

（修订本）

毛澤東傳

（美）R·特里尔 著/刘路新 高庆国 等译 胡为雄 校

河北人民出版社

毛澤東傳

〔美〕R·特里尔　著　刘路新　高庆国　等译　胡为雄　校

河北人民出版社

毛澤東傳

（修 订 本）

〔美〕R·特里尔 著

刘路新 高庆国 等译 胡为雄 校

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石家庄市城乡街44号）
河北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河北省新华书店发行

850×1168毫米 1/32 18.5印张 453,000字 1989年3月第1版
1991年7月第7次印刷 印数：620,001—670,000 定价：7.80元

ISBN 7-202-00359-7/A·2

中文版序

R·特里尔

已经以六种语言出版的《毛泽东传》，今天又有了它的中文版，我非常高兴，它终于来到了最关心它的人们中间。

今天，人们小心翼翼地评论毛泽东的时代，特别是他的后期。当时并不象现在这样重视经济，而是以政治统帅一切；人们极少关心中国以外的世界，而是关起门来高呼口号。当时只有毛的像章和“红海洋”，人们的思想意识就是“为人民服务”。

然而，中国还是中国，中国人还是中国人。岁月更迭，中国正在走进一片崭新的天地，正在抓住新的机会。毛自己曾经说过：“死了张屠夫，就吃混毛猪？”

回顾过去，我认为，我们可以说，毛领导的革命在某些方面已经结束。炮火已经停息，硝烟已经散去，人性开始回归——带着它顽强的个性和执拗的梦想。

在《毛泽东传》一书中，一位外国作者为

中国人描述了一位中国领导人的生活。这似乎有些不可思议！但是，毛不仅是中国的，而且是全世界的，他的影响早已经超出了他的国家。人类有着某些相似的特质和志向，这就意味着我们要用一些更具普遍性的标准衡量人类的领袖人物。其中一个最基本的标准是：他为他领导的人们带来了什么。

作为一名外国人，还有第二个因素使我意欲写一本关于毛泽东的书。在对中国作了近25年的访问和研究之后，我发现，二十世纪中国发生的一些事件并不为大多数中国人所明了。当然，在中国，近几年关于毛的新资料不断出现，例如关于遵义会议，而且肯定还会有更多的史料为人所知；但是作为外国学者，他们可以不断努力去挖掘一些中国尚没有公开宣布的资料。例如，为了写《毛泽东传》一书，我曾到过印度尼西亚、缅甸、澳大利亚和其他很多国家，拜会了那些曾见过毛的外国领导人，倾听他们对毛的评论。

1976年可以说是中国的一个分水岭，在这一年的变化使我怀疑当时官方的"正确性"。那时我曾为邓小平辩护，我告诉过一些中国官员，作为一名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我认为，说邓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是荒谬的。但有些中国官员不同意我的看法。而多数官员与人们和我的看法不谋而合，于是，我决定仔细分析研究中国发生的每一件事和它最近的历史，并决定要写两本传记。首先，我选择了毛，然后我又写了江青，前者是人们公认的英雄，后者则是一个恶魔。

在传记中，我们可以看到政治、文化和个人意志的相互作用。应该说，在毛的故事中，马克思主义只是一个组成部分，传统意识、大写的自我、人际竞争、健康状况等等，在毛的生活中都是一定的影响因素。我努力把毛描写成一个人。

有些中国人建议我不要写关于毛的书，他们告诫我说这是一个非常敏感的政治问题。我决定不过分涉及敏感的政治，传记不

应该追赶政治上的时髦。本书的后记对毛作了进一步的总结，有些方面与1981年以来中国共产党的决议对他的评价是吻合的。

同时我在书中还谈到了权力集中的问题，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中国人民是得益于毛的领导的，而文革中又深受其苦。重要的是，对毛在六、七十年代的悲剧要有一个清楚的认识，我们不能把一切错误都加在毛一个人的头上。

一种革命被发动起来后，不再需要其他的“革命制造者”。但是，有人企图贬低毛是不可取的。在这里，我要坦率地说，毛在后期所出现的问题并不主要是意识形态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在权力集中而且不受人民制约的地方，就会不可避免地出现动荡不安、主观武断和因循守旧。

当权力集中于一人之手而且不受任何约束时，掌权者会认为他自己就是真理和权力的本源。

我注意到，自1976年以来，中国在检讨自己的失误方面有了明显的进步。起初，人们都把错误归罪于“四人帮”。

后来，毛被肢解为好的部分和坏的部分，据说，“四人帮”的破坏和毛的失误应对所出现的一系列问题负责。

当一些中国人对整个政治体制发出“诘难”时，开始了第三个阶段，用中国人的话说，就是要搞改革、开放。邓小平本人也鼓励这种“诘难”，他首先号召进行“政治改革”。政治体制问题会继续受到人们的关注，因为这在当代是一个热点。

毛有很多不同的言论，其中一些很有意思。在他生命的后期，他似乎理解了政治所能达到的界限、斗争的永恒性和人性的特点。尼克松对毛说他已经改变了世界，但是毛不同意这种赞美：“我并没能够改变它，我只是改变了北京的一些地方。”

毛具有使人惊讶的能力，其中最令人惊讶的或许是毛晚年对自己的制度所作的毁灭性的打击。通过发动文化大革命，使人们对马克思主义产生了怀疑——甚至厌恶政治。这就又产生一个问

题：在毛以后的中国社会，新的意识形态将会是什么？这也是一个即将提上议事日程的问题。

最后，我要感谢译者刘路新先生和河北人民出版社的编辑，是他们的辛勤努力才使更多的中国读者能够看到这本书。

序　言

黑发分头下温和的面容，柔软的双手，炯炯逼人的目光，保持头部稳定的宽大的双耳，在没有皱纹、宽阔而苍白的脸上尤显突出的下颏上的黑痣。"一位典型的中国大人物"，一位认识他和其他中国领导人的缅甸人评论道："他没有周恩来的清秀，但是显得慈祥宽厚。"①

年逾82岁，毛泽东的外貌没有很大的改变。青年时看上去略有焦虑，在官邸里，这位领袖显得雅致、悠然自得。他渐渐地发福，同时也失去了热情的知识分子的神态，对一切事情应付自如。"他看上去象一头海象"，一位在他有生之年见过他的泰国领导人说："一切都显得高深莫测。"②

他总是处在人们注意的中心。富于自制力。给人的印象是能同时眼观六路。毛从来没有失去他的两重性：脑弦紧绷如满弓，机敏似猫。

他善穷经据典，使来访者大惑不解，或以

沉默静思使对方不知所措。他把手伸进口袋般的裤子里扪虱子的粗举又会把另一来访者吓得目瞪口呆③。脸部的上半部分显示他是一个知识分子：宽阔的前额，探索的眼睛，长长的头发。下半部则表明他是一个感觉论者：厚厚的嘴唇，高隆的鼻子，稚童般的圆圆的下巴。④

毛的行动并不优雅，他步履蹒跚。美国妇女活动家史沫特莱带着政治的和个人的热情在三十年代曾试图让毛唱歌跳舞——她轻易地与其他中共领导人所做的一样——但最后不得不怏怏地放弃这种努力。"高傲和自重妨碍了他的跳舞。"⑤在这同一时期认识毛的一位流放中的日本共产党人野坂参三说，他的舞姿看上去象在做操。⑥毛的舞蹈节奏很不自然。

毛出击时从不错过目标。而他的这种平衡——如果存在平衡的话——是来自对手的撞击。他说自己既有虎气，又有猴气。他的性格中冷酷无情的一面和幻想狂热的一面不断交替出现。

他的手书表明，他是一位随心所欲而不会为戒律所困扰的人。那些字体则大则小，龙飞凤舞，用绅士派学者的标准衡量，这并不是"好"书法。

因为毛是一个复杂的人物。所以人们决不知道他深深的城府里会随时流出些什么。尽管毛是一位温和的人，能控制自己的情绪，但也有脾气。来自密苏里州的记者埃德加·斯诺，早在三十年代就见到毛，他说，毛对任何事情从不持中立或消极态度。

毫不奇怪，毛不总是能够经常博得众人的爱戴，至少不象周恩来那样——这位高级官员甘愿立于毛的身影之下；或者不象朱德那样——这位中国共产党军队的总司令坚韧、极易犯错误、经常咧嘴笑(史沫特莱成功地使他们二人与自己跳舞)。

"我简直不知怎样与毛交谈，"一位与毛和周恩来都打过交道的印尼人说，"与周而不是与毛在一起——可以有热烈的讨论，你会完全知道你的位置。"

毛生于1893年，逝于1976年。这一时期，中国的一切事情几乎都翻了个过儿。封建王朝被推翻。战争象有轨电车一样去而复来，成千上万的人死亡。密友翻脸。斗争的火炬传给新的一代，而他们并未感到象毛在燃烧时的那种热度。

他活着。他以铲除所有的不平等让社会进入一个新时代为毕生使命，这位幸存下来的农家子看上去更象一位先祖而不是政治家。在几十年的战争生涯中——这一战争摧毁了占人类五分之一人口的古老帝国，同时也使他家中四分之三的人以身许国——他却从未负过一次伤，没有失去一只胳膊、一条腿或一只眼睛。

在他个人的身躯里含藏着中国革命的故事。

怎样说才贴合毛泽东的形象？农民造反者？他劝导并率领从湖南稻田里和江西绿林中来的群氓游民组成的弱小军队，夺取了地主手中的统治权。

军事统帅家？他说过，他的胃口从未象在战争时期那样好过。⑦

诗人？如果他不置一切不顾，去吟上几句诗以表达令人振奋的斗争激情，描绘中国山河的壮丽，就难以结束一场战斗。*

近代以来，许多中国的爱国者出国寻求到了使苦难中国获得新生的手段吗？毛从欧洲借来的不是机器、宗教或自由制度的蓝本，而是共产主义，他借助于技术和灵活性，对症下药，使一位病入膏肓的病人——中国起死回生。

帝王？他教会中国三代人去公然蔑视束缚中国人民两千年之久的禁条和权威，然而最终，或许他自己也感到绝望，他树立了一面天子出言皆金科玉律的镜像，这可怕地表明，旧世界老是附在新世界身上而再生。

---

* 提起自己的优美诗句，——这些古体诗他曾劝阻青年不要去效仿——他一反谦谦之态。“谁说我们没有创造性的作者？”他在1942年的一次演讲中说道，“这里正好有一个！”他指着自己，加了一句。

目　录

少年时代(1893—1910)

稻田里的竹台上，坐着一位身穿灯笼蓝裤的少年，一头浓密的黑发在阳光下熠熠发亮，一双炯炯有神的大眼睛充满幻想，他身材单薄，但个头对他那尚未成年的年龄来说颇高了点。他的任务是看护秧苗，防止鸟禽侵害。

翠绿的群山环抱着一个田园山冲，土墙草房掩映在山峦绿茵里。一座石桥横倚谷中，眼前的大自然和二十世纪初的这个亚洲乡村生活是那样宁静，竹台上那孩子身边翻旧的书却与这一切毫不相干。

这位农家孩子姓毛，“毛发”的毛，他的学名叫泽东，意即“润泽东方”。

他家里的四间房子座落在一片绿色的山坡旁，治家严谨的父亲掌管家庭大权。毛先生身材不高，长相精明，留着髭须，一副干什么事情都急不可耐的神色。十八亩农田构成了他的世界，他为此而兢兢业业。

泽东就出生在这个坚实而宁静的粘土砖房

里。随着他年龄的增长，他与父亲的冲突也在增加。

入夜，四周一片静寂，空气燥热，只有阵阵蟋蟀在鸣叫。没有人说话，也没有人走动，整个山村似乎已完全溶进大自然之中。毛家的房子里却点着一盏油灯，微光映洒一面墙壁。在当时的中国乡村，到夜晚农民便早早上床睡觉，可是泽东却正坐在没有玻璃的窗户下挑灯夜读，完全陶醉于一本英雄传奇式的小说《水浒传》。他那挂满汗珠的脸贴近那一盏灯火只有黄豆粒大小的油灯，且还用被子半遮着油灯及自己，以免灯光射出去，因为毛先生不喜欢他的儿子夜里费油点灯。

一天，毛家和邻居之间的池塘边上发生了这么一幕：毛家请来的客人们穿着走亲访友时才穿的衣服，站在这个长满莲藕的池塘旁边，表情尴尬、欲言又止。这种短暂的平静随时会打破，因为毛先生的火暴脾气已一触即发。站在他面前的满脸通红的泽东成了人们注意的中心。

刚刚在家里父子俩发生了一场争吵。父亲当着客人的面骂他懒而无用，泽东顶撞了父亲，然后跑出家门。父母都出来追赶他，客人们也都小心地跟在后边。泽东跑到了池塘边上停下，声称如果父亲再靠近一步，他就要跳下去。

毛先生压住雷霆之怒，转而同儿子论理而不使用殴打手段。他提出，只要泽东对自己的无礼表示道歉并磕头表示以后顺从就行了（在旧中国，磕头是一种繁琐的跪拜礼，磕头者要双膝跪倒，用头触地九次）。泽东在客人面前的反抗举动迫使父亲作出了让步。泽东向父亲道了歉，但仅只半磕头（一只膝着地），毛先生许诺不再打他。

毛家的生活比韶山大部分人家要宽裕。在十九世纪初，即毛泽东的童年时期，毛先生把这个贫穷的家庭变成为一个较富裕的家庭。1904年泽东10岁时，他家只有十八亩农田，3岁以后就增

加到二十四亩。毛家每年大约要消费掉四千五百斤稻米，此外还有约七千斤余粮可供出售。毛先生雇了一名长工，精细地做粮食和生猪的投机贩卖生意，同时还通过放高利贷的手段赚钱。他攒到一笔本钱后就开始买进其他农户典当的土地。毛先生的家里看起来还相当景气，有一座牛棚，一个粮仓，一个牛栏，一个猪圈，还有一个小小的磨坊。

这座土墙住宅原是泽东的爷爷在1878年修造的。毛先生家境渐渐富足，对住宅进行了扩建和整修，显得比过去气派多了。后来，这里住着两户人家，毛家和邹家。当泽东看到自己家的房子换成瓦顶时，邹家的房子仍然是草房。

泽东是无忧无虑地成长起来的。与他同龄的其他孩子享受不到这种优厚的生活。他没挨过饿，衣服不多但从不衣衫褴褛。他母亲持家井井有条。令他头疼的是父亲。他的渴求在精神方面。

韶山美丽而宁静。它离最近的城镇也有几个钟头的山路。这似乎是自然的造化。这里几百户人家，多属毛氏宗族，但人烟稀稀。所以，韶山的基色是青山绿树和片片庄稼。

脚下是红色的土壤。插满秧苗的水田在阳光下银波粼粼，象一面点缀着碎珠的巨大镜子。清新的竹林衬托出烟雾缭绕的青色山峦，并排而立的参天松树，象是在忠实地保卫着它们赖以生存的山坡。

从地名上我们可以看到农民对大自然的敬畏及融洽。韶山的意思是音乐之山。传说古代有位皇帝巡游时曾在此休息，并在四周的山峰上演奏过韶乐，① 韶山便由此得名。距韶山最近的两座城镇也依流经附近的湘江而取名，同时湖南省也简称为“湘”。

这里没有报纸，外界消息都是通过口头传播，未有新闻传入，韶山几乎与世隔绝。如果来了北京皇宫的布告，首先召集村民宣读，然后就把它贴在村校的墙上，再无人过问。就象毛家孤零零

地立在山坡上一样，韶山两千多村民自成一个世界。

韶山，泽东少年生活的天地，直到他16岁永远离开它之前，他从未远离家门七十里以外。

湖南是一个富饶而生机勃勃的内陆省份，这里充满了传奇色彩，历代为兵家必争之地。湖南人喜欢告诉你，他们家乡是七山一水两分田。这恰当地道出了湖南之现状的缘由。

除了北部有洞庭湖外，湖南的东部、西部和南部都是连绵起伏的山脉。因此这里的人们形成了粗犷的气质，连绵的群山为一帮一帮的土匪出没提供了天然的庇护所。在湖南这片土地上生活的人们既有精明狡诈的一面，也有勤俭朴实的特点。在毛泽东以后所作的诗词和散文中，高山的形象宏伟壮丽，桀骜不驯，无往不胜。

境内众多的湖泊和四条江河使湖南有鱼米之乡的美称。泽东从6岁起就喜欢游泳，他后来世界观的形成，几乎可以说与他的中流击水、江河拍浪分不开。

洞庭湖平原是中国的主要粮食基地。俗话说，"两湖熟，天下足"。同时，这块人口众多的平原还有着丰富的政治传统，不管是在商业还是在思想领域，省城长沙常常领导着中国的新潮流。

韶山既不处于湖南的高山峻岭中，也不处于平原上。在泽东身上，既有山地人的特性：粗陋朴实、反叛精神、英雄豪杰意识，又继承了平原人的传统：热爱读书、擅长组织和关心世事。如果说湖南人的性格是山岭的粗犷与平原的柔和相结合的话，那么，毛泽东可以说是地地道道的湖湘子弟。

在毛先生家里的摆设好象比不上挂在房梁上的一串串红辣椒那样鲜艳。和大多数湖南人一样，毛先生吃饭时喜欢有辛辣的调料。在这种家庭长大的泽东，一生都喜欢吃辣味食物。

其他地方的中国人不得不提防湖南人的暴烈和固执，但是，

他们也并不否认湖南人英勇顽强。当时在全国一度流传着这样的说法："湘人不倒，华夏不倾"。

他们大多都有宽宽的前额、深眼窝、红面颊，他们是中国的普鲁士人*。因而毛泽东决不是在平庸之中长成。

韶山的宁静只是暂时的，因为山外正发生着急剧的变化。在北京，中国的最后一个王朝正奄奄一息。中国是极端落后的，1880年毛先生开始闯荡世界的时候，偌大的帝国在其繁荣的表象背后却连一米长的铁路也没有。

中国正在被欧洲列强瓜分。1893年12月毛泽东出生的几个月后，日本也参与了瓜分。1894年的中日战争中，日本大胜中国，使中国的士阶层大为震惊、惊慌失措。

与此同时，一些外国的社会思潮，也以前所未有的势头涌向中国，冲击着中国人的心灵。就在泽东出生前夕，中国的第一位驻外大使出版了一本记述英国见闻的书，书中对西方世界的描绘使孔夫子的信徒们大吃一惊。当3岁的泽东蹒跚学步时，中国的首批赴日留学生已启锚东渡了。

反对满清政府的浪潮象暴发的洪水在迅猛高涨。在毛先生的青年时期，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几乎推翻了满清王朝，但后来，清政府在欧洲人的帮助下，于1864年平息了这次起义。在泽东的童年时期，中国发生了旨在革新朝政的变法运动。结果是令人沮丧的，因为改良已解决不了问题。

泽东还不到一岁的时候，孙（中山）(1867—1925）写了一份请愿书，标志着他从改良向革命的转变，推出了彻底变革旧中国的方略。守旧派总是设法抵制变革；他们造谣惑众，说什么如果火车要以小孩作燃料，那么燃烧的洋理论不正是对火神的亵渎

* 普鲁士人以吃苦耐劳、纪律严酷著称。——校注

吗？泽东就出生在这样一个旧中国走向没落的时代。

在和父亲发生冲突以前，泽东是以中国传统的方式养大的。他从未挨过打，穿着开裆裤，毫不顾忌地随地便溺。

他捉蟋蟀、做游戏。他咯咯地笑着，高兴地接过大人们给的红鸡蛋，站在一旁看大人们焚香为慈禧太后（1835—1908）祝寿。

他有时会看一眼堂屋内檀木桌子上的青铜佛像，他还以不解的眼光盯着大门两旁歌颂太平盛世忠孝贤明的对联。他开始琢磨中国的象形文字的意思，读字的发音是湖南口音，“h”常读成“f”，因此，“湖南”也就成了“弗南”。

和所有的农民一样，毛先生为第一胎就生了个儿子而非常高兴。儿子是个宝，女儿是片瓦。当时认为只有儿子才能继承家业、传宗接代，而女儿是不可以的。毛先生读过两年私塾，16岁时为避灾荒去当了兵，虽然韶山的大部分孩子都上不起学，但是泽东还是有这种机会的。在毛先生看来，儿子识几个字能搞清楚家中的往来帐目，能代写个契约合同，同时，接受儒家思想教育，能把一个娇惯的孩子改造成一名孝顺懂礼貌的青年。

村头的南岸是所私塾，这所学堂十分正统，不容有丝毫外来的异端邪说。象圣经在新教主日学校里人人必读一样，学堂里奉为经典的“五经”具有至高的地位。泽东8岁时开始念书。他对读经书不感兴趣。多年以后，毛泽东回忆说：“我8岁起就厌恶儒学。”②

泽东常和他的同学们在上课时偷读禁书，老师一走过来，马上就用经书遮住。这些书大多是描写战争或反叛的，诸如《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等。韶山时期，这些书比任何东西都更影响了毛泽东的心灵世界。

虽然这些书不会给清政府的统治造成大的威胁，但是它们属

于禁书之列。儒家信徒也不赞成读这些传奇小说，因为这些书将把文人学士引向另一个文学天地——泽东的情形正是如此。

13岁离开私塾时，泽东已经变得对经书里的清规戒律非常憎恶。而他首先反对的就是那种讲求陈规礼仪的古代道德哲学。它只要求人们盲从，只要求孩子们鹦鹉学舌般地大声朗读那些晦涩的陈旧的格言，摇头晃脑，象念经的和尚。

正如拉丁文课不受现在的西方学生欢迎一样，对《论语》的学习于中国顽童肯定是件苦差事。

儒学的功用适得其反。它强调忠孝，这反而使泽东憎恨两个管他的人：老师和父亲。

这两个人都打过泽东，这使他更加愤怒。他虽然还没有形成什么思想，但是已经有了强烈的正义感。泽东在成为一名叛逆和革命者之前，早已心有定见，且已经是一位倔强的充满激情的少年。

他的正义感首先是在他与同学们的相处中表现出来的。他很同情班上一位因家境贫穷而带不起午饭的同学，常常把自己的饭与他分着吃。母亲看到他晚饭吃得那么多感到迷惑不解，当泽东告诉她事情的真相后，这位善良的母亲便每天早晨都给儿子准备两份中午饭带去上学。③

正义感使泽东从不示弱。10岁时他曾和高年级的同学打过一次架，这使他母亲很是担忧，因为她终身向善。

进入南岸私塾两年以后，泽东知晓了在课堂上背诵四书五经的礼节，离座去到老师的讲桌前站好，面向旁边，以免正视老师，然后背诵指定的段落。但是，有一天上午，当老师叫到他的名字时，他竟在座位上纹丝不动。他开始了反抗。

“你听得清楚我背书，并且是坐在那里，这样我又为什么要站起来背呢？”④泽东毫无惧色地对不知所措的老师说。

老师气得脸色煞白，命令泽东按老规矩做。这个10岁的孩子

搬着自己的凳子走到老师跟前，然后坐在凳子上，以平静而挑战的目光望着老师。怒不可遏的老师扯着泽东的衣服企图让他站起来，泽东挣脱了，然后跑出学校。象《水浒传》中的叛逆者一样，躲进了山林。

他朝着自己想象中的“城市”方向走去。但走了许久还只是在山谷里兜圈子，没有走出十里路。家里的人四处找他，但是他不敢回去，因为老师肯定会打他，父亲也不会放过他。

三天以后，毛家的一个人发现了他。他才多少有点屈从地回了家。

若干年后，这位昔日的小学生更多地从政治角度回忆这件事。他对埃德加·斯诺说：“我回到家里以后，想不到情形会有点改善。我父亲稍微比过去体谅些了，老师的态度也比较温和些了。我的抗议行动的效果，给了我深刻的印象。这是一次胜利的‘罢课’呵。”⑤

聪明的泽东尽管讨厌四书五经的内容，但学习还是不错的。不久，在与父亲争吵时，他就能引经据典地与父亲辩论了。在二十世纪的中国，即使是通读四书五经的孩子，也不能保证长大后都孝顺。

泽东在13岁时辍学了，因为毛先生不满足于儿子只是在上学前和放学后到田里帮着干农活。父亲曾因算盘打得不行在经商时吃过亏，泽东学过算术，在这方面可以帮他的忙。从5岁起，泽东就开始干一些力所能及的活，拔草、捡柴、放牛、拾豆子等。现在，白天他是一个成年劳动力，晚上，他成了父亲的管帐“先生”。宝贝儿子开始回报了。

因常在一起，父子之间出现了更多的摩擦。泽东和他父亲斗智，经常用温和而坚定的反抗使暴躁的父亲为难。泽东讨厌去为他越来越富的父亲四处要帐。一次他帮父亲去卖猪，在回来的路

上，他把全部收入都给了一个乞丐。⑥

冬天，父亲常坐在火炉边，或是抱怨泽东不听话，或是叼着烟袋生闷气。他曾和人家打过官司，因为对方在公堂上恰当地引经据典使他输了。泽东现在也能引经据典舞文弄墨了，他还会孝顺自己吗？但是既然木已成舟，做父亲的总应是慈爱的呀。

一天上午，毛先生看到泽东在地边的一块墓碑旁看小说，他大发雷霆说："你是不打算干活了？"毛先生一边说一边扫了一眼泽东跟前的两只空粪筐。"不！爸爸，我只是歇一会儿。"毛先生又责备泽东一上午也没有从猪圈里往田里送一筐粪。事实上，泽东已经送了五六筐了。事情就这样不了了之。但是到了傍晚，毛先生发现他的儿子又在那块墓碑旁看小说。⑦

他责备泽东受了"坏书"的影响，以至于连父亲的劝告都不屑一顾了。"不！爸爸，我是听你的话的，你要我做的事我都照做了。"当发现泽东一下午担了十几筐粪时，毛先生半惊半喜，张口结舌。

泽东说："活我照常干，书也要照常读。"

当然，泽东也有过失（有书籍记载的很少）。有一次，因为看书入了迷，放的牛跑进了邻居家的菜地他都不知道。⑧

毛夫人身体健壮，慈眉善目，与她那消瘦精明的丈夫形成鲜明的对照。她宽厚随和，她丈夫则粗暴吝啬。从体格、长相上来说，泽东更象他的母亲。他们都有敏感的大眼睛，甜蜜的笑容，从他们的走路和手势就可看出他们的慷慨大度和多愁善感。

毛夫人娇宠了她的长子，泽东也终身深爱母亲。幼时的泽东是家中唯一的小孩，母亲在他身上倾注了全部的爱（还有他的爷爷，他在泽东14岁时去世）。*

毛夫人的娘家在韶山南边的一个县，是一个普通的家庭。和

---

* 第二个孩子泽民生于1896年，比泽东小8岁。

韶山的大多数人一样，她也是只字不识。同时，毛夫人还是一位佛教徒，泽东经常和母亲一起到附近的凤凰山的佛庙里去求神拜佛。

毛先生从不信佛，这曾使泽东感到伤脑筋。9岁时，泽东曾和母亲讨论过父亲的不信佛以及如何帮助父亲的问题。毛泽东在数年后回忆说："当时和以后，我们试过很多办法想让他信佛，可是没有成功。他只是咒骂我们。"⑨

可以肯定，父亲把发财看得高于一切。但是后来泽东发现，父亲对神灵的态度有了变化——尽管不一定是出自内心的。一天，毛先生外出要帐，在回来的路上碰到一只老虎。这只老虎受惊逃掉了，毛先生如释重负。后来泽东回忆说："从此，他对佛教比较尊重了，间或也烧些香。"⑩

1905年，第三个儿子的出世使毛先生的脾气有了一点变化。父亲对比泽东小13岁的泽覃比对长子更好。但是泽东与父亲的作对并没有停止，这使家庭关系日趋紧张。

泽东和母亲联合起来对付父亲。他们背着父亲把稻米送给揭不开锅的乡亲们。还和家里的长工结成统一战线反对父亲的吝啬行为。最后，他们（在泽东舅家的帮助下）共同说服泽东的父亲，同意让泽东继续学习。

泽东发现他的家庭正分为两派：一派是他父亲（"执政党"），另一派是他和母亲、二弟泽民以及长工结成的统一战线（"反对党"）。⑪

但是，"反对党"在策略方面发生了分歧。泽东的倔强、精明总是对父亲采取正面顶撞。对此，母亲是不赞成的。她反对说："这不是中国人的做法。"由于读书所受的影响，同时，外边发生的事也波及到一向平静的韶山，泽东对佛教的信仰日趋淡化，这使他母亲感到不安。

在读书时，母亲成了泽东的庇护神，给他保护，泽东也很敬

重母亲。尽管他对她的爱没有减弱，但是随着成年的到来，母亲对他的影响不如以前那样大了，特别是在韶山的最后两三年里。泽东当时是在同“中国人的做法”开战。

一个农民秘密组织哥老会的一些成员袭击了毛先生的家。泽东在多年后回忆说：“我想这是件好事，因为他们偷走了他们没有的东西。”他这种大逆不道的观点不仅遭父亲反对，“我母亲也不赞成”。泽东承认说。⑫

毛先生有办法对付他这位爱想事又很倔强的儿子，这种办法在当时是很典型的，他为泽东找了一个女孩子并强迫14岁的泽东娶她。可怜的泽东呆若木鸡。出于某些考虑，泽东顺从地接受了这种生硬而可怕的仪式，这个呆呆的小新郎衣着齐整，规规矩矩地向每一位来客磕拜。但是他拒绝与这位比他大六岁的新娘圆房，他说他从未碰过她一个指头。⑬

儿子对付专横父亲的做法在当时也非常典型。他接触了更为广阔的精神世界和社会，因此他的思想不再局限在家庭这一狭小的天地之间。

学堂给了泽东宝贵的学习能力。他象猫逮耗子一样搜寻和阅读在韶山能找到的各种书籍。泽东读过一本描写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小册子，几十年后，他还能充满激情地回忆起其书的开首句：“呜呼！中国其将亡矣！”他在回忆这本书对他的影响时说：“我读了以后，对国家的前途感到沮丧。我开始认识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⑭

一本倡导维新和技术改良的书——《盛世危言》，使泽东接触到了这样的思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看到这本由具有改良思想的买办写的书后，使泽东产生了这样的考虑：为了中国的命运，他应该走出韶山，去学习更多的知识。

还在韶山读书的时候，有一天，泽东和他的同学们碰到一群

从长沙来的豆商。他们之所以离开长沙，是因为1906年的饥荒使长沙发生了大规模的抢米暴动，愤怒的人群把抚台赶出了衙门。后来官方新派一名抚台，又恢复了统治，接着就是一连串的流血事件，很多暴民被斩首示众，其首级挂在旗杆上，以儆效尤。[15]

在好多天的时间里，来自山外的这一消息把学校搞得纷纷扬扬。这件事使泽东终生难忘。泽东的朋友差不多都站在暴动者一边，但是，他们“仅仅是从旁观者的立场看问题。”对他们寄予同情，而没有看到这件事与自己的联系，“他们并不明白这同他们自己的生活有什么关系。”但是泽东看到问题的更深一层，“我却从此把它记在心上。我觉得跟‘暴民’在一起的也是些象我自己家里人那样的普通人，对于他们受到的冤屈，我深感不平。”

韶山也有人造反。哥老会的一些成员——它的势力在整个湖南都很强大——因为地租问题与韶山的一个地主发生了纠纷。恼怒的地主控告他们用银元贿赂官府赢得了这场官司。哥老会在一位姓彭的铁匠的率领下，聚众暴动，官兵追捕他们，迫使他们躲进了浏山。地主扬言，他们在聚众闹事之前曾杀了一名婴儿祭旗。后来，哥老会被围捕，彭铁匠被斩首。

在泽东看来，《水浒传》的故事正在他的家乡重演。他听别人把彭铁匠称作“土匪”，在激动人心的小说里，农民起义领袖宋江也被称为土匪。同时，和历史上经常出现的情况一样，群山成了庇护所。泽东还产生了另一种联想，他后来回忆说：“在我们的心目中，他是一个英雄。”[16]

不久，毛先生也成了造反的对象。

在泽东17岁那年，时值青黄不接，韶山发生了粮荒。一双双饥饿的眼睛都在盯着商人和地主们的粮仓，挨饿的人们发出了“吃大户”的呼声。但是毛先生这个“大户”没有任何反应，在饥饿袭击韶山时，他仍向长沙贩卖粮食。愤怒的村民拦截了他的货船，把粮食抢个精光。[17]

“我并不同情他。”[18]泽东谈及当时暴跳如雷的父亲时说。他形成了一个深固的观念：他那心狠的父亲是旧中国不平等的社会制度的卫道士。这位少年看到了父亲的发家途径，他得出了一个可怕的结论：老头儿是中国走向真正的自救之路的绊脚石。

泽东的话充分表明了他对父亲的态度和情感：“我学会了恨他。”[19]他已经把自己的少年生活与整个时代联系在一起。

二十六年后，毛泽东在回忆当时之所以没有完全与村民站在一起时说：“但同时我又觉得村民们的方法是不对的。”[20]可能是看到自己家被围，他感到了震动，也可能是他后来的经验告诉他，没有一整套政治策略而只有单纯的反抗是不会成功的。

在进一步求学问题上，泽东与父亲之间的争吵到1910年发展到比较激烈的程度。毛先生打算让泽东到湘潭县城的一家米店当学徒，湘潭距韶山七十多里。泽东对父亲的安排并没有强烈反对，他想，县城里也许能提供更好的机会，但他真正想去的是到一个洋学堂读书。他小心翼翼地向父亲谈了自己的想法，但是父亲只是粗声地笑了笑，这刺伤了泽东。在这以后，他与父亲一度互不讲话。

在外婆等几家亲戚的帮助下，泽东在湘潭一个失业的法科学生家里学了半年*。尽管他迫于父亲的压力，或因经济问题，不得不经常回到韶山，但是，半年的学习过后，泽东已不再是父亲所期望的那种宝贝儿子了。

16岁的泽东为自己制定了稳妥可行的计划。他从家里的亲戚朋友处东借五块钱西借十块钱为自己的行动作准备。一天，吃晚饭时，他直言不讳地向父亲宣布：“我要到东山高小读书。”

“你说什么？”毛先生发火了，他对付这位倔强儿子的最后一张王牌就是钱，“你是不是今早中彩发财啰？”

当他得知泽东已为此凑了一些钱时，毛先生的贪婪面目完全

---

* 原文有误，毛到湘潭是做学徒。——校注

暴露了。这个守财奴大声说道，如果泽东到湘乡读书，必须要有一笔钱用，支付雇来顶替他的长工的工资。[21]

泽东也不想把贪婪的父亲逼得太甚。他又从一位尊重学问、并帮助族人上学的母方亲戚那儿借了一些钱。

当重提起花钱雇工这件事时，泽东要了父亲一下。他打断老头的恼怒，不动声色地问道："雇一名长工一年要多少钱？"可怜的毛先生说要十二块钱。泽东把装有十二块钱的一个纸包放在他粗糙的手上说："这是十二块钱，我明天早上就去东山。"[22]*

黎明时分，泽东起来收拾自己的行李。毛夫人伤感地默默无言地看着在忙活的儿子，除了提醒儿子不要遗漏东西，她只问道："你去跟爸爸辞行么？"泽东回答："不，我不去。"

天亮后不久，泽东就出了韶山。这是一个凉爽的金秋的早晨。肩上还是那根用惯了的扁担，但两头挑的不是粪筐。一头是一只装着一件长袍、两条床单和一顶蚊帐的包袱，另一头是装有《水浒传》和《三国演义》的筐子。他对韶山以外的世界几乎一无所知，自此，他再也不返回韶山居住了。

难道16岁的泽东在韶山已是羽翼丰满的叛逆者了吗？

主要因为来自母亲的道德观念，加上读书产生的社会意识，泽东在刻板的学校和严厉的家庭的环境里成了一名不安分的人。

毛先生是一位令人讨厌的人。他经常打骂泽东，在别人面前羞辱他，嘲笑他的求知欲，始终认为泽东"懒惰"而且"无用"，并以自己的成见限制泽东的成长。

按传统观念，即使父亲是恶棍，儿子也只有服从。泽东蔑视这

---

* 原文失实。作者的资料来源于肖瑜用英文写成的("MAOAND I WERE BEGGARS")《我和毛行乞记》，这本有些哗众取宠的书虽然披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材料，但不免有许多不实之处。据毛的亲属回忆，几经变故之后，毛的父亲是愿意送子"读新学"的。在肖瑜的以讹传讹的说法中，毛的父亲俨然是一个毫无爱子之心的极度残忍的人。——校注

个。然而，儿子与父亲在其他方面的相似又是惊人的。与当时其他青年叛逆者不同，泽东没有忘记他的家庭，他与家里的人保持着联系，并得到他们的多方帮助。他说他的家庭和“普通家庭”一样，这显然是不合实际的。

泽东在家时的作为也没有走极端。他常常向父亲妥协，他忍受了痛苦的“婚姻”，他没有离开农田去参加哥老会，他在韶山的大部分岁月都是信佛的，当他离开韶山时，他仍然忠顺朝廷。

在韶山的东边不远，与毛泽东差不多同龄的张国焘，后来也成了中国共产党的上层人物。年轻的张国焘与家庭关系很融洽，与他那位富有的受过良好教育的父亲相处很好，然而他也成了一名叛逆者。[23]*

在泽东的生活中，他在家庭和南岸私塾的遭遇并不是个别偶然现象，家庭和学校从心理上烙上了庞大的中国社会等级制度森严的标记。

是的，泽东从8岁就开始厌恶儒学。他曾回忆说：“我的‘大部分同学’都讨厌读四书五经。”[24]

这位16岁的青年在历史变迁的特殊时期，成了一位典型的中国式的叛逆者。他不是神经质，他反对的不仅在于父亲本人，而在于父亲所代表的社会制度。他的反叛是明智的。

依照当时的中国文化规范，毛先生对儿子的要求并不都过分。泽东之所以反抗是因为他感到父亲所代表的权威是可恶的，且正在走向没落。如果中国的家庭和村庄都象这个样子，中国如何才能得救？如果韶山的这种父权家长制是中国的正统规范，那么，妇女将有什么样的命运呢？

作为个人，泽东的反叛与当时整个国家的反抗浪潮非常吻合，他自己也把个人的斗争纳入整个社会斗争之中。[25]他说：“我

---

* 原文有误，张系江西萍乡县人。——校注

与之斗争的第一个资本家是我父亲。”

泽东与父亲之间关系的紧张既有社会的一面，也有心理的一面。父亲对他的压制不能完全归结为社会的“压迫”。泽东的弟弟与父亲的关系不象他这样紧张，据说，他们俩都因为父亲的同意而受到了很好的教育。

出于内心骄傲，泽东夸大了父亲的自私和专横。*

正象他母亲的温和善良一样，父亲的粗暴管教方式——这不是他的目的——也深深地影响着毛泽东的一生。

虽然从心理上讲，泽东和母亲更为亲近，但他并没有承袭多少母亲的性格特征。等到另外的三个孩子出世以后，分散了母亲的注意力，同时，泽东也认为母亲的想法有时有异，母子间的关系开始疏远了。

离开韶山时泽东心有鸿愿，他要向父亲证明自己有出息。在以后为更有价值的目标而奋斗过程中，他在许多方面超出了父亲，但他和父亲仍然习性相近。

在泽东憎恨父亲的背后，父子间存在一种未认识到的同一性，在一个更广大的范围内，他成了和父亲一样的权力主义者。

毛先生并不十分了解自己的儿子。泽东瞧不起自己的父亲，他用策略而不是过激的方法来对付父亲，并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与此同时，毛先生试图以粗暴的方式培养的“美德”确实深深地植入泽东的心灵深处。他不久就向别人说：“怠惰者，生之坟墓。”俨然是他父亲的再现。

后来，泽东谈到为什么因为父亲指责他懒惰而恼火时，说：“年长的应该比年轻的干得更多，我父亲年纪比我大两倍多，所以应该多干活。”就在这里，泽东显露出父亲所持的品德，他还宣称，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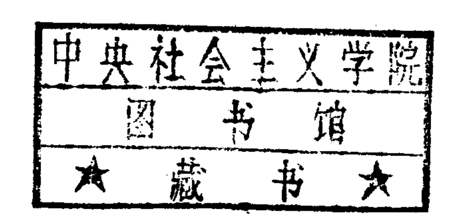
* 有些作者说，“我学会了恨他”——这句出自二十世纪初一个中国男孩之口的话有些不可思议——在斯诺写的毛的传记的中文版中被删掉了。但是，哈佛——燕京图书馆藏的各种中文材料中均有这句话。

“等我到他这样年纪的时候，我会比他勤快得多。”[25]

父母都没有引导泽东接触社会革命的思想，接受此类思想是他这一代受过教育者的自然秉赋。

他以后革命的成功和他成为那一类型的革命领袖，都可溯源于他在韶山的少年时代。

新思潮和旧中国的社会状况使泽东成为一位反叛者；在韶山的家庭生活的磨练则使他比其他人更为坚韧不拔。



为何求知（1910—1918）

从家出发到学校有四十多里路，刚走几分钟，泽东遇到了一个姓王的邻居。王看到这个身着新衣、新鞋和新袜的小青年感到很惊奇，因为在韶山，人们平日里不是这样穿着。

“毛伢子，你穿上新鞋子真好看。”饱经风霜的王说。“我要去上学了。”泽东自豪地答道。他开始解释要做的大事，但是老王听了后大笑起来，直笑得泪水流满了他那粗糙的脸。他对这个小青年去“洋学堂”念书的想法讽刺挖苦了一番，然后问泽东这个“荒唐的想法”是否已征得父亲的同意。

泽东发火了，冲他喊着：“你简直是个老古董！”喊罢便继续赶路。①

泽东用竹扁担挑着行李走进东山高等小学堂的黑漆大门。砖瓦结构的建筑物外边是护城河和高高的围墙，泽东感到好象是走进一座大寺院（他在韶山见到的最大建筑物就是韶山的寺庙）。

泽东穿过护城河上的白石小桥来到一个堂皇的大门前，他被当成了脚夫。应付这种令人不快的窘境，泽东还缺乏经验。学校的规模也使他吃惊，长这么大还从未见过这么多孩子在一起。

学生们嘲笑他说："东山是学堂，不是傻瓜来的地方！""乡巴佬还想进我们的学校！"泽东紧张地向里走去，找到了校长办公室。

"先生，你让我在你们的学校里念书吧。"他的话带着农民的特征和气质。校长叼着一根镶铜竹烟斗，沉默了片刻，他只问了这位神情庄重的青年叫什么名字。

"先生，我叫毛泽东。"

毛镇静的情绪引起了校长的兴趣，他举出几个不准这个年轻人入学的理由，比如16岁年龄过大，没学过算术和地理，字写得不好，并准许他逐条进行反驳。②

在场的另一位教师帮这位来自田庄的青年讲话。当他离开校长办公室加入到刚才曾讽刺他的学生之中时，他已经得到了试读五个月的许可。

到东山之后他才知道，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两年前就死了，由这件事使他看出，从偏僻的韶山来到东山，要弥补的差距有多大。

一位姓文的表兄（母族中的后代）已经在东山读书，他给过泽东一些帮助。但是在众多的学生中，只有两人成了泽东的朋友，这就是来自富裕的地主家庭的肖氏二兄弟。他们与泽东交往多年。

在学校，毛认为自己属外乡人，因此和他交往的只有少数几个同样把自己当作外乡人的同学。这些外乡人不会讲标准的当地口音*，带补丁的衣服使他们与富家子弟有明显的不同。

---

* 这些学生几乎都是湘乡县的，他们说的都是当地口音。甚至本县的学生也因地区不同而互相对立。毛在谈到这些纠纷时有点伤心地说："湘乡有上、中、下三里，上下两里人纯粹由于地域观念而斗争不休，彼此势不两立。我在这场斗争中采取中立态度，因为我本来就不是湘乡人。"③

还有一个重要的特征使泽东成了外乡人中的外乡人。在学生中间，他16岁的年龄和个头都超过其他人，看上去要比他们大四五岁。

这里的大部分学生都是些衣着讲究的势利小绅士。毛是农家的儿子。他的家不算贫穷，但却是一个乡下的未见过大世面的家庭。他的手比邻桌同学的粗糙，他的脸由于日晒比大部分学生都要黑得多。毛讲话慢条斯理，他周围的伶俐孩子讲起话来简直象放机关枪。

他与这里的一切都显得格格不入，有一个学生甚至想雇泽东做他的佣人。

毛的身材瘦长，走起路来步子很大。他不久就显出读书人的面相。虽然有条辫子留在脑后，但头发长长的，还有些蓬乱。总的说来，他那不修边幅的样子倒显得相当潇洒。在体质和气质上，他已经具有了自己的特征。

如果说毛有点儿粗鲁的话，他是真诚坦率的。对毛来说，走进东山不意味着踏进社会，也不是为了获得较好的社会地位，而只是更努力学习那些在韶山学不到的东西。

学校的教室整洁漂亮，与韶山满是灰尘的草房大不相同。从这可以瞥见中国的上层社会的舒适生活。

在东山，人们也正在接触新思想，这种新思想将很快荡涤着韶山那样的旧有传统和社会秩序。这里讲授科学，倡导改革，早点名时，老师都要讲述中国在外国列强的压迫下所受的苦难，以唤醒和培养学生的民族感情。

学生们穿着佩有彩色腰带的长袍，但是他们的心灵被这种新思想所震颤。

学习是毛的唯一真正的朋友。在南岸私塾度过的痛苦岁月却讽刺性地培养了他扎实的古文基础，他能用古文体写出很有说服

力的文章，这成了他克服其他方面弱点或过激行为的资本。

对当时改良政治的了解使他产生了这样的想法：知识能够改造世界。

除了学校的全部课程外，他还读了两本很重要的书。文表兄借给他几本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梁是当时很著名的政论作家。还有杰出的思想家康有为撰写的《戊戌变法》，这是一死里求生的维新运动的宣言，康是那次运动中卓越的思想家。这些书使毛泽东第一次产生了自己严谨的政治思想。

一位曾留学日本的教员对毛的影响很大，虽然他教的英语和音乐两门课，毛都学得不很好。自豪的日本对毛很有诱惑力，1905年的日俄战争中，日本打败了俄国。毛喜欢当时那些描绘日本繁荣的故事和诗歌，“我当时知道并感到日本的美，并且从歌颂日本战胜俄国的歌曲里感受到一点她的骄傲和强大。”④

这是他第一次接触中国以外的世界，使他产生了持续终生的信念：日本是中国的兄弟邻邦。

关于战争的学习标志着他在了解世界史方面迈出了第一步。

一天黄昏，刚刚做完体育锻炼，晚自修的铃声就把满头大汗的学生召进教室。毛走到肖家二兄弟之一的肖三跟前，他手里拿的是什么书？毛很纳闷。那是一本《世界英雄豪杰传》。由于书籍对他有着极强的吸引力，毛问肖他是否可以借读此书。在以后的几天里，就象陪伴着一个新情人一样，毛手不释卷地读完了这本书。

毛把书还回去时，肖三发现书中画了各种各样的符号。他在描述拿破仑、华盛顿、彼得大帝、格莱斯顿、林肯、恺撒大帝、卢梭和孟德斯鸠的段落旁边都画了许多圆圈和圆点。

“中国也要有这样的人物！”毛情绪激昂地对肖三说。中国也要富强起来，“才不致蹈安南、朝鲜、印度的覆辙”。他引用了学者顾炎武（1613—1682）的一句话，“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他打开《世界英雄豪杰传》,大声地向同学——他们还不习惯于向他求教——朗读其中关于乔治·华盛顿的一句话:“只是在华盛顿的领导下，经过八年艰苦的战争，美利坚才赢得了胜利和独立。”⑤

就象看到了地平线上方的一丝光亮，年轻的泽东开始注意西方了。当时以及后来，他一直在思索中国应该从西方借鉴什么。美国已完成了一场革命，那么中国呢?

毛喜欢读描写中国古代皇帝的书，对英雄的爱好使他想了解更多的人物。其中有两个皇帝的形象深深地印在他的心中。一个是秦始皇，统一天下的中国铁腕人物;另一个是汉武帝，他开创了以他的名字著称于世的尚武时代。

同学们都很敬佩毛对《三国演义》等传奇小说的记忆力，他们喜欢听他复述其中的精彩片断。但是毛认为小说描绘的都是历史上发生的真实事件，这使得每个人都感到震惊。为了这，他还和历史教师发生过争论。对任何同意那位教师观点的同学，泽东都对其大加指责，甚至用椅子打了一个同学。毛不愿意接受批评，正象他后来在回顾这段学习生活时所承认的那样。⑥

关于小说的争论他甚至找到校长那儿，当这位博学的校长也不同意他的观点，即不认为《三国演义》是战国时期发生过的真实事件时，他给湘乡县令写了一封请愿书，要求撤换校长，并强迫那些摸不着头脑的同学签名。*

毛是一个刚直的孩子，有时他的任性和鲁莽有点过头儿。他对在韶山时就使他如痴如醉的小说的看法如此天真、固执。

《三国演义》事件使他在东山的日子更糟，同时也预示了他后来思维的特点，思考方式偏执、固执、藐视异见。

毛的成绩很好，试读五个月后，校长允许他继续留读。学习

---

* 上两段中关于毛用椅子打人、争论、写请愿书的记述失实，作者把三国时代和战国时代也搞混了。——校注

成绩对他社交上的孤僻是一种安慰，但事情总是有两方面。一些学生更加嘲笑他偏狭的热情。于是，他开始考虑离开这所学校了。

在东山，毛大大地开阔了眼界。现在，他又想走遍湖南，看看长沙。

两次回韶山——一次在春节，一次是在初夏学期结束时——更坚定了他要实现自己理想的决心。毛先生温和多了，但仍缺乏远见。“你什么时候才能完成学业当上先生，回来光宗耀祖？”父亲问道。⑦

1911年9月，毛挑着行李离开了湘乡。肖三因为自己也有不满意东山的地方，和泽东一起离开了湘乡。他们步行到湘潭，毛在那里曾申请进一所高小读书，因为年龄太大、个头太高而被拒绝了。*

毛还有一条退路，他已请东山的一位教员介绍他进长沙的一所中学。肖和毛挤进从湘潭开往省会长沙的小轮船的三等舱。令毛感到高兴而又惊讶的是，他没有费劲就进了一所漂亮的学校：湘乡驻省中学。

肖三回忆说，开初，长沙的喧闹使毛“兴奋得讲不出话来。”⑧ 当时长沙有80万人口，气候炎热，缺少特色，又脏又乱。在1904年辟为通商口岸和外国通商后，长沙有些繁荣了，并且日益成为反清革命的堡垒。

毛在这里第一次看到了报纸。在这之前，他只知道印刷品是了解历史的窗口，可是报纸上讲的都是当今发生的事件啊！

《民立报》是孙中山鼓吹民族革命运动的喉舌。毛从这份报纸零乱的竖排栏目中看到了广州起义失败的消息。起义是由一位湖

---

* 原文有误，毛是在湘潭求学不成后再到湘乡东山求学的。——校注

南的革命者黄兴领导的。毛回忆说："我深为这个故事所感动，并且还发现《民立报》充满了激动人心的材料。"⑨

激动之下，毛自己写了一篇文章。"这是我第一次发表政见，可是这个政见却有些糊涂。"毛在回忆他那篇贴在校门口墙壁上的充满激情的文章时说。他主张新政府应由维新派和革命派组成，孙中山当总统，康有为任总理，梁启超任外交部长。(如果一个美国青年出于统一的热情呼吁美国政府应由罗纳德·里根当总统，拉尔夫·纳德为副总统，艾尔德里奇·克莱沃为国务卿，天下再也没有比这更天真可笑的事了。)

英雄仍然是17岁的毛泽东崇拜的对象。

但是，君主不再在毛所崇拜的英雄之列。在一次激进的行动中，毛成为全校第一批剪辫子*的学生之一。为了反清事业，他和另一个剪掉辫子的同学一起催促原先曾"相约剪辫子"而后来又反悔的十个同学，用剪刀强行把他们的辫子剪掉。

毛在湘乡驻省中学只呆了四个星期。1911年10月，武汉城里的革命军举起了反清大旗，统治中国267年的最后一个王朝正在走向崩溃。一个月内，革命军占领了十七个省，满清的时代过去了。

长沙宽阔的林荫大道上忙乱纷纷，群情高涨。政治从旧的模式中脱颖而出，但还没有找到新的模式。学校的教科书被暂时忘却，学生们所作的不再是古文，而是一些要求美好未来的标语。

一个革命党的宣传家到毛的学校向学生发表演说，宣称新纪元的来临。毛听后非常激动，他决定"参加革命"。⑩五天之后，他想出了具体的步骤，参加了湖南革命军。

毛在长沙驻军里每月的饷银是七块大洋，两块用于伙食，其

---

* 辫子是当时的中国男子对半外族的满清王朝表示忠诚的象征。

余大部分都用来买报纸。毛看报纸时全神贯注，似乎将其奉若神明。如果按类别划分的话，泽东买的都是些左翼报纸，中立报刊只是登载些消息。报纸是中国政治生活中的新事物。

在《湘汉新闻》上，毛看到曾留学日本的一位湖南人创立了一个“社会主义”党，其他的文章也大谈“社会主义”是一种新的社会思想。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接触到“社会主义”这个词。

当时，社会主义是指伴随着模糊的集体参与的社会改良，马克思主义还没有在东方地平线上出现。可毛这个“私有者”却深为所动，他热情地写信给以前的中学同学，宣传这个颇有吸引力的理论，可是只有一位同学回信表示赞同。

在政治形势尚未明朗化的时期，半知识分子总是最有影响的人物。在军队，毛开始显露出自己的半知识分子形象。毛不愿参加学生组织不只是因为自己年龄大，而且还是因为他对教育一直存在着矛盾心理。

毛担心学校生活对他的影响。与父母对他的期望相比，他倒更象一名有教养的绅士。他喜欢那些没有文化的士兵把他看作学者。他回顾过去时说：“我能写，有些书本知识，他们敬佩我的博学。”⑪ 他为士兵们写家信，给他们读报纸。

虽然其他的士兵都是亲自去挑水，但毛却是从卖水的挑夫那里买水。毛朦胧地意识到自己的不明确身份，他回忆说：“但我是个学生，不屑去挑水，只好向挑水夫去买。”⑫

他的父亲，虽有绝对的权威，但始终未能把泽东培养成为一个地道的农民。

“我以为革命已经过去，”毛在回忆1912年春天时说，“于是脱离军队，决定回去念书。”⑬ 孙中山已和袁世凯达成妥协，袁是个阴险的铁腕人物，他表面鼓吹共和，内心却留恋中国过去的帝制。革命的军事对峙阶段已经结束。

毛丝毫也不留恋军队生活。在军队那段时间，他没打过仗，

只是给长官们干些零星的事务。他之所以当兵，是因为他认为军队对建立新中国有一定的作用。他在与朋友的交谈中激烈抨击孔孟之道："如果民众都软弱可欺，那么完善其道德又有何用？最重要的事情是使其强大起来。"⑭

连排长们都挽留他，但是当他认为军队不再响应时代的召唤时，他果断地马上离开了。学校又召回了这位18岁的半知识分子。

去哪所学校呢？毛拿不定主意，于是他查阅《湘汉新闻》和其他报上的招生广告。学费怎么办呢？韶山来信说泽东现在必须找个工作。

这个退役的士兵住进了很便宜的"湘乡会馆"，开始了他一生中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的流浪生活。

一个警察学堂的招生广告吸引了毛，但他也喜欢一个开设肥皂制造课程的学校，他认为这对中国的清洁、文明有益。这两个学校他都报考了，但是即将开学之际，他又退了出来。

他又报考了另外两所学校，政法学堂和商业中学，他指望这两个学校对韶山会有足够的吸引力，能从他父亲那儿弄到学费。

毛在谈到他给父亲写信要钱时说："我向他们描绘了我将来当法律学家和做官的美好图景。"⑮还没等到韶山回信，这位歧路彷徨的青年对这两个学校又失去了兴趣，当然也又一次浪费了报名费。

就象一个垫子只保留最后一个人的痕迹，毛不断地接受同学的劝告，但是他什么也没有决定下来。他什么都想抓住，结果一无所获。

不久，毛瞄准了一个目标，他花钱报考了一所高级商业学校。毛先生同意支付学费，"我父亲是很容易理解善于经商的好处的"，⑯年轻的毛坐下来学习经济。

他起初肯定不知道这所学校的很多课程和教材都是英文的，他的英文并不好，只是在东山高小学了点入门知识。

毛回忆说："这种情况使我不满，到了月底，我就退学了，并且继续留心报上的广告。"[17]

一名不文，邋里邋遢，坐在长沙闷热潮湿的街道边的茶棚里，用他那发呆的大眼睛盯着报纸。干什么去呢？

毛一度对周围的生活采取冷眼旁观态度。他看到了一切事物的两重性，他反思自身（其思维我们无从得知）。他坐在人生的高处，俯视忙忙碌碌的芸芸众生。

"我即宇宙！"他以道家的冥想得出结论。[18]

湖南省政府军的军火库爆炸，烈焰熊熊，他和朋友们一道去观赏。一年前他曾满怀激情地参加了这支军队。但是现在，他以旁观者取乐的口吻说："这比放爆竹要好看得多了。"[19]

一天，三个学友在天心阁的顶楼上与毛邂逅相遇，他正独自专注而平静地在城墙的这个七层高塔上俯瞰长沙。毛从冥思中回到了现实，四人一起去喝茶、吃瓜籽。

这三个青年的家境都比毛好，其中一个曾经借钱给毛。对于政治，出于世故他们可能比毛懂得更多些。一位姓谭的青年是大官的儿子，他说君主制的废除就意味着"我们都可能当总统。"

当另一个学友用些论据来反驳谭时，毛打破了沉默："让他说，我很感兴趣，让他说吧！"谭继续解释，对一个政治领袖来说，学问是次要的，而重要的是斗争意志。毛被这种看法深深地吸引住，就象凝视长沙的红屋顶时那样。[20]

这个流浪者似乎正忽隐忽现地孕育着一种新的世界观。

他又踏进了另一所学校的大门——省立第一中学，但六个月之后就离开了。他对考学已很自信，在报考第一中学的考生中，他名列榜首。

也许有些自满，毛对学校作了两点批评："它的课程有限，校规也使人反感。"[21]这很能说明年轻的毛的品性。

一位教员借给毛一本很有趣的官方史书——《御批通鉴辑览》。这本书为他下一步的行动提供了跳板。和课堂上讲的东西相比，他更喜欢这些谕旨、法令以及皇帝的御批等等。于是他决定自学一段时间。

好象六个月是毛兴趣转移的自然跨度，他隐居在湖南省立图书馆的时间也是半年。

他总是早上开馆就进去，下午闭馆才出来。他一动不动地坐在书桌旁埋头苦读，好象一座低着头的狮身人面像一般。只是中午出去买个烧饼或几个包子当午饭。

他饱览了现代西方的历史和地理。为了扩大知识面，他又转涉小说、中国诗词和希腊神话，还有改良派严复新近译成汉语的西方名著：亚当•斯密、斯宾塞、穆勒和达尔文以及他在《世界英雄豪杰传》中曾遇到过的两位思想家卢梭和孟德斯鸠的作品。

他凝视着挂在图书馆墙壁上的《世界坤舆图》。他以前从未见过这样的地图：中国只是一个国家，与其他几十个国家排列在一起，模糊的边境线把中国与外国分开，中国在这上面不是一个"中央帝国"。

他笑着对肖三说，在省立图书馆，他就"象牛闯进了菜园子"。[22]他后来认为，这半年的书海生涯对他的生活影响很大。

在不得不和别人共事时，毛表现出一点猴子的性格，但在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时，他又会象老虎一样。

毛每晚都回到"湘乡会馆"，这里住满了退役兵、学生、过路客和一些虚度时光的闲荡汉。

有天晚上，这里发生了一场武斗，士兵们袭击并想杀害学生。毛此时似乎仍带着点道家的气质，而不象一位挺身而出的公民。他回忆那个血腥的夜晚时说："我躲到厕所里去，直到殴斗结束以后才出来。"㉓

读书的热情代替不了付房租。不久，钱的短缺迫使毛又去查阅广告栏。他选中了教书，一所师范学校的广告吸引了他：免交学费，食宿便宜。教师的职业还是有用的。

毛的两个朋友也力劝他进这个学校，他们指望毛在入学考试时帮助他们，毛答应了，便写了三篇作文。"当时我并不觉得自己顶替朋友作文的行为是不道德的。"㉔他回忆说。他把这事看作一种友谊，他很高兴显示一下自己的文学才能，就象在军队时那样。

三篇文章使他们都考进了这所学校*。毛得到了韶山的同意并收到寄来的钱，听凭兴趣忽发奇想的时代已经结束。在二十三年后毛回想起当年这段漂泊无定时期的生活，不禁有些好笑，他说："从此抵制了后来所有广告的引诱。"㉕

政局变得更糟，袁世凯丧心病狂，企图恢复君主制，并要登基当皇帝。在这个逆历史潮流而动的新复古派和孙中山领导的立场动摇而又松散的激进派联盟间存在的紧张气氛中，军阀们悄悄登场了。在长沙，一名军阀谋杀了两位在 1911 年起义后执政的激进派领袖。到 1917 年夏，中国有两个政府：一个是北京的军阀政府，一个是孙中山领导的广州政府。

日本在蚕食中国，但是没有人出来组织全国性的抵抗。军阀乱于国内，列强迫于门外，给中国带来了新的痛苦——湖南的生猪产量十年内下降了一半——在知识分子中间也出现了悲观绝望的想法。

---

* 实际上毛开始是在第四师范学校就读，几个月后，第四师范并入第一师范。所以，到 1913 年秋，毛就是第一师范的学生了。

中国已经脱去了旧的外壳，但是还没有获得新生。

这时代，这一切，对毛来说不是坏事。他还是需要冷眼旁观，而不是要去做些什么。这是接受良好教育的大好机会，他抓住了这个机会。

毛和其他四百名身穿蓝色毛纺制服的学生一道入了学。学校的两层楼房、圆柱、拱顶和庭院完全仿照英国殖民地建筑的风格(其实是日本式的建筑翻版)。

和中国的一切高等学府一样，第一师范也是一所新学校，但它的设备和条件都不错，而且优秀教员继承了湖南的学术传统。

第一师范的外墙上写着校训："实事求是，不要自以为是。"实际上这里的教学和这里的建筑一样是中西兼顾。毛上午读中国历史，午休时间看德国哲学。

毛仍然精瘦，更显出一双炯炯有神的大眼睛。他的发式、手掌和鞋子都表明他是一位年轻的知识分子，一件灰色长袍取代了肥大的粗布衫*。他的言谈举止还是慢条斯理，他不是那种讲起话来滔滔不绝、指手划脚的学生，在聚会时更是很少说话。

通过许多课程的学习，毛选择了自己的路，从缺乏自信变得成熟了——不只是在思想上，而且在追求这些思想的方法上。

毛回忆说："这所新学校有许多规则，我只赞成其中的极少数。"[27] 在第一师范，他还是一位普通的学生。一次他读书到深夜，被子靠油灯太近，引起了一场小火灾，烧坏了几张床铺。还有一次，一位同学因父母包办婚姻而苦恼，毛为之同情，到这位同学家，劝说他的父母放弃他们的安排。

在第一师范，人们很少呼他的名泽东，而是叫他的字：润之[28]，其意思是"施惠"或"润泽"。

---

* 虽然他的被褥——由学生自备——仍是农民式的，这在学校不多见。[29]

毛对于不喜欢的课程，如静物写生和自然科学方面的课程很少染指，甘得零分或接近零分。他喜欢的课程，如写作文学或伦理主题的文章和社会科学课程，他学得津津有味而且有独到见解，常得100分。

完全放弃枯燥的静物写生课不是毛的做事风格，他不得不硬着头皮应付一下。在绘画考试时，他一笔在试卷上画个椭圆，题名“鸡蛋”，然后就离开了教室。一天上课时，一个简洁的构思使他得以提前离开教室。他画了一条水平线，在上边又画了个半圆，题名“半壁见海日”（这是唐代李太白的一句名诗）。他的绘画成绩不及格。

毛在维新派的风云人物梁启超的自由体文风影响下，写出了热情洋溢的文章。但是国文教员袁大胡子，“看不起我视为楷模的梁启超，认为他半通不通。”㉙

袁还说，毛在自己每篇文章的最后写上日期是傲慢自大。有一次，袁当着全班同学的面，将毛写有日期的那一页文章撕掉了。毛站起来，抓住袁的胳膊，问他到底想干什么，要拉他到校长办公室去“评理”。㉚

奇怪的是，这个对很多管束都进行反抗的青年却接受了古典文风对他的塑造。“我不得不改变我的文风”，他有点不坦率地说。实际上，他在心理上还是倾向于古文形式的，特别喜欢无神论学者韩愈（768—824）的行文技法。

二十二年后，毛对埃德加·斯诺说：“所以，多亏袁大胡子，今天我如果需要的话，仍然能够写出一篇过得去的古文。”㉛（“如果需要”，这句话含有讽刺意味，因为，毛这时已开始讨伐其他人用古文写成的文章。）

因此，当毛在政治上比改良派还激进时，他的文学风格还是落后的。他在文风崇古和政治从革命两方面双双背离梁启超。

毛在第一师范所受的教益主要来自道德哲学和报纸——这是他持续终生的两个爱好。

和绝大多数青年一样，毛也从他的榜样那里学到了很多东西。从1915年起，他的道德楷模是一位很善于吸收门徒的人物，这位具有过激精神的绅士因为提倡寡妇再嫁而震动了整个长沙，这就是杨昌济，他是一根往旧中国的躯体中输入新鲜血液的导管。

杨的生活方式是传统的——人们称他"老夫子"。他讲课照本宣科，但是他在渴求生命意义的一代人的心灵中播下了会结出激进果实的种子。

杨尊崇宋明理学(始于10世纪)，但也花了四年的时间去英国和德国研究康德、格林和其他欧洲思想家的理论。使二者结合在一起的是他对心灵和意志的信仰。慎思、敢做、心之力能使世界改容。无疑，这是个人主义，但这是着眼于整个社会进步的个人主义。

没有哪位良师——三、四十年代遥远的斯大林除外——能比这位在爱丁堡取得中国哲学博士学位的中国人对毛产生过如此深刻的影响。毛对杨先生的伦理学课程有浓厚的兴趣，他读新康德派哲学家泡尔生著的仅十万字的《伦理学原理》一书后，竟然写了一万二千字的批注。一到星期天，毛和其他几位得宠的学生就带着敬畏的心情拜访杨寓，并在杨寓吃午饭。后来毛和杨的女儿结了婚，毛最初遇到她就是在一次拘谨的周日午餐时。作为老师、朋友、岳父，杨对毛的影响是别人无法相比的。

毛用文章回报了杨先生的德育观。一篇充满激情的文章《心之力》得了100+5分，这使毛很兴奋，他把这事告诉了许多人。

"一位道德高尚的人。"这位昔日的学生后来在谈起他的教授时说。[32] 这是个珍贵的赞扬，它已摆脱阶级分析的限制。

晚上，毛常在学校图书馆全神贯注地读长沙和上海的报纸直

至深夜。其他学生都从他那儿听到一周来中国的动荡局势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最新动向。

对每一则欧洲要闻——凡尔登，兴登堡的权术，巴黎保卫战中的出租汽车的用途——毛都能从中国历史上找到类似的例证。他成了比较、评论"活历史"（他常用这个词来描述报纸）的顾问。

任何一位同学来找毛，都会有人告诉他："可能在报纸阅览室"。[33]

毛用韶山寄来的一点钱订了一份报纸（他父亲说他这个习惯是"把钱浪费在废纸上"）[34]。他常把报纸周围的空白处剪下来，然后把剪下来的纸条钉成小本，仔细一看就能发现，毛在这些纸条上写着城市、河流、山脉的名称。毛在读新闻时，手边总放着一本中国地图册和一本世界地图册，新闻中提到的每一个地理名字，他都在地图上找到并记下来。

杨致力于他的精巧构思：对社会进行道德治疗；毛则浏览报纸，这一通往社会行动的门径后来使他超越了杨的道德范畴而走向暴力生涯。在这个时刻，对于这位仍坐在图书馆里的青年来说，德国的理想主义和热切的公民意识已有机地融为一体了。

为了使毛遵循自己的路前进，杨指引毛接近"船山学社"（王船山名夫之，17世纪的爱国者和热心为公众的哲学家）和《新青年》——一份用尖锐的现代西方思想抨击中国僵化的传统的杂志。

和杨先生一样，毛从未失去对中国自身文明的信仰。如果说他偶然把握了一种西方思想的话，也只是把它作为医治病态的中国政体的药片或绷带。杨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国家为一有机体，犹人身之为一有机体也，非如机械然，可以拆卸之，而更可装置之也。"[35]

杨是现代中国发生转折时期的人物。他在长沙出门时坐四人小轿，但是他也坚持冷水浴和不吃早餐。毛在反封建的同时，也从杨那里获得了这种通过勇敢的努力而再生的信仰。

杨热衷于体育运动，认为这是从思想革命迈向社会变革的第一步。为实践"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的要诀，他坚持冷水浴，以便不再坐轿子。

毛（和朋友们一起）去长沙附近爬山，在冰凉的池塘里游泳，有好长一段时间一天只吃一顿饭，晒日光浴——他认为这会给他的身体带来能量——有大半年的时间不在宿舍就寝而在学校院子里睡觉。这都是为了使他的身体更加健壮。*

如毛所说的"体格锻炼"，在中国不如在西方普遍。对毛来说，锻炼身体不仅仅是一种强身健体的方法。为什么他迎着狂风高声朗读唐诗？这不是在练嗓子，而是在磨炼自己的意志。

毛在日记中写道："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㊲

以上是肖三的回忆录中的英译说法，但是中文原文里还有第三句，这一句被具有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编辑删去了："与人奋斗，其乐无穷！"其意思是不仅要有强壮的体魄，更要有社会斗争的坚强意志。

一天夜里，雷电交加，毛浑身湿淋淋地来到蔡和森家。原来他刚从岳麓山巅跑下来。问他原因，他说，这是为了体会一下《书经》上"纳于大麓，烈风雷雨弗迷"的情味。㊲

在第一师范的第二个暑假，毛和肖三的哥哥肖子升——一个潇洒稳重的青年——一起作了一次游学，走遍了湖南的五个县。这次"游学"是受他读的《民立报》上一则消息的启发，消息说两

---

* 然而——个性多么特殊！——毛却讨厌学校规定的几分钟哑铃操，甚至写讽刺文章攻击那些"机械"的锻炼。毛更喜欢自己发明的身体"测验"。㊳

名学生徒步走遍了中国，甚至远到西藏。

毛和他的朋友不带一文钱，他们给当地的地主乡绅写巧妙的对联换取食宿。这次游学历行六个星期，步行近千华里，更多的了解了湖南。

22岁的毛可谓是文武双全了。他的第一篇文章《体育之研究》在《新青年》上公开发表，[38]署名“二十八画生”（“毛澤東”三个字繁体共计二十八画）。[39]

文章明快有力：“运动宜蛮拙。骑突枪鸣，十荡十决。暗明颓山岳，叱咤变风云。力拔项王之山，勇贯由基之札。其道盖存乎蛮拙，而无与于纤弱之事。”

文章三环相扣，有理有据。意志是联系身体和精神的纽带，运动是意志的体现，锻炼身体归根到底就是为了战斗。毛认为，“夫体育之主旨，武勇也。”健康的体魄、勇敢的意志和乐观的态度都是拯救中华民族所需要的。

“国力苶弱，武风不振，民族之体质日趋轻细，此甚可忧之现象也。”毛在文章的开头这样写道，整篇文章都是阐述如何解决这一问题的。

在毛的生活欲望中还没有政治，他只是以自己普罗米修斯式的情感去面对需要更新的中国之现实。“自信人生二百年”，[40]他后来回忆起在这个时期时发过的壮语。

在第一师范，毛是作为一名学生组织者度过这几年的生活的。[41]从1915年起，他就是学友会中一名出色的活动家。1917年，有34名学生（学生总数为400）被选进学友会，获票最多的毛主持学友会的工作。*为了增加学友会的经费，他在街上卖过小吃。[42]

他鼓动学友会与学校的清规戒律和迂腐顽固的校长作斗

---

* 作者将毛泽东得票最多的“人物互选”活动误作选举学友会负责人的活动。——校注

争，——毛称他“复古派”*——为此他还险些被开除。（袁大胡子等人都帮助、保护过他，毛的果断刚毅赢得了人们甚至那些被毛伤害过的人们的尊重）他还动员学生抵制湖南军阀和北洋军阀对学校的骚扰。

在毛的带领下，学友会举行了反对日本的“二十一条”和列强欺辱中国的抗议活动。[43]现在毛看到了日本的黑暗面，他读了一本关于日中危机的书《明耻篇》，便在这本书的封面疾书：“民国奇耻，何以报仇，在我学子！”在给一个朋友的信中他质问：“拥有四万万人的民族岂受三千岛国之欺？”

他以学友会的名义为长沙的工人办起了一所夜校。“我们不是木头石头，我们是人。”他在贴在大街上的招生广告上写道，“有了文化，我们就能挺直腰杆做人。”一种学习方式已按照他自己的经验考虑出来了，“每次上课，衣服听便，不必求好”，[44]广告补充道，“笔记本和所有教材都不要钱。”

毛忘记了没有几个人能读懂他那高深的启事**。他又到工人家去招收学员，即使这样，夜校也只持续了几个月。毛在顽强地维持着，当物理课效果不佳时，他向学员们许诺说：“方才所讲，不过发端，将来如电灯之所以能用，轮船火车之所以能速，其理必皆告汝等知之。”[45]

在第一师范的最后一年，毛的一个行动显露了他的自信，也是他政治抱负的第一次表现。他后来带点夸大地回忆说：“我感到自己心胸开阔，需要结交几个亲密朋友，于是有一天我就在长沙一家报纸上登了一个广告，邀请有志于爱国工作的青年同我联系。我指明要结交坚强刚毅、随时准备为国捐躯的青年。”***广告

---

* 中文的意思是“恢复旧的制度”。

** 毛坚持记《夜校日志》，用古文形式写的。[46]

*** 其他材料上写得清楚，毛只是把他的广告贴到长沙街上的一面墙壁上，一家报纸认为它有刊登的价值，就把它采去了，毛在他的原稿上加了标题：“二十八画生征友启事”。

的最后一句是引用《诗经》上的一句:“嘤其鸣矣，求其友声。”[47]

毛只得到“三个半回音”。(“半个”是李立三，李后来成为著名的共产党领导人，并与毛发生过冲突。毛回忆时，只是冷冷地提及李的“不明确”的答复，说:“我们之间从来没有发展到友谊。”)然而，这个表面上看来显得天真的征友启事使这些爱国青年开始了重要的活动。毛组建了一个纯政治性的组织“新民学会”，它是湖南上空升起的第一颗红色信号弹。[48]

“世界上有两种人，”一天，毛对肖三评论说，“有的人善于做具体事情，有的人善于做组织工作，前者要多于后者。但是，每个人都有他的长处。”[49]

毛感到，一位组织家的天才，就在于能把各种人的长处融合起来，他不应当揭露挑剔别人的弱点，而应鼓励所有积极因素的联合。毛的父亲没有做到这一点，而毛将会成功。

1918年6月，毛从第一师范毕业了。和他周围的人一样，尽管精神财富充实，但在社会上仍无立足之地。他不仅是持不同政见者，而且是个不合时宜的人。

戊戌变法的维新派是持不同政见者，但是他们为当时的社会所接受。梁启超虽然在知识界不受欢迎，但他却有一套自我存在的方式。

对毛这一代人来说，旧中国已不再是铁板一块，甚至成了一触即燃的易燃物。在军阀时代，传统已失去了意义。同时，毛又不能在西方化的中国人身上找到认同，如在檀香山受过西方教育的孙中山。现在，他既不是一条小鱼，也不能算是一只雄鹰。

毛的生活已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他不再受他人幻想的鼓动，已经能自我控制。

毛在第一师范学业优秀。杨先生把毛列为他在长沙教过的几千名学生中的第三位——肖子升第一，毛的另外一位朋友，后来

成为中国共产党一颗陨星的蔡和森居第二。第一师范的最后一年，同学们在敦品、胆识、口才和文章等几方面把毛作为学校的楷模（校长当然不会这样做）。一个学友称毛为“奇才”，还有一个称他为“智囊”。[50]

毛正在形成自己的思想，他看重中国的尊严。他信仰个人自由，他已抛弃了他以前心目中的英雄梁启超和康有为的改良主义。他感到，在惊心动魄的社会变迁中，须要有新的东西产生。“现在国民思想狭隘，安得国人有大哲学革命家、大伦理革命家，如俄之托尔斯泰其人，”新民学会在蔡和森家里成立时，毛说：“以洗涤国民之旧思想，开发新思想。”[51]但是，新思想能带来一个新的社会吗？

在这几年，毛很少讲“革命”这个词，即使谈到它，也仅指扫除一切旧的东西。他毕竟才24岁，可塑性还是相当大的，以至于一位老师的影响——且不说杨先生，就是袁大胡子——也能在他的心灵上留下烙印。

毛的风格是不断完善自己，与任何放纵自满都格格不入。在任何情况下，他都是把利刃，他将挑战、探索、鉴别、反抗。

在第一师范的五年半时间里，毛在书边空白处或笔记本中写了不少于百万字的分析、观点评注。他常在书的空白处写上“荒谬”或“不通”等批语。[52]

毛喜爱“学问”这个词，“学问就是提问，就是探索，”他曾对肖三说。[53]每当他与应征的几位朋友会面时，一见面不是问候客套，而是直截了当地问对方最近在读什么书。

一天，他到一位富裕的“新民学会”朋友家去，这个年轻的主人中断他们的政治谈论而把仆人叫来嘱咐其去买猪肉，并交代清楚价格和买什么样的肉等。毛对此很恼火，他竟以家庭琐事来干扰谈论中国前途这样的大事，他一气之下，起身离去，再也不与这位富家子弟来往。

毛同样严于律己。他养成了一种习惯，常拿着书到离一师不远的南门那吵杂喧闹的大街边去看，以此作为考验，培养自己的注意力。这是成为英雄的一条小径。

如果说他还无力按照自己的想法改造周围世界的话，那么他至少已经能够塑造他自己了。

毛当时是漫无目标的，但他不是单枪匹马。

在东山时毛就与众不同，但同时他孤立、凄凉。到1918年，他更鹤立鸡群，他与别人之间的距离却增加了他的号召力。他的行高于众处倒成了领导的手段，别人乐意追随他。他从一名学生长成为一名领袖人物。

毛从未脱离时代，同时又超越了时代。即使在第一师范，传统和权威也被踩在脚下，因为这位不安分的精英人物已不再相信这些东西了。毛仅仅是学生领袖，他的激进也只是冷水浴。但是，时代的性质确定了也许毛本人还没有察觉到的一种联系：教育、体格与政治革命。

以上三者是互相关联的。因为，要再造中国，首先须要赋予中国民众以知识，接着便是行动，而行动将意味着流汗。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第一师范就成为一名学生叛逆和一个体育锻炼的热心者，按照趋势自身的逻辑，下一步就将向马克思主义迈一大步——更确切地说是列宁主义——虽然在1918年毛的头脑中还没有一点马克思主义的影子。

可以肯定，他处于矛盾之中。纸面上的变革方案医治不了社会生活中的顽症，传统和现代不可长期同床共枕。难道一个有教养的精力充沛的青年到头来仅仅是撞向中国痛苦之墙的一只苍蝇吗？

未来将赐给他消除这些矛盾的利剑。同时毛还有自己的信条，这在他读泡尔生的《伦理学原理》所做的笔记中表现了出来："凡有压抑个人，违背个性者，罪莫大焉。"[54]

1918年4月，毛的母亲患了结核性淋巴炎，大弟泽民带着她从韶山来长沙就医。小弟泽覃这时已住在长沙，毛把他安排进入第一师范的附属小学读书。

十月份，毛母病逝，享年52岁。“从那以后，”毛回忆起他母亲的去世时说——“我更不想回家了。”[55] 为了参加母亲的葬礼，毛回韶山过了很短的时间，当时有很多人参加了葬礼。

毛发现他的父亲赚够了钱，正忙着把草房顶换成漂亮的瓦房顶。

毛为母亲写了一篇文言祭文，其中佛教和儒家的思想成份各占一半：

“吾母高风，首推博爱，远近亲疏，一皆覆载；恺恻慈祥，感动庶汇。爱力所致，原本真诚；不作诳言，不存欺心。”

毛陷入了更具体的回忆：“病时揽手，酸心结肠；但呼汝辈，各务为良。”

京沪天地(1918—1921)

26岁生日前夕，毛第一次离开了他的家乡湖南。

《三国演义》中有三位英雄。毛泽东与杨教授的另外两个学生也自称是“三豪杰”。这两个同学，一个是肖子升，另一个是蔡和森——和毛的母亲同乡的一位具有战斗激情的青年。

杨昌济于1918年离开长沙执教于北京大学。他在首都写信给这“三豪杰”，谈如何到西方勤工俭学以拯救中国，新民学会讨论了这封信，蔡代表长沙进京参加赴法筹备工作，毛和另外二十人于1918年秋启程赴京，先是步行，然后坐船到武汉，接着乘火车到北京。

毛早就希望能到北京。由杨搭桥，由《新青年》杂志作媒介，他已初步介入新文化运动。毛后来同肖三谈起北京这份刊物时说：“它有两个宗旨，其一是反对古文，其二是反对旧礼教。”①

毛的个人处境与北京的富丽堂皇形成了鲜

明的对照。与其他大学生一样，他也曾是小池塘中的大鱼，但是现在，他又一次感受到了在大海中作小鱼的痛苦。一直到他找到工作，手里才有了一点钱。

起初，他在后门附近杨教授家与看门人同住一间小屋。②后来，与另外七个湖南青年一起在一个叫三眼井的地方租了一间小房。

八个人象沙丁鱼一样挤在炕上。毛后来回忆说："每逢我要翻身，往往得先同两旁的人打招呼。"③

北京的开销比长沙贵得多。买煤烧炕使他们拮据，每人能有一件大衣更不可能。他们只好八个人合买一件大衣（湖南人从不穿大衣，就象弗罗里达人从不穿皮袄一样），轮流着穿，以抵御迅即席卷北京的严寒。

在异地他乡如何才能找到一份工作？他去请求杨教授帮忙。尽管毛很穷，但在湖南那些好的学校里他结识了不少人，并学会了交往。杨给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写了封简信，询问能否为一个参加勤工俭学运动而处境窘迫的学生找个工作。

阅读《新青年》使毛最佩服两位作者，"他们一度成为我的楷模"，他说。其中之一，就是当时任北大图书馆馆长的李大钊教授。

毛获得一份在期刊阅览室的工作，月薪八块大洋，报酬较低。但做事也不多，就是清理书架，打扫房间，登记阅览者的姓名，对一个有毕业文凭的26岁青年来说，这不算工作。

在北京大学，毛不是什么长沙才子，而只是靠两只苍白的手整理书刊的雇员。毛回忆说："由于我的职位低下，人们都不愿同我来往。"④

他一会儿在大窗户下他的三抽屉办公桌前忙碌，一会儿穿梭于书架之间，身着褪了色的蓝长衫和一双布鞋，他的大眼睛不放过任何东西。毛通过他的签名簿认识了一些新文化运动的头面人

物，“我曾经试图同他们交谈政治和文化问题，”他伤心地回忆道：“可是，他们都是大忙人，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管理员讲南方话。”⑤

在北大的其他场合，毛的地位也同样低，只有在缄口不言时他才能去听讲座。一次，他斗胆向胡适提了一个问题（胡当时是著名的激进分子，后来成为有名的自由主义者，蒋介石的驻美大使），胡问，提问题的是哪一个，当他得知毛是没有注册的学生时，这位激进而洒脱的教授拒绝与他交谈。

但是，毛象水蛭一样盯住周围一切好的东西。他渴望涉足知识界的大门，他参加了新闻学研究会和哲学研究会，这是恰当的选择，因为报纸和道德问题是他当时的热情所在。

他也结识了新的人，其中有张国焘，这是来自韶山东边一个地主家庭的青年，尽管他们并没有成为密友。

中国的北方不同于南方，毛的前二十五年一直在南方居住和生活。湖南的生活方式与北京差别很大，就象弗罗里达与蒙大那的差别一样。除冬天的严寒、口音的相异、饮食的不同等环境问题外，毛还面临更重要的心理问题。

北方是官僚传统的沃土，同时是达官贵人的世界。在权贵眼中，出苦力的人是不会思考问题的，他们根本不能理解一个曾在韶山种过田的人的想法。

在1918年至1919年间，毛的活动范围很狭小，那个冬天他形成了对北京生活既爱又恨的矛盾心理。

然而，毛的心中另有一个北京，他独立持重，为自己建立起一个小天地。

毛喜欢北京古老的文化和悠久的历史。他漫步在公园和宫殿。在西山，在长城，他抒发思古之幽情。面对北海垂柳上的冰凌，他吟诵起唐代诗人的名句，体验着岑参笔下那令人赞叹不已的冰雪晶莹的意境。⑥这位来自湖南农村的青年看到了日趋没落的

中国文明的内在和谐。

这都城处在不断的政治动荡之中，但是毛似乎更沉湎于细微事物，“北京数不尽的树木引起了我的惊叹和赞美。”这位来自长沙的叛逆者，暂时忘却了他的使命，迷恋于诗词和古老的传统，留恋于山水之间。

毛决定不去法国，蔡和森和其他一些来自长沙的朋友启锚远航了，因为毛发现了留学法国的困难。留学的一项准备是学习法语，而毛不会法语。尽管出国留学可以得到资助，但每个学生仍要拿出一定的路费。毛已经是债台高筑，无法再向有钱的熟人张口借钱。*

另外，可能还有杨开慧的拖累。毛在拜访杨教授的宅第时和在新闻学研究会上结识了杨小姐，杨是学习新闻的学生，她无意去到法国的工厂里劳动。

从根本上说，毛之所以呆在国内是因为他的出国愿望并不强烈。除了所说的一切困难之外，还因为毛并不认为他的——或中国的——前途在西方。他的心灵已被祖国的传奇历史、秀美山水和近来所遭受的耻辱占据。

我们可以通过毛自己谦虚而矜持的解释来说明他不去马赛的理由：“我觉得我对我自己的国家了解得还不够，把我的时间花在中国会更有益处。”⑧这一决定是他已经形成的态度的结果，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以后的排外主义倾向。

与此同时，在一百二十英里以东的天津，一个名叫周恩来的青年作出了相反的决定，他启程赴欧洲留学。

---

* 在少年中国学会的一次讨论会上所发生的一件事反映了毛的穷困潦倒。毛发言说：“总是坐着空谈没有用，应该付诸行动。把你的衣服给我，我来洗……大小不论，价钱一样。三天以后你就可以交钱取货。”没有人反应。后来一位学生的妻子开玩笑说：“作为绅士，毛不会干洗衣服的行当。”另外一位学生认为毛只不过是说说而已，就对毛说：“那好吧，明天你来给我洗衣服，我要看看你会不会做。”毛真的干了，当然也就得到了钱。⑦

中国的革命始发于图书馆。当时需要一种理论来指导对腐朽制度的反抗,这一理论早已存在。当毛的祖父还是小孩子的时候,就由卡尔·马克思在另一图书馆——大英图书馆里提出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马克思主义仅是只言片语地传入中国,只是在苏联革命之后才逐渐进入中国人的心灵。

马克思主义是一回事,它主要是根据西方先进国家的实际总结出来的一种理论。列宁主义则与此很不相同。如果在落后的俄国能进行马克思主义革命,如果帝国主义自身发展的逻辑会导致社会主义的产生(列宁这样认为),那么中国难道不应该进行同样的革命吗?或许马克思的深奥难懂的论文需要仔细认真地研究?因此,1917年以后,一些思想敏锐的中国人在毛泽东当时工作的图书馆开始涉猎马克思的文章和小册子。

毛因为工作之便可以不必花钱去阅读有关书刊——这对他捉襟见肘的处境来说实在是一个恩惠,在这里他第一次读到了马克思和列宁。

但是,那年冬天的毛并没有掌握马克思主义,在他心中占主要地位的是无政府主义思想。他读克鲁泡特金多于读马克思,他对这位热情的俄国人比对那位有系统理论的德国人了解得更多。

与其他无政府主义者一样,毛知道他反对什么而不知为何反对。同时,他还没有掌握反对军阀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思想武器。从个人角度说,无政府主义对那年冬天生活无着的毛也是合适的理论。

1919年春天,北京爆发了学生示威——后被称为五四运动——这一运动把《新青年》的主旨思想推向了高潮。但是,毛没有参与其中。他这时的心情抑郁,举棋不定。当北京的学生热心于国家大事时,他只是短暂地注意了一下这一事件,然后漫无目的地独自离开了北京。

就在北京的学生砸烂孔家庙的时候，他去拜谒了山东省的孔墓。

他回忆说："我看到了孔子的弟子们濯足的那条小溪和孔子幼年所住的小镇。"⑨ 他攀登了东岳泰山，游览了孟子的出生地，然后他又到了梁山，这是《水浒传》中的英雄们聚义的地方。

在北京的激进分子宣称要抛弃中国的过去的时候，毛却沉溺于过去的泉源之中。五四运动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知识分子运动——改变传统、抵制日本对中国的干涉。但是这时的毛却置身于中国的山川名胜。

在儒家圣地逗留之后，毛继续乘火车到达徐州（他曾路遇一同窗好友，并借钱买了火车票）。在徐州，他看到了《三国演义》中的英雄们到过的地方。然后他到南京，环绕着古老的城墙漫步。他唯一的一双鞋被人偷去，只得再次借钱买票到上海。

这次旅行似乎代替了本来就很模糊的到上海的目的。毛说他到上海送勤工俭学的同学赴法。他肯定去了上海码头。然而，他从北京出发时并没有和任何人结伴同行，他独自置身于古迹名胜之间，觅古寻踪，历时数周。

很明显，北京并没有更大的吸引力，可以让毛呆上半年以上的时间。

自第一次世界大战起，上海这一中国最大的城市(200万人)已成为西方的门户。商业贸易是其主要特征。毛不喜欢上海，因为这里没有古墓、胜景和名山吸引他。

他去拜见他在《新青年》上结识的他的第二个楷模陈独秀教授，这位研究文学的学者在1917年迫于军阀的压力从北京搬到了上海。这次会面为日后的进一步接触播下了种子，尽管这第一次的会面对双方都没有留下很深的印象。

毛在上海漫步街头，阅读报纸，拜访湖南友人。

他的心回到了长沙。赴法勤工俭学的组织者拨出一些钱给

他，使他得以回湖南。1919年4月，毛打起行囊，步行兼乘车船回到了长沙。

当时毛的手头非常拮据。他在湖南大学为投考者而设的学生宿舍里找到一张床位。不久，他在师范附小兼教历史课，毛要做的事情太多，不想要固定的工作。

因而毛过着清贫的物质生活，尽管他的思想漫游在人所不及的世界里。他一双大脚上穿的是草鞋，因为草鞋便宜而且在夏天更实用，吃的饭食主要是蚕豆和大米。日常生活中，他经常要依赖别人。

北国之行明显地在他身上留下了印记。在北京时他很少讲话，现在在长沙他有很多话要说。他的第一次冒险举动是公开地讲马克思主义这一新奇的思想，虽然对此他也是所知不多。

1919年下半年，毛成为长沙地区新文化运动和反对帝国主义运动的先锋——这是五四运动的两个主题。当时的主要矛头指向湖南军阀统治者张敬尧，这位半封建式的亲日派曾使五四学生付出了血的代价。

毛领导了长沙的五四运动，使运动主旨的两个方面都做得出色。在炎热的六月，组建了"湖南学生联合会"。

学生运动的热情空前高涨，在全国首屈一指，即使美国六十年代的学生骚乱较之也略逊一筹。学校都一半时间停课(理想的"真理"压倒了现实)。一纸宣言可以引起学生第二天更大规模的游行。包里装着牙膏，背上用毛巾袋裹上的雨伞，学生们走出长沙与其他地方的志同道合者取得联系。几乎每个人与自己的家庭都发生冲突。印刷粗糙的杂志不断涌现，标题都带着一股高昂的情绪：《觉悟》、《女界钟》、《新文化》、《热潮》、《向上》、《奋争》、《新声》。

用六十年代的标准来衡量，这些学生绝不摩登。他们中的大

多数是身穿长袍马褂的绅士，一挪脚就要有仆人陪从。他们一只脚站在传统的门槛里面，嘴上却言词激烈地反对传统。与美国的一些福音派信徒一样，他们和周围人一样生活，但嘴上却说是周围的人污染了他们纯洁的心灵。

有一个大学生剁掉自己的两个手指以抗议督军张敬尧的残暴统治。13岁的丁玲带领全班同学冲进湖南省议会的议事厅，要求妇女在继承财产方面与男人享有同等的权利，她后来成为中国著名的短篇小说作家。年龄越小，他们越无所顾忌。

毛在一个“使用国货、抵制日货”的集会上发表演讲，而没有注意到中国产品还不能满足人们的需要这一事实。他组织一批女学生——从一开始他就把女学生吸收进湖南学生联合会的核心——在长沙街头检查店铺，警告老板要销毁日货。

毛后来回忆说：“当时没有时间谈情说爱。”事实的确如此，晚间政治活动之后一两个小时的休息，不带邪念的男女相依而卧不会发生情事。毛泽东和“三杰”之一的蔡和森及他聪明美丽的妹妹蔡畅曾立下三人盟约：发誓永不结婚。*但是他们三人都违背了这一誓言，毛则违背了三次。

但是这并不能说明他们的誓言是戏言，而是表明他们一度曾经具有的思想——与美国福音信徒一样——他们并不羞于自相矛盾的言行。他们认为他们没有时间谈情说爱，但是爱情悄然而入，而且常常为他们的事业增添光彩。

学生的社会处境使他们处于一系列矛盾之中，他们是蒙受耻辱的一代。古老传统的粉碎使他们一时间失去了根基，国家的风雨飘摇又使他们濒临绝望。

做旧中国的反叛者要求具有很大的胆量来付诸于行动。对外

---

* 还是杨教授的学生的时候，毛在一则笔记中写道，他完全赞成宋代兄弟哲学家二程的观点，“货、色两关打不破，其人不足道也。”⑩

表堂皇、内部腐败的旧中国的公然反叛，犹如挥戈猛刺一个外皮尚好、里面烂如狗屎的西瓜，引起众人哈哈大笑。咒符既被揭破，烂透的西瓜又始发青春。在1919年的中国唤起民众的反抗并非难事。

在那个暴风骤雨的夏天，毛为学生联合会而奔走忙碌，他创办了一家周刊，自任编辑和主笔，并依地名将该刊物命名为《湘江评论》。第一期《湘江评论》印了两千份，一天之内就销售一空，以后每期印五千份(这在1919年的湖南其印刷量是很大的)。

杂志锋芒犀利，充分表达了五四运动的文化主旨。它使用白话文而不是呆板的文言文，语言的改宗就如用耶稣的原话改写钦译圣经一般的惊人。

的确，甚至胡适教授也认为毛是一位引人注目的作者。他在红格薄纸上草就的文章生动活泼，观点明确，对每一个问题都有详细的论证，他以前如饥似渴地读报纸终见成效。

“人类解放的运动猛进，”毛作为编者在发刊词中宣称，“什么不要怕?”他作出的回答充分显示了他当时超然的思想。“天不要怕。鬼不要怕。死人不要怕。官僚不要怕。军阀不要怕。资本家不要怕。”⑪

在中国的一份报纸上，我们看到当时的一位小学教师对毛的回忆，文中不乏溢美之辞，但很有史料价值。

> 他日间事情既多，来找他谈问题的人也是此来彼去，写稿常在夜晚。他不避暑气的熏蒸，不顾蚊子的叮扰，挥汗疾书，夜半还不得休息。他在修业小学住的一间小楼房和我住的房子只隔着一层板壁。我深夜睡醒时，从壁缝中看见他的房里灯光荧荧，知道他还在那儿赶写明天就要付印的稿子。文章写好了，他又要自己编辑、自己排版、自己校对，有时还自己

到街上去叫卖。这时，他的生活仍很艰苦，修业小学给他的工资每月只有几元，吃饭以外就无余剩。他的行李也只有旧蚊帐、旧被套、旧竹席和几本兼作枕头用的书。身上的灰长衫和白布裤，穿得很破旧。[12]

毛写的一篇名为《民众的大联合》的文章集中表达了他的观点。[13] 这篇文章雄辩有力，通俗易懂，富有爱国热情，尽管还不能说是马克思主义的，但与两年前的《体育之研究》有明显的不同。

毛开首便直刺中国社会现状："国家坏到了极处，人类苦到了极处，社会黑暗到了极处。"他不再认为强健个人体魄是解救中国之关键。中国确需这样一种修道士——毛是他们中的头一个——来带领中国走出黑暗。不过，毛在《民众的大联合》中并没有提出领导权问题。

他尽力争取广泛的支持，他号召各阶层的民众联合起来，对压迫他们的势力"齐声一呼"。团结一致，至关重要。辛亥革命未能发动民众，下一次革命决不可重蹈覆辙。

文中提到了马克思（"一个生在德国的，叫做马克思"），以与毛欣赏的无政府主义者（"一个生在俄国的，叫做克鲁泡特金"）相比较。毛说，马克思的观点"很激烈"，克鲁泡特金的更温和的观点虽不能立见成效，但是他的最大的优点是"先从平民的了解入手"。

文章富有革命色彩，但是在1919年的长沙，马克思与其他一些革命理论家相比，似乎并不引人注目。毛期望一种更为公平的社会秩序。他有出色的组织才能，但是当时的毛还没有找到合适的理论形态。

毛设想多种形式的联合会聚汇力量形成革命大潮。联合的目的很简明："反对压迫民众的……强权者"，妇女、人力车夫、农

民、学生等，各界人士都包括在这种联合之内，没有阶级界限之分。

毛以设身处地的口吻述说了各阶层的苦难，而对学生之苦他最为激动：

> 我们的国文先生那么顽固。满嘴里"诗云"、"子曰"，究底却是一字不通。他们不知道现今已到了二十世纪，还迫着我们行"古礼"，守"古法"。一大堆古典式死尸式的臭文章，迫着向我们脑子里灌。⑭

在学校时，毛就造过现已与之不存在联系的老师的反。现在，他要造社会的反。他信誓旦旦："我们倘能齐声一呼，必将这历史的势力冲破。"

毛的文章受到李大钊举办的《每周评论》的赞扬（"武人统治之下，能产生我们这样的一个好兄弟，真是我们意外的欢喜。"⑮），这引发进一步形成了更广泛的组织"湖南各界联合会"。*

毛开始公开亮出自己的观点，他完成了自我的转折。读书学习，在书页上写一万字的批注是一回事，在公众面前亮相则是另一回事。这是一种行动，其言论将会造成后果。毛不再只是探索周围的世界，而是开始改造它。

消灭左派杂志是军阀张敬尧的一个癖性，就象看门人在能源危机时熄灭灯火一样。一批全副武装的士兵一夜之间就把只出版了五期的《湘江评论》扼杀了，它的主办者"湖南学生联合会"也同时被取缔。

当时各种小型杂志多如飞雀，过眼即逝。毛很快又入主《新

---

* 毛在《湘江评论》上发表的谈西方事务的文章笔锋犀利，但有时也很奇怪。他认为，德国"唯一出路"是与俄国、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联合成一个"共产共和国"。巴黎和会后，他讽刺法国首相克里孟梭说："无知的克里孟梭老头子，还抱着那灰黄色的厚册（暗指巴黎和约），以为签了字在上面，就可当作阿尔卑斯山样的稳固。"⑯

湖南》杂志，这家由湘雅医学专门学校的学生主办的杂志同样是“五四”的产物，因暑期人手短缺，欢迎毛来作编辑。杂志创刊于六月，八月份由毛接管，十月份便遭到了与《湘江评论》同样的厄运。但是它被查封之前，引起了更多左派的注意。

毛的文章被长沙的主要报纸《大公报》采用，他又可以写作了。他作为政论家已享有一席之地。其时，发生了一起可以大作文章的事。

长沙有位待嫁的赵小姐，她不喜欢择她为妻的那个男人，但是四位老人——她的父亲是眼镜制造商、男方的父亲开古董商店——坚持这一精心安排的婚配。结婚的那一天，赵小姐穿上新娘的服装，坐在轿中，在向男方家行进的路上，她突然从衣下拿出一把剃刀割喉自杀了。[17]

悲剧发生后不到两天，毛写的《对于赵女士自杀的批评》就见报了。接着，在两周的时间内，他在《大公报》上发表了八篇文章论述婚姻、家庭的压迫和旧社会的罪恶。

既如往常，毛从自己的生活中挖掘社会罪恶的根源。

他谴责社会，“赵女士的自杀，完全是环境所决定”。毛言辞掷地有声：“环境是婚姻制度的腐败，社会制度的黑暗，意志的不能自由。”他把赵小姐结婚的花轿称作：“囚笼槛车”。

从这九篇文章的字里行间，我们可以发现毛的包办的婚姻对他的影响，以及他母亲的逆来顺受。“大男子主义”已被列为中国革命的对象之一。

毛以父亲般的口吻写下了《婚姻问题敬告男女青年》。在另一篇文章中，他呼吁读者“振臂一呼”，并砸碎迷信的枷锁。勇往直前是他的一个信念支柱。“命定婚姻，大家都认做是一段‘美缘’，谁也没有想到这是一个错举。”

自此时起，毛反对自杀的思想持续终生。“截肠决战，玉碎而

亡，则真天下之至刚勇，而悲剧之最足以印人脑府的了。”

象赵小姐那样自杀不是对腐朽的旧社会的反抗，它实际上迎合维护了即将灭亡的旧道德秩序。毛写道：与其自杀而死，毋宁奋斗被杀而死。

毛鞭挞了妇女贞节牌坊，这在当时影响很大，“你在哪里看见男子贞节牌坊吗？”这个几乎可以肯定还是童身的男人问道。接下来，他召集女学生走上街头说服家庭主妇抵制日货，争取各方支持反对军阀张敬尧的罢工。

毛的思绪被新民学会的名称牵回。妇女运动只是造就新人的开端，毛正在逐渐接近这样一个观念：建立新社会应该是最终的目标。

毛和他的朋友们与张敬尧的湖南政权一直处于冲突状态，这种冲突在 1919 年 12 月终于摊牌。张的军队用刺刀和枪托驱赶在教育广场焚烧日货的人群。[18] 一个接一个的部署行动的会议开到深夜，毛写了一篇呼吁推翻亲日派军阀屠夫张敬尧的宣言。

一万三千名学生和他们的支持者在毛的宣言上签了字，长沙地区的罢工开始了。关键时刻到了，张敬尧没有被推翻——尽管他的统治动摇了——毛和其他领头的人惹了麻烦。

毛决定离开湖南，逃避张的追捕，因为，张现在对他们怀有刻骨的仇恨，他要到湖南以外去寻求对驱张运动的支持。

毛重返北京。这次在北京的四个月，是他收获的季节，尽管并不完全如预料的那样。

新民学会派遣毛北上，他是由一百人组成的驱张请愿团团长。毛还接受了《大公报》和其他报刊的任务，他这次不再是身无分文了。

在武汉逗留十天以后——在这里毛对当地形势作了考察——这一批人到达北京，正好参加在湖南会馆举行的有一千多人参加

的反张集会。毛带着一条标语来到会场："张毒不除，湖南无望。"

毛在陈旧破败的福佑寺租住下来，这里位于故宫附近的北长街。他睡在这寒冷的寺殿里，在镀金的神像的眼皮底下。他夜间阅读和写作的地方是一条香案、油灯摇曳的火苗将其映成怪影。香案旁边是一台油印机——这是新时代从事政治活动的圣物。这里就是这位来自湖南的青年政治家自豪地称为"平民通讯社"的印刷车间。

毛的反张计划并没有多大进展，北方是一个更广阔的世界，也就关心更大的问题：大军阀统治的"国民"政府的腐败；凡尔赛会议以后国际局势的急剧变化；十月革命引起的反响；五四主题思想的贯彻到底。毛串东走西，但一谈起湖南的事情，他所得到的是不屑一顾的眼神。

毛这次北京之行的第一个收获是杨小姐。杨开慧比毛小八岁，是一位身材苗条的少女，有着圆圆的白皙的脸庞。毛对她的钟情在前一次来北京时就已萌发，现在则更进了一步。

毛到达首都一个月之后，杨教授去世，这似乎为毛与杨开慧的结合开辟了道路。

这一对情侣开始了他们的"试婚"，[19]如果杨教授在世或许不会同意，但是在北京他们并没有成立家庭。他们在毛居住的北长街寺里的神像旁见面，或者去杨温暖舒适的家里。春天，他们一起到西山骑马漫游，在僻静处逗留。似乎在那年春天过后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就降生了。*

五四精神鼓舞下的毛杨的结合是自由恋爱的结晶，这在旧中国是罕见的。一年多以后在长沙举行的结婚仪式只不过是走过场而已，很少有人记在心中，甚至毛本人在1936年与埃德加·斯

---

* 原文有误。毛、杨于1920年冬在长沙正式结合，婚礼极简。长子毛岸英生于1922年10月24日。——校注

诺谈话时，也回忆不起来确切的日子。

长沙的赵小姐没能活着去光扬五四道德风貌，而杨小姐的奋争使这种精神在政治运动中得以体现。死去的赵小姐使毛愤遗笔端，活着的杨小姐则令他心醉神迷。赵永离人间，杨则在精神上注给毛以新的活力，佐促毛在二十年代进行笔战和继之以真枪实弹的斗争。

也是在喇嘛寺的香案上，毛阅读了《共产党宣言》。(中文译本，他当时不得不阅读与他有关的各种书籍。)这一次，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找到了知音。部分是因为《宣言》——其第一部分的中文译本出现于1919年11月的中国——是当时在中国最有影响的马克思的著作。部分是因为俄国革命后，经过李大钊教授和其他人的介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人的面前放出了新的光辉。

苏俄成了毛的指路灯塔，就象十八世纪九十年代法国之于英国的激进派一样。他对马克思理论的掌握是逐步的，但是布尔什维克的成功深深地打动了他的心。

他曾同一位青年妇女谈论新俄罗斯，并表现出热情，那位妇女说："搞共产，好是好，但要好多人掉脑壳。"毛激动地回答："脑壳落地，砍脑壳，当然，当然，但是你要晓得共产主义多么好！那时国家不再干涉我们了，你们妇女自由了，婚姻问题也不再拖连你们了。"[20]

对毛来说，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思想，它解释历史是怎样从一个阶段演进到下一个阶段。

毛对于革命行将带来的社会前景考虑不多，他也没有注意到艰难而重要的问题是要夺取政权。但是，在1920年他的确已经开始信仰马克思主义，并认为中国的命运要与俄国式的革命连在一起。

只有这样，才能拯救国家，克服落后，人民的能量才能得以

释放，五四英雄们的理想才能实现。

马克思主义从来都不是象命令或疾病一样，从一种历史环境一成不变地传播到另一种历史环境，而是在新的环境中得到再生。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接受也正是这样。自1919年他成为《新青年》的读者时，他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已在毛的心中播种。圣彼得堡传来的消息使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革命的希望所在。对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理论的吸收是毛的思想演进的第三个阶段。

毛说起他在北京度过的第二个冬天时讲："有三本书特别深刻地铭记在我的心中，使我树立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21] 这三本书除《共产党宣言》外，还有一本考茨基的著作和柯卡普的《社会主义史》。后两本书没有给毛很纯的马克思主义。*

但是，毛已经确立了自己的"信仰"。自1920年夏天开始，他认为自己已是马克思主义者，并且以后从未动摇过。无政府主义、改良主义和空想主义都被挤出他的政治思想的核心之外。

毛并没有在一夜之间吞食马克思、脱胎换骨变成纯粹的马克思主义者，这从他继续从事湖南自治运动的行为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四月份他离开了北京，原因之一是他在这里并不能为湖南的自治做些什么。

杨开慧自父亲死后便随母亲一起回到长沙，毛暗中思量，一俟湖南政局稍安，他便抽时间与杨聚会。

在那个时候，他还希望与陈独秀教授谈谈自己的马克思主义信仰。毛变卖了自己过冬的大衣买了车票启程去上海，脑子里装着一大堆没有清理的目的和想法。

---

* 至少列宁曾长期地把考茨基列为反马克思主义者；柯卡普的大杂烩式的书亦不成体统。

毛在上海日子艰难，他为大班和富有的买办洗烫衣服并要来回取送。

作为洗衣店的帮工，他每月的报酬是十二至十五块钱。其中要有大约八块钱用作车费，因为他要往来于洗衣店和私宅及旅店之间。如果说在他以后的生活中对上海很少露出笑脸的话，我们不难理解个中缘由。

毛期望陈独秀在湖南问题上予以指导，但是，这位革命的教授手头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由新近成立的共产国际派遣的俄国顾问已经到达中国，与李大钊和陈独秀商讨关于在中国成立布尔什维克组织的具体事宜。

那年春天的陈独秀是迄今所知对毛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影响最大的人。"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陈独秀表明自己信仰的那些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22]毛后来谈起这位以前是北京的反传统斗士时说。毫无疑问，洗衣店的艰辛使毛进一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也帮助他更深刻地理解了马克思所说的"无产者"这个词意义何在。

毛去码头向赴法勤工俭学的湖南学生送行，阳光闪烁在黄波逶迤的黄浦江面上，潮湿的空气中回荡着装卸船货的号子和汽笛声。毛身上穿着在自己受雇的洗衣店里洗得泛白的灰布长衫。

在赴法之前，新民学会的成员在上海的半淞园举行了会议。毛讲了话，他提出了"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口号，会议决定委派他回长沙任湖南勤工俭学运动的负责人。大家郑重地合影，然后，一帮人沿着吴淞口岸蹓跶着走向一艘法国货船。

在这次赴法的学生中有女生，让女生参加这一运动是毛的一个重要贡献。他对负责女生组的一位湖南学生说："外引一人，即多救一人。"[23]他对妇女的遭遇的同情再一次充分体现了他对旧中国的憎恨。

一位学生对毛的不能赴法表示遗憾，毛回答道："革命不可能等到你们归来再着手。"[24]

毛独自站在斜台上，看着朋友们顺序走进船尾的四等舱。当他要转身走回市内时，他大声对他们说："努力学习为救国。"[25]

湖南内战一直在进行，但是到了1920年夏，以张敬尧的败走和较为开明的谭延闿上台而结束。毛在这种新的自由气氛下带着满腹的政治计划回到长沙。

奉谭之命担任那骚乱不已的第一师范校长者恰巧是毛过去的老师，这位教育家不久就聘任毛为第一师范附属小学修业学校的主事。[26]毛在编辑《湘江评论》时曾在这里代过课。当蔡和森和其他的湖南名流正在法国的工厂里忙碌时，毛无可争议地成了新民学会的领导者。

修业小学的报酬丰厚，主事的职位且有一定的威望。毛很快就显示出他不只有俭朴的一面。他与杨小姐住在清水塘附近的一幢房子里，这里曾是一个地主的住宅，宁静而又漂亮。租金每月十二块，与他在上海洗衣店时的收入一样多，比他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时的收入还多50%。从外表上看，毛已跻身长沙上层社会。

1920年至1921年是毛思想和行动趋于一致的时期，这给他的政治生活带来了新的目标，也给他的亲属多少带来一些痛苦。

毛把五四精神推向前进。他创办了青年图书馆，又（与其他人一起）重建湖南学生联合会。[27]回韶山的几个星期，他给家乡传送了新文化的火炬，成立了教育促进会。他在湖南《通俗报》上撰文并担任编辑。这是一份半官方的教育报纸，毛的朋友何叔衡任主编后，该报便转向左派。

在一位与他关系颇好的女同学——她也是杨教授最好的学生之一——的帮助下，毛创办了文化书社，[28]在湖南传播左翼文化

的种子。"湖南人现在脑子饥荒，实在过于肚子饥荒。"他在"文化书社缘起"中写道。

毛在湘雅医学校以低租金租了三间房作文化书社社址，并且还从杨开慧的母亲那里得到了经济上的援助。他甚至请书法甚好的军阀谭延闿为书社写招牌，出席开业仪式。在那个下午的开业礼典上，两个冤家对头握手言欢了。*

书社营业很好，不久就在其他城镇成立了七个分社。初期最畅销的书籍有（都是中文书刊）柯卡普的《社会主义史》、《马克思〈资本论〉入门》、《新俄国之研究》等，杂志有《新青年》、《新生活》、《新教育》和《劳动界》。

毛在五四运动的主旨中增进了亲苏俄的内容。他和《通俗报》主编何叔衡一道成立了"俄罗斯研究会"，并发起了赴俄勤工俭学运动。在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影响下，毛试图组织劳工联合会。在共产国际的建议下——这些建议从北京和上海通过信件传给他——他开始组织共产主义小组。同时他还组织了社会主义青年团这一共产党外围组织。**

1921年5月，何叔衡被省教育厅辞退，《通俗报》的激进分子也一齐被解雇。毛聘用他们当中的许多人为修业小学的教师。在反抗斗争中，如果说学生是中坚力量，那么小学教师则象一根红线把他们与那影响不断扩大的毛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行营联在一起。

第一师范本身在传播马克思主义方面，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毛在校内学生中招募新的追随者；靠学校的薪水维持少数学生领导人的生计；利用校友会漂亮的活动场所召集会议，并以文化书

---

* 毛还办了一个弹棉作坊，希望能为左派事业筹集一些资金，但生意不佳。[29]

** 刘少奇当时曾是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成员，后来去苏联的莫斯科远东劳动大学勤工俭学。这位勤奋的少年来自宁乡县的一个地主家庭，他比毛晚五年毕业于第一师范。毛第一次去北京时他们曾见过面，并谈论过勤工俭学问题。

社的名义向每个与会者赠送10元钱作为礼物，以使书社的书库能象一个公共汽车站一样供年轻人进进出出。第一师范对于毛这个崭露头角的共产主义者来说象一个大家庭。

毛自己家庭的成员也被吸收进来。毛的父亲于1920年死于伤寒，终年52岁——除了说几乎没有人参加父亲的葬礼外，毛很少提起父亲的死[30]——毛悄无声息地接过了父亲手中的一切。他安排二弟毛泽民进入第一师范，让三弟泽覃在一个很好的中学读书，还把他继妹泽建送进附近衡阳市一所师范学校。

这三人不久便参加了共产党组织，在毛的直接领导下，毛象父亲一样不时把他们打发得团团转。

毛不复独立奋斗了。他经常收到很多从上海、北京和法国的来信并写回信。他在长沙这个不大不小的池塘中成了一条大鱼。在湖南各地他都有可靠的联系。他也过着普通的夫妻生活，妻子不久有了身孕。

毛在1920年写的一系列文章主要都是论述湖南自治问题的[31]。这是毛的地方主义思想的回光返照吗？窥斑见豹，从其生气勃勃的文章中，可以看出毛是如何的一个人。

还在上海洗衣店干活的时候，他就与一位主办《天问》周刊的湖南活动分子和湖南改造促成会取得了联系。现在，谭延闿成了省长，毛和其他一些人希望他能保证湖南的自治，"不引狼（北京政府）入室"。

毛论述这个问题的文章是他关于解放思想的延伸，还谈不上是马克思主义的（这些文章《毛泽东选集》没有收入）。他也没有为将来独立的湖南确立社会目标，只是简单地让湖南脱离历史的重负。

毛对湖南自治问题的议论是对自己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思想的运用。他把"湖南以外的"地方都称为"外国"。他呼吁成立"二

十七个小中国”，因为“大中国思想”是一种罪恶，阻碍了社会生活的“自然发展”。

诚然，毛之所以赞成二十七个省都关起门来自治，是因为他认为只有各省的小建设成功，一个更为强大和繁荣的中国才会存在，“此正是美、德两国由分而合的道路。”

然而，对于一个已经是激进的信奉国家民族至上的人来说，转而支持分省自治无疑是令人震惊的——他的一些左翼朋友也认为这是他的一个错误。

他沉痛地写道：“四千年历史中，湖南人未尝伸过腰，吐过气。湖南的历史，只是黑暗的历史，湖南的文明，只是灰色的文明！这是四千年来湖南受中国之累，不能遂其自然发展的结果。”

北京，同其软弱无能的“国民”政府（以及它严寒的冬天和对南方土话的歧视）都一并受到毛的抨击。

到1921年春，毛已经失去了对湖南独立自治的热情。军阀的更迭也动摇了这种激进的理想。谭延闿在1920年9月被取代，新统治者赞成自治，但反对通过自治解放民众的任何意向。

数周后，毛带头冲击省议会，把挂在考究的墙壁上的条幅、旗子扯了下来。他认识到了改良政治的局限，并要在现存政治结构之外进行组织活动。

• •

肖子升在法国勤工俭学回国后见到了毛。他们彻夜长谈，双方都伤心地掉了泪，因为他们发现他们之间的友谊已经出现了裂痕。毛是亲苏派，而肖不是。毛赞成强权，而肖则害怕这会危及个人自由。

毛决心组织民众来夺取政权，肖则仍是一个十足的学究。他对毛说：“象刘邦和项羽（汉朝的两位政敌）那样争夺天下的争斗，在耶稣基督和释迦牟尼看来，就象街头顽童为争一个苹果打架斗殴一般。”

毛只是说："你不同意卡尔·马克思的理论，很遗憾。"[32]新民学会兄弟般的团结自此已成为过去。

1921年初期的一个大雪天，新民学会在文化书社开了三天会议。毛在会上强调"变革"的目标，反对"改良"。他赞成采用俄国式的革命方法，反对"通过几十年的教育"的改良方法。

从法国归来的大部分人反对他的观点，一些继续留法的人也写信反对这一观点。他似乎遭受失败，这是因为他在会上宣布新民学会"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但是，在某种意义上他赢得了自己斗争的胜利。他转移了自己的思想传播基地，他把和自己观点一致的一伙人拉进了社会主义青年团，使新民学会趋于解体。

五四运动的参加者已经分裂成两派，也就是这些问题造成了毛与肖的分手。1919年在《新青年》上的论战已经为他们作了总结："谈论主义"还是"研究问题"？知识分子是用理智分析研究具体问题，还是在一种思想意识的指导下付诸一定的行动？[33]

胡适教授为首的五四自由派，坚持研究具体问题而远离政治生活，李大钊教授为首的马克思主义派，则信守"主义"。

无疑，毛站在"主义"一边*，他希望发生分化。如果把五四传统与某一具体思想形态联系在一起就意味着会产生分化的话，这种分化是件大好事。其时，另一种分化也已隐约出现。

无政府主义在1920年乘时而入。一些敏感、笃信绝对自由的年轻人组成了自己的组织：湖南诗雨社、健学会、青年会和（最有影响的）劳工会。

毛对无政府主义的信条非常了解，1918—1919年在北京时这种无政府主义思想曾一度使他着迷，但是现在，在他的心中，

---

* 胡适避谈意识形态问题，要求成立"好人政府"。这与毛曾想要孙中山任总统、康有为任总理、梁启超任外交部长组成政府时所持的理想的折衷主义何等相似。

马克思已经驱逐了克鲁泡特金，他不顾一切地与劳工会展开斗争。

毛以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这类马列主义的书籍为武器，抨击无政府主义的代表人物，给对方以毁灭性打击。

他嘲笑无政府主义者要“在24小时之内废除国家”的蠢举妄动。

每当从无政府主义的阵营中争取过来一人，毛就把他引荐到组织严密的社会主义青年团中来。

在北京时的孤独和被人疏远，使毛倾向于接受无政府主义。现在，他正作为长沙左派力量的主要带头人大踏步地朝前迈进，开始把无政府主义看作是令人难容的东西。

1921年夏，毛乘船北上。这次旅行是他在长沙十个月的组织活动的最高峰。

作为准备阶段，先是成立马克思主义与俄罗斯研究会，然后是新民学会的分化，接着是有坚定信仰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产生。现在，重要的时刻到来了。

在前此的几个月中，毛收到了数省共产主义组织在联络地上海和北京的重要的马克思主义者发来的很多指示。他在1920年9月曾秘密地去过上海这个港口城市参加计划会议。

现在，毛作为湖南两位主要的马克思主义者之一再次返回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湖南的两位代表都是教师，另外还有来自其他五个省和(留学)日本的十一名代表。

非常凑巧，在至汉口的船上毛正好与肖子升同舱。作为朋友，他们争议到深夜，毛正在阅读《资本主义制度概论》。能维持坚固

的友谊而不分道扬镳吗？毛心里更可能有一种负疚感。*

十三位代表风尘仆仆赶到上海的法租界，住进在博文女校已经订好的房间（学校暑期放假)。他们大都是年轻人——平均年龄26岁——其中没有一个是工人或农民，毛的家庭出身最为低下。

会议于七月中旬在望志路一栋装有黑漆大门的灰红色房子里举行。这栋房子外表平平，底层没有窗户，为上海一位代表的长兄所有。全体代表——包括两名来自共产国际的俄国特使——围坐在起居室桌旁的圆木椅上，桌上放着茶杯和文件。

毛当时是27岁，他抿着嘴很少讲话，眼睑下有一圈黑晕。作为一位代表，他穿着土布长衫很象一位来自湖南乡下的道士。

有人记得毛在谈话时不停在耸肩。他那好斗的特性使人留下印象。"他在讲话时微笑着布下陷阱引诱对方上钩，使与之辩论的一方无意之中自相矛盾。然后，他发出一阵笑声。"[35]这会惹火那些认为有重要问题要谈的人。

毛常常不修边幅。"你可以从他的脖子和身上刮下斤把灰尘"，[36]一个同僚回忆说。在饭店吃饭时，他用袖子擦去洒在桌上的饭粒和酒。他常常是穿鞋不穿袜子，或是让袜子搭拉在鞋面上（他的这种习惯保持了几十年)。

在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令毛十分激动的一周，他一直渴望大会的召开。他在着手湖南自治运动时曾写道："无论什么事有一种'理论'，没有一种'运动'继起，这种理论的目的，是不能实现出来的。"[37]现在他确认，这种运动应该是布尔什维克式的，而他正与两名布尔什维克同桌而坐。

参加会议的十三位代表虽然各有不同的考虑，但终归都受到俄国革命胜利的巨大激发。如果没有苏联的影响和帮助，这种会

---

* 同样奇怪的是，毛和何叔衡的上海之行使长沙的一些激进分子感到"很突然"[34]，——是否湖南代表人选事宜曾发生过争执？

议是不可能在1921年举行的。

但是，长沙的情况不同于整个中国，更不同于莫斯科。党的核心提出的思想是否与毛这位地方政治家所设计的方案不谋而合呢？

迹象表明，湖南代表问题似乎成了会议的注意焦点。会议认为，毛的伙伴何叔衡不是完全的马克思主义者，没有资格充当代表。毛不愿伤害湖南老乡的自尊心，于是找个借口让何返回长沙，说长沙有紧急的事情需要何去亲自处理。*

会议的气氛并不十分热烈，代表们并没有感觉到自己是在亲自经历一个重大历史事件。炎热的气候使人疲惫不堪。一些代表感到头昏脑胀，而更多的人则发生意见冲突（而毛无论如何也不是这次散漫的会议上的活跃人物，他后来对这次会议谈得很少）。

能否说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是虎头蛇尾？在某种程度上是这样的，李大钊教授（当时仍在北京）和陈独秀教授（当时在广州）都没有出席。

的确，十三位代表几乎都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仅代表中国当时的五十七名共产党员！没有理由希望他们在一夜之间完成移山之功。

无论如何，这些代表不是经过考验的有共同信念的团体。其中一位代表不是住在女校，而是住在豪华的东方大酒店，并且花很多时间和精力陪他漂亮的妻子逛商店购物品。

十三位代表无法主宰这次会议。会议的规模和时间基本上是由共产国际以及缺席的李大钊和陈独秀决定的。

代表们谈论的观点与毛内心深处的想法并不十分吻合，这尤其使毛不悦。

---

* 作者的这段文字资料来源于张国焘的《我的回忆》。事实上，何叔衡作为"一大"代表始终参加了会议。包惠僧说："记得开会时，何叔衡与毛主席坐在一起，在我的对面。"——校注

会议上出现了两条路线。占统治地位的是共产国际的路线，而且得到了富有才能的张国焘（他的故乡就在韶山附近）的支持：组织城市工人，推翻资本主义，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政权，摒弃与孙中山的脱离实际的国民党的一切联系。

不赞成上层路线的是渐进主义者。他们认为需要一个民众教育时期，中国的城市工人数量太少，不足以推翻资本主义，为了反对帝国主义和军阀，与孙中山合作是可能的。

毛在根据自己过去的经验思索：谁充当组织领导者？采取温和的还是强硬的手段？毛对这两派的了解都不是很深。这就是为什么他当时没有强烈地支持任何一方的原因吗？

简单地说是这样，因为他当时心态复杂，漫无头绪。苏联模式是他新的热情所在，但是由于他以前存在的信念根深蒂固，这种热情又很不稳固。

在长沙反击无政府主义的过程中，他更加信仰俄式的社会主义，并满腔热情地加紧建立政党。但是到了上海，他新近形成的信条似乎有些动摇。

当时在全国的五十七名党员中长沙有十六人，他的湖南同志是否理解莫斯科的精神呢？这种新的观点在韶山是否能行得通？毛当时还没有完全理解俄国的布尔什维克主义。

一天，与会者发现了可疑的来访者。很明显，法租界已经注意到这个会议的行踪。会议决定迁到上海南边不远的风景胜地。于是，会议在南湖的一只租来的游艇上继续举行。

肖当时正取道上海回法国。奇怪的是他与毛乘一列火车抵南湖（肖说这是毛的建议）。所有的会议代表也都同车抵达，但是他们在车上没有坐在一起。毛和肖闲聊，抵南湖后同住一个房间。在解行李时，毛还力劝肖参加会议。

会议在游艇上继续进行，舒适华丽的十六米长的游艇飘荡在

水面。代表们品尝着南湖的鱼，商量着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的事宜，决定加入共产国际，并且每个月向在莫斯科的总部汇报一次。

那天晚上毛很迟才回到旅店。撩起蚊帐，他爬到肖的床上与他睡在一起，他热得满身是汗但是没有洗澡。

“代表们大多都不错。”毛用长沙老乡之间谈话的口吻对肖说。他似乎正在思考他所要进入的更为广阔的世界。“有些人还受过很好的教育，懂日语和英语。”㊳

毛对肖作了深谋远虑的预见：“如果我们努力奋斗，共产党在三、五十年内就有可能统治中国。”㊴这种预言在当时简直是空口说白话，肖当时也没有多深的印象，他担心独裁主义会步尘而来。

第二天早晨，毛没有去参加会议。他起得很迟（这是他的习惯）——起来后便与肖一起去游览杭州的名胜。他们在西湖附近的花园、小山和寺庙中度过了一天的时间。

然而他们争吵了起来，肖羡慕山水的壮丽，毛打断他说：“这些满是罪恶的地方，几多人把自己的金钱用来干可耻勾当。”他们在杭州只呆了一夜。

毛不久就回到长沙，担任襁褓中的共产党的湘区区委书记。从那以后，他再也没有见到过肖子升。

组　　织（1921—1927）

一切都发生了变化，但是，热闹了一阵子，又都恢复如常。上海的一次会议并不能就此动摇长沙的政治模式，也不能引导毛转向他喜爱的事业。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之后，毛有了一些新的任务，但是，他仍是沿着熟悉的五四道路前进。

毛是中共湘区党的负责人，但是也没有多少事要负责。他还可以做自己的事，这就是教育加组织。他试图把共产主义这杯新酒倒进湖南这只试瓶中。

他的活动范围仍在长沙。1921年至1923年间，他的文章大多发表在长沙的《大公报》上，而不是在党的或全国性的刊物上。在1921年和1922年的文章中仍然可以看到五四精神的光辉。毛甚至还没有烧掉他与无政府主义联系的桥梁。

他在第一师范的关系网仍然存在，成了共产主义者他也没有停止在附小的教学工作。在

第一师范的支持下，他开办了夜校，参加学习的有黑铅厂工人、电灯公司的职员、人力车夫、菜贩以及铁路工人。第一师范附近的居民都知道“夜校的毛先生”。①

毛还办了“补习班”，为那些想学算术和语文的18岁以上的农村青年补习文化，这使乡下的泥腿子第一次走进了第一师范宽敞的讲厅。他们皮肤黝黑，衣衫褴褛，身上散发气味，在课堂上出声地嚼着大饼和油饼。

有些人试图把这些鱼从第一师范的池塘中赶出去，毛一面尽力取悦母校校长，一面当众以漫不经心的口吻说服饰和饮食习惯只是“小节”。他软硬兼施的策略使人难以招架，这使他能把补习班继续办下去。

在毛的这一系列教育活动中，最为出色的是创办“湖南自修大学”。它于1921年秋季在“船山学社”成立，在学校存在的两年多时间里，学生最多时达二百个，毛的弟弟泽覃也是其中的一个。毛把新民学会的朋友请来讲课，开慧也曾助一臂之力。

事实上自修大学上课很少，它的宗旨是读书、讨论和自修自省。

确定无疑的是，传播马克思主义是其目的之一。学校出版了言辞甚激的小型月刊《新时代》，毛在上面发表了自己最初的两篇带有马克思主义味道的文章：《观念史观批判》和《马克思学说与中国》。*毛解释说，这份刊物不象普通校刊那样的“文字的杂货店”，它将朝着既定的方向。②这位年轻的组织者也在努力使自己靠近既定之规。

然而，毛仍然首先是教书匠，其次才是理论家，他相信，教育会提高“老百姓”的素质。作为教师，他是认真而忠诚的。

---

* 这两篇文章的作者，分别为李维汉和李达。——译注

在二十年代早期，毛写的文章最有趣的要算《自修大学言》。这篇写于1921年8月的文章，在1923年初被上海的一家重要杂志《东方文汇》转载。

对传统教育的强烈不满使毛创造出“学阀”一词，中文的“学阀”是由“军阀”一词套用而来的，学阀冷酷无情，信奉金钱主义，用学问作交易，武断地给学生灌输知识。

毛的学校，入学者毋须考试，但要求“提出自己对社会的批评主张”或“阐明自己的人生观”。学校授课很少，宗旨是自己“阅读和思考”。学习过程成了一个集体寻找光明的过程，毛勉励学生刻苦钻研。中国历史是自修大学的主要课程。③*

正如该校利用古雅建筑作校舍一样，它亦从传统教育中借鉴了有价值的东西。毛说他要把三件好的东西结成一体：旧式书院刨根索底的研究方法，现代学校的崭新教学内容，培养健全人格的常规体制。

学校获得了成功，然而只有少数精英才知道学校的真正目的。湘区党组织从历史、地理和哲学各班吸收了许多新成员。但是很多“老百姓”认为读书太多太难懂。

在二十年代早期的手工工人，能够并愿意上夜校学习世界史，那决不是一般的人，毛迄时为止还没有与普通群众打成一片。

上海的会议在某个方面影响了毛，他比以前更加注意劳工运动。

1922年中国劳工运动的高涨，人数很少的共产党人在其中做了很多工作。他们（以及支持他们的共产国际）认为这是代表中国未来的潮流。马克思发现了工业无产阶级，它在东方的信徒们

---

* 毛自己讲授中国古代史，他认为，了解中国的过去会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④

也步尘而至。毛尽管有所怀疑，但他还是参加了进去。

毛从上海回来时戴了两顶帽子：他是湘区区委书记，还是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主任，劳工运动是当时中共的重点所在。安源是毛的第一个战场。

位于湖南东部的安源是一座僻镇，但是，1898年德国和日本在这里开了煤矿，使它拥有大批的煤矿工人，因此它成了姗姗来迟的中国工业革命的最早立脚点。⑤

六十年代有一幅油画，画的是年轻的毛顶着狂风无畏地向前迈进，去发动安源的矿工。* 画中的毛比真人还要大，他穿着白长衫，仪态庄严，看上去象一位牧师要给不信教者带去真理。

1921年底到1923年初，毛到安源去过四次，实际情况并不全如油画上所表现的。在安源的这项工作是尝试性的也是艰难的。有些工作没有任何结果，而且毛也不是唯一的领导者。

毛的确穿着白长衫，沿着铁路步行到安源，但是当他一看到这座小城时就脱了下来。安源是一个很脏的小城。

在恶劣的工作条件下，一万二千名矿工被每天十五个小时的繁重的劳动累得麻木了。在方圆四英里的范围内就有二十四座基督教堂，却只有一个小小的医疗站为六千名工人服务。这里是狄更斯笔下情景的再现，这里丝毫没有受到五四的激动。

毛尽力保持很低的形象，他住在矿工的家庭，察看矿井，勤做记录。

当他走进屋子去与工人交谈时，矿工们全体站起。工人们的这种敬畏并不利于他完成工作，社会隔膜的存在，毛在精神上感到苦恼，难道他已不再是大地的儿子而成了一个格格不入的莫斯科的真理的守护者？

---

* 顺便说，这幅油画的复制品1969年在梵蒂冈展出，标题是："年轻的中国传教士。"⑥

毛并不灰心。他和弟弟泽民一起第二次到安源。这一次毛头戴草帽，身穿着破旧的上衣，脚上是一双草鞋，看来土气多了。

在1921年12月的几周时间内，他们二人住在一家客店里。每天，他们都冒着晨雾外出去说服矿工。“你们的双手创造了历史”，毛不停地对着这些黑黝黝的面孔和疲惫无神的眼睛说。

他在安源的主题是要反对天命论。

一个共产党小组成立了，还有工人俱乐部和必然会出现的工人夜校。夜校并不十分成功，毛不久就取消了夜校，代之为工人子弟办了一所很顶用的日校。

毛会用简明形象的教学方法。他在黑板上写上一个“工”字，解释说，上边的一横线是“天”，下边一条是“地”，中间的竖线代表工人阶级自己，工人是站在地上，顶天立地，整个世界都是他们的。⑦他这种教学方法或许会让杨教授摇头，但这并非不好的教学方法。

1922年9月，当毛第三次来到安源时，安源的气候是山雨欲来。这部分是因为矿工的悲惨遭遇，他们不被当作人看待；部分因为来自长沙的知识分子的成功的煽动。

毛是负责人，但他并不是主要的操纵者。另一位主要人物是李立三。李即是对毛1917年的征友启示没有明确表态的那半个答应者。直到1921年，李还在法国勤工俭学。

另外一个人物是出身于地主家庭并曾在莫斯科受过教育的年轻人刘少奇。在1922年秋天那次成功的安源罢工中，刘是一位英雄。这次罢工使安源对大部分中国人来说成了一面旗帜，并促成了湖南省工团联合会的诞生。毛被选为联合会的总干事。刘则在毛的桂冠上加上了漂亮的羽毛。⑧

安源的工运使人印象至深却颇异常。四亿多人口的中国只有二百万产业工人，安源工人俱乐部犹如沙漠孤堡。“工人万岁”，毛带到安源的这一口号在1922年的中国听者藐藐。

安源办起了阅览室、合作社、工人议事会，大约有60%以上的工人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各级工人俱乐部。五一节举行了盛大游行，十月革命的周年纪念日、列宁的生日，甚至远在德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李卜克内西的生日都有庆祝活动。

在安源立下了根基，共产国际心里暖烘烘的(安源确被戏称为“小莫斯科”)。这里看上去似乎成了对所谓的世界革命有示范作用的前哨阵地。但是它将把世界引向何处？矿工们赢得了较好的工资和工作条件，下一步怎么办？

1922年，毛几乎没有写什么东西，建立一个又一个的组织使他太忙了。

现在清水塘成了他的办公室。这里是湘区区委所在地，也是长沙左翼分子的会所，直到黎明时分，这所低矮的房子——周围是共产党人用以掩人耳目的菜地，窗户透出的灯光常常持续到黎明。

毛还过着自己的小家庭生活，他不象有些共产党人乐意的那样，终日埋头于文件和会议之中。杨开慧和毛从清水塘搬到了部分由自修大学使用的一所房间，这里比较舒适。毛的岳母和他们住在一起，她自己有一间中意的房子。毛的第一个儿子岸英（意为英雄的河岸)生于1921年。温馨的家庭生活并没有因繁忙而紧张的工作受到冲击。

到1922年又发生了变故，不知是因为家庭的原因，还是毛希望离办公室近一些，他们又搬回清水塘居住。

毛领导了长沙有六千名泥木工人参加的罢工(他们抱怨每天只能喝上两顿稀粥)。他穿着粗布衣衫装扮成工人，吹着口哨指挥工人呼口号。⑨ 他还领着一批人在晚饭时间冲进有钱的工头家里，让工人看看两者在饭食上的差距。

省长的随员怀疑毛不是普通的建筑工人，盘问毛的名字，毛

却巧妙地把话头扯到其他事情上去了。

1921年11月，毛曾与当时途经长沙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有过会晤(他以后没有提起过)。[10] 毛帮助成立了各种各样的工会组织，这包括石匠、理发、纺织、裁缝和排字等各行业工人。毛南下到衡阳，在第三师范建立了党组织，他的继妹为他这种工作铺平了道路。

毛参加了排字工人的罢工，他们反对毛经常在上面发表文章的《大公报》。这次罢工可能损害了他与编辑部的关系，此后，他很少或再也没有在这份报纸上发表过东西。[11]

对长沙九千名人力车夫的艰苦生活，毛表现出特殊的关切，拿出党的活动经费帮助车夫做3100辆人力车的大小车主降低车租的罢工，并取得了胜利。在给人力车夫上课的夜校课堂上，毛又采取了新的教学方法。他在黑板上先写一个"工"，再在旁边写一个"人"，这两字的合义就是"工人"。毛然后再写一个"天"。他微笑着告诉车夫如何把"人"字放在"工"的下边构成"天"字。他进一步解释说，如果工人团结起来力量可以顶天。[12]

有些车夫取得了入党资格，毛在南门外为他们举行简短的入党仪式。他把中国共产党的旗帜挂在榕树上，车夫们一个接一个地前来旗下，举起右手随毛宣誓："牺牲个人，阶级斗争，严守秘密，服从纪律，努力工作，永不叛党。"眼中闪现出喜悦的神色，毛给每位新党员一份证书和一些学习文件。

这真是乾坤逆转，天翻地覆。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工人，从来都被认为与政治无关，现在却成了自认为是历史前进动力的政党的成员。人们会说，这是从贫民窟提出来的权利要求。

此后不久，阿格尼丝·史沫特莱在北京与几位有教养的中国人共进晚餐。酒过三巡，一位上层人士宣称："中国没有阶级，马克思主义者才抱这种观念。我的车夫拉着我走在大街上时，我们可以象老朋友一样谈笑。"史沫特莱惊讶地问："假如是你拉着他

走在大街上，或者说他不愿意干时，你们还能成为朋友吗?”⑬

二十年代的北京对毛一无所知，然而史沫特莱早已不知疲倦地参与了毛的事业。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毛发明了阶级，这是令人信服的发明。它说明了人力车夫并不处于社会之外，通过阶级斗争能成为历史的一部分。

1922 年 4 月，毛到杭州参加中国共产党中央全会。他成了引人注目的人物，同时他又不是太有名气。参加杭州会议的一位共产国际的代表回忆说:“扮演主角的与会者是陈独秀、李大钊、张国焘……和另外一位非常能干的湖南学生，我记不起他的名字了。”⑭ 毛当时名声赫赫，但仍是一隅之士。

1923 年，湖南的劳工运动进入了关键时期。一方面它处于全盛阶段，在中国是最强大的。毛让李立三、刘少奇和他的有经济头脑的弟弟泽民留在安源继续开展工作。他又在湖南的很多地方播下了革命种子。

他组织了不少工会，他发动了多达十几次的罢工，他不时地在各处暗中发展党的组织。工作正大踏步地朝前迈进。两年的时间，湖南就有了二十多个工会组织和五万多名会员。尽管发展党员条件甚严甚慎，但湖南的党员人数从 1921 年中期的十人，一年后猛增到一百二十三人。在每一个工会成立之际，毛总是设法把一名党员安插进去作总干事。

另一方面，劳工运动缺乏民众基础，铁路上发生的危机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

象很多产业一样，铁路大部由外国资本把持，反帝情绪加剧工人的反抗心理。铁路工人是最为先进的，在华北，铁路成了襁褓中的中国共产党的摇篮。根据上海的指示，毛把注意力转向粤汉铁路。中国共产党认为它——与安源煤矿一样——可以成为湖南无产阶级革命的先锋。

毛按照安源模式行动。在长沙的新河车站，他干起来得心应手，工作进展顺利。他在茶馆举行会议，有时邀请铁路工人到清水塘他的家里彻夜讨论罢工计划。

在北边的岳州，毛的工作因为某些原因收效不大。"工人是世界幸福之母"，⑮这句响亮的口号也没有能带来多大的成功。

一场罢工在1922年9月被发动起来，列车象死蛇一样躺在停车场里。毛还特地安排了从其他工会和城市发来的支持罢工者的声援电报。但是，已经控制住汉口的北部军阀马上把军队调向岳州镇压工人。结果损失惨重，鲜血染红了铁轨。

虽然进行了反击，也取得了一些成绩，但军阀终于控制了局面。到1923年2月，粤汉铁路工人已经被压服，湖南的统治者取缔了工会。无产者似乎还没有接近革命。

1921年至1923年的斗争阶段似乎很快结束了。1923年4月，毛逃离长沙，躲避作为"过激派"要受到的逮捕。*⑯

毛没有和杨开慧一起出走。杨又一次怀了孕，由她的母亲负责照顾。过去的两年，是毛和他的第一位自由恋爱的妻子在一起生活的最长的一段时间。

当他潜入乡下时，毛有很多问题要思考。城市工人的革命是否真的已经在即？如果不是，还能说共产党是绝对正确的吗？

党在城市的道路上艰难地行进。党的总书记还是陈独秀教授，他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以致看不到农村道路的希望。那些从欧洲留学归来的人，如李立三、刘少奇等也没有认识到，亚洲的革命应该与欧洲的有所不同。

但是，中国的无产阶级人数太少，不足整个人口的百分之一，中国共产党也还主要是知识分子的组织。很多活跃的工会会员还不知道"马克思主义"一词是什么意思。

---

* 很多年之后，当时的湖南省长在台湾接受采访。在问及他当时为什么有机会却没有杀掉毛时，他笑着回答："我也不知道，可能是因为他的能量太大了。"

再说，军阀手中有枪，公然蔑视他们几乎等于自取灭亡，劝导他们看来也是无济于事——毛在1922年12月曾与湖南省长引经据典地交涉过。

毛没有参加1922年7月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这一点令人费解。他当时已作为参加会议的代表抵达上海。他后来解释说："我本想参加，可是忘记了开会的地点，又找不到任何同志，结果错过了这次大会。"[17]很难相信在偌大一个上海他竟没有一点关系。看来在1922年夏天，毛似乎与党并不完全合拍。

他的热情受到压抑。劳动工会曾是他的生命，为此他牺牲了自己的写作，丢掉了在小学的教师职位，而且不得不逃离长沙。

然而，城市的组织工作并不能发挥毛的全部能力。他从没在矿井或工厂干过活，他熟悉土地却不了解机器或生产程序。他也没有去过欧洲，而在那里，无产阶级通过起义掀起的世界革命轰轰烈烈。

在某种程度上，毛没有象张国焘（一个地主的儿子，能讲英语）、李立三（曾留学法国）或刘少奇（曾留学苏联）那样完全适应城市的劳工运动。

他并不象刘少奇那样相信产业组织的不断前进，会象受引力作用那样，自然而然地踏入社会主义之门。

工资与劳动时间问题并没有给毛以很大的刺激，换句话说，还没有长沙那位新娘的自杀或他父亲对佃户的贪婪给他的影响大。

排外倾向使毛收住了脚步。俄国顾问在当时是很时髦的，但是，新中国这样就能产生吗？简单地在共产国际的日程表上勾出几条，可爱的中国的一石一土和社会生活就会发生改变吗？

问题是要找到同盟军，毛知道这一点。他在《民众的大联合》

一文中已经表明了他希望广泛联合的意愿。但是在1919年，毛还是自由地写作自己感兴趣的东西。到1923年，他已成为纪律严明的队伍中的一员，这支队伍的领袖比他更神通广大，而它的总部则是在八百英里之外的上海。

中国共产党内部对于1921—1922年的政策也正好在重新考虑。第一次代表大会产生的路线是偏执的，五十七名党员的力量也过于弱小，莫斯科认为“一大”路线过于自大。

生于荷兰的布尔什维克推销员马林，试图遵照共产国际的指示改变这个局面。1922年的第二次代表大会没有认真对待马林的意见，实际上路线并没有改变。不久，广州发生的事给马林以进攻的手段。

自1917年起，一直就任广州政府首脑的孙中山被军阀赶出了他的巢窠。孙——这位行为古怪、热情满腔、性情无常的人物——正处于穷途末路。西方国家从未支持过他，军阀也开始反对他。莫斯科这时向他伸出了手。

1923年1月，一桩政治联姻就这样促成了。孙中山在上海与苏联特使越飞达成了协议。中国共产党将与国民党携手合作，共产党员可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同时共产党继续保持其独立的存在。但是，“国民革命”的组织领导权落在了国民党一边。“国民革命”对共产党来说还是新术语。

这是决定命运的一步。莫斯科对此很满意，这是共产国际把自己的标签贴在中国革命身上所获得的第一次成功。可是，中国共产党内部并不是皆大欢喜。

对毛来说，一个新的阶段开始了。呆在韶山认真地思考一段时间后，他又来到了上海。毛住在党组织提供的一间房子里，周围是外国租界（比较好听的名称是“国际租界”）喧嚣的商业区。他给他的同事递交了一份湖南工作的报告。

1923年夏，毛生平第一次来到广州。中国共产党要在这里召

开第三次代表大会，讨论与孙中山的合作问题。毛在会议期间说："一定要有革命的大联合，不能孤军奋战。"⑱他很快就成为与孙中山的国民党联合的热心的支持者。

这座南方城市使他眼界大开，这里有外国人，有地处内地的湖南所没有的通商口岸。*它的喧闹对这位还没有见过大世面的湖南人是一次震荡。毛在广州方言的包围中无所适从。

另一方面，这座城市毕竟位于长江以南。广州的气候、饮食和习惯要比北京更适合这位湖南人的口味。毛和广州人一样穿起了木屐穿街过巷。

为什么毛如此热心于同国民党的合作呢？**

在广州时原因有两个。毛一直认为建立新中国的斗争是一场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1923年的国民党是反对帝国主义的。对于正在出现的孙中山——莫斯科——中国共产党这种三角联盟，反帝是较为合理的或者说是唯一能把三者维系在一起的纽带。

为了反抗外国对中国的欺辱，毛倾向于中国各阶层组成最广泛的联合。

另一方面，毛之所以赞成合作是因为他的地位还不高，他不愿与大多数人发生意见冲突。大会表决是否要把劳工运动的领导权交给国民党时，毛起初投票反对，难道要把这些轰轰烈烈的工会组织拱手交给只知纸上谈兵的外来权威？

但是当大多数人转向另一边的时候，毛也改变了自己的调子。他要与大家一致，他不得不如此。从长沙这块根据地出来以后，他要在全国性的共产党网络中开辟自己的道路。

大会选举他为十四名党的中央委员会成员之一，这使他得以

---

* 湖南当时还没有外国人开办的工厂，所以毛认为，长沙的上层社会人士虽然一无所长，但却阻止了帝国主义的入侵。⑲

** 张国焘反对与国民党合作，陈教授则赞成，因为他认为，中国还没有作好革命的准备。

取代极左主义分子张国焘而成为组织部长。因为这一工作，他的基地迁到了上海。1923年，他的文章主要发表在党的全国性刊物《向导》上，而不是在湖南的刊物上。

毛现在成了全国性组织的工作人员，在长沙教书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另一位同志接替了他在湖南省工团联合会的工作。他清点行装搬出了清水塘，再也不需在湖南居住了。

但是，他与湖南的两条重要联系依然存在。韶山在他的心中仍占有一定的位置；杨开慧也还没有离开长沙。1923年底，毛通过信件得知他们的第二个儿子来到了人世，取名叫"岸青"(意即明媚的岸边)。

第二年的大部分时间毛都是住在上海。这是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地方，在当时的中国，这是无产阶级人数最多的城市。在上海，帝国主义势力象黄浦江上的雾角声和小贩的沿街叫卖声一样无处不在。

一天，毛邂逅一位刚从欧洲留学归来的同学。毛穿的是褪了色的中国旧式长袍和草鞋，这位同学则是西装革履。"你最好换一换衣服"，毛轻蔑地说。这位同学感到迷惑不解。毛继续说，"我告诉你为什么。"[20]

他和他的朋友一起沿着码头走到黄浦公园。公园的大铁门上是一块写着公园管理规章的牌子，其中一条是禁止折花，另一条是说不许狗进入，第三条写的是："除苦力外，华人不许入内。"

毛与这位勤工俭学归来的朋友之间的鸿沟一直没有填平。在内地长大的毛，在这个通商口岸，不能习惯中国人在西方人面前卑躬屈膝。

这年的冬季，毛又一次南下到广州，这次是参加国民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曾一度苦恼的孙中山现在成了亲苏分子。

---

* 国民党成立于1912年，它的前身是同盟会。但是，只是在根据孙、越的联合宣言进行重组以后，它才成为一个组织严密的政党，召开自己的代表大会。

在会上和会后，毛比以前都更积极地为国民党工作。刚刚进入而立之年的毛，在马克思主义派别以外更广阔的政治舞台上第一次亮相。

在会上，毛为孙的不明朗的而且非马克思主义的“三民主义”进行辩护。他是被选进国民党权力机构中的十名共产党员之一。同时还与另外两名共产党员一起，进了由十九人组成的国民党新党章审查委员会。

在上海的国民党机构中，毛被委以重要的职务。一个月之内，他就成了国民党驻上海分部的组织部长。

1924年早春，毛春风得意地回到上海。他分别处理两个党的组织文件。在被驱出湖南以后，他已有了一个崭新的开端。在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结成统一战线的日子里，他感到志得意满。

毛有了新的工作伙伴，其中有米哈尔·鲍罗廷和他率领的共产国际的顾问团。

1923年到中国工作的时候，鲍罗廷还不满40岁，但是他认识列宁，而且声望较高。在统一战线中，他成了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双方的顾问。来访者只有出示一个系着金链、上面绘有国民党党旗的珐琅徽章，才能进入他在广州市区的别墅。

鲍罗廷身材魁梧，有着棕色长发，络腮胡子，他穿中山装，着高筒靴，在豪华的办公室里踱着步。他不会说汉语，却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他的美国妻子是布斯特·基顿的亲戚）。㉑

在广州，毛有时与这位抽着香烟、讲话喜欢打手势的苏联人交谈。他认真地听着那些精心构思的理论和苏联的建议。但是，他与鲍罗廷的世界观相去甚远，以至这位侃侃而谈的苏联人所讲的一切都不能打动他。*

没有几位苏联人能讲汉语，他们对中国也不是十分了解。的

---

* 鲍罗廷说他发现毛“非常自信”。㉒

确，十月革命是世界革命的火花，但是，这些凡胎肉眼的使者能否完成传播革命的任务呢？

如果说毛和李立三一样对共产国际的“传教士”并不感到敬畏的话，他也和张国焘一样不与他们作对。他对这位来自莫斯科的活泼的年轻顾问保持超然的态度（当时在广州的另一位亚洲马克思主义者受鲍罗廷的影响很深。这位穿着欧式亚麻布制服、单薄而患有结核病的青年经常出入于鲍罗廷的别墅。他被法属印度支那赶了出来，中国民族主义者为他提供了避难所。他就是胡志明。）[23]

毛还认识了国民党的一些领袖人物。他在广州曾与孙中山有过一面之交。这位毛少年时代的英雄正处在自己生命的最后一年，说话显得啰嗦。“他不允许别人与他争论，或者提出他们自己的看法。”毛抱怨地说。[24]

在上海，毛经常见到的两位国民党高级官员是汪精卫和胡汉民。两位都是能干而且健谈的政治家。毛与他们比起来显得有些土气，他自己也意识到了这一点。

在毛看来，汪和胡都有点过于自负和夸夸其谈，他们二人（加上当时在广州的军事将领蒋介石）都有可能成为孙中山的继承人。他们也谈论“国民革命”。但是，如果这些人成为新中国的政治家，真不知会新在何处。

如果说毛还疑虑的话，那么整个共产党的组织也抱有同感。

陈独秀教授看来对国民党靠的不是太紧，他是中国共产党的头号人物，也曾是对毛最有影响的马克思主义者。陈仍保持着坦率诚实的形象，这在苏联人或国民党里面崇尚虚荣的人中是少有的。但是毛弄不明白的是：陈反对传统观念的锋芒到底何在。

一个细节含义很深：陈独秀在上海穿着笔挺的西装，而毛则是粗布制成的中式长衫。

当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四月份在上海开会时，毛因为某些

原因没有出席。张国焘以不满的口吻说，毛正忙于“国民党的工作”。当时，毛似乎正在回湖南的路上，中途在安源煤矿作过停留。

与此同时，毛对自己的忧虑保持沉默，国民党的工作深深地吸引着他。毛对国民党的事业是如此卖力，以至李立三嘲讽他是“胡汉民的秘书”。

国民党在二月份采取的一个步骤对毛尤其合意，就是成立了农民部。中国共产党还从来没有这样做。这使毛更有理由热衷于统一战线。农民部的成立，要做的工作很多，毛走上了一条重要的新路。㉕

毛在1924年的一次旅行是到香港，他和张国焘因为劳动工会的事前往这个毗邻广东的英国管理的岛屿。他们在上海乘船经过碧波荡漾的南中国海。在甲板上，一伙流氓把毛和张逼到一个角落，手中挥着刀子要钱。毛不愿屈服而想较量一番（这表现了他的勇气和好斗性格）。张劝说毛不值得为几个小钱拼上一命，由于力量的悬殊，加上别人的劝解，张才劝住了他那火暴脾气的湖南同事。

毛在政治上没有张国焘左，但当个人受到挑战时他比张更容易发火。

毛在 1923—1924 年写下的文章反映了他的生活道路。他在共产党的喉舌刊物《向导》上发表过几篇谈时政的短文，文章辛辣犀利，但是论理性不强。

有两点在1923年的文章中很突出。毛把商人看作是国民革命的关键所在。人们会问，他在湖南工团联合会工作的弟弟对此不知有何感想？

他一直坚持反对帝国主义。㉖在论“纸烟税”的一篇文章中，他嘲笑北京政府在帝国主义面前发抖，摇尾乞怜于外国势力。“如果我们的外国主子放个屁，那也是非常香的。”他在文章中讥讽

道。

但是这些文章没有挖掘出历史根源或上升到哲学的高度。他也没有涉及解放的主题，机关工作使他越来越注意细节问题，而不是如何成为一名解放者。

然而还是有一条主线贯穿其中。毛一直认为，人民是最为重要的力量，只有从人民的利益出发，商人才有资格成为革命的力量（此乃毛之希望所系）。

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终归是毛最关心的问题。毛认为，如果没有别的变故的话，与国民党的统一战线可能是走向“民众的大联合”的第一步，从而可能使中国复生。

农民问题就象天边的一片云，它在五四的主题中没有一席之地。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八十五的农民仍是沉默的大多数，对此中国共产党还没有引起注意，直到1924年似乎还没有一位农民是中共党员。当时之世没有人认为农民有革命的能力。

毛已经在城市度过了十四年，他一直在学生和工人中间活动。在他的新生活中，他差不多已经抖掉了身上的乡土气息。中共内部也没有什么东西能激励毛去考虑农民问题。

在广州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带来了第一个信号，使毛开始从政治上考虑农民问题。他督促他的仍持怀疑态度的同事们把农民作为革命的必要组成部分。他甚至引用中国历史来说明农民起义的光荣传统，而不是谈论苏联的革命。

但漩涡过后，随之又是一片宁静。当时唯一的农民组织是彭湃创建的，彭是地主的儿子，他改变了自己的立场，为贫苦的农民而斗争。在广东的东部，他发起成立了农会。农运工作进展顺利并引起了国民党的注意。

彭湃被任命为国民党新设的农民部部长。在他的指导下，1924年7月广州成立了农民运动讲习所。这在中国历史上——或许在整个人类历史上——是第一个以政治反叛为目的训练农民

的学校。

彭是先驱者，毛是彭所寻求的能为之助力的第一批共事者之一。1924年8月，受彭的邀请，毛在农民运动讲习所讲了第一课。他的激情打动了学员，讲习所也更影响了他。他的光临带来一个新的开端，从此较大地影响了中国的未来。

回到上海后，事出来了麻烦。毛在广州与彭的合作使他意识到，自己在上海机关里的做法有点儿不对头。

工作方式是一个问题。毛并不象其他人那样满足于从文件上了解世界，他不愿墨守成规。有些人常抱怨他的不守纪律，旅途中常常一个人溜走。但是，这只是一种征兆。

更严重的问题在于李立三等人嘲笑毛过分热衷于国民党的工作，简直成了胡汉民的秘书。当孙中山处于肝癌晚期时，风暴乍起。明眼人很容易看出，派系复杂，暗怀戒心的国民党人正在策划反共。

然而，毛的眼睛只盯着统一战线，"一切工作都打着国民党的招牌。"[27]在1924年夏他仍然这样坚持。共产党中几乎没有人同意他的意见。

毛感受到了压力。他失眠了——这对他是不常有的——健康状况有所下降。这使他在中国共产党中的地位更加孤立，到1924年底，他不再属于共产党总部中的一员。同时，他也不可能再被认为是值得信赖的连接国共两党的桥梁。*

1925年1月，他拖着身子到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的第四次代表大会，整个会议期间他愁眉苦脸，所起的作用也很小，以至后来有人在回忆文章中误认为他没有参加这次会议。

他讲的很少的一点是关于农民问题。但是会议的气氛是倾向

---

* 1924年2月回到上海后，毛在这一年中没有发表过任何文章。1925年，他的文章主要发表在国民党的新刊物《政治周报》上，当时他被指定为这个刊物的编辑。

注重城市工作，同时还有对国民党的疑虑。会议结束时发表的公报中，“农民”一词在每次提到时都与“工人”一词用连字号连接起来，好象农民不可能单独存在似的。

会议结果对毛来说象是礼节性地走走过场而已，毛被赶出了中央委员会。

毛精疲力尽，陷入了困境。在自传中他掩饰了这种紧张。甚至不提第四次代表大会，他冷漠地回忆说：“那年冬天，我回到湖南去休养——我在上海生了病。”㉘

毛善于随机应变，这种技巧使他受益终生。如果说他能够受一时的感情驱使而冲动起来的话，他同样也知道如何退却。该撤退的时候，他会退回到应该去的地方。

与一些同事不同的是，毛保留着自己的生活领地。韶山的农田是属于他的，他没有放弃也没有出售。往事并非不堪回首。

父亲留下的田产收入能派上很多用场。如果他想脱党转向别的人生道路，不愁缺资金。如果他想要农民吃饭借机与之攀谈，他也有钱。㉙

在长沙时，毛经常回到韶山小住。1925年早春，他要在老家呆上较长的时间，在近半年的时间里，他脱离了通商口岸，脱离了文件和委员会，脱离了办公室里的斗争。

毛在乡村召开政治会议，把一部分田产收入用作共产主义事业。在韶山老乡的眼里，毛倒挺象继承着父业。他还是个地主，即使他是红色地主。但毕竟是地主。他让旧的服务于新的。

毛把血缘关系携入政治纽带之中，他所有的家庭成员都投身于革命。这在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高级成员中是很不常见的。

27岁的泽民，在完成了安源的工作后，即将出任在上海的中共出版社发行部经理。19岁的泽覃刚刚加入中国共产党，他一直在长沙忙于长兄曾从事过的学生运动。继妹泽建在湖南的岳北从事组织工作。开慧自1922年起就是中共党员，她在长沙和岳北从

事教育和组织工作。她曾一度到上海工作过，但与毛不在一起。

现在，毛杨的婚姻关系不再象1921年和1922年那样亲密了。“知误会前番书语。”1923年末，毛在给杨开慧的一首诗中写了这么一句。[30]从那以后，他们再没有在一起呆过很长的时间。

除家庭成员以外，毛还动员了他的很多亲属。在人们回忆毛回韶山的文章可以看出“毛”姓族人随处可见。毛发动了毛福轩、毛新枚、毛远尧、毛月秋和其他许多人。血缘关系给毛带来了方便。

1925年春节，毛合家团聚。开慧和两个儿子都在，泽民也回了家，可能还有泽建。血缘关系和事业上的志同道合一定给了他们力量。

然而，他们并不是超人，他们也有矛盾。在毛的领导下，他们之间也有分歧。但是，他们并没有简单地鄙视投身共产主义事业以前的生活，他们似乎觉得，韶山这个团聚之地能为不久就要到来的繁重的革命工作作准备。

一连几周，毛沿着农田和山谷漫步。他与邻居们交谈，还下田和雇工们一起春耕。

到二月份，毛开始行动了。他离开韶山走了几个县和更远的一些地方，他住在农民家里，考察农村状况，听取农民的意见。

他的笔记本记得满满的，这是调查得来的第一手资料，这使他感到着迷。他走在青山绿水之间，上海的烦恼似乎一扫而光。

他这时的心情与少年时期完全不同。湖南的农民饱受苦难，已经动员起来，已在向解放之路迈进，民怨鼎沸已经变成反抗。

衣衫褴褛的贫农闯宗祠盛宴，豪绅们不得不向农会低头。

毛很快就从考察转向行动。他不是湖南的农民组织的发起者，对农民来说他不是象彭湃那样的英雄。彭湃出现的时候，广东的农妇总是高高地举起她们的儿子，让他们看一眼这位“农民的君主”。[31]

但是毛在走访时，总是给农民协会打上自己的印记，他甚至还在农民中建立党小组——上海对此肯定持反对态度。他在山林田间、陋棚草舍向农民谈共产主义，他努力与中国不再沉默的大多数接上联系。到1926年底,主要因为毛的活动，湖南七十五个县中半数以上有了农会，会员人数达二百万。

在湘潭县，毛建立了二十多所夜校。办学的目的在于进行平民教育(中国人称为提高文化水平)，同时传播政治思想。他喜欢用“手”和“脚”两字为例开始讲授语文课。大自然赐给每个人的都是一双手和一双脚，一切财富都要用双手去创造，但是为什么地主老财手懒脚懒……

就个人经历来说，毛转了一个大圆圈，从土地上出走现在又回到了土地上。1910年，他作为叛逆者离开了韶山，但是当时的反抗目的不明，在他幼稚的心灵中只是认为生活中存在着不平等而已。

到了1925年，毛认识到，反叛不仅是受伤的灵魂拒绝服从，而且是全体人民寻找新的未来。他应该嘲笑自己以前对待父亲的尖刻态度，真正的问题已远远超出感情范围，它不仅是心理上的，而且是政治上的。现在看来他的父亲似乎不再象魔鬼那样可怕，而是历史的遗物、旧时代的象征。

毛最终还是从他受的教育中苏醒了过来，回到韶山，使他对十几年所受的城市教育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他矫正了自己对“洋学”的态度。

以前回家度假，他总是站在学校一边，站在东山小学和第一师范一边，不满老乡们的批评。但是到1925年，毛改变了看法。“我认识到，我错了，农民对了。”[32]他现在喜欢旧式的中国学校胜过洋学堂，他不再反对他的父亲，他开始从更广阔的视野上看问题。他悄悄地向排外主义思想转变。

1925年8月，在毛的父母曾经住过的那间卧室的阁楼上，中

国共产党韶山支部成立了。第一批共有三十二名农民党员。上海总部对这种鼓动革命的方法持什么态度，则无从得知。

1925年中，上海棉织厂的一名中国工人被一个无法无天的日本工头打死，工人中爆发了抗议示威。英国人召来了租界警察，开枪镇压游行示威的工人，导致十人死亡，五十人受伤。

这一事件象划着的火柴扔进了火药桶，很多城市爆发了示威、罢工和冲突。香港的罢工持续达十六个月，在世界历史上可能也是时间最长的一次。一直被人瞧不起的北京人力车夫也在自己的车上挂出招牌："不拉英国人和日本人"。

这给农民带来的影响也前所未有，乡村第一次发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呐喊。共产党的影响象热带的蔓草一样迅速扩大。1925年1月，中国共产党的党员人数是九百九十五人，到11月份就达到一万人。

很快地，革命似乎不再只是出现在激进派的文章中了。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国民党走到了交叉路口。孙中山于春天在北京病逝，他的遗体上覆盖着国民党的红、蓝、白三色党旗，一大批悲哀的人参加送葬。有没有后继者能象他一样走上这条绷紧的绳索？关于国民党性质的争论夏天就开始了。

秋天，毛又回到了他所得心应手的场地。他新发现的问题——农民运动的高涨——在争论中占重要的地位。

湖南省省长正在搜捕这个在乡村活动、年届31岁的高个子激进派。在乡下，毛是相当安全的——军阀对山区鞭长莫及。但是毛走了冒险的一步：到长沙。统治者盯他的梢，派出军队搜捕他，他逃到了广州。

外部政治力量刹那间压住了社会变革的内在动力。

当毛1924年在上海为组织上写了几个月的文件，1925年在湖南精神抖擞地干了几个月之后，便填写了一首词以示志念。

《长沙》这首词既怀旧，又冷静地希望未来。毛回忆起了求学的时代：

忆往昔峥嵘岁月稠。
恰同学少年，
风华正茂；
书生意气，
挥斥方遒。
指点江山……

毛感到逝去之物不可追：

万类霜天竞自由。
怅寥廓，
问苍茫大地，
谁主沉浮？

整首词充分显露了毛的个性，结尾充满自信：

曾记否，
到中流击水，
浪遏飞舟？[33]

跨过而立之年，青春的活力会稍减，但还会保持那种改变环境的力量吗？

在十月份雨季开始的时候，毛到了广州。他离开珠江边上这座喧闹的城市已有将近一年的时间，毛发生了变化，统一战线也发生了变化。

了解一下毛怎样对他的同事们解释这几个月的行踪，将会很有意思，同事们一定非常关心他黯然失色的这一段时间。我们所能说的是，毛没有浪费他的时间，他在不事声张地努力。不久他恢复了在党内的工作。

这主要是对国民党而言，因为他现在在国民党中的位置高于他在共产党中的位置。他是国民党领导机构的——而不是共产党的领导机构——成员之一。

毛成了国民党的主要刊物《政治周报》的主编。1925年后期，他似乎非常热心于这份工作，他自己写作了大约十五篇文章。所有这些文章都是对时政继续作些激进的评论，这些内容大都已在1923年的《向导》和其他地方阐述过。湖南乡村的生活还没有结出什么果实。

毛在国民党中还有另一重要的职务，他是宣传部第二号人物。因为宣传部的部长忙于广州政府总理的工作，毛实际操纵着国民党的宣传机构。

但是，只有毛的第三个工作才闪现着未来的光辉。1925年10月开办第五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在这一届学员中湖南占了40%，毛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他的弟弟泽民就参加了这一届的学习。

毛在讲习所象一颗新星一样升起。经过一段时间的失色之后，他作为教师东山再起。

毛在兴旺的国民党内的工作是惹人注目的，因为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正从紧张趋于恶化。

或许统一战线不可能存在下去了。不管怎样，1926年春天，统一战线已经破裂。一个右翼团体“西山会议派”（由于其成员曾在北京西山开会而得名）开始出现于国民党内，他们不希望与共产党有任何交易。

就在毛从湖南逃到广州之前，国民党内一位颇有影响的左翼

领导人于广州被害。“西山会议派”在这次事件中可能做了手脚。

在1926年1月召开的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反对统一战线的势头稍有收敛。当时国民党在南方影响很大，大会在广州商业区举行，热闹非凡。和国民党的所有会议一样，大会的第一项议程是全体起立，朝孙中山的画像三鞠躬，聆听对他的遗嘱的宣读。

毛坐在前排，他发言与别人辩论。他以173票再次当选为执行委员会的候补委员。（汪精卫的得票数最多，248票；共产党的高级领导人李大钊是192票）毛还被选进国民党的农民部。

在代表宣传部向大会提交的报告中，毛表达了他的新思想：“我们过多地注意了城市而忽略了农民。”[34]

他是正确的，然而这又象是旷野中的一声呐喊。国民党更象是一支军队而不是一个政党，这支军队的核心是家有地产的军官。象毛曾经接触并领导的湖南农民运动那样的革命，国民党怎么会赞同呢？那岂不是自己革自己的命？

西山会议派在会上占绝对劣势，他们对原则的违背引起了争论。他们反对统一战线，将得到怎样的惩罚呢？毛站在宽容的一边。*

毛的目的到底何在？在国民党的“二大”上，他似乎偏右，以后的许多事情更说明其立场。

手中有枪杆子的蒋介石在继承孙中山的事业的竞争中取得了成功。他希望，一旦把孙的几位信徒拉到自己身边，就开始反对共产党。

1926年3月，蒋介石破坏统一战线。他以“中山舰事件”为借口对共产党突然一击，逮捕共产党员（其中有周恩来），[35]对共

---

* 作者此说有误。毛不仅在《政治周报》撰文激烈抨击“北京右派”，而且还提议将其开除出国民党。——校注

产党力量较强的劳动工会实行控制。在国民党内部，他用阴谋制服汪精卫的左翼势力，汪被迫赴欧洲“考察”。蒋介石控制了广州政府，并使之向右倾斜。

然而，毛决没有断绝与国民党的来往。尽管实际上，国民党已解除了他对宣传部的控制，但是他不久就有了新职位。当广州的监狱中塞满了他的同志的时候，毛成了国民党第六届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负责人，这一届从五月起始，十月结束。在那不愉快的几个月中，毛是唯一一个在国民党中任职的共产党人。

农讲所设在广州市中心的一座古雅的孔庙里。毛喜欢利用祖宗遗产从事反抗传统的活动。他住在农讲所的一间小屋里，晚上睡硬板床，没有蚊帐（在广州，只有赤贫或以苦为乐的人才这样做）。

竹书架上摆着他在湖南逗留期间所做的笔记，这些笔记使他能够开出长达二十三课时的讲座:“中国农民问题。”

他还亲自负责另外三门课程：九个课时的“农村教育方法”，及他素来喜爱的地理。他开设了讨论式的独立学习课程，在教室里提出了对权威的怀疑。他开创了新的卫生课教学。他还采用了新的教学方法，把课堂搬到海丰，让学员参观彭湃领导下的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

毛还亲自挑选自己的十五名教师队伍，他们中大多数都有实际工作经验，办事扎实。他选择举止文雅的周恩来（此时周已出狱）讲授军事课程。

周有许多毛不具备的品质——性情温和，行为敏捷，善于交往，根守中庸。周虽已 27 岁可仍象个少年——而毛在少年时就显得老成。周曾到过日本（1917—1918）、法国和德国（1920—1924），这从其举止中可以看出来。周出生于书香门第，参加民众革命是他出于道德的选择。他对军事作战所知并不多，毛也是如

此。

那年夏天在广州开始了毛周合作，这种伙伴关系经历了种种波折，得以保持下来。这有些不可思议：周出身地主家庭，刚从欧洲回国，而毛则是地道的农家子弟，家乡偏于一隅。

北伐即将开始。在蒋介石看来，这是用军事行动夺取北方军阀的权力以统一中国；而在毛看来，还不止如此。

毛预计，当国民党的北伐军经过早就骚动不已的农村时，会引起社会的大震荡。毛是正确的，毛的目的是要训练全国各地的农民干部，以指导这场社会变革。

半是因为农讲所的原因，毛的声望在共产党内部得到有限度的恢复。共产党对农村形势的越来越关心使它的领导人再一次起用毛。

在1926年7月召开的中央全会上，农民部终于成立了。毛被任命为负责人。很明显，这使毛又一次在中央委员会占有一席之地。是年底，《向导》发表了他的两篇论农民问题的文章。

然而共产党决没有掌握住全部农民运动，它的农民部居然不合时宜地设在上海这样的大都市里。与此同时，毛还在广州忙于为国民党负责农讲所的工作。他只是短期回上海两次，但是他的农民工作的重心还是在国民党内而不是在共产党内。

这解释了毛为什么能占据政治舞台的中心。

对共产党的多数领导人来说，二十年代中期，最麻烦的问题是，共产党怎样才能从统一战线中获益而同时又能保持自己的独立性。

同样，对莫斯科来说，统一战线是他们在中国的得意之作。的确，中国共产党是苏联的产儿，但是苏联人过高地估计了这个婴孩的能力。既然国民党显得更有势力，所以一谈到中国，克里姆林宫必定要谈到统一战线。

毛与此不同。

国共两党的关系对毛那种超出常规的独特性并不重要，行动方法问题也引不起他的注重。

毛所关注的是支持者的问题，革命应该为了谁？什么样的星星之火可以点燃中国大地上的革命烈焰，使之有足够的热度能够熔化旧的同时又能创造出新的？

毛的答案来自湖南。革命应该为穷苦人，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住在农村。革命是为了韶山周围90%以上的人民，毛认为他们属于贫农或中农。星星之火应该在农村燃起，地主的压迫比城市里买办的压迫更严重也更残酷。在毛的心里，他认为这才是根本的真理，一切政治方法问题都是次要的。

因此，他与国民党在一起的时间比其他共产党员要长，这并不奇怪。因为二十年代中期，国民党比共产党更加注重农民问题。

毛遭到了上海的反对。陈独秀教授带着书生气地推论："农民是小资产阶级，……如何能作共产主义的运动？"[36]刘少奇带着屈尊俯就的语气说，无产阶级必须"提携农民"，领导他们走向革命。[37]

对于毛提出的基本真理问题，莫斯科沾了一丁点边，就那么一丁点儿，决不会多。马林对农民的蔑视使人想起马克思嘲笑农民的愚蠢。但马林在1923年便永远地离开了中国。眼见农民趋于活跃，共产国际于1926年初在列宁的著作中找到了关于农民的革命潜力的理论根据。

然而毛的逻辑并不是共产国际式的。因此他欣赏国民党的北伐（在这一问题上与蒋的意见一致），而莫斯科并不赞同。

苏联人希望农民在精心设计的统一战线的严格控制下参加革命。他们担心，国民党军队的北伐会引起社会动荡，使拥有土地的国民党官员无法控制（他们是多么英明）。

进一步说，莫斯科还与北方的三大军阀相处很好，（其中包括

1923 年大肆屠杀铁路工人的那一位。）斯大林不希望失去他的军阀，也不希望失去他的国民党。斯大林关于中国政策的出发点是要服务于苏联的利益，所以他不希望这二者发生冲突，不愿在中国革命和苏联国家利益之间被迫作出痛苦的选择。

但是在何处点火呢？每一次新的革命都是创造性的活动，根据其他地方获得胜利的经验而制定的周密的革命计划来看，很少有奏效的时候。革命之火往往在绝境中闪现，一经引燃，便暴烈迅猛。毛希望和要求有一场社会变革以击破莫斯科和上海发号施令的公文。最终，他有了成功之道。

1926 年 2 月，毛在广州发表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38]半年以后，他在北上的途中又发表了《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毛在《分析》的一开始就提出了这个问题。他描绘了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中国各社会阶层的相互关系和地位：城市工人阶级人数较少；受帝国主义的欺凌使一部分中国的资产阶级同情革命；农民是革命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他们需要一个革命。"毛从自己掌握的事实材料出发，而不是从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出发作出了这一判断。

然而，在《分析》中，毛还是把人数较少的工业无产阶级看作是"革命的领导力量"。他试图置农民力量于无产阶级的领导之下。

九月份的文章是另一种内容。文章认为，农民在革命的各方面都是至关重要的，他们受压迫最深。买办只是在沿海和沿江地区占有优势，"不若地主阶级之领域在整个的中国各省、各县、各乡"。

毛进一步论证，买办总是尾随军阀，而军阀又是"地主阶级挑选出来的"。他从经济上进行论证："财政上军阀政府每年几万万元的消耗，百分之九十都是直接间接从地主阶级驯制下之农民身上

刮得来”。换句话说，中国的权力产生于土地。

毛大胆地断言：“都市工人阶级目前所争政治只是求得集会、结社之完全自由，尚不都即时破坏资产阶级之政治地位。”他终于说出了他在长沙就有了的对劳工运动力量的怀疑。

他继续评论道：“乡村的农民则一起来便碰着那土豪劣绅、大地主几千年来持以压榨农民的政权……。”因此，他们最能战斗。

毛自然而然地得出结论说：“然若无农民从农村中奋起打倒宗法封建的地主阶级之特权，则军阀和帝国主义势力总不会根本倒塌。”

这是一个惊人的结论。革命的成败取决于农民，只有农民才能使旧中国这个摇摇欲坠的大厦倾塌，即使是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也要完全依靠他们。随着这篇文章的出现，卡尔·马克思降至亚洲的稻田。*

毛已经表明了他的思想，这是他1925年在湖南时就已经形成了的。

乡村象磁铁一样吸引着毛。农讲所第六届于1926年10月结束，广州再没有其他事情可以留住他，但是他没有去上海主持共产党的农民部工作（他是部长）。他回到家乡湖南，他不愿在大都市的办公室里发号施令，而要在现场处理农民运动中的问题。

湖南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它变成了当时中国革命运动的轴心。北伐军于1926年夏末抵长沙，当时统治湖南的军阀也披上了拥护国民党的外衣。与此同时，农会在农村各地势力强大。

两种势力之间将有风暴来临，毛不久就会感受到这一点。他显得有些郁郁沉思，不能完全意识到将要到来的麻烦。他在进行

* 因为北京掩盖了《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一文的内容，所以我较为详尽地引用毛的原文，该文没有收入《毛泽东选集》，也从未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任何地方出版过。

准备活动——他到过浙江和江西（译按：应为江苏）的一些农村，并在《向导》上报道农民运动“风起云涌”。他在湖南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上作了重要讲话。在经过一段时间活动后，毛又回到了风平浪静的韶山。

他常常在冬天回去，那里虽不是家，但至少环境使他感到适应。就象两年前正月回家的那一次一样，他在周围几个村庄考察，在五个县度过了三十二天的时间。

这一次，毛不需再象游吟诗人一样寻找听众了，湖南已有五百万农民加入了农会。他的任务不再是发动农民，而是向外面的世界展示这一整幅农民运动的画卷。

这一次毛干得很漂亮。埃德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并不是中国革命的经典著作，经典著作应该是毛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毛发现，人们敲着铜锣拥着戴高帽子的地主游乡，罪大恶极的地主已经被关进县城的监狱，他们的罪行包括囤积居奇抬高粮价——而毛的父亲在1906年也这样干过。有些地主则抛弃家产狼狈逃窜。

农民成立了梭标队维持新秩序，孩子们很快接受新的道德观念，毛注意到，在玩耍打闹的孩子中，其中一个被惹得生气的孩子跺脚高呼：“打倒帝国主义！”他听到一位农民对一位乡绅吼叫：“劣绅，你晓得三民主义么？”

社会翻了个过儿。由于他久不曾置身于斗争的漩涡之中，社会的震荡甚至连这位叛逆者也感到吃惊，他怀着敬畏之情奋笔疾书：“地主的体面威风，扫地以尽。”他的激动心情使《报告》的风格与国民党或共产党的文件风格殊异。

毛欣喜若狂。农民为了禁绝赌博，“烧了一担麻雀牌”，毛感到很开心。他不在意有些乡下人确实喜欢打麻将。

毛怀着激奋——而不是责备——的心情报告说，被推翻的地

主开始称崛起的农民为乡里王。他并不隐瞒对劣绅的讥讽，“如今是委员的世界呀！你看，屙尿都碰了委员”。

看到轿子被砸，他感到高兴，“农民最恨那些坐轿子的。”他是否想到过他所尊敬的杨昌济教授在长沙时每天早晨都坐着轿子到学校上课呢？

革命显然改变了一切。一件事是呼唤新社会的诞生，另一件事就是要砸碎你所坐的轿子。

毛谈到叶公好龙的故事。叶公非常喜欢龙，并在室内各处都雕画出龙的图案，真龙听说叶公如此痴心，就下凡而来，叶公却吓得魂不附体，一命归西。

毛总结道：“嘴里天天讲‘唤起民众’，民众起来了又害怕得要死，这和叶公好龙有什么两样？”[39]（上述毛的话出处均见[39]）

而这和毛的岳父的平和的激进主义有什么两样？

教书匠在毛的职业顺序中退后了。他开始反对使他认识了更广阔的世界的洋式教育，现在，他认为杨教授之类人物不能成为政治盟友。

《报告》没有提到城市工人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角色（北京在五十年代编选《毛泽东选集》时用心深远地加上了这一点），但是，这些内容即使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也是相当激进的。

毛把农民划分为贫农（70%）、中农（20%）和富农（10%）。作为社会科学的划分，这样分类只是粗略的，但是作为变迁的杠杆这是英明的。让贫农意识到自己的贫困，这是革命的第一步。

毛宣称——部分来自调查，部分来自评估——最贫困的人也是最革命的，这是毛的一贯看法。高山为谷，深渊为陵。这是毛在1927年对革命的理解，他正在为之“振臂一呼”。

毛不得不再次回到都市的政治世界中。带着他翻旧了的报告手稿，毛来到城市参加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会议，会议于

1927年3月在武汉召开，气氛热烈。

在1927年的其余时间里，武汉成了毛生活的一部分。武汉是湖北（中文意思是湖的北方）的省会。这座工业城市，是中国中部的重镇，扼京广铁路要道，又是从重庆到流往上海出海口的扬子江（中文"大洋之子"的谐音）上的水路枢纽。

在1926年12月，国民党北伐军占抵武汉，城内一时间随时可见到穿新式绿军装和戴大沿帽的将士。国民党左派政府和少数共产党人一起，企图控制迅速发展而又难以驾驭的中国革命局势。蒋介石远在东边的南昌，自成一统。到1927年春季，武汉成了中国革命运动中的重地，但其内部却正在分崩离析。

共产党和国民党——若即若离的一对——都把他们的总部迁到了武汉。

国民党组织为毛找到了一所漂亮的别墅。[40]这所别墅原属一位商人。灰色的砖墙隔开了大街上喧嚣的吵闹，装饰着黑色竖板的房间围成一个院子。

开慧从长沙搬来与毛住在一起，她的母亲也带着毛的两个孩子前来，住了几个月的时间。另外一间卧室则给来自广东的农民运动组织者彭湃居住。毛甚至还有一间书房，他在书房里完成还没有结束的关于湖南农民问题的文章。

毛部分时间用来教课。在附近一家有红柱和拱廊的大宅第里，成立了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武汉分部，仍是国民党和共产党联合创建的。1927年上半年，毛在这里给来自湖北、湖南、江西和其他省份的学员讲课。

毛感觉到了武汉的政治气候在转阴。陈独秀教授并不喜欢《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向导》上只发表了其中的一部分，整篇报告——还有陈独秀的否定性评价——发表在湖南的一家刊物《战士》上。

毛在武汉遇到了他在安源时的老搭档李立三和刘少奇，他们

正在这个中国的第二大工业城市开展劳工运动。他们认为毛过于关注农民问题。

在共产党内，毛一直被认为是右翼分子而受到批评，现在他有些激进了，并且，实际上很激进。他与国民党为伍的日子即将过去。

紧张的生活并没有使毛文思枯竭。他漫步在对峙于大江两岸的龟山和蛇山。在蛇山，一座灰白色建筑使他着迷，这座古塔便是建于公元三世纪的黄鹤楼。毛身临其境，陷入了沉思。

在中国悠久的文化传统中，再次寻找到了精神寄托，毛挥毫写下了一首古体词：

> 烟雨莽苍苍，
> 龟蛇锁大江。

他的思绪飞向了大自然，也飞向过去：

> 黄鹤知何去？
> 剩有游人处。
> 把酒酹滔滔，
> 心潮逐浪高。㊶

他是否已把湖南的乡村置于脑后？实情并非如此。他的思绪正遨游在另一个世界，临江赋诗不过是一时的遣兴。

毛面临的问题——中国南部农民运动的高涨和他希望就此干一番的事业——也是当时社会的问题。这个问题在一系列会议上都引起争论，毛每次都是一个惹人注目的与会者，因为他那已经流传开来的《报告》，涉及到当时最棘手的问题。

然而，武汉政权的大多数领导者对湖南的革命热潮还没有清

醒的认识。

当毛最终讲出这个问题的时候，国民党的领导者被惊动了。毛要求农民没收地主的土地（方法很简单，农民抗租不交），在国民党的执行委员会和新成立的土地委员会上他都力争这个问题。

毛在土地委员会讲这番话时，可以明显看到反对意见来自何方。"湖南的军官都是农民的剥削者，"[42]毛一语中的，但是这些军官大都与国民党亲密无间。

在广东，国民党采取激进措施代价可能会很小，但是在北伐的过程中这样做几乎等于自取灭亡，因为在广东，为国民党效力的一大批北方官员都拥有土地。

毛很明白他正处在与国民党决裂的边缘。

他嘲笑一位指责农民已经被"简直是赤化了"的军事指挥官，他说："这一点子赤化若没有时，还成个什么国民革命！"国民革命的阵营正在分化。

湖南并不是中国的典型。毛从韶山回来，抱着农民的力量不可抗拒的深刻信念。但是，在1927年，就提出中国应该走湖南的道路，是一个可怕的设想。

毛以前在上海时的上司、国民党领导人汪精卫写信给毛，指责毛是一位煽动叛乱者。甚至来自长沙的一位密友——一位共产党人——也告诉土地委员会，说毛的征收土地方案必然会引起"穷人和富人之间的激烈斗争"。[43]

在国民党和共产党内部，当时较受欢迎的一项方案是：为了保存统一战线和北伐的顺利进行，限制农民的"过分"行动。

毛仍然住则入墅，出则赴会。但这种政治活动似乎已无足轻重。除武汉以外，中国正在出现两极分化。长江岸边的统一战线象一枝脆弱的竹子，来自下游的一阵狂风就要把它折断。

蒋介石给了统一战线致命的一击。他早已放弃了与共产党的联系，借助于刺刀——他唯一喜欢的政治方法——他又一次而且

永远地撕破了与共产党的合作。

到达上海以后，蒋介石开始大肆逮捕和屠杀左派分子（周恩来差一点没有逃掉）。这是蒋的狰狞面目的暴露，也表明了他内心中的北伐的目的。而为了迎接蒋的北伐军的到来，上海的左派一直与北方的军阀作战。

在中国东部和南部的其他地方，军阀也开始压制一些激进的左派组织。在北京，发现了袭击苏联大使馆的事件和对左派人物的迫害，其中受害者之一就是毛过去的上级李大钊。

就在毛听说李大钊被军阀张作霖极其残忍地慢慢绞死后不久，他在长沙的文化书社也被军阀查禁。革命火光正在熄灭。

共产党在风雨飘摇中的武汉召开了第五次代表大会，国民党的代表团第一次出席了共产党的会议。毛毫无热情地应酬着会议。

事情比他想象的还要坏。拥有六万名党员的共产党正处于人民拥护的顶峰，但是它的上层却失去前进的方向。

主要问题是莫斯科仍然抱住统一战线不放，陈独秀教授对此并不满意，但是他又不得不顺其自然。

毛关于土地问题的观点遭到了强烈的反对。他的同事们对他很不满意，以至取消了他的投票表决权。他讲得很少，他肯定已经意识到他将失去农民部部长的职位，但是当预感成为现实（一位俄国文学专家瞿秋白取代了他），他仍感到沮丧。此后他未再参加会议。

当这次最终把全党引向灾难的会议继续进行时，毛在他的别墅里消闲，到东湖、龟山和蛇山漫步。*

---

* 罗易回忆说，毛在武汉“一刻也停不下”。总是半途到会，发表一通锋芒毕露的演说后扬长而去。据毛说，这是因为在湖南的“农民大众正在受苦受难”，他不能在武汉过舒服日子。㊹

在共产国际的指示下，共产党继续在蒋介石的烘炉中度日。农民问题已把国民党中左翼分子卷了进去。由于急于从中脱身，他们把国民党拱手交给了蒋。现在只有两条路可供选择：要么进行农民革命，要么听命于蒋及各式军阀。

共产党没有选择其中任何一条路。

国民党中的左翼最终还是选择了蒋。7月份，他们开始把矛头转向武汉的共产党，和中国的其他地方一样，这里也是白色恐怖。至仲夏时节，中国革命似乎正走向末路。

湖南发生的事件是时局向右转的发端。五月份，一些军官在军阀的指挥下把枪口转向左派，毛乔装搭乘运货火车南下试图重整势力进行反抗。

在长沙，士兵们高呼着"蒋介石万岁"的口号，开进工会和学生的办公室，对手无寸铁的工会会员和学生开枪，逼迫他们喊"蒋介石万岁"，湖南有三万人在那个夏天被杀害，毛很幸运没有成为其中的一员。

毛在略感绝望中尝试过各种努力，他组织起工人和农民反抗镇压，但是他也认为应该亲自去见省长劝说他们阻止这种行动。

陈独秀教授——还有莫斯科——这时仍希望修补统一战线。陈命令毛离开湖南到四川去。毛既没有服从陈也没有改变自己的决心，他还象消防队员一样站在烈火中。他与自己过去的上帝的决裂是彻底的。但是，陈做不到的事，湖南军阀能做到，军阀命令逮捕毛——他被迫逃回武汉。

曾是左派根据地的扬子江畔传来的消息使毛感到恐怖。罢工者就地杀头，上海市中心就摆放着竹笼子，悬挂着被处死者的人头，女共产党员被破口大骂的士兵枪杀，子弹射穿阴部。面对惨状，毛潸然泪下。

在农村，去发动农民的学生被用煤油活活地烧死。左派分子被绑在树上，身遭千刀万剐直至死去，凶手还往伤口里撒盐和沙

土，剐刑在封建军阀手里又复活了。凶手还抽去受害者脚上的筋肉。

毛在这种情况下从湖南回到武汉，鲍罗廷正在他那装有电梯、贴着玫瑰色壁纸的四层楼别墅里忙着打点行装。他正在合上关于中国革命的这本讲义，莫斯科已经让他在这里呆了四年。"一切都完了"，这是他离开中国回苏联时对中国革命的祝福。㊺

对毛来说——并不是对大多数共产党领导人来说——苏联革命者的威望在鲍罗廷的火车开动之际也在下降。与此同时，蒋介石在南京向武汉发来电报，对国民党分子的爱国行动表示祝贺，称他们除去了共产主义这块肿瘤。

如果说夏天带来的是悲剧的话，秋天则显得奇异。共产党从一个极端走到了另一个极端。

它一反软弱的合作态度，——这显然太晚；代之以以牙还牙的武装斗争——这又为时过早了。

在表面温和的政治中包藏着的是军事上的极端主义思想，——斯大林与国民党的调情毕竟才过去几个月。

毛把握住了这一转变。在面临毁灭的情况下，他并没有比其他人表现出更强的控制能力。

7月15日，共产党与武汉政权彻底分裂，陈教授已经绝望地独自去了上海。共产党召开了紧急会议，在陈缺席的情况下，会议讨论的是他可能反对的内容。与会者把赌注轻率地压在农村和城市的同时起义上。

毛被派往湖南，去领导后被称为的秋收起义*。他感到茫然，不过仍竭尽全力、四方奔走。是策略有些不对头呢，还是事情不尽如人意？抑或二者兼而有之？

可悲的是，新的路线也是受到莫斯科引发的。六月份，斯大

---

* 秋季被认为是最适于起义的时间。因为这个时候，农民要交纳地租和各种苛捐杂税，再说秋收以后也比较空闲。

林突然要求中国共产党也要有自己的军事力量。更荒谬的是，与此同时，这位暴君远在四千英里之外，还坚持共产党要支持武汉政权。现在真的应了中国的一句成语：对牛弹琴。

因此，八月和九月，中国共产党在一步步地走向绝境。他们打着国民党的旗子开始武装反抗。首先是周恩来领导的南昌起义，起义没有成功，可是头昏脑胀的中共领袖们仍然继续进行没有正确政治路线的军事盲动。

危难之际，共产党的领导人物在八月上旬召开紧急会议。毛参加了这次在华氏100度的酷热的武汉一间阁楼里匆忙举行的会议。心怀愤懑的11位委员罢免了陈独秀的职务。代替陈的是瞿秋白，这位自由派学者曾成功地取代了毛在农民部的职务。

陈教授被扫进历史的垃圾箱。1936年，毛提起与国民党合作曾遭受重大损失时，严厉指责了陈，可他却没有责备斯大林，斯大林才是更大的罪人。

毛对两位共产国际代表的评价也是很尖刻的。“鲍罗廷站在陈独秀右边一点点。”事实确也如此，鲍罗廷信任国民党的时间更长。对1925年起就扮演着一定角色的印度人罗易，毛的态度也不温和：“他站在陈独秀和鲍罗廷两人的左边一点点，可是他只是站着而已。”㊻ 这是很公平的评价。罗易的发火也并不能解决问题，因为莫斯科相距太远，而且又顽固地坚持从自己的利益出发指导中国革命。*

毛转向了左边，和陈独秀以后中国共产党内的其他所有人一

---

* 如果罗易的回忆值得相信的话，他和鲍罗廷都发现毛是一位不可思议的人物：“我在汉口第一次见到毛。当时午夜刚过，我们正在政治局热烈地讨论问题。鲍罗廷也在，坐在我身边。一个高个子走了进来，步伐沉着而显得高傲。他脸庞黝黑而宽阔，高高的额头上长长的直发向后梳卷。‘毛泽东。’鲍罗廷悄声对我说。他没有注意我，也没有注意很有权力的鲍罗廷。我们两个外国人对视了一眼，鲍罗廷又悄声地对我说：‘这个人很难对付，是个典型的中国人。’”㊼

样，他转向了枪杆子。与大多数人不同的是，他最后完全抛弃了国民党，"国民党的旗子真不能打了。"[48] 他在为秋收起义作准备时，从长沙写给共产党总部的信中有这么一句话。[49]

在土地问题上他仍持激进的观点。

起义暴动起而复灭，象众多的爆竹一样。毛并不比其他的人做得更好，不仅是因为毛新的左派观点还没有形成一个整体（他沉迷于国民党太久，再说农民军也不可能一夜之间创造出奇迹），同时还因为瞿秋白的左派观点也摇摆不定。

瞿希望从城市开始，毛则仍然坚信中国革命的重心在农村；瞿认为群众暴动的浪潮会给左派增强实力，毛则在谋划通过有组织的行动用枪杆子夺取权力。当时他与瞿也是若即若离。

骰子掷出去了，毛发动了他的秋收起义。一天夜里，他在长沙郊区召开会议进行布署，他设计出自己的新旗——这使党中央大为恼火——旗子上是斧子、镰刀和五星。他通过遍布湖南的所有的老关系，举行起义企图以攻下长沙作为结束。

毛占领了江西边境上的东门市，取得了几次小规模的胜利，但最终连连被打败。

事情很快变得一团糟，毛的部队是乌合之众，有的人后来甚至相互火并。经过夏天的镇压，革命的群众基础被削弱了。（五月以来，湖南共产党两万多名党员，有四分之三遇难。）再看到他以前建立的工会、学校及遇到除死亡和逃走的以外的很少几个人，毛象是做了一场恶梦。

1925—1926 年间，群众运动处于高潮时，共产党非常谨慎。到 1927 年中期，当群众激情渐减时，共产党又迸出激进的火花。对现在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来说，第一步就是一个悲剧。

共产党总部的混乱也还没有止息。毛在他的整个起义过程中一直在与党中央辩论。中央认为毛太热衷于军队，不相信群众。当事情变得糟糕时，他的部队又被指责为"自找麻烦"。

毛在答复中指责中央“忽视军事而又希望群众性的武装起义的矛盾政策,”这导致配合的不密切，使起义缺乏湖南以外的支援。

最后，不是长沙被攻下，而是毛被捕。

在去衡阳*招募矿工参加他的部队时，毛被地主的武装民团抓获。民团奉命把毛押到总部去处死。快接近院子时，毛沉着机智地想好脱身之策。他先是把从别人那里借来的钱用来企图贿赂押送的士兵以便脱身，但这一计策明显的无用。

在离院子近200码的时候，毛决定赶快逃走。他这时还很精瘦，行动敏捷。他躲过了飞来的子弹，跑到池塘边的一片深草丛中藏了起来。

士兵赶了上来，他们迫使老乡搜索草丛。毛静静地蜷伏在地，暗抱一线希望。很有几次士兵逼近了他，他甚至能触到他们。他感到了绝望，因为他认为他们已经看到了他。

降临的夜幕掩护了他，追兵停止了搜索离去吃晚饭了。

整整一夜，毛在山丘灌木中跌跌撞撞地穿行。他赤着脚，因为押送的士兵拿走了他的鞋，这半是因为士兵贪便宜，同时也出于迷信的说法，即死人没有鞋就不会变鬼报复杀他的人。

精疲力竭、遍体鳞伤的毛迷了路，后来，他遇到一个答应帮助他的农民。毛开始吉星高照了，他的身上还有贿赂别人剩下的七块钱，他用这些钱吃饭，同时买了在中国革命的最低潮时最急需的两件东西：鞋和雨伞。

毛又追上了起义部队残部。秋收起义是失败了。此时，毛与中央的关系更加恶化。他认为应该有自己的行动，他拒绝攻打长沙。因为这无异于以卵击石。

---

* 应是浏阳。另，毛的被捕是在起义发动之前而不是之后，并且是用贿赂团丁的方法脱身的。——校注

毛又失去了领导地位，他被赶出了中央委员会，即使是湖南的共产党分部也把他驱逐出了领导机构。

毛无从知道党的官僚们对他的不满，他远远离开了。但是，毛并没有得到这些叫人皱眉的消息，他已经背向城市和一切已经建立的组织。当十月的寒风吹走了盛夏的酷暑的时候，毛率领他的一千名心情沮丧的幸存者到达湖南东部边境一个荒无人烟的地方。

他打算使用枪杆子走自己的路。

• • •

奋　斗（1927—1935）

毛走向了山岭，这是唯一的去处。路上他不时地停下来，鼓励千余名情绪低落的追随者。

到达文家市时，毛已有了一个新的计策。他要象《水浒》里的农民反抗者那样，把队伍带进山里去。他已找到了挽救革命的方法，但是他手下的人胆敢跟着他干吗？

一些人确是跟定他。另一些人中途退了下来，因为他们看到前景实在是不妙。想家是一种通病，很多人都渴望回家种田。有人以为为国民党而战可能会更有好处。

在三湾村，毛的部队都集结在一座破庙里，以躲避连绵的秋雨和那沾满草鞋的红泥。毛连续地讲了好几个小时。他阐述了自己关于军队的一些想法，而在有些人看来，这支农民武装不象一支军事队伍，反倒更象一个政治团体。他强调在部队中实行民主，而有些军官认为，这样做会丢掉一些理应存在的差别。

当时的情况不允许提出异议。而在困境中仍有胆识则是毛的风格。

中国共产党遭到了大规模的破坏，几个月前还有五万名党员，现在只剩下七千名。左翼的国民党人士不是销声匿迹就是被迫流亡国外。湖南和广东的大部分农民运动领导人要么牺牲，要么被捕。

毛的这支在一个月前发动秋收起义的工农武装也几乎损失90%。他现在又在劝说剩下的10%拥护他的新奇计划，而得到的很可能只是汗水和眼泪。他们肯定都已猜测到了毛在党内的不利处境。那么还值得为这位独辟蹊径的领导人去效力吗？

毛自己肯定也是心存疑虑。尽管他被党的机关除名的消息在三个月后才传到，但他知道这一天迟早会到来。光是来自上海的非难——党中央硬是要搬回上海，就象一群蚂蚁被蜂蜜所诱惑而无视险要的环境——就足以使毛烦恼不已，更令他无法忍受的是，就连他自己创建的湖南党组织也在诋毁他。

回想整个夏天所遭受的苦难，他的心肯定会因懊悔而隐隐作痛。他已和开慧及其他亲近的人分离，显得既消瘦又疲惫不堪，眼神也变得暗淡无光，头发象扫帚一样蓬乱，破烂的衣衫里藏满了虱子。

如果说当时没有道出他对前途的忧虑的话，那完全是因为他坚强的意志在这几个星期里起了作用。在通往成功的道路上，这个阴暗的冬季，是一个转折点。

在这人烟稀少的山里很难遇到地主，因此食物短缺，战士的薪水也少得可怜。毛的下属军官只有极少数是党员，而且有些人想要离开队伍。有几个军官对毛在军队中实行民主十分恼火，在离开三湾继续撤退时，他们明显地想要暗杀毛。①

然而，毛毫不动摇。他带着湖南人特有的固执去实行自己的方针。一种内在的力量驱动着他勇敢向前。一个全新的战略在他

攻打城市失败后就已形成。现在，他要将其付诸实践。

才智的焕发来自自卫的本能。回去和党中央取得联系会无益于事，况且他们对毛抱有成见。最好是独立奋斗。

毛从未想过去欧洲避难，而在1927年有好多著名的左派分子都流亡国外。毛评论这一趋向的措词表明了他是何等依恋乡土："许多党的领导人都被党指派到苏联、上海或是安全的地方去了。"②

毛把最后的一线希望交给了大自然。似乎他的求生之术与他选择的崇山峻岭有着密切的联系。毛剩下的那几个扎根于泥土的共产党员，或许会象自然界万物轮回一样得到更新和壮大。

毛在云遮雾罩的井冈山扎了营。这是一个雄伟而荒凉的世界，毛用他那集农民和政治家于一身的敏锐目光选中了这块根据地。这个主意很简单，他的余部确实弱小不堪。但敌人肯定也有弱点，怎样才能寻出这些弱点并加以利用呢？

军阀们各自为政，不能组成统一的力量。当他们相互争夺地盘时，为适合在中国的外国列强的军事利益，这种争夺就更加激烈，便不可能同时控制中国边远地区的区域性农业经济。

敌人外强中干。他们虽然占据着城镇，而粮食却来自乡村。如果说中国仍然要靠农村吃饭的话，共产党就应该在稻田里扎下根。

但有一点不容忽视，那就是钢。起义者每时每刻都要有防卫的武器。

毛提出，中国共产党一定要在农村建立一支正规军队。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党确实应成为一支军队。只有在农村站稳脚跟，并完全控制这一个大区域时，才能去占领城市，以最后完成革命。

这不是欧洲或上海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它后来成了为中国

所接受的毛主义并延及非洲和拉丁美洲。

毛抓住枪杆子的同时也就开始了他真正的革命行动。

二十年代早期，他在广东和上海忙于组织工作，几乎没有注意到军事问题，也没有写过这方面的文章。他是一个革命者，但他从未用枪杀过人。

从1925年起，毛开始转向农村工作，但他并没有马上对军事感兴趣。他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也未分析军事力量。

自1927年中期国共两党分裂后，毛拿起了枪，他的所有的共产党的同事们也都握枪在手（在陈独秀教授回到上海的书房后）。但当时的目标是占据城市，忙乱地把一些人拼凑在一起，根本不能称其为正规的军队。

井冈山不仅仅是避难处所，毛在这里建立了一支崭新的武装力量。

城市道路在两种意义上讲都已行不通。毛开始和农民生活在一起，直到二十年后他才回到城市。当时的主要任务是暴力抗斗，毛成了一名指挥官。他坦率地说："边界的斗争，完全是军事上的斗争，党和群众不得不一齐军事化。"③

五四运动在井冈山收获了它的第一个真正的政治果实，这是何等的矛盾！1919年的那场运动是学生们在城里发起的，他们反对儒家的思想并高呼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而这些又和枪杆子及稻田有何联系呢？

这是英雄的争斗。如果说，自1923年至1926年，毛在臃肿繁杂的官僚机构中任职时辜负了杨教授对他所作的普罗米修斯式的评价的话，那么，1928年，毛在井冈山的斗争使他真正成了一位普罗米修斯式的人物。毛知道："自觉的能动性是人类的特点。人类在战争中强烈地表现出这样的特点。"④

从思想意识范围内说，五四时期的学生是钢铁般的英雄。游行示威时他们手里拿的不是枪而是刷子。他们只是言词激烈而已。毛真正的创造性在于他把三样东西结合在一起：枪，农民武装和马克思主义。无论在哪一方面，毛都不能称为先驱者，但他是把三者结合在一起的第一个人。

毛似乎不象一名军人。他不会神气十足地阔步行走，也不注重仪表或通常军事意义上的军纪。如果他带的不是枪而是一本书，看起来可能会更协调。

毛用枪杆子表达人道主义的世界观。直到逝世，他还坚信，在战争中，人的因素比武器更重要。这一道理很简单，战争是政治的一种手段，要得到人民的支持，而这二者都绝对不可少。

在井冈山，毛提出了他的著名的比喻*，那就是，他把军队比做"鱼"，而老百姓是"水"。在中国，侠士总被认为是有正义感的人。《水浒》中的绿林好汉没有完全用暴力之争取代道德之争，即不是西方战争理论中所公认的那种边打边谈，而是在战争的进行之中展开道德斗争，他们常和敌人展开论战！毛也是如此，在长达五十多年的政治生涯中，他从未放弃过与敌人进行激烈的论战。

五四时期，两条通往新中国的道路吸引了毛，而且它们分别被他所敬仰的两个教授信奉。一条道路叫做"过程"。陈独秀笃信马克思和列宁提出的历史发展规律：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

在寻求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陈独秀所抓住的确实是社会变革的科学。城市是这种变革的所在地，工人是这一变革的关键。资本主义的矛盾与日俱增，革命将是其必然的结果。

---

* 这一比喻源自中国的古典文学。

第二条道路则强调“意志”的力量。李大钊赋予马克思主义以道德和冲动力的新解释。不管二者比例多么匀称，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的是中国人，而中国人口的大多数是农民，只有农村完成了自我改造，新中国才能到来。

作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毛在早期是信奉“过程”理论的，工会、城市、十月革命。他象位记事员站在历史的大门口等待革命“高潮”的到来。他在这方面的组织工作上耗费了很多时间。这是陈教授的思想占统治地位的时期。

但是到了井冈山就是另一回事了。1927—1928年的冬天，在创立新政治体制的斗争中，这位雕塑师在很大程度上单独地和泥土打上了交道。行动代替了消极等待。

李大钊早在1919年就对知识分子写道：“我们应当到田间去工作，这样，文化的空气才能与山林里村落里的树影炊烟联成一气……。”⑤

井冈山分散的村落中，居民一共不过两千，该地的土壤十分瘠薄，到处都是裸露的石头。农民没有火柴，只有象原始人那样击石取火。

“老表，你叫什么名字？”⑥毛遇到胆怯或怀有戒心的农民时总是这样问。他这样礼貌、谨慎是明智的。比起城里的政治来，井冈山上的政治更难开展，也更为复杂。

这里也有秘密社团。当地人和北方移居过来的客家人之间有着激烈的矛盾。当地的乡绅与山下的军阀和国民党相互勾结。毛是地道的外来人。

象是一名手艺人，毛不得不小心翼翼地行事。他不能大张旗鼓地搞土地改革，因为土地太少了。他被夹在地主和土匪之间，而地主和土匪几乎又是相伴而生的。受地主的压榨，农民别无选择，不得不上山当土匪。这里的阶级结构是中国共产党的文件或

毛以前的文章中没有谈到过的。

毛在这场挑战中采取了机智灵活的策略，宛如“猴子”出山。中共的“发妻”无产阶级远在城市，在这种情况下，土匪就成了毛的政治“情妇”。

毛结识了两个名声远扬的土匪首领*，他们给毛六百个人和一百二十支枪⑦。他把许多游民和懒汉都补充到毛的队伍里。两年中，红军扩充的大多数成员都是无业游民。而这些人是工人和农民所鄙视的。

毛之所以招募这些无业游民是因为其他的兵源几乎没有。然而，毛并不把游民看成是社会渣滓。“他们也是人”，他提到游民时曾说，“有五官四肢。”⑧他们属于同一阶级，游民也是受压迫的人。毛认为可以改造他们。**

毛要做的工作是多方面的。国民党军队来犯时要打仗，要制订社会政策，如何掌握与地主豪绅斗争的尺度？能不能既向农民征税，又避免不利的影响呢？

毛确实没收了一些地主的财产，初到井冈山时，用这种方法来获取部队的给养比向普通老百姓征税要好得多。他在群众大会上也枪毙了一些地主，但他却尽最大努力不去触动那些中间分子。他的政策是打倒土豪劣绅，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

他还组织了民兵和赤卫队以补充正规部队。他抓教育，这是他的拿手好戏。他办起了干部班、战士班，还有一些教憨厚的农民认字和写字的班。

没有课本，缺乏纸张，教师们只好用树枝在地上教学生写

---

* 原文有误。“土匪”头子袁文才、王佐均受过革命影响，各自的队伍都自称“农民赤卫军”。袁还是中共党员，毛曾亲自作袁的工作，送他100多支枪，以后便将袁、王二人所率队伍改造成工农革命军。——校注

** 1928年，他在给上海的中共中央写的一份报告中说：“在此种情形下，只有加紧政治训练一法。”⑨

字。

面对各方面的挑战，毛在逐步走向成熟，他不象一年以前在武汉时那样愁眉不展了。他的面容显得更加坦然、充满活力，开始给人一种权威感。

如果说毛的父亲曾是韶山的一个“白”乡绅，那么，毛在34岁时就成了井冈山的“红”乡绅。

中共中央发生了变化，但是没有任何改进。莫斯科对瞿秋白很不满意，李立三取代了他在中央的位置。

李立三形而上学地提出了“革命高潮”的观点。他所期待的前景几乎是一个超历史的高潮，就象基督徒期待耶稣复活一样。以怀疑的眼光去看现实使得一切都不同。尽管1927年的大革命失败了，他确很偏爱这种盲目的出击。

李开始牵制毛。1928年3月，李从湖南共产党组织中派遣一名特派员到井冈山，带来了颇多的批评和指示。毛的处境很严峻。

撤销党内一切职务的消息并没有使毛感到吃惊，这一四个月前作出的决定已失去了打击力。但是，这位特派员批评了毛的社会政策。中央认为，对阶级敌人应进行更多的“烧杀”，“工人阶级化”应当成为党和军队的口号。（可是工人在哪里呢？）

毛在井冈山时有点儿右倾，当时必须这样做。争取各方面的力量并改造他们是他当时的策略（他曾十分宽容地称那两位土匪头子是“忠实的共产主义者”）。

毛被命令到湖南去与军阀的军队打硬仗，他没有选择的余地，因为井冈山已归长沙的党组织领导。这次出征付出的代价是昂贵的。井冈山被敌人占领了，尽管一个月后又夺了回来，但他的部队却损失了一半。

中共中央又向井冈山派了一名代表，结果与上一次截然不同。这位代表是来井冈山纠正毛的政策的，但他的举动出乎人们的意料。他非但没有斥责毛，反而成了毛的伙伴，这一结合改变了中国的命运。

朱德于1928年4月到达井冈山。中共的极左路线使他在华南连续吃了几次败仗，战士所剩无几。这次，他受中央的委派去批评毛泽东。上海认为，毛象《水浒》中的梁山好汉，军事意识太强，他不是发动群众共同掀起革命高潮，而是为群众杀富济贫。

朱德手下的一些军官觉得，毛看上去不象军人。他们记忆中的毛是一位身穿褪了色的灰布中山装、身材高大、热情健谈的人。他的头发长而杂乱，没有刮脸，胡子遮住了下颏上的痣。他们还发现，毛的手掌很有热度，并有淡红色的光泽。⑩

毛不摆架子。朱德到达前，毛正兴致勃勃地与朱的几个下属军官坐着畅谈，手中端着一大杯开水。*

毛和朱在水坑村的一条小溪旁相会拥抱。他们两军相合，组成了一支一万人的军队，红军真正地诞生了。⑪ 这时作为共产党的武装力量才开始为世人所知。

两位领导人，需要就很多问题进行商谈（一年前，他们曾在中央的一次会议上见过面，但当时很难有机会交流思想）。更重要的是，他们就要共同指挥一场战斗，因为一个军阀正在攻打井冈山。他们一起击败了敌人。

毛和朱在某些方面很相似，但不尽相同。他们都来自农村，因此都能不摆架子地和农民谈得来。但是，在风度和理论水平上毛更象一位知识分子。毛具有朱德的朴实，但他远不如朱那样率

---

* 朱德的政委是陈毅，后来成了毛的外交部长。朱德手下另一个出色的年轻军官是林彪，后来他与毛的关系甚密。但四十年后，他又想密谋杀害毛。

直。朱德是一个非常出色的、但思想单纯的战士，毛则把自己塑造成了一个脱离了军人外表的战士。

朱德很快就把毛看成是一位思想家，他代表上海准备对毛所作的指责从他的唇边消失了。另一方面，毛十分欣赏也非常需要朱德惊人的军事才能。毛总是乐于制定宏观的战略，而把具体的战术行动交给别人。现在他可以这样做了。

在共产党前途难卜的关头，他们相互取长补短。自从他们会师后，反李立三路线的火种开始在井冈山燃起。"朱毛"联盟产生了。二十多年后，很多中国人还认为"朱毛"是一个英雄的名字。

毛现在有了一个合作者。他在长沙时曾有一批忠实的追随者，他自己也曾追随过德高望重的人物：在长沙第一师范时的杨教授，五四时期的陈教授。在上海为国民党工作时他又追随过胡汉民。但是毛能否很好地与地位相同的人相处呢？朱德是他的第一个考验者。

毛在各个连队建立了政治性组织。不是象上海指示的那样去成立政治部，而是发动组织普通士兵委员会，通过讨论政治问题来提高大家的觉悟。要发动一次反对地主武装的战斗吗？士兵委员会马上会控诉地主是怎样欺压农民的。

毛坚持在每班设党小组，每连设党支部，每营设党委。这样，党便由一个抽象的概念转化成了一个每日出现的实体，使党来到了夜晚营地的篝火边，来到了每一个战士的身旁。

不许军官打骂士兵，帐目公开，由大家监督。每打完仗，毛都组织民主会议，会上可以各抒己见，还可以点名批评或表扬上级军官。通过讨论，如果取得一致意见，军官也可能被降职。毛成了导师兼道德家，他创造了一种新型的军风。

中国的旧军队只知道利用士兵的躯体，而没有利用过他们的

头脑。

这是要造成一种民主的气氛，每人都感到自己是战斗中的一员。然而这一系列改革使得一些老式军官对毛十分恼火。他们愿意为实现未来的民主而战，但不希望在他们领导的军队中看到民主的举动。

毛还为士兵们制定了纪律、在群众中的行为准则。早在长沙读书时，毛就已发现，对中国的士兵来说，掠夺周围的老百姓似乎已成了传统。

抢劫和强奸本是军人们常作的一些事。然而，在井冈山，几个星期过去了，小心翼翼的村民才知道毛给他们带来了太平盛世。战士们帮助农民春播，给年老体弱者砍柴，送还从农民那里借来的镰刀，买菜如数付钱，住宿在有年轻姑娘的地方也不骚扰她们。这一切简直是天翻地覆。

毛正在努力证明，他领导的军队与中国人熟悉的旧军队有天壤之别，他要建立军民鱼水关系。

毛从未上过军事学校，而其他的红军高级将领大多都在军校学习过*。他仅有的军旅经历就是曾给长沙驻守部队的一名军官当过六个月的传令兵。和中国老百姓一样，他讨厌在军队中所见到的一切。

不做普通一兵，他是要直接成为一名军事家。他认为，军队一定要有自己的目标，军队的一切行动都要服从这个目标。作为军事家，毛是伟大的，因为他跳出了纯军事的羁绊而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

我们能说毛是民主主义者吗？他的新中国所建立的政治制度与民主毫不沾边儿。但是在夺取政权的道路上，他是一个民主主

---

* 例如，周恩来（黄埔军校）、林彪（黄埔军校）、彭德怀（湖南陆军军官讲武堂）、朱德（云南陆军讲武堂）。很多年后，毛说："打仗的时候，我从未读过兵书，我们也从来不带着书本打仗。"[12]

义者，因为他相信，决定性的力量存在于民众之中。

他认为，每个人都有其长处，总的说来人与人之间是平等的。毛对别人的此类特点很敏感：不善适应（如象毛在东山学校读书时那样），与人无争（毛 1919～1920 年在北京的处境），无拘无束（他几乎一生都如此）。他有非凡的组织才能，因为他知道，只有充分听取民众的意见，才能取得良好的效果。

毛需要朱的通力合作，因为他当时处在两种势力的夹击之中。上海的李立三认为毛软弱无能，而井冈山地区的豪绅们却惊恐地发现，毛决不是无能之辈，于是就求救于国民党的军队来剿灭“赤匪”。

在茅坪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上，毛提出了两个观点：[13] 一是“集中兵力”，只有当我军战斗力优于敌人时，方可包抄出击。毛认为，当时红军的力量还很弱小。

第二个观点是关于工作作风，当然，不仅仅指工作作风。毛把政治和武装斗争看成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二者不可分割。“每个人都既能打仗，又能做政治工作。”

毛坚持开展武装的马克思主义运动，把枪和书结合起来。这将使红军在广大的农村扎下根，然后随着革命高潮的到来向城市推进。党中央仍留在上海，这一事实本身就充分显示了毛与李立三观点之间的根本性冲突。李立三的党只是一群城市知识分子，根本不是一个能够战斗的党。

起初，毛并未想长期占据井冈山。这个根据地的建立不是以胜利始而是以撤退始，是在吸取失败教训后所进行的一种新尝试。但是毛慢慢地发现红色力量能够在山区生存下去，虽然国民党仍在南京统治着中国的大部分地区。

毛总结说：“根据地对于红军就象屁股对人一样重要。”[14] 如果没有机会坐下来休息，一个人肯定会因疲劳而倒下。1928 年中国红军正是如此。

茅坪路线仍是悬在空中，毛无法把这一理论完全付诸实施。整整一个夏天他不得不和党中央斗争。上海和长沙的那些掌权的败事者们叫毛十分恼火，他就象一条暴怒的鲑鱼随着“高潮”跳上跳下。

这种局势7月份发展到白热化，湖南共产党的两个特使带着李立三的指示来到井冈山给毛施加压力，企图制服毛，让他举行大规模的出击。

为了寻求支持，毛召开了一次会议，表决结果是反对南征。但是特使亮出两张王牌：一是朱德同意他们的意见，另外，很多来自湘南的战士也都渴望离自己的家乡近些。这次出征在毛的反对下开始了。

南征的结果可以说是一场大灾难。仗打败了，部队损失惨重。原来红军占领的村镇又落入敌人手中。毛赶忙来到湘南劝说朱德回到井冈山坚持茅坪会议制订的战略。他成功了，但是，井冈山的大部分地区已被敌人占据。

湘南没有出现革命高潮，现在应该做的是抓建设和教育，而不是到军阀和国民党力量强大的城里去冒险。

长沙来的两个特使嘲笑道："山沟里怎么会有马克思主义！"[15]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山沟里是不可能有马克思主义的，但是，毛坚信不移地认为，中国具有自己的特殊性。莫斯科和上海在争取政权的过程中可能有所帮助，也可能帮不上忙，但是山区将是建立新政权的关键。

到1928年10月，毛和朱又夺回了井冈山的大部分失地。共同的斗争使他们的关系也更加亲密。朱德对这次南征很是悔恨。同时，他越发钦佩毛的头脑了。

把井冈山根据地比喻为人的“屁股”或许有些道理？也可能毛温和的土地政策是明智的？上海对毛仍然不满。但是他在局部地区获得了道义上的胜利。到1928年底，他实际上已成为当时湖

南组织涣散的中共力量中的头号人物。

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在莫斯科举行了第六次代表大会，因为当时在中国很难找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召开这次会议。严峻的事实比大会的任何决议都更有说服力，大会的报告五个月后才传到井冈山。这一事实本身说明，井冈山具有何等重要的意义。

第六次党代会选出了一个极左的政治局，李立三独掌大权。没有人提议选举缺席的毛为政治局成员，就象没有人建议感谢苏联人为大会提供的低劣的伙食一样。

代表大会（显然是在苏联人的敦促下）正式提出农村根据地是走向革命胜利的有效一步。这是新的政策，它平息了对毛的井冈山之举的根本性非难。起码毛又回到了中央委员会。

然而，第六次党代会根本不赞成毛的方针。他们仅仅把农村根据地看成是等待革命高潮到来的前站，城市工人仍被视为革命的中坚力量(但是很少)。他们认为吸收游民进入共产党比不扩大党的力量还要糟。

不知毛是否考虑过他在历次党代会中的角色？已经举行了六次代表大会，有两次（第一次和第三次）他起过一定作用，有两次（第四次和第五次）他成了旁观者，还有两次他干脆没有参加。

毛发现自己再一次步入了一个三角的阵势之中。二十年代早期的三角是共产党——莫斯科——国民党。现在的三角是共产党(上海)——莫斯科——井冈山。

中国共产党当时是一个党员之间很少见面的政治组织。人数最多的一次大会是在武汉召开的第五次党代会，到会者也只有八十人。党都是通过信件联络来组织和开展斗争的。

有时信件从发出到收阅需要几个月的时间，在此期间此政策很可能被彼政策代替，虽然指令都是来自上海。当上海草拟重新执行一种政策的信件的同时，很可能一封发自莫斯科的信已在途

中，信中指示执行另一种政策。

现在回想起来，这些学究们竟然想夺取政权，统治一个有四亿五千万人口的国家，确实令人惊讶。

然而毛时常获益于这种中世纪的联络方式。1927年11月制订的极左路线，他在四个月后才听说，这样，他就有了一段自由活动的时间。

当然，有时也会因信件的姗姗来迟而损兵折将。1928年中期，在莫斯科就已批判了极左路线，可毛在11月份才接到报告。在此期间，他迫于极左路线的压力，执行了他们的土地政策，使红军失去很多支持者。

毛的文笔往往犀利不凡，但是，在党内斗争中，一支雄辩的笔并不总是能解决问题。当有人站在毛这一边时——例如朱德——他们发现毛令人信服。但是，他写文章的语调常会触怒一些人。毛写文章总是象在宣布某些真理，这使那些不赞同他的观点的人很不愉快。他的娴熟的运用格言警句的技巧，是一把双刃的利剑，使要表达的思想鲜明生动，然而，那些不会运用格言警句的同事们，不喜欢他的这一风格。

如果说毛提出一些格言和比喻显得有点儿狂妄，那只是因为它们脱离了党内文章常见的枯燥与繁琐。

毛一直把家人带在身边，事业上的失败和挫折使他更需要亲人。毛几次失意后回到韶山都说明了这一点。在井冈山亦同样如此，不过这里的戏剧主角发生了重大变化。

毛的弟妹们都竭力地帮助他。弟弟泽民毅然离开党中央的上海总部(他在那里工作得很好，尽管党中央反对毛的观点)，并忠实地加入了毛在偏僻的农村进行的实践。泽覃也从湖南赶来。朱德第一次从南方赶到井冈山时，是他代表毛首先作接洽工作，并出色地完成了工作。在后来的几年中，毛的两个弟弟都坚定地跟

随毛，他们的妻子也都因此至少被捕过一次。

毛的继妹泽建，比两个弟弟对井冈山的帮助更大。她自成年后始终都是湖南党的活跃分子。自1927年底始，她在险恶的环境中往来于井冈山和平原之间。1929年，一个国民党的爪牙抓住并杀害了她。

开慧带着两个儿子住在韶山，若让她上井冈山，不是不可能，但肯定会有很多困难。或许在当时的情况下她必须选择跟毛在一起，还是跟孩子们在一起。她选择了后者。1930年在长沙，国民党逮捕了她，遭到严刑拷打后被杀害。⑯

在生命的最后三年里，开慧没有见过毛。说毛抛弃了开慧是没有根据的，实际上，他一生都很爱她。但是，毛在1928年中期爱上了一个女中学生也是毋庸置疑的。

毛见到贺子珍时她才只有18岁。贺聪明、活泼。朱德的一位部下曾描述过他对毛的这位"革命爱侣"的印象：既有魅力又有涵养，讲话清晰且有分寸。她的那双眼睛就象"两颗水晶"，见到她"就会给你一种甜如蜜的感觉"。⑰

子珍还具有政治头脑。她父亲是一个家产不丰的小地主，有一定的进步思想，开了一个出售左翼书刊的书店。贺子珍于1927年加入共产党，还帮助过同年8月的南昌起义。⑱

1928年6月的一个晚上，毛在一次党的会议上做报告。事有凑巧，这次会议在永新县城举行，子珍是团的支部书记，参加了这次会议。散会后毛和她闲谈起来，他们共进晚餐，吃了两只鸡，喝了两瓶酒。

两天后，子珍帮助毛工作了一整天，晚上她留下没有走。第二天吃早饭时，毛对此事毫不隐瞒，"贺同志和我相爱了"。毛对同事们说。

隔了几天，一位军官来见毛，谈完正事后，他笑着向毛表示祝贺。毛笑着问道："谁告诉你的呢？"

“这是军营里的喜讯，哪个不知道。不过，邀我来庆贺一下怎么样？”

毛安排了一次宴会。

这件事突如其来。它是青春爱情之火的激发。它似乎表明，毛在井冈山上找到了新的力量之源。尽管在更大的舞台上形势对他不利，但是现在，毛精神焕发，勇气倍增。

不久，井冈山谷中流传一首新歌：朱司令努力干——挑谷走田间。毛司令努力干——革命兼说爱。

在以后的几年中，毛一直和子珍在一起生活。他们的结合预示着毛的一个创造性时期的来临（与八年前和开慧结合时一样）。她不久就给毛生了两个孩子（就象开慧与毛在长沙生活的两年中那样）。

新妻子与新生活两次双双而至。

在另一方面，毛与子珍的关系同他与开慧的关系截然不同。这位 18 岁的姑娘完全是在斗争中成长起来的。而毛遇到开慧时，她还在父亲的保护之下。毛敬仰她的父亲，但并非出于政治的原因。子珍没有这方面的影响（毛从未见过她的父母）。她恰是一名热情的共产党员，能把这块新琢的美玉得到手，毛真是赏心不已。

在井冈山，很少有人知道杨开慧。显然，毛很少谈及她和他们的三个儿子。尽管如此，直到 1930 年，听到开慧被害后，他才和子珍正式结婚。*

1929 年初，毛离开了井冈山。原因是实践性的而不是哲理性的。他要再开辟一个更好的根据地。

---

* 井冈山时期，朱德也娶了一个新妻子（第四个），与毛的一样，他的新妻子是从队伍中选出的一个十几岁的姑娘。

党中央对井冈山施加压力，要他把队伍带到南方去发动壮观的革命。而当时国民党的军队正在攻打井冈山，每一个寒夜都有一场你死我活的战斗。土地政策中出现了极左的错误，使红军和群众有所疏远，一些中农不愿再给红军粮食。恰在此时，彭德怀将军和他的队伍又突然来到了井冈山。

彭德怀后来成了中国革命中的杰出人物，但他和他的一千人马的到来并没有受到热烈的欢迎，因为加剧了食物的短缺。

毛决定向江西进军。他和朱德之所以要进入这一翠绿的多山省份是有很多原因的。如果能占据另一个省，就可摆脱湖南共产党的吹毛求疵。朱德在江西国民党中有很多联系(他和他们有过多年的交情)。另外，江西的军队不象长沙和广州的右翼势力那样有钱并有外国的帮助来与红军作战。彭德怀则留下来守卫井冈山。

这次可怕的远征于1月开始，战士们排成一路纵队走在冰雪覆盖的崎岖山路上。四千名战士（其中有一百名妇女，包括子珍)，每人只带了半斤炒米，他们满是虱子的棉衣，一点儿也不保暖。胡乱应急的帽子使他们看上去象一群捡破烂的小贩，没有药品，甚至两千多名战士没有枪，只有长矛。

毛现在是骨瘦如柴，衣衫褴褛，蓬乱的头发垂到肩上。

两次休息后，炒米就都吃光了。这四千人继续跋涉，已有人冻饿而死，如果不打仗，还会有更多的人饿死。当然，如果不能尽快吃上一顿饱饭，很少有人还有力气打仗。他们终于发现了敌人，在离开井冈山的第三天晚上，他们打败了国民党的一支驻防部队，大家饱餐了一顿。

毛的这次进军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在到达较暖和的南方之前，他已失去了几十名战士。有好几次，红军战士不得不掰下树枝作拐杖扶持着走路。在大余（以盛产钨而著名)，毛犯了一个仁慈的错误，他让疲惫不堪的战士们在这相对舒适的“绿洲”停留

的时间过长，敌人追上了他们，结果损失数百人。

毛和朱到达江西瑞金的一个小镇时，正好赶上过春节。当地驻军正设宴庆祝打败“朱毛共匪”取得的胜利，一派节日气氛。拱凳上的红烛与军营门口的红纸春联相互映衬。樽酒把筷，杯盏交错，笑声不断。

突然间子弹横飞，狂欢者们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吓得目瞪口呆。“朱毛共匪”把住了每一道门，他们用枪把所有的驻军赶出军营，然后把他们锁进一个祠堂里。后来朱笑着回忆说：“我们替他们吃完了春节的盛宴。”⑲

不久，毛就在瑞金建立了根据地。自离开井冈山以来，他损失了半数的战士。但他得到了一个实施他的“土地革命战争”计划的机会。在1929年余下的时间里，他逐渐用枪把赣南变成了赤色。

每攻下一个村寨，毛就把它打上自己的印记。他把宣传共产主义的标语贴在墙上，召开群众大会，解释红军的由来和目的，建立人民委员会（苏维埃）。这些委员会有时能存在下去，有时则是昙花一现。

瑞金地区并不象井冈山那样贫穷，毛的日常备用物也较以前多了些，伙食也有改善，衣服也可以替换了，还可以弄到一些药品。

朱毛的军队攻下长汀后，缴获了许多缝纫机。他们用这些机器制做了第一批红军军服——打着绑腿、帽子上缀着红星的深灰色军装。

毛又回到了稻田和青山之中。然而，这一次与二十年代中期在湖南时大不相同。他现在有一块安全的根据地开展工作，而在秋收起义时他所缺少的正是这个。

红军不是革命简单而又纯粹工具，毛不是拿破仑。但红军的

力量对革命至关重要，它可以保证革命取得成功。

要是李立三能等到革命时机的成熟就好了。二十年代左右，毛肯定会做到李立三现在想做的事——率领红军开进中国富饶的城市。

这次远征并未减少上海对毛的非难。雪片一样的信件很快就追上了毛，内容都是极左的指示。

李立三仍然只会坐在办公桌旁狐假虎威发号施令。他按照自己的需要解释六大决议（毛也是如此）。整个1929年，他发出的指令是：把城市作为中心；不要建立根据地；不要进行土地改革，因为条件尚未成熟；把红军分散成游击队。他还命令毛和朱离开军队到上海接受批评。

朱怒气冲冲，毛则神色不变。两个人都违背了李立三的政策精神，不过他们尽可能对信件表示遵从。过去的一年，他们都是这样敷衍过来的。

令人惊奇的是，毛从未离开过中国共产党：在1924年当他被讥讽为"胡汉民的秘书"时；在1927年第五次党代会批判了他所坚持的土地政策时；在1928年他被指令离开井冈山时；直到1929年，及以后的一、两次类似的情况的时刻，他都未退党。

他之所以还留在这个圈子里，是因为他坚信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终究会到来。他的灵活机智的工作方法有时近乎机会主义，但是，他要实现的目标一直是共产主义。

进而言之，毛不满足于建立起只包括一、二个省的王国。中国的面积比整个欧洲还要大。仅湖南省，在1920年的人口就与法国1789年大革命时的全国人口相等。为了中国的未来，为了取得最后的胜利，他需要一支真正的全国性力量。没有共产党，毛和朱不可能在三十年代初就建立起这样的武装力量。

毛走地方路线，但他的思想不是地方主义的。

如果说毛在二十年代末或三十年代初脱离了中国共产党，那

么，就不会有那么多人追随他。他被看作是一位著名的人物，但他只是居于党的权力机构的中层。*

他并没有把自己看成是中国的救星，但他有自己的观点，而这些观点又常常偏离党的路线。然而，毛做了很多努力并多次做出让步以便留在党的机构中。

1929年，毛得了疟疾。这场大病持续了三个月，有好几次是在生与死之间徘徊。江西搞不到奎宁，等了好久，上海的交通员历尽千辛万苦才把药送到（共有两个人护送这些宝贵的药瓶，其中一个在半路上被砍了头，另一个总算闯关过卡回来了）。

毛在福建境内的一座草舍里养病，这里距江西东部较远，可能是信仰基督教的傅医生救了毛的命。傅连璋医生是被红军争取过来为红军做事的。在长汀，一位英国浸礼会教徒给他取了个教名叫尼尔森。

李立三路线的影响是毛在江西时面临的主要问题，这一点可以从朱德在毛生病期间的举动得到说明。朱德好象失去了舵手，开始对李立三半推半就。在“流动游击”喊得最响的时候，他也离开瑞金去“发动群众”了。

谁也不知道毛在听到朱德的这种无益的妥协时有何感受。无论如何，朱德的从命收效甚微。几个月后，他又回到毛的路线上来了。

到1929年末，毛又复出，他已从疾病和对朱德的失望中解脱出来。他准备在福建的集镇古田召开一次重要会议。支撑在山里的稻草床上，他草拟出时今著名的《古田会议决议》。

毛象一个杂耍演员，他把几个球同时抛至空中，在较为熟悉的问题上和李立三展开了论战。

---

* 第二次茅坪会议选举产生的中共湘赣边界特委会，负责湘赣边界地区的党务工作。在十九名委员中，毛排在第十五位。

他对如何管理军队提出了强硬的观点，他对一些人的“单纯军事观点”感到痛惜。毛坚持说：“军事是完成政治任务的一种手段。”[20]实际上这是对朱德的批评。[21]一些效忠于党的中央的地方人士对毛是个问题。古田会议并不是一帆风顺，自始至终都充满了权力之争。为了取胜，毛巧妙地运用了他钟爱的手段，他开始转向秩序和纪律。

红军已不象在井冈山时那样是一支兄弟队伍，官兵也不再坐在一起讨论政治问题了。有些官长对政治原则似懂非懂，甚至连一点政治思想都没有，却被吸收为党员，只因为他们是官长。毛批评了这种做法，但是，他有时也只得听之任之。

在《古田会议决议》中，他主要强调的是纪律。他批判了“极端民主化”和“绝对平均主义”。官长应允许骑马，司令部应比连队配给较大一点的房子。

他又提出了一个新的想法，这就象打向李立三和一些年轻留学生的一记耳光。合格党员的一个标志应是“必须没有发洋财的念头”。可如此多的人靠奖学金留学去了，又有如此多的党的领导人到外镀金。把一半的时间浪费在横穿西伯利亚的火车上，他从未放弃自己的观点。在他给林彪（当时是春风得意的年轻军官）的一封信中充分说明了这一点。此信后来取名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封写于1930年1月的信，既表达了他对未来的坚定信念，又清楚地表明了毛对一些具体问题的看法。

这时的毛是相当乐观的，他认为，革命的希望就象“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22]已可触摸得到。是不是毛已开始赞成李立三形而上学的高潮论？而就在此时，李和中央都十分悲观。毛为此责备他们，他的推理比他的乐观主义更具有打击力。

斗争随着整个形势的变化而变化，它的涨落不仅和自己的力量有关，同时也取决于敌人的力量。这是一个简单而又基本的道理。

1928年初，毛一度十分谨慎，因为军阀之间还没有相互残杀，所以当上海命令他多方出击时，他感到十分吃惊。到1930年，他已敢大胆地行动了。因为这时蒋介石受到两个军阀的攻击，同时日本人也正向中国施加压力。

1930年3月，共产国际的官僚机构抛出了一条荒诞的消息。他们出版的新闻简报《印象通报》(Imprecorr)上刊登了一则毛的讣告！讣告中说毛死于肺结核，并称毛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驱"。[23]

这一过失并不是克里姆林宫在中国问题上犯的最严重的错误。

随着1930年的过去，起始象蛤蟆一样把自己吹得胀鼓鼓的李立三的牛皮也吹破了。他和毛之间奇特的拔河赛摇动了每个人的立场。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毛在江西的成功使他与李立三之间的关系更加恶化，尽管李立三为红军逐渐扩大的影响也有所触动。朱毛军事武装（主要是红军第四军）是当时左派在全国范围内最有力的武装。但这一事实并没有使李转向毛的建立长期农村根据地的思想。他说，"在山里"建立政权纯粹是"开玩笑"。

不管怎样，李确实想利用朱毛的军队来进一步实施他的攻击几个主要城市的计划。他很快就取得了这种权力。[24]

彭将军攻占了长沙，徒劳无益地坚守了十天，最后被赶了出来。贺龙将军（他的生活不久就和毛的生活交织在一起）被派去攻打武汉，但他没拿下这座大城市。

毛和朱的目标是南昌。他们徒劳地占领江西省府24个小时*，工人没有起来，国民党没有垮台，军阀的军队也损失不大。

毛从进军南昌的失败中得出的唯一结论是：李立三的路线已

---

* 原文有误。朱毛红军从未占领过南昌。——校注

彻底破产。*

但是，失败的硝烟还没有散尽，李又玩弄了一个伎俩。长沙失利后一个月，李告诉彭德怀再试一次，并命令朱和毛也参加这次会战。红军人数已超过两万，是中国共产党迄时为止最强大的一支军队。毛带领队伍进攻了十二天，但国民党军队有飞机、大炮和军舰……。

毛放弃了战斗，没有服从李的命令（带着彭和朱）。他用实际行动反对李，又回到了赣南。

李立三垮台了。两个月内，他失去了党内一切职务。和他的前任瞿秋白一样，他被召到莫斯科，挨训受责，继而进监狱。

进攻长沙的后果是导致开慧和毛的继妹被杀害。他的两个儿子被救了出来，但毛直到很多年后才见到他们。他家的土地被国民党查封，更甚的是，他们还掘毁了他父母的坟墓。[26]

毛再也收不到地租了，这位"红乡绅"再也没有静修的好去处了。毛在井冈山和江西没收了许多地主的财产，现在他才知道被没收财产的滋味。

难以理解的是，毛颇欣赏他在韶山的名望。后来他向埃德加·斯诺谈及他在韶山的形象时说："当地的农民相信我不久就会回到家乡去。"他指的是三十年代早期。这似乎有点儿自鸣得意。

毛接着说："有一天，一架飞机从上空飞过，他们就断定飞机上坐的是我，他们警告当时种我家田地的人，说我已经回来视察我家的田地了，看看地里有没有树木被砍掉。他们说如果被砍掉

---

* 离开闽赣边界去攻打南昌之际，毛对这次出征肯定也是心存疑虑。离开长汀时，他在一首词中写道：

百万工农齐踊跃，[25]

席卷江西直捣湘和鄂。

国际悲歌歌一曲，狂飙为我从天落。

既无百万，也很难说得上狂飙，另外，一支外国歌曲真的会使毛感慨万千吗？

了，我一定会向蒋介石要求赔偿。”毛总是感觉到，那个靠得住的乡土世界对他有一种无形的吸引力。㉗

李立三的主要批评者并不是那些受他迫害的人，而是刚从苏联学习回来的一伙新人，他们揪住他不放。毛已看清了自己的前途，他又有事情干了，要与一伙新的对手——28个布尔什维克作斗争。㉘

这“28个布尔什维克”是在莫斯科学习的一群左派中国留学生，他们受到斯大林的赏识，因为他们站在反对托洛茨基的立场上。他们就读于莫斯科中山大学，导师就是校长维克多·巴威尔·米夫。米夫同时还是斯大林远东政策的得力顾问，因此，他不久就从大学的校园来到了上海的小巷，成了三十年代初期的鲍罗廷。

28个布尔什维克除擅长理论外，对其他事情一窍不通。的确，他们都缺乏经验，其中的两位佼佼者——王明和博古，在1931年取代李立三掌管党中央时都只有24岁。

他们俩和毛除了都是中国人之外，很少有相同的地方，王明出身于地主家庭，性情温和。博古的父亲在清朝时曾当过县令。两人都曾是上海大学的学习尖子，又同时在十几岁时就离开中国去苏联学习（毛在十几岁时还没有离开过湖南）。㉙

他们于1930年离开莫斯科中山大学回国。出人意料的是，1931年初在上海举行的中央委员会上，他们俩竟取得了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权。米夫从中起了很大的作用。

好象是欢迎王和博的回国，毛写了一篇题为《反对本本主义》的文章。文章主题是论述“山沟的马克思主义”和在莫斯科学到的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区别，毛提出的口号是：“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㉚

这一时期，是毛自1926年以来日子最好过的一段时间。李立三已被清除，中央开始对农村工作有些好感，尽管当时的党中央

远在上海的法租界内。毛在1930年9月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27年以来的第一次）。

以毛为政治首领的江西根据地工作进展顺利，到1930年底，根据地的面积已扩展到一万九千平方英里，管辖人口三百万。几次攻打城市的惨败进一步提高了江西和其他红色农村根据地的声望。

李立三的"玩笑"变成了现实。许多党的高级官员来到了山里，党中央决定成立"苏维埃政权"为中国的临时政府，这样就使对农村根据地的重视具体化了。在李立三以后的政治氛围中，毛必然就成了中共党内的重要政治人物。

与李立三进行了三年的斗争，现在，毛不得不应付这一斗争遗留下来的一个棘手问题。李立三在江西的追随者们不欢喜毛和他的思想，并密谋反叛。其中有些是渗透进来的AB团分子（Anti-Bolshevik，"反布尔什维克团"）。国民党搞AB团的目的就在于向中国共产党渗透。

毛得到警报后，迅速行动，在富田囚禁了几个反对他的领头人物。这一行动将反叛推向了高潮，几千人赶到富田企图释放被关押的人。几千名武装战士参加了这次长达几个星期的战斗。这是共产党阵营内发生的第一次重大事变。

毛赢得了胜利，但他没有因取胜而变得宽宏大量。他违背了自己制定的"治病救人"的内部斗争方针，他杀了成百甚至有上千的人。如果说这个事变使毛再也不象以前那样受到爱戴，但却使他的统治地位更加巩固了。*

一天，一个自称是毛的老同学的人拜访毛，他是毛在东山高小时的同学肖三。肖三已与共产党人心心相系，（他与爱挑剔的哥哥肖子升不同，肖子升曾随波逐流地加入国民党，转而退了出

* AB团非反布尔什维克团，富田事变有着特殊的环境，对其处理毛确有失误之处。——校注

来，后又去了欧洲献身文化事业。）当天晚上，毛邀肖三谈了很久。

他俩谈到了如何教文盲识文写字的问题。这次交谈仿佛是毛开始戎马生活之前的回声，然而，也预示了他拿起枪之后的生活。根据地的稳固发展使他能再次考虑作教师的问题，教育别人是他的癖好，他要重操旧业。

毛领导下的江西政权开创了一个自由时期，人们可以象寄一封信那样为追求感情的自由而随意离婚。婚姻应建立在爱情的基础上，生儿育女也不能做为维系婚姻的纽带。

毛的婚姻自由政策和他奉行的其他政策一样，是带有革命精神的。在旧中国，最底层的人们结婚并非一件易事。毛在江西调查时发现只有10％的游民和1％的长工能找到妻子，他对此大为震惊。而且在旧中国，离婚几乎不可能，对妇女来说则根本不可能。

毛的新法律实施后，出现了一派结婚与离婚的繁忙景象。姑娘们把当地的苏维埃政府当做婚姻管理局，她们等在那里，直到那些不耐烦的干部为她们找到男人才罢休。

有些夫妻即合即离，朝秦暮楚。[31]

有些青年团员在“向封建主义开战”的名义下，胡乱地发动所谓自由婚姻运动。

1919年，长沙的那位新娘自杀后，毛也撰文提倡“恋爱自由”。然而，当新旧思想交战时，毛选择了中间立场，这一点揭示了中国革命的根本出发点。他希望每个人都能享受到婚姻生活的幸福，而反对无节制地纵欲、早婚、独身和其他异常行为。

他的有些政策定得比他许多同事所希望的要严厉。他不同意将男子的婚姻年龄降至20岁以下，女子降至18岁以下。他坚持红军战士的妻子，只有征得丈夫的同意或是两年得不到丈夫消息的

情况下方可提出离婚。*

他的婚姻政策使普通农民自由地结合，但他也不赞成二十年代一些布尔什维克知识分子提出的在性生活方面的"一杯水"观点。他认为应给农民保持自己传统习俗的一席之地，而不可过于轻率地处理男女之事。

这一点很合毛的性格，他笃信诚实的乡土美德。他不同于那些五四型的知识分子，他们认为，大胆的社会实践是件令人激动的事，而且有其自身的合理性。他和开慧或子珍的婚姻在当时的环境中都是稳定的。确实，毛并不看重结婚的仪式，他在完婚之前就同她们生活在一起——然而一旦确定，这种关系就会稳定地保持下去，直到外部因素促其发生突变。

毛在江西时制定的《婚姻法》完全反映了他的经历。两个人开始同居就视为"结婚"，不管他们是否已领了证书。这样就消除了私生子的概念，这是中国的一大变化。同时，毛制定法律的宗旨是要把稳定的家庭式爱情作为所有人的规范和权力。

毛的革命最终给社会带来的影响，具有讽刺意味。共产党取得政权后，改变了一切，因为它改变了人在社会中的地位。然而，人的行为规范并无多大改变。

蒋介石正准备用武力铲除共产党。从某种程度上说，自李立三向蒋的城市发动几次进攻之后，这是以牙还牙。

然而，却是朱和毛与发怒的蒋对峙。从1930年12月至1931年7月，他们共打退了国民党军队的三次"围剿"，他们以少胜多的战例在军事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毛采取灵活的战术，诱敌深入（把国民党军队引到他们不熟

---

* 老百姓的妻子可不受此规定的约束。这种区别也预示了毛在延安时对结婚、离婚和性的问题进行限制。三十年代末，首要的问题是抗日。因此，毛在这方面采取了强硬的政策。

悉的山里)，以置换空间这种方法，毛掌握了时间的主动权，他看着敌人逐步分散兵力，一旦发现敌人有明显的薄弱环节时，就集中所有的兵力围歼，他称这种战术是"以十当一"。

由于灵活的战术使得毛的军队能够利用与当地农民的鱼水关系，并使他那众多的军队能简装行动。在第一次"围剿"中，蒋介石投入十万军队对付毛的三万人；第二次，蒋把人数增至二十万，而毛的队伍还是三万；第三次"围剿"，蒋介石飞到武汉，亲自督战，指挥着三十万兵力，而毛的军队则只有蒋军的零头。

反"围剿"的胜利是毛多年来最辉煌的一页。上万名国民党士兵最后倒向共产党一边，许多国民党军官被击毙，毛只损失很少的战士。朱毛军队缴获了大批枪支，他们在战利品中还发现了一些奇怪的机器，他们从未见过也不知怎样使用这些玩意儿，这就是无线电发报机。

1931年夏，毛抒情至极地填了一首词，对其令人激奋的内容来说，《反第二次大"围剿"》这个题目似乎平淡了些。

白云山头云欲立，
白云山下呼声急，
枯木朽株齐努力。
枪林逼，
飞将军自重霄入。

七百里驱十五日，
赣水苍茫闽山碧，
横扫千军如卷席。
有人泣，
为营步步嗟何及！[32]

毛和朱有可能击退蒋介石，但要击退28个布尔什维克就是另一回事了。1931年对毛来说是喜忧参半，他把人民战争的思想付诸实施并取得了成功，但他在中央的处境却是十分不利。

由于当时异常的环境，毛也就有了自由行动的可能。共产党总部远在上海，江西的苏维埃政权又是一种新的政权形式，它曾一度成了自由王国，在很多方面偏离了党的准则。1931年，紧张的军事气氛，更加强了它的自主性。

所有这些，都可以从在瑞金召开的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得到印证。这是中国共产党迄时为止召开的规模最大的一次会议，共有610名代表。开幕式于1931年11月7日清晨举行，这一天是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胜利十四周年纪念日。

28个布尔什维克给这次大会以很大的影响，但是他们不能控制大会。毛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这一脆弱的政权可望包括有华南地区多半很少的几十个苏维埃)，这是毛当时的最佳头衔。他成为了一个政府的首脑，尽管中国的大部分地区还不知道这一政府，也不知道毛泽东这个人。毛身边还有两位副主席，张国焘是其中之一，这个地主的儿子一直与毛合不来。

在上海，王明和博古取得莫斯科同意后，决定巩固在中央的正规统治。1932年，他们开始了计划中的下一步，中共中央由上海搬到了江西，这个最富有生气地显示共产党的精神的地方。“从1931年到1934年，我在中央根本没有发言权。”毛后来抱怨说[33]。

28个布尔什维克反对毛的什么呢？还是两个老问题——军事战略问题和土地政策问题。在落后的中国，要靠枪杆子和农民保证革命的最后胜利。28个布尔什维克无论在军事思想还是土地政策方面与李立三的本本主义都没有多大差别。

在28个布尔什维克的眼里，毛只不过是一名农民游击战士，

他的军队已被游民思想所腐蚀。他的灵活的战略战术："敌进我退，……敌退我进"在28个布尔什维克看来是忽视了根据地的占有。"夺取主要城市"，他们叫喊，仿佛1927年和1930年的惨败没有发生过似的。

总之，28个布尔什维克将毛看成是《水浒传》中那样的农民反叛者，而不是一位布尔什维克式的无产阶级军队的领袖。

在江西，毛根据人民战争的要求调整了他的土地政策。"鱼"需要"水"，没收财产要谨慎从事，不要与中农为敌。在共产党的修道院里长大的28个布尔什维克，伸出优雅的手轻易地抓住了把柄，毛执行的是"富农路线"。

28个布尔什维克对中国共产党前十年的历史似乎毫无记忆，那段时间也没给他们留下任何创伤。另一方面，他们所说的也不是假的，他们的批评有时是有很好的理论根据的。

毛确是把一些封建主义色彩（例如，家族政治）绘入了治理农村的蓝图。毛还不精通马克思和列宁，头脑中还残存着一些《水浒传》的思想。

甚至在语言的使用上，毛也和28个布尔什维克展开论战。他认为简单地将"Soviet"（苏维埃）和"Bolshevik"（布尔什维克）直译过来，普通农民根本就不懂它们的含义是什么，许多人都以为"苏维埃"是一个人的名字，"布尔什维克"更是象刀叉一样不为中国人所熟悉。毛总是尽量避免使用"布尔什维克"这个词，他还找到了一个有具体意义的词来代替"苏维埃"——"工农兵代表会"。

但是，在28个布尔什维克看来，毛这种做法恰恰证明了他对马克思主义把握得不准确。

1933年，毛被解除了制定政策的权力（尽管他还拥有他的政府头衔）。此时，蒋介石调集了不少于四十万人的军队，开始了第四次"围剿"，但毛已不是此次反"围剿"的负责人。

周恩来负责这次反“围剿”，1932年8月(译按：应为10月)在宁都举行的一次会议上，他取代了毛的职务，成为红军总政委。

在这些年中，周没有站在毛的一边。他相信阵地战，他认为这可以“御敌于国门之外”。他觉得毛行为古怪，在宁都会议上，他俩曾言词激烈地展开过论战。[34] 当然，周并不象毛那样强烈反对28个布尔什维克。

红军打退了蒋介石的第四次“围剿”。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是周在28个布尔什维克思想指导下的战术起了作用，还是毛朱留下的影响赢得了这次反“围剿”的胜利呢？但无论如何，这次反“围剿”的胜利使毛更加孤立。他的“胆怯的游击主义”也因此而被看成象自动化时代的纺车一样落后。

1933年4月，反“围剿”胜利后举行了一次会议，它把毛的军事威望打入了地狱。毛没有参加这次会议，他的疟疾又犯了，再一次遭受挫折而卧病在床。

那位基督徒医生赶了来并命令毛住院四个月，但他恢复的比这要快。不久，他就责备傅连璋医生为他受用的过奢伙食。他说：“我们不要忘记现在是战争时期。”这一下轮到这位医生看起来象得了疟疾。傅回忆道：“突然，我的脸红得象只胡萝卜。”[35]

毛已经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写过东西，1933年，他写了几年来的第一篇文章《必须注意经济工作》，这是他第一次涉及经济问题。[36] 自从把军事指挥权丢给周恩来后，毛就象生手一样热情十足地将自己投入到基层工作的研究之中。

他骑马巡视苏区，核算收获的粮食，组织贩盐队到国民党占领区走私必需品。他又开始聆听农民的声音了，自离开井冈山后他很少这样做。

中央发起了扩充红军一百万的运动（1933年初还不到五十万人）。每个根据地周围都筑起了土墙，称为“铜墙铁壁”。毛指出，这样扩红会夺走农田里的劳动力。他还认为，这些土墙会使红军陷入阵地战。毛在一篇谈群众生活问题的报告中说：“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

日本人的入侵再次给中国罩上了阴影。就象乌云遮住了太阳一样，它使国共两党之间的内战置于一种奇特的光线之下。他们究竟是为何而战呢？难道它比抵御外敌入侵，保卫国家领土完整更重要吗？

“满洲事件”是一个漂亮的借口，东京借机第一次踏上了它巨大的邻邦俯伏着的躯体。它的最初后果是分散了蒋消灭红军的注意力，而它的长期影响十分深远。

毛的民族主义思想丝毫没有减退，在共产党的领导人中，他差不多是唯一一个向农民宣传反对帝国主义的人。他提醒农民说，国民党干的最坏的事，是他们与洋人勾结企图从外面打开统治中国的大门。

当时人们对此感到好笑，苏区以外很少有人听到过这种说法。但十年之后，这一说法就显示出其英明之处。毛和朱于1932年4月对日宣战，但是他们已有好几年没见到一个日本人，他们所控制的中国人口也只是很小一部分（其法令只在九百万人口中生效）。

毛确有远见。

他的目标不是抽象的社会主义蓝图，也不是重复苏联的革命，而好象是江西的山沟里发生了“又一次十月革命”。

他从未对世界革命浮想联翩。中国是基础。如果中国出现危难，再也没有比拯救她更重要的事情了。假如没有中国，任何革命的说教都只能是脱离实际的知识分子的空谈。

毛开始倾向于建立一个抗日统一战线，但他当时所拥有的权力只能是谋划此事。中央还没有发表任何抗日宣言。实际上28个布尔什维克从未受到民族主义的影响，他们把日本对中国的侵略看成是帝国主义联合进攻苏联的开始。[37]

1933年12月，福建省发生了一场悲剧。一支杰出的国民党军队、蔡廷锴领导的十九路军转而反对蒋介石。蔡想和日本人打仗而不是围剿共产党，他向共产党派出了密使。

而中共却举棋不定，他们对待十九路军反叛的态度是漠不关心并兼怀敌意。王明在莫斯科谴责蔡说："在同他握手时应朝他脸上啐唾沫。"[38]在中国共产党决定帮助蔡之前，蒋已用计铲除了英勇的十九路军。

毛肯定同情蔡。他希望建立一个抗日统一战线，它包括共产党以外的所有爱国人士，只要他不是反动派。1936年，毛回忆说，中国共产党没有团结蔡是错误的。

然而，毛并没有为了蔡而使自己陷于窘境。实际上，他曾尖锐地批评蔡企图在共产主义和反动派之间寻求"不存在的第三条路线"。而更主要的是，要反对对蔡战而胜之的情绪潮流，毛缺乏必要的影响力。再说，没有胜利把握他是从不出击的。因而他只好随波逐流，这是一段使毛回忆起来会感到不安的插曲。

1934年1月，毛来到瑞金参加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他是苏维埃政府的主席，尽管已有名无实，他还得来主持会议的开幕式。会堂里挤满了一千名代表，装饰着红红绿绿的旗帜。他看到一幅标语："只有苏维埃才能够救中国。"一声礼炮和一连串的鞭炮声拉开了大会的序幕。

毛作了一个简短的、毫不说明问题的讲话。大会的所有决议都已在提前召开的中央会议上确定了。而在中央会议期间，毛要么缺席，要么难起什么作用。

此时第五次"围剿"已经开始，但是毛只能做一名旁观者。

这次“围剿”的方案是由德国人制定的。蒋介石急于彻底消灭共产党，求助于希特勒，两位德国将军冯·西格特和冯·福尔肯豪森成了蒋的军事顾问。28个布尔什维克控制之下的中国共产党也同样急切地求助于外国人，这次反“围剿”由一名德国共产党员奥托·布劳恩直接指挥，他是共产国际赠送中国革命的最后礼物。

这次代表大会被王明的盲目乐观主义思想所笼罩，因为当时布劳恩指挥的几次战斗还不算太坏。毛只好保留自己对阵地战的怀疑。他主持大会时就象一只落了毛的凤凰，谁也不会为大会解除他的主席职务而惊讶。但是，他竟没有被选入他已负责了三年的政府（人民委员会），这对他太残酷了点。

蒋开始实现困扰了他三年的“围剿”目的。一旦敌人进入大门，那么，“御敌于国门之外”很容易就会变成一场恶梦。因之布劳恩把领地看得比军队重要，而结果必定鸡飞蛋打。事情偏偏这样发生，它暴露出“阵地战”的愚蠢。

1934年的春天并没有给瑞金带来欢乐。

冯·西格特将军构筑碉堡，并用公路将它们连接起来。这一战术奏效了，因为中共也选择了把自己的军队固守在防守阵地上的战法。这便使兵力太弱而且装备低劣的共产党的军队失去寻找敌之薄弱环节、灵活机动地对之各个击破的机会，而国民党军队却能对被困的、给养不足的红军有效地实行经济封锁。

到8月，中共原来控制的七十个县只剩下六个了，甚至连长汀也落入国民党之手，许多红军将领战死沙场。

毛对此无能为力，终日闷闷不语。他处于如西方人们说的那种被“软禁”状态。

自1934年仲夏始，他就藏身在于都（瑞金以西）一座小山上的草房里。

一天晚上，朱德手下的一名军官来和毛闲谈。他带来了酒和

鸡。在那艰苦的岁月，这是再美不过的佳肴了。他们受用了一顿。

毛和他坐在院子里的藤椅上，啜饮着酒。当话题触及到令人留恋的往事时，毛对这位老部下叹道："唉，现在不再是井冈山同志们的天下了。"㊴

毛试着回到书本中去，他杂乱地记着笔记，他赋写忘情于山水的诗词，他还教他的警卫员识字。然而，听到山外发生的事情，他无法安宁下来。他又一次在交厄运的时候病倒了。

他高烧达华氏105度，这一次的疟疾发作几乎和1929年的那次一样严重（尽管博古把毛的病称之为"外交病"）㊵。从8月一直到9月底，他一直卧床不起。当疟疾加重时，又出现了急性肠痉挛，他当时肯定想到过自己是否还能恢复过来。

厄运与整个夏天同在。

傅医生带着药箱来到于都。一天，傅为毛炖了一只鸡。毛拒绝吃——这位要求甚少的病人总是说，他有一个护士就可以了，不需要医生陪着，他拒绝吃鸡。一种职业的习惯使他乐于接受那位军官送来的鸡，而不愿要傅医生为他准备的鸡。他让傅医生把鸡吃了。㊶

毛从医生的病床上硬挺过来了。当他于9月底离开于都时，他发现外面世界乱得无法收拾。然而，这种混乱也给他提供了机会。

蒋介石轻而易举地赢得了第五次"围剿"的胜利，他似乎觉得自己使中国摆脱了"共产主义灾难"。共产党决定放弃江西。

毛觉得这样做是"惊慌失措"之举，但这是博古和布劳恩决定的。红军余部开始向西北行进，希望与贺龙在湖南领导的苏区会合。

28个布尔什维克为这次惨重的失败而感到窘迫不安，所以毛又悄然回到为指挥撤退而组建起来的军事委员会里。这是一个

小小的转机。至少，毛应比几乎所有的同事更少地受到指责。

红军就象波涛汹涌的大海中失舵的小船。十万人（还有几百名妇女）的队伍毫无目的地走着，一定有很多人都意识到自己是在走向死亡。不少人却在伺机开小差。

长征就这样开始了！

两个星期以后，莫斯科用无线电传来指示，告诉中共撤离江西。

毛带了每人都备有的三天的干粮，还带了一匹马，——这是与国民党作战的战利品，外加一把雨伞和一捆书。

在同事们看来，带公文包是毛的标志，小包里通常装有文件和地图，但这次他却没带。这一点很奇怪。周围的人认为，这说明毛仍很悲观。如果他知道自己很快就会掌握大权的话，可能会把那个包带在身边。[42]

把握未来（1935—1936）

如果说未来趋向会有利于毛的话，那么，在1934年末那些个晦暗的日子里，只有独具慧眼的人才能洞察到这一点。

实际上，毛在党内的对手们在远航的一开始就风向不利（尽管博古和奥托·布劳恩在长征开始时仍处在重要的领导地位）。但是，相对于整个中国来说，共产党人的自命不凡实在有点象是犀牛背上的几只虻蝇。

中共党外的很多人（当然党内也有一些）认为，自1927年大革命失败和江西根据地被夷平以后，中国共产党实际上气数已尽。长征开始后最初艰难困苦的几个月丝毫没有改变这一前景。对毛来说，突然离开自己曾是头面领导人物的机构是令人心碎的。而且，那些留下来的人中——原则上说，他们的任务是扰乱国民党，但是实际上他们危在旦夕，与其说他们是28个布尔什维克的支持者，不如勉强地说他们是毛的支持者。

毛的弟弟泽覃是他的同情者之一，在任何情况下他都象是毛的影子，在1932年间，毛的失势使泽覃也受到指责。在1934年毛实际上被软禁的那段日子里，他仍然与毛站在一起。

没过五个月，泽覃就被逮捕并被处死（另外一位被处死的是倒霉的前领导者瞿秋白，他主要因为身患结核病而留在江西）。

毛还留下了他与贺子珍所生的两个孩子。因为当时红军规定，只有那些能够行军的孩子才能随军撤退。毛把两个蹒跚学步的孩子放在一家不知姓名的农民家庭照料，他再也没有见过他们。*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妻子中，有三十五位参加并走完了长征，贺子珍是其中之一。长征开始时她正怀着第三个孩子，这个孩子显然是在毛遭到软禁的时候怀上的。艰难的跋涉对子珍的身体是残酷的，实际上还损及了她的婚姻关系。

长征结束以后曾访问过共产党人的英国记者冈瑟·斯坦因，问毛当时是否发觉自己是少数派而且不能占上风，① 毛回答说："是的，我曾是少数派。这种时候，我所做的唯一的事情是等待。"1935年，他的机会来了。

长征在进行的过程中按其必然性呈现出自身的形态。在它胜利结束之前，甚至没有一个人称之为"长征"。开始时，只不过是艰苦的大退却**。后来，毛告诉罗伯特·佩恩："我们的目的，是摆脱围剿并与其他苏区会合，除此以外，我们还深切希望自己能够处在抗日的位置上。"③

在长征的每一阶段，主要问题都是摆脱国民党的围剿并生存

---

* 1949年以后，曾多方努力寻找他们的下落。有些中国人认为周恩来成功地完成了这一任务，并使他们受到很好的照顾。但是这两位后代——现在应该40多岁了——一直没有露面。

** 1936年春，埃德加·斯诺发现他们仍用"二万五千里行军"一词称呼这次史诗般的大撤退。②

下来。长征者每天必须做的都是四个紧紧相连的任务：摆脱在江西时三面被围的绝境；与远在西边的其他一个或更多的苏维埃政权接上联系；在中国的其他地方重建江西那样的根据地，并在这一新的根据地代表全中国抗日。

共产党的领导人只是对于前面第一个任务不存在什么分歧。实际上，确实党内的分裂具有很大的腐蚀性，以致于长征还应有第五个任务——虽不直接明了，但却至关重要——就是成立党的新领导机构。长征使成熟的共产党人有别稚童般的布尔什维克。

毛的第一方面军有三万名官兵，占长征参加者的四分之一。他们打的第一次大仗是在湘江边上，这是毛少年时代梦中的河。这次战役使党内的政治斗争几近明朗化。

蒋介石准确地判断出红军会向西北方向逃窜。在蒋强大而有力的军事机器面前，共产党损失了五万人。在极度痛苦之中，伤员们咬住自己的衣服，抑止住自己无法控制的哀叫声。

国民党消灭了将近半数的红军。面对如此巨大的代价，毛决定向博古和奥托·布劳恩的领导地位发起新的挑战。

严酷的现实是，红军不能按照原定的计划与湖南北部贺龙的苏区会合，因为蒋已部署了六倍于红军的兵力等待他们。在这种形势下，毛决定改变计划，同时向28个布尔什维克发起了猛烈的攻击。

红军应该掉头向西南进入贵州，这是敌人兵力较弱的省份，然后与四川北部的共产党军队取得联系。毛的这一观点占了上风，奥托·布劳恩向北挺进的计划告吹。

与此同时，在1934年12月的会议上，毛胆壮地指责导致湘江惨败的两个策略错误。博古和布劳恩定下的路线是一条直线，这可以使蒋介石坐等红军的到来。

同时，毛抱怨共产党人没有利用佯攻这一武器，而这在行军中是应合理地加以利用的；没有注意当地民众的情绪，也没有意

识到地形的复杂。

毛还认为红军负载过重，军队带着政府的所有装备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骡子和驴子驮着沉重的办公用具、印刷机和档案，行动缓慢。

毛在这个问题上与28个布尔什维克的斗争触及到了根本的问题：中共是继续作为流动之中的临时政府（28个布尔什维克的观点）呢？还是有计划地外撤后，相机重返旧地，稳立根基，待时机成熟后，逐步夺取全国政权（毛的观点）？

一个细节可以充分地说明28个布尔什维克的作风：长征开始时，红军实际上没有一张精确的地图。博古和布劳恩坚持带上所有的办公用具和文件，但就是没有想到带上对行军最重要的东西（一个年轻的瑞士传教士被捕后，被控帮助国民党干事。但是在他答应帮助红军指挥员读一张法文的江西省地图后，减轻了对他的处罚④）。

28个布尔什维克没有任何军事经验，而毛和朱在近十年的战争中经验丰富。博古在1932年成为共产党的领导人时还没有看到过打仗，长征开始时他也才只有26岁。布劳恩——尽管他是共产国际派给中共的军事顾问——也没有受过军事训练或参加过一场战役。而且，布劳恩根本不会汉语。

大约54%的长征者都是24岁以下的年轻人，和他们相比，42岁的毛是年龄较大的。只有4%的人年龄在40岁以上，甚至还有11～12岁的少年充当司号兵、勤务员、送水员、通讯员，或只是作为福神。傅连璋医生宣称，根据他的判断，在这些天真朴实、血气方刚、出身于农民的长征者中，90%的人没有过性生活。

最初的失败应归咎28个布尔什维克，而毛不应为此而受责。事实上，毛在党内的影响正在迅速上升。他不可能在一夜之

间赢得领导权，但是在湘江战役以后的几周时间里，他的威信在稳定地提高。

他开始用自己的方式制定政策。文件烧毁了，办公用具被扔进深山峡谷；多余的枪支弹药送给当地可信赖的农民；简装轻兵，昼伏夜行，这样部队的行踪就不会轻易暴露。

用能打动人心的标语口号，向部队解释每一次即将到来的行动，很多村庄都召开群众大会宣传红军的神圣使命，并招募新兵，具有文艺天才的战士还给群众唱歌跳舞。这一切都是毛的主意。

有一次，一个连队被置于一个很显眼的山头上，故意分散地暴露自己，看上去好象有很多人在那里。国民党军队真的就把这些忙碌的士兵当成了红军主力，被红军窃听的国民党电台发布的胜利消息说："红军主力已陷入重围。"与此同时，共产党的大部队在背后向国民党军队发起了进攻。

这种典型的毛主义的声东击西战术干得非常漂亮。一位将军回忆说："整个战役，就象猴子在狭窄的胡同里耍弄一头牛。"⑤

这种战术使得红军能够渡过220米宽的水流湍急、恶浪滔天、两岸尽是陡峭岩石的乌江。蒋介石好象已经觉察出他真正的敌手正在向上游挺进，便飞到贵阳亲自安排二十万特别部队，想拦截、阻止他们通过贵州到达富庶的四川。毛蒋争雄的态势开始形成。

红军占领了富饶的古城遵义。用计之妙使朱毛开始享有魔术师的声誉（红军必须使用这种办法，因为拼凑起来的国民党军队与红军的力量之比是100:1）。

红军首先占领了遵义以东十英里处的一个村庄，抓获了一批俘虏，这些人对这次谋略的实施有关键作用。红军审讯者轮番劝诱威逼这些俘虏，给他们银元，耐心诚恳地给他们讲"苏维埃道路"的优越性（具有当时特征的中国社会主义）。

共产党人用这种方法很快就获得了遵义驻军的全部情报，也

搞到了他们的制服。他们接下来的一幕与其说属于中国战争史倒不如说属于中国戏剧史。

当夜，红军伪装成作战归来的国民党军队，他们穿着国民党军服，吵吵嚷嚷地向遵义靠近，讲着当地的土话，甚至肆无忌惮地吹起军号通报他们的到来。

在漆黑的夜里，他们和城堡上的守军讲着当地的土话，被当作是自家人。他们还解释说，连长在和红军的战斗中被打死了。守军还没来得及怀疑，他们已进入城里，手中举着刺刀高喊："我们是中国工农红军！"

当天晚上，毛睡在当地一个小军阀的一间雅致的楼上卧室里，第二天上午很迟才起床。

这十二天，毛在遍是园林宫殿的优美城市里，睡着柔软的床，得到了很好的休息。贵州的大部分地方都被红军从军阀手中"解放"(这是个新术语)了出来，红军现在已作好了进川的准备。

在遵义，毛还成了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在他得到很好休息的军阀宅院，毛不失时机地召开了会议。会上，他扭转了由28个布尔什维克当权所带来的局面，并赋予长征以新的意义。

毛并不操控那归属于他的强大集团，也不属于业已存在的两派：28个布尔什维克和黄埔军校派（周恩来是其中最知名的一个）。

毛是一位值得信赖的领袖，因为他与朱德一起在江西的反"围剿"战役中有过辉煌的战绩。但是，他的行动之所以成功是因为28个布尔什维克明显地失败了。共产党的一些关键人物看到了这一点，他们随时都会收回对毛的疑虑。

周恩来在遵义会议上起了关键作用。在毛和朱德发言后，及博古大喊大叫地为自己辩护后，周作了极为重要的发言。他转向毛这边，对毛作了这样的评价："他一直都是正确的，我们应当听

从他[6]。”他还让出了自己在军事委员会的职位并敦促让毛接替。

周发言后，28个布尔什维克再也没有获得主动权。而且自遵义会议后，周再也没有对毛的领导地位或思想提出过根本性的挑战。

毛重新获得的权力主要在军事方面。至少在整个长征期间，枪杆子居一切权力之首。他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头号人物，并从此入主政治局*。这使他比红军在井冈山或江西时的任何一位将领都拥有更高的权威。朱德仍是红军的总司令，而且继续支持毛。

毛在遵义会议上提出了一系列策略，这些策略可以说是他的杰出军事思想的总结。

• 敌强我弱，红军须集中力量打歼灭战。

• 不打无把握之仗，大踏步进退，以捕捉战机。

• 诱敌深入，避免打阵地战。

• 红军既是战斗队，又是宣传队。对犯错误者应予以教育，而不能秘密处罚，应让每一位战士都知道下一步行动的目的及危险所在。

在该城一座天主教堂里举行的群众大会上，毛解释了这些方略，同时提出了未来几个月的口号："北上抗日。"

遵义的十二天改变了长征面貌，给这次惨败的军事撤退赋予了新的政治使命：为着民族和革命的双重目的。

---

* 毛没有成为党的总书记。28个布尔什维克的成员张闻天——对博古和布劳恩持批评态度——接过了这个职务。毛的职务是军委主席，在这方面他成功地取代了周恩来和布劳恩（校注：毛只是在遵义会议之后进入全权指挥军事的新成立的三人军事小组）。

1935年，中共还没有设后来是党的最高职务的主席一职，但是，总书记也不象以前那样是最高职位。遵义会议后，党的不明确的领导机构在北京公布的官方史料中也可以看出来，他们只是简单地说毛从此获得了"领导地位"。

很明显，中国革命已经从莫斯科的影子中摆脱出来。斯大林现在有更重要的事情做，而不再顾及四处流窜的中共，他也根本不相信这批农民军队就能完成中国革命的艰巨任务。

更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不再由一个令人敬畏的苏联人来领导。这决非偶然，正是在与莫斯科接触十分困难，共产国际与中共之间联系几归消失的时刻，权力移交到了毛的手中。

毛依然景仰十月革命。三十年以后——当他有充足的理由不再讲苏联的好话时——他告诉安德烈·马尔罗，当时向西北去的一个原因是“以能与苏联接上联系”。⑦但是在毛看来，中国革命的重心还是应该在中国的农村。

另外在党和军队内部，毛在组织方法上也逐步对斯大林主义进行抵制。这也特别表明他对人的改造所抱的信念和他那灵活、植根于本土以及精神高于物质的军事策略是正确的。

毛的最终目的是要到达陕北，并从那里开始抗日。同时，他还想与四川北部张国焘的军队会合，在这个神话般的省份建立苏维埃政权。

遵义休整后，长征重新开始时，毛看上去整洁潇洒。警卫员发现，毛穿上了一套特制的合体的灰军装。

毛有一匹马，但只是在十分疲劳时才骑上去。有两次他染了疟疾，病得很厉害，以至连马也不能骑，不得不躺在担架上由两名战士抬着行军。

在他私人的小包袱里总装着雨伞和书。里面的东西不断地更换，《水浒传》却是一直带在他身边。没有材料表明，毛在长征时带了马克思或列宁的著作。

他常常通宵达旦地工作，但有时他也破惯例在自己的吊床上睡到正午。他一直把身边的几位年轻人当作是自己的助手，这些年轻人包括秘书、卫生员和兼作勤务的警卫员。

一位年仅二十岁的警卫员陈昌奉，慢慢地才知道毛的严格要

求和喜欢独处的生活方式。队伍一停下来过夜，毛马上就要开水，如果情况紧急，他会整夜不眠地工作。每一次停下来，陈就要赶快为毛布置好工作的地方——一个小岩洞或一块干净的石头。[8]

有时毛也能稍稍享受一下，他的工作人员十分乐意把他安排去某家有院子，床上铺有稻草，有可以置放文具和电话的书桌的地主家里休息或者工作一两个晚上。

如若能找到香烟，毛即使在最晦气的日子也能够振作起来。有些资料说，在部队即将开始作战时，他的士兵甚至用鸦片与对方换取香烟。在没有烟草的时候，也就显示出了毛的灵活机智，他把各种各样的带有刺激性的树叶当作烟草的替代品。奥托·布劳恩也有这一嗜好，寻找上好的烟草或许是这位爱大惊小怪的德国人和这位稳重沉着的中国人共有的一种热情，有时他们共同进行一些冒险的试验。

夕阳的最后一抹晚霞染红了天空，毛身上灰色的军装也变成了桔黄色。明月下，错杂的乱石顿时犹如正在打斗的龙。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部队燃起松枝火把照亮前进的路，悬崖峭壁张着血盆大口好象是在寻找机会企图吞噬这支幽灵般的队伍。

每当这种时候，毛就会写下几首诗词。他感到自己“离天三尺三”；他看鹅毛大雪犹如“飞起玉龙三百万”；湍急的河流在他笔下可使“人或为鱼鳖”；层层群山在他看来是“原驰蜡象”。

毛在长征的路上真正地发现了自己。尽管生活艰苦，有他不熟悉的地理上的挑战，有死亡的威胁，有党内的派系斗争，还有几次红军几乎全军覆灭。但是，十个月六千英里的长途跋涉充分显示了毛那寻常难以发挥的天才。

反常的是，毛并没有受个人生活的牵制，而是开始了一个超群出众、鸿才大展的时期。他独身单处却总是想着集体的使命。虽然说贺子珍也参加了长征，但是在十个月的时间里，她可能一直都没有和毛在一起。当时为毛服务的几个亲近的人撰写的回忆

录中甚至没有提到她。毛与他生存下来的弟弟泽民的关系也不密切，泽民当时负责照顾财经、档案和物质供应工作。

另一方面，长征时期可能是毛诗词写作最多的时期。二十年后他有些留恋地说："在马背上，人有的是时间，可以找到字和韵节，可以思索。"⑨诗词把大自然和历史融合在一起，这种融合最终成了毛这位革命家和东方第一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成功的秘诀。

他把崇山峻岭看作战斗序列的一部分：

山，
倒海翻江卷巨澜。
奔腾急，
万马战犹酣。

山，
刺破青天锷未残。
天欲堕，
赖以拄其间。⑩

毛似乎在土地中找到了革命的证据。横贯十一个省的长征的广泛阅历，可取代莫斯科的新权威，毛努力使这种新权威面对中国现实。

长征结束时，毛甚而面对群山又发灵感，将它视作超出中国自身革命之外的世界和平的象征：

而今我谓昆仑：
不要这高，
不要这多雪。

安得倚天抽宝剑，
把汝裁为三截？
一截遗欧，
一截赠美，
一截还东国。
太平世界，
环球同此凉热。⑪

毛又是一位探险家，在一次又一次的战役中，在他的国家的广袤的土地上，他看到了约二十多年前从书上得知的庙宇山峦。他曾经离开华南，去过北京，然而在那里他并没有感受到自由的气息。现在，他自主旅行、无拘无束，他把壮丽的山河视作生身之地，视作冶炼自己新的革命方式的熔炉。

1935年的毛，最真实的形象应是：一位视野开阔的诗人；一位带着农民的精明和将军的眼光悉心研究地图的战略家；一位远离家人、朋辈，以哲人度量同其热切诚恳的警卫员交谈，或抽出片刻教给秘书几个生字的领袖。

他的大多数重大时刻存之于孤寂独处中，然而他又象高山一样引人注目。在他作为中国的摩西的岁月里，他与大地谈心，与高山交流，而不需要妻子、朋友或参谋这样的媒介关系。

四川是一个更硬的坚果，比毛预料的还难敲碎。蒋介石在现场手忙脚乱地亲自指挥对红军进行大规模的反击，他拍电报给他的官员们说："此役命系党国，务将红军困在江南。"一部分地方军阀也振作起来，投身到非同寻常的防守大战中，准备对付红军。

张国焘放弃了在四川北部的苏维埃根据地，领着红军悲观消极地向荒无人烟的西藏地区逃窜。这意味着，毛在北渡长江时将不可能得到张的精锐的第四方面军的帮助，这使蒋能够把毛的

运动着的部队围困在令人生畏的江河横贯之地。

在入川的使人精疲力尽的艰难行军中，红军抵达茅台镇。这里是闻名于世的中国烈酒之乡。共产党人发觉自己已置身于酿酒作坊之中，排列的一百只大缸，每一只都盛有二十担酿制的酒。

年轻的红军战士从未享用过这种东西（或其他任何一种），有些人认为缸中盛的是洗澡水，他们把自己疼痛的脚浸泡其中！奥托·布劳恩经验较多，脸上马上露出愉快的笑容。有些红军战士面对如此之多的酒有些不知所措。当共产党军队离开时，一滴"洗脚水"也没有剩下。

只是因为有了毛英明的声东击西战术，红军才冲破了蒋的封锁。现在看来，最佳方案是到云南兜个圈子。毛假装要攻打贵州省会。因为蒋的军队正在那里高枕无忧，等待着最后的胜利。毛对待发牵制敌人的部队说："只要将滇敌调出，就是胜利。"

1935年4月，毛带着他的部队进入云南。

云南这地方与越南为邻，毛在这里遇到了春天的炽热。稻田里的禾苗郁郁葱葱，圆坦的山峦之间是鲜艳的野花和纷飞的蝴蝶。但是他必须忍受炎热的气浪。蒋象一只追着花朵不放的蜜蜂，已经到达昆明，带着由他亲自指挥的10万精锐部队。

毛对昆明又发起佯攻。这使他得以渡过长江。——长江的这一段称为金沙江，它把云南和四川分隔开。金沙江穿过的这一带山势坡度递降，比率每英里为18英尺，故湍急的江水穿山越石，倾泻而下。蒋确信他已把红军困在荒凉的江岸，便命令烧掉靠近红军路线的所有渡船。

但是，毛的足智多谋弥补了人力和武器上的不足。在林彪率领部队佯攻昆明，另外一支部队在蒋的眼皮底下吃力地架着竹桥时，毛迅速派遣一营兵力向西到达另一个渡口。由于伪装示形于敌，使得共产党的军队可大胆着手抢渡金沙江。这些比毛读而不厌的古典小说中的农民起义故事毫不逊色。

装扮成警察、国民党侦察兵和征税人的先遣队，乘坐一只木船闯过湍急的江水，摸进守军的院子里，发现他们正在打麻将，枪支都倚在墙上，便马上全部缴了他们的械。蒋介石狡诈多谋却不够灵活，他没有想到这里的渡船也应该烧掉。在其后九天的时间里，六只大渡船把红军接过金沙江，进入四川。

红军进入了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在这蛮荒之地，人们的生活方式也极端野蛮愚昧。对于他们，毛得把原则性和灵活性结合起来。

他坚持让他的部队以礼对待当地的部落民，即使对强取豪夺的倮倮们（彝族的一个部落）*也是如此，[12]红军拿每一只鸡或每一两粮食都付给银元。这是因为毛一直认为少数民族同胞在旧中国受尽欺虐，他们在未来的社会主义中国应成为平等的一员。

但是，毛也挑起部落之间的纷争以便从中渔利。他使用的手段使人想起他在井冈山时对待土匪的方法，同时也预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七十年代外交政策中的均势策略。

毛发现倮倮人分为“白倮倮”和“黑倮倮”。二者的相互仇视不亚于红军与国民党的相互仇视，这使他偏向黑倮倮一边。他对他们说，并不是所有的汉人都是坏人，就象并不是所有的倮倮都是坏的一样。他建议，黑倮倮应和红军站在一起，反对他们共同的敌人“白”汉人（蒋介石）。

不久，毛的一位将军与当地的一位首领歃血结盟为兄弟，叩头拜见倮倮的女王**，并保证给她二百支枪和一千块银元，让她仁慈地允许红军通过她的领地。

如果说这就是毛主义的话，至少是奏效的，不管28个布尔什维克对此作何感想。结果，几百名倮倮参加了红军，并到达中

---

* 毛的一位同事（长征中失去双腿）后来对埃德加·斯诺夫人说：“这些倮倮们是最好的没收者，发现有人比我们更擅长于此道，我们并不觉得愉快。”[13]

** 刘伯承将军与之歃血结盟的彝人首领小叶丹，是男性。——校注

国的大西北。

红军长征渡过的最后一条主要河流或许是整个军事经历中最可怕的河流。蒋决心把共产党人堵在大渡河以西，这样他们就会消失在西藏东部的雪山里。据说,《三国演义》中的英雄和太平天国领袖石达开（1831——1863）都丧生于这条河边。毛对此知道得很清楚，这也是他所仰慕的两次起义中的故事。

蒋介石飞抵重庆，再次坐镇指挥以根除共产党。他也知晓这两次著名起义，不过非常藐视它们。他的飞机向红军撒下传单说毛正在走"石达开的路"(这位太平天国的领袖失败后被处死碎尸)。

大渡河水凶猛异常，无法泅渡，即使渡船也难免有倾覆的危险，唯一的一座桥被国民党守军牢牢地把守着。

泸定桥象杂技演员走的钢丝一样悬在半空中。它由十三根铁链组成，比湍急的水面高出二百英尺，两端分别固定在峭壁之上，巨大的铁链上由一块接一块的木板铺成桥面。

作为一种欢迎方式，国民党守军把位于红军一方的半数木板全部拆走，只留下稀疏的几块连住铁链。毛认为，正是因为延误时机曾使过去的起义军在此覆灭。为了争取时间，红军战士在二十四小时内奇迹般地走完了最后的八十英里路程，到达泸定桥。

先遣队员象猴子一样从一根链子跳上另一根链子，以完成殊死的任务。他们用带子把手榴弹和毛瑟枪捆在背后，逐步靠近，踏上有木板的另半截铁桥，向敌人的桥头堡接近并展开冲击。很多人中弹掉入激流之中，第一批的二十二个人只有五人到达了可以朝敌军投掷手榴弹的地方。

在那天下午的大渡河上，精神战胜了一切。其他人尾随这五个人，集中火力强攻。国民党守军茫然不知所措，他们开始抽掉木板，然而又太慢，于是就浇上煤油烧木板。

但是毛的战士象被一种强大的吸引力拉着似地勇往直前。越

来越多的战士跟了上来——枪声变稀——他们发出令人胆寒的叫喊穿过着火的木板。似乎是被红军疯狂的英雄主义吓破了胆，敌军不战便脱阵仓惶溃逃。大约有100名国民党兵就地参加了红军。

自愿报名参加抢渡大渡河的所有先遣队员的年龄均在25岁以下。

下一步就是与张国焘的第四方面军会合，恶劣的自然条件和少数民族部落居民使这种会合更加困难。以后发生的斗争使毛不得不承认，蒋介石并不是唯一的难题。

大雪山的气候条件和海拔高度变化异常，半下午天色就暗了下来。没有大米，食用青稞，使人肠胃不适，暴风雪接连不断，土豆般大的冰雹从天而降。在海拔一万六千英尺的高山下，成百上千衣衫单薄的战士，特别是气血不旺的南方人，被严寒摧垮了身体，一些人永远地躺在了四川的雪谷之中。

更麻烦的是蕃族部落居民凶暴残忍地从山上滚下巨石，以此表达他们对红军入侵的不满。

毛努力用吟诵诗词和讲故事使战士们振作起来，他用辣椒和生姜熬成热汤给这些冻僵了的战士们暖和身子。艰苦的生活，可能还有将与张国焘的会合而引起的焦虑，使毛感到软弱无力，他又一次患了疟疾。⑭

毛的健康观是，精神有极重要的作用。毛与参加长征的两名医生——傅连璋、姬鹏飞（姬后来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长）谈到了由于心理原因而引起身体疾病的问题。他相信，有时人们不需服任何药物单靠极大的希望也能生存下去。

毛把生病归罪于生理状况以外的因素，这是受自身经验的启发，因为毛的每次生病总是与他事业上的受挫巧合。

的确如此，1923年在上海（他因为亲国民党的态度而受到批

评)；一年以后的中共第四次代表大会期间（他失去了在中央委员会的职务)；在1925年冬和1926年隐退到韶山的日子里（因为农民在革命中的角色问题，他的人事关系很紧张)；1929年末（来自李立三的压力）以及在1934年夏天（与28个布尔什维克的冲突使他实际上被软禁了起来)，他都患病。

现在，当他郁闷地想到与张国焘的会合时，焦虑再一次成为生病的前兆*。[15]

一天，一块不象是部落蕃人凶狠地投来的石头滚到一名红军战士脚下。石头上系着一张纸条，上面潦草地写着："我们是红四方面军，在伊涅河40里的上游处，有一座用绳子结成的吊桥，你们可以从那里通过。"战士们欢欣鼓舞。

毛则不然。因为他正面临着一个人的挑战，这个人自认为他应是共产党的领袖，尽管他没有参加遵义会议。

毛已有八年没有与张见面了，不过并不是躲避他。两人都不象28个布尔什维克，尽管张也去过莫斯科但并不了解苏联。他们二人都比28个布尔什维克有经验，他们的相互不信任也早于28个布尔什维克。

1918年第一次见面时，他们的风格和背景明显地相距甚远。地主的儿子张是北京大学的注册学生，而毛则是一个无着落的旁听生。在毛置身于农村运动之后很久，张才开始参加城市的劳工运动。

长征又带来了新的分歧，张认为毛是在滑向"游击主义"。他批评共产党领导全国抗日的想法是痴心妄想，并认为遵义会议是"独断专横"的，所以遵义会议的决定应该修正。[17]

毛站在自己的立场上，认为张怀疑建立苏区根据地的思想。他判定，由于张"逃离"根据地，两度使毛朱的部队失望。在他

---

* 1938年在延安，毛对梁漱溟承认，他不时地为神经衰弱所困扰。[16]

的眼中，张的第四方面军没有丝毫的共产党人精神，却有一种高人一等的优越感。

在远在川西的某地一条路边，红军战士搭起了讲台，树起了旗帜和标语。毛站在大雨中等待着张的到来。一会儿一支有三十名随行人员的马队飞驰而来。

毛张紧张关系的本质根源在这些漂亮的马身上就得到了鲜明的体现。张的军队（五万人）比毛朱的军队人数（四万五千人）多。*张的部队衣着整齐，装备精良，和整个长征的生活比起来，他们的隐蔽式生活好象是在度假。⑱

当张走近前来的时候，毛突然对身边的一个人大笑着说："不要羡慕那些马。"他可能回忆起自己的部下没少吃不时作为补给的马肉。

张对这次会面作了不同的描述："我一看见他们，立即下马，跑过去和他们拥抱握手。"⑲

一位亲毛的军官回忆说："张国焘在他的三十名随从的陪伴下骑马而来，就象演员登台演出一样。朱德和毛跑上前去迎接他，他却在原地等着，甚至没有往前走半步。"⑳

情形就是这样。可以肯定地说，毛和张彼此对对方和对方的部队都存疑虑。

当天晚上，毛、张和其他主要人物一起共餐。张以一个失宠者的留心注意到饭桌上没有进行任何严肃的谈话，他回忆说："他们甚至没有兴趣听我介绍四方面军的情况。"㉑

足智多谋的毛以很少的交谈使笨拙的张感到烦躁不安。他自己是一个喜欢吃辣椒的人，因此吹嘘说，喜欢吃辣椒与成为一名革命者是有联系的。张可能并不喜欢吃辣椒，他的回忆录中有一个产生分歧时无趣的镜头："毛遭到了博古的反驳……他不喜欢吃

---

* 原文有误。当时一方面军不足二万人，四方面军有七、八万战斗部队，另有几万名非战斗人员。——译注

辣椒。”

如果说这是长征中的最低点的话，却有其原因。两支部队企图融合在一起，各有自己的特点、经历和目的。几个月的时间，终于出现了问题：性格的冲突、惯常的骄纵、穷苦士兵对未来的美梦。

毛和张各自以自己的方式统率军队，而且谁也不想失去对自己军队的控制权。

为了未来，毛希望继续北上以便抗日；张则更愿意呆在西部积蓄力量，因为他对这里已较熟悉了。

8月份，政治局在毛儿盖召开了重要会议。这一地区的居民主要是藏族，毛住在一家藏民的家里。这是一栋两层的木制房子，一层喂养牲畜，二层住人。政治局会议在一个喇嘛寺里举行。

毛显然得到了大多数人的支持，但是，张统率着红军中最精良的部队，因此达成了妥协，两支部队分别向北进发。

但是，在执行这一决议时出了问题。毛张关系的恶化使张找到了借口——地形恶劣——不再向北而是掉头向西。毛则率领部队从四川西部骤然向北，好象是害怕张的部队会从后面向他的人发起突然袭击。不管怎么说，象他一生中许多关键的时刻一样，在毛儿盖发生的事使毛处于生涯中最危急紧要的关头。他终究不能与张国焘抗衡。

令人费解的是，朱德这时是随张一起向西而没有和毛一起向北，由此也可以看出分裂的严重性。毛在这种转折关头一定产生过动摇，他后来说朱德是在枪口的威逼下才这样做的。张则坚持说朱德和他在一起是他自己的意愿，因为他不满毛以军事天才自负。

真理在两者之间。

朱当时的动机是复杂的，在以后的岁月中，他拒绝谈及此事似乎可以证明这一点。原因之一可能是他认为自己是四川人，希望留在他自己的天地里。另外，也可能是对毛的专横的工作方法的一种报复。

但是，朱真正关心的或许是分裂本身。他可能是分兵北上这一妥协政策的制造者，他之所以决定随张国焘向西，作为一种策略，可以防止第一和第四方面军的火并。

总之，一年以后，朱德与张国焘一起到了毛所在的延安，从此对张很少作什么评论。

除非这一出戏是毛故意安排的，但是又不象。毛在从毛儿盖继续北上的艰难跋涉中，身心一定都遭受折磨。

在甘肃过大草地是长征中最恐怖的日子。泥潭、饥饿、当地居民（回族）的敌视骄横和对毛的一系列政策的不明了，使毛丧失了上千名战士。回族女首领对汉人深怀敌意，她威胁说，任何给红军提供帮助的人都将被开水活活地烫死。[22]*

红军不得不为求得食物而第一次杀人（不然，他们只能吃松果、蘑菇和青草）。毛后来说："这是我们唯一的外债，有一天我们一定要偿还当时不得不从藏民那里拿走的给养。"[23]没有材料证明他们这样做了。

毛奇怪的谈论或许是尖刻的嘲讽，五十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对西藏的一些措施做法，或许应该与1935年藏民对毛的做法经历有关。

长征一拐就要结束了。毛的部队在越过六盘山之后到达陕西，共产党领导下的一支小部队已经在那里，徐海东欢迎这批穿着破衣烂衫的幸存者。**毛走向前去平静地问道："你是海东同志

---

* 此段失实。——校注

** 这支队伍从三十年代早期开创的江西苏区出发到达陕西，与陕西革命力量汇合。陕西革命力量是在十六名陕西青年领导下，由二十年代的农民运动发展而来的。1926年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毛曾教过这十六位青年。

吗?”[24]他果然就是。长征的恐怖和壮烈就此结束。

在时而酷热时而严寒的恶劣气候条件下，毛跨越了二十四条河，翻过了十八座山。等他到达西北黄土高原时，*他的一年之前离开江西的士兵只剩下了10%。

在那个激动人心的时刻，毛只说了句:“谢谢你不辞劳苦地来接我们。”那天晚上，他平生第一次睡在黄土窑洞里。

长征将毛“造就”为一个把思想和行动结合在一起的人，将他推至于中国最有希望的政治领袖的地位边缘。而且给他提供了一支钢铁般的队伍，他们一直和他站在一起，直到六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

的确，长征曾是一场大退却，[25]而且直到1935年底，共产党的命运还是前途未卜。然而，长征具有深远的影响，红军走过的路程相当于美国东西跨度的两倍。毛之于中国犹如摩西率领以色列人走出埃及。[26]把一个由不同成份组成的群体加以锻造，使之变成一种对自己事业深信不疑的强有力的运动。

长征还有宣传的功绩。一年时间经过了有两亿人口的居住区，战士们不停地宣传他们的事业。毛坚持认为，一夜的休息不可能干别的，但至少有时间教农民写六个字:“打土豪，分田地。”

长征者都象是预言家，每一英勇的创新举动似乎都证明了明天的社会主义中国的到来。

一切崭新的社会制度都是起源于理想——资本主义的初始阶段也不例外——共产主义中国就诞生于长征的汗水、鲜血和冰雪之中，它激发了战士们对新社会的渴望，也培养了他们的使命感。毛泽东曾是他那个时代的摩西。

没有年轻战士的勇敢顽强，长征不可能取得成功，这些理想

---

* 黄土高原是中国若干世纪水土流失形成的贫瘠黄土地，有的地方现已形成戈壁沙漠。——校注

主义者只有这一条路可走。运气也是一个因素，贵州和云南的军阀如果来真格儿的，会把红军一举粉碎。第三个不可缺少的条件是毛的魄力和手腕。

.毛在领导长征时充分显示了他的政治天才。在他看来，共产党的首要任务是领导中国人民抵抗日本的侵略。这一事业使“毛主义”的所有成份结合成一个相互关联的整体，正是因为这个整体，提出了西北才是目的地，提出了江西惨败后共产党继续存在下去的理由。它把共产党从宗派主义的牢笼中解放出来。在千百万还不知道马克思主义为何物的中国人民眼中，他们成了爱国者。

毛占据中国共产党的最高职位不是单纯凭借他的组织才能，不是莫斯科的恩赐，也不是因为他创造性地运用了马克思主义。他的崛起是因为他有持之以恒的目标和坚韧不拔的意志，因为他把一些简单的心理和社会真理付诸行动。

思想观的程式化是以后的事情，是毛有时间对之作深入思考的结果。

现在，毛已将中国共产党扎根于自己的国土，他对中国的了解比对任何别的事物都更充分，这使他能够做28个布尔什维克不可能做到的事：使中国革命真正地成为中国革命。

在离陕西还有几天路程的六盘山上，毛写了一首展望未来的词：

天高云淡，
望断南飞雁。
不到长城非好汉，
屈指行程二万。

六盘山上高峰，

红旗漫卷西风。
今日长缨在手，
何时缚住苍龙？[27]

“苍龙”是七合星以里东星座的名称，在毛的词中系指日本。* 抵抗日本人的侵略确实是以后十年压倒一切的任务，长征的结束只是这一任务的开始。

---

* 词中的苍龙系指蒋介石。——校注

抗　日（1936—1945）

在大西北，毛有了施展才能的机会。他有自己的章程："延安道路"。"延安道路"很快就成了一个含义无穷的用语。

三十年代的陕西是一个苦难深重、愚昧不开、没有什么前途的地方。①

农夫们穿着粗棉蓝布衣，头上箍条毛巾。他们的饮食与南方有很大的不同。很多人不知道北京在哪里，也不知道日本人是谁。

1928—1929年的大饥荒，陕西至少有三百万人饿死。毛有时会发现整个村子没有一个六岁以下的小孩。②

有人告诉埃德加·斯诺，他看到农民在拆房子，卖了以后交纳赋税。另一个人则说他亲眼看见一头猪的转卖得支付六次不同的税。

在南方时，近代帝国主义的侵略激起了毛的怒火。但是，帝国主义这时还没有渗透到中国的大西北。毛发现延安没有一个西方的"剥削者"。另一方面，陕西自古以来，一直是中国北部的战

略要地，这是中国共产党选择这片黄土地作为他们活动中心的原因所在。

毛的方案是代表整个中华民族抗日，同时在国内的斗争中锻炼共产党的队伍。

因为共产党有坚定的抗日信念，红军的队伍在其后的三年中迅速壮大。因为毛是一个热情的民族主义者，同时又是一位共产主义者，因而他赢得了胜利。没有他，中国的共产主义事业可能就不会这样成功。因为他不能容忍任何对他的“延安道路”的反对意见，所以他要在不断扩大的中共这块纤维布上熨平任何非毛主义的皱褶。

总部开始设在保安。1937年1月迁到一个较大而且比较安全的城市延安。毛的延安实际上是共产党抗日游击战争的训练中心。

延安有三千年的历史。在1938—1939年日本人的飞机把它炸成废墟之前，延安一直保持着古老的风貌，城墙环绕，依偎在黄土山的怀抱中。建筑物倒塌以后，窑洞成倍增多。

窑洞就是在土山上打一个洞。前有拱形门廊，装上纸糊的花窗格，地面铺着灰石头，后墙是匆忙整理而就的山坡。

毛在陕西这个前哨基地的十年中，共住过四个这样的窑洞。

他知道充分利用空间。他的窑洞有三间石灰水粉刷的小屋，他把旁边的一间辟出作为书房：桌上点着蜡烛，近处有一瓶烧酒，③摆得满满的书架上似乎没有外国书。④

他的一件小小的奢侈品是他的木澡盆。他坚持要有一张南方式样的木床，四根柱子，挂上蚊帐。他一直没有适应北方农民睡的炕，尽管在保安时他也曾试过。

日本人的轰炸把毛从他的第一个窑洞里赶了出来。他之所以放弃第二个窑洞，是因为附近正在建一个礼堂，上午叮叮当当的敲打声常常把这位迟睡的人从梦中搅醒，因为这时候对他来说还

是半夜。他住的第三个窑洞在一片枣园里，中央委员会的办公地点也是在这片宁静的树林中。随着战争的加剧，毛希望离军事委员会的办公地点更近一些，因此他再一次搬家。⑤

每一个窑洞的前面都有一块平地，有一把安乐椅和几个石凳，毛一般还有自己的小片菜地。

毛的日常生活和工作都在逐步变好。直接参与打仗的日子对他来说已成为过去，特别是1939年以后，不时地有飞机来轰炸，但是他再也不需站到战斗的最前线。

当地老乡讲的话要过几个月的时间才能听得懂。毛一天到晚听到的大都是这种急促的土话，几乎没有遇到会讲中国官话的人。陕北根本不出产大米，因此毛不得不把金黄色的小米作为自己的主食，偶而还能吃到额外补贴的羊肉。

毛把他的年轻的警卫员送进了学校，他对陈昌奉说："你已经跟着我六年了，一直没有很好的学习机会。"陈说，一想到将要离开自己的首长，就感到非常难过、激动，泪水便流到他给毛端来的洗脸水里。

毛不再需要贴身警卫和忠心的仆人，他有了更多的同志。另一方面，在延安，他也不再希望一位文盲青年作他夜间闲聊哲学问题的伙伴。他不久就有了新妻子、很多的来访者和一些亲密的朋友。

如果说陈昌奉的掉泪是因为他不愿脱离与毛的亲密关系，那么他去上学时毛送给他本子和铅笔，则总括了他们俩有别以前的有规则的生活的开始。

现在，在毛的视域里，日本和俄国再次同时出现。

毛第一次听说俄国时，只知道它是中国的剥削者，是一个长期陷入泥潭的专制独裁国家。十月革命以后，布尔什维克的苏联在他看来是世界的希望。然而，毛开始忽视斯大林对中国共产党

的建议。他在权力方面的上升，是作为中国大地的儿子战胜亲苏的28个布尔什维克的胜利。

日本给毛的第一印象是一个英雄的国家。1905年战争表明日本已称雄亚洲，也显示俄国力量的开始衰弱。即使在日本开始对贫弱的中国长期施以侵暴以后，毛仍相信中日有发展成为兄弟关系的可能。然而到了三十年代末，毛成了抗日的强有力的号召者。这似乎成了他衡量一切的标准。

毛的抗日思想实际上并不比一个说中国将可能死中求生的预言更深刻。

三十年代末，在毛看来，是日本而不是苏联可能会让中国落入共产党之手。

可以肯定地说，日本无意之中帮助了中国共产党。相比之下，莫斯科曾公开宣布要给中国带来社会主义革命，但是毛感兴趣的只是结果。二十年代，没有斯大林的帮助，毛也一样会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人物。但是，如果没有三十年代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毛不会在1949年成为中国的最高领袖。

1936年间，毛显然已意在恢复与蒋介石的统一战线。而这种统一战线的方略曾在1927年引起了惨痛的破裂！现在毛又要同杀害了他的第一个妻子、他的弟弟、他的继妹和他的近乎半数的亲密朋友的集团实行联合！象一对昆虫一样相互厮杀十几年的两军将要再度合作！

毛之所以改变态度希望与蒋采取共同的行动，有几个原因。其中之一是他对祖国深挚的爱。长征期间他就渴望国家的统一，1936年早期写的一首普罗米修斯式的词表达了这一点。整首词用了一个质朴的题目《雪》，可内容并不谦朴。但是，如果说词句豪放激荡的话，那么它不仅代表了毛本人，同时也代表了中国。

北国风光，
千里冰封，
万里雪飘。
望长城内外，
惟余莽莽；
大河上下，
顿失滔滔。
山舞银蛇，
原驰蜡象，
欲与天公试比高。
须晴日，
看红装素裹，
分外妖娆。

江山如此多娇，
引无数英雄竞折腰。

毛从大自然的壮丽转向自己理想志愿的壮美。他提到中国古代四位受人敬重的皇帝，还有征服过中国的无畏的蒙古英雄。

惜秦皇汉武，
略输文采；
唐宗宋祖，
稍逊风骚。
一代天骄，
成吉思汗，
只识弯弓射大雕。
俱往矣，

数风流人物，
还看今朝。⑥

全词淋漓尽致地表达了毛的个人使命感。过去的英雄都已成为过去，在新的战争年代，他们不可能再成为东升的旭日。唯独只有毛能负托管理中国的多娇江山吗？*

《雪》是一首地道的民族主义的颂歌，是中国壮丽的山河使毛产生了如此坚强的信念：现在的中国比四千年历史的任何一个时期都更加辉煌灿烂。

毛是在努力团结所有的人以结成抗日统一战线的时候写下这首词的。他的英雄主义之梦是在把中国作为最高事业，在中国面临的危险比自成吉思汗以来任何时候都要严重的时候产生的。

毛心目中的英雄并没有包括列宁、乔治·华盛顿或任何一位西方人物。他们都是东方的，而且都是过去的。

马克思主义者往往在民族主义这块基石上徘徊犹疑。消灭阶级最终使人类和谐共处的观念支配着他们，但这又常常与强烈的民族感情相杂并处。因此，第二国际的失败也就带来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阴云。

毛从来没有忘记中华民族，这是他在三十和四十年代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

1936年间，毛每一次给国民党发去电报的时候，都睁大另一只眼睛密切地注视着全国人民对此作出的反应。他的双重任务是：既使蒋介石丢脸，又能团结人民大众。⑧

毛对新的统一战线是真诚的吗？他当然不相信共产党和国民党能同享未来，他也不相信随着战争的持续，国共两党会融合而形成单一的政府。

---

* 最后两句似乎受小说《三国演义》的启发。在毛非常喜欢的这部小说里，集英雄和恶棍于一身的曹操对汉室后裔刘备说："天下英雄，使君与操耳。"⑦

但是，毛确实认为，共产党和国民党能够站到一起。因为双方都在全力以赴，以各自不同的方式进行着抗日斗争。只要掠夺者还在中国的领土上，双方就互不拆台。

对于这一点，毛在保安时曾和斯诺谈得非常坦率："如果我们的国家被人掠占了，也就无从谈起建设共产主义的问题。"

在与阿格尼丝·史沫特莱的会见中，毛提出了更为激进的观点："共产党……最关心中华民族的命运和我们后代子孙的命运。"⑨

蒋也在努力将自己树立成一个爱国者的形象，然而，他的政治主张的本质使他没有毛成功。他的国民党没有扎根于占中国大多数人口的农民之中。似乎为了弥补这一点，蒋在寻找外国人作靠山。最后，蒋则完全背弃中国，以自怜的形象投入了美国的怀抱。

但是，山姆大叔对中国局势鞭长莫及，也无力解救蒋。

毛在打抗日这张牌方面很精明，也很幸运！正当他对自己的反蒋策略感到信心不足时，日本人发起了进攻。然而，如果代表全中国的抗战没有深入毛的内心的话，任何一种因素或两种因素的结合都不会起作用。

统一战线是一场双簧戏。不过，当时毛也有双倍的信心，他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所有学说都是治疗中国这位病夫的药。因此，重视治病的良药甚于病人是绝对不容置疑的。

与此同时，毛还希望把他的这种商标的药加诸蒋的身上，并已准备为此而斗争。长征期间和四十年代的内战都说明了这一点。他相信，这种对药物的选择是出于对病人的爱。*

1935—1936年间，毛对少数民族和被迫流浪者的态度，既体

* 毛对统一战线的态度，在1938年他对一次群众集会所作的讲话中可见一斑："如果国民党错了，我们就必须批评他们，"毛笑着说，"过去，我们用机关枪批评他们，现在我们是用笔和口。"⑩

现了他的精明和爱国的双重特点，也促进了他的统一战线政策的成功。他号召蒙古人与中国共产党携手合作，“保存成吉思汗时代的荣耀”。他敦促穆斯林也这样做，以保证“突厥人的民族复兴”。

他对哥老会这样说：

“哥老会历来是代表民族志士及广大农民与劳苦群众的组织，……被目为‘下等人’，被诬为‘盗匪’，而不能公开存在。哥老会所遭受统治阶级的待遇，同我们所遭受的待遇，实是大同而小异。你们过去主张兴汉灭满，我们现在主张抗日救国；你们主张杀富济贫，我们主张打土豪分田地；你们轻财仗义，结纳天下英雄好汉，我们舍身救中国、救世界，……我们彼此之间的观点主张都相差不远，我们的敌人及我们的出路更完全相同。”

毛在发给这一秘密会社的传单最后说：“哥老会和全中国人民团结起来打日本兴中华。”[11]

理查德·尼克松未来的朋友也确实无比的灵活机智。

就在毛号召组成统一战线的同时，蒋的一次谈话说明他已经失败了一半。

1936年10月，蒋介石到西安筹划第六次“剿匪”，这位总司令在一次讲话中傲慢地说：“现在，不要谈论日本人的威胁，任何只谈抗日不谈剿共的人都不是中国士兵。日本人还远着呢，可是共产党就在我们眼皮底下。”[12]

共产党甚至比蒋介石知道得还要近。两个月以后，经过一系列惊心动魄的事件，蒋在西安成了毛的囚徒。

1936年，毛给蒋提出了一系列的建议，其后果之一，是蒋手下的军官出现了骚动。

张学良是著名军阀张作霖的儿子。到1936年秋，对张学良来说，蒋的反共和动摇不定的抗日态度已变得不可忍受。这位英俊而且感情丰富的将军是东北军的首领，他的军队抗日特别

积极，因为他们的家乡东北自1931年起就被日本人占领。

张与共产党取得了联系，双方达成默契。1936年，张的三千名军队，顺风转向，倒向红军一边。

12月的一天夜里，张包围了西安北郊的一座寺庙，蒋介石就下榻在这里。他开枪击毙了蒋的30名随从。

灵活的总司令穿着睡衣赤脚逃走——假牙也丢掉了——翻过墙头，带着背上的伤跑到附近的小山上。张的一名军官发现他痛苦而暴怒地蜷缩在石缝里。

蒋愤怒地提醒这位将军别忘了他是他们的总司令，这位将军弯了一下腰恭敬地回答："你还是我们的囚犯。"⑬

毛和他的同事们面临着微妙而棘手的选择。张学良的目的也是毛的目的——推动全国抗战，但是，怎样处置这位大名鼎鼎的俘虏以实现这一目标呢？

有些共产党的领导人希望对蒋实行无限期的监禁，或者作为卖国贼对他进行公开审判。毛则另有谋略，他想利用这一时机，显示自己既往不咎、宽宏大量的姿态，在全国赢得道义上的胜利，以作为一名爱国者，挫败这位中国名义上的领袖。

"我们一周时间没有睡觉，都在作决定。"⑭周恩来说（他也主张宽大）。

正当中共在处理这一棘手难题的时候，从莫斯科来了一份令人不可思议的电报。斯大林认为，绑架蒋介石肯定是日本人的阴谋，张学良和共产党应该立即无条件释放蒋。似乎毛看到这份电报后勃然大怒，他把电报撕得粉碎，一边跺脚一边咒骂。⑮

这是斯大林最后一次就基本方针问题直接给中国共产党发指示。毛一反常态，——他不只是纵声大笑，这是他的有力武器——这表明，他决非看不起斯大林。不过，毛不理睬斯大林的指示，

同时，这也使他更加怀疑莫斯科的聪明和诚意。*

经过三方——张学良、共产党、蒋介石及他难对付的妻子——十几轮的谈判，“西安事变”的结果是达成了妥协，这是令人惊讶的。

蒋作为自由人飞回南京。张学良陪同前往，不久就成了蒋的阶下囚。但是，作为回报，蒋放弃了中国只存在一个政府的要求。

不出数月，国共统一战线产生了。这也是受“芦沟桥事变”的影响。“芦沟桥事变”之后，日本便开始大规模地侵略中国。1936年8月，北京和天津相继陷落。

红军改编为第八路军，正式成为中国全部武装力量的一部分。西北苏区也不再是企图取代南京的一个政府，而改称为“边区”。在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共产党的名字降了一格。毛也从蒋的财政部门中领取薪金——每月五块钱。

蒋重新得到了他的假牙，但是，只有以前就属于他控制的地区才听从他的指令，并不是整个中国都服从他。蒋赢取了他获得释放的胜利，但是中国共产党因为释放他，使中国共产主义的运动在全国人民面前赢得了崭新的地位。

毛从没有象在西安事变时那样显示出他对蒋的优势。他作的是长远打算，留给蒋的是权宜之计。他一直保持沉着稳定（看到斯大林的电报时除外），而蒋则惊慌至极，象是缺乏教养似的。毛摆脱了对局势的拘谨，而蒋则努力抓住总司令的最后一点威风。

西安事变，象是一面镜子。从中可以看到，中国共产党决没有把其内部纷争置诸脑后，遵义会议也没有使28个布尔什维克

---

* 然而，可以肯定地说，来自莫斯科的电报使天平对强硬派更加不利，他们坚持审判蒋介石。刘少奇说强硬派人数很多，他认为“这可以作为一个例子，说明少数人有时是正确的。”莫洛托夫后来宣称，是苏联人的策略挽救了蒋的性命。[16]

全军覆没。虽然没有人再企图推翻毛——仍有二人想这样做——但是，还会有很多唇枪舌剑的论争。

在左派和右派的意见分歧和斗争中，作为领导者的毛一直喜欢居于中间位置。在第二次统一战线形成期间，他也就是站在这种位置上。他最反对的两种极端观点是："投降 主 义"和"关 门主义"。

前者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反复无常的张国焘（他曾一度是"关门主义者"，以至成为毛左翼的一个污点），以及王明（他作为28个布尔什维克的头面人物在莫斯科呆了六年以后回国。莫斯科认为蒋是亚洲的希望所在）。他们要的是与蒋的全面联合。

毛很清楚应如何对付这种人，他把喜欢吃糖的孩子推到那门锁上插有钥匙的糖店前。毛不久就让王明担任统一战线中共产党一方的负责人，长驻蒋的首都。

"关门主义"的倡导者引起毛的敌视，何况他们中间还有象王明或张国焘那样可以与作为中共领导人的毛相抗衡的 非 等 闲 之辈。这一批狂热分子希望把蒋带进法庭甚至处死他，他们排除一切与国民党合作的可能性，否认这是一种斗争方式。

毛厌恶他们，因为他们没有一种民族危机感。他认为他们是在机械地运用马克思和列宁的学说，而对中国的特殊情况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他认为他们是托洛茨基分子——毛一直对托洛茨基持怀疑态度。

很多热情的左派分子之所以热衷于"关门主义"，简单地说，他们认为陕北的土地改革已经给普通的农民带来了好处。他们担心与蒋的重新合作会冲淡共产党的社会规划，事实也是如此，毛毅然决然地表示拯救国家比土地改革更重要。

毛对"关门主义"的憎恨甚于对"投降主义"的敌视。实际上，直到1941年，毛对重新与国民党联合一直抱有很大的希望。这并非因为他从个人的角度信赖蒋，而是因为他过高地估计了共

产党在国民党心目中的地位。

毛这时已经确信未来是属于他的。但是蒋仍然认为共产党不久就会被消灭，他一直没有把共产党的问题考虑得象毛认为的那样重要。

毛的抗日方法是渐渐广为人知的“人民战争”。人民战争把中国的军事传统发扬光大，不是把战争局限在狭小的圈子之内，而是把这个任务交给了人民。

在井冈山和江西苏区的全盛时期，毛和朱已经在按照这条路走。而现在他们跨上了一个更辉煌的台阶。具备何种德行的人才能出任指挥呀！要利用和引导如此众多的人的情感！人民战争确实如此，它不仅指全体人口中的一部分——象十几年前那样——而是指整个中华民族。

在作为头号革命者的毛为拯救中国发起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际，“人民”一词进入中国革命之中。

随着蒋介石的政府不断西撤，日本人长驱直入，大片国土沦丧。在敌后，共产党领导下的游击队成了唯一有效的抗日力量，直到 1941 年都是如此。

共产党在人民中间如鱼得水，它的力量不久就达到了创纪录的水平。到 1940 年春天，八路军的人数达到四十万。是年，共产党的党员人数比 1937 年的四万人增加了五倍。

蒋不能与红色战士相匹敌，不能成为水中鱼。蒋对他们也不能施加任何形式的控制，因为他们大多分散成一千人左右流动的作战部队。

战争对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影响也有惊人的不同。当国民党被日本人的进攻不断赶向中国西部的时候，共产党在北部和东部的敌后根据地不断发展壮大，到 1940 年，有五千万人口居住在毛的华北根据地。

现在中国人使用的“解放”一词的起源会为我们提供一些了解

共产党成功的线索。当红色战士谈及解放的时候，一般认为解放是从日本人的统治下解放出来。然而毛这时已有自己的想法，他认为解放是社会的解放，是从地主劣绅、苛捐杂税、高利贷、军阀和儒家思想对中国的统治下解放出来。

解放还应理解为中国共产党对政权的获得。

在共产党逐步取得政权的时候，红色战士以自己的行动和他们作为贫苦农民军队的性质倒向即将到来的社会解放。毛把他的军队用到与蒋共同的民族事业之中，但军队内部的精神面貌在一定程度上是革命的希望所在。

这对蒋是一个威胁。然而，毛的统一战线战略又是无懈可击的。这位最高统帅已经落入毛的陷阱。

很多外国人吃惊地看到红色军队斯多噶式的英雄主义。人们认为蒋为八路军提供弹药和给养，但是1939年以后再没给过任何东西。除蒋介石的军队外，苏联人没有给过其他任何中国军队以援助。八路军依靠敌人同时也依靠自己的智慧生存下去。

阿格尼丝·史沫特莱看到一名痛苦异常的伤兵乞讨药品，可是没有，她所能给予他的只有最后一片安眠药。输血根本不为人所知。服装供给是如此缺乏，以至士兵们要赤着双脚蹚过结冰的小河。

史沫特莱随一个连队作战，她看到战士们战斗了整整一天，打完仗后却没有一点点东西吃。小米唾手可得，但是他们没有钱，而指挥员不允许战士们不付钱就拿走别人的东西。

在这个残酷的夜晚，指挥员开始给战士们讲毛在古田会议上提出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三大纪律”和“八项注意”中的有些内容就是不允许不付钱强行拿走群众的任何东西。战士们高唱着“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迎接黎明的到来，歌声直冲云霄。史沫特莱惊呆了，她说：“他们的声音象一支管弦乐队。”[17]

这些人既不会读也不会写。他们焚烧日元，因为他们认为只

有中国的钱才是钱。他们第一次见到火车就象美国儿童第一次见到剑龙。他们到西安，象孩子站在牛肉饼摊前那样，排起队希望按一下开关，因为他们对于手指一动电灯就亮感到很惊讶。

毛，作为一名军人同时又不止是一名军人，深知军队是构成他们社会的一部分。对八路军战士来说，强奸等于是侮辱自己战友的姊妹。为了使八路军能为中国人民所接受——并有一个奋斗的目标——毛以人民战争服务于人民。

八路军很快就赢得了农民的信赖和支持。他们与之一起打击日本侵略者就象追打一条蛇。他们从贫困地区招募新兵，给他们吃的，教他们写字，招募来的少年儿童便作通讯员或卫生员的工作。他们自然而然地成了共产主义的信徒。

八路军中的新闻宣传员，象中世纪的游吟诗人一样，把刚结束的战役编成快板，并在锣鼓的伴奏下，唱给战士们听。留下来的画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海报，使无生气的村庄得到愉悦。画报上毛的脸庞显得十分清瘦。

•

1938 年上半年，毛写了很多东西，他系统地总结了自 1927 年他第一次拿枪以来的很多军事思想。他写的《基础战术》,[18]成为干部的必读手册。《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是他阐释人民战争意义的经典性著述。在《论持久战》中，他从中国的角度论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总趋势。

他的一名警卫员着迷地目睹了毛写作《论持久战》时的情景。毛坐在窑洞里的书桌边，微弱的烛光照着他苍白的脸。他两天没有睡觉，只吃了一点点东西，一条湿毛巾用来擦他身上的淋漓大汗。笔记本旁边放着一块石头，手臂酸疼时就紧握几下石头使手指得到松弛。[19]

五天以后，写满了显示毛桀骜不驯性格特点的草体字的稿纸已有一大摞，而毛的体重减轻了，眼睛布满了血丝。当他起身去

吃已不止一次给他热过的晚饭时，工作人员便把这视为一重大胜利。如此着迷于写作的政治家真是举世少有。

第七天，毛突然痛得跳了起来，他右脚上穿的鞋被火盆中的火烧了一个洞，而他还在沉思。他喝了一杯烧酒，继续把《论持久战》的最后一部分写完。到了第八天，他突然感到头痛，一阵晕厥，医生赶来给他诊断后，他仍继续写作。到了第九天，终于完成了这篇长达五万多字的论文。

然后，毛叫人送到刘少奇的窑洞去征求意见。

毛的军事文章很有生气，具有一种以中国为中心的民族本位主义特点和对左翼极端分子的本能敌视。

他坚持，在作出判断之前要有实际的调查研究，他嘲笑那些以偏概全而认识不到问题全貌的人，左翼分子总是想一步登天，他劝这些人要有耐心。

为了突出论点(弱者在几乎没有武器的情况下对抗强者)，毛借用了中国传统军事思想中的二元论：进攻与防御，运动战与阵地战，持久与速决，集中兵力与各个击破。

毛提出了他的著名格言："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并不是说军事可以支配政治，相反，毛坚信，没有一个崇高的目标，军队的工作没有任何意义。不过，毛在三十年代就已认识到，在中国这种落后的条件下，共产党要想赢得政治行动的独立性就必须有自己的军队。

即使毛在谈论枪杆子的时候，他也是盯着超出枪杆子的东西。毛是反战的勇士，然而他又认为，在他这个时代的中国，战争是对政治合理性的真正检验。

毛揭示出了战争中不可低估的人的因素："我们是人，敌人也

---

* 这是对中文"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直译。我觉得这比通常翻译的"政权是从枪杆子成长起来的"要准确些。中文意思并不是说所有的政权都出自于枪杆子。格言的主语是枪杆子，而不是政权。——译注

是人做的，我们都是人，那我们还怕些什么呢？”[20]

毛善于把共产党军队的弱点转变成优点：“反对两个拳头同时打人的战略，集中兵力向一个方向作战。”

从政治的立场出发，毛认为战争要有战略防御阶段：“一切正义的战争，战略防御不仅可以吸引政治上的异己分子，还可能集合一部分落后的群众加入战争。”

他的眼光是远大的，也是傲慢的：“从此以后，人类将亿万斯年看不到战争。已经开始了的革命战争，是这个为永久和平而战的一部分。”

毛认为抗日战争可以分为三个阶段。[21]第一阶段——已接近尾声——日军大举进攻，大片的中国领土将沦陷。毛对这种损失并不惊慌失措。诱敌深入是有利的，日本人在这方面将犯错误，他们将被广大的同仇敌忾的人民所包围。

紧接着的是时间较长的第二阶段，双方相对处于一种均势状态，同时在敌后有小规模的游击战争。这样削弱了敌人的武装力量。然后是第三阶段，中国人民开始反攻，并以大规模的运动战代替零星的游击战。

这正是1937—1945年发生的事。只是在第二阶段，共产党的游击队并不是削弱日军的唯一力量。

毛在延安时期的很多军事著作，都是以他在二十年代内战时期的经验为基础的。但是也有新的主题。在三十年代民族危机的关头，他不再象二十年代那样热衷于搞宗派分裂，当时主要是小股势力在农村进行较量。

他开始象一位世界政治家那样讲话。在延安，毛第一次把世界事务作为他日程表中的一部分。他需要这样做，把中国人民的战争描绘成全球危机的一部分，这对他的事业有利。

毛预见到，西方反对纳粹德国的民主事业对他自己的抗日存在着潜在的价值，他的笔雄辩地论证了全球反法西斯主义的重要

性。他对西方有时出现的软弱感到焦虑：这会不会使蒋感到绝望而去同东京达成密约？他称赞英国和美国对战争做出的努力。一句话，毛赋予他的统一战线思想以世界性的意义。

毛开始谈论中国的激荡对不发达国家会产生的影响。他对非洲和拉丁美洲还所知不多，但是他看到了整个亚洲正在兴起的反对殖民主义的解放运动，印度出现在他的谈话和文章中。这是他后来提出第三世界革命问题的第一个信号。

毛并不依恋外国人，其他的中共领导人更是这样。

实际上，共产国际的代表是迄今为止毛真正接触过的外国人。这些人——从鲍罗廷到布劳恩——给毛的印象并不佳，他与他们的关系也不很融洽。但是毛在43岁和44岁时接触过的西方人（主要是美国人）则与此很不同。

中国有一种传统，即以自己的生活方式吸收并同化杰出的外国人。十七世纪时，耶稣会的教士来到中国企图使一些中国人皈依天主教，但是他们却慢慢地被中国化——甚至在中国宫廷担任一定的职务。直到教皇警觉地意识到这一点，才改变了这种颠倒的宣讲福音的活动。

然而，在中共1949年以前的历史上有那么多的外国人参与了中国的事务，可谓空前绝后。首先是二十年代共产国际的代表，然后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延安作短暂逗留的西方人。

一天下午三点钟，英国记者冈瑟·斯坦因到毛的窑洞接受"会见"。毛一直谈到吃晚饭时才停下来。然后他们走出窑洞在一棵老苹果树下共进晚餐。毛仍然不停地抽烟，斯坦因则继续在纸上记录：关于中国共产党以及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期的一些目标。

晚饭以后，他们回到窑洞，一边喝酒一边继续交谈。毛看到斯坦因写字的桌子不稳当，就走出去拿了一小块石头垫在摇动的

桌脚下面。晚上，斯坦因几次站起来想离开，可毛对此象是全然不知。

毛不停地谈了十二个小时，言辞激烈。斯坦因回忆说："直到凌晨三点，当我最终站起来离开的时候，我感到意识不清，四肢发麻，眼睛发胀。而毛还象下午时那样精力充沛，讲话有条有理。"*㉒

阿格尼丝·史沫特莱总去拜访毛——毛也同样回访她——她可以拍毛的肩膀，甚至教毛跳舞。史沫特莱回忆说："我转交给毛泽东一张纸条，希望他来聊聊天，他一会儿就到了，带着一包花生。"㉓

通过斯坦因和史沫特莱这样的来访者，毛精明地让西方世界了解了他；同时，通过这些外国人，中国人民也更加了解了毛。埃德加·斯诺成功地扮演了这一双重角色。

自1936年夏天起，在与这位来自密苏里州的天才冒险家一起度过一段时间以后，毛开始与西方人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在炎热的夏天作长时间聊天时，毛曾当着斯诺的面——还有林彪——脱去长裤。

在《西行漫记》和其他一些作品中，斯诺透露了许多不为中国人所知的故事。三十年代的毛还没有机会利用中国的新闻媒介来扩大自己的影响。斯诺作品的中文译本有助于毛在本国提高知名度。

毛也通过与斯诺的交往逐步了解美国，这种了解的重要性几年之后便显示出来。

他在这位理想主义者、年轻的美国记者身上发现了自己可以敞开心扉的地方。在三十年代的延安窑洞里，他并不幻想外国人

---

* 两天以后，毛在街上碰到斯坦因，对他说："我已把我们的谈话告诉了朱德同志和周恩来同志，他们都赞同。"

会和他一起创立社会主义中国，但是他相信外国人会理解他的目标。否则，他就不会告诉一位美国人他自己的生活经历——这在中共领导人中和其他国家的共产党领导人中是不寻常的。

在斯诺与毛谈话时，贺子珍常常会送来一碟酸枣或炒辣椒。当毛在共产党内的权位不断上升时，他妻子的处境却在恶化。

三个孩子的出世使她从一位生气勃勃的政治人物变成了一位默默无闻的家庭主妇。* 贺子珍瘦小的身上还留有二十块弹片，这是长征途经贵州时留下的纪念。她已变得骨瘦如柴，而且受神经失常的困扰。

1937年的一天晚上，毛来到阿格尼丝·史沫特莱住的窑洞吃晚饭。客人只有尼姆·韦尔斯即埃德加·斯诺的夫人和吴丽丽。吴是一位很大胆的漂亮女演员，她涂着口红，留着长发，在共产党的这种环境里，仍"上海"味十足。

未待夜临，小筵便开，毛与丽丽共酌，相依把盏。他在感情上已经离开了子珍，心中重新荡起了感情的波涛。

最后，不是吴丽丽，倒是另一位姿色稍差但却更为执着的女演员掀起了毛内心的风暴。㉔

一天，毛在艺术学院发表演讲。听众里面，有一位刚从上海来到延安、长着一双明亮眼睛的女子，她坐在离前面最近的给干部保留的单独一排座位后。这女子鼓掌的声音很响，提了一些很受欢迎的问题，演讲结束后，又私下里向毛请教一些"理论问题"。

毛并不是蓝苹所亲近的第一位中共领导人，但是，自从在艺术学院的那次会面以后，她再也不需向其他人抛出彩球了。

---

* 也可能是因为孩子中没有男孩使她沮丧。歧视妇女的封建思想的残余在共产党的圈子里，并不象官方所说的已经不存在了。

蓝苹——这并不是她的第一个名字也不是最后一个——出身于贫苦家庭（在这方面，她不同于子珍，也不同于大多数中共著名人物）。她的童年生活很不幸，因为她的父亲经常用铁锹殴打自己的妻子和女儿。她在上海的剧院里找到了自己的生活之路，同时也有了一连串的罗曼史。

和很多来自东部城市的青年艺术家和学生一样，她听到西北的情况时很激动——在个人的意义上——她接受了延安新生活的挑战。

她与毛的相遇使人们想起，1928年井冈山附近的一次青年团会议，这次会议使毛摆脱了孤独的生活。但是，两个女子表现自己的方式并不相似。

蓝苹美丽漂亮，尽管缺少贺子珍的温柔贤慧。她有一双聪明的黑眼睛，而且她熟知怎样分配自己的感情以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她从不无缘无故地把自己抛出，在为获得名誉和权力的斗争中，她会把网撒向更大的范围。

毛轻快地——如果不是没有困难的话——开始了他的第三次婚姻。蓝苹和毛这时似乎都有自己的配偶，她的远在上海，毛的近在咫尺。在延安这座小城里，子珍很快就听说了毛与蓝苹的传闻，她对此作出了痛苦和强烈的反应。*

再说，党对毛的私生活也不能充耳不闻，象他在遥远的井冈山遇到子珍时那样。因为毛现在太知名了。

中央委员会就此事进行过激烈的争论。这位满身冲劲的女演员是何许人？有没有可靠的政治背景？难道说一位参加过长征的老战士、一位三个孩子的母亲就应该把位置让给她吗？

但是毛决意已成。他威胁说要“回到老家当农民去。”㉕党对

---

* 事实是，在江青到达延安之前，贺子珍已于1937年底离开延安登上赴苏联治病的途中，尔后在苏联一呆九年。当然，贺的出走也是负气的，因感情冲突她提出与毛离婚。当贺到西安时，毛还去电劝她返延安，不要离婚。——校注

此默认了，只提出一个条件：蓝苹只能作为一名家庭主妇，不能参与政事。然而，后来的事实证明，这是养虎为患。

当梦幻的时刻一过，一个人甚或会丧失对女强人的爱。以一位新来的女演员取代为自己生了孩子的母亲，难道毛忘记了长征的凄苦岁月？

可以肯定地说，这桩婚姻给双方都带来了兴奋：毛，一位来自农村的男子，热爱中国的传统，正置身于政治和战争之中。蓝苹，一位漂泊不定的女演员，不理会中国的传统思想，是一只在上海文化界的温室中飞来飞去的蝴蝶。

在个人生活发生危机的一个夜晚，毛曾在阿格尼丝·史沫特莱的窑洞里聊天。他突然把世界风云的话题转到爱情上，他问阿格尼丝是否爱过男人，为什么爱？爱对她意味着什么？[26] 然后，他背诵了一首写给他的牺牲于七年前的第一个妻子杨开慧的诗。

这种赤裸裸的表白对毛来说是不同寻常的。他的内心正经历着剧烈的思想斗争（啊，单纯的史沫特莱小姐不能进一步激发毛的感情。她的心思都在吉普车、绷带和纳粹主义上)。

与此同时，蓝苹似乎已经认定，这种进攻是最好的防卫手段。她为自己挑选了一个新的更雄伟的名字——江青，意思是："绿色的江"或"纯净的水"，"绿色的江"似乎更合适。这个女人城府很深，令人捉摸不透，能以猫一般冷艳的魅力，去召唤她想要的东西。*

在中国，即使共产党的历史也充满了氏族的纠纷。

毛最小的弟弟娶了子珍的妹妹作第二个妻子。毛泽覃第一次结婚是在1925年，他的妻子在1930年与杨开慧和毛泽建一起被捕。尽管泽覃的妻子后来被释放——国民党认为他与毛泽东相比

---

* 1972年，罗克珊·维特克在会谈中发现，江青对她在延安改名一事很敏感："她很快地改变了话题，好象我揭了她的短。"[27]

是一条小鱼，因此他的妻子比杨开慧的结果要好——但是泽覃没有再和她联系。毛泽覃与贺子珍的妹妹贺怡的婚姻是短暂的，因为他于1935年被杀害。

贺怡于1937年—1938年间重新露面，她又结了婚并来到延安。她和她的新丈夫对毛泽东“遗弃”子珍很恼火，这无助于事。贺怡的丈夫被派到华南工作，贺怡则被留在延安。或许这是平息吵闹的一种方法，因为这对夫妇反对毛与江青的结合。[28]

1938年早期，张国焘的妻子在离别十几年之后经西安去往延安看她的丈夫。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给她安排了一个房间，里面只有两张简单的木床。另外一张床上躺着一个身体单薄、苍白的、大约30岁象是生病的妇女，这除了贺子珍还能是谁！

两位敌对的共产党重要人物的妻子走到了一起，周恩来的夫人介绍说：“这是贺子珍同志，毛主席的爱人。”

两位女人谈了起来。张夫人发现，“爱人”已不是目前贺毛关系的贴切用语了。“泽东对我很不好，”贺子珍说，“我们吵了起来，并打了一架，他抡起一条板凳，我抓过一把椅子。噢，显然，我们算完了。”

张夫人试图劝子珍返回延安。但是，这位可怜的人认为，最好还是按照毛的安排去莫斯科治病。

据张夫人说，由于偏向贺子珍，她作为证人就顾不了许多。到延安后就去见毛，并对毛发了火。她说：“一切都是你的错，你要马上给她写信。”[29]

毛没有对她发脾气，他只是听着，什么也不说。几天后，张夫人又去见毛，毛对她说：“我给贺子珍写了信，但是她不会回来的。”

实际上，似乎不是子珍不愿回延安，因为她成了处境艰难的人。这一切并不主要是她个人的过错。

贺子珍去了苏联，带着她的第三个孩子（在长征途中生的女

儿），同去的还有毛与杨开慧生的大儿子，17岁的岸英。*

自从1927年毛在韶山最后一次见到他们，岸英和他的弟弟岸青一直过着艰苦的生活。他们的母亲在1930年被杀害后，党组织和外婆家设法把他们抚养长大。但是，作为“共匪”的后代，过日子真不容易。

他们在上海卖报纸。有段时间，他们在一个破庙里栖身。庙外挂着一块招牌：我们讲故事，一次一分钱。[30]

奇怪的是，他们在三十年代初期用的名字是杨运福和杨运寿，即用的他们母亲的姓。不过，假定毛不在世或外婆没有收养他们，他们这样命姓取名倒很自然。

毛一在延安安顿下来，他们俩就被送往那里，但是没有和毛住在一起。岸青被安置在农民家里，岸英在去莫斯科之前也是如此。

毛岸英与贺子珍一同去苏联，说明毛并没有完全丢开他的前妻一点不管。但是子珍的状况没有改善，她狠心地打她的女儿。不久，她就被送进莫斯科近郊的一家精神病院。

四十年代末，她又被转到上海的一家精神病院。毛好象是1938年后再也没有见过她。**

莫斯科一直没有利用贺子珍的遭遇，或她在苏联的出现，批评毛对待她的态度。

1939年，毛与江青一起生活。1941年初，他们的第一个女儿出世。毛又一次履行了正式手续。我们无法确知毛与贺子珍离婚的时间——江青说首先提出离婚的不是毛泽东，也无法确知他与江青结婚的时间。

---

* 岸英此时正和弟弟一起在苏联学习。——校注。

** 1979年，贺子珍仍然活着，离开了精神病院。官方的报纸在沉默了几十年后又重新提到了她（毛于1959年曾会晤过子珍）。——译注

毛的新妻子给女儿取了个很有意义的名字：李讷。李是江青本来的姓；讷是与江青在上海曾爱过的一名男演员的名字谐音。*

---

* Li Na的Na用汉字表达是"讷"而非"纳"，作者将其与江青恋爱过的男演员唐纳的"纳"混为一字。而毛的两个女儿李敏、李讷之名取典于《论语·里仁》："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另外，毛泽东撤离延安时用的化名叫李德胜。——译注

圣　人（1936—1945）

这时的毛，在外表上也显露出他的足智多谋——对另一些见过他的人来说是城府很深——正是这种足智多谋把他推至最高地位。他的行为举止也变得老练深沉，他的目光和微笑可以让人捉摸不透。

有时，他注视着和他讲话的人，歪着头，好象是在掂量他的话的分量。他嘴上老噘着香烟，丝丝有声地大口抽吸着。①

有些外国人在与毛交谈后离开时，竟骇得想不起毛刚才对他们说了些什么话。

毛虽然内心有钢铁般的意志，但是被简洁的谈话所掩盖，看上去有一种娇弱的女人气。②

毛的刚毅掩藏在一些人称之为女人气的沉默寡言之中。美国人克莱尔和威廉·班德曾说："很遗憾，我们注意到毛外表上有女人气质。"

与各类男人都有交情，有的还不止是交情的阿格尼丝·史沫特莱，对毛也有类似的印象："一个高大而令人生畏的身材缓步向我们走来，

高声向我们问好。一双女人般的柔软的手握住我的手。……他黝黑的国字大脸表情深不可测，天庭饱满，嘴则女性化。不管怎么说，他是一位唯美主义者。”③

“他不握紧也不摇动你的手，而是让你把手放在他的手里，然后再把你的手推出开来。”④史沫特莱有些抱怨地说。

按照史沫特莱的标准，在中共领导人中，朱德朴实敦厚，古道热肠。这位世界革命的圣母玛丽亚如果希望在与毛的政治交谈中得到更多的东西，那么，这种希望在她落座之前就会消失。“实际上，我对他的女性气质和阴郁情绪感到讨厌。一种本能的厌恶从我内心升起……。”

史沫特莱不久就领悟到至关重要的一点——和斯诺一样，她一开始就发现毛是“奇怪的人物”⑤——这就是，毛不再是一望便知的一本打开的书。他正在逐步变成圣人，而只有圣人才会神秘不测且无拘无束。

延安时期的毛正处在他事业的中期。他的目光已经脱离过去的战场，他统治了中国的部分地区。他开始把自己看作是下一位中国的统治者。作为一位40多岁的人，他要随心所欲地做事。

毛的身上开始显露出一种主宰的风骨。

急不可耐的表情已不复存在，他眼睛亦不再在银盆似的脸庞上闪烁，他开始出现一种释迦牟尼式的殷实和练达。

毛的个性由诸种不可调合的色彩组成。尽管他领导着一个非常复杂的组织，他还是喜欢长时间地独处，只是偶尔才与大家相处。他并不关心——也可能是没有注意到——在其他的时间别人是否会谈论他。

不管是在个人方面，还是作为中共领导人在政治的马鞍上，毛的处事泰然自若，独具风格，自成一体。

按照规定，所有的人都只能留短发。但是毛却让自己的头发任意地长，直到看上去象一位音乐家。抽烟和不按时起床被认为

是违反纪律的表现，但是，毛抽起烟来就象烟囱，而且正午之前很少起床。尽管统率着军队，他敬起礼来总是心不在焉地比划一下。他走起路来拖沓的步子象一位农夫。⑥

毛在他的文章中说，任何形式的批评都应该是温和的有节制的。但是他有时却大发其火，甚至破口大骂，直到对方惭愧满面地离去。⑦

在党内人士的非议声中，毛不冷不热地新续了一个妖艳的女子为妻。毛经常独处，但他的家庭却是所有中共领导人的家庭中最热闹的。活泼的蓝苹以及儿子和侄儿在他书房里跑进跑出。

毛在延安开始发福。负责根据地教育工作的徐特立仍然是那样清瘦，徐是毛就读于长沙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时的老师。二十年前，徐象毛一样一直提倡斯巴达式的体育锻炼。到了延安，他仍坚持锻炼。花甲之年，仍在冰冷的河水中游泳，从不穿大衣，食量也很小。⑧

但是毛从不讲究养生之道，他的许多行为在徐特立看来都是受了魔鬼的诱惑。这多少可看作是他那不受拘束的风格的延伸。

这个卓尔不群的人之所以不循规蹈矩，并非仅仅因为规矩难以遵循，而是出于要超越既成之规的天性。清规戒律是一根拐杖，他发现自己足可以不用它，这就是延安时期的毛泽东。

史沫特莱准备写一本关于朱德生平的传记，她有些天真地问毛对她的这一想法有何见教，那是在1937年，刚在年前毛对斯诺谈了自己的生活经历。"我问毛泽东，呆在延安写朱德的传记和到前线去写战争，对我来说哪一个更重要些。"毛回答："这场战争比已经过去的历史更重要。"很遗憾她未能录下毛说这话时的表情。⑨

毛的王者之气日显。他感到中国的历史重负落在了他的肩上——这是他的行为不再放任自然之原因所在——自负感也变得更加强烈。

不可泛泛而论一位政治家身体的发福或工作中的纵任，而应

看到这是一个以过不惑之年圣人已具自觉意识。毛并没有变得喜好奢华，却仍然保留着无所畏惧的性格特点。

再者，狂热的崇拜开始在他的周围出现。且不说是谁制造的这种崇拜和为什么这样做，这种崇拜的存在改变了毛的日常生活，并最终改变毛本人。

毛的画像开始出现，公共场所可以看到他的题词手迹。两个超乎寻常的字眼与他联在一起：一个是1938年林彪（以及后来的其他人）所称的“天才”；[10]另一个是1941年肖三（还有其他的人）所称的“我们的救星”。[11]

四十年代中期拜访毛时，不复有象斯诺和史沫特莱所熟知的那种不拘礼节。得到被毛接见的传唤成为一种令人激动的事，卫兵拿着带有刺刀的枪站在他的门边，忙乱的工作人员让毛与来访者保持很大的距离。毛也不再到其他人的窑洞中去。

毛的形象的树立在一定程度上是战争带来的结果。在一切主要国家中，战争领袖多少都被神化。对毛的崇拜并没有超过斯大林、邱吉尔，或是罗斯福。

在中国，在共产党与国民党对立的时候，提高毛的形象有着特殊的意义。共产党也需要为全中国提供一名可以与蒋介石匹敌的人物。

在延安这座小城，毛的举止行踪足能家喻户晓。很多人都认识他，老乡们常常看到“主席”走在布满灰尘的小巷里。这种环境中，个人崇拜不会走向极端以使其超出凡人的身份。这种崇拜还没有发展成为一种宗教，在宗教的魔力下，人们对神灵顶礼膜拜，即使他们对自己崇拜的神灵一无所知。

在延安时期，毛的权威是职务上的，但他仍然是一位可以接触的人。

即使在他坐车外出时，他也不避人耳目。他的“轿车”是一辆雪佛莱，车上写着：“救护车：纽约华裔洗衣工人救国联合会捐

赠。”他常常是坐在前排，看上去象是司机的助手。

毛不停地写文章，不断地在会议上发表演讲。在这种小地方，他的指示可以直接告诉执行者，而不需要中间环节。

在延安以前的岁月中，毛有丰富的思想观点，但没有多少权力。进入五十年代，他拥有了权力，而这个地球上最大的国家的庞大的官僚机构，使人们只能听到这位导师的声音。而延安之所以令人激奋，是因为他在那里既教导着人们又统御着人们的行动。延安的岁月是毛作为中共领袖的黄金时代。

作为一名政治领袖，毛文武双全。

他曾持枪，跋涉于中国大地一年之久，这在中国的统治者中没有先例。他坐之于书房建构了自己的思想，几个大国的近代统治者中——包括戴高乐——都未能做到这一点。

毛的行为并没有沾染中国军阀所具有的封建习气，比如坐轿子，朝孔，华丽的住宅，在床上拥着小老婆接见来访者——山东一位军阀就是这样。

然而，与28个布尔什维克、蒋介石、民主同盟（介于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的左翼第三势力）的领导者相比，毛则显得更受中国传统的影响。他喜用毛笔写字，潜心于中国历史经典著作。

“我在他的住处没有看到一套西装或一套正式的长袍。”[12]伊斯雷尔·爱泼斯坦写道。这位美国记者在1944年曾游历了中国的大西北。如斯言，毛既不穿西装也不着长袍，他（和政府其他官员）穿的衣服与农民一样：宽大的裤子，对襟上衣。

标准的棉布服似乎反映了一种新型的身份关系：没有阶级之分，也没有代际之别。可以肯定地说，延安精神是土生土长的，是地道的中国式的，但是在中国历史上又没有先例。

新的东西在黄土群山中萌发。

延安是属于毛的，已经存在的稳定的政权可以说是毛的政体。萌发状态的“毛主义”其各方面的特征都有所显露。

相比之下，江西时期是毛度过的凄迷的岁月，毛很少能干自己想干的事。他的社会主义思想既没有得到充分发展，也没有受到地位高于他的中共领导人的赏识。

毛证明了他不是一个军阀。对军阀来说，枪就是事业，权力就是目的。广阔的社会视野引导着毛要塑造出新的社会制度，赢得那些长途跋涉来到黄土高原的人的赞颂——甚至迷恋。

如果说仅仅拥有权力就是毛的目标的话，他可能就会裹足不前。因为在延安，他的权力已经得到了保证。他的目标是要改造九千万中国人的心灵，他们在1945年称他为“领袖”。

从另一方面看，毛的“改造”的概念令人生畏，其大部分原因应归于他童年时期的心灵创伤。他正在逐步证明自己权威性的人格特征，正在做很多他的父亲曾经做过而且认为年轻的泽东不可能做的事。

到延安访问的人会感到儿童团的活跃气氛和互助精神。不管物质条件如何艰苦，他们有共同的目标。财富没有成为负担，也没有带来令人厌恶的等级观念。人们知道他们正在用自己的双手建造一个崭新的世界。

毛是否早已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还是仅仅只能称为“农民改革家”？外国的观察家对此有不同的看法。这个问题实际上并不神秘。在延安，毛没有实行共产主义，但是他一直把共产主义作为他战争结束以后的目标。

因为当时的主要问题是抗日，毛暂时挂起了阶级斗争，而是努力动员一切可能的力量投入这场鏖战。它是由共产党领导的，本质上是民族主义的。

土地政策是关键所在。在与国民党合作的统一战线形成之际，没收地主的土地已告一段落。地租压到适当的水平——在共

产党取得土地之前，地租高达60%——但是要得到保证。这既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也鼓舞了士气。

毛的税收政策也赢得了民心。税收曾一度被取消——毛的政府在统一战线的名义下从蒋介石的财政中得到补给。后来税收重又实行时，也是相当进步的，80%以上的家庭没有感到这是一个沉重的负担。

在整个边区还实行了选举制度。各级政府都采用"三三制"，即共产党员的数量在政府机构中不超过三分之一，三分之一的名额是非共产党员的左派分子，另外三分之一是毛称为中间分子的人物。

这些措施并不等同于西方的民主——尽管在政府机构的选举中有时共产党员得票最多——但是这改变了大西北的群众心理。延安精神的秘密就是参与。

在中国以前的历史上，还没有实行过普遍投票的选举（在江西苏区，"剥削阶级"是被排除在外的）。

当然，选举者在选举领导人时没有选择的余地。但是，普通老百姓称之为的"我们的政府"，是从未有过的新鲜事。毛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对其统治者的态度。每一个男人、女人和孩子都有一种集体责任感。一种民主意识似已存在。[13]

毛这位半知识分子开始对知识分子表现出尖锐的矛盾心理。随着大城市中人们对国民党的越来越失望，学生、作家、艺术家和其他知识分子涌向西北。他们寻找新的角色，充满活力和爱国气氛的延安为他们提供了活动的场所。

这些知识分子认为延安根据地是一块磁铁，毛对此感到很自豪。他欢迎他们的到来，不只是因为蒋介石冷待他们。

然而，毛没有把知识分子视为他的斗争中的重要角色，而且他坚持不懈地抵制他们绝对自由的要求。

对文人学士又爱又恨的复杂态度，反映了仍然存在于毛潜意识之中的两种影响。

看来，毛没有忘记1919年他在北京大学受到的冷遇。这使他有一种纠缠不清的心理欲望，一有机会就把知识分子置于他们应在的位置。

毛憎恨过他的父亲，然而最终，父亲的幽灵还是在他身上有所浮现。他的父亲不喜欢看到毛读书，年轻的毛反抗过这种狭隘的思想意识。但是，毛嘲笑读书的某些做法很象他父亲在韶山曾经做过的。

或许毛的父亲对他的影响最终还是超过了他的母亲，如果说这种影响只存在于潜意识中的话。他的母亲曾是他反对父亲的同盟军，但是，他的父亲正是一种楷模，是毛的人格特征中某些方面努力仿效的榜样。

老毛先生坚持要从事体力劳动，年轻的毛憎恨在田里干活。然而，延安时期（和以后），毛把知识分子赶出他们的书房去参加体力劳动。

老毛先生曾独断专横，他批评儿子的懒惰。现在，毛的社会主义哲学已经形成，其核心主要是强调意志。

所有这一切，都说明老毛先生不仅曾是儿子的压迫者，而且亦使毛的潜意识中存在着一种欲望，即希望成为令父亲满意的人。延安时期，压制的阴影又笼罩在被毛泽东“整顿”过的人身上。

还有一种性欲冲突。在江西，按照中国当时的标准，毛是一个从思想到行动都主张爱情和婚姻自由的人。但是在延安，毛号召把所有的精力都用在民族的事业上。他认为人们考虑性的问题是一种精力的浪费，不过他自己不包括于内。

在这个问题和其他一些问题上，毛与一位大胆的女性观点相佐。这位女性这时是延安《解放日报》的文学编辑，叫丁玲。丁

玲是一位来自毛的家乡湖南的活泼而坦率的作家。*三十年代，很少有象她那样的作品如此生动地描写了公私观之间的冲突。

这位延安的圣人不相信社会主义意味着性关系的自由放任。他于 1944 年颁布的婚姻法比斯大林颁布的婚姻法更轻视家庭。离婚比以前更难，实际上，妻子要想与正在作战的丈夫离婚是不可能的。

十名来到北方加入共产党行列的青年学生组织了“自由恋爱俱乐部”，他们被一一逮捕。⑭

毛对这些事变得愈加小心，原因有很多。共产党的社会激进主义的所有特征都要与统一战线的温和的性质相适应。

其次，陕西农民的思想观念要比江西农民的思想观念落后。他们是“水”，共产党的军队这条“鱼”必须在水中才能生存下去，因此，不能完全忽视他们的保守观念。

而且战争有它自身的逻辑，“我们的”努力就是一切，“我的”打算一钱不值。民族战争是衡量一切的天平，是一个毫不怜惜个人意愿、焚毁脆弱的个人幻想的大熔炉。**

毛个人婚姻的起伏变化，也使他从心灵上关上了自由的大门。他曾经问自己爱情的意义何在（如在与史沫特莱的对话中）。他与贺子珍关系的破裂是他 40 岁以后的事，他现在似乎感到需要一个长久的伴侣。

毛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和江青一起生活了三十多年。他安定了下来，孩子成了他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性问题的“一杯水”已经蒸发。

---

* 丁玲以所著《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而闻名于全国。解放后在“反右”和“文革”中均受到大的冲击。——译注

** 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对自由的限制是与自我防卫联系在一起的。在毛的最后几年中发生过这样一件事：一位住在西安的澳大利亚少女爱上了一位中国青年。这对情侣要结婚，北京不顾澳大利亚总理的干预，长时间不予批准，因为这位男青年的父亲是一位军界要人。直到毛死后，他们才获准结婚。

他以自己的经历为别人制定规范。

丁玲批评毛和共产党在妇女问题上的退却。1942年的“三八国际妇女节”，丁玲写了一篇题为《三八节有感》的短文，文章质问共产党（她属于这个组织）是否还是性解放的先锋。

与毛不同，她瞧不起结婚。尽管毛刚与江青开始温暖的家庭生活，丁女士却敢于揭示领导人的夫人将面临的特殊命运。

丁女士指出，如果一位女同志不结婚，就会受到责难；然而如果她真的结了婚，不是因为工作而忽视了家庭义务，就是耽于孩子和家庭的负担，没有起到一个新型社会主义公民应起的作用，结果都会受到批评。

毛的延安成了大男子主义者的俱乐部，只有很少有魄力的女性在一些特殊的岗位上工作，男女的性别比例和军队一样是18:1。根据毛在长沙时的朋友蔡畅的说法，整个延安没有一名女性来自劳动阶级家庭（但是她“忘了”江青）。

在丁女士写下那篇满是怨气的文章之后，不久，毛找到了讽刺挖苦丁女士的机会。在一次文化界人士合影时，毛看到丁玲到来，就从他在前排中间的位置上站起来，很有礼貌地对这位固执的女性做手势连声说：“让我们的女同志坐在中间嘛，我们可不想在下一个三八节再挨骂。”[15]

在关于政治与艺术的关系问题上，毛与来自上海亭子间的一批知识分子展开了斗争。

毛排斥“为艺术而艺术”，[16]知识分子的每一件工作都要服务于加快中国的解放这一明确的目的。这种观点使他不仅与丁玲而且与大多数左翼知识分子关系紧张。他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提出这一强硬的列宁主义路线，遭到了知识分子的抵制。

毛向延安的文艺界扔出了几枚思想炸弹。

毛嘲笑“独立呼吁”，⑰这既是理论之争，又是政治策略之争。“真”和“爱”脱离了时代具体的阶级斗争也就变得毫无意义。作家是党的事业这一大型“机器”上的齿轮（毛在这里受到列宁的影响）。

毛宣称：“一个人只要他对别人讲话，他就是在做宣传工作。”⑱这一未经推敲的粗糙观点是毛的发明。学习是改造世界的武器，他在长沙初露头角时已经感受到这一点。而在延安，他看到作家、艺术家仅为自己的爱好而工作。他们还没有象他那样，把思想作为推动时代进入新社会的车轮。

与卢梭一样，他希望把有思想的人赶回到更艰苦的生活道路而使头脑更简单些。

象一位掌权者会做的那样，毛坚持认为，在面临敌人威胁的情况下，来自知识分子的批评会损害民族的安全。有几个价值观念支撑了他的论点。

毛认为：落后的但是可靠的陕西农民比来自东部的吱吱喳喳的知识分子对战争更有用。他迁就农民，因此，这几年实行了温和的土地政策。但是他觉得对舞文弄墨的人没有这种必要。

“不允许把看法变成结论”，⑲毛对延安的文艺界宣布。换句话说，你只有提出正确观点的自由，不正确的观点不允许公开提出来。

年轻时的毛认为威吓是捍卫真理的武器。他绝没看到这易使人从尊重正确的东西转而走到错误。在延安，这种本能开始在制定充满强制色彩的政策方面发生作用。

毛还要求知识分子在他们的艺术作品中只描写生活中光明面，创作应提供比“日常生活”“更高的境界”。

在四十年代，人们不会毫无怨言地轻易接受这些观点。《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开始了毛与中国很多富有创造性的知识分子的对立，这种对立持续他的整个后半生。

在延安，在各个领域——不独在文化界——毛创制了新理论学说。毛主义已经诞生，这很难说它是某一单纯幼稚的概念思想或观念的综合，应该说，它是为生存而作的艰苦斗争的副产品。

1942年以前，日本人的侵略是毛首要关心的问题。东京制定了灭绝人性的"烧光、杀光、抢光"的政策——美国在越南也与此相似——以此对付中国共产党。这给红区带来的损失是最为惨重的，因为这时国共统一战线在趋于萎缩。

蒋不仅不再给毛的边区以援助，反而对它实行严厉的封锁。"人民战争"是否还有足够的场地和人力进行下去呢？

在中共内部，毛在上层遇到的敌手与长征时期相比要少得多，但是他在下面遇到了更为棘手的问题。

张国焘不再是毛的障碍，他于1937年灰溜溜地跑到延安。*他的军队在西藏的荒山野岭中差不多丧失殆尽，他本人也威信扫地。毛静静地等候张国焘自生自灭。这位泄了气的对手住在延安近郊一所漂亮的房子，在抗日军政大学讲一点课，象往常一样，他把自己好好地保养起来了。

张和毛在最后一次见面时一场好戏发生了。[20]事情是因干部子弟学校的学生演出的歌舞节目所起。张的儿子是这所学校的学生(在延安平等主义的高原中，特殊化已开始露头)，这个小男孩以其歌唱和演剧才能而著称，自然在哑剧中扮演了一个角色。

但是，令张国焘勃然大怒的是，他儿子演的是一个叫张慕焘的反面人物，是一个叛徒。

毛观看了这场演出，与其他领导人一起欣赏孩子们的表演。根据张的说法，毛在看到叛徒受到责骂时笑了起来，"由张国焘的儿子来演张慕焘是再合适不过了。"

---

* 朱德与张国焘一起到的延安，虽有不愉快，但他逐渐恢复了与毛的关系。

毛的老对手马上站起来，撕下他儿子脸上的面具，一边拽着儿子走出大厅，一边愤怒地吼道："畜牲！混蛋！猪狗不如！"

不久，张离开延安倒向国民党一边，毛再也没有见到他（张在加拿大居住了很多年，直到1979年去世）。毛没有处死、伤害或赶走张国焘，张一直呆在领导机构中，直到离开延安。

毛对他三十年代的第二名主要对手态度也很冷淡。王明于1937年终于从莫斯科回国。他从"投降主义"的立场出发，攻击统一战线。这在两年时间里，使毛很恼火。但是他深受斯大林的赏识——据说"西安事变"时斯大林发给毛的电报就是由王明草拟的——在全民抗战期间这是一个主要问题。

"你是中国人还是俄国人？"在统一战线破裂的一次会议上，一位国民党官员怒气冲冲地问王明。后来，他又从极左转而极力讨好国民党，支持与蒋成立联合政府，使他看上去象是"红萝卜"（外红内白）。1939年以后，他失去了在中共权力机构中的高位。

毛并没有惩罚或者报复这位28个布尔什维克的旗手。

王明仍不断地坚持自己的观点，四十和五十年代他都在中央委员会中（博古也是如此，直到1946年去世）。*

在1937—1940年间，统一战线的工作对共产党来说是辉煌的。这反而给毛带来一种潜在的危机。接连的成功使共产党的队伍不断壮大，很多刚来延安的年轻人不象参加过长征的老战士那样意志坚定。爱国者大批地涌来，但是当要最后摊牌的时候——

---

* 王明在莫斯科的经历或许使他知道：不成功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他应能回忆起，1937和1938年两年中，70%的苏共中央委员被逮捕或杀害。

我们可以相信王明下面的陈述，由此可以看到四十年代后期毛王的关系。他们正在争论关于苏联的问题，王明的妻子走了进来说："我在到处找你，原来你们两个又争了起来，我说你最好回家吃晚饭。"一直呆在角落旁听的江青同意王太太的意见："你来了太好了……这两只老公鸡真没办法，他们一见面就斗……你把你的拉回去吃饭，我把我的拉去吃饭，他们就不能再斗了。"[21]

1942年，毛已意识到他可能要再次对抗国民党——他们会不会支持共产党的这一目标？

更加困难的日子在1941年到来，经济困难使毛不得不第一次开始向农民征收赋税。在1942年，他甚至还发行了奖金丰厚的彩票。难道说与群众蜜月般的生活已成为过去？

因为红色敌后根据地具有分散的特征，共产党起着政府的作用，这产生了官僚主义和对名利的追求，有些人认为边区政权正在走向穷途末路。

委员会增多，小恺撒突现。棉布服装也开始分成三种不同的颜色，以表明人的等级身份。延安精神不再是唤起群众斗志的灵丹妙药。

在这种形势下，毛把毛主义的理论集中起来——这可以实现多个目的，也使毛成功地压倒了共产党内部的所有对手。

为整顿党的工作作风而开展了“整风运动”（毛这样称）。毛主义为这场运动提供了精辟的教材。

同时整风运动给中国革命提供了思想理论体系——不是产生于莫斯科而是产生于国内的思想理论体系。

毛在整风开始时的一次千人大会上中肯地说：“我们的理论还落后于革命实践。”[22] 在延安，这位历次斗争中的胜利者开始回顾自己的斗争方法，他有了时间把这些宝贵的经验升华到哲学的高度。

长征途中，毛没有精力——甚至也没有纸张——写作政治文章。四十年代，毛读了很多马克思、列宁和斯大林的著作，他们的名字点缀了毛延安时期写下的文章。

然而，毛在引用这些西方大师们的话时有一个自相矛盾的地方，他读他们的书越多，对他们的敬畏就越少。他之所以援引马克思、列宁和斯大林，主要是为了支持和美化自己的思想体系。他认为他的思想体系与他们的有共同之处。

毛在著名的《实践论》中说："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变革梨子，亲口吃一吃。"㉓毛主义意味着从实际出发思考问题。

毛把经验——而不是问题——置于认识过程的核心地位。这种非同寻常的唯物主义，可能会让马克思也大吃一惊。

28个布尔什维克批评毛是"狭隘经验论"，但是他仍执着地坚持自己喜爱的公式。在整风运动中的一次讲话时，他说："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㉔毛主义意味着调查研究与发言权这两者的很好结合。

这位农家子在湖南的经历——加上他坚持己见的勇气——使他把农民看作是中国革命的脊梁。

毛反对共产党的领导者（他们有很多人）把马克思主义教条看作是包医百病的灵丹妙药，而忘记了它所要影响的对象。

"无的放矢"，毛在一次讲话时这样批评知识分子，这篇讲话就是著名的《反对党八股》。毛主义意味着把听众所需掌握的内容与听众看作同等重要。

一天，毛在延安的一堵墙上看到一幅标语："工人农民联合起来争取抗日胜利。"这位半知识分子犀利的眼光发现"工人"二字写成了"エ人"，㉕他认为一般人看不懂这些字，于是在一次讲话中很恼火地讽刺挖苦这种故弄玄虚的书法。

他要求人们学习有用的知识：

> 做饭当然是一门艺术，那么书本知识呢？如果你什么都不做，只是读书，你只能认识几千个字，只会翻字典。手中拿本书，吃着人民供给的小米。然后你心满意足地点点头，再去啃书本。

作为民粹派的毛这时已羽翼丰满，他对繁琐哲学的厌恶使他

象他父亲一样讲话：

> 书没有长腿，你可以随意打开合上。读书是世界上最容易的事，比大师傅做饭要容易得多，比屠夫杀猪容易得多。猪有腿能跑，他必须捉住这头猪，他杀猪，猪会叫。放在桌上的书不会跑，也不会叫，你可以随意翻它，还有什么事比这更容易吗？

这位教书匠开了一系列药方：

> 所以我劝那些只有书本知识但还没有接触实际的人，或者实际经验尚少的人，应该明白自己的缺点，将自己的态度放谦虚一些。[26]

毛不拜倒在“现成书本”脚下。他建议共产党员到城市去，到农村去，亲自体验一下中国的实际生活。土匪和“名妓”都可以讲出很好的传记题材。

与此同时，亦受孔子思想影响的毛认为文字是很有影响力的。他告诉干部们，不要利用平民对文章的敬畏，而去用官样文章吓唬人。

毛推论说：“一个人偶然一天两天不洗脸，固然也不好，洗后脸上还留着一两个黑点，固然也不雅观，但倒并没有什么大危险。写文章做演说就不同了。”[27]毛主义的意思是，与群众讲话要诚心诚意。

所有这些都是对28个布尔什维克的猛力一击。他说：“十七、八岁的毛孩子”——王明和博古都比他年轻很多——“倒学会了对《资本论》和《反杜林论》吹毛求疵。”[28]他甚至指责他们不是革命者。

“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关系，就是箭和靶的关系。”但是，“有些同志则仅仅把箭拿在手里搓来搓去，连声赞曰：‘好箭！好箭！’却老是不愿意放出去。”

毛继续说：“马克思列宁主义之箭，必须用了去射中国革命之的。”“不然，我们为什么还要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呢？”㉙毛继续沿着以中国为中心的实用主义道路走下去，“我们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是为着好看，也不是因为它有什么神秘，㉚只是因为它是非常有用的。”毛主义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这一激进的德国哲学，移植到中国实用主义哲学的土壤之中。

“教条主义狗屎不如”，他对傲慢的极左主义者说，这是他在整风运动中所要反对的主要问题，“狗屎可以肥田，人屎可以喂狗。可教条主义呢？既不能肥田，也不能喂狗。有什么用呢？”

对那些自以为能背诵苏共教条就是一种成绩的人，毛给予直截了当的批评。他把这些错误的狂热者比作“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㉛

这很象是在东山小学读书时的毛泽东，他讨厌油嘴滑舌的纨绔子弟把书本当作仕途的阶梯。现在，他批评党内的形式主义者，因为他们对待马克思主义教科书也是这种态度。

毛用一个术语来说明马克思主义思想要适合中国的具体情况——“中国化”——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运用。㉜但是，这一点是令人费解的，作为一种社会理论的马克思主义自产生时起就是相当“欧式的”。能够“中国化”吗？毛认为能。

他在1938年写道：“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这回事，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㉝

把马克思主义的学说译成汉语，已经赋予它以新的意义。“无产阶级”——“没有财产的阶级”——在中国人看来并不单纯地

指城市的工人阶级。*

"大同社会"，这是毛对中国未来的乐观展望，它比"共产主义社会"更令人迷惑。因为"大同"是指一种乌托邦式的黄金时代，被认为曾存在于中国的古代，现在已无处可见。

对马克思的某些结论，毛是反对的。这位德国人认为历史发展要有五个阶段，中国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使毛相信奴隶社会可以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可以跳过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两个阶段。

马克思所作的其他一些论点，毛则加以发展以赋予新意。是的，城市工人必须"领导"革命，但是农民是它的"主力军"。

毛引鉴了马克思的学说，但是毛主义并不完全等同于马克思主义。

在官方出版的《毛泽东选集》收编的158篇文章，有112篇是在西北写就的。这些文章包括了他的所有主要哲学著作，文章的语气是圣人的语气。

毛在一次讲话结束时意味深长地说："希望同志们把我所讲的加以考虑，加以分析……每个人应该把自己好好地想一想……把自己的毛病切实改掉。"[34]

甚至，他的谦虚也是以一种特殊的方式表现出来。他在一篇谈研究方法的文章的序言中写道："我自己也是在黑暗中摸索这些事情。继续当一名小学生，这就是我的志愿。"[35]

十五年以前，毛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表现出的勃勃生机，已经埋下了潜在的线索：他将象一位导师一样对全中国讲话。

---

* 毛没读过德文原版的马克思著作，他所读的这类书已经带有中国的思维模式。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快要结束时，毛召开了一次中共代表大会。自1928年在莫斯科召开第六次代表大会以来，这还是第一次。毛没有出席中共六大，他当时在井冈山。

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对毛和毛主义来说是一次辉煌的胜利。从“1928年的莫斯科”到“1945年的延安”，在时间、空间和中国革命的进展方面，都是很长的一段历程。

“一个胜利的大会，一个团结的大会。”毛在延安的枣园里*贴切地说。这时，富兰克林·罗斯福已去世，希特勒也已在已成废墟的柏林自杀。参加会议的代表是从120万党员中挑选的，中国共产党这时已成为世界第二大共产党。

代表们坐在木制长凳上，前面是一排绿色植物和一幅巨大的毛的画像。二十四面红旗标志着中国共产党自诞生时起走过的历程，每一根柱子上都有一个很大的“V”，表示中共所属的盟军反对法西斯主义的胜利。

灰色的砖墙上也有一些标语，这是毛努力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结果，同时又带有儒家道德的气息。

“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一幅标语这样写。“同心同德”，这是会场后边的一幅标语。

新的党章提出“毛泽东思想”是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没有提到斯大林的名字。

现在，莫斯科已经意识到，毛战胜了王明。同时，毛并没有改变自己的观点，向北顶礼膜拜。

毛总结了党早期斗争失败的教训和遵义会议胜利的经验。他在报告中的发言对苏联是尊敬的，但没有提到苏联对1927年以后的中国革命提供了帮助。

……

---

* “七大”后七届二中全会会址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校注

毛被选为新设的中共中央主席。

他静静地听着王明、博古等人对他的赞扬，这些人曾反对过他。他也听说了给张国焘起的“军阀”的别号。

刘少奇已是中共的第二号人物。他在一次讲话中共计一百零五次提到毛的名字，毛对此并不感到难为情。刘少奇宣布：“我们的伟大领袖毛泽东……把我国民族的思想水平提到了从来未有的合理的高度。”㊱

与代表们共同举杯时，毛显得和蔼可亲，并无矜持之态。会议厅的上层就是乒乓球室，这里也有胜败之分，有竞争而不强调团结。毛拿起球拍，他的球艺不高，但他的一位同事注意到毛总是“泰然自若”把球输给对手。㊲在那里“团结胜利”的大会分出了胜方和败方。

成熟的桃子(1945—1949)

对于毛来说，四十年代末不是进行理论建树的时期，而是实施闪电般军事行动的阶段。政权，象一只成熟的桃子，引诱着他。

毛制定了一系列决策。他开始向美国友好，然后又愤愤地转过脸去。他又一次与蒋的国民党打了起来，其获胜之易可能连他自已也感到吃惊。他在与苏联沉闷的婚约上签了字。

美国之于毛恰似中国之于罗斯福——遥远处的一丝微弱的灯光。零零碎碎的报道使毛在心目中为美国，这块华盛顿从英国的欺压下拯救出来的土地，勾画了一个讨人喜欢的形象。

苏联和日本近在咫尺，而美国还只是存在于想象之中。

到1944年，一切都发生了变化。毛需要美国帮助打败日本人。然而，山姆大叔以蒋介石的支持者为伪装，已经站在了中国的门前。毛开始思考美国在战后亚洲的角色，他曾希望中国成为亚洲的中心。

在延安，毛对美国的兴趣使那些受过他挖苦的美国记者迷惑不解。现在，毛已能获取国际新闻资料，他象经纪人阅读股票行情那样，研究起美国来。

毛看过几部美国电影，他认为《愤怒的葡萄》很出色，贝蒂·格拉布尔的表演使他惊叹不已。在描写美国士兵在意大利作战的影片《太阳之行》中，美国士兵那种无忧无虑的风格使他惊讶——他们是在打仗，还是在野餐？查利·卓别林是他非常喜欢的一名演员。①

1944年夏，一架满载美国士兵和外交官的C—47飞机在延安的黄土冈上降落。毛乘着用救护车充当的大轿车来到机场，欢迎“迪克西使团”。*

这是毛平生第一次与美国政府官员握手。

在与戴维·巴雷特上校、二等秘书约翰·S·谢伟思等人会面时，毛显得小心翼翼，但并不是不抱希望。在延安，毛与罗斯福拼凑的代表们举行了会谈。

迪克西使团的延安之行是约瑟夫·史迪威将军促成的，这位远东战区司令试图估摸一下共产党的实力，以便帮助美国结束对日战争。“刻薄的乔”**对共产党颇有好感，并希望与其有更密切的合作，以便给战争注入新的活力。

毛在1944年似乎是亲美的。他已感觉到美国军队要踏上中国的土地与日本人作战，但没有预料到美国人会使用原子弹。他对此表示赞赏，并开始欣赏美国来访者无拘无束的风格。他甚至同意美国的建议，派一名美国将军来统率中国的所有军事力量（蒋介石对此不同意）。

与迪克西使团的成员谈话时，他常使用“民主”一词，②好

---

* 迪克西（Dixie）指美国南部各州。——校注

** 系史迪威的绰号。——校注

象这是延安和华盛顿共有的价值观念。但是，西方人都知道，毛没有成为西方民主的崇拜者。他在国际场合所谈的民主，也就是“反法西斯主义”。

到了五十年代就可以看出，毛坚持用激进的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待美国的前途。

信息灵通的美国人对蒋的国民党的自负、腐败和无能十分失望。毛对美政策的思想也是围绕着国民党而考虑的。

除了打败日本人之外，毛还希望罗斯福停止给国民党提供美元和援助。不然，共产党与国民党的战争将会是长期的、艰苦的。

毛努力想让美国人相信：共产党把握着未来。蒋介石没有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的支持，如果华盛顿认识到这一点，中国的内战或许可以避免。如果美国承认共产党有着与国民党平等的地位，或许可以组成一个联合政府。毛坚信，即使有这样的联合存在，他也会战胜蒋介石，就象黎明会取代黑暗一样。

毛发现，要使罗斯福相信中国共产党能战胜国民党，很不容易，比说服斯大林要困难得多。

毛很晚才获知美国政界对中国事务所采取的态度。蒋介石和他的妻子已经活动了几位关键的共和党人，结果他们百分之百地同意支持国民党。因此，在这种处境下的罗斯福，不得不谨慎地对待蒋。

在中国问题上，“刻薄的乔”与克莱尔·陈纳德将军存在分歧。陈纳德不希望与毛合作，而是要用强大的空中力量结束日本的命运。罗斯福的来自俄克拉荷马州的“推土机”帕特里克·赫尔利少将，反对史迪威及国务院中一些中国问题专家们所持的观点。

可怜的毛被蒙骗了。没人告诉他，美国在对待中国问题上，

70%的时间是在唇枪舌剑地争吵，而只有30%的时间是在采取行动。

帕特里克·赫尔利于1944年后期到延安。毛赶到机场迎接这位罗斯福的私人代表。赫尔利用莫希干人战争呐喊般的声音介绍自己，他的喊叫甚至会使周围的尘土飞扬起来。办事干练、具有尚武精神的赫尔利——据说他可以马步站很长时间——穿着佩有勋章的军官制服。毛平静地走上前去，穿着没有形状的棉衣和布鞋。

"毛思同"，他的一位助手听到赫尔利这样向毛泽东问候。而另一位助手则听到这个咋咋唬唬的使者在叫"毛思董。"*

毛和赫尔利挤进救护车。③ 国际交往中很少有过这种严峻的考验。

当他们经过延河的时候，毛向赫尔利描绘延河水冬天怎样涨满，夏天又怎样干涸。赫尔利回答说，俄克拉荷马的河流夏天也只有很少的水，所以只需观察鱼儿在水中搅起的浑浊，就可以追踪鱼群。

他们看到一位农民用木棍赶着骡子，赫尔利把头伸出窗外，用英语向农民建议道："查利，打它的那一边。"毛插话说，他小时候在韶山时曾喂过骡子，赫尔利说他曾经做过牛仔，然后粗鲁地大叫一声"呀呼"，来描绘他的那一段生活。

"这家伙是乡巴佬。"④ 毛后来对朱说。从此，"乡巴佬"就成了赫尔利在延安的绰号。

无知是赫尔利的最大问题。他对中国或马克思主义的了解还不如毛对莫希干人的战争呐喊知道得多。他甚至也不了解他的朋友蒋介石。

---

* 赫尔利发音不准，将"毛泽东"称呼为"毛思同"，他的助手听起来象是在说mouse tongue。而另一位助手则听成"毛思董" moose dung——校注

毛和赫尔利制定了国共联合的方案。毛对这一方案很满意，他们都在上面签了字。但是在重庆，国民党的领导人嘲笑这一"五点方案"。

毛对巴雷特上校说他怀疑蒋是否真会同意这一方案，因为赫尔利说在他来延安之前蒋已经知道方案的要点。

赫尔利有着坦克车一样的外表，但从智力上讲，他就象靠垫一样软弱。不几天他就改变了自己对"五点方案"的态度。接下来的一年，他一直使美国的政策倾向于蒋——直到他愤愤地辞职。他一直认为，国民党的日趋衰败是由于美国国务院的亲共态度造成的。

毛又打出了一张牌。看来，最高首脑会谈是唯一可行的途径，他要求到华盛顿去。

他的信件于1945年1月交给迪克西使团驻延安的办事处，希望他们转交给"美国最高官员"。⑤信中说，毛泽东或周恩来，或他们二人，已作好赴美的准备，如果罗斯福总统把他们当作中国主要政党发言人接待的话。

毛要求，如果罗斯福总统不打算邀请他们，请予以保密，以免激怒蒋介石，因为中共正在与国民党进行不愉快的谈判。

赫尔利扣压了这一信件。信件先到重庆，因为这位俄克拉荷马人当上了驻华大使。信件一直没有送到"美国最高官员"的手中，直到最后有人向罗斯福抱怨巴雷特上校与中共秘密联系时，这封信才被发现。毛始终没有得到答复。

十周以后，毛听说谢伟思要被召回华盛顿，他马上邀请这位年轻的美国外交官交谈了半天。毫无疑问，他猜测谢伟思是回去安排毛周对罗斯福的访问（谢伟思自己也不知道他被召回国的原因）。毛错上加错。

仲夏时节，谢伟思被逮捕，他被指控向左翼的《亚美》杂志泄露机密。毛更加心烦意乱。罗斯福在蒋的坚持下已经把史迪威

将军解职。现在，赫尔利把那些认为毛将掌握未来的美国官员一一赶了下去。

毛写了一篇题为《赫尔利和蒋介石的双簧已经破产》的文章。[6]他对美国的调情，同罗斯福的生命一样，已经接近尾声。

这位俄克拉荷马人和蒋总司令又挑起了一轮新的国共内战，这差不多等于把中国的未来拱手交给了毛。而且迫使毛更接近苏联，比已有的或他所希望的关系还要近。

赫尔利和蒋介石所坚持的一切都在向下滑去。

当年秋天，当毛看到苏联与蒋的政府签订了友好同盟条约时，一种与美国合作的新的兴趣再次闪现。但这也只能是昙花一现，因为华盛顿现在完全听命于蒋介石。

在美国“失去”中国的前四年，毛就放弃了美国。

巴雷特在毛和赫尔利之间两头受气。当赫尔利带着“五点方案”回去之后，这位倒霉的上校被派往延安，与毛协商是否有补救的可能。毛发了脾气，怒斥蒋介石是“杂种”。

他叫道：“如果你们美国人吃饱睡足了，想指责人民，支持蒋介石的话，那是你们的事，我不想干涉。”[7]

他盛怒之下所作的预言在将要发生的悲剧中得到了验证：“如果你们愿意，那就支持他吧。但是请记住，中国是谁的中国？它肯定不是蒋介石的，它属于中国人民。当你们无法再支持他的时候，这一天就会到来。”

赫尔利爱插手军事和外交问题，他的部下厌烦地称这位老板是将军大使。当巴雷特去向这位将军大使汇报时，[8]赫尔利也暴跳如雷地骂毛思同先生“混蛋”。

毛在延安从赫尔利那儿听到的大多是美国革命时的术语。毛可能从未听说过“人身保护法”、“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赫尔利从美国《人权法案》出发，规定了他认为中国的战后联合政府应遵守的价值标准。

毛对此反感吗？不！与赫尔利的第一轮会谈结束后，毛的反应是值得赞赏的。可笑又可悲的是，那个对毛宣讲美国宪法的人，也就是后来在毛的脚下使绊子的人。

以这种方式接触到的美国民主信条，并没有使毛在五、六十年代增加对美国思想的信任。在《毛泽东选集》出版时，有关四十年代对美国表示热情的内容大多被删了去。⑨

如果毛当时访问了华盛顿，或许他可以让罗斯福相信，是他把握着中国的未来。这虽不能完全制止毛蒋之间的摊牌，但至少中国的内战不会持续三年，使三百万人命归黄泉。

美国可能也不会直到最后还支持蒋介石——实际上不止是最后——乔治·马歇尔也不会无力去做双方的调停工作。

毛极有可能战胜蒋，这在意料之中。不管马歇尔做些什么，即使让他自行其事，也无济于事。但是，如果毛在1945年作为政治领袖来到白宫门前，而不只是作为遥远的命运之神悬浮于美国人的想象之中，美国所受的震动要小些，所遭受的“损失”也不会引起如此强烈的不满。

毛的第一次出国应该是在51岁时到美国，结果却是56岁时去了苏联。他在其后25年间与美国的关系或许不应这样痛苦地陷入沼淖，也不应被战争和战争的威胁所中断。

抗战过去了，但和平却没有到来，紧张的气氛随着日本人的投降降临了。国共两党竞相受降，因为从日本人手里接过枪几乎等于控制了未来。为了这，相互责骂的电报在毛和蒋之间飞来飞去。

其时蒋暂时占优势，毛不得不让步。两大国际势力却站在蒋一边，美国的后勤援助，使蒋在接受日本投降时走在了毛的前面，而莫斯科与蒋的政府签订的条约，则使毛担心与国民党的内战将会长期而艰巨。

因此，毛决定赴重庆与蒋谈判。“鄙人亟愿与先生会见，共商和平建国大计。”他以中国传统的礼节用语给蒋发了电报，“弟亦准备随即赴渝。”⑩

一些共产党的领导人反对毛的重庆之行，认为没有美国对毛的安全作出保证，毛就不应该前往蒋的领地。

1945年8月，依然是热情奔放的赫尔利飞赴延安接毛。毛生平第一次走上飞机，第一次公开进入蒋统治的地区。在向南飞的路程中，赫尔利对世界形势发表了看法，毛则赋了一首诗。

毛至少这一次戴上了帽子。当他戴着太阳盔下飞机时，有人认为这是他采取的安全措施。毛看上去很警觉，同时又带有几分冷漠。

自1938年日本人攻占汉口以后，重庆就成了国民党的基地。它横跨扬子江，是一座山城，这对毛来说是新的景观。* 他住在红岩区一条小巷中的一栋舒适房子里，蒋调派一辆美国轿车供他使用。

这里的气候对毛来说热多了。十一年来他一直住在长江以北。延安的夏季干燥——尽管冬天寒冷——而重庆的夏天则潮湿，雾气缭绕，象一个澡堂。

自1927年他离开武汉以来，时隔18年，这是他第一次不以土匪的身份住进城市。许多人来访，报纸提到他的名字时也没有诬蔑之词。

毛见到了老朋友，也见到了过去的对手。他对每个人都表现出一种慷慨大度和爱国热情，与之互赠字画。毛把他的词《沁园春·雪》透露给了《新华日报》(这是他发表在主要刊物上的第一首诗词)。整个重庆都获识到毛对中国山河的热爱，都感受到毛的使命感。(译按：《沁园春·雪》一词最初发表于1945年11月

---

* 长征途中，毛曾到过四川省的部分地区，但是没有到过省会重庆。

14日重庆的《新民报晚刊》时，毛已于10月11日离开重庆。）

已逾二十载复未晤面的蒋、毛握手了。

这两个对手，一个冠冕堂皇，一个不修边幅。蒋的制服笔挺合身，戴满了勋章；毛的衣服则皱皱巴巴，暗淡无光，好象是从衣堆中任意拣来的（尽管他穿了一双新皮鞋）。

蒋看上去象钢柱，而毛则象杆竹。

据说，当时蒋很紧张而毛则镇静自若，这不一定确实。象毛那样嗜烟的人绝不会内心完全镇静，尽管毛当时慢吞吞地吐着青烟。

毛之所以能保持镇静，因为他知道他能智胜蒋介石，因为他相信他的事业（撇开个性因素不说）终将会战胜蒋。多少出于这样的原因，毛坦率爽快；而蒋则阴遮阳盖。

四十三天以后，毛和蒋签订了一纸协定，总司令工工整整地写上自己的名字，毛泽东的签字则是一挥而就，如行云流水。

协定没有解决任何根本性的问题，国共两党真的能够共掌政权吗？如果组成联合政府的话，红军真的就会遣散吗？但是，召开国民代表大会的事宜被小心翼翼地提到了日程，一些领土边界的划分问题也得到了解决。

当两位对手举杯共酌时，双方都笑容可掬。宴会上的其他人注意到了这种不可思议的场面，脸上却无一丝笑意。

回延安前的一个晚上，毛被邀出席观赏京剧。戏演到中场，一张纸条递给共产党代表团，周恩来极其不安地离开了座位。

毛泽东停在剧场外面的汽车遭到子弹的袭击，毛的一位助手中弹倒地，已经毙命。⑪周恩来面色煞白，他找来蒋的首席谈判代表，表达了自己的极度愤慨。

毛依然呆在座位上。他很喜欢京剧——尽管取得政权后他对之进行了压制——他要享受这种时刻的每一分钟。演出结束后，双方领导人参加了一个饯行宴会。毛已经忘记他的汽车受到的袭

击了吗？他宽宏大量地笑着举杯建议道："为蒋介石先生长寿，干杯！"

自剧场一面之后，毛再也没有见过蒋。

毛和蒋怎么能彼此信任？毛没有相信蒋，"世界上没有直路可走，要准备走曲折的路。"他回到延安后说。⑫他的重庆之行就是走曲折之路，他并没有认为与蒋谈判就此结束国共两党的争斗。他之所以去重庆，是因为国际形势迫使他不得不如此。苏联和美国（以种种方式）支持蒋的国民党，毛不得不对蒋以礼相待。

他之所以去重庆，还因为中国的"老百姓"不希望发生内战，毛不愿自己被人看成是破坏和平的人。

他去重庆的目的也在于显示一下自己的实力。蒋不得不邀请他，对毛来说，这比谈判的内容和结果都更重要。它及时地向中国和世界暗示，蒋还有一个对手存在，而且这个对手已经统治了一亿人口，并有一百万军队听其指挥。

"天无二日"。蒋对他的助手们强调说。⑬但是，毛的行动是要证明，中国的天空对这两个太阳会作出选择。

毛鄙视蒋。他不久就总结说："蒋介石已经没有了灵魂，只是一具僵尸，什么人也不相信他了。"⑭然而，他在重庆时掩藏了这种感情。*

有些共产党人对与蒋谈判实在没有兴趣，因为自1927—1937年，蒋这个人一直与他们作战，现在更是如此。有些人已经厌恶战争，他们相信，与蒋的谈判可能会取得成功——周恩来可能就是其中之一。

毛巧妙地回答了这两个问题。他坚持认为，世界是在不停的

---

* 王明曾说，毛在重庆与蒋交锋后，筋疲力尽，晕头晕脑，夜不成眠。但是，王明的这种说法是不足信的。⑮

变动之中，一切事物都不能仅从表面做出判断。现在是真实的，但未来也是真实的。如果一个人既尊重现在又想把握未来，须得迂回前进。

1946年初，马歇尔再次来到延安，这是他为缩小毛和蒋之间的裂罅作最后一次努力。[16] 陪同马歇尔的周恩来，对马歇尔的调解仍抱有希望。同毛相比，周认为有可能找到一条直路，因此，马歇尔发现周是一位更为直率和诚实的人。

毛对此几乎不抱什么希望。与一年前不同，他显得更独立。象一位演员一样，他已演完了在谈判中的角色。

在向马歇尔祝酒时，他讲的话一定带有挖苦和假心假意的味道："让我们为中美两国、为国共两党持久的合作，干杯！"

马歇尔在云里雾中，仍规规矩矩、按部就班地在直路上前行。飞机在延安机场就要起飞时，他问毛准备何时再与蒋谈判，"什么时候蒋邀请我，我什么时候去。"毛回答，声音象从远山中传来。马歇尔发自内心地预言："可以说，一个前所未有的进步时代还等着中国。"毛能以自己的方式证明这一点。

毛再也没有会见过美国官员，直到经历了三场战争和美国换了四届总统之后。

一切调解都失败了，马歇尔不久即离开中国。1946年秋，毛和蒋开始了最后一轮厮杀。双方都撤回了协定的条款。

毛知道，"两个不讲理的人碰到一块，就要打起来。"[17]

其后的三年对毛是有利的。他的军事计划收效极大，他的政治预言使他象一位技艺高超的奇妙魔术师。

政治局内出现了分歧——在土地政策上和取得政权的时间上——但这些分歧并没有成为削弱整体战斗力的相互对立。行政上失调的主要因素来自对胜利的头昏脑胀。

1946年，国民党占据着整个中国南部和西部人烟稀少的地

区。共产党的力量在北方很强大。毛的军队只有蒋军的三分之一，枪支弹药则是其五分之一。

第一年，毛继续采取防御战术，蒋介石四处出击。到 1947 年早期，世人确已相信，共产党象过时的黄花一样开始枯萎了。

特别是三月份，毛放弃了延安。他的一些同事希望坚守下去决一死战。莫斯科也认为撤退的决定是错误的，共产党的失败会就此降临。

毛并不伤感。他说延安"不就是几座窑洞吗，"他采用的是中国古代的战略，"失掉一座空城有什么关系，目的是要打败敌人的军队。"

蒋得意地飞到延安，毁坏了那里的坛坛罐罐。他预言，再有三个月的时间就可以彻底消灭人民解放军。三个月以后，他的军队被一点一点地吃掉，这是他在这座空城里叫喊时没有预料到的。

毛又回到了农村，再一次扛起枪。*

这一次，他骑在一匹精壮的马上。他从东部沿海地区搞来了质量尚好的香烟，他有了电台和较好的电话系统。

一年的流动生活使毛的体重有所减轻，虽然吃的食物一般来说并不坏。通常都有肉吃，有小米，有时还有萝卜和白菜。曾经有一周的时间断过粮，只得喝面粉和榆树叶熬的稀粥，"味道鲜美"，周恩来文雅地这样对工作人员说。[18] 不知道毛在喝粥时是否也这样说，他喜欢吃辣味十足的食物。

毛又一次患了重病，迹象表明，他得的是帕金森氏综合症。**

他的电报都是一些具体的指示。他和其他的人一起工作——

---

* 撤离延安以后，中共领导人兵分两路。毛、周和任弼时（一位与毛靠得很近的湖南人，如果不是在1950年去逝的话，会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高级领导人）在一起。朱德和刘少奇在一起。

** 1964年，毛在回忆1947年的生活时说："那个时候，我身体闹病，写字也写不得。"他不得不口授电报信件等，并由江青笔录下来。[19]

他不得不如此，因为小分队的指挥员执行他的命令——很少有时间去面对高山单独沉思。

毛的生活比在长征时期要好一些，但他的领导方法还是沿袭过去的。他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关在密室里与周恩来等人开会，秘书们跑进跑出，不断把前线的消息告诉他们，并与前线保持联系。

他把江青和在延安出生的女儿带在身边，全家人一起流动。

毛这时候没有产生新的基本思想，也没有写诗，至少在公开发表的诗词中，没有一首是这一时期写的。他只是为别人的诗续上几句。一天早晨，一名警卫员看到东边黄河上喷薄欲出的红日，即兴写了一首诗，可写到一半就写不下去了。毛听他读后说："可惜没有结尾。"说着就拿起笔在后面加了三句。

在毛的名字越来越为世人所知的情况下，他用了一个假名——李德胜，意思是"离得胜"。

他同一位从未见过收音机的老乡攀谈了起来，这位姓王的老汉正要把一个木盒子劈开当柴烧。"李德胜"尽其所知给他讲解电磁波的原理。"下次看到这玩意时，不要把它劈开当柴烧喽。"他告诫道。老王答道："不会的，我要用它听毛主席讲话。"[20]

毛开始流露出自己拥有权力的感觉，他的文章开始代表中国说话("要不这样做，中国人民也将不满意。"[21])。

蟠龙战役大获全胜之后，毛和周坐在一棵大树下收听共产党电台的广播。干电池收音机放在一只翻过来的木盆上，里面传来女播音员那爱憎分明的声音。她说到蒋的时候声音冰冷；谈到毛时则充满感情。毛对周说："这就叫爱憎分明，我们应该训练更多的、象她这样的广播员。"

如果能在一个村子里住上一段时间，毛总是在黄昏时分走出窑洞，坐在一只小凳子上，手中拿着一本《学英语》手册。他对外语仍提不起兴趣来。但是，1944 年和 1945 年间与美国人的接

触可能使他觉得学说一些美国话是必要的。一个战后国家领导人的形象正在形成。*

有一篇回忆文章把毛和周的勤奋作了不恰当的比较。"有时候，为了减轻主席肩上的重担，周总理睡得比主席还迟，起得也早。"㉒按照北京的标准，这是尖刻的评论。

然而，有意思的是没有一个人——甚至张国焘——暗示过毛缺乏毅力。

毛与国民党的将军胡宗南进行了一场激烈的决战。胡宗南在毛离开后就占领了延安，并在那里宴筵，他曾声称不占领毛的总部不结婚。㉓

毛的战士不足两万人，而胡宗南却有二十三万人马。毛在陕北打转转，使胡宗南过于分散自己的实力，并把他们引到人民解放军力量强大的地方。

毛的军队唱着："存人失地，地可复得。存地失人，地人皆失。"毛并不在意领地的丧失，而是把大部分时间用来与胡捉迷藏。他常常坐下来给他的工作人员讲故事。他要求警卫员写日记，以提高写作水平，并负责给他们修改。

胡宗南二十三万人马战线拉得过长。他们与老百姓的关系不好，在这方面比不上毛的"鱼儿"们。当胡宗南步步上钩时，毛开始行动了。他说："胡宗南象是一只拳头，我们要让他把手张开，现在，可以将他的手指一根一根地剁掉了。"

1947年底，毛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反攻。他与胡玩的把戏，也正是解放军在华北和中原地区同国民党军队要的把戏。

"人民是我们的铜墙铁壁。"㉔毛的话听起来有些夸大其辞，

---

* 五、六十年代，英语从毛的日程表中消失了。他可能认为，四十年代不应选择英语，而应选择俄语、阿拉伯语或西班牙语。六十年代北京出版的回忆文章中说，毛在内战期间学了"一门外语"，但一直没有说是英语。

但结果确是如此。"共产党有广大的民众，国民党有大片的领地。"1947年，一位美国军事观察家说，"在华北，70%的农民都倾向于共产党。"㉕

在东北，蒋介石上了惨痛的一课，只占有城市而不占有民心是没有用的。他的火车从一座城市到另一座城市，但看到的只是亲毛的农民将铁轨掀掉，扔进山里。蒋只占有火车站！这就是内战的局势。毛已稳操胜券。

城市中的很多人都支持毛，这是他的又一有利的条件。"要饭吃，要和平，要自由。"这是新的学生运动提出的口号。这一运动是反蒋的，因为蒋的国民党一样也不给人民。

住在农民窑洞里的毛，距这场小五四运动很远。他采取的政策是密切配合，而不是完全投入知识分子先锋的这些活动中。这与1919年是一样的，当呼唤新世界的呐喊此起彼伏的时候，他正在孔夫子的出生地前沉思。与1935年也完全相同，当学生运动在北平进行得轰轰烈烈的时候，他正在遥远的延安。

然而，1947年，毛马上就看到了城市反蒋浪潮的重要意义。毛称之为"第二条战线"㉖——第一条战线当然是指武装斗争。

1948年春天展开的几次战役，充分体现了毛的灵活机智。他从未反对过这种正面冲突，除非他认为自己的力量太弱，没有把握取胜。现在，他的力量变得强大了。转瞬之间，厮杀不是在毛的领地进行，而是在蒋所统治的地区展开。

蒋介石写了一本书《中国之命运》，预言他将取得全面的胜利。现在，中国这块屏幕上的画面以不同寻常的速度交替出现。每一个画面都显示蒋的国民党受到重创。蒋介石的半数军队在坚守防御阵地……"共匪"作为祖国的儿子为国家而战……蒋对他的一个刚丢掉一半军队的将军大发雷霆……毛在沉思，面部表情象如来佛般地泰然自若……蒋穿梭于机场之间……毛漫步于乡间小道。

到 1948 年 11 月，人民解放军的人数超过了蒋的军队。战争的天平更加倾斜。

激奋之中，毛写了一篇诗一般的文章。他说他的敌人“交上了厄运，整天呜呼哀哉，愁眉不展。”[27]

获得东北之后，毛没有直取北平。这使蒋以为毛无力那样做，但毛所为有因。这是为了让解放军有足够的时间休整，并使处于穷途末路的国民党军队更加陷入混乱。同时，也使林彪和他的指战员能够包围住五十万人的国民党军队，然后在平津地区把他们一点一点地吃掉。

与此同时，毛给国民党的几位将军传递了一个信息，敦促他们停止抵抗。“你们想一想吧！”他以兵家常见的口气劝道：“如果你们觉得这样好，就这样办。如果你们还想打一下，那就打一下，总归你们是要被解决的。”[28] 国民党决定顽抗到底。

与国民党预料的正相反，解放军先攻克了天津和一些小城市，而且几乎是用德国人的效率一一拿下的。如果李立三和奥托·布劳恩没有与毛作对的话，他们看到这种场面时，一定会欣喜若狂的。可惜的是，他们在错误的时间里想做正确的事情。当然，他们早已离开了决斗场。

到 1948 年春，毛的胜利已经伸手可触。象蛇蜕皮一样，他已摆脱了 1946 年—1947 年的那种谨小慎微的心态，因为这样的日子已经过去。

毛的一些同事对胜利所抱的期望要比毛低。“我们不会失败，”1946年彭德怀将军坦率地说，“但是，我们确实不可能打赢”。[29]

刘少奇等人认为，中共应暂时满足于把中国分成南北两个不同的政权。按照这一慎重的理论，解放军渡过长江不仅与斯大林的意见相违背，还可能引起杜鲁门的干涉（1948年，美国有10万军队驻扎在中国）。

1948年的毛嘲笑了这种悲观主义的论调。

1921年，毛和肖子升一起乘船去上海时，他曾对肖预言说，共产党会在“三十到五十年”内取得政权。[30]他在1946年夏天预计要经过“一年半的战斗”。1948年春天，他谈到了“1951年7月”。1948年底，他宣布，“还需要一年左右的时间”，结果证明了他预言的正确。[31]

蒋成了一个急于讲和的人，一封又一封言辞温和的信从南京发出。但是现在，毛不愿意分享权力，他的言辞象勇往直前的解放军战士的刺刀一样坚硬。人民解放军从绿色群山中突起，于4月份一举攻占了这座美丽的城市，这是毛给南京的唯一的真正的答复。南京陷落不久，整个南方也都由解放军接管。

毛写了一首诗，他已有一段时间没有创作诗词了。诗中，他把南京描绘成虎踞龙蟠之地。

钟山风雨起苍黄，[32]
百万雄师过大江。
虎踞龙蟠今胜昔，
天翻地覆慨而慷。

诗的最后几句似是发之于毛的虎胆：

宜将剩勇追穷寇，
不可沽名学霸王。
天若有情天亦老，
人间正道是沧桑。

“人间正道”，是地道的儒家思想的翻版，但紧接着的后半句改变了孔夫子的意思。因为孔夫子从来不提倡用政治的力量带来

沧海桑田般的变化。

毛读过《伊索寓言》，他从中找到了“以怨报德”的逻辑为自己辩解。“一个农夫在冬天看见一条蛇冻僵着。他很可怜它，便拿来放在自己的胸口上，那蛇受了暖气就苏醒了，等到回复了它的天性，便把它的恩人咬了一口，使他受了致命的伤。”毛引用农夫临死时的一句话说，“我怜惜恶人，应该受这个恶报。”[33]

在这种决战的时刻，毛无须以猴的精灵施用任何诡计，楚霸王的自取灭亡则在于他怜及敌手。使世界发生沧桑变化的时机已经到来，没有任何东西能阻止毛抓住这个机会。

毛的胜利是对蒋的当头一棒。

“抗战胜利的果实应该属谁？”他问，“这是很明白的。比如一棵桃树，树上结了桃子，这桃子就是胜利果实。桃子该由谁摘？这要问桃树是由谁栽的，谁挑水浇的。蒋介石蹲在山上一担水也不挑，现在他却把手伸得老长老长地要摘桃子。他说，‘此桃子的所有权属于我蒋介石，我是地主，你们是农奴，我不准你们摘’。我们说，你没有挑过水，所以没有摘桃子的权利。”[34]

毛已登上了世界政治舞台。1945年的重庆之行使他为更多的人所知。1947年他在战场上取得的胜利使他成为人们敬畏的人物。

毛延安的办公室墙上曾挂有四幅伟人像：蒋介石，邱吉尔，罗斯福和斯大林（其顺序是按照西方的字母排列的）。这种排列顺序已经把中国置于世界强国之林。

到1948年，毛感到，他要做的就是取代蒋，成为中国的领袖。（在谈及国民党准备释放一名臭名昭著的日本战犯时，毛已经开始对蒋发号施令：“我们决不许可你们这样做。”[35]）他认为，他进入了世界的竞技场。接着发生的一次事件证明他是正确的。

英国人此时还认为这个东方古国是约翰·布尔的后花园，派了

一艘护航舰沿长江而上。"紫石英号"到南京以后，马上扬起国旗。水兵们抽着雪茄，拥进了这座摇摇欲坠的城市中的英国大使馆。

英国人已经习惯于控制柔顺的中国人。但长江此时已不在蒋的控制之下，毛的人开枪重创了"紫石英号"，23名英国人被打死。这艘护航舰象一条病鱼在长江里泡了101天。因为它的舰长拒绝签署一份文件，不承认"侵犯了中国水域"。[36]

英国下院对此大为恼火。邱吉尔称人民解放军的行动是"公然的暴行"。毛以一个简单的论点作了回答：一个主权国家不会允许外国船只在它的江河上任意航行。这位"共匪"已开始代表中国讲话了。

毛在一次声明中宣布："外国政府如果愿意考虑同我们建立外交关系，它就必须断绝同国民党残余力量的关系，并且把它在中国的武装力量撤回去。"这一今天看来符合逻辑的声明，当时却激怒了英国。

斯大林对毛的胜利所做的贡献是在毛接近政权边缘时要求他放弃努力。这位苏联人后来承认："我们当时认为，中国的农民起义没有发展前途，中国同志应和蒋介石寻求妥协，他们应该参加蒋介石的政府，解散自己的军队。"[37]

毛准确地预感到，一个战后的亚洲正在形成，而且要超出蒋介石、邱吉尔、罗斯福、斯大林这四个大人物的预料。他后来对"超级大国"的不信任，部分原因应归于1948年超级大国没有发出信号，欢迎他进入他们的俱乐部。

蒋介石向南迁至广州。美国大使这次没有随蒋一起走，其他主要国家的大使也都留了下来，他们都继续呆在南京。但有一例外，那就是苏联的使节随蒋去了广州，当华北地区在毛的领导下赤化的时候，他们仍依附在蒋这堆白骨上。

毛邀请莱顿·司徒雷登大使前来会谈。这是一个脚注，即毛对自己1945年试图到华盛顿与罗斯福会谈的一个注解。毛已经决

定中国将暂时偏向苏联，但毛的中国是否会与美国方面有事务联系，还不得而知。*

但是司徒雷登慌了手脚，而华盛顿对毛和司徒雷登的会谈表现出三心二意。**

1945年，在毛力量较弱的时候，应该来华盛顿，但是美国不邀请他。1949年，他已经强大，勿需去哪里求援。他以高姿态邀请美国官员会晤，而不是自己亲自去拜访，美国对此仍不感兴趣。

1945年，华盛顿看毛势力太弱，不愿和他打交道。但仅仅四年后，美国又认为毛太强，和他交往不会有什么好处。

毛愤慨了。不久，他就下令对驻在华北的美国领事馆人员采取强硬的措施。很多人被指责为"间谍"，并被驱逐出境。

美国与中共在南京的最后一次接触是令人不快的。司徒雷登在日记中写道："黄华坦率地说他们把美国当作敌人。"[38] 这位脆弱的美国大使回国不久便一蹶不振。毛写了一篇《别了，司徒雷登》与他告别，这是毛写的对美国最不友好的一篇文章。[39]

回过头来，毛说马歇尔的调解是企图"不战而控制整个中国"。他称蒋的政权是"美国殖民政府"。语言尖刻，带着强烈的反美情绪，时而还引述古籍。

毛不能隐藏他对美国的不满，因为美国富有，而中国贫穷。他讨厌美国的"慈善"胜过它的武器。"美国人在北平、天津、上海，都洒了些救济粉，看一看什么人愿意弯腰拾起来。"

美国对待其附庸的傲慢态度使他想起周朝时的一位渔夫，这位渔夫钓鱼不用渔钩和诱饵，渔线高出水面三尺，此谓之"愿者上钩"。

他引用中国古经典《礼记》中的一句话，告诫那些仍然希望

---

* 1946年，周曾对马歇尔这样说："我们将向一边倒，当然，倒向哪一边将取决于你。"——校注

** 美国一直没有公开毛对司徒雷登的邀请。

依靠山姆大叔的人："嗟来之食，吃下去肚子要痛的。"

在英雄气概之外表内，毛也有隐忧。因为美国曾是那样轻蔑地对待他，现在，他反过来羞辱美国，"没有美国就活不下去了？"声音如此之大，反而表现出他内心的不安。

为什么为攻击自由主义者——司徒雷登、艾奇逊——而对麦卡锡之类的保守分子毫不留意呢？美国的自由主义者是毛的主要敌人，因为他们吸引了中国的自由主义者，这为毛的亲苏设置了难题。

一些"第三力量"的人物，甚至一些共产党人，都很崇拜美国的民主。他们觉得美国（毕竟距离遥远）不象苏联那样可恶。毛在制订外交政策时，主要是想击中国内的目标，用中国的俗语说，"指桑骂槐"。

蒋介石知道没有美国他无法存在下去。在整个1949年一年，他企图说服山姆大叔——有黄金的支持——站在他和毛之间，此时他正被毛从一个城市赶到另一个城市。那一年他搬了五个地方，12月离开大陆去了台湾。

司徒雷登在他的日记中写道："蒋去福摩萨会招致许多问题。"[40] 但是司徒雷登和毛当时都不知道这些问题将会有多么严重。

是毛获胜了，还是蒋失败了？两者兼而有之。1948年，蒋介石在一次国民大会上承认，共产党比国民党更全力以赴，也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更多的好处。[41] 中国人民解放军战胜了国民党军队。中国的经济在蒋介石无能的手中已变得支离破碎。

军事和经济这两者的失败原因实际上是一个，蒋介石的支持者太少。

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问毛，对延安失守有何评价，毛回答说："人民战争不取决于一个城市的得失，而取决于怎

样解决土地问题。”毛之所以能打败蒋介石，是因为他深深地知道：战争的社会意义存在于中国广大的群山绿野之中。赢得了中国农村“老百姓”的支持，就等于赢得了战争。而蒋不了解这一点。*

毛泽东没有象蒋那样征兵征粮，引起人民的反对。他的部下也不象国民党军队那样，用一半的时间来建造自己的安乐窝。他没有依赖外国的支援，象蒋在1948年那样。(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从美国得到价值三十亿美元的援助，而同一时期，毛一点外援都没有得到。)

毛泽东赢得了知识分子的支持，知识分子们发现，蒋一边宣扬对自由世界的忠诚，一边减少自由的空气。一些爱国的知识分子看到他们的国家在蒋的统治之下正遭受极大的痛苦和折磨，正在走向崩溃。任何一个对未来抱有一线希望的人，都会对这种社会现实产生极大的不满。

蒋的精明只限于应付一个接一个的危机，鼠目寸光。作为一个谙熟历史而有真正力量的人，毛有着更长远的打算。

蒋是一个自负而愚蠢的人，常被事物的假象所迷惑。毛（在四十年代）头脑很清醒，是一位不受别人偏见影响的人，他所感兴趣的只是自己目标的实质。

蒋只是一介武夫，而毛则是一位思想家。对他来说，枪杆子只是一种工具。1943年，在共产党处于弱势的时候，蒋完全可以与毛达成一项对自己有利的协定。但他不了解战争和政治之间的关系，而毛却深谙其重要性。蒋只知道寻求军事手段来解决共产主义问题，结果既丢了军队，又失去了中国人民的支持。

毛在《红楼梦》中悟出了蒋介石和他的军队的处境。含玉而

---

* 与刘少奇相比，毛对蒋的态度更强硬，但在土地政策方面则“温和”些。他在一封电报中提醒刘：“欲速而不达。”要求对小地主宽容些。毛温和的社会政策加深了鱼水情”，使人民解放军战胜了蒋的军队。——校注

生的贾宝玉，日夜不能离开“他的命根子”，是挂在脖子上的那块宝玉给了他生命和智慧。在毛看来，蒋的军队把自己与外界隔绝起来，等于丢掉他的“宝玉”。[42]

毛对军队的看法与蒋不同。从根本上说，是人民动员和支持了军队。军队不是一架机器，不是什么神秘物，简言之，它是服从于政治斗争的一种方式。毛从未丢掉过他的军队——象贾宝玉没有丢掉他的宝玉一样——而蒋却因丢了宝玉常处于恐惧之中。

到1948年年中，中共已有三百多万党员，二百五十万解放军指战员，军队不得不分成地区性的游击力量。遵守纪律和相互协调的问题也就产生了。毛为此写了《关于建立报告制度》之类的文章。

在井冈山，毛曾象牧羊人一样管理他的为数不多的战士。现在，他指挥着世界上五个规模最大的军队之一，不能再因袭过去陈旧的方法了。

城市使毛的一群自农村来的人面临着从未有过的、现实的困境。毛已经赢得了获取政权的战争，但同时在清洁思想的战争中却倒在地上。他的矛盾的心理不断伸长，他开始怀疑，是否得到的越多，失去的也越多。

猴子将不会让老虎凭借全力而称王。导师的角色——在延安时，他曾把这一角色同领袖的角色完美地结合在一起——看来已经从他身上消失。

1948年4月，人民解放军再度攻占了延安。但是它没有——也不可能——再次带来延安精神。毛口授了一份电报，祝贺延安人又回到了家园，而他一直没有重访延安。

随着全国解放的到来，毛却很少露面。他似乎已厌倦抛头露面。他运筹帷幄，其筹策主要是围绕怎样和以什么样的程序去摘取悬在他头上的果实。

1948年快要结束的时候，大卫·巴雷特上校和约翰·梅尔比在北平共进午餐，后者也是来自南京的美国大使馆。这天阳光明媚，温煦的阳光透过柿子树。然而，隆隆的炮声震掉了桌上的筷子。人民解放军已经到达西山，从那里可以俯瞰北平全城。炮弹片飞落到了北京机场。㊸

一位孤守北平的国民党将军派了几名代表出城，要求与毛的农民勇士们谈判，在联合的外衣下安排了投降计划。这不再意味着分享权力，而只是交给共产党控制的一种象征性表示而已。这位国民党将军交出了北平城和二十万军队。

毛的战略战术拯救了这座城市，使之免于遭受巨大的破坏。由于拖延了很长时间，而在此之前已占领了其他一些城市，毛认为国民党不会再为北平而战。后来，毛让蒋的这位将军当了水利部部长，以示奖励。

人民解放军不久就进了城，象乡下的孩子周六进城一样。他们脚穿布鞋，军装肥大，表情腼腆。有些人竟凑到灯泡上去点烟。

在队伍前面，大喇叭竭力虔诚地高声叫喊："祝贺北平人民获得解放。"* 有些旁观者看到战士们羞红的脸，还以为这是长途跋涉的疲劳所致。人们看到轻轻驶过的坦克、吉普、重型大炮，几乎全是美国货。

"蒋介石是我们的运输大队长。"毛曾开玩笑地说。他的话应验了。

毛和朱德的画像被高高地举起。朱德面带微笑，而毛则表情严肃。到处都飞扬着油印传单，内容都是宣传新中国的。蒋的新闻机构的刊物《华北每日新闻》，一夜之间变成了毛的《人民日

---

* 北京作为中国的都城已有五百年的历史。但是当蒋——他与毛一样对中国北方怀着复杂的感情——于1928年建都南京时，他把北京改成北平。毛正式建立政权后又把北平改成北京。后来，共产党用北平表示国民党时期。

报》。

北京的编辑们十分明智地马上转向，毛对出版物历来都很重视。

毛要求把报纸的竖排改为横排，并用自己的草书为报纸题了名。他为报纸写了许多文章，可从未署名。多年来，他象对待家里的厨师那样不断地雇用和辞退报业人员。

对北京来说，世界变了样；对世界来说，北京变了样。

北京红遍了。可是，它的市民们却还没有见到这位把北京改变了颜色的著名的丹青妙手。他还健在吗？一些信息不灵通的人们这样问。国民党的军队投降七周以后，毛还没有露面。一些知情人猜测，是因为1918～1920年的北京对他太不友好了呢？还是他已决定把他的政权安扎在别的什么地方？

终于有一天，大街小巷传开了一条消息，毛正在来北京的路上，他的飞机刚从石家庄起飞。这座城市在北平以南一百六十英里处，也是解放军攻克的华北第一座城市。

《人民日报》发表了它的第一份号外："毛主席已抵达北平。"报童们尖着嗓子喊。标题是四英寸的红色字体。路人纷纷抢购，仅四十五分钟的时间，报纸就一抢而空。

进步人士和左派人士为形势的变化欢欣鼓舞，富人担惊受怕，人力车夫平静地谈论着将来的前景。每个人都在谈论毛，他的性格，他的爱好。

在北京大学，一位姓郭的门房对一位图书管理员回忆说："他就在这间房子里，就坐在那张桌子旁边整理报纸杂志……"王管理员盯着那块地方，"是的，我想起来了。从我最后一次见到他到现在有三十年了，从照片上看，他现在胖了点儿……"

他们俩一起上楼，去看一看毛泽东在业余时间读书的阁楼。郭用扫帚把指着说："就是这里，三十年前他就坐在这把椅子上。

有时候，一读就是一整天呐。”

王管理员对着天花板感叹：“当时谁知道啊……？”㊹ 也许他希望在1920年应该对毛好一点儿，应为毛读书提供一些帮助。

王管理员是对的，毛是胖了一些，“你胖了。”四年前见过毛的一位来访者对他说。“反动派把我变瘦了，”毛带着胜利者的幽默说，“现在他们被打跑了，我又长胖了，”* 睡觉是一个因素，他睡觉睡得早的时候就会发胖。

毛收到了攻克长沙的捷报。电报是他的第一位夫人杨开慧的哥哥发来的。五天以后，毛做了简短的回复。他同时告诉杨先生一些家事，毛和开慧生的两个儿子现在都在北京。毛岸青在上学，岸英在中央机关从事俄语翻译工作。“他们很想看外祖母。”毛又加了一句。㊺

毛安排他的两个儿子回湖南，但不是同行。岸英于1950年回到湖南，岸青在1951年才回去。他们来到母亲的墓前致哀，拜访了杨家的人。毛还和陈玉英取得了联系。他在长沙清水塘和开慧一起生活时，陈玉英是他们的保姆。毛曾四次邀她到北京，每次都花很长时间单独陪着她。

毛没有去观看北京街头上的热烈气氛，他径直来到紫禁城，在那里安顿了下来——带着他的书、烟叶、穿旧了的衣服等所有用品。江青陪伴着他。

定都北京，是一引人注目的选择。其后的四个多月中北京很多旧建筑都进行了修整。城墙、城门都象演出后下降的大幕一样推倒在地。工匠们从制作枪镖转向制作肥皂。几乎所有的外国使节都被要求搬出原使馆区优雅的住宅，到闭塞的郊区建造新馆。

---

* 实际上，毛在整个战争年代都很瘦，延安时期长胖了一点儿，内战时期又变瘦了。1950年起，他的面容不再虚弱和饥黄。

然而，毛泽东没有建造斯大林式的小别墅，他住在过去皇帝曾经住过的地方。

“房子”是明代建筑的楼阁，座落于王朝的心脏紫禁城一个静僻的角落。金黄色的琉璃瓦顶掩映在梧桐树张开的枝丫下，红色的立柱象卫兵一样日夜守卫在那深棕色的木墙周围。

毛泽东住房的窗户外面，有青铜雕龙。它们一个个张着大嘴，象是诉说着从过去到现在的经历。1949年的北京，没有人——除毛以外——能够听到它诉说些什么。汉白玉台阶一直延伸到宽大的玻璃门下，门分成四格，里面端重地挂着帘子。

这就是中南海。毛站在他的前门可以看到清澈的水中自由游动的金鱼。

房子里简朴而雅致，毛不喜欢花或其他的装饰品。很高很高的天花板给人以阴森森的感觉。高大的窗户透出灯光看上去象天主教堂。

木雕屏风和丝绸帷帘显示一种淡雅的情调。象街灯一样的大吊灯挂在距沙发十英尺高的地方。书籍摞在书架上，中国古书都是这样放法。书堆里有一套《大英百科全书》，可能这是毛准备攻克英语的工具。

毛的书桌上铺着精美的绸布，一只大茶杯和一只放大镜放在上面。他坐的椅子是柳条的，这样夏天衣服不会粘在上边。

卧室和书房没有很大的差别。木床的一边，一条长凳上是很厚的一摞书，* 另一边是痰盂。衣服挂在衣架上象是医生的白大褂。

窗户外是一小块菜地。毛在思考问题或休息时，常去照料地里的菜豆。这是皇帝所没有做过的。

毛的脑海中一定急速地浮现起“解放”的一幕幕场景。谁在他家乡韶山的农舍升起红旗？长沙《大公报》上的辩论；人民解

---

* “我上床之后不看会儿书睡不着觉。”有一次，毛对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说。㊻

放军经过龟山和蛇山，攻克武汉时的情景？

解放很快就成了过去的回忆。“中国共产党掌权”对世界的“解放”具有崭新的意义。毛有巨大的力量卸去中国脊背上因袭的负担吗？人们猜测着，迈进办公室的毛泽东将会为中国做些什么？

“是这些衣衫褴褛的泥腿子改变北平，”毛在握住缰绳的同时也在沉思着，“还是北平改变泥腿子？”[47]

“我们熟悉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① (1949—1950)

1949年10月1日，55岁的毛泽东步出他的书房，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并亲自升起了国旗。

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缓缓地沿长安街行进，毛乘坐的小车前面是一辆坦克开路，坦克的编号是“谢尔曼NO.237438W14”。② 这辆坦克是美国送给蒋介石的礼物，从底特律运来上海，目的是帮助蒋介石消灭毛。“谢尔曼NO.237438W14”曾在“自由世界”服役一个时期，现在，它正隆隆地碾过故宫门前的大道，驶向另一个世界。

毛穿一身新装高高地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南边，放大了的孙中山画像微笑着向他祝福。成千上万的人聚集在天安门广场——地面石板上的标记告诉他们自己应站的位置——凝神聆听毛总结自己的奋斗历程：“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的民族将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③

在毛批示同意下，政府不顾繁忙的公务，决定建立人民英雄纪念碑。毛为它写了碑文，他以常见的纪念战争英雄的风格写道："人民英雄永垂不朽。"④

碑文首先向"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致敬；接着的第二段颂扬了"三十年以来"的斗争。最有意思的还有第三段：毛感谢那些"从一千八百四十年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

毛把鸦片战争作为革命的起点，他所想起的不仅仅是三年的反蒋，不仅仅是中国共产党三十多年的历史，而且想到了中国三百多年来屈辱的历史。

共产党的时代不是历史长河中一个孤立的片断，而是整个反帝斗争的高潮。我想，毛的任何一位同事都不可能写出这样的碑文。镌刻着毛写的碑文的花岗石纪念碑，屹立在占地98英亩的坦荡荡的天安门广场，成为毛为中国历史篇章写下的证言。

毛在一次讲话中回忆起他学生时代崇拜的英雄康有为——他曾在1911年提出要康任总理。"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⑤毛找到了这条路。他以对马克思主义有所发展的口气说："唯一的路是经过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

在这里，马克思主义被当作一种工具，用来实现象中国的山川一样古老的梦想。

康认识到了这个目标，毛则实现了这个目标。毛走的是马克思的路线，而康走的是孔夫子的路线。康坚持认为，如果正确地去读的话，现代社会生活的价值观可以在儒家的学说中找到。毛则认为，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思想在中国的过去的确存在，但是在中国共产党之前，这是一个无法实现的目标，因为他们没有找到实现这一目标的途径。

莫斯科肯定感到震惊。毛把马克思主义从它在欧洲体系中拔抽出来，移植到中国的土壤之中，并给它挂上中国的出生

证。

毛还把西方置于它自己的位置上。“中国人被看作不文明人的时代应当完结,”⑥他宣称，中国的文化超过西方任何时期的文明。毛说:“对于现代中国和现代世界的认识水平，艾奇逊之流就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个普通战士的水平之下。”⑦

1949年中期，毛有些焦虑地说:“我们熟习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习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⑧乡村的日子伴随着扛枪的生活已经成为过去。现在摆在面前的是一系列新的问题：编制预算,地区间的争端，军官们之间的斗争,官僚主义的四起，以及由于胜利随之而来的道德腐败现象。

毛的一定时期内的任务很明确。一些地区的残敌要肃清。“没有解放”的地方还有台湾、西藏和海南岛——一个盛产香蕉、和风习习、靠近越南的岛屿。一些边疆地区还处在混乱状态，——它们与新中国的关系也不密切——这是殖民地时期留下的后遗症。

毛无意触及香港，这一只金鹅还可以给大陆下很多蛋，再说香港也在大陆的环抱之中。

生产力要有大的提高。中国处于战乱之中已有十二年，而且在此之前多年就是战争不断。工厂破败不堪；运输在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简直是一个笑话；四十年代后期，中国实际上还没有钢铁生产。

五亿五千万人口要进入一个新的组织网络，这对中国共产党来说是很棘手的问题。因为中国的大部分地区至今仍被某种神秘的气氛所笼罩。毛把中国的民众比作一张白纸，在这张白纸上要写出什么呢？对毛是一个难题，再说，这张白纸在这位书法家面前并不是纹丝不动的。

这不是一般的政府更迭。对一届新的美国政府来说，它所面对的是使其行动和权力受制约的一套社会制度和官僚机构：从联

邦内部事务到华尔街，从教会到“500财神”及各个大学等等。相比之下，毛的政府必须改变社会制度和官僚体制。

他要熔化中国的一切机构——即使那些至今并不认为是政治性的机构——然后在社会主义的模子里重新铸造。

要使中国启动向前，毛需要调动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在他第一届政府的二十四位部长中，有十一位部长不是共产党员。在中国第一个宪法的起草过程中，有十四个政党的成员参与其中。在1949—1950年间，毛几乎没有吓跑一个人。

只要他们细心阅读毛写的东西便知，毛把国民经济恢复阶段称为“新民主主义”，[9]在这一时期，私人企业可以和国营企业并存。但是，他的“新民主主义”只是指一个阶段，而不是新社会的固定的模式。他从来都认为，随之而来的是向“社会主义的过渡”。

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有其自身的**方法**，它是要达到一个**阶级的目的**。

毛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提出了这种过渡方法，这是一篇内容丰富的就职演说。在谈到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专政”时，毛用“人民”一词来代替“无产阶级”一词。这不是变换花招。很明显，毛的革命比列宁的革命有更广泛的意义。中国共产党的敌人大多不是中国人，因此它得到中国人民的广泛支持。“人民”是与“帝国主义”相对而言的。

另一方面，毛所说的“专政”也不是原文照搬马克思的意思。他的专政是重新铸造中国社会的一种方法。他很从容地宣布：“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互相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关键的是，由于时间不同，“人民”的含义也就有所变化。

毛的阶级目标也非常明确。开国庆典由他升起的国旗上，红色的旗面上缀着五颗黄色的星，有一颗星比其他的星都大。天安

门广场上闪耀的这五颗星代表着毛所指出的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相互合作的五个阶级，但是最大的一颗星代表无产阶级。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两个月以后，毛准备作第一次出国访问。他要到莫斯科去见斯大林，以示中国确实要“一边倒”。他的上层同事们大都去过苏联，他认为已经准备就绪，应该到共产党权力的源头去看看。

56岁的毛，这位代表着五亿五千万亚洲人的马克思主义者，要去向斯大林谈谈自己的未来。70岁的斯大林是世界马克思主义的教皇。

毛从莫斯科回到紫禁城后，他可能对自己写作《别了，司徒雷登》感到了后悔。因为，这次到寒冷的苏联首都所作的是一次不愉快的访问，毛后来回忆说：“斯大林不愿意签订条约，经过两个月的谈判，他最终还是签了。”⑩

在莫斯科，毛第一次看到了中国以外的世界。他对欣赏苏联人的芭蕾舞无甚兴趣，也吃不惯在中国人看来是半生不熟的厚厚的鱼片和肉片。

毛面对的是斯大林的傲慢和妄自尊大，因为斯大林还没有把握住中国共产党的胜利会有多大的能量。⑪ “真是又一个铁托”，这是这位苏联领袖在1949年对毛的诅咒，他还称毛是“麦淇淋式的马克思主义者”。看来是心理上的焦虑——而不是俄罗斯的甜菜浓汤和伏特加酒——使毛在重压之下又一次病了起来。⑫

斯大林对中国的兴趣，和毛对中国之命运的看法并不一致。斯大林把社会主义中国看作是新入校的小学生，他要在他的马克思主义班上给它找一个位置，与波兰、匈牙利等国家在一起。他希望新中国象东欧一些国家一样敬重苏联这位长者——并且有所进贡。

毛认为他的革命是独特的。他感到，他开的这一枪会在欧洲

以外的整个世界回响几十年的时间。要让他把自己对中国的自豪感与复杂的世界局势——这不是蒋介石的世界——相一致，是很不容易的。

斯大林让毛象一名小听差一样地等着。他好多天不见毛，因为斯大林也不允许其他的人与毛交谈，所以没有一个苏联人敢去看望毛。毛感到自己受了冷落，曾有一次威胁说要打点行装回国。

毛从他的东道主那里只挤出三亿美元的贷款(为期五年)，中国以原材料和中国货作为偿还，外加1%的利息。这大大小于莫斯科给波兰的援助，尽管中国比波兰大20倍；这大约相当于苏军在四十年代后期从中国东北取走的三分之一。*

就在毛刚回到北京的时候，正巧发生卢布贬值20%，这一下就从仅有的三亿美元贷款中削去了六千万。

斯大林为他的贷款强要代价，毛答应了三个苛刻的条件。1952年以前——实际上直到1955年——苏联继续控制中国东北的部分地区：两大海关门户大连和旅顺以及中国东北的铁路；成立联合股份公司开发中国新疆西部沙漠地区的矿藏；中华人民共和国承认外蒙古是一个主权国家——毛在此之前，一直说它是中国的一部分。

毛看上去闷闷不乐，事实也是如此。这些让步击中了他的民族自豪感的要害。为了得到贷款，这是丢面子的事，而且（根据印度政府提供的资料）他希望得到的贷款是十倍于此的。⑭

一些中国人认为毛对斯大林过于软弱。这是自从成为党的领袖以来，毛第一次受到的批评。在北京，人们传阅着一份小册子，标题是《为什么要倒向一边?》。还有人公开地反对与斯大林

---

* 在整个中苏友好条约生效的1949—1960年间，苏联对中国的援助总额为15亿美元，还不到同一时期美国给蒋介石的小台湾的40%。⑬

联盟，他们甚至提出，“不要国际援助，也可以胜利”。⑮

毛比斯大林清醒，但是斯大林比毛更富有世界经验。在外国的草地上较量，毛远不如在紫禁城的古书、红柱和茂密的桐树间老练——就象赫鲁晓夫一样。

毛所得到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在他的嘴中不到十二年就化为乌有。北京的一些人物——不是中共高层领导人，而是一些知识分子——对此早有所料。

斯大林挫败了毛泽东，条约计划执行的时间是三十年。莫斯科之行在毛的成绩单上不是闪光的一点。

毫无疑问，从长征时起，毛就再也没有接受过莫斯科的指令。1942—1943年的整风运动以后，他的社会主义与苏联的社会主义更是貌合神离。

苏维埃中国不会在苏联的控制之下吗？斯诺在三十年代曾问过毛这一问题。毛当时以少有的洋洋自得的挑战口吻答道：“如果这种事会发生的话，也就可以修一条铁路到火星上去，并从赫伯特·乔治·威尔斯先生那里买火车票。”⑯

然而，1949—1950年的毛感到自己别无选择，不得不拜倒在斯大林面前。他已经失去了美国，他需要北部边境的安全，也需要有抗衡日本的保证。再说他从其他地方也不可能得到三亿美元的贷款。

毛对斯大林仍然敬畏。

毛很看重斯大林，而斯大林却不尊重他。他也知道这一点，但却没有背叛这位马克思主义的教皇。当然，毛有很多理由怀疑斯大林。在马歇尔放弃了蒋介石之后很久，莫斯科仍抱住蒋不放。* 但是至少可以说，在1948年，斯大林为中共对付蒋介石提

* 一直到1949年8月，斯大林还在与蒋介石谈判，希望能在中国新疆得到一些特权。

1949年新年期间，毛写的《将革命进行到底》指出，“某些人”在“阴险的”、“在美女的外衣下”企图冲淡革命的最后浪潮，很明显地包括刘少奇和斯大林在内。⑰

供了间接的帮助。

与杜鲁门和艾德礼相比，斯大林可以说是毛较好的朋友（猜疑总比敌视好）。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布成立后24小时，莫斯科就承认了它。如果说斯大林是最后一位承认蒋介石失去中国大陆的主要领导人的话，但却是第一个承认毛泽东获胜的人。

斯大林在中国东北的活动，并不象某些人认为的那样是反对中共的，这些活动主要是因为他们过低地估计了中国共产党把握未来的能力。在斯大林强掠沈阳的工厂的时候，他做梦也没有想到，毛不到两年的时间就统治了这座城市。*

毛自莫斯科回北京以后不久，斯大林突然喜欢起菠萝来。他命令马林科夫说："给中国人发个电报，我想让他们给我一块地方建个菠萝罐头厂。"⑱ 赫鲁晓夫战战兢兢地告诉斯大林，中共不愿意外国人在他们的土地上建工厂。"这肯定伤害了毛泽东"，这位后来成为克里姆林宫头号人物在这方面深有体会地说。

毛对斯大林的建议很不满，但是他发回的电报是温和的："如果你们对菠萝罐头感兴趣，可以给我们贷款，我们自己建工厂，用工厂的产品偿还贷款。"斯大林恼羞成怒。中国的菠萝没有一只"荣幸"地登上克里姆林宫的餐桌。

毛拒绝过许多人的要求，但还从未象这样拒绝过斯大林。

毛对莫斯科的尊敬使人难解的坚定从这件事上可以看出来。1950年，毛降低了他认为自己是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的调子，以免给斯大林罩上阴影，这对毛固执的脾气来说是少有的。

---

* 毛小心翼翼地处理东北的问题。他的宿敌李立三，在苏联呆了很长时间后，于1945年随苏联军队进入中国东北。四十年代后期，毛没有阻止李立三进入中共在东北的上层领导机构。

与此同时，毛又谨慎地使共产党的神经中枢远离东北这一"莫斯科的幼儿"。离开延安以后，他没有把总部迁往沈阳，虽然他可能已准备好这样做，而是让他的政权在马背上呆了一段时间。

他甚至要求斯大林派一位出色的苏联马克思主义者到北京来，审查将于1951年交付印刷的《毛泽东选集》。

毛60岁的时候，传来了斯大林去世的消息。毛称这位苏联领袖为"当代最伟大的天才"，*⑲他却没有飞赴莫斯科参加斯大林的葬礼。** 在苏联阵营中，他是唯一这样做的领导人。

这两者都值得深思。毛敬慕斯大林，同时他认为他有资格成为世界上第二个斯大林。不去参加葬礼，毛似乎提高了他在苏联阵营的众领袖中的地位，他认为自己在其他人之上。

数年之后，即使在斯大林自己的同僚们也开始剥去他的外衣的时候，毛仍然拒绝公开批评斯大林。

毛首先颁布的国家法令是婚姻法和土地法。两个法律都给旧中国以打击，而且似乎已赋予集群性强的中国老百姓以个性。

毛试图给农民以选择配偶的自由，给他们一份自己的田地。

但是，让人民获得个人自由并不是毛的最终目的。他心中有新的、美好的设想。在这一新的计划中，中国的民众将再次成为一种摆设，就象他们在封建主义辉煌的大厦中一样。毛无意把中国变成杰弗逊式的小农耕作地。

第一步是要砸碎地主的统治，把土地分给农民。这也是很重要的一步，几乎象宗教的皈依一样，因为这一步解除了农民身上的枷锁，成千上万的地主一夜之间清贫如洗，很多被处死。

然而，这并不是气候的变化，而是一场风暴。风暴过后，农民很快就要把他们的土地交给公社。

---

* 毛的文章《最伟大的友谊》没有收进《毛泽东选集》第五卷，这一卷包括1953年的一些文章。

** 周恩来参加了葬礼，并是唯一的一个外国的扶柩者。毛的妻子当时正在莫斯科的一家医院养病，但是既没有参加葬礼，也没有与苏联领导人有过任何直接接触。

在政治上，毛仍然实行家长式的统治。中国太落后，不能向现代化作一次性的飞跃。实现民主和平等——毛崇尚的价值观——是非常艰难的。

一部婚姻法和一部土地法不可能一夜之间完全消除旧中国的各种弊病，社会秩序仍然需要监督保护。

三十年后再看中华人民共和国，仍可以看到它在1950年形成时期的样子。二元化统治支撑着中国的社会舞台，处在前景上突出地位上的是一些摆设性的组织——妇联，共青团，工会，少先队；背景上是党——它是无处不在的。

参加各种会议成为群众新生活的标志。有些人一天到晚地开会，这不禁使人想起毛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描绘的现象。早在1927年，一位地主就抱怨说："如今是委员世界呀，你看，屙尿都碰上了委员。"[20]

每家书店都有标着"哲学"书籍的柜台，上边摆的是马克思、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的著作。解放以后，哲学还有其他的意义吗？不言而喻，答案就在柜台上。

直到1948年后期，在四川省的部分地区，人们还一直没有听说过毛泽东这个名字。尽管毛控制华北已有十五年的时间，但是中国太大了，一套制度普及整个中国需要很多年的时间。

思想意识被语录统一了起来，中国终由"人民"掌权，和平到处受到"帝国主义"的威胁，苏联是全世界"民主的典范"。《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的出版发行，为中国提供了规定的用语——这本书在1951年印刷了二百万册。

如果说不是灵魂的话，至少语言已经归于一致。

在上海，有数不清的街道会议。在一次街道会议上，一位文盲老太太发表自己对新宪法草案的看法。在上海方言里，"宪法"和"戏法"两词的发音相同。整个讨论在老太太听来都是要"支

持什么魔术师变的新戏法”。在一位主持会议的党员的催促下，她站起来大声说：“我活了73岁了，记得只看过一次戏法。现在人民政府要表演新戏法，我完全拥护，一定要去看看。”会议主持人很恼火。结果，会议一直开到半夜，直到这位老太太讲出几句热烈拥护宪法的话方罢。㉑

毛在四十年代曾一度消失了的猴子般的精明，又回到了辉煌的金殿。

毛在一次庄严的党的会议上说，“人到老年就要死亡，党也是这样。”㉒这句话一定震住了某些人。死亡，永远不是一个文雅的话题，差不多所有的共产党员都不认为自己的党会死亡。

毛在谈到他引进的阶级制度时说：“革命的专政和反革命的专政，性质是相反的，而前者是从后者学来的。”㉓确实如此，但是这些学来的东西都是好的吗？其中有没有毛曾抛弃了的无政府主义的痕迹？

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领导成员来见毛，毛告诉他们：“要有较多的独立性，”尽管他们周围的人都持相反的观点，“革命带来很多好处，但也带来了一个坏处，”毛脱口而出，“就是大家太积极太热心了，以致过于疲劳。”他要求他的来访者，保证“学生的睡眠时间再增加一小时。”

各种委员会是不是太多了？毛继续说：“积极分子开会太多，也应当减少。”

这些年轻的干部，给毛看他们起草的团章草案，有一条是：“不要背后乱讲。”毛清楚地知道，书面文件同实际行动存在着很大的差距，他说：“不准人家在背后骂一句话，事实上办不到。”㉔

毛说：“群众对领导者真正佩服，是在通过革命实践过程对领导者有了了解之后。”那么，现在，革命斗争已经取得了胜利，年轻的干部怎样才能获得威信呢？

革命的成功改变了毛的政权的性质。矛盾在于随着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的控制日益加强，毛发现他对党的控制越来越困难。

与延安和内战时期一样，毛还是实行个人领导制。他在几年后的一次会上说："我们一进城，就四分五散，各管一方。"㉕

毛不久就抱怨说："我在北京，差不多听不到什么，所以我不时要出外走走。"㉖

治理一个近6亿人口的国家，毛需要一个复杂的中间机构与人民群众保持联系。* 而这种机构的独立形成使毛萌生出一种对国家的失控之感。

胜利前夕，毛津津乐道中国人民将接管"中国的"所有权力㉘，而所有权力已被证明是难以捉摸的东西，"人民"的范围也不易界定。1949年的毛决没有预见到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的中国会是什么样子。

朝鲜战争的爆发使毛首先感到震惊。

1950年6月炎热的一天，毛在他的讲话中说，中国人民要过"两个关"。"战争一关，已经基本上过去了，"㉙他说第二个关是土地改革。第二天，他在谈到士兵转业返回家乡的问题时再次提到这一点。

就在那天之后，北朝鲜的军队进入南朝鲜。

台湾和西藏是人民解放军唯一还没有进入的两个地区，毛希望人民解放军继续向这些地区挺进（海南岛已于当年春天被解放军用两栖登陆的战术占领）。没有整装待发的人民解放军驻在东北边境和朝鲜接壤的地方。

世人尽知，甚至小国之间也常常相互挑起战争。回忆一下历史

---

* 毛和卢梭一样只相信直接的管理。他有一次说："我不相信选举，中国有两千多个县，一个县选两个人，全国就有四千多人，选四个人，就有一万人，哪里能容得下这么多人开会？哪能认识这么多人？"㉗

就可以发现，1950年朝鲜南北战争的爆发完全是他们自己引起的。

即使说是斯大林鼓动了北朝鲜领袖金日成的话，还没有足够的证据可以证明这一点。当然，毛还从来没有见过金日成，在1950年，他们的关系还不足以发展成采取联合行动。朝鲜的共产党当时敬仰的是莫斯科，而不是毛。

但是，当战争爆发以后，却把毛深深地卷入其中。㉚

毛已习惯于把朝鲜视为他的庞大国家的附庸，他认为这块地方和中国一样同受日本的蹂躏。从1945年起，又多了一层联系：杜鲁门似乎想由此踏上进入中国的台阶。

如果说，毛还谈不上对朝鲜民族特别尊重的话，他至少认为，朝鲜是一块和中国利益相关的地方。地理因素就说明了这一点，中朝两国的边境线沿鸭绿江和图们江蜿转延伸500英里。

随着麦克阿瑟将军战争意图的进一步膨胀，毛通过印度驻北京大使向美国政府转达了他的立场。㉛这种立场虽不带有强烈的进攻性，但是非常明确：如果麦克阿瑟让战争靠近或越过中国边境的话，中国就要介入。

麦克阿瑟正做到了这一点。当年10月份，在麦克阿瑟炸毁鸭绿江上的一座大桥以后，毛马上把他的二十五万军队开到朝鲜，站在金日成一边。中国与美国交战了。

毛主要不是为了挽救金日成的政权，他的一些“国际主义”同事可能早在10月之前就想坚定地与卷入战争的金日成站在一起。斯大林也可能希望中国军队早点介入。很显然，对克里姆林宫来说这易如反掌：由中国出兵作战，苏联提供武器。*

毛的谋算完全是从中国的自身安全出发的。

---

* 毛的介入给美国在朝鲜的军队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当时在朝鲜的美国将军大卫·巴尔——他曾是美国在中国的军事顾问小组的头目——后来说，如果毛提前24小时进入朝鲜，他甚至“不能从那场灾难中救出一个人”。㉜

当然，毛的有些同事坚持，完全不介入朝鲜战争。㉝

在决定是否介入的时候，他度过了一两个不眠之夜，在书房里来回踱步。当他决定参战时，只准备逐步介入，并且在采取每一新的行动之前都不放弃谈判。

只是在美国把它的第七舰队调往台湾海峡，在美国官方公开地把台湾和朝鲜联系在一起以后，在麦克阿瑟要求蒋介石的军队参加战争以后，毛才把他的军队派到朝鲜。

毛是一位纵逸的半知识分子，麦克阿瑟是一位活跃而能干的人物。他们二人都相信：中国这个中央帝国是亚洲的轴心。

毛的大儿子岸英，和他的继母贺子珍及患神经病的弟弟岸青去了莫斯科。那时，毛同江青刚刚开始新生活。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岸英都在读书。他努力使自己适应苏联的生活，虽然他不是与苏联人而是与意大利共产党领袖路易吉·隆哥的儿子同住一室。与此同时，他的继母在一家精神病院里打发着时光。他的弟弟岸青则常与一位金发的苏联女孩在一起下棋、嬉戏。

岸英于1945年回到中国。毛在延安与他交谈，认为他有很多书本知识而不懂农活。到京后，岸英离开北京* 来到河南省的一个村庄干农活。他学起掏粪，把粪装入袋中，然后用驴子把它驮走。他的一双学生手上长满了老茧。**

毛很高兴地看到儿子学会了他自己当学生前曾被迫做的农活。在毛对待岸英的方法上我们可以看到他父亲对待他的影子。㉟

岸英离开农村以后，用他流利的俄语从事翻译工作。毛常常

---

* 岸英是从莫斯科经新疆飞西安抵延安的。——校注

** 苏联有的学者称，毛对岸英在苏联接受的某些思想很不满意，如，岸英曾批评围绕着他父亲的“领袖崇拜”。他们说，有人曾要求岸英对自己的思想写出“检查”。有一段时间，岸英不经过允许不能进入毛的房间。㉞

岸英和岸青自苏联学习回国后，不能很好地读写汉语。毛对此一定感到很吃惊，他不得不把他们再送进学校学习汉语，就象他们在伊凡诺夫的共产主义国际学校学习俄语一样。

问他在农村生活的细节（“从翻过两次的地里长出的谷子，去壳后一斗能打出多少？”）。

毛感到他的儿子不仅要学习养猪，还要学习战争，他让彭德怀将军把岸英带到朝鲜前线去。

一天，美国飞机轰炸设在小山上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二军司令部。司令部中弹，大多数参谋人员被炸死，尸体血肉模糊。29岁的岸英就这样死于弹片而不是死于水疱。

彭德怀在朝鲜做了几件毛不高兴的事：建立他自己的与苏联联络的渠道；抛弃毛的游击战术，代之以阵地战和“波浪式”突袭战。在麦克阿瑟被解职、谈判时机已成熟时，还发动大规模的进攻战，使中国人伤亡惨重。在毛的内心深处，可能已把彭德怀的“粗心大意”与岸英的死联系在一起了。

在一定程度上说，彭德怀就是毛的麦克阿瑟。但是当杜鲁门把他的这位刚愎自用的将军解职以后，毛仍把他的彭德怀“留用”了八年多。

毛在朝鲜有赢有输。毛获得了胜利，麦克阿瑟企图给中国以打击的愿望没能实现。人民志愿军在朝鲜的出色表现给华盛顿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如果毛没有在朝鲜参战，中美两国可能会于五十年代在台湾海峡发生一场战争，也可能于六十年代在印度支那边缘地区发生一场战争。

然而，朝鲜战争给毛的生活和工作都投下了一层阴影。儿子的死一直萦绕在他的心头。

战争使中国花费了大量的钱财。毛在1952年说：“去年抗美援朝战争的费用，和国内建设的费用大体相等，一半一半。”[36]

朝鲜战争提高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中国政治中的地位，也为毛彭后来发生的激烈冲突埋下了伏笔。

1950年秋的一天，两位仍在北京居住的美国人，[37]在北京大

学图书馆附近看到很多人挤在宣传栏前。宣传栏里贴着从《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和《柯里尔》双周刊上摘录的文章，中国人在看这些文章时显得群情激昂。

从《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上摘下的一篇文章有一幅地图，上面是北朝鲜和中国东北部的一部分。箭头从北朝鲜指向中国的好几个城市，并标有飞行距离。从《柯里尔》双周刊上摘下的一篇文章也有一幅红色地图，箭头从台湾、朝鲜、日本和冲绳群岛指向中国。在美国印刷的这两幅地图，都是在毛出兵朝鲜之前出版的。

这样的文章对中国的读者产生的影响，与古巴导弹危机期间在美国产生的效果一样。

不久，在整个中国都可以听到“抗美援朝”的口号。美国和中国之间的联系渠道象停电般的被割断。对“绅士们的世界”——毛讥讽美国的叫法——取开放态度的中国知识分子一夜之间惊呆了。到处都在逮捕“特务”、“反动派”，一些思想观点、歌曲、绘画在1950年尚是生活的一部分，到1951年则成为“颠覆”行为。

朝鲜战争救了蒋介石的政权，它使美国与蒋更亲近，这在六个月以前看起来还是不可能的。这也使得写有“毛主席万岁”的红绿彩旗在毛的有生之年不可能在台湾出现。

毛的心中对山姆大叔已有所准备，他认为美国会从朝鲜、台湾和印度支那三个方向侵略中国。华盛顿的很多行动又使毛更加确信这一点。在长达十五年的时间里，这一直是毛考虑亚洲问题的重心。

朝鲜战争为毛和斯大林的关系埋下了祸根。

几年之后，毛在成都的一次党的干部会议上说：“我们革命成功的时候，斯大林说它是假的，”毛坦率的总结使听众震惊，“我们不与他争论。当我们一开始抗美援朝战争，我们的革命才变成真

的了。”[38]

当斯大林学会了尊重时，毛则学会了不信任。如果说毛在1949—1950年间没有与斯大林“争论”的话，中国在朝鲜战争中的胜利使他更倾向于反对莫斯科——至少在私下里是如此。

毛彻底明白了两件事：俄国人卑鄙、自私、不可信任。他们在朝鲜战争中使用的苏联的枪支和手榴弹付的都是市场价格，他们甚至还要为赴朝鲜采访的苏联记者支付生活和旅行费用。

毛终于认识到，这种联盟不是花岗岩制作的。

如果毛不把他的二十五万军队派到朝鲜，如果麦克阿瑟没有一时心血来潮开到中国边境的话，斯大林会保护中国吗？我们无法回答，但毛对此表示怀疑。

实际情况正是毛冒了一切的危险，他的军队开进朝鲜，站在金日成一边参加战斗，而俄国人则只坐在后方为金日成一方讲话。

多年之后，在一次谈到斗争妥协的关系时，毛说：“妥协总是要的，我们不是在朝鲜的三八线同美国人达成妥协了吗？”[39]

改　造（1951—1953）

“毛主席给了我们土地。”刚分得土地的农户说。土改，有些人一听到这个词就发抖，有的人则欣喜若狂。

中国是一个由乡村组成的社会，历史上没有哪一个政府能象毛的政府那样，将其影响渗透到每一个村落。这种变化不是经济的或技术的变化。中国的乡村看上去——现在还是——与亚洲其他地区的乡村十分相似。

在那地方，人们仍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面朝黄土背朝天，使用着镰刀和与二千年前没有两样的斧子劳作。地方风俗令人窒息，生老病死、婚丧方式循环往复地一成不变。在简单的娱乐活动中，着装演戏必不可少。

这变化——正如毛三十年前所参加发动的湖南农民运动一样——是组织上的和心理上的。沉重的捐税和地租负担从农民肩上卸了下来。拥有土地不再意味着可以统治别人。耕作不再是单家独户，而是逐步由生产队统一进行。

毛主席开始象以往那样被认作是新的“贤君”。

分地主的财物给农民的“清算运动”神圣而严肃。中国农民的实利主义思想在这种时候不仅没有降低，反而激发了精神的振奋。

一位新当权者就向财主们报复这个问题，并对一位美国作家说道：“你要想让一个人坦白交待，只需把铁棍放在炉火里烧。”“但是女人很顽强，她们宁死也不愿告诉你金子藏在哪儿，身体被烧焦了也无所畏惧。”①

毛从未亲自参加这种咄咄逼人的阶级报复。他年轻时在农村经历十分复杂，因而他对地主未产生任何直接的个人仇恨。他从来没有挨过饿或受过奴役。尽管他反对虐待，但他并不能阻止这种行为，因为愤怒的农民控制了土改。

农村的精神面貌在改变。一向被认为是合情合理的权威，现在也受到责难。

一直被视为天理的陈规旧俗也被雨点般降临的新观念所取代：阶级、热爱苏联、斗争、翻身。

农民们向一位美国客人提出的也是些新问题：“为什么杜鲁门支持老蒋？”“你们吃饭用筷子吗？”“拖拉机是什么样儿？”“美国共产党也一样有自己的军队吗？”②

毛青年时期关心的妇女解放终于有了结果。财产是问题的关键所在。毛的政府给了中国妇女以自己的名义拥有土地和其他财产的权利。

毛现在住进了城市。城市所发生的变化不是电闪雷鸣般的，而是一步一步的。

中国共产党驯服城市的技术远不如它在农村的工作得心应手。它的干部也不是城市型的；三百万国民党的旧职员还要继续用来为新的事业服务。

然而，城市问题比农村问题容易对付。资本家寥寥无几，他们很少有道义上的权威，因为他们依赖剥削中国的外国人扶持，并且又是暴发户，只不过是二千年来以土地为基础的社会体制这块草地上的晨露。

毛用不着在北京、上海或广州消灭这一阶级，许多资本家犹如倒入开水中的龙虾，在温度升高时，便默默地轻易地就变成赤色了。

毛的目的在于把"消费型城市"变成"生产型城市"。大城市将不再是外国人的经商地，也不再是拥有房地产的豪绅们闲荡和征收房租的基地了，这些地主豪绅依靠从乡下搜刮来的钱财，挥霍无度。每一个城区都新建一些小型的工厂，作为其生活的核心。

对外贸易突然中断，财产典当业也被取缔。夜生活的融融灯光也熄灭了，这与其说是出于清教徒式的节俭，不如说是因为人们的精力转向了制作机床、自行车和塑料鞋。

因为朝鲜战争带来的紧张气氛，城市整顿更加严厉。在毛看来，"反革命分子"多得不可胜数，由于朝鲜战争的爆发，使他感到，与蒋介石和美国的战斗还没有取得彻底的胜利。

成千上万的人不是被处死就是被投进劳改营，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的这场城市运动，使大批人受到毛自己常说的所谓的肉体消灭。③

铲除"反革命分子"并没有每一步都按照毛的路线办。与其他一些运动一样，这一次警察成了执行者，他们远离毛的监督，因此，"治病救人"也就不再是其主旨。

另一方面，毛十分谨慎地着手接管城市工业和商业，直到1955年后期，这些行业大部分还都控制在私人手里。

改造知识分子的运动——即令人心惊胆寒的"思想改造运动"——也因为朝鲜战争的爆发而变得锋芒毕露了，它的确具有毛的特征。

梁漱溟是一位半儒家式的乡村民粹主义者。他不是共产党员，但毛乐意同他争论，他提供资金让梁建立一所小型的研究机构。*

但是1953年秋，毛向梁发起猛烈攻击，使两人关系破裂。它始于一次政府委员会的会议（译按：指1953年9月16日至18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梁是以党外人士的身份出席的。梁在会上发表讲话对共产党的农业路线、朝鲜战争和阶级理论持异议。

毛怒气冲冲地抓过麦克风。

"他说他美得很。"毛用唐朝一位名妃的故事讥讽梁漱溟，"比得上杨贵妃。"

毛非常激动，一会儿面对上千名情绪激昂的听众，一会儿转身用手指着仍尴尬地站在台上的梁漱溟，"他们那样高兴你，"毛愤怒地说，"骂我是'土匪'，称你是先生。"任何人都能听得出这种挑衅的口气，人们又感到奇怪，毛似乎感到了这位想要成为中国的甘地的人对他的挑战。

毛对委员们说，梁竟认为自己对于农民问题的见解比共产党还高明，真是"班门弄斧"。

半知识分子的毛嘲笑真正的知识分子梁的无用。"他有没有工商界那样的供给产品、纳所得税的好处呢？没有。"他挖苦梁那么热心地帮助农民，是要"把工人的工资同农民的收入平均一下，拿一部分给农民，"是要"毁灭中国的工业。"

"蒋介石是用枪杆子杀人，"毛大叫道，"梁漱溟是用笔杆子杀人。"毛在说到这两种杀人手段时拖长了语调，仿佛是自己35年来两种性质斗争的重演。他在谈到"用笔杆子杀人"时转而讥刺

---

* 三十年前，在北京大学，毛作为一名未注册的学生旁听过梁的课，那时梁是印度哲学教授。后来，1938年在延安，他们交谈过，1950年至1953年间也曾多次恳谈，在建设中国本土社会主义方面，梁可能对毛产生过影响。

梁漱溟说:“你就是这样一个杀人犯。”

权力的嚣张赤裸裸地暴露了出来:批评就等于杀人。

毛的干涉使会场的气氛转而指责梁,座席上响起一阵阵的叫喊声,梁受到众多人的诘难,不得不走下讲台。另一位非共产党人士站起来劝阻大家安静:“我们今天不该这么激动。”

然而毛却激动了。他要那位叫大家安静的前国民党老人作自我批评。

毛仍让梁保留原来的职务。*他要梁自省(尽管它不会给中国带来任何税款或产品),他需要这个封建主义遗老“充当活教材”。这种以教代罚的方式(或以罚当教)在毛以前的共运史上还没有先例。

梁仍留在全国政协委员会,毛令人惊讶地宣称,“除非他自己不愿意借政协的讲坛散布他的反动思想了。”为了显示毛主义对梁所代表的中国传统思想的胜利,他费尽心机与梁作斗争。④

毛25年来的斗争,就是要把粗糙的现实变成太平的理想世界,这个世界在他看来比周围乱纷纷的现实世界更真实。

“我们会再次笃信宗教。”一个世纪以前,费尔巴哈就指出:“政治会成为我们的宗教。”《基督教的本质》的作者早就预见到了这种世俗思想时代的到来,毛则以中国式的方法把自己置身其中。毛以前的圣人早已开始寻求这种大同社会,毛则采取了新的步骤:他把真理和权力熔于一炉。

二十多年来,成立一个武装政党的全部目的就是在于把这一古代的梦想变成现实。当然,在通往政教合一的道路上,知识分子成了主要的牺牲者。

半知识分子的毛始终对高居于象牙之塔的人怀有不满。他讨厌他们的患得患失,他们的不偏不倚,缺乏热情,他们怀疑的目

---

*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

光，以及他们胜过自己的满腹经纶。

毛熔政教于一体，并不仅仅是出于权宜之计，而且因为他深深地感到这两者应该熔合在一起。这就更糟糕了。

在思想改造运动期间，人们忧心忡忡，暗中算计带来的精神折磨成了残酷的现实。一位新闻工作者几进几出监狱，起初他感到莫名其妙，后来也就淡然了。一次，他坐在监狱的院子里自言自语："或许呆在这儿更好些，在外面，随时都有被捕的可能；而在狱中，至少没有这种担心。"⑤

毛需要的是驯服——象在韶山时，他的父亲那样；象在东山高小时，他坚持宗教信仰者所称的"统一于真理"那样。他认为，任何偏离的要求都是分裂的征兆。

孔子云："士可杀不可辱。"毛的做法与此正好相反，他未曾杀"士"，但确戏其"头"于股掌。

毛时而象弥尔顿——"我不赞颂修道院里的美德"，时而又象J·S·穆勒——"做别人讨厌的苏格拉底，也比做受宠的猪强得多。"⑥然而毛又不象弥尔顿那样，认为真理是一个五光十色的东西。他相信辩论不在于发现真理，而在于在每个人的心中建立一个先验的真理。

毛与弥尔顿一样——不同于穆勒——有自己的上帝。他认为真理不是过程的最终产物，而是从一个固定的源泉向外放射出的东西。在这方面，中年时期的毛是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五十年代时，他相信：社会思想是一个科学的东西。毛象穿着长袍的牧师一样成了一位穿着白大褂的科学家，审视着试管中知识分子的变化。他确定自己的算式，不时向试管中添加"正确的思想"晶体，从容不迫地等待着所预计的合成物出现。

在这种背景之下，毛的谆谆告诫"斗私"成了人们注意的中心，毛并不仅仅让人们象《圣经》要求的那样"无私无利"。"私"这个词意味着"隐私"和"自我"。毛教导人们要与别人一致，不

要独出心裁。在新中国，没有任何自然空间或心理空间留给个人，让个人去思考真理。

毛是一位中国式的整体主义者，他曾一度宣称有一个上帝——即群众。如果群众是一个集合体，是纯一的统一体，可行的道路只有一个，而不是多个：人们不可自行其是。*

人们甚至只能说“它”——毛的群众，而不是“他们”——中国人民（这使人联想起戴高乐的奇怪行为，他爱法国，而不爱法国人）。对毛来说，接受多元论就是接受六万万私利者。“斗私”，不意味着就是“利他”，而是意味着“和群体打成一片”，这一度成为道德的规范和社会的准则。⑧

“斗私”，包括“反抗家长制”，因为家庭很可能成为私利观念的温床，它与毛力图把一切自我价值观念纳入大同理想的努力相抵触。

在思想改造运动期间，很多人由于不得不检举自己的父亲，而导致精神全面崩溃。毛对这种现象并不同情，他把孝道视为旧中国遗留下来的糟粕。在毛看来，他自己的父亲就曾是封建秩序的象征，是一位吝啬的、心胸狭窄的父辈。

所以，毛以西方人的敏锐目光看到了一只驯服的羊与不离开羊群的羊之间的不同。他要求**在羊群中间**的每只羊都能自由说

---

* 毛认为人们各个自行其是很可怕，他称这种作法为“拉山头”。晚年，在回忆过去时，他伤心地看到，这种各行其是的不团结就象一条黑线贯穿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之中。

在延安党校，太阳落山、散步时就分成了“山头”。甚至到食堂吃饭时也分成“山头”。在自己的山头内，无话不谈，但要与其他山头的人交流思想则很难。当我们面临敌机轰炸时，外地来的干部和当地干部也分成不同的转移路线。即使在我们生命危急的关头，我们也不能很好地团结在一起。⑦

人的这种分裂倾向是否可以被接受呢？难道应当麻木不仁地任这种分裂存在下去吗？在陕北，就是躲飞机时，外来干部和当地干部也分道走，甚至冒丢掉性命的危险也不愿混到一起。

我们应该认识到山头的存在，重视这种现象，并消灭山头。山头的形成既有历史原因，又有地区因素。

话，自主独立自我完善，而不要温顺驯服。但是，脱离群体的生活是不正常的，毛看到了这一点，因此，他需要的是一个羊群。

毛开展了反贪污、反浪费和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政府官员成了运动的靶子。他们中间有些人开始认为，这种新体制就到此为止了，但毛并不这样想。

与此同时，为了清除经济生活中的不良现象，开展了“五反”运动：反行贿受贿、反偷税漏税、反盗窃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反对的目标是私营工商业者，他们在五十年代，仍是中国城市舞台上的正式角色。这一运动筹集的额外收入支援了朝鲜战争。

发动这两场运动旨在使所有的马克思主义领导者们认识到，毛泽东的领导在道义上是完全正确的。然而，使用的方法大部分是沿袭了思想改造运动时期的方法。不象斯大林时期的苏联，深更半夜破门而入，突然抓人，而是利用社会压力促其坦白。因而，这大胆地使人们把自已的良知与社会的利益联为一体。

“三反、五反”运动带有列宁主义的味道，但是也可看到儒家道德礼教的影响。

毛不仅是新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也是旧中国的产物。在中国，个人从不依靠自已的力量奋斗。个人从不单独地与上帝斗或与博大的清教徒意识斗，而是在一群人中斗。

在毛的中国，人民之成为社会主义者，不象圣保罗的信徒去往大马士革的途中所发生的宗教皈依一样。再生——如果发生的话——是全社会性质的。在西方，我们认为人能孤立地改变自已，在毛的中国，不能指望这种灵魂的变化会单独发生。

毛为“三反、五反”运动发出了指示，但是，他对政府官员和商人的批评远比对知识分子的批评要轻得多。

胡风是一位有乡土气质的诙谐诗人，他在上海文艺界光采出

众。他很早就是一位左派（尽管他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曾大胆地反对过毛）。他写了一首庆祝1949年胜利的诗《已来临的世界》，这首诗远非象某些人认为的是反毛的。"毛泽东如崇高的神，向全世界宣布，新时代建立新秩序"。诗行中热情洋溢。

然而到五十年代初，胡开始抱怨"舆论一律"。他感到毛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变得让人碰不得了。他反对让人民把这本小册子"当作图腾崇拜"。他称思想改造运动中那些爱管闲事的组织者为"官僚"。⑨

《人民日报》发了一连串批判胡风的文章，其中大部分出自毛的手笔。当然，公众舆论对胡风的反驳与其他一切行动一样，是阶级问题。在人民民主专政下，允许人民有言论自由，而反革命分子则没有这种自由。* 胡试图游离于阶级之外。

毛走得更远。他断言，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向前发展，敌人不是在消亡，而是在壮大。人民并不总是善于识别反革命分子，他说，"我们的人眼睛不亮，不善于辨别好人和坏人。"⑩

这是悲观主义的第一次流露，是毛的一个强制性推理。

同一性并没有实现，知识分子仍在嘶哑地唱着他们不协调的歌，然而，同一性体现在历史的无情记载中。过去的阶级划分要重新判定，否则，如何解释知识分子的叫苦连天呢？

这种政治迫害连麦卡锡也会自叹弗如。毛认为，唱走了调就是犯罪。"胡风……这样的人不杀，"毛解释道，"不是没有可杀之罪，而是杀了不利。"⑪

毛有一次曾谈到政府机构里大约有10％的干部可能是反革命。沈阳一家街道缝纫小厂的七名成员，怀着惶恐不安的心情讨论着他们厂里的0.7个反革命分子。

至于胡风，人们把他涂抹得已失去了原貌，正如麦卡锡把任

* 汉语中，"人民"有两层意思："公民"和"人民"，这里的"人民"，指不是反革命的公民。

何怀疑蒋介石的人都看成是共产主义分子一样，胡对毛的《讲话》的怀疑，是认定他为反革命分子的证据。不久，这位有棱角的诗人被查明是个“间谍”，这足以使红色的官僚们把他投进监狱。他的精神被摧垮了。

毛的怀疑是对的。在胡风的周围有一帮爱发牢骚的作家，胡是他们的中心人物。其中有一位写信向胡吐露：“因为我想写点东西，就读了毛主席在延安的《讲话》，但是读过以后，就再也不想写了。”⑫

然而对毛来说，欲将论战纳入阶级斗争的范畴，有如用纸遮云一般。

1951年中期，《人民日报》开始连载一系列文章。作者是毛，连载的是他的《选集》。

这本集子确实是精选的选集。本传记引用的很多文章无法在这本权威性的《选集》中找到。这些文章有些写于二十年代，还谈不上有什么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有些写在江西时期——当时毛刚染指权力——其中含有可能连毛本人也不相信的思想。他的诗词也被筛选出去了。*⑬

所发表的文章是经过润色的，粗俗的比喻和俏皮话荡然无存。经一群远胜于文学权威的笔杆子的删改，去掉了文中一些关于世界政治的小错误，顾全了作者的名誉。同时被编者删去的是，毛早年关于某些亚洲国家将被中国同化的见解。

一些妙言怪语及毛在不同的背景下所发表的对西方表示友好的谈话被大段大段删去。凡是不赞颂苏联的也都没有保存下来。甚至对李立三的批评也温和了许多，唯恐激怒了李在莫斯科的老师。

毛拾起了以前帝王们扔掉的东西。语言是规范的，所发表的

---

* 可能是因为体裁陈旧，又带有很浪漫的情调。

作品都是当局认为对其统治有利的东西。

中国的方块字不仅仅是字，还具有象形。四划代表“草”（“艸”），屋顶下面养猪（“豕”）表示“家”，表示“日”或“明”的汉字都有太阳（“⊙”）这个图形。

在列宁主义者看来——标语就象坦克一样有用，这与儒家是一致的。没有哪种语言能象汉语那样产生如此直露简洁的标语。四个字，甚至两个字就可表达全部的意义。标语中的含糊暗示极具煽动性，毛是掌握这一艺术的语言大师。

对于受过教育的人，这种表意文字犹如闪电，引导人们走进历史的广阔领域。毛在这方面的娴熟技巧，使他有能力对付所有的人，包括那些不喜欢他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

毛的诗词恰如其分地表达了他的思想，但是，大多数人对此只能一知半解。——毛的朋友郭沫若曾这样坦率地说过——不过这没什么关系。最高领袖的诗作增添了他的光辉，这实际上是一种统治艺术。⑭

1952年后期，毛的注意力从政治运动转到了经济工作上。不久《人民日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了。58%的资金用于重工业（苏联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只占41%；美国在1880——1912年间只占19%），60%的基本建设需要依靠莫斯科的技术援助。

有一天，在一次党的会议上，毛向与会者承认，中国的奇迹可能不会多了。这似乎是一种全新的语调，“我们吹不起牛皮，……我们竟然都比不上比利时这样的国家。”⑮他一直盯着钢铁和煤的产量。

识文断字在军队里已不是什么稀罕的事了。但道路是艰难的。在人民解放军创建空军和海军之前，电力没有帮他们一点忙。现在，这些东西成了毛走向下一个旅程必不可少的东西。

在社会主义思想领域，毛比在延安时期更加赞赏苏联。1945

年，他提出要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的具体现实相结合，这样差不多挤掉了苏联模式。然而，五年以后，北京提出了一个令人惊讶的口号，“苏联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明天。”这两个社会主义国家真的完全相同吗？

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得很好，工业年增长率是11%，钢铁产量增长了4倍，煤炭和水泥增长了2倍。在这期间访问中国的人已抛开了中国的思想目标这一话题。一些人称中国人为“蓝蚂蚁”，一些人称中国人是“崭新的人”。但不管怎么评说中国人，中国正在阔步向前。

桥梁和铁路出现了，文盲几乎被扫除了。人民的健康水平得到改善，平均寿命已经超出亚洲人的通常水平。一个东方大国，第一次迈出了向工业化进军的步伐。

中国依然贫困。纵观经济，发生了三件大事：在农村，封建体制被打破，焕发出新的活力；向工业化迈出了第一步；分配亦前所未有地平均了，——这对五十年代毛的中国的精神风貌极为重要。

1953年，一个消失多年的声音又叫喊起来。定居在香港、身体虚弱的张国焘撰文描绘了他昔日的对手毛的形象，这些有偏见的文章也揭示了一些事实真相。

“毛的生活没有规律，而且颇有些神经质，”张写道，“在与别人交往时，他常常谦恭有礼。然而，又常常固执己见。”中南海的工作人员当知，这些评论讲的是他们的领袖。

“他虽然知道身居高位该怎样行使权力，”张断言道，“但是他缺乏吸引追随者的才能，人们只对他敬而远之。”⑯ 毛确实发现，虽然他在群众的眼中成为巨人，但同时还要在政治局中赢得支持。

张的评论有一定道理，因为他并不只是否定毛。“毛在很多方面甚至比斯大林更有手腕，”这位对毛和斯大林都了解的人写

道，“但是他并不那么狠毒。”张也半公开地承认，毛以自己的才智战胜了他。“同中国历史上众多的君主相比，”这位毛以前的对手感到，“毛泽东的确更有才能。”

象林顿·约翰逊一样，毛冲动起来也会半夜三更给工作人员或同事打电话。为寻求了解，他会把专家们召集起来，长时间地问这问那。他在花园散步时，会突然向警卫员谈起自己对某一重要政策的看法。然后立即钻进古书中（和林顿·约翰逊一样）去查找以前有无先例，或者为自己的论点寻找佐证材料。

他总是深夜驱车登门拜访苏联大使尤金。尤金是一位知识分子，毛就同他讨论哲学，直到天亮。毛的《选集》结集以前，某些文章的修正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这种“夜莺式”的交谈。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烟草消费国。毛至少有六十多年的抽烟历史，可能任何国家的政治领导人都不如毛抽掉的卷烟多。

毛似乎有一段时间戒了烟。伏罗希洛夫元帅在斯大林死后访问中国时，曾告诉毛说，苏联的医学专家认为，如果斯大林遵照医嘱戒了烟的话，他可能不会逝世的那么早。于是，毛也戒了烟。

但是，十个月以后，他又抽了起来。

“戒烟无济于事，”他说，“工作太辛苦，不能不抽。”⑰

五十年代，毛没有写多少文章，但是这是他发表演说最多的十年。毛不是一位才华出众的演说家，相反，王明的演说总是充满激情，而朱德讲话则直诚坦率，平易近人。史沫特莱回忆说，毛在公开场合发表演说时，语言极为丰富和幽默，也没有任何手势。⑱

然而，同少数人在一起的时候，毛则更显得才华横溢。他热情率直，喜欢巧妙的引用比喻。但这些特点只是在几个人一起讨论问题时才能表现出来，而不适用于群众集会。

毛的讲话大多只有一个粗略的草稿，只是在五十年代初，有

一、两次，他真正坐下来作充分的准备。1953年中期，毛重新开始学习英语，然而，东北的形势严重恶化又使他中断了学习。从此，政治家最终取代了学者。

一天，毛对满屋子的地方干部们说："官越大就越无知，北京不是学知识的好地方。"⑲ 夺取政权三年之后，尽管取得了一些成功，毛还是对政治体制焦虑不安。

平民百姓（当他们确信干部们不听群众意见时）嘲讽高高居于他们之上的各层官僚为"宝塔"。毛感到自己象是处于宝塔的顶端。

他决定从塔顶上下来到各地去看看，"我在北京，差不多听不到什么，"1953年中期，他在给一批财政官员作报告时说，"以后还要出外走走。"⑳

他还派他的部下到农村去。负责中南海警卫工作的是8341部队，这支精锐武装力量的前身是毛1949年前的贴身护卫队。㉑ 这些年轻的警卫员，从帮助毛锄园种瓜，到保持警惕、预防宫廷政变的一切迹象，样样都干。

1955年，可能还在其他时候，毛给8341部队分配了一项他想作的任务。他派这些来自全国各地的士兵回到家乡，想通过他们了解农村的情况。

8341部队的干部们四下探听消息，询问群众的意见，了解家人的情况，然后不经过正式渠道而向毛汇报。

这是过去皇君王体察民情惯用的手段。毛的同事们怎么也不会料到一位工人阶级的领袖竟然会这样干。

毛在一次讨论农业问题的中央委员会上说："我用十一天工夫，看了一百二十几篇报告，包括改文章写按语在内，"毛以古喻今说，"我就'周游列国'，比孔夫子走得宽，云南、新疆一概'走'到了。"㉒

五十年代，毛还没有把孔夫子看作是中国以往历史的祸根，

他对孔夫子的态度还是友好的。

一天，毛走出书房，到怀仁堂作报告。这是一座秀丽的古代建筑，位于紫禁城内，是中央委员会所在地。许多党外人士参加会议，其中，邹庆文（译音）是四十年代“第三势力”的头面人物，同其他人一样，他在1949年倒向了共产党。

毛走到哪里，哪里就会欢呼雀跃。他已经习惯了，但他的助手总有些不放心。在毛到来之前，礼宾官员就走近邹，告诉他仪式的程序，因为邹坐在门口，他将第一个见到毛：一看到毛出现，他就要马上起立并鼓掌。以此为信号，整个会场里就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以示对毛主席的敬意。

邹回忆说，当毛缓步从走廊过来时，一切按程序进行。暴风雨般的掌声显然使毛受之无愧。㉓

若要表示一下深入群众，毛就会走到群众面前。开会时，他四处走动，向熟人问候，并长时倾听别人的谈话，也听取别人的批评意见。他解答下层向他提出的问题，并答复别人的插话。

五十年代的毛还不是一位高高在上的神。

建　　设（1953—1956）

1954年毛在其政府的外观上做了一些变动，这反映出了1953年间其内部的倾向。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毛曾做过三点让步。他让民主党派在政府中发挥一定的作用，尽管他对他们并不十分依赖；他让军队参与国家的统治，虽然他坚信军队属于人民；另外，他允许六个行政大区有许多自主权，尽管这具有削弱他个人权力的危险。

到了1954年，毛想使权力更加集中。在朝鲜停战，城市经济基本稳定和成功地完成了土地改革之后，更多地加强中央集权似乎成为可能。

1954年9月，1226名代表云集北京，参加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一个共产党与权力机关相分离的没有实权的议会。毛在大会上的发言不满一页，其主要观点却象夜空中的星星一样烁烁闪耀：“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

党。"[1] 这一句话就决定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地位。

毛撤消了六大行政区，同时削减了军队对政府的直接影响。总之，在1954年的新宪法颁布之后，党对国家的控制加强了，各种"独立王国"被废除。

这种独立王国，特别是东北领导人高岗的独立王国，在1953年一度很强大，对毛构成了威胁。毛摧毁了它——但这并没有使他心情转好，他感到党内团结发生了动摇。

高从未忘记，当毛长征到达陕北时，在为毛的长征队伍提供立足之地方面他曾起过巨大作用。高回忆说，长征队伍到达陕北时，"就象破衣烂衫的乞丐。"他甚至自诩，"如果我当时不接受毛，他哪里会有今天？"[2] 高岗的虚伪还表现在，他把毛的讽刺性评价"只有高岗同志不犯错误"，[3] 当作自己一贯正确的证据天真地经常加以引述。

如果说高的行为使毛不快，那么他与苏联人的关系则更使毛感到威胁的存在。毛不是新中国建立时期第一个会见斯大林的中共领导人。早在1949年中期，高岗曾代表东北地区去莫斯科与苏联签订了一个贸易协定。根据1950年毛泽东和斯大林的协定，中国的工业重地东北仍处于苏联的控制之下。1950年，苏联同意援助的50项工程中有30项是在高的王国中。*

数年后，毛曾把东北和新疆说成是解放初期的"两个殖民地"。[5]

高与斯大林交往而凌驾于毛之上。他给苏联人以特别情报（这与斯大林赠给高一辆小轿车不无关系）。[6] 结果，按照赫鲁晓夫的说法，高被看作是"俄国特务"。

斯大林让人把高和苏联驻北京大使关于中国内幕的谈话记录转交给了毛。"天晓得斯大林怎么想到会这样作"，这是赫鲁晓夫

---

* "高岗万岁"的标语口号在沈阳的各种集会上都可以看到和听到。[4]

的恰当评价。[7] 大量迹象表明，斯大林认为高在中国的地位正在下降，这位苏联老板想和毛搞好关系。[8]

1952年，毛真的把高从他的王国中弄出来，调到北京任职。[9]但在毛看来，高仍然是一个很显眼的人物。东北独立王国的威胁虽然已经削减，但是高（在其上海同谋饶漱石的支持下）对毛仍然进行中伤。

在1953年中期的一次重要的经济政策协商会议上，高与毛在经济政策上发生了冲突。当时，同毛相比，高更推崇苏联的在工厂实行"一长制"。高被指控同解放军进行不应该有的"接触"，[10]并且他希望能当总理(尽管他并不谋求取代毛做党的主席)。

斯大林一死，毛开始反击高。毛之所以拿高开刀，是为了阻止高以后再搞阴谋，也是为了杀一儆百。

高还有其他参与者。当时，毛收到了几位高级领导人的一封信，信敦促毛"去休养"。* 这封信最初可能来自饶漱石的王国(饶根本不理会毛给他的意见，而一味地鼓吹只有亚伯拉罕·林肯和富兰克林·罗斯福才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政治家)。

朱德也卷入了这一角逐。这位军事英雄提出，党应该实行"主席轮换制"。这一建议看起来很平常，但在当时的危机时期却具爆炸性。

最后的摊牌是在1954年圣诞节前夕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毛向高、饶发起攻击，并撤了他们的职。然后毛去了浙江的莫干山，四个月没有露面，官方称他在"度假"。

这种情况是不奇怪的。高度紧张使毛病倒了。他隐退很长时间，然后带着恢复过来的充沛精力再次投入战斗。高饶事件是新中国成立后给毛带来严重心理创伤的第一个事件。他确实"休息"

---

* 在以后的镇压年代里，这封信的签名者之一曾说："这封信是出于对毛主席健康的关心才写的。"[11]

了一下。尽管是在结束这场对他至高无上的权力的挑战之后。

当毛仍在离休思考问题时，1954年2月中央委员会开会，毛因“度假”而缺席引人注目。这是自1950年中期以来召开的第一次中央委员会。直到1955年4月，才又召开了一次会议（译按：应为3月召开的党的全国代表大会），这次会议对高、饶进行了正式清洗。毛或许不想在现场看到结局。*

会议由刘少奇主持。高、饶被轮流叫进会议室，接受大家的批判。高进来后，声称他是清白的，绝没有反党阴谋。然后他拔出了手枪，对准自己的太阳穴，旁边的人急忙碰了一下他的胳膊肘，子弹射穿了天花板。⑫

这仅仅是死亡的延缓，后来高在监狱中服毒自杀。他是第一个（但不是最后一个）与毛较量后失去生命的党的高级领导人。

高岗事件之后，毛开始削弱朱德的权力。在全国人大会议上，党的主席毛被选为人民解放军的统帅，这是用和平的方式从朱德手中夺取权力。第二年，毛把一个新的元帅头衔授给了朱德，同时被授予元帅的还有其他九位军队领导人。“毛—朱”伙伴关系已成过去。

毛并不愿意高岗事件如此结局，这可以从他在处理高岗事件的第二次会议的讲话中看出。他用文学语言比喻说：“人是要有帮助的，荷花虽好，也要绿叶扶持。”⑬1955年春天的这个讲话的主要意义在于，毛号召互相帮助、集体领导并在同志之间建立合作的态度。

毛清楚地意识到，高岗的“余毒”并没有随着他的死亡而消失。

这场斗争已经结束，然而毛仍坚持要把反对高岗的斗争神圣

---

* 两个当时在场并取代高、饶在政治局中位置的人是林彪和邓小平，我们以后还要更多地谈到他们。

化。六个月后，毛找到了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把高岗称为是那种“不继续革命的人”。结果，自负的高岗扮演了一个连他自己也不会想到的角色——充当了反面历史教员。

与毛一起倚靠在北京的一个游泳池边上的那个人是谁？那是尼基塔·赫鲁晓夫。世界上的两位马克思主义巨头，把他们宽大的身躯浸泡在游泳池中，正在争论核战争问题。

我们这个时代许多重大争论中的其中之一就这样开始了。在这两个巨头中，究竟谁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斯大林的真正继承者？谁的路线将在对美国扩张这一至关重要的问题上取得成功？与大多数乌克兰农民一样，赫鲁晓夫向来不喜欢游泳，因此，争论暂时是毛占上风。

赫鲁晓夫是作为贵宾来参加新中国五周年国庆的。他参加检阅游行，出席盛大招待会并发表祝词。赫鲁晓夫后来回忆说，毛的热情友好是他未曾料到的。他们俩热烈拥抱互吻面颊。西方世界看到不可遏制的共产主义阵营如此巩固，甚为不安(1954年秋天，东南亚条约组织成立，美国也与蒋介石缔结了盟约)。

实际上，从个人特点看，毛与赫鲁晓夫除了都有一个大肚子外，很少有共同点。毛的思想不轻易外露，炮筒子赫鲁晓夫曾说：“我从来也不敢保证我完全把握了毛的话。”毛爱好读书；赫鲁晓夫则喜欢玉米棒子。毛（用赫鲁晓夫的话说）“行动起来象熊一样沉着迟缓”；[14]赫鲁晓夫则象公牛满地乱撞。毛放眼世界未来；赫鲁晓夫则天天想着怎样对付美国的实力挑战。

这次毛和赫鲁晓夫在北京的会谈，是五年来中苏最高领导人的第一次会晤。周恩来曾去过莫斯科两次；刘少奇去过一次（历时三个月)。较低等级的苏联领导人也曾访问过中国，但这五年来毛从未离开过中国。

斯大林死后，莫斯科确实对毛更信任，也更慷慨了，尽管毛

并不这样认为。以前在莫斯科的公文袋里堆积的有关两党的所有分歧，在 1953 年到 1954 年期间一下子全都烟消云散了。最令人吃惊的变化是，《真理报》甚至称毛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赫鲁晓夫欣然来到北京——这是他第一次访问亚洲——似乎也是一个表示友好的信号。

这次中苏最高级会晤的具体成果对毛有利。毛得到了更多的贷款，收回了在苏联人控制下的东北的两个港口。毛不喜欢的中苏联合股份公司被解散，这比毛和斯大林所签协定规定的日期提前了二十五年。苏联的报道史无前例地把中国称为“平等伙伴”。

然而赫鲁晓夫是在闷闷不乐中离开中国的。在回到莫斯科后，他告诉同僚，“与中国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⑮

毛向赫鲁晓夫提出了蒙古问题。他曾答应斯大林外蒙古可以独立——他当时不得不这样做——但他认为莫斯科把乌兰巴托变成了笼中之猴。⑯ 毛后来说，“我们提出了这个问题，但他们（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拒绝回答我们。”

从文化背景上看，这次会晤象是黑夜中交臂而过的两艘战舰。赫鲁晓夫说：“每当我们要改变话题时，中国人就送来茶——请喝茶，请，请……按照中国的文化习惯，如果你不立刻喝光，他们就会把杯子拿走，再泡上一杯，放在你面前——如此不断重复。”⑰ 心胸狭窄的赫鲁晓夫感到毛是在捉弄他。

这位苏联人曾要求中国派一百万工人去苏联开发西伯利亚地区，毛觉得这有些冒犯了他。但是当赫鲁晓夫放弃要求时，毛（按照赫鲁晓夫的说法）却说这一计划可以试一试。这时赫鲁晓夫失去了勇气，但已无法收回他所提出的建议。二十万中国工人去了西伯利亚。这计划后来夭折了。

赫鲁晓夫愈来愈感到毛过于精明，“他知道怎样制服我们”。⑱

当毛和赫鲁晓夫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国庆游行队伍时，赫

鲁晓夫象是一个察看庄稼长势的农民。焰火使毛兴致勃勃，赫鲁晓夫则不然。忽然周恩来发现了毛的妻子，就走上前去要把她介绍给赫鲁晓夫，但被毛阻止了。他带着江青迅速地穿过紫色平台，走到稍远的角落，夫妻在那里一起观看焰火。[19]

很难说究竟是毛不想让赫鲁晓夫见江青，还是他不想让江青见赫鲁晓夫。

令赫鲁晓夫吃惊的是，毛很蔑视美国的威胁。在游泳池畔，毛对赫鲁晓夫表达了帝国主义是纸老虎的观点。赫鲁晓夫后来说："我努力要他相信，一两枚导弹就足以把整个中国化为灰烬。"[20]

1954年的这次讨论，使人想起毛在九年前对日本广岛原子弹爆炸的看法。中国共产党最初的反应是与其他国家一样的。在美国的原子弹袭击广岛之后，重庆的共产党报纸《新华日报》说："这是军事技术的一次革命。"但毛不同意这种看法。

"原子弹能不能解决战争?"毛在四天后的一次讲演中问道。"不能"。毛提出了自己独特的看法。他批评道："我们有些同志相信原子弹是万能的，这是极大的错误。"[21] 毛极其严肃，"原子弹是美国反动派用来吓人的一只纸老虎，"他向来自内布拉斯加州的关心中国革命的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重申了这一观点，"看样子可怕，实际上并不可怕。"[22]《新华日报》不得不纠正原来的看法。

直到1954年，毛仍然相信人的意志要比武器重要。对赫鲁晓夫来说，一样东西，如果你能吃或能触摸到，那它就是真实具体的。而毛则是一个很自信的预言家，他坚信中国以及整个世界都将螺旋式地向共产主义过渡，资本主义必将灭亡。赫鲁晓夫感到毛把他看成是胆小鬼。*

---

* 毛和赫鲁晓夫确实曾在一件事情上达成一致意见，但很快就被遗忘了，这件事二十年后在不同的情况下重新被提了出来。当时赫鲁晓夫曾提议就欧洲安全问题召开会议；毛说这是一个好主意。于是，赫鲁晓夫向二十三个欧洲国家和美国发出了邀请，但西方不感兴趣。后来当赫尔辛基会议在1975年召开时，毛指责这是对苏维埃的背叛。

赫鲁晓夫离开北京后，毛和他的关系开始趋于紧张，几个月后，赫鲁晓夫向西德总理阿登纳暗示，中国“可能会给西方带来麻烦”。毛毫不怀疑，苏联人把中国共产党看作是“儿子党”或仅仅是“爱国党”。五年以后，赫鲁晓夫还对艾森豪威尔说，他和毛“是好朋友”，㉓看来这话不是发自内心的。

游泳池畔的一幕不过是中苏最后决裂的前奏。究竟有无必要害怕战争？这一问题使毛和赫鲁晓夫的分歧愈来愈大。㉔在赫鲁晓夫到达北京前夕，毛就表明了他的立场。作为“意识形态的考验”㉕（这是北京的说法），他下令猛烈炮击台湾与大陆之间的大小岛屿，而炮声将引起更大的回响。

1951年末，毛告诫江青“作好份内的工作”，㉖这是他一种进退两难的答复。这导致毛的第三次、也是最长的一次婚姻步入微妙关系阶段。

1950年，共产党给了江青相当重要的工作。她负责中共中央机关的管理工作，同时主管中宣部电影局。

但是毛的“绣花枕头”㉗（赫鲁晓夫这样称江青）树敌过多，要求她辞去党内工作的呼声很高。江青向毛申诉。但江青本人也承认，毛实际上站在批评她的一方。毛的解决办法是叫江青作好份内工作。

事实上，江青大多数时间是花在病床上或去莫斯科，或两者兼而有之。

她在五十年代确实经常生病。但毛认为她实际上的病比她胡乱猜想的要轻得多。毛在几年后的一次会议上的讲话似乎是对江青而发：“过分讲究吃、穿、住和小汽车，是高级干部生病的四个潜在原因。”㉘

有时，可以在招待会上看到江青和毛在一起，㉙但他们更多的是长期分居。江在1949年到1957年期间，为治病四次去莫斯

科，她不在中国的时间加起来差不多有三年。尽管在这一时期，毛也去过莫斯科两次，但在苏联首都他们却没有在一起。

江青去莫斯科疗养至少有一次是违背她的意愿的，然而毛支持那些坚持要送她走的人的意见。1956 年到 1957 年是江青第四次去莫斯科，她消沉到了极点，非常想回国。然而 1957 年 1 月，周恩来去莫斯科与赫鲁晓夫会晤时带了毛的明确指示，江应当呆在莫斯科直到恢复健康。

江青老是担心与毛的前妻贺子珍会具有同样的遭遇，这是不足为奇的。因为贺子珍也曾被毛送到苏联，后来又进了苏联精神病院。

所谓江青只需作好份内的工作可能意味着，从党的角度上讲，就是不让她担任要职。但江还是设法使自己成了毛的秘书。不过好景不长，不到一年的时间，她就被赶出了北京去了莫斯科。江说，是"某些领导人"做出的这个决定，[30]但如果毛不同意这个决定的话，他完全可以否决它。

按照江青自己的说法，不管怎么说，在五十年代她曾为毛工作过一段时间。在一张特别的倚床上，她翻阅着文件，把重要的内容呈送给她现在称为"主席"的那个人。当她为他读电文和报纸时，他坐在她的床边，这就有可能使江了解的情况比毛多。

毛从来没有公开谈起过江青在这一时期给他的帮助。他对江青五十年代受的冷落不闻不问。之所以这样，部分原因是党给毛的压力。毛与江青的婚姻在党内高层中一直不受欢迎。

在北京，毛经常看到他的两个女儿，因为李讷和李敏就住在家里。五十年代中期，她们进入北京大学学习。李讷显然是两人中较为聪明的一个，她选读了她父亲喜欢的历史，李敏则学习自然科学。

经常出入毛家的另一个人是毛的侄子毛远新，他是毛的弟弟毛泽民的儿子。毛泽民在 1943 年被国民党杀害。

毛岸青是毛与杨开慧所生的唯一活下来的儿子，他从不露面，常年呆在医院，毛似乎对他关心不够。*

新中国诞生已经五年了，那么毛的中国是什么样子呢？

毛语出意外地谈起了天安门城楼的“革命”。随着时间的推移，革命已具有一种包罗万象的意味。现在，革命象一经打开的手提箱里的物品一样分解为各个部分。

革命的内容已经发生了变化。

革命意味着在工厂整天地工作；意味着学习毛泽东思想；意味着一个小姑娘把她刚在学校里学的汉字教给她的祖母；意味着富有理想的年轻干部从北京奔向农村，向那些只关心天气和温饱的农民传播共产主义思想。

革命是健康的身体，冗长的会议，高高的帽子，关闭的寺庙，新建的桥梁，粮油票证，印尼总统苏加诺对“人民中国”的致意。

在农村还有一些零星战斗，但大的战役已很少。没了地主，也没了日本人，只有胜过穷互助组的富互助组。懒汉需受到管教，爱管闲事的人应受到处置。

乡土中国离福利国家还相差很远。收入尚不平均，没有社会保险，必须劳动谋生，家庭出身至关重要。

但人们之间互相合作的义务比过去增强了，这正是社会主义的含义。此外，社会主义还意味着那些永远是干部的人不断召开会议，告诉人们应怎样生活。他们工作努力，襟怀坦荡，可以说无懈可击。但他们事无巨细，包揽一切。

当毛改变自己以前对人口增长的看法，提出要计划生育时，

---

* 毛曾奇怪地谈到指甲与孩子性格之间的关系。他对印度尼西亚客人说，“对于儿女们，你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检查一下他们的指甲是否修剪了，”他微笑着，把双手一合，继续说，“这样你就可以知道你的孩子是不是听话。”㉛

干部们积极响应，把农民召集起来开会，"他们甚至告诉你夫妻什么时候同房。"有人曾这般抱怨说。

过新年贴出的春联换了新的内容。以前春联的内容是美德和富裕，现在则是实现五年计划的口号。从传遍千家万户的喇叭中传出来的也是新口号。"中国共产党万岁"是听到最多的口号之一。

走进每一节火车厢，都可以听到女播音员尖尖的声音："我们就要到达北京了，那是毛主席居住的地方。"播音员们把播放唱片音乐和启发式宣传的职责结合起来，她们刺耳的声音使新中国保持思想上的警觉。㉜

他们果真如此吗？主要问题是社会性的而不是思想观念上的。人民以建设者的姿态共同做对中国非常重要的工作，至于每个人内心里究竟怎样想，毛主席很快就发现，连他自己也不知道。

一天，驻北京的波兰大使决定要检验一下毛的中国公民的诚实性。他怀疑一种崭新的道德风貌是否确实存在于中国社会的各个角落。他有意把他的钱包丢在他住的旅馆的走廊中，当天晚上钱包就被送回，里面的40美元分文未少。第二天早晨，他又把钱包丢在旅馆大厅的长沙发上，结果又是原物归还。这位大使感动了。

第三次，他把钱包丢在附近的公园里，一名警察把它送了回来。

打开钱包一看，变成了80美元。天哪！美德是一回事，变魔术可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这位大使猜测，可能是当警察发现钱包时，钱包是空的。他们估计钱包里肯定是有东西的，于是为了掩盖在中国有小偷，他们在归还时就放进了80美元。㉝

是不是某个中国人偷了这40美元呢？很有可能。这发生在

毛的中国，如果在哥穆尔卡的波兰，也会发生这种情况。

毛要求人们具有统一的世界观。他喜欢听到解放军军官为士兵洗袜子和短裤的新闻，这表明官兵平等，没有等级差别。这种姿态就带有了他的时代之路上的精神。但是，要在一个庞大的、等级意识和重视物质生活的社会中把这些加以制度化，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不过，一名将军洗自己袜子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这可以使人们容忍落后，激起他们继续革命的热情。假如没有这种带有偶然性的姿态，中国不见得会更好一些。

与斯大林时代的苏联相比，五十年代的中国较为美好。很少有人玩世不恭，人们满怀希望，热情奋发，忘我地工作。他们能够在公园或家里舒适地休息。社会主义并没有削弱中国厨师的贡献。

但另一方面，毛并没有打破中国人由来已久的自得其乐的思想。他没有激励他的人民去探索中国以外的世界。中国就是他们的世界，他们的视野是这样的狭小。

有人说，中国比苏联更有人情味，但缺乏全球意识。

毛的中国象是一个大家庭。他要求人民要象过去尊重宗族关系那样，建立并尊重新型的同志式的亲密关系。当听说他的儿子在朝鲜战场上牺牲时，他所说的话反映了这一点。噩耗传来，他控制住自己的感情，沉默了好久才说："没有牺牲就没有胜利。牺牲我的儿子和牺牲别人的儿子是一样的。"*㉞

这种关系在中国并不算是什么新现象。在汉语中，"大家庭"是指"所有的人"。古代的君臣关系如同父子关系。县官被称为"父母官"。没有离群索居的人。包办他人的事被看作是天经地义的。

---

* 毛岸英的遗体没有运回中国足以说明毛的这一想法。毛岸英被葬在朝鲜的土地上，金日成每年向他的墓地敬献花圈。㉟

这样，法律的作用就很小。父母从来不通过法律来解决与子女的纠纷，子女也没有诉诸于法律的自主权。

毛的中国也是如此。在过去的中国，孩子在家中有一种安全感。在毛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也有这种感觉。在过去，如果父亲指责孩子有错误行为，孩子没有权利为自己辩护或要求公众裁决。毛的公民也是如此。[36]父亲对子女是恩威并重，毛的权力也是与其思想的威望密不可分的。团结合作的大家庭而非有限公司，正是毛的目标所在。

这一事实能说明毛与中国存在着对抗吗？很难这样说，至少目前还不能这样说。

毛夺取政权的方式是从本国实际出发的。他脱去了马克思主义身上的西装，并给它套上中国的长袍。他象农民起义者一样上山打游击，而不是象列宁占领圣·彼得堡的十月革命那样去攻占上海。

他的奋斗目标也是从中国传统中采撷来的。他认为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就是实现大同世界。

他不必花太大的力气去与宗教作斗争。卡斯特罗要反宗教，波兰人要反宗教，甚至苏联在某种程度上也要反宗教。在中国，对另一个世界的向往要比天主教的古巴和波兰以及东正教的俄国更淡漠。

毛的思想与中国的传统非常吻合。孔子不相信有上帝存在，因此毛也就没有废黜上帝的问题。孔子相信宇宙有其内在的规律性；毛也如此。

对于毛主义者来说，伦理道德的存在就象自然规律一样不能违背，这与清朝达官有相象之处。

然而，毛的中国也有与古代中国不同的地方。例如，在这一文明中，极少有过靠社会纽带紧紧维系在一起的如此强大的国家政权。毛的政权用法规来管理人民，这只有在二千二百年前的秦

始皇朝代能这样，秦始皇以后的朝代很少如此。他用中国的法家传统、依靠管理法令而不是占统治地位的儒家公德思想，把中国治理得井井有条。

毛甚至还与他自己创立的新中国相矛盾。作为一个新法家，他使中国从束缚和神秘中获取了自由，这些束缚和神秘就是：家族压迫、对天的敬畏、极端的地方观念。但他又是一个货真价实的中国整体主义者，他要把亿万中国人按照一个新的计划结合起来。他的新国家已开始培养现代公民，但要多长时间这些公民才能跳出受前现代社会影响很深的毛的体制呢？

这仍是未来的危机之所在。

五十年代中期，毛坐在他的书房里，注视着中国的威望在世界上日益提高。他不出国访问，也不写有关外交事务方面的文章。在《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收集了1950年到1957年毛所写的文章)中，99%是关于国内问题的。在这一时期，毛在非正式讲话中也很少讨论外交政策。

出国访问主要由周恩来执行。1954年，周出席讨论印度支那问题的日内瓦会议，扩大了中国的影响。在1955年的万隆会议上，周使中国与不结盟国家建立了亲密友好的关系。毛只是运筹帷幄，他进一步发展了古代中国的无为而治思想。

毫无疑问，中国在朝鲜战争中的胜利，提高了毛在世界上的威望（在朝鲜战争期间，有许多国家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战争结束后，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就很少了）。由于斯大林搞了肃反扩大化，所以在斯大林死后，毛的威望进一步提高。毛在国内所取得的成就，对第三世界产生了特别大的吸引力。

外国人纷纷来拜见毛。*

来访者主要来自亚洲。缅甸的吴努总理于1954年来北京向

* 苏加诺抱怨说，他曾八次邀请毛访问印尼，但毛没有任何接受的表示。

毛表达敬意，毛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西哈努克1956年第一次在北京见到毛。“我喜欢那些亲王们，”毛对这位柬埔寨亲王说，“因为当他们不反对革命时，会象你一样反对帝国主义。”另一个亲王——老挝的苏发努冯·富马——在1956年也去了北京，但毛并不象喜欢西哈努克那样喜欢他。毛一直支持柬埔寨的中立派即亲王的力量，对老挝中立派即亲王的力量的支持时间则较短。

第一位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印尼大使莫诺努图，在回忆他去拜访毛并向他递交国书时说：“就象去路易十四的宫殿，仪式是那样的庄严。”[37]

上午10点，这位大使在紫禁城的朱红大门前受到中国礼宾司司长的迎接，这时，奏起中国和印尼两国国歌。莫诺努图的六位随从留了下来，他被领进一个古色古香的大厅。大厅两旁摆着明朝的瓷花瓶，一条巨大的红色地毯铺在中间。大使穿过大厅，一扇门轻轻打开。他走进了装饰相同的第二个大厅，这时又一扇门打开了，毛就站在那里，高大、沉着、慈祥。

毛和大使没有交谈，只是交换了国书。然后，一直陪同在旁的周恩来把大使领进隔壁房间。在那里，毛和大使按部就班地谈了一些爱国主义与和平方面的问题（与此同时，另外六位随行人员被带到另一个房间去喝香槟，吃中国甜点心）。

例行谈话结束后，毛起身离去。莫诺努图发现自己从另一个门走了出来。“我觉得不应当问毛任何问题，他象是一尊神。如果你有什么实际问题，应当去找周。”

毛似乎的确把自己视为亚洲（而不是西方）来访者的君主。有的人喜欢他这样。缅甸总理吴努说：“他看上去慈祥宽厚。”[38]也有的人讨厌他那种中国古代君主式的傲慢，“毛从来没与我谈论过天国，”莫诺努图说，“但我认为他肯定信仰它。”[39]

尽管这位印尼大使受到了很有礼貌的接待，但他感到毛对他

并不热情。在与毛的三次会见中，毛只做过这样的评价："我听说你们的国家很美丽。"尽管那些喜欢毛的亚洲人的报道经过竭力烘托，但毛给人的印象总是欠欠身子，似屈尊俯就，迷惑一下来访者。

在五十年代，毛不太注意非洲，也很少会见非洲人。只有一次他把中国与非洲大陆相提并论，就是当他得知南非的种族隔离法将对那里的华人产生歧视时，他支持黑人抗议该法案的行动。

1955年秋，毛会见了自抗日战争以来到访的第一位日本人。几星期内，他又接见了另外两个日本代表团。毛正以新的姿态对待日本。在以后的二十年中，毛会见日本人的次数比其他任何国家的客人都要多。

五十年代初期，毛曾希望日本左派能执政，他对此过于乐观。整个亚洲并不会随着中国的沸腾而沸腾。到1955年，毛改变了态度，他开始与任何日本人握手(不管是左派还是右派)，为的是想让东京的天平倾向于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而与蒋介石断交。

1956年中期，毛曾向日本提议签订一个包括中、日、美三国在内的"太平洋条约"。虽然当时被轻蔑地拒绝，但在七十年代当毛联合日美反苏时，"太平洋条约"已在精神上达成默契，只不过没有形成文件罢了。

在杜勒斯咒骂他，"封锁"他(让人好笑的是，美国花那么大的力气去封锁一个世界上最自给自足的大国)，并且预言他的政府将"垮台"的那一时期，毛当然不可能会见美国人。毛不时地会见苏联官员，他要与苏联安然相处，就不得不这样做。

正是通过亚洲舞台(另外还包括一些属于第三世界的其他几个地方)，毛树立起了自己的外交形象。在第三世界的舞台上，毛可以说是一个英雄——他只呆在幕后派周去传达路线方

针。*

中国曾受尽外强欺侮——这与亚非其他国家命运相同。中国是落后的农业国——亚非国家也是这样。中国也同样是有色人种——在欧洲，即使共产党也没有与第三世界的有色人种建立起这种稳固的关系。

万隆会议后，毛在国际上的威望大大提高，许多第三世界国家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

这一时期毛脚踏着两只船。他开始打第三世界这张牌，他知道他的苏联朋友做不到这一点。总有一天这会导致中苏关系紧张，所以在五十年代中期，毛打第三世界这张牌时小心翼翼。

作为亚洲最大的马克思主义国家的领导人，又领导了规模宏大的马克思主义革命，毛在第三世界阵营中有着特殊的影响。但在五十年代毛并不以此来对抗莫斯科。他不说第三世界是世界政治力量中的最重要力量，他也不把中国革命看作是世界革命的新发源地，这些思想只是到了后来才提出。

许多来自前殖民地国家的领导人都被毛的隆重接待弄得激动万分。这些领导人一踏上中国土地，首先看到的就是从飞机场进入市区时，两旁悬挂着高达三十英呎的他们本人的神采奕奕的肖像。当天早晨的《人民日报》早已告知中国百姓，来访者是这个

---

* 周在陪同毛会见外宾时，很少说话，有时干脆什么也不说。但是，当他单独与外国领导人在一起时，他则以绝对的权威来处理事情。毛与周的这种关系为世人称奇。有一次，吴努（他的诚实使他显得不是天真幼稚就是莽撞冒失）当着毛的面对中国“侵犯”缅甸边境发了一大通牢骚，毛平静地解释时周则坐在一旁沉默不语。吴努的同僚认为他对毛的直接冲撞对他不利。

第二天，当周陪同吴努一起去北京机场时，吴努诚恳地问：“周总理，我昨晚那样对待毛主席是不是不妥？”“吴努，”中国总理平静地回答，“你和我是经常见面的，如果你有什么不满可以对我说，不必对毛主席说。”“我很抱歉。”“没关系，”周热情地说，“不必过虑。”[40]

时代的重要人物。人们站在马路边夹道欢迎来访的贵宾。报纸在第一版上发表热烈欢迎的文章。

这些领导人还从未见过象天安门前的国庆游行那样如此壮观的场面。毛的巨幅塑像架在引导着游行洪流的彩车前部，塑像的手向前伸展好象是要去触摸正在凌空飞舞的彩色气球。这些外国政治家的心绪也同气球一起飞舞腾空。㊶

盛大宴会举行了，对来访客人国内经济的发展给予援助的许诺作出了；最后，受到毛主席接见的极大荣幸，使几乎得意忘形的来访者，带着满心欢喜回到自己的小国。

监狱生活——如尼赫鲁一样，许多人在那里呆过数年——决不是这样。华盛顿、巴黎和莫斯科似乎都不乐意看到，北京能与它的亿万民众和谐共处。

五十年代的中国人民比较纯朴，中国政治中没有什么阴影，因而许多第三世界的领导人把毛尊为泰斗是不足为怪的。

1956年秋天，印度尼西亚的苏加诺来北京见毛。苏加诺的一位助手回忆说："他们相互拥抱，就象是多年未见的老朋友。"㊷他们一起站在一辆帕卡德敞篷轿车上，缓缓驶入北京市区。毛面带微笑，挥动右手向群众致意。苏加诺也学毛的样子，微笑着向群众做手势。到处都充满了泛亚（洲）友谊。欢迎的人群站在离敞篷车五英呎远的路旁挥动着鲜花。悠闲漫步的警察并不阻拦他们。看不到荷枪实弹的士兵。

礼炮鸣二十三响。毛和苏加诺登上天安门城楼，十六排纵队的游行队伍在下面开始接受检阅。坦克滚滚而过，枪支如林，锣鼓喧天。运动员翻着筋斗。游行者一会儿挥舞扇子，一会儿又举起鲜花或标语，远远看去真是人潮花海，五彩缤纷。太阳也来助兴，洒着金辉把欢迎的队伍映照得灿烂辉煌。据说动员了五十万群众……㊸

早在苏加诺要来的前一天晚上8点钟左右，就有一位妇女在

紫禁城附近西单街挨院串户，每到一家她就以清脆的嗓音通知："苏加诺总统明天到达北京，政府已决定动员五十万居民隆重欢迎他。"这位妇女是这一地区不拿工资报酬的居民委员会负责人。

在一家门口，她更具体地通知说："你们家有四口人。居委会希望去两个，下午2点之前到西单街，你们的位置是在这条巷子的出口东面。你们要等到苏加诺总统和毛主席通过以后才能离开。"

可见，如此壮观的欢迎场面决不仅仅是因为太阳才有了光彩。

那么，西单街的居民们对毛和苏加诺有什么感想呢？在五十年代的中国，感情并不是主要的，它只是表现在爱国热忱中。在毛的领导下，中国人民不愁吃穿，没有失业，生活安定，他们个个都有一种自豪感，人人争做贡献。因此，这样艰巨繁重的任务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是可以承受的。

尼赫鲁来访时，毛很重视，因为毛对尼赫鲁很感兴趣。尼赫鲁不象大多数印度人那样迷信。他是一个现代人——不象莫拉尔吉·德赛那样喝小便。在1949年，毛曾谴责这个印度人是终将被扫进历史垃圾堆的资产阶级分子。这次来访时，毛热情赞扬了尼赫鲁反抗英国人的斗争，非常尊敬他。

但在谈到核战争时，毛的论断却令尼赫鲁大为震惊。毛说："他（指尼赫鲁）相信，如果原子战争爆发，整个人类将毁灭。我认为，即使发生最坏的事情，也不过是有一半人死去，另一半人会活下去直到消灭帝国主义，全世界都变为社会主义。"* ㊹

在1954年时，毛和尼赫鲁在大多数问题上的观点是一致的，

---

* 我们发现，毛的这种自信象其他的许多观点一样，是从中国古代历史中得到启发。1958年他在党的八大上说："战争危险的存在用不着害怕。死掉一半人在中国历史上发生过不只一次。汉武帝时期人口是五千万，到三国两晋和南北朝时期减少到一千万。"毛又进一步举出许多类似的例子，说明人口减少并不影响文明的进步。㊺

只有关于战争的看法两人截然对立。尼赫鲁对国际事务采取道德主义态度，毛只是对国内事务采取道德主义态度。

在性格上，这两位领导人也格格不入。毛认为尼赫鲁讲话啰嗦——中国人发现印度人总是这样，毛在二十年代就发现M·N·罗伊有此毛病。尼赫鲁则认为毛狡猾——这是印度人对中国人的普遍看法。*

毛是主张与印度友好相处的。他尊重列宁把德里看作未来世界革命中心的论断。然而，对于毛来说，他缺乏那种与中国之外的世界建立稳固关系的冲动，这就使得毛和尼赫鲁在反殖民主义的道路上不能并肩走得很远。

作为中国人，毛是以"黄种人的眼光"来看待世界的（事实上，许多大国的公民都有种族优越感，象中国这样的大陆强国更是如此）。在中国历史上，它很少走向世界去寻找它所需要的东西，只是到了十九世纪才不得不这样做。中国是一个"中央帝国"，不仅表现在它的自我夸耀上，在地理现实上也是如此。

对于毛来说，还有其他一些因素影响了他。他出生在山区而不是沿海。他的性格形成时期不是在大城市度过的。他的革命生涯是从中国内地开始的。

与斯大林不一样，他是从延安而不是从整个中国的角度来看待世界。当斯大林与希特勒签定友好条约时，象所有虔诚的共产主义者一样，他也不能理解。毛五十年代的思想，就其大部分来说，仍然是他在三十年代末期所接受的马克思主义观点的稳步发展。但在这一时期，毛已开始固步自封，倾向于脱离马克思主义正统。

毛对中国之外的世界没有亲身的经历。赫鲁晓夫在1959年

* 我曾请一位缅甸领导人对毛和尼赫鲁作一个比较。"完全是不同类型的人，"这位二者都见过的缅甸人停了好大一会儿又说，"如果我不得不和他们打交道，我情愿和尼赫鲁交谈。"㊻

对美国的访问，哈罗德·麦克米伦1960年的非洲之行，都使他们每个人的原有想法发生了很大变化，而毛没有这样的经历。

毛非常了解外部世界。他不断地读书，在五十年代的世界领导人中没有哪一位（甚至包括戴高乐）在读书和写文章方面超过毛。* 他的外国知识仅限于历史和地理两方面，对科学技术、政权上执政党和在野党的更替他不甚感兴趣。

外部世界毕竟不是中国。尽管毛对外国知道很多，但他关心的方面是有限的。在这方面他与林登·约翰逊总统恰恰相反。林登·约翰逊所知甚微，却认为他的职责即是象新政时期为得克萨斯儿童们所做的那样为亚洲儿童做事。

对毛来说，当时的对外政策只为着单一的目标，即使新中国可以顺利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他的长期目标将在后面七十年代时谈到）。他对国外的事务一概不感兴趣。

他对每个国家（除了苏联）的态度都是："你们来我们这里吧。"至于同"帝国主义国家"建立外交关系，他告诉他的同事："不但现在不应急于去解决，而且就是在全国胜利以后的一个相当时期内也不必急于去解决。"[17]

---

* 毛与戴高乐在这一点上是一致的。二人都是自己动手写信函文件等，既不喜欢口授由别人代劳，也不愿用打字机。戴高乐是出于审美的考虑，而对毛来说，使用打字机，几乎等于用调羹去舀游泳池里的水。

疑　云（1956—1957）

有时一年胜似一个世纪。公元一千九百六十八年，对美国和欧洲大部分地区来说，就是如此。而对于中国（乃至整个共产主义阵营）来说，1956年也是这样的一年。它改变了国际共产主义阵营的格局。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毛从未象在非斯大林化带来喜忧参半的时期那样震荡，毛小心地行事。

1954年对毛来说真是春风得意。权力得到巩固；第一个五年计划进展顺利；秋天，他与赫鲁晓夫相处时处于较有利的地位。1955年，他开始感到：他可以踩足油门加快实现一些宏伟目标了。

然而，在1956年，他遇到了来自国内外的各种阻力。

1955年中期，在谈到农村形势时，毛以激烈的言辞批评道："我们的某些同志却象一个小脚女人，东摇西摆地在那里走路，老是埋怨旁人说：走快了，走快了。"① 他认为，农村出现

的将是一场风暴，象他在1927年看到的那样。"在全国农村中，新的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高潮就要到来。"

但是，在怎样推进这场前所未有的农业集体化问题上，引起了争论。在毛看来，要引导五亿农民在党的领导下进行集体劳动而不是自己单干。

第一步，是大约每十户组成一个互助组，这时，小农所有制没有很大改变。第二步，是合作社，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制。*

对毛来说，这令人心情激奋。自五十年前反对父亲的压制时起，他就一直在考虑土地问题。现在，解决的办法就在眼前，他当然会毫不犹豫地抓住它。他认为，只要使农业集体化，就能牢牢地巩固社会主义政权。

并非每个人都同意毛的观点。土地改革完成之后，刘少奇就曾对农民说过："从现在开始大规模的运动已不再合适，主要的问题是集中力量进行经济建设。"② 1954年，筹备起草新宪法之际，另一位高级官员也表示过同样的意见："过去，共产党依靠搞运动取得了胜利，今后，必须依靠法制建设社会主义。"③

由于农业部总拖后腿，毛不得不把他的一个精明但脾气暴躁的亲信陈伯达** 安插进农业部任第二把手，以便执行他的路线。但是，与此同时，一些地方领导人则在筹划着解散合作社！全国六十七万个合作社中有两万个因为办得不成功，已被强令解散。这些人的行动受到刘的支持，他们认为，大规模的集体化只有到农业机械化时才有意义。

领导层中的大多数人认为，以前，共产党的任务是夺取政权***。现在，中国已经成了社会主义国家。因此，今后的工作要

---

* 这两个阶级都不影响农民对自己消费资料的私人所有权。

** 陈伯达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青云直上，官至高位。

*** 公正地讲，有人也担心强制实行集体化会带来巨大损失，以后的结果证明，这种看法是正确的。

脚踏实地地一步一步地去完成。

毛认为，权力的行使不是砌砖，而是雕塑。刘和其他许多领导人并没有完全理解毛的意思。

面对农村日益高涨的形势，毛提出一个口号："多、快、好、省。"但农业部做了篡改并拖了很长时间才在《人民日报》上发表。

五十年代的毛不是斯大林。他不能够对那些妨碍他行事的人进行屠杀或者把他们流放到西伯利亚，他只能进行诱导和利用。

一天晚上，他会见了八十位上海工商界的巨头。④这些人都是私营企业的老板，共产党把他们称作"民族资本家"。考虑到他们有爱国之心，同时也需要他们的经营管理能力，到目前为止，毛一直允许他们自由经营，不加干涉。

为了不使这些企业界巨头们过分紧张，毛语调缓慢，如叙家常。"你们怎么不抽烟？"他亲切地询问这群忐忑不安的听众，"抽烟不一定对你们有害。邱吉尔一生抽烟，身体很健康。我所知道的唯一不抽烟而命长的人是蒋介石。"

毛说，资本家的表现一直是好的，但最近他在北京听说，有的资本家自己提出要国有化，他们不想在建设社会主义大厦的过程中拖后腿。毛说他不相信，很怀疑，所以，他来到了大城市上海，想听听诸位的意见，"我今天只带两个耳朵来参加会议。"

这是毛的策略。当然，如同脱毛凤凰，这些资本家，已经嗅出正在发生的变化。在两个小时的会见中，他们竞相表态要转向国营。他们的"要求"当然得到了满足。结果，一个资本家星期一还是私营企业的老板，到了星期五，就发现自己成了拿薪水的经理了。可见，毛不仅在农业中，而且在工业中也在探索更具特色的社会主义实现形式。

关于毛的策略，这次会见之后，有一则故事在上海各单位流传开来。毛召见了刘少奇和周恩来，他向他们提了一个问题："你

们怎样才能使猫吃辣椒?”

党的第二号人物刘少奇首先说:“那还不容易，你让人抓住猫，把辣椒塞进猫嘴里，然后用筷子捅下去。”

对于这种莫斯科式的解决方法，毛惊恐似地摆摆手,“决不能使用武力，……每件事都应当是自觉自愿的。”周一直在听着，毛要求周谈谈看法。

“先让猫饿三天，”这位善于走钢丝的人回答,“然后，把辣椒裹在一片肉里，如果猫非常饿的话，它会囫囵吞枣般地全吞下去。”

毛也不赞成周的办法。“也不能使用欺骗手段——永远不要愚弄人民。”那么，毛自己的策略是什么呢?“这很容易（至少这口气与刘相同),把辣椒擦在猫的屁股上,当它感到火辣辣的时候,就会自己去舔掉辣椒，并为能这样做感到兴奋不已。”⑤

不管这故事出自何处，毛不喜欢强迫是确实的。他还认为，政治欺骗不能唤起人们的参与热情。但是，这并没有影响他为了自己的目标而成为一个权力主义者。

毛并不仅仅陶醉在抽象的社会一体化之中。当时，在毛看来，富裕和社会主义是一枚硬币的两面。这也是刘一直主张的观点。毛的特殊之处在于，他更强调道德意志。

他感到，中国农村正呈现出一种新的精神面貌。这足以使农村一夜之间进入一种新的更高级的社会组织形式，而不需要机械化作为基础。当然,对于落后的中国来说,这是一种合乎逻辑的过程。在没有物质刺激的情况下,集体主义精神是行之有效的手段。

毛认为，农村形势的高涨有利于工业的起飞。在1955年即将过去之际，现代社会主义之光正在毛的视野中闪耀。

1956年是共产主义世界大动荡的一年。在这一年，从布拉格到北京,“自由”成了时髦的口号。在1955年末第一片雪花还未

落下之前，毛也是鼓励“自由”的。他的动机主要是出于发展经济——他那种类型的经济。

毛放松了对知识分子的控制，他声称，知识分子是结束中国极端落后状况的“决定性因素”。他扔给富裕中农一块骨头。1956年2月，他改变了以前的政策，明确表示，富裕中农也可以参加合作社（留在合作社之外的人被看作是受社会抛弃的）。

要依靠知识分子和富裕中农，这场为进入富裕天堂而进行的振奋人心的运动才能取得成功，要引诱他们去“舔掉屁股上的辣椒”。但荒唐的是，知识分子和富裕中农在毛所要建立的社会中将没有一席之地。毛的最终目标是使每个人都成为多面手，高度专业化的专业人员将被遗弃。在农村中将出现新秩序：一切财产归属集体，个人所有权无甚意义。

尽管如此，在1956年春天，中国人的狂热并没有丝毫减少。

《论十大关系》是1956年4月毛在政治局会议上的一个重要发言。这篇长文满载着政策、方针，也是毛的哲学思想的回归。五十年代初期，毛一直把翅膀紧折，现在他要展开翅膀了。

从文章的题目可以看出，毛不相信有什么稳定的直线的发展。他很少谈“过程”这个词，只是谈“关系”。他认为万物皆在变动。“世界是由矛盾组成的。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任何现象都孕含着矛盾，这是他立论的核心。“一万年都有两点。将来有将来的两点，现在有现在的两点，各人有各人的两点。”⑥

没有绝对不变的事物，因此只有很好地去利用它的不稳定性。人们不能停滞不前。真正的平衡不存在于纯粹的计划之中，而是来自矛盾斗争的消长起伏。

毛喜欢说“两条腿走路”。这是一个形象的概括。离开了任何一条腿都不能走路，全部道理就在于二者运动的关系。由毛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中可以窥视到古代中国的阴阳、明暗、雄雌等思想的影响，它们反映了一切事物固有的二重性，包括毛自身具有的

虎气与猴气的二重性。

经济依旧是毛关心的主题。但是他要的是一个更具中国特色的经济发展模式。

他要求："还要适当地调整重工业和农业、轻工业的投资比例，更多地发展农业、轻工业。"中国不可能一夜之间变成另一个苏联，况且中国人民应当得到更多更好的消费品。"他们是竭泽而渔"，毛曾对他所信任的阴险狡诈的康生这样谈论苏联。⑦毛所说的"渔"是指工业生产，"泽"指人民生活。

毛说，要精简党政机构的三分之二，虽然难以实行，但这是一个突破性的建议，它表明了毛的思路：他想要松动一下僵化的官僚体制。

在与此主题相关的另一讲话中，毛谈到中央的统一性和地方的独立性之间的关系，这是他长期关心的一个问题。毛发挥了猴子的精明："统一性和独立性是对立的统一，要有统一性，也要有独立性。比如我们现在开会是统一性，散会以后有人散步，有人读书，有人吃饭，就是独立性。如果我们不给每个人散会后的独立性，一直把会无休止地开下去，不是所有的人都要死光了吗？"⑧他还把这种道家的格言用于分析工业。

毛现在感到，国防预算应当削减。

"你对原子弹是真正想要、十分想要，还是只有几分想，没有十分想呢？"他问政治局的同事们，"你是真正想要、十分想要，你就降低军政费用的比重，多搞经济建设。"

国防部长彭德怀在这次会议上说："如果将来爆发战争，由我们出军队，苏联出原子弹。"⑨从彭和毛的关系来看，彭的这一思想潜伏着对他自己不利的因素。

毛是从三个角度来考虑国防预算的。他已开始意识到，中国和苏联将来不会携手并进。

在1956年，他坚信，经济的增长进入六十年代会加速。同

时，这也是中国一切事情的关键。

他阐述了他的国防哲学：人民战争加原子弹。他不主张大力发展装备着常规武器的正规军。

中国百花盛开之时，东欧正值硝烟弥漫。就在毛第一次谈论他的新温和路线之后的几个星期，赫鲁晓夫关于斯大林的秘密报告传到了北京，毛不喜欢赫鲁晓夫的报告。*⑩

虽然两年后，毛在成都的一次谈话中说："我们一则以喜，一则以忧。"⑪ 但实际上赫鲁晓夫的报告深深地震撼了他。报告产生的刺激就象鼓点，在1956年毛的所有活动中不断回响。

以前，毛在公开场合滔滔不绝地颂扬斯大林，但在私下里却咒骂他。现在他则在《人民日报》的一篇六千字的文章中小心谨慎地试图使自己表里一致。他认为，斯大林的错误来源于他个人，而不是社会主义制度。

在这之后的六个月里，毛四次接见了来自苏联的官方代表团，这对于其他任何国家来说都是没有先例的。10月份，他甚至打电话邀见苏联大使，因为他对波兰和匈牙利发生的政治动乱表现出极大的不安。

毛曾在四月份告诉米高扬，他认为，"斯大林的功大于过"。他对每一个来自莫斯科的访问者都表达这一中心观点，其精神实质与《人民日报》上的文章的观点一致。他认为，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来说，任何其他的观点都会象打开的潘朵拉盒子。**

这难道不会给中国的斯大林投下一层阴影吗？毛没有公开提

---

* 朱德和邓小平率中国代表团参加了苏共二十大，他们亲耳听到了赫鲁晓夫对斯大林所做的振聋发聩的攻击。朱德同意对斯大林的这种公开指责，邓则心存疑虑，以等候毛的指示才作出反应。于是他们把赫鲁晓夫的报告内容发回北京。结果，政治上笨拙的朱德又一次说话失慎，而精明的邓则再次表现了自己的正确选择。

** 据希腊神话，宙斯命潘朵拉带着一个盒子下凡，潘朵拉私自打开盒子，于是里面的疾病、罪恶、疯狂等各种祸害全跑出来散布到世上。——校注

过这个问题，但这确实是他对于非斯大林化的主要忧虑所在。当然，还有一些理由已足以使他反对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例如，关于反斯大林一事，莫斯科应当事先与他交换一下意见。如果斯大林真是这样的恶魔，那么，在他身边的那些人这么长时间里都在做什么呢？毛认为，赫鲁晓夫自己即便不是“帮凶”，也是“傻瓜”。[12]

但无论何种指责，都同他在中国的最高权力相比无足轻重。毛不仅是中国的斯大林，他还是中国的马克思和列宁，不过目前他扮演的角色是中国的斯大林。

毛在一系列的讲话中号召知识分子自由鸣放。“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一口号可不是来自马克思，而是来自古代中国的传统。

刘少奇公开指出这一口号不是毛本人想出来的。这位党的第二号人物在北京大学历史系的一次讲话中说：“百家争鸣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出现了。……后来毛主席改进了它，并把它作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还有许多事并不是毛主席先想到的，他仅仅加工改造了它们。”[13] 这是一个大胆的评论。（许多事情！那么在刘看来，还有什么事情呢？）

毛主动掀去了对中国思想自由的压制，这在马克思主义政党中是没有先例的。欧洲的非斯大林化也在做同样的事情，但是毛的行动早于他们。

为了发展经济和其他事业，毛需要的是来自中国男女老幼的革命激情，而不是唯唯诺诺。他认为中国已经取得了某些成就，未来的美景正在召唤着他。

毛作为虎需要更多的经济成果，作为猴则想知道他受到敬爱的程度。

毛说，可以允许“美国之音”和蒋介石讲话的存在。[14] 刘插话说，新闻报纸应当从政府机构中分离出来以使其更加独立。他

建议，要给记者以较大的自由度，保证他们有高工资，“甚至可以比毛主席的工资还要高。”[15]这样，他们才会“讲真话”。

许多自由派老知识分子毫无顾忌地谈出了内心想法。他们只是从表面上理解毛的意图。“中国属于六亿人民”，一位学者在《人民日报》上撰文说，“它不只是属于共产党。”[16]这种反对一党专制的叫喊，便是在毛四周突然开放的百花园中普通的一朵。

第二朵花也几乎同样普通常见，这就是反对共产党对中国各个领域的生活实行严密控制，作家们要求有更多的思想自由。

毛后来问赫鲁晓夫（不知是出于好奇还是只想激怒这位苏联人）对“百花齐放”这个口号怎么看，赫鲁晓夫否定了它。他说：“任何一个农民都知道，有些花应栽培，而其余的应砍掉。”[17]赫鲁晓夫声称，“毛也认为这一口号可能不适合于苏联。”

这确实是一种毛主义的口号，它反映了毛性格中的两重性。在他内心深处，他是蔑视每一个知识分子的，这部分是由于他赞成列宁的观点（赫鲁晓夫也赞成列宁的观点），部分是由于毛在早年深受“学阀”之苦。但与列宁主义者不同，他认为知识分子是可以改造的。

“在团结他们的同时，要教育他们，”[18]这是毛建立统一战线的方针。对于斯大林来说，统一战线就是争夺权力，要纯而又纯。按照毛的观点，处理好统一战线内各派别之间的关系，就可以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共同抗击眼前的敌人。

斯大林把他在战争时期与美国和英国的结盟看作是建立统一战线，他的目的只是要打败希特勒及其帮凶，并不试图去改变美国和英国的社会制度。毛与蒋介石建立的统一战线有双重目的：一个是打败日本，另一个是在与蒋共处的同时削弱他的势力。

与斯大林相比，毛具有更柔和、更有耐心、而且始终不妥协的政治手腕。即使是在掌权时，他的这种导师气质从未消失过。

1956年岁末，毛说出了他早就想说的话：在二十年代末和三

十年代初，中国共产党党内打击他的那些人都是斯大林的弟子。[19]毛没有早一点说出来，表明他对这位苏联独裁者还是非常敬畏的。

尽管为时过晚，但将其摆明不愧为巧棋一着。他鞭打斯大林这具僵尸，就为自己作为正确的中共领袖罩上了一圈美丽光环。

百花丛中出现了毒草。在武汉爆发了一场大规模的学生运动。[20]在1956年炎热的夏季，大规模的示威使这场运动达到高潮，叫得最响的口号是“欢迎国民党！”“欢迎蒋介石！”

香花也许确实已变成了毒草。在英国和美国受过教育的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对毛的百花齐放政策有所贬低。[21]文章说，毛的号召有点象“早春的天气”，“乍暖还寒，开放的鲜花易遭霜打而凋落。”

与那些敢于直言要求议会选举和新闻自由的持不同政见者相比，这些在基层广泛蔓延的怀疑主义态度更使毛感到失望。

毛下令禁止百花齐放，原因之一是迫于刘及其他同事的压力。在1957年初的一次讲话中，毛第一次提出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即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这一区分是模糊不清的。* 这种模糊性，象是令人胆战心惊的阴云，在毛以后的二十多年中一直笼罩在中国的上空。

费的怀疑是明智的。到1957年末，许多学者在几个月前还满怀希望，妄自尊大，直言不讳。现在，他们却在清扫办公室（坐在办公室里的都是一些没有大胆直言的人）隔壁的厕所。丁玲（他与毛的关系时冷时热）当时在擦洗作家协会大楼里的地板。

---

* 一个阿飞在上海的一所公园里论证了这种区分是何等模糊。当他企图强奸一名妇女而被抓获时，他竟不以为然，并愤怒地向警察质问：“你来干涉是什么意思？这是人民内部矛盾，与你无关。”警察只好疑惑地离开了他。

毛说："我国现在的社会制度比较旧时代的社会制度要优越得多。如果不优越，旧制度就不会被推翻，新制度就不可能建立。"[22]口气已变，调子明显降低，似乎含着哀怨。当然，又带有防御性质，但是并不完全符合逻辑。究竟出了什么问题？

毛在1956年太乐观了，过高地估计中国已变成一个有机的大家庭。当时毛认为，"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基本结束"，[23]但后来他又改变了他的思想。在他以后的年月里，这样的阶级斗争每隔一段时期就要开展一次，不管"阶级"是否真的存在。

毛发动"双百"运动，允许自由表达不同意见。他认为，各种批评和抨击可以防止政权的僵化，可以保证新的一代有活跃的思想。越开放越好。

但是且慢，花苞必须按照园丁的旨意长大和开放。允许自由鸣放并不是为了去追求真理，而是治病救人的药方。

在政治局中，不是每个人都能理解毛提出双百方针的要旨(他们也不象毛在1955年底有那么一种活跃的心情)。刘和其他一些人对于让共产党接受放肆的、公开的批评很不高兴，只有毛一个人认为邀请党外人士来批评共产党是有好处的。

甚至1957年初毛不得不让步时，某些人来说这种让步是不彻底的。2月份，毛有一次发表讲话时，一些高级领导人起身离开会场以示抗议。[24]结果，就这篇讲话是否应公开发表引起了激烈争论。刘从《人民日报》发表的会议照片中消失了，另外还有包括朱德在内的五名政治局委员的照片也是如此。

毛未来信仰的一个重要支柱就这样消失在1957年的冬雪之中。他促成社会制度的改造并获得成功。土地集体化了，新的精神面貌正在农村兴起。这些变化看来是不可逆转的了。

但是，毛在构建政治制度方面却没有这么成功。

他冒着风险征集反对意见，然而又把它们抛在一边。结果便

导致了一个谨小慎微，甚至沉闷的知识界。在毛执政期间，“双百”运动，只是毛在追求一种不可能实现的政治体制之曲折道路上所发生的第一个波折。毛想以民主方式解决冲突，同时又要确保不离开共产党的领导；他想激发起人民自由争论的生动局面，同时又不能离开早已确定的目标。

在1956年的紧张时期，毛做了一件特别的事情。他离开北京来到武汉，尽管首都五、六月份的气候要比武汉更宜人。他不顾同事们的阻拦，下水游泳。

邓小平说：“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有点主观主义，毛主席也不例外。他要去游泳，尽管大家都不同意，他还是去了。”[25]这可不是到游泳池里沾一下水，这是一个62岁的老人畅游长江。

第一次，毛在激流中搏击了二十公里。从武汉三镇的武昌出发，游到汉口登岸，花了两小时时间。[26]身上还滴着泥水，他就坐了下来品尝起有名的武昌鱼，然后，他挥毫写道：

才饮长沙水[27]，
又食武昌鱼。

这首词的其他几句，反映了1956年中期毛内心中混含着的挫折、失望和大胆冒险的复杂感情：

不管风吹浪打，
胜似闲庭信步，
今日得宽余。

毛禁不住将自己与孔子比较，似乎不仅要显示自己身体的强健，而且要显示他政治的强盛：

子在川上曰：

逝者如斯夫！

毛大为孔子所感染，他的游泳确乎有点想使自己跻身那表露个人精神价值的传统统治者的队列中。毛为旧的模式注入了新的手法。古代帝王是通过优美的书法，或远离色欲的高雅来显示其精神价值，但他们从未使用过游泳方式。

从《游泳》一词的下阕可以看出，毛的心绪所系仍是经济的发展。他提到了在扼守武汉的长江两岸的两山之间建造一座大桥：

风樯动，

龟蛇静，

起宏图。

一桥飞架南北，

天堑变通途。

……

神女应无恙，

当惊世界殊。

从这些词句中可以感受到，毛此时既被中国有可能被改造的激情所迷住，但又夹杂着把中国这个难以对付的老怪物改变成新样子并非易事的气馁感觉。

在武汉，毛的第二次游泳畅游了十二公里（和第一次一样是顺流而下）。第三次游泳时，毛挥臂击水，从未竣工的桥墩间穿过。这位执政者，对他的人民的劳动成果发出慨叹。

毛一直在南边巡游（直到波兰爆发了波兹南事件以及中国的后院西藏出现叛乱迹象）。他重访了故地长沙，又畅游了湘江。

摆脱了在北京时日常事务的缠绕，毛在慎独深思。他也是在用他最喜欢的方式——融于大自然之中——来放松一下。

当1956年9月中共八大召开时，毛心境不好。这是自1945年以来的第一次党代会。十一年来中国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毛在贯彻自己的路线方面并不是一帆风顺。

有56个外国共产党代表团出席了大会。毛主持了开幕式。事实上，中国在国际上的威望已经大大提高。党代会的报告谈到中国的国际成就时；不时赢得阵阵掌声，而在谈到国内建设成就时掌声较少。

在毛看来，这次党代会表现出过份的自满。的确，他取得了几个明显的胜利：国防开支被削减；毛当时喜欢的邓小平被提拔到新的重要岗位上，担任党的总书记。这就使毛能与第二号人物刘少奇的可怕势力相抗衡。

但是，这次党代会没有认可毛的"大跃进"计划，而提出了稳定发展经济的计划。更有甚者，它开始限制对毛的个人崇拜。1945年写进中国共产党党章中的"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这句话，在1956年党代会通过的新党章中删去了。当然，这次大会肯定受到七个月前赫鲁晓夫废黜斯大林的影响。这在毛同赫鲁晓夫对抗的史册上又增添了一个斑点。

在平静的外表下，中国共产党党内的第一次大分裂已在悄悄地开始。尽管党章中对历史发展必然性的信仰丝毫未变，党内争吵也没有激化。而且，毛对批评采取了容忍态度（李立三和王明得以重新选入中央委员会），但裂罅还是存在的，其中有两条裂罅在以后的十年内已似鸿沟。

彭德怀元帅很不高兴，尽管还担任国防部长，但他在党内被降职。"我老了，对主席没用了，不重要了。"彭抱怨说。[28] 毛显然不会忘记，他的儿子是在彭的指挥下死在了朝鲜。不管怎么说，很

明显，毛正在扶植林彪以与彭德怀抗衡。林彪这个特殊的宠臣在三年后位重一时。

刘第一次大胆地冲撞毛，他已有这个资本。随着踏平这些"障碍"想法的萌生，毛不再是在跋山涉水途中满脑子只想着革命事业的纯而又纯的英雄，而是变成了有着复杂经历的政治家。

在1945年党的七大上，刘的报告中105次提到了毛的名字，但在八大上仅有4次。"集体领导"的话总是挂在刘的嘴边。刘说，在中国，基本的政治斗争已经结束，今后的任务是进行经济建设，其目的是要转移毛对政治运动的热情。他大声呼吁，说出了许多经济计划者想要说出的话："在革命战争中行之有效的经验不能够运用于新中国的经济建设。"㉙

刘在解释为什么把"毛泽东思想"从党章中删去时显得无动于衷。他说："七大已经确立了毛主席在全党的领导地位，即使现在不再提毛泽东思想，我们每个人仍然知道它。"刘进一步说："另外，如果总是重复已经习惯了的东西，也没有什么意义。"*㉚

毛很清楚，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攻击已经对他在党内的最高权威的地位产生了影响。当时亲近毛的邓在一次对共青团讲话中说："毛主席从来没有说过他不会犯错误。"㉜这听起来象是为毛辩护。交通部长（不是中共党员）说："社会主义民主应当比资本主义民主更优越。资本主义国家的总统还有三年或四年的任期问题，……谁知道毛主席要当多少年的主席呢？"㉝

---

* 中央委员会的开会过程是怎样进行的，当时鲜为世人所知，我们只是从后来关于刘向大会所做的报告中的两个观点（刘说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又说现在的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所以要努力发展经济）。体会得出刘辩解说："所有的事情都做得匆匆忙忙，""没有时间去加以修改。"毛事先肯定没有读过刘的报告，显然刘自已也没有仔细检查过。然而，一旦大会通过，这个报告就将字字如镂，不可更改。如果在组织严密的党的八大上，一个重要的报告都发生这样的事情的话，那么在文化大革命中虚构一些弥天大谎的拙劣做法，必定存在无疑的了。㉛

毛在1957年初确实考虑过引退问题。他把自己比作一名戏剧主角，他也怀疑自己是否正在衰老而不能把戏唱好，但他没有下台。他没有向党和政府提出辞职请求，仍然是党和政府的首脑。

关于苏联，毛在公开场合出言谨慎，但在私下里他是指责莫斯科的。他决定同时接见米高扬和波兰领导人奥哈布，这是带有恶作剧性的行为。在交谈中，他明显偏向波兰，甚至赞扬苏联人不喜欢的哥穆尔卡。

毛对波兰的这位第一书记奥哈布说："好象不谋而合，中国和波兰一直是很好的伙伴，我们对此很满意。"米高扬怒气冲冲。奥哈布深受鼓舞，当即大胆地批评了莫斯科。毛就在他的办公室里挑起了两个外国领导人的争端。

米高扬不同意奥哈布对"波兹南事件"所作的冷静分析。奥哈布反驳说："波兰人比苏联人更清楚波兰正在发生的事情。"米高扬大发雷霆："发表如此反苏言论的人，只能被当作敌人来对待，这也适用于那些喜欢听此宣传的人。"

奥哈布很难堪，与毛握了握手，离开了毛的房间。

但是，毛也站了起来，与奥哈布一起走了出去。米高扬被冷落在一边，气急败坏。他没有继续参加中共八大，当天就飞回莫斯科。[34]

在1956年结束之前，毛提出，既要反对"教条主义"，又要反对"修正主义"。不久，这一口号就频繁地出现在中国的报纸上。这说明形势神秘而严重。斯大林被看作是犯了教条主义的错误，而毛又指出另一个相反的错误也存在于党内。

这是一片不合时宜的雪花，然而这片雪花将会变成一场暴风雪。*

---

* 毛神秘地对奥哈布说："中国也有哥穆尔卡，但决不会把他开除出党，仍把他留在党的中央委员会里。尽管总是不同意他的观点，但是经常征求他的看法。"毛的话半开玩笑，半带伤感，是不是他在党内遇到了什么阻力？[35]

1957年初，毛象是一位波斯地毯编织工用各种彩线编织着，在毯子织好之前他还不知将会成什么图案。毛手里现在握着六根线，要组织好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百花园中的毒草已多于香花；对斯大林的评价应保持平衡；波兰事件不应受到谴责；但匈牙利的教训不能忘记；他必须悄悄地消除中国的个人崇拜；中国经济要以尽快的速度向前发展。

几个月来，毛一直试图对这些问题进行公开辩论，但是党内反对这样做的压力相当大。匈牙利事件使毛心存疑虑：应该在何种程度上容许党外人士对共产党的批评呢？

"匈牙利事件发生以后，我国有些人感到高兴。"他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中说："他们希望在中国也出现一个那样的事件。"[36] 这是一个哀伤的声明。但是，毛最初是坚决支持匈牙利事件的。这有如一个不诚实的女子与人调情后，又哭喊着说遭受了强暴。

当毛转向反对匈牙利事件时，他又把匈牙利发生的事情生搬硬套到中国来。匈牙利可能是在进行"资本主义复辟"，而在中国不会有这样的情况。但由于被匈牙利事件所困扰，在以后的岁月里，毛一直说中国有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

"如果你说得是正确的，就不用怕什么批评。"毛在三月份的一次宣传工作会议上热情地说。[38] 这里特别强调了一个"如果"。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是相当灵活的，一个人怎么能够天天保证他的观点是属于非对抗性的矛盾范围呢？

毛能够在纳吉的布达佩斯和斯大林的莫斯科之间发现一条中间道路吗？

毛开始退缩。在国内，他指示追查"右派"。武汉的大学生运

---

* 布达佩斯动乱发生以后，不久，埃德加·福尔曾向毛提到过匈牙利事件，他发现这个问题"似乎是触到了主席的痛处。"[37]

动被称为“小匈牙利事件”。在外交上，他很快就赞扬莫斯科扶植的布达佩斯新的领导人卡达尔。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他在北京两次款待卡达尔。在与这位匈牙利领导人谈话时，他说，1956年危机时期，他曾写信给赫鲁晓夫，敦促他迅速出兵镇压布达佩斯的“修正主义分子”。[39]

毛对波兰的同情也随之烟消云散。四月份，他曾宣布将在夏季访问华沙（除了苏联之外，这将成为毛一生中唯一的一次出国访问），但后来又突然取消了这次访问。[40]到1957年末，他开始大谈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并愿意由莫斯科来领导。

在北京，由于毛的让步，1957年倒是团结的一年。经济发展在1956年没有出现毛所期望的“跃进”，他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实行的言论自由实验也由此告罄。毛的许多同事在看到这两个倒退之后，不无宽慰地说：“我早就料到会是这样。”毛退回来与他们站在一起。

实际上毛并没有完全放弃他的思想。自斯大林的神话破产之后，他的内心深处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他对莫斯科的敬重远没有达到以前的程度。他在思考着，试图走一条更具中国特色的道路。

三年来，毛的医生一直不允许他吃鸡蛋或鸡汤，因为苏联专家说这些东西对老人的健康不利。[41]某一天苏联专家改变了这种说法，毛的那些亦步亦趋的医生们也改变了主意，毛又能吃鸡蛋和鸡汤了。通过这件事，毛发誓说，绝不能再盲目崇拜苏联模式了。

毛抱怨说，中国的艺术家们总是把他画得比斯大林矮一些。[41]

毛虽然忘不了这些令人不快的小节，但他所执行的一系列政策表明，他对苏联模式的信仰依然存在，只是有所收敛而已。他对莫斯科相当敬重，但他不愿公开承认这一点。

如果刘认为1957年的平稳为解决分歧提供了机会的话，那是大错特错了。刘和毛都热衷于发展经济，但是究竟"怎样"发展，他们之间有分歧。匈牙利事件对他俩都产生了巨大震动。刘认为，较好的生活水平是防止中国出现类似危险的最重要保证，毛则认为要优先重视道德领域的改造。

毛后来称1957年是糟糕的一年。这年中期，毛写了一首优美而令人惊讶的词《游仙》。*这首词是怀念他的第一个妻子杨开慧的。随着缭绕于他身边的云朵，毛沉浸在对美好往事的回忆之中，表达了一种虽死犹荣的心境。

毛的这首词是答赠他的一位友人（同毛一样，她的爱人也是在三十年代死于蒋介石的屠刀之下）的。当时他们四人同在湖南从事共产党活动。毛巧妙地使用双关语来称杨（"杨"这个姓又可指白杨树）和柳（"柳"又可指柳树）：

> 我失骄杨君失柳，[42]
> 杨柳轻飏直上重霄九。

毛接着用了一个古代的神话传说：吴刚由于"学仙有过"，受到惩罚，到月宫去伐桂树。但是她每砍一刀，刀口又会自动长合，桂树依旧恢复了原样。这样，她不得不永远砍下去。

> 问讯吴刚何所有，
> 吴刚捧出桂花酒。
> 寂寞嫦娥舒广袖，
> 万里长空且为忠魂舞。

---

* 此词公开发表时题目改为《蝶恋花·答李淑一》。——校注

毛以天国的祝福来赞美人间为正义而战的壮举。词中的“虎”是指蒋，泪水则形容心情的喜悦：

忽报人间曾伏虎，
泪飞顿作倾盆雨。

这首词带有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交织着天国神话、人间欢乐、革命壮举和悲痛的回忆。

《游仙》这首词并不是毛怀念杨开慧的唯一迹象。在写了这首词之后几个星期，毛在书房里接待了二十年代曾给杨开慧和他当过保姆的陈玉英[43]。在与陈的两个小时的谈话中，毛回忆往事，情不自禁地说：“见到你就象见到开慧。”从有关这次谈话的资料可以看到，当时泪水在毛的眼眶里打转。毛说：“为什么不每年来北京看看？”他提出了一个堂而皇之的理由来掩饰他真正的心衷：“来看看这里的发展变化也好嘛。”

江青已于这年的早些时候从苏联医院回到北京，但她的身体仍不佳[44]。毛带着她去各地巡游，但事情总不尽人意：南京天气过热，而青岛又太湿，使她患了感冒。毛只好打发她回北京，自己则呆在青岛这个北部港口筹划着发动一场“反右”运动。

在其八十二年的生涯中，毛只参加过一次国际会议，这就是1957年深秋在莫斯科召开的世界共产党高级首脑会议。毛率领中共代表团飞往莫斯科，同时也参加十月革命40周年的庆祝活动。在那里，他第二次见到了赫鲁晓夫。

在莫斯科机场，毛热情称颂苏联。但在访问过程中，他又几次巧妙地使用了“人民”这个词，来避开说是莫斯科帮助了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得到了苏联人民的巨大同情和慷慨援助。”[45]

毛觉得他有资格摆点架子。可以肯定，他已准备好要谈一些赫鲁晓夫不赞成的观点，但是又同赫鲁晓夫一样感到要以团结为

重。毛在这次会议上的地位举足轻重，正如同一些东欧人士后来抱怨的那样，毛和赫鲁晓夫在他们之间拔河。[46]

毛拜谒列宁墓时对在莫斯科大学读书的中国留学生发表演讲："我们社会主义阵营应当有个领头人，这个领头人就是苏联。"[47]尽管毛是站在国际讲台上（这是他一生中仅有的几次中的一次），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已摆脱了他身上的全部乡土气息。当他开始对留学生演讲时，他问有多少学生听不懂他的湖南口音，大多数人举起了手。结果，面对这些中国听众，他得通过一个翻译把他的演讲从湖南话译为普通话。

在这次首脑会议期间，毛几次屈从于苏联人。哥穆尔卡在与毛会谈之后不满地说，他对毛坚持要共产主义阵营内"保持团结"的做法甚为"失望"；[48]南斯拉夫不喜欢毛那样效忠于苏联在共产主义阵营中的领导地位[49]；毛也没有在公开场合谈论他在国内执行的"双百"方针，和赫鲁晓夫一样，他被匈牙利事件吓着了。

在毛的思想中，战争与和平有双重的意义。就在他飞往莫斯科前的两个星期，苏中签订了一项备忘录，苏联援助中国研制原子弹。

如果没有这样的背景，毛也许不会去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的庆祝活动。他与赫鲁晓夫会谈的重点就是防务问题。在第一次会谈之后的两天，中国的一个高级军事代表团就应苏联国防部的邀请飞离北京。毛仍然需要苏联的帮助。

但是毛并不赞同赫鲁晓夫关于战争与和平的观点。他非常轻蔑地谈到核武器，与1954年他对尼赫鲁所说的观点一样，这使苏联和东欧都大为震惊*。"东风压倒西风。"毛的这句话不久就风

---

* 毛所使用的词语也使比毛明显粗俗的赫鲁晓夫甚为惊讶。在争论人类是否能在核战争中生存问题时，毛说："若干年后，人们就会生出比以前更多的娃娃。"

赫鲁晓夫正好坐在孙中山遗孀的旁边，当毛说这些话时，她大笑。赫鲁晓夫则一本正经地说："他应当注意他的用语。"毛经常表现出这种粗俗随便。赫鲁晓夫也有他自己粗俗随便的方面，例如，他把江青称作毛的"绣花枕头"。[50]

行起来。毛的意思是说，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必将战胜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

在场的人认为，准是几天前苏联发射的人造地球卫星给毛留下了深刻印象。毛一到达莫斯科机场就发表讲话说："苏联发射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是一项伟大的成就，它标志着人类进一步征服大自然的新纪元的开始。"中国"五四运动"对科学的追求仍在毛的心中闪耀。在毛看来，社会主义阵营只要有了人造地球卫星，就能够蔑视帝国主义的一切挑衅。

毛暗地里不断劝说赫鲁晓夫，敦促他不要与西方进行裁军谈判。如果说毛与赫鲁晓夫在对待西方的政策上有分歧的话，那么在国防战略上他们更有着根深蒂固的异议。

"如果苏联遭到西方的袭击，你们不应当抗击，而应该后撤。"[51]毛的这一观点使赫鲁晓夫大为惊讶。

"你所说的'后撤'是什么意思？"

"就是有目的的撤退，准备打一年、两年甚至三年的持久战。"

毛是意指苏联在二次大战时就撤到斯大林格勒。赫鲁晓夫目瞪口呆，他只得向毛解释说，那次由于希特勒的入侵所导致的撤退是被迫的，况且，如果再发生战争就与二次大战不一样了，因为有了核武器。

"如果你们后撤到乌拉尔，"毛平静地说，"到那时我们中国就可以参战。"这使我们想起两艘战舰黑夜里在辽阔的水域中交臂而过的情景。

毛根据中国的弱处提出，要打败入侵者，必须重视战略防御，但苏联人并不这么想。

毛不害怕核武器（当然，他对核武器知道的要比赫鲁晓夫少）。他认为，只有当你害怕它时，它才可怕，如果你不怕它，它也就吓不倒你。

总之，毛是在尽量赢得时间，建立一个至少能与美苏抗衡的强国是他的目标。在实现这一目标之前——尽管还要走很长的路——阻止美苏联盟反对中国，对于毛来说，是头等重要的事情。

毛对赫鲁晓夫谈到他的中国许多同事。据赫鲁晓夫说，这些同事中的大多数人后来都没有好的结局。高岗就是典型的一例[52]，“你甚至不能在毛的面前提到高的名字”。这充分反映出毛在北京一直经历着复杂的政治斗争。令人感兴趣的是，他现在是把这些经历当作过去的往事向赫鲁晓夫提出。

大概只有一位同事是毛真正欣赏的。“你看到那位小个子了吗？”毛指着中国代表团的一位成员对赫鲁晓夫说，“他聪明能干，很有前途。”[53] 他指的是邓。事实上，这位顽强的四川人后来三起三落，两次是因为毛改变了对他的看法而罢黜了他，这是后话。

赫鲁晓夫在玩笑声中告诉毛，布尔加宁现在工作不得力。毛问谁可以代替他，赫鲁晓夫说，将由柯西金取代他。“柯西金是谁？”毛问。他从未听说过柯西金，就象赫鲁晓夫对邓一无所知一样。赫鲁晓夫把柯西金介绍给毛，于是两人走到一边攀谈起来[54]。柯西金后来确实取代了布尔加宁。八年后，毛在北京会见了他，这是毛最后一次会见苏联领导人。

在莫斯科，毛成了社会主义阵营中坚持与西方势不两立的好战立场的代表。同时，他内心中也升腾起另一种忧虑：即他发现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在动摇和衰减。“我看有两把‘刀子’”，毛在回到北京后说，“一把是列宁，一把是斯大林。”这表明毛仍然把苏联看作是马克思主义的摇篮。

“现在，斯大林这把刀子，俄国人丢了”，他继续说，“列宁这把刀子现在是不是也被苏联一些领导人丢掉一些呢？我看也丢掉相当多了。”[55]

毛的这些话说明他在信仰上正经历着激烈的内心斗争。“十月革命还灵不灵？”对此问题，毛悬而未答。在毛以后的十九年余生中，对此问题的态度虽然几经变化，但他一直未做出彻底的回答。

早在毛去莫斯科之前，他就已经形成了对苏联人的以上看法。但是，当毛装着去克里姆林宫啜伏特加时，还巧妙地把急躁的赫鲁晓夫蒙在鼓里，并取得他的信任。

体制的修补（1958—1959）

一位在五十年代早期就认识毛的缅甸人后来回忆说："到1957年，他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他长时间地静静地坐着，显出老相，行动也变得迟缓了。"他们二人坐在天安门城楼上交谈时，"毛的眼睛望着远方，他在回忆朝鲜战争……"①

度过了艰难的1957年，毛自莫斯科回来后，就把希望寄托在1958年的大跃进上。

他把五亿农民卷入二万四千个人民公社的集体生活之中。他不仅想使经济发展的速度加倍，而且试图改造人们的灵魂。他要让中国人民相信，革命并不是象其本身所表现出来的，是来自上面的一种压力形式，而是人们发自内心选择的一朵鲜花。

他在一月份北京的一次干部会议上说："我在北京住久了，就觉得脑子空了，一出北京，又有了东西。"②

带着挑战又很镇静的心情，毛南下到了南

宁。他在邕江里游泳（邕江流经南宁），在南湖公园的兰花丛中漫步。他感到自己接触了真正的中国。

在南宁的一次会议上，当谈到政府的官僚作风时，他说："这个问题我讲过一万次了，但是一点用处也没有。不管怎么说，我还有点资历吧，有些事应该给我打个招呼吧。"③他有些怒气冲冲。

他对他的经济专家们说："你们的文件，我两年不看了，今年还不准备看。"④他对官僚机构的效率低下很不满，他希望下边有更多的能动性。

毛挑衅性地对一位高级知识分子说，推倒城墙是件好事，这位知识分子看到北京的城墙被破坏，痛心地流下了眼泪。拆牌楼是件好事，毛固执地高声说。很明显，他不只是要推倒几座旧城墙，他是在与他认为不合时宜的世界观作斗争。

毛用水来形象地比喻大跃进。他在一次谈到要清除党内的宗派等级思想时说："我们每天都要洗脸。"他说，对那些变得傲慢自大的官员，"要浇一浇冷水"。他还说到了"细菌"和"洗掉"积满的灰尘。*⑤

他自己也下了水。他七次在武汉的长江水中游泳，而且每次都是在众目睽睽之下游上很长一段距离。激流是一种挑战，而水可使人的皮肤光洁。1957年，毛感到烦躁不安，象一个好长时间没有洗澡的人。到1958年，解脱的机会来了，毛跃入水中尽情洗浴。

五十年代后期的毛，一天到晚不停地琢磨谁和他站在一起，谁想反对他。他发现在他的花园中毒草的数目远远地超过了强行种植的鲜花，便不能容忍。他在一次会议上说："现在，全国究竟有多少人赞成社会主义，我和许多同志摸了这个底。"⑥

---

* "细菌不讲迷信，它干劲十足，目中无人。"他在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讲道，"它这种天不怕、地不怕的精神，不比某些人强吗？"

对毛来说，1958年的行为可追溯到1956年。“百花齐放”的结果令人失望，知识分子要让毛下台。现在，他只相信那些没有受过教育的人的力量。

毛在北京的一次政府规划会议上说：“青年人不压迫老年人，老年人不会进步的。”⑦知识分子大多都是年老的，是1949年以前的社会遗留下来的。正处在上升时期的年轻人更单纯，对新的社会秩序更充满热情。

这位来自韶山的人总结说：“譬如积薪，后来居上。”

在一定程度上说，毛自1958年以来所做的一切，都可以在他早年没有实现的理想中找到根源。同时毛也不满于苏联的道路，不满于中国迄今为止的对苏联的效仿。毛还开始了与幻影的斗争，因为新中国已经出现的东西和他希望出现的东西之间产生了鸿沟。

毛之所以要对体制进行修补，还有另外一个根本原因——他越来越感到自己终有一天要死去。

这位农家子在谈到大跃进时说：“就象养猪一样，骨架在头四个月就定形了。”⑧大跃进的目的就是“建造这种骨架”。

大跃进实际上是一种发展的思想，但它是不明确的、没有经过一致同意的、也不详细的发展计划。

非常矛盾的是，毛泽东，这位“五四”精神的产儿，在大跃进期间创造了一种近乎宗教色彩的气氛。“敢叫日月换新天”，“改天换地”，这类口号广为流传。当工人们被迫通宵呆在工厂以完成过高的定额时，他们看到墙上有这样一条标语：“一天等于二十年”。

这很天真，但也极具感染力。甚至连监狱中的犯人也被触及到了。一位在大跃进期间服刑的犯人（后来离开中国）回忆说，

他妻子给他写信说，为了支持大炼钢铁，她已把他们结婚时的铁床献给了国家。[9]

在同一所监狱，犯人们积极参加消灭苍蝇的运动。监狱给每个犯人的任务是一天要打死50只苍蝇，超额完成数可以累积起来或用来换香烟。

毛的精神也被大跃进的热潮提了起来。尽管他的一些同事很保守，尽管后来很多中国人为自己的虔诚努力被人利用而恼恨，但是，1958年的新政策使毛精神倍增。

毛想起了他最近与莫斯科进行的核武器问题谈判，他形象地比喻说："我们国家象一颗原子弹，一旦爆炸，就会释放出巨大的能量。我们能够做到以前从未做过的事情。"[10]

他在中南海的办公室里，也拍打苍蝇。在杭州，他夜间在别墅外的小路上散步时，也要追赶偶尔飞过的蚊子。他为自己没有打死过老鼠感到遗憾（老鼠也是四害之一）。* 他把自己与中国几千年前的孔圣人相比，"几千年来，包括孔夫子在内都没有除四害的志向。"[11]

毛的头脑随着统计上的估计而膨胀着。

十个月的时间建成了人民大会堂（在苏联专家认为这个设想不可能完成之后），这难道不说明共产主义精神已经在中国出现吗？一万二千名建设者每天干十二个小时的活，而不是标准的八个小时。毛在谈到这些人时说："他们需要物质刺激吗？他们需要额外的报酬吗？他们不需要，他们不需要那些东西。"这种从社会主义道德向共产主义道德过渡的速度，使毛非常激动。他宣称："这不只是'按劳分配'的问题，其中还有列宁的'共产主义星期六'的伟大思想。"[12]

一个夜晚，毛在访问了几家工厂归来后，被工人们的冲天干

---

* 原文如此，作者想象之笔。——校注

劲所鼓舞，他写了一首充满感情的诗（译按：应为毛抄写了清末诗人龚自珍的诗）赞扬劳动人民的意志，也表达了对组织工作的不满：

九州生气恃风雷，
万马齐喑究可哀。
我劝天公重抖擞，
不拘一格降人材。

1958年夏的又一个夜晚，他看到《人民日报》上的一则新闻说，江西的一个县消灭了血吸虫病——这个县距毛过去的根据地井冈山不远。

他兴奋得夜不能寐，黎明时分，他披衣下床，走近书桌，清晨微风拂煦，旭日临窗，他遥望南天，赋诗一首：

他描述过去的悲惨岁月，蜗牛*和水蛭仿佛占取了那片令人沮丧的土地。

绿水青山枉自多，
华佗无奈小虫何！
千村薜荔人遗矢，
万户萧疏鬼唱歌。

此时此刻他的视野浩瀚无垠：

坐地日行八万里，
巡天遥看一千河。

---

* 原文如此。疑为丁螺之误。——校注

牛郎欲问瘟神事，
一样悲欢逐逝波。

《送瘟神》就以水、生物和大自然的神圣展开想象，它通篇表达了这位大跃进时期的普罗米修斯的激情：

青山着意化为桥。
天连五岭银锄落，⑬
……

1958年夏，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召开第二次会议，这次与1956年的第一次会议气氛完全不同。毛摆脱了羁绊。

毛对惊得目瞪口呆的代表们说："我问我身边的同志：我们是住在天上，还是住在地上？他们摇摇头，说是住在地上。"精明的毛有不同的看法，"我说不，我们是住在天上。如果别的星球有人，他们看我们不是也是住在天上吗？所以，我说，我们是住在地上，同时又是住在天上。"⑭

毛用同样的方法还与人争论过"我们是神仙吗？""我们是洋人吗？"等等问题。*

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毛的思想变化过程，在以后的十几年的时间里，他一直用这种思想衡量中国。一切事物都不能仅从表面出发作出判断。不断的变动才是唯一真正的现实。未来不是存在于"彼岸"，而是必须从现在就抓住它。混乱是美好事物的助产

---

* 毛还说："人类有可能变成另一种东西，那时地球将不再存在，太阳也会变冷。"毛读过19世纪德国进化论的倡导者海克尔的书，毛的这种思想就反映了这种影响的存在。毛后来曾说，他的思想受"四位德国人"的影响很大，"黑格尔、马克思、恩格斯和海克尔。"⑮

士。

有一天，毛这样说："长江后浪推前浪，一切事物都在不断的变化之中。"⑯这并不是以一种历史观去否定任何其他历史观。

一则湖南谚语说："草鞋无样，边打边象。"⑰在毛以后的岁月中，他就象打草鞋一样治理中国。

毛宣称，大跃进"破除了"许多陈旧的东西。⑱ 在他心中，"迷信"就是那些认为外国比中国好，中国应该承认自己永远落后以及只从表面看问题的思想。

实际上，毛对迷信的定义是非常宽泛的。在1919年，迷信是指宗教和祖先崇拜。这里每个人都知道封建迷信是指什么。到1958年，迷信变成了各种束缚人们意志的镣铐。

他在一则批注中写道："那些近来攻击人民公社的人们就是指把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这一科学原则当作法宝祭起来打我们，你们难道不害怕这个法宝吗？"⑲

现在，是不是连马克思也变成了应加以反对的迷信？

毛的确开始轻手轻脚地把马克思置于他应有的位置上。他在党的会议上提醒大家："马克思也是两只眼睛两只手，跟我们差不多，只是他脑子里有一大堆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不是革命没有革成吗？列宁不是在这方面超过了他吗？"中国这样的革命，马克思没有做，我们做了。我们的实践超过了马克思。"⑳毛继续阐述自己的观点。

大跃进并没有破除魔法，只是用毛的魔法代替了一切与之不同的思想方法，其中也包括马克思的一部分。

如果说毛对要达到的目标还有所怀疑的话，他对怎样前进则有坚定的信心。他感到经验已经教给他很多政治行动的秘诀：

- 利用矛盾是得到和掌握权力的方法。

• 平衡只是假象，甚为糟糕，不平衡才是最有创造性的事物的状态。

• 进步靠“波浪式”推进。

• 如果只有上面的命令，而没有群众热情投身变革运动的积极性，那就不会有什么结果。

• 斗争保持纯洁，它不仅能让你得到想得到的东西，而且是政治中的神圣的东西。

• 可信赖的人不是专家，而是老粗、外行、卑贱者或所有那些愿意为公众服务的人。

他在中共第八次代表大会上说：“从现在开始十五年以后，当我们变成一个现代化的、工业化的、文化高度发展的强国时，我们可能会变得趾高气扬，尾巴会翘到天上去。”[21] 这是一种奇怪的混合的感情：过分乐观的预言，同时又意识到成功会伴随着阴影。

于很多中国人来说，大跃进的热情主要是受到即将到来的现代化前景的刺激。钢产量在十五年的时间内会增加8倍，会超过英国。小轿车遍地。

但是对毛来说，这场战斗及战斗的目的有着更根本的意义。如果毛是一位幻想家，那么他更重视实现这一乌托邦幻想的过程而不是终极目的。在这种奋斗的过程中，人们的精神和心灵发生的变化将是非常美妙的，尽管还不知道这条道路将把人们带向何方。

他用统计数字来说明这一点。可以肯定地说，很多被夸大了的统计数字之所以能够出笼，仅仅是因为欣快症允许人们强奸事实。而且，毛本人的哲学观点对大跃进时期出现的令人无法相信的虚假数字也有影响。

再说，中国的语言在说明统计数字方面也有不精确的一面。“万”在中文里常常意味着“数千”，这相当英文里的“很多很

多”。毛自己的心理活动也强化了这种倾向，“我们有百分之九十的人赞成社会主义”，这只是一种自我鼓气。

毛有时说，有些任务我们要在两年内完成，其他的任务在四五年内完成，这都不是非常精确的时间表示法。

毛现在把钟表的摆动作为一种哲学真理来加以信仰。在一次谈到辩证法问题时，他举了休息和起床的例子：“中国有句古话叫‘久眠思起’，眠后即醒，醒后又眠。”这是中国道家的说法。㉒

一天，毛召来一位学者交谈，他就是曾受过西方教育的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教授。费教授在“百花齐放”期间曾小心翼翼地放过一点儿。“你能不能稍稍地变一变，”这位君主问他的臣民。

这是一个能深深打动人的问题，这表明毛并不专横。

费解释说，他有他的道路，他处在中国两百名高级知识分子的圈子里，他们希望相互加强联系。

毛迅即反驳：“不要与那两百人为伍，去寻找另外的两百人嘛，到工人农民中走一走，你会在那里找到两百人。”费怀疑这会不会有效果。

毛脱口而出：“真正的朋友要到工人农民中去寻找。”㉓

毛鄙视各类专家，大跃进就是对各种专家思想的庆典。

有知识的专家在毛看来是特别怪的人，这位半知识分子嘲笑他们，同时又要与任何一名从他这条路上穿过的教授一争高低。

在汉口的一次讲话中，他列出历史上很多著名的人物。这些人物都做出了伟大的事业，但是又都没有受过教育，职位不高，年纪又不大。他停顿下来，问身边正在听讲的一位著名史学家：“范文澜同志，我对不对？你是历史学家，我如果不对，请你纠正。”毛马上又不停顿地说：“马克思也不是在中年或晚年以后才创

立了马克思主义，而是在青年时期。列宁创建布尔什维克的时候也只不过32岁……”㉔

在以后的几年中，毛以这种假装着请教的方法，五六次使年老的范下不了台。范文澜在这种场合又不能——或者说感到不恰当——不回答。毛喜欢显示自己比历史学家知道得还要多，同时又表现出对历史学家的轻视。

在齐放的百花夭折以后，毛在一次粗暴的讲话中说："无产阶级必须建立自己的知识分子大军，用资产阶级建立他们的知识分子大军的方法。"㉕ 年老的毛认为这是最重要的事。

这里有一个缺憾：知识分子阶层与中产阶级的兴起相联系，而中产阶级的毁灭又无法使它得以幸免。农民不需要历史学家，炼钢高炉旁的生活本身不可能变成精致的小说。学习法国文学有什么用处？

毛召唤"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但是这如同点了菜、菜上不来一样，他们一直没有到来。

为了摸索出一条中国式的道路，毛又拣起了他在延安时丢掉的东西。妥协的策略又开始出现——在国内为了获得权力而结成联盟，在国际上为了获得时间和援助与苏联打得火热——大跃进期间，他已将其置于脑后。

"公社"这一术语可以追溯到中国古代的原始共产主义思想。对任何一个中国人来说，当他第一次听到"人民公社"一词时，不需查阅马克思或列宁的著作就能理解它的意思。*

毛重申："山沟里出哲学。"㉖ 自三十年代他与28个布尔什维克斗争以来，还没有这样说过。

在一次高干会议上，毛谈到"得道者昌"，这使干部们大吃一

* 有些共产主义名词，如阶级，在过去的中国是没有过的。

惊。[27]这个词是儒家用来指事实上的道德政治。毛再次把他的马克思主义置于中国的优良传统之中。当时的会议记录表明，毛在引用这句名言时，下边的人都笑了起来。毫无疑问，那些忠诚的马克思主义者是神经质的笑。

一天，一位同事谨慎地向毛指出："《孙子兵法》中没有马克思主义。"毛听了很恼火，因为一位中共党员居然机械地把一位圣人从中国优秀的传统中排除出去。尽管观点不大牢靠，但毛还是坚持认为《孙子》中有马克思主义。[28]

或者说：他是不是真的指马克思主义中有孙子的思想？这使他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同时也可以与孙子的思想相一致。

他在中共第八次代表大会上说："中国有自己的语言。在俄语和英语中，'共产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发音基本上是一样的，但是在汉语中就完全不同。"[29]借助于这种语言的分析，毛在心理上已经脱离了苏联阵营，苏联终究是腐朽的西方世界的一部分。

在批评苏联经济的时候，毛更靠近儒家学说，也就更远离欧洲的马克思主义。"中国的'道'能否与中国的经济规律一致。还须要研究。我看，从一般的意义上来说，它们是一致的。"[30]他已准备把中国的"道"置于具体的经济成就之上，这与儒家传统一致，而与欧洲的马克思主义则不一致。欧洲的马克思主义是以经济规律为出发点的，它认为"道"只是经济规律的反映。

为了说明一切事物都有两个方面，毛在1958—1959年间走到了极端。他在一次地方干部会议上说，怀疑是好事，尽管他没有进一步地说明为什么是好事。他要求在召集会议的时候既要邀请好人参加，也要邀请坏人参加，"如果没有坏人，也就没有了好人。"[31]

他在1958年11月的一次会议上说："台湾朝我们这边打炮是件好事，不然民兵组织不可能这么快就建立起来。"[32]这种对台湾海峡局势的评价，等于说生病是好事，因为生病为医生提供了显示

自己本领的好机会。

居于卑位永远是件好事，毛总是这样对那些身居高位的人说。有一次，毛在他的桌子上看到一份报告，说广州附近的一个小伙子偶然发现一种有效地消灭蚂蚁的方法。毛看了后很高兴。他在第八次党代会上对高贵的代表说："全世界都没有发现有效地控制白蚁的方法，但是广东的一名中学生就发现了一种方法。"㉝

毛甚至开始说美国也是件好事。他在1958年11月对一批干部说："要两条腿走路，要有俄国的革命热情和美国的实际精神。"㉞两个月后，他在美国历史中发现了大跃进的先例，"在一百多年的时间里，就变成了世界第一，这只能被认为是大跃进。"㉟（原文如此）。

毛在这条路上走得很远，他甚至说"国家的消亡"虽然是可怕的事实，但是也应辩证地看待。㊱

所有这些，对中国的精英分子都是一种震动，它看起来不是属于马克思主义的。*它轻蔑地抛弃了宝贵的中国式的（和列宁主义的）秩序观，它没有带来具体的政策，也没有任何乐观的内容能使这些共产主义者感到高兴。

大跃进期间，毛的言行中最不能令人容忍的是，他认为中国共产党的分裂也是一件好事情。他在第八次代表大会上说："世界上永远存在着分裂现象。"没有人能否认这一点，但是毛用自然界的更新现象来说明这一点。他对代表们说："这不过是新陈代谢，就象细胞的死亡一样，每年、每月都存在分裂。"㊳他似乎非常喜欢"分裂"这个词。

基于分裂是一种正常现象的信仰，使毛不久就进行了可怕的

---

* 但是毛认为，他的大跃进是受马克思主义思想启发的。他在1959年春季说："我最近见到一位西德朋友，我对他说：你们的马克思完全丢掉了自己家乡的事，他一直在忙于我们国家的事。"㊲

试验。

毛在中国的实验没能成功，一夜的异常兴奋，凌晨时分就变成了沮丧。大跃进不久就出现了可怕的倾斜。

作为一种治疗方法的大跃进并非没有带来任何益处。每一代人都必须找到使自己激动的事情，1958年就为亿万农村青年提供了这种条件。地方的积极性被调动了起来，集体主义精神得到成长，普通人也感到自己有了新的生命。农村各级政府形成了新的框架，熔工作和生活于一体。

但是作为一种经济政策，大跃进是一场灾难。中国在迈向现代化的新长征中浪费了五年的时间。*

粮食产量大幅度下降。1960年，毛的中国第一次广泛出现了饥荒。解放军中出身农民的官兵的不满导致五个省份发生了小规模的抗议行动。毛对钢铁产量的预测和他对实现农业机械化所需时间的预测，结果证明是荒谬的。

对毛的一个残酷的打击是，资本主义势力在抬头。因为食物短缺，农民骑脚踏车把手中有的粮食和蔬菜弄进城里的黑市场以高价卖出，然后把得来的收入花在非毛主义的肆意挥霍上。

麻雀的生死沉浮结论性地说明了很多问题。宣布麻雀为“四害”之一是毛的主意，它们会因此而不吃宝贵的粮食吗？六亿中国人为了响应北京发出的号召，全民出动消灭四害，因为它们妨碍了经济的进步。这种场景着实地令人兴奋。

但是，对麻雀发起攻击是不明智的，因为麻雀不只是吃粮食，还吃那些吃粮食的害虫。

害虫象龙卷风一样袭击农民的庄稼。毛默默地接受了“四害”

---

* 据说，邓小平曾批评毛的大跃进：“驴子当然走得更慢些，但是它很少出事故。”㊴

的新定义，把麻雀取消，把臭虫列为四害之一[40]（老鼠、苍蝇、蚊子已在魔鬼的万神殿里占有它们的位置）。

就六亿中国人以感人的忠诚响应毛的号召而言，大跃进是一项辉煌的成就。就毛的计划脆弱和不协调而言，它是一场惨痛的失败。

把两者结合起来——高期望值和低效果——我们就会知道，为什么大跃进在中国的政治肌体上会留下很大的裂伤。

毛在1958年末受到批评时，他有点悲伤地说："我的思想也起了变化。"[41] 他开始意识到，公社太大了，不可能一口就消化掉。"人民公社"所要求的平均主义——把富村的东西拿出来与穷村共享——引起很多人的反对。毛在1959年2月的一次谈话中自己也承认了这一点，认为这样的平均是"绿林豪杰的剪径"。因此，他同意退回到较小的生产单位大队，把大队作为农村新的所有制单位。

"大队就是公社"，毛厉声说，"这只不过是换了口气说话。象一只刚从蒸锅里抽出爪子的猫一样满意，他说："什么事情都要一步步来。"[42] 这使人想起一句中国谚语："打肿脸皮充胖子。"

不管是出于怨怒还是出于同僚们的压力，毛在1959年中期把国家主席的职位让给了刘少奇，他自己只保留中共中央主席的职位。

毛在承认错误的同时又为自己辩解："谁要是说这么一个大的社会运动不会发生任何偏差，谁就是空想家、观潮派、算帐派，或者就是反对派。"[43] 这话粗妄、威风凌厉、富于挑战性，是典型的毛的言行。他讨厌算帐先生——他们使他想起他的父亲。他鄙视那些畏惧下一次革命浪潮的人。他在区分反对者方面是很迅速而且敏捷的。

严峻的现实捅破了毛的乐观主义的纸墙，企图用每家大院的后院的土高炉提高钢铁产量和集体意识是不可思议的。北京大学

也建造了自己的炼钢炉，这使毛特别高兴，他可能认为，自己终于还是砸碎了知识分子傲慢的外壳。

在他1919年受到过冷遇的可爱的北大校园里，难看的土高炉没有达到任何目的，所产的钢铁质量都很差。毛为了填平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之间的鸿沟，所作的长期努力终于没有成功。

大跃进的整个思想讽刺意味十足，它是一位知识分子试图改造外部世界的典型的例子，所借用的力量只是他一时头脑发热产生的幻想。

毛在大跃进失去吸引力之后的一次会议上说："即使有失败，那也没什么。我们将重新建设。最坏的事情莫过于全世界都笑话它。"㊹

他的坦率仍然掺合着挑战："如果你不愿意跟我坚持到底，我就自己干下去，直到把我开除出党。即使那样，我也要到马克思那里去告状。"

1959年，毛在压力之下后退到了山区。这是他辞去国家主席之后刚刚几个星期，赫鲁晓夫撕破苏中核武器协定之后的日子里，也是他将与一位高级同事发生可怕的摊牌的前夜。他选择了湖南。

三十二年过后，毛又一次看到了韶山。他去看了在1927年溃败以后从他手中没收了去的自家农舍。

毛泥塑一般站在他父母的遗像前。"如果是现在，他们（患这样的病）就不会死了。"他喃喃地讲了好久，仿佛是在思索自己的年龄和中国在医疗保健方面所取得的进步。66岁的毛接着说："那个时候医疗条件太差了，尽管他们年纪不大，但还是死了。"（他的父亲52岁时死于伤寒，母亲死时也是52岁，死于结核。*）

毛来到他父母的墓前。这座墓在1927年间的国民党的恐怖时

---

* 毛母死于淋巴腺炎。——校注

期被掘开以示侮辱，最近几年被修葺一新——现在中国的这种土葬传统已改成火葬。

有人递给他一朵松桠，他深沉地接在手中，把它插在墓前，说："前人辛苦，后人幸福。"然后，他朝着墓碑深深地鞠了一躬。㊺

这是他迄今为止对自己的父亲讲过的最热情的话。

入夜，就象五十年前反抗父亲时常做的那样，毛独自坐在油灯旁。他写了一首诗，与他的很多诗词一样，这是一首古典风格的律诗。在他的《到韶山》这首诗中，还可以看到大跃进的大胆风格：

别梦依稀咒逝川，
故园三十二年前。
红旗卷起农奴戟，
黑手高悬霸主鞭。

为有牺牲多壮志，
敢教日月换新天。
喜看稻菽千重浪，
遍地英雄下夕烟。㊻

象其他诗词一样，毛对正在形成的新社会感到欢欣鼓舞。但是，在这个严峻的时刻，在他的胜利的喜悦中，第一次出现了忧郁的斑点。我想，他不只是诅咒罪恶的过去，还包括他当时的遭际。

"英雄下夕烟"的画面，使毛痛苦地意识到自己在走人生的下坡路。

"为有牺牲多壮志"，这引人注目的句子也能说明这一点。壮

志——毛自年轻时就喜欢的主题——和磨难打开了通往新社会的大门。"为有牺牲"是这首诗的情感中枢。

在韶山陪同毛的，是一位充满朝气的年轻的地方干部华国锋。华象一位童子军领队，他当时是毛的家乡湘潭地委书记。毛带上了他，在与自己的同代人政治局委员们的关系紧张以后，他把手伸向了比自己年轻的人。

毛找来他第一位妻子杨开慧的哥哥杨开智，还有杨小姐的一位生前好友，亲切交谈。这次谈话没有公开，但是当时38岁的华国锋和毛在一起。㊼

毛在湖南时，匈牙利总理明尼希访问北京，日程表上突出地安排了毛的会见。中国方面负责接待的人在谈到毛的去向时说："他现在正在农村，在认真地思考一些意识形态和哲学问题。"这位匈牙利人发怒了，他对自己的随行助手们说，即使斯大林，"这位活着的神"，也没有毛这么神秘。

访问即将结束的那一天，明尼希这位美食家正在北京烤鸭店进午餐，有人告诉他说毛在等着见他。匈牙利人噙着满嘴的饭菜说："这位老板应该等几分钟，我等他的时间够长的了。"但是，这不是北京的风格，明尼希的老练圆滑被压倒了，几分钟的时间他就出现在中南海毛的书房里。㊽

在南方的日子，好象使他重又增添了活力，毛是那样平和而练达。他指着一提其名便站了起来的刘少奇说："我们有了一位新主席。"* 当时的气氛看起来是轻松愉快的。

位于扬子江畔、海拔四千英尺的庐山，风景如画，凉爽宜人。但是，当毛在1959年7月到庐山去见他的中央委员会的同

---

* 从刘少奇一方也可看出毛已让出国家主席一职，这可以从他妻子的谈话中略见一斑。有一天，她对孩子们说："爸爸很忙，他没有时间休息，毛主席把一些具体的国家事务都交给他了。你们不要打扰他。"㊾

事时，他知道自己面临着麻烦。

毛坐在柳条椅上，凝视群山，目光恍惚，神态不定。在战斗开始之前，他写了一首诗。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成立的纪念日，但是今年的7月1日，他想到了超出政治的东西：

一山飞峙大江边，
跃上葱茏四百旋。
冷眼向洋看世界，
热风吹雨洒江天。
云横九派浮黄鹤，
浪下三吴起白烟。

毛的心中又起了流芳百世的念头。黄鹤是传说中长生不老的鸟，黄鹤楼在庐山以西不远，传说古代有一位圣人骑乘黄鹤飞去。毛以不寻常的两句结束他的《登庐山》一诗：

陶令不知何处去，
桃花源里可耕田？[50]

陶渊明是公元四世纪的一名官吏，同毛一样，也是一位诗人。年老之前，他从官府退出，成了一名隐士，写下了充满乌托邦幻想的《桃花源记》。毛可能想起了过去存在过的纯朴天真，可能想到了退休，可能想到了自己辞去国家主席职务，也可能想到了超出具体的社会秩序之外的宇宙和谐。

数小时内，他就与人在1959年的社会秩序问题上发生了争执。

国防部长彭德怀是一位能干、但有缺点的人物。他长相丑陋，学识不多，亦无风度。他的率直性格早就有所表露。小时候

他一脚踢了祖母的鸦片烟罐，结果被赶出家门。他的士兵们尊敬他，但他并不象朱德那样是一位随和的人物。彭做事直截了当，心眼直来直去，他常常不能把握住毛的巧妙迂回的军事战略思想。

还是在延安时，一天，有人问彭德怀："你在读谁的书？""他写的。"正在看毛的《论持久战》的彭德怀回答说。这是毛在1938年花了九天的时间写成的文章，不久就成了经典著作。彭德怀粗鲁地对他的来访者说："他还想出版呢！个人写的书只能用个人的名义出版，不能用中央的名义出版。"*[51]

彭德怀仅比毛小四岁，他们在井冈山时就在一起。彭知道毛犯过一些错误，因此并不把这位主席看作是高人一等的超人。在延安时他就讨厌扩充自己的势力。他一直认为朱德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只是后来在仪式上才承认毛拥有这一殊荣。

到1959年，中央上层的气氛对彭的处境十分不利，因为他坚持反对毛执意推行的不得拥护的新政策路线。

几十年来，在中共的组织机构里，人际关系是头等重要的，却又不成体统。毛过去曾经常与朱德、刘少奇、彭德怀等人在一起边抽烟边聊天，他们共同商量日常生活中的每一件事。进入五十年代以后，这一切都慢慢地消失了，到庐山会议时被彻底埋葬。

这位国防部长在中央委员会的分组会议上说："我的看法是，人民公社办得太仓促了。"他给毛的宠儿身上罩上一层阴影。[52]

"毛主席家乡的那个公社，去年搞的增产数，实际上没那么多嘛。"这可是圣地！"主席去过这公社，"彭德怀继续说，"我曾经问过他，你了解怎么样？他说没有谈这个事。我看他谈过了。"[53]这是对毛的绝对正确和绝对权威的直接挑战。

---

* 原文失实。——校注

彭德怀并不是单枪匹马，和他站在一起的军界要人包括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总参谋长。解放军是农民的军队，这位高级官员认为应该让中央知道，农民被毛的大跃进推得太快了。

28个布尔什维克集团的剩余人物，包括在遵义会议上曾和毛站在一起的张闻天，现在也站在彭德怀一边。张刚刚结束在莫斯科的大使生活。彭德怀在春天的东欧之行中，对毛的做法大发牢骚。张闻天则认为，大跃进已远离莫斯科式的马克思主义的信仰。

彭德怀和他的朋友们认为，大跃进是一个错误，对这个错误，人人有责任，"包括毛泽东在内。"[54]他们坚持认为，意识形态不能代替经济形态，不正常的欣快症应该清除掉。

毛被震惊了。盛怒之下，他写信给正在北戴河度假的江青，附寄了一份他准备答复彭德怀的发言草稿。[55]江青马上给毛打电话，说她这就飞到庐山来，在这场冲突中她要和毛站在一起。

毛说："不，斗争太激烈了。"江青还是来了，带着相机到处拍照——松树，山峦，楼阁。她固执地坐在充满紧张气氛甚至是火药味的会场中。她的出现不仅没有能给毛带来安慰，反而使他感到更加沮丧。*

毛已有好多年没有感受到这种压力，他失眠了。就在他要应付彭德怀的挑战的前一夜，他吃了三片安眠药，但还是不得不来回踱步，等待黎明的到来。他象一位东方的李尔王，受着痛苦的煎熬，等待着上午的会议。

他毫无表情地开始道："你们讲了那么多，允许我讲个把钟点，可以不可以？"他象捻珠祈祷一样不断地重复着一些钢铁产量的数字，这表明他心绪烦乱。[56]

然而，在他的四十分钟讲话结束之前，他又慢慢地恢复了

* 这两段原文不实。——校注

以前的精明。彭德怀后来曾承认，他象张飞——古代一位冲动且成功的英雄——只有其粗，实无其细。毛在他诱人的讲话结尾时纠正说："我象张飞，虽有其粗，亦有其细。"[57]

毛退却了，但没有凄怆。

他想从极左的图腾柱下退出来，"公社食堂不是我们的发明，而是群众创造的。"他承认建立公社食堂的计划应该修改，因为这惹火了几亿农民。他没有完全接受彭德怀说他"狂热"追求办不到的事情的指责。

毛要求团结。但这不是他的特点，在任何情况下，他都喜欢成为锋刃，而不是钝刀。但是此时他的刀子已经使用得够了。

他在强调团结的重要性时也承认："因为在建设方面基本上不在行，我对工作计划一点不知……主要责任在我身上。"[58]

他在承认错误时的措辞也是很巧妙的，他说："说要快，马克思也犯过不少错误。"他还说："我见过列宁的手稿，里面改得一塌糊涂。他也犯过错误。"[58]

他努力为自己大跃进的核心思想争辩，他要求不要夸大失败。他坚持认为，大胆地寻找一条中国式的、通向共产主义的道路仍然是国家的最重要任务。

为了胜利之日的到来，不管是纯粹痛苦还是些许痛苦，他都在会议代表们面前保持精神优势。

对毛的一个批评是，他把人民作为祭品，捧上了不能实现任何目的的祭坛。有人引用孔子的一句话，这位圣人在反对用泥人陪葬死尸时声明说："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毛在他的不眠之夜，忍受着说他断子绝孙这种不公开表示指责的折磨。

"我无后乎？"他问中央委员会，"一个儿子打死了，一个儿子发了疯。"[59]

在这伤感的时刻，在中国的政治会议上，他已远离主题，他这番话的阴影已进入个人生活领域（他是否与彭德怀还有不快？

不能确定，但他的儿子在彭的照顾下死在了朝鲜这是事实)。

庐山到处流传着各种谣言，说如果毛撤了彭德怀的职，他就要用自己手中的实力密谋军事反叛。现在，浪头转向了彭德怀，毛面对这些谣言不得不深思。

他把矛头转向这位高级军事将领，"你解放军不跟我走，我就找红军去，一切从头开始。"很多人动摇了。当他威胁说要"重上井冈山"的时候，他们不会不想起毛在1940年"要回到韶山去"的威胁，因为当时有人反对他与江青开始新的生活。

然而毛明智地给这些热汗涔涔的将军们留下了一条退路："我看解放军会跟我走。"马上，就有几位军界主要人物站起来，发誓与毛站在一起。

彭并不具有毛那样柳树般的灵活性。他继续战斗，尽管他没有很多的支持者。他开始坦率地谈论在中国发生"匈牙利事件"的危险，而且暗示说如果中国发生匈牙利事件，苏联的军队就会介入。毛要求会议延期。

彭德怀本来就容易发怒的脾气现在又失去了控制。他想起了在延安时长达一个多月的毛彭争吵。他用粗话大叫道："在延安你操了我四十天娘，我操你二十天娘不行？"

会议乱了套，已离开了正常的秩序。朱德说："谁还相信我们曾经在一个饭碗里吃过饭啊！"

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彭德怀的国防部长就被林彪取代。

毛的胜利来之不易，他在庐山会议期间还没有十分的把握控制局势。他不得不召开后续会议。他在领导人传阅的文件上作了重要批示，写了难以捉摸的信件来区分敌人和动摇不定的人。

他写信给张闻天说："怎么搞的，你陷于那个军事俱乐部去了。"然后，他又露出一副温和的口气，"承你看得起我，打来几次电话，想到我处一谈。我愿意谈。"

难怪，毛在庐山时看上去很憔悴。他没有去"桃花源"，他失

去了一些根本的基础，他为战胜彭德怀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庐山会议结束以后，他带着江青到杭州他的别墅作彻底的休养。

与彭德怀的斗争比1954年与高岗的斗争更加困难。

高岗只是一位阴谋家，而彭德怀在基本的政策问题上与毛不一致。高认为毛的个人统治走得太远，而彭的同样观点对毛是一个更严重的挑战，因为斯大林也是在这种时候因为类似的失败而被废黜。高使得几乎整个政治局都反对他。而在庐山，朱德支持彭德怀，刘少奇持中立态度，政治局几乎没有一个人完全同意毛。*

在庐山萦绕的是斯大林的幽灵。在以后数年的时间里，毛一直与非斯大林化作斗争，庐山是开端，也是起因。

从斯大林的去世，毛找到了应付世界共产主义危机的中国式的方法。但是，他在前进的道路上分裂了中国共产党。

1959年到1960年的冬天，毛把彭德怀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宣布他属于1957年的敌人之列。实际上，毛把彭变成了一个想象中的怪物，这个怪物日后适应于毛所要求达到的任何目的。

"真理是在与谬误的斗争中发展的。"毛在谈到彭德怀事件时说。他能揭露或想象的谬误越多，他认为自己掌握的真理也就越多。

---

* 毛关于人民公社的缺点一段话，由于超过了其承受能力而给他的庐山听众带来惊慌。在断言公社没有垮台的迹象之后，他旋即大声说道："准备垮一半，垮七分，还有三分。要垮就垮。"

苏联与超越（1958—1964）

在为大跃进作准备的时候，毛曾问来访的布尔加宁："什么是毒草？"这位苏联人没有作出满意的回答。毛开始给他讲西红柿的历史："一百年前，西红柿在欧洲被认为是毒草。"① 一切事物都在变化之中，没有固定不变的事物，耶稣哥白尼一开始不是被当作毒草吗？

如果布尔加宁没有被完全说服的话，毛则越来越坚信：苏联人对辩证法已失去了兴趣。他们越来越喜欢有一个稳定的世界，而毛则对世界的动荡感到欢欣鼓舞。

这是否是中苏伙伴关系在迅速地走下坡路的原因？这解释了两家成为仇敌的氛围。意见的分歧一开始就表现在很多方面，且无休无止，其中互不信任的气氛是最为关键的一个因素。毛在1958年改变了行车方向——其原因可以追溯到非斯大林化之始——不久，莫斯科就认为毛狡猾、狂妄。

苏联人对中国的大跃进感到惊讶，这是很

正常的。大跃进象是毛的一份宣言书，他要从以莫斯科为核心的正统思想中独立出来。与布尔加宁谈论西红柿的历史只是一个小小的信号，说明毛已开始反对苏联指导下的国际共产主义传统。他要寻找更鲜红的明天的西红柿，这种西红柿在今天“非辩证法”的思想看来，是属于毒草之列的。

赫鲁晓夫已经发现，毛的这种举动对苏联的利益和国际共产主义的团结将意味着什么。失却了共同的马克思主义信仰，毛和赫鲁晓夫的纽带关系也就象掉在地上的中国豆腐，很难再完整地拣起来。

正当大跃进进入高潮的时候，赫鲁晓夫第二次来到北京。这次访问是简短的（三天时间）和务实的。毛在赫鲁晓夫来访之前已与自己的军事顾问密谈了好几个星期。最急待解决的问题是台湾海峡出现紧张局势。透过这一问题背后，更主要的是商量如何对付美国，如果发生战争如何采取行动。

毛和赫鲁晓夫各由其国防部长陪同，就中苏的军事合作问题进行磋商，但实际上赫鲁晓夫的目的是想借此牵制一下毛。

“军事合作”是一颗五光十色的宝石，从不同的侧面你会看到不同的颜色。赫鲁晓夫后来说：“我们要在中国建一座无线电台，与我们的舰队保持联系。”他不动声色地回忆说，“我们提出要在他们的领土内为我们的情报监听站提供一个基地。”② 毛对他与赫鲁晓夫的会谈有不同的看法：“他想与我们组建一支联合舰队，想控制沿海，封锁我们。”③

赫鲁晓夫正确地判断出毛头脑已在发热，他担心台湾海峡的紧张局势会导致苏联阵营内部发生一场战争，他希望苏联握住决策的杠杆。

然而他仍然认为中国是一个坚定的同伙，他完全支持毛对台湾的主权要求，并对毛要收回台湾给予军事援助。

毛对问题的考虑远比赫鲁晓夫深刻，中国的主权正在受到轻

视，中国反对"帝国主义"的心愿是苏联所不欣赏的。赫鲁晓夫认为毛的大跃进是一个后果很不妙的玩笑，这位苏联人说："不可能一下跃进到共产主义。"④

尽管赫鲁晓夫早在1954年对中苏关系就有过令人不快的谈话，但是毛比赫鲁晓夫更早地看到了将要到来的分裂，毛小心谨慎地向这一步靠近，他希望破裂。

中苏高级会晤之前，毛曾在一次军事会议上作过一篇讲话，如果赫鲁晓夫读过这篇讲话，他在会谈中就有可能更深一步地把握苏中关系问题。毛的这次讲话不是谈对外政策——而主要是谈苏联。

毛在讲话中抱怨说："现在，有些教条主义者主张照抄苏联，我想知道，苏联过去又照抄了谁呢？"⑤

毛感到迷惑不解的是，为什么一直存在中国模仿苏联的问题，从来没有苏联模仿中国的问题。他反对"盲从外国"，他直截了当地宣布说，中国为继续向前迈进已积累了比苏联更"丰富的经验"。

关于这一问题，赫鲁晓夫从很不相同的水平上看待毛。这位苏联人认为他有足够的本领把这位小伙伴拢在身边。

毛感到，自己要应付一场同中国革命一样的危机。

欢送赫鲁晓夫的宴会开过三周以后，毛开始炮轰金门、马祖岛。这一举动震惊了整个世界，但在紫禁城看来，这只是小事一桩。贯彻毛泽东路线的外交政策产生于新的观点，这就是他要在中国国内建设社会主义。

毛越发不断地用过去扛枪生活的调色板来涂抹当前政治斗争的颜色。他说："我看还是农村作风、游击习气好。二十二年的战争都打胜了。"⑥这有点自我辩解的味道。

毛向台湾海峡插了一刀，同时，他把中国农民推进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社会实验之中。很多西方观察家认为这二者没有

逻辑联系，但在毛看来，这是合情合理的，斗争是通向完美的台阶。

“全民皆兵”成为大跃进的主题口号。毛在1958年9月发出号召，“人民公社里头都搞民兵，全民皆兵。各省造轻武器，造步枪、机关枪、手榴弹、小迫击炮、轻迫击炮。”⑦ 当然，战争的阴云笼罩着台湾海峡，但这不是这种军事思想的根源。

毛坦率地承认，是他——而不是蒋介石——导致了金门、马祖危机。他若无其事地称他的行动“只是打了几炮”。他并不想真正地来一场战争。他承认：“我并不想引发一场风暴。”*⑧

但是，这种外部危机能给大跃进火上加油。毛在同一个场合说：“除了其不利影响外，这次危机使我们动员了很多力量——使落后阶层和中间派也做好了战斗准备。”

公元一千九百五十八年，是年老的毛把军事精神注入政治的第一次努力。当然，这是一次倒退，退回到令人兴奋的年代。当然，这使很多计划者皱起了眉头，也使赫鲁晓夫大吃一惊。

毛说赫鲁晓夫“他瘸着一条腿，不用两条腿走路。”⑩ 因此，他反对莫斯科在政治和经济方法上死板的应付，“他们相信技术和干部可以决定一切。”⑪ 他这样评论苏联人，是为他把一切事务直接扔给群众的做法辩护。

毛讨厌苏联人提出的“全面巩固”的观点，由此可以看出他对莫斯科的反对他为此对苏联的政策作了抨击。他说：“在整个宇宙和地球上，一切都是不断地产生、发展、消亡，不可能有全面的巩固。”⑫ 这与他放弃已成定规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而掀起大跃进的浪潮的思想同出一源。

毛对赫鲁晓夫的态度是恶作剧式的，因此，他把第一个人民

---

* 毛后来认为他在台湾海峡的举动可能是轻率的。他在1958年12月的一次会议上说：“如果我们过于冲动，在国际问题上就可能犯错误。”⑨

公社称做是放了一颗“卫星”。

莫斯科的世界是静态的稳定的，而毛的世界是不断变动的。苏联人陷入了维持现状的安乐椅中，而毛还是不满意他周围的世界。

一年以后，毛与赫鲁晓夫再次会晤。中苏关系又罩上了一层乌云。印度和中国在边界地区发生了武装冲突，而莫斯科在这件事上倒向印度一边。赫鲁晓夫到美国兜了一圈，并与艾森豪威尔共进晚餐，毛认为这是拍马屁的举止。苏联人也认为毛的人民公社是“疯子的举动”。

最糟的是，由于中苏关系的旋转不定和相互间的指责，苏联援助中国发展核武器的计划告吹。

赫鲁晓夫不愿意再去北京，是否该轮到毛去莫斯科了呢？但是毛纹风不动。在这种紧张不安的气氛下，两国的高级会晤于1959年秋天在北京举行。

赫鲁晓夫傻乎乎地从美国直飞北京。他到中国首都的时候，正值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十周年庆典。这里一派节日的气氛，根据中国的标准，胡志明、金日成和其他许多国际要人要到达北京，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成了主题音乐。

但是，毛与赫鲁晓夫在一起的照片却没有多少庆典的景象，倒象是在参加葬礼。两人的眼睛差不多都眯成了一条线。赫鲁晓夫后来说：“我一到北京就感到有一股冷飕飕的凉气。”[13]江青说赫鲁晓夫的这次访问是“单调乏味的，让人讨厌的”。[14]

毛感到恼火的是，赫鲁晓夫称赞艾森豪威尔是一位和平人物，并批评中国是“好斗的公鸡”——这在北京的正式宴会上是少有的。赫鲁晓夫认为苏联和美国是两个主要力量，他们对维护世界和平共同负有特殊的责任，这更加激怒了毛。

赫鲁晓夫再次提出在中国的土地上建立无线电台，以与他航

行在太平洋上的舰队保持联系。"我最后一次告诉你，不行。"毛用打雷一样的声音说："我不想再听到这个问题。"⑮

1957年，在莫斯科，毛在这些问题上采取了主动。1958年与赫鲁晓夫在北京会谈时，他让赫鲁晓夫对台湾海峡的局势估摸不透，可能也是采取主动。但是到了1959年，主动权似乎已转移到赫鲁晓夫手中，他只能从赫鲁晓夫的背后嗅出点味道。

一天下午，用茶时他问赫鲁晓夫："有多少征服者侵略过中国？""很多"，他自问自答，"但中国人同化了所有征服者。"赫鲁晓夫对毛的话的迷惑不解很快就消失了："想一想，你有两亿人口，我们有七亿。"⑯

在同一次会谈中，毛给赫鲁晓夫谈到汉语的独特性——以前他只对中国人讲过，"世界上所有的语言中都有'电'这个词。"他说，"但是他们都是从英语中借用来的，只有我们中国人才有自己的词。"⑰ 毛选了一个赫鲁晓夫无法争辩的话题。

在1959年的最高级会晤中，最使毛感到恼火的是，赫鲁晓夫提出要见一见彭德怀，并要送给这位被废黜的将军一份漂亮的礼物！这在毛看来是对中国内部事务的干涉。

赫鲁晓夫的姿态表明，这是他对僵持着的苏中关系危机的指责，也是对毛偏好大跃进的指责，正是在这些问题上，毛已受到彭德怀等人的困扰。

赫鲁晓夫在冷冰冰的气氛中回国，他没有见到彭德怀，也没有签署任何联合公报。后来，毛再也没有见到他。*

由于彭德怀和赫鲁晓夫之故，毛度过了一个烦恼的秋天，他到宁静而遥远的海南岛去度假（没有带江青）。

---

* 毛在1964年对一位来访者说："我去过苏联两次，但我不会再去了，苏联人把我们看得狗屁不如。"⑱

一年之内，苏联对中国的援助也停止了，这在1959年的高级会晤后已成不可避免之现实。苏联在1960年中期撤走了它的一万二千名专家和技术人员，毛这一次与往常一样，过分乐观地估计了自己的力量。

赫鲁晓夫叫嚷，昏庸的中国人（一个少见的民族）侮辱了苏联恩人。* 毛答复说，苏联专家对关键计划和资料一直保密。

毛咆哮着说："还不如法国的资产阶级，他们还有一点商业道德观念。"[20] 他很迟才发现，苏联的产品"笨重、原始，而且价格昂贵。"

桌面上的外交礼节还保持了一段时间。1960年秋天，毛还到苏联大使馆参加了一年一度的庆祝十月革命纪念日招待会。但是，1961年苏共二十一大期间，苏中关系公开破裂。自1956年反非斯大林化以来，这是第一次召开苏共代表大会。阿尔巴尼亚是主要议题，中国是争论的热点。周恩来率领中国代表团怒气冲冲地离开莫斯科，毛泽东破天荒地在北京机场迎接他的伙伴。

1962年末，毛跨出的一步是对世界范围的马克思主义组织致命的一击。他宣布，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权力"已经被修正主义分子篡夺。"[21] 分裂产生了，党与党的关系枯萎凋谢。公元一千九百六十三年，毛和苏联在意识形态上分道扬镳了。

所有这些都源出于制度问题，实际上，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即将结束。现在的斗争主要是围绕对国际共产主义这具僵尸的占有上。

到1964年，毛看到苏联这个魔鬼头上的犄角已多得不可胜数。他在一次计划会议上毫不掩饰地说，"现在的苏联是资产阶级专政，是大资产阶级专政，德国法西斯式专政、希特勒式的专

---

* 后来，赫鲁晓夫下台以后，毛给柯西金提议说赫鲁晓夫到"中国的大学中学习马克思主义。"[19]

政。”[22]他再次将苏联国家同西方国家进行比较——他没有提出纳粹德国式的专政，看来他对西方世界了解并不多。他说，“他们是一伙比戴高乐还卑鄙的家伙。”[23]

毛很有可能得出一个看法，在1964—1965年之交的冬季终于得出：苏联比美国还坏。

当然，在来自中国内地的这位“沙文主义者”看来，二者都不是好东西，但是苏联更靠不住。他说：“美国是坏蛋，但他们是诚实的坏蛋。苏联还是骗子。”当他发现苏联人正在崛起时，美国人的统治地位正在衰弱。

他产生这个新想法的一个原因来自他与邓的分歧。出于既定的政策，邓小平认为，亚太地区是全球紧张的重心。[24]毛纠正说不是的，现在欧洲是全球紧张的重心。由此可以说，在毛看来，美国的威胁已经减弱，而苏联的威胁正在上升。

毛的做法是不可思议的，他重新把中国的救星定为敌人。在他的很多同事看来——不只是已下野的高岗和彭德怀——毛走得太远了。

然而在这一问题上，毛也得到了下层人士的支持，很多中国人不喜欢苏联。很多学识渊博的党外人士从一开始就反对中苏联盟。即使在台湾，很多人私下里也称赞毛终于摆脱了贪心的北极熊。

然而在政治局内部，在苏联问题上，毛还面临着一些战斗。

既然毛满不在乎地拔去了塞子，人们也许会问，为什么还会把苏联这个瓶子拿了这么久呢？毛后来说，中国在五十年代别无选择，只有追随莫斯科。他说：“因为我们什么都不懂，完全没有经验，没有人能分清正确与错误。我们只能照抄别人，虽然我们对他们一直就不满意。”[25]

这并不是问题的全部。直到非斯大林化出现，毛还一直认为莫斯科是马克思主义信仰的源头。

象在许多宗教中常发生的那样，信仰的慢慢动摇就会发展到超越充满疑惑的激烈时刻。1962年，毛已放弃了这种信仰，但还是有点儿藕断丝连。在一次中央会议上，毛提出有两种教条主义的论点，然后接着说："莫斯科认为这两点是我提出来的。"㉖这两点可以说是毛主义的宣言，毛为此而感到自豪。这毕竟还打动了他，给他以某种印象，因为莫斯科把它们说成是他的思想的产物。

在六十年代早期，毛对世界问题的兴趣超出了苏联阵营的范围，在外交政策方面也取得了明显的成功。看起来，1960年与苏联的分裂似乎去掉了中国外交政策上的负担。毛不再在别人的面前充当低人一等的伙伴，取而代之的是在第三世界更为广阔的舞台上唱起了独角戏。

从1960年中期到1964年底，有十七个国家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的援助开始流向第三世界的一些地区。中国的形象在这里的革命运动中闪光，这里的革命者感到，苏联企图与美国一起充当稳定世界的合伙老板。

中国在大跃进期间与一些国家的友好关系日趋紧张。毛除了具有能让人消除疑虑的能力以外，还有能让人紧张的一面。他在1962年一个批示中写道："1959年是一个马鞍型，全世界转而反华。"*㉗

在六十年代前五年，毛失去的比得到的更多。

1960年，毛对来访的蒙哥马利勋爵说："我想，你知道你是在和一个侵略者谈话。"毛的两眼神秘地眨着，这是一个漫长的夜

---

* 此时中国还保留着忠实的阿尔巴尼亚。但是来自当时监狱的一份回忆录说，普通的中国人都认为对巴尔干这样的小国家，中国没有必要认真对待。其中一位当时正在服刑的犯人说："如果六亿中国人站在一起，一人一口唾沫也会把阿尔巴尼亚变成汪洋。"毛去世后，中国官方的政策马上降低了调子，与公众的口味一致。㉘

晚，“被联合国认为我是侵略者在与一位侵略者交谈，你介意吗?”㉙*

他不希望改善与印度的关系，尽管在政治局中有人反对，他仍然坚持在喜马拉雅山地区与印度摊牌。在军事上中国获得了辉煌的胜利，中国人民解放军使印度军队受到重创，然后又撤回，让印度的民主处于一片吵闹之中。

但是，毛好象只是想证明他的外交政策是为了防御世界，而不是为了赢得世界。他在这次军事胜利以后没有紧接着采取任何外交活动。中国与印度的关系直到毛的晚年都很不好。

毛发现了非洲。在1960年以前他几乎没有提到过这块大陆，即使在他开始对这块大陆感兴趣的时候——中国在那里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他这方面的知识也还是有限的。1964年，他接见了阿尔及利亚的来访者，会见结束时，他不得不要求他们写下他们的总统本·贝拉的名字。

同一年，他在会见桑给巴尔来访者时，也出现了这种情况，“肯尼亚有多少人口？三百万?”尴尬的来访者告诉毛，肯尼亚的人口是八百五十万。毛对桑给巴尔的地理位置也不清楚，“你们国家在北半球还是南半球?”“正好位于赤道上。”来访的非洲人回答。“赤道上一定很热吧?”这是毛的下一个问题。㉚

这些关于非洲的天真的问题(也许是故作谦虚)，并不妨碍毛私下里对此作出精明的判断。除了意识形态方面宣传的需要之外，毛私下承认古巴倒向苏联而不是倒向中国的真正原因，中国缺少古巴所需的石油和武器，而莫斯科可以供给这些东西。㉛

毛深知施加自己影响的基本技巧。1964年，与苏联毗邻的罗

---

* 随着年事愈来愈高，毛常常提些玩笑式的问题，这可不象他表面看上去的那么谦逊。数年后，他对泰国领导人克立说："你不怕我吗？蒋介石和西方骂我是土匪、罪犯、杀人犯。"（过了一会儿，当毛说，他不久就要死去时，克立说不可能。毛问情由，克立答道："啊，主席，世界不能失去象你这样的第一号坏人。"这句话"使毛极为高兴，……他拍打着坐椅扶手，笑得浑身抖动，起身同满屋子人握手。"）

马尼亚要求中国派一高级代表团访问布加勒斯特，毛在做决定时非常谨慎，他说："即使只与他们握握手，也是很重要的。"[32]

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固执地要求把中国排斥在国际组织之外，毛在一次会议上对此作出响亮回答："我们孤立吗？不孤立……我们国家有六亿人口，六亿人口孤立吗。"[33]

如果说，"反华"的态度使毛感到愤怒的话，这种态度更使他惊讶。他努力使他的同事们和他自己相信，反对中国的力量并不是很大的。1960年，中国在巴基斯坦进行了一次展览，受到反华示威者的包围，这使毛很烦恼，他写了一篇题为《关于反华问题》的文章。文章中可以看出，他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的成就感到自豪，同时也为某些人继续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而感到受了伤害。他劝告他的同事们"接受世界上大约有百分之十的人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会经常反对我们这一事实。"[34]

1964年秋，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里，爆发出两件新闻。第一件是赫鲁晓夫在克里姆林宫被推翻，第二件是中国爆炸了自己的第一枚核武器。对毛来说，两者都是胜利——为中国的骄傲和独立提供了根据。

毛对赫鲁晓夫下台所作的反应说明，他已染上中国帝王的思想痕迹。埃德加·斯诺在此后不久曾问毛，如果苏联人的看法是正确的话，中国的个人崇拜是否正在出现。毛认为，赫鲁晓夫之所以下台可能就是因为他没有个人崇拜。[35]

毛说，让中国人从几千年来对帝王的崇拜中摆脱出来，是一件很困难的事。确实如此，即使一位马克思主义统治者，可能也不会摆脱这种影响。

毛对赫鲁晓夫的后继者采取了放任自流态度，这也是一种传统的做法。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如果说赫鲁晓夫是一位"法西斯主义者"的话，很难说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是"社会主义

者”。难道苏联的社会制度不是回复到了不能挽救的境地了吗？

然而，毛更多地从个人角度看待新的领导者。在不到四个月的时间内，他会见了柯西金——克里姆林宫的第二号人物——并举行了会谈。

在原子弹试验的当天晚上，人民解放军的卡车在北京到处散发《人民日报》的号外。号外用红色大字印刷的标题宣布了这一消息。第二天，每家商店都在橱窗挂上了“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消息。

美国人不会忘记这么一幅照片：毛与钱学森一起坐在罗布泊核试验基地的一张木桌旁。*钱学森是加州工学院的一位科学家，中国的核弹之父，他冲破美国政府的重重阻挠终于在1955年回到中国。㊱

毛对中国的原子弹爆炸成功异常兴奋。他亲自鼓励钱学森等科学家。他以少有的热情和激动告诉外国来访者，中国不得不研制原子弹，即使生活水平问题使他们身负重担。

毛了解并相信，战争是人民战争，战争是社会主义政治的延伸。出于同样奇怪的原因，毛对发展核武器持很不同的态度。他希望原子弹用于政治目的甚于军事目的。与戴高乐一样，他把它看作是自己国家行动自由的保证。与大多数军事专家的看法不同，毛认为，原子弹有几枚就足够了。1965年他对安德烈·马尔罗说，六枚就足够了。㊲

他的目标是“打破两个超级大国的核垄断。”他不承认使用核武器具有很大的威慑力，认为它只能吓唬那些害怕它的人。不过这并不包括他自己，“如果你把所有的人都杀死，即便占有了土地，又能作何用呢？”㊳

毛认为战争是政治的延续，因此他认为最好的防御手段是拖

---

* 原文如此。——校注

拉机加原子弹，这是他一贯的看法。如果有人侵犯中国，他还会诱敌深入，把他们包围起来，用对待日本的办法对待他们。

原子弹还有另一方面的作用。当两位高级经济官员谈到核武器问题时，毛说："是的，我们需要它们。不管是什么国家，不管他们有什么弹，原子弹还是氢弹，我们都必须超过他们。"[39]

1964年的核试验鼓舞了毛。他认为中国的科学家在各方面的能力都保证了中国在发展核武器上会走在前面。仅仅三十二个月后，中国成功地爆炸了它的第一枚氢弹。这种速度的确很快，同样的事，美国花了七年零四个月的时间，苏联花了四年的时间，英国花了四年零七个月的时间。

六十年代前半期，毛对美国的政策作过很多的批评。他谴责美国对黑人的迫害、控制巴拿马运河，谴责华盛顿在国外建立军事基地。"就象一头牛把尾巴拴在桩上，这还有好日子过吗？"[40]

但是与四十年代后期相比，毛对美国的攻击减弱了，这不只是因为中国已经变得强大起来。他的攻击常常带着嘲笑，在感情上也与对苏联的攻击不同，是面对面的。

尾巴拴在桩上的公牛是很危险的，但是归根到底，还不能与到处游荡的北极熊相比。然而这种潜在的威胁还没有被认识到。

现在，毛还不希望从美国得到什么好处，他倒是在考虑，美国想从中国得到什么。虽然他对美国的生活还不十分了解，他认为美国是帝国主义角色。

1956年，他在一次知识分子集会上说："美国人只知道赚钱，如果没有人给他抬轿子，它就得考虑走路了。"

毛在1964年春节的一次谈话中说："帝国主义、修正主义联合打到国境了。"[41] 这种观点令人吃惊，也很露骨。苏联和美国这两顶帝国主义的帽子都是他给戴上的，他对两个超级大国的感受也很相似。革命的策源地？反革命的策源地？两者都不是，他们

都是敲中国大门的强盗。

这再一次证明，毛已完全脱离莫斯科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同时也使中共内部潜伏着新的斗争。因为在1964年，毛的大多数同事都认为美国和苏联不是一样的。

不管怎么说，毛的漫不经心使我们吃惊。“让他们来吧，”他说，“我们顶多退到延安。”他同时反对两个超级大国，而不是拉一个打一个，这似乎不明智。然而，这正是毛在六十年代后半期要做的事。

毛总是很精明，但他从来不虚心。在他看来，世界存在的意义，就是为中国提供了赶上和超过的目标。

退　　却（1961—1964）

自1961年起，毛又恢复了自己的本色，尽管心中充满疑虑和不快，却开始正视政治和经济现实了。刘、邓二人强调政治秩序和经济效益符合了时代趋势。刘、邓不仅与毛有认识上的冲突，更加重要的是他们极力推行实用主义路线，因而权力不断扩大。毛没有阻止，或许也不能阻止他们。

作为党的主席，毛在1961年至1966年期间只召开过一次中央委员会；在政治局，他也时常被敬而远之，这在以前从未有过。在以后的三年里，他很少接见外国人。

毛知道，国内大部分地区有一种对北京的不满情绪。在1962年的一次会议上，他曾大胆地讲述他曾听到的一个故事。这是一个好打趣的广东人说的。“当火车向南开时，它的隆隆声似乎在说：‘前途光明，前途光明，前途光明。’但向北开时（去北京），它似乎在说：‘没有希望，没有希望，没有希望。’”①

从后来批判邓小平的材料中不难看出当时政治局势的变化。材料说邓在六十年代初“见到毛主席时以平等身份自居，不拘礼节。”② 新闻宣传对毛的崇拜也在逐渐减退。你可翻阅当时党的刊物《红旗》杂志，就是读上一个小时也很难找到毛的语录，甚至连他的名字也很少提及。

人民公社实际上已解体为大队，乡村里秘密的自由市场也开始合法化。原来的管理人员又当上了工厂的领导。偏离党的工作方法的倾向已经出现。1957 年被作为毒草连根拔掉的知识分子又在刘、邓的官僚庭院中找到了新的土壤。

经济在这种氛围中稳步增长。毛无法否认，当时他也的确没否认这一事实。

毛在五十年代末曾对来访的外国客人说：“十年以后再来看看，就能看出我们是对的还是错的了。”③ 然而，大跃进不到一年的时间就被他的同事们拖住了，还谈什么十年。

毛的退却从他对自己路线机智的辩解中可以看出。他曾深有感触地说：“大家都是好同志嘛！”④ 他还曾接着一位领导人的话说：“一个人不可能没有一点缺憾。”这位领导人已经承认现实。

1961 年开始的时候，毛在中央委员会上说：“肥猪只有在栏里才能养出来。”一句话，就是要整顿一下。建筑师不应该总是把时间用在修补上，现在该考虑怎样利用猪栏了。

毛对那些不肯让步、甚至有些严厉的与会者说：“我们凡事都要从实际出发，不能照搬照抄不懂的东西。”⑤ 而这样说的人就曾试图这样做。

“我是个中间派。”他这样讲，可他自己对此也未必相信。

对毛的不满大多源自他五十年代后期的独断专行。非斯大林化使他僵化的思想有所松动。他焦躁不安，信仰丧失，在被老一套的说教包围之中，他开拓了一个新的前进方向。

为什么要发动 1957 年的铲除毒草运动？因为匈牙利事件使

毛烦躁不安；为什么要搞大跃进？因为毛意欲脱离正面临解体的国际共产主义阵营，并试图按自己的想法走出一条中国的路；为什么要反击彭德怀？因为毛把它看成半是与赫鲁晓夫的幽灵作斗争。

要消除个人崇拜吗？可是它好比一个针眼，1956 年以来中国所有的政治丝线都须从中穿过。毛觉得，他自己的意志就是那一时代中国道路的化身，他感到自己能超出常规，跨越一定的社会秩序。

但是，刘、邓和其他人相信规则之书：在这块有着六亿五千万人口的土地上，消除组织结构，那是绝对不安全的。

毛后来在指责刘和倔强的邓时曾说："他们把我当做亡人。"平时，带着诚恳的目光听毛的指示，向毛点头称是，为他的讲话热烈鼓掌，可就是不去贯彻他的指示。他们常常"忘记"向毛汇报情况。开会时，他们总是坐得远远的，避免毛那令人难料的询问或是尖刻的教训。

与国防部长彭德怀的斗争留下了极坏的后果，甚至一向以谨慎著称的刘在 1962 年也出来反对"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⑧

北京市一位副市长写了一个寓意深刻的剧本《海瑞罢官》，把因罢免彭而出现的对毛的不满情绪推向了高潮。该剧本说的是明朝的一个忠臣因直谏而被皇帝罢官的故事。难道仅此而已吗？

毛马上就看出(尽管当时没有发作)，这是对他轻率地罢免彭德怀作出的尖锐批判。

北京的一位专栏作家写了一则故事，讲的是一个才能平平的运动员，在一次幻觉中竟吹嘘自己打破了奥林匹克跳远纪录。细心的读者都会猜到这位运动员是谁。*

---

* 这位专栏作家是邓拓，他于 1979 年和剧作家吴晗一起平反昭雪(当时二人均已去世)。

这位作家还写了一篇《专治健忘症》的故事。作者勾画了一个健忘症患者(没有说出名字)，他忘性极大，自己刚刚说过的话马上就忘了，因而变得喜怒无常。文章十分隐晦地写到："如果谁发现自己有此症状，必须马上全休（影射高岗危机时朱德对毛的劝告)，什么也不说，什么也不做。"⑦

这些伊索寓言一类的文章，是典型的中国人提意见的方式，但这已经够大胆的了！

毛在六十年代早期讲话甚是简要，很少闲聊，好象他已认识到他的说服力在逐渐减弱。他在阐述自己的观点时，懒于讲究形式和次序。

"我没有多少东西，"他有时这样开始他的讲话。有时他也会说，"我想讲六点……"他还常常在讲话中罗列一些数据，似乎想证明：他要是愿意的话，也可以做一名刻板的专家。

埃德加·斯诺曾于1960年访问北京，他问毛对中国的长远规划是什么。"不晓得。"这就是毛难尽人意的回答。

"您太谨慎了。"斯诺说。

毛却坚持说："这不是什么谨慎，就是不晓得呀，就是没有经验呀。"⑧

毛难以掩盖自己在大跃进时期的错误。1958年，他说中国将用十五年的时间超过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而在1962年他又改口说要用五十至一百年的时间。

然则，毛的讲话有时也让人摸不着头脑。他在1962年的一次中央委员会上说"近几年，我们很多工作不是很糟吗？"⑨这使得与会的人不知道他是做自我批评还是另有所指。

他在1962年的另一次会议上说："不许人讲话，老虎屁股摸不得，凡是采取这种态度的人，十个就有十个要失败。人家总是要讲的。"毛这是攻击他偏爱的靶子——严重的官僚主义。

"你的老虎屁股真是摸不得吗？偏要摸！"⑩

在毛看来，一些官僚主义者正在脱离群众，不能倾听人民的呼声。工业企业的管理人员开始趾高气扬，仿佛工厂就是他们自己的。医务工作者拒绝到边远的乡村去工作，因为舒适的城市生活吸引着他们。一些干部不按规定下乡劳动，而是象野餐一样，象征性地去一趟乡下。所有这些都使毛十分恼火。

作为一个普通人，毛越发关心生活中一些具体、新奇、简单、难以预料的事情。

作为一个政治家，他不能容忍中国现存的多层次的组织机构。

作为一个哲学家，他认为除非干部真正地深入群众，与他们同甘共苦，否则中国的革命没有希望。

现在，甚至书籍在他看来也成了权威的象征。"有人写出书来，然后就让那些没有经验的娃娃们去读。"⑪ 他认为，如果没有直接的生活斗争经验做先导，一味地填塞间接知识，"娃娃们"就会变成书呆子。

一天，几位智利新闻工作者拜访了毛。在谈到中国与智利的友好关系时，一位编辑首先告诉毛，最近在圣地亚哥举行的中国经济成果展览引起很大反响。但是毛却另有所悟："我还是从你这里才知道有这么一个展览。"他有些恼火。环顾了一下在场的中国官员，毛说："看来我的官僚主义很严重啊。"⑫

六十岁时，毛消减的不是复杂的心事，而是对重建一个拥有6.5亿人口的社会所需的复杂机构的容忍。他要亲躬每事，要亲自触摸中国革命的脉搏。

1961年，从第一线上退下之后，毛写的诗词比以往任何一年都多。

有一首诗纯属歌颂军人的美德，由此寄托政治上东山再起的希望。这首诗便是《为女民兵题照》：

飒爽英姿五尺枪，
曙光初照演兵场。
中华儿女多奇志，
不爱红装爱武装。

写于湖南的《答友人》[13]是一首感情充沛的怀旧诗。在诗中提及了传说中的舜帝。这个贤明的皇帝驾崩后，他的两位妃子悲痛欲绝，止不住的泪水滴在竹子上，留下斑斑泪痕。直到今日，在湖南、江西一带的竹子上还隐约可见当年的泪痕。

九嶷山上白云飞，
帝子乘风下翠微。
斑竹一枝千滴泪，
红霞万朵百重衣。
洞庭波涌连天雪，
长岛人歌动地诗。
我欲因之梦寥廓，
芙蓉国里尽朝晖。

毛给他的出生地湖南涂上了一层不朽的色彩。娥皇和女英身着用万朵红霞裁成的百迭彩衣走向人间，洞庭湖的波涛似乎在拍打着天堂的大门。是的，毛曾和肖瑜于1921年穿过这湖水，走上了建立中国共产党的道路。他年轻时漫步过的橘子洲头是如此地震颤，仿佛它对地球的依附已不复存在。在毗邻的生死线上，毛梦想着新生。到那时会摆脱这种羁绊吗？

《咏梅》[14]是他1961年所作诗词中的佳品，毛解释说，他读了十二世纪词人陆游的《咏梅》词，便和了一首，但“反其意而

用之。"

面对正在出现的中苏之争，这首词旨在振奋军心，当然他自己也得到了充分的表现：

风雨送春归，
飞雪迎春到。
已是悬崖百丈冰，
犹有花枝俏。

俏也不争春，
只把春来报。
待到山花烂漫时，
她在丛中笑。

春天被冷峭的气氛所包围，毛认为一切好的事物都是如此。梅花——中国传统中正直高洁的象征——勇敢地屹立在冰山峭崖之上。毛在慨叹中国在苏联阵营中的孤立，也许还包括他自己在中国的孤立。

如果说陆游看到梅花时只想到令人伤感的一面，* 那么毛却看到了梅花壮丽的归宿，尽管它现在不被人注意，因为高贵的梅花已抛弃了私欲（"俏也不争春"），有着崇高的思想境界。确实，最后一行的"笑"预示它将永生。

和陆游词描绘的那样，梅花确也孤寂。然而，陆游仅仅为之伤感，而毛却能体味出孤独中的欢悦。

---

* 陆游原词⑮：驿外断桥边，寂寞开无主。已是黄昏独自愁，更著风和雨。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

从1959年开始，佛教思想又重新回到了毛的谈话和想象之中。

当大跃进的步子开始放慢后，毛指出："自己作个菩萨自己拜，我们必须打破这种偶像。"在彭元帅被罢免后写的一份"检讨"书上，他批写道："如果他彻底转变了，就会立地成佛，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⑯

毛敦促干部应该走出城市，在农民中间才能保持谦虚谨慎的作风。毛说他们"应该每年离开北京四个月，到劳动人民那里去取经。"他的这种想法源于《西游记》，这部小说中的猴王就是离开宝座出外寻找佛经的。

毛在1962年的一次中央委员会上问："和尚念经为什么要敲木鱼呢？"当时他正在重读《西游记》。原来，从印度取来的真经被黑鱼精吞掉了，敲一下，它才肯吐一字。"不要采取这种态度和黑鱼精一样。"⑰毛这是利用佛教的传说来阐述党的领导者说话时不应吞吞吐吐("敲一下吐一点")。

他开始赞成宗教领袖了⑱，难道西哈努克亲王领导的柬埔寨不比由总统领导的南越傀儡强吗？友善的睦邻尼泊尔王国不是比议会制的印度更好吗？

王海蓉是一位挺严肃的姑娘，当时正在北京外国语学院学习英语。她是毛的侄女，毛泽民的女儿。*1964年王海蓉来看望毛。她感到吃惊的是，毛竟督促她去读一读圣经和佛经。

毛并不是因和彭德怀发生冲突才开始谈论佛教思想的。因为他对欧洲的马克思主义失去了原有的迷恋，就开始转回到中国的传统，对宗教表现出一种新的宽容态度。** 他日渐发现中国所有

---

* 她改了自己的姓，不姓毛，而姓王，王是毛的表侄孙女。——校注

** 五十年代，毛有一次和达赖喇嘛一起庆祝藏历新年，有人告诉毛，向屋顶投掷庆贺饼是对佛的祭祀。他把自己的一份饼向上投去，然后却调皮地笑了笑，把另一份投到了地上。⑲

的好经验都是有先例的，因而日渐把历史看做一连串道德故事，历史不仅只是精致的马克思主义历史规律的翻版，而是不断发生的好人和坏人之间的永恒斗争。

有一次，王向毛偶然提到她的一个同学只顾读《红楼梦》不学英语语法，毛听了后显得很严肃。以下是他们的对话：

毛："你读过《红楼梦》没有？"

王："读过。"

毛："你喜欢《红楼梦》中哪个人物？"

王："谁也不喜欢。"

毛："《红楼梦》可以读，是一部好书。"

当他的侄女正力图使自己成为一个国际主义者、一个现代女性的时候，毛却在第五次通读《红楼梦》。

毛又问她是否读过唐代诗人杜甫的《北征》，王就象在课堂上回答问题似地说："没有，这首诗没有选入《唐诗三百首》。"毛听后离开椅子，走到书架前，找到了那首《北征》，递给王，并告诉她要多读几遍。

王问道："读这首诗要注意什么问题，要先打点预防针才不会受影响。"

毛似乎有点动怒："你这个人尽是形而上学，为什么要打预防针啰？不要打，要受点影响才好，要钻进去，深入角色，然后再爬出来。"[20]

六十年代中期的毛突然发现他的侄女太死板（他告诉她在学校里要敢于反抗），同时又太左（他告诉她多了解中国的过去）。

六十年代，是毛自1918年从第一师范毕业后阅读历史书籍最多的时期。他在历史中找到了慰藉：

"孙子膑足，兵法修列。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

毛把他取得控制权以前的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分成五个“朝代”。[21]陈独秀等人都是失败的昏庸之主，因之自然而然地他把自己比做是成功的贤明君主。*

毛已意识到自己同命运的主宰不可避免的会面已经为期不远了。毛有时称这位命运的主宰为“上帝”，有时则称之为“马克思”。

毛在1964年接见阿尔及利亚客人时说：“帝国主义分子前不久还叫嚣中国政府要垮台，现在不做声了，因为还没有垮。”[23]

但是，毛在内心里却不乐观。“不过，我就要垮了，要去见马克思了，医生也不能保证我还能活多少年。”

几星期后，四位副总理来和毛讨论第三个五年计划。“制订计划要从实际出发。”而在1958年毛却根本没考虑这一点。他继续说，“我已经七十多了，但我们不能把‘在有生之年看到共产主义’作为制订计划的基础。”[24]

该年年中，毛对一些军队干部讲：“如果原子弹投下来，只有去见马克思一条路了。不过，年纪大了，终究要死的。”毛还曾伤感地说，“负担太重时，死是很好的解脱方法。”[25]

埃德加·斯诺和毛共进晚餐，问毛是否可以拍一部电视片来重现当晚的情景，斯诺说：“有谣言说您病得很重，如果将今晚的情景通过屏幕公诸于世，不就证明那些谣言纯属夸大其词吗？”[26]毛苦笑了一下，好象是信心不足。事实上，他认为自己不久就要去见上帝了。

毛知道自己生命将尽并有所准备。他对来访的阿尔及利亚客人说：“谁都难免一死，最起码在中国历史上没有先例。”

从毛和阿尔及利亚客人的谈话中可以看出，他把中国的垮掉

---

* 毛令人惊讶的词《沁园春·雪》写于长征胜利后。1964年第一次在中国公开发表，毛在词的最后写道：“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他把对过去的羡慕和对现实的把握联系在一起。[22]该词首次发表时间参见本书220页。——校注

和自己的垮掉相提并论。事实上，他已很难把中国的命运和自己的命运分割开来。他已接受作为一个人的毛泽东将会死去这一事实，但他不能接受中国在他死后偏离毛主义的道路。他对几个军队的领导人说："每个人都应该选好接班人。"[27]

和邓小平相反，毛的面部没有随时间的流逝而越发生气勃发，他已是面如满月，找不到皱纹，表情已不那么丰富，眼睛也变得更加深不可测，发型则依然如故。

1964—1965年间，毛与客人交谈时不时有护士进进出出。帕金森氏综合症引起的震颤、僵硬和动作不协调一直困扰着他。然而，他并不十分注意自己的健康状况。

毛抽用弗吉尼亚烟草生产的"中华"牌香烟，而且抽得很凶，与斯诺在一起的一晚上就抽了十二支。他的手指发黄，牙齿变黑。他喝少量的中国葡萄酒，不象正经喝酒的人那样不停地喝，只是偶尔啜上一口。

他同他的医生有一个君子协定："我发烧时请你，我不发烧时不找你，你也不找我。"[28]

由于轻视一切专家，毛把自己的医生看成好象是清洁女工。他曾说："我对医生的话只听一半，要他一半听我的。"

毛还和以前差不多，在豪华的地方过着简朴的生活。[29]

他不喜欢在房间里摆设鲜花或其他装饰品。[30] 他总是吃那几样辣味十足的湖南菜。无论是和江青一起吃饭，还是跟外国首脑共进晚餐，美餐之后他都要咕噜咕噜大口地喝汤，还会打着饱嗝。

毛在中南海边上的住处确是富丽堂皇，他就住在这座名为"香妃后宫"的宅院，他自己有一个游泳池。

毛在六十年代的工资是每月四百三十元，[31] 只是工厂里高级技术人员工资的两倍。毛不喜欢买贵重的东西，不过，无论他需

要什么，党都会使其满足。因而不能从表面上来理解他在1964年说的一句牢骚话："我需要秘书，可是又雇不起。"

尽管毛的地位看上去已脱离了任何凡世的官职，但人们仍称他"毛主席"。这与"周总理"和"林国防部长"的称谓含义不同。为什么老是用这么一个乏味的称谓呢？

确实，红色中国不知该怎样加衔于毛，但它知道不能给他加上什么。毛是一位将军，但党指挥枪的原则使他不喜欢俗气的军衔。他极象是一位皇帝，但外观绝对忌讳用这两个字。

于是，"主席"的头衔便意味着，毛头顶不乏城市会议严肃性的民主桂冠，占据着在几千年的中国历史上历来由上天指定凡世统治者人选的职位，恰似一位半人半神的被崇敬者不伦不类地端坐于现代议会的首席。*

和许多老年人一样，毛变得迟钝而且主观。他开始不自觉地高声谈论来访者的外表形象了："都很年轻嘛！""个头很高嘛！""她准有七十多岁了！"㉝

毛开始不太喜欢听来访者的恭维。1964年，一位桑给巴尔的来访者对毛说："请允许我向您表示诚挚的敬意。自踏上中国这块土地，我就向往着与您的会面，我实在无法用语言来表达我的激动之情。"

毛瞪了来访者一眼，冷静地问道："你读过马克思、列宁的书吗？"

这位非洲客人变得更加客套起来："您的著作实在叫人爱不释手。"

毛打断他的话说："我写的东西不多。"

客人坚持道："不，您的著作很多。"

---

* "主席"一词的频繁使用，使刘少奇大为不满。这位一国首脑说："他为什么那么喜欢被称作'主席'？'毛主席'、'毛主席'，你听见谁叫过'列宁主席'？"㉜

毛直截了当地说："好了，我们今天就谈到这里吧！"说了声"再见"就走了。

毛总是自己写信，结尾大都注有"凌晨四点""凌晨六点"，这说明通宵达旦地伏案工作。

和他的很多同事不同，毛喜欢读书。就是当着来访者的面，他有时也会翻出一本诗集或一本字典，以用来说明或验证论点。

"解剖麻雀"，[34]是毛最乐于用来解决问题的方法。"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中国的麻雀和外国的麻雀都是如此。"他觉得，研究小事情有利于解决大问题。

毛很少谈及政策，而哲学与工作方法是他最愿触及的主题。

毛不太擅长或者说不喜欢在众人面前讲话。在六十年代他根本就没有讲过。和普通人交谈的日子已经过去，他越来越把自己限制在一个长时期想象的世界里。

在家聚会中，他的话题更是经常涉及自身经历。他谈论自己的早年生活，谈论自己家庭成员，这在中国领导人中不多见。他乐于从自己以往的经验中树立榜样叫别人去效仿。

毛曾对一个年轻的来访者说，当兵半年也就够了。[35]而没有提及他1911年在长沙也只当了半年兵。他用最欣赏的哲学原则对自己作了透彻的解剖："任何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我自己也可以一分为二。我是一个小学教员，（然而）我又信神。"[36]

谈及他的婚姻时，毛似乎确也一分为二。1962年，他的岳母——杨开慧的母亲去世了。他给杨家写了一封信，就象一个女婿履行应尽的职责一样。[37]他写道："葬仪，可以与杨开慧同志我的亲爱的夫人同穴。"令人吃惊的是，他于再婚二十多年后，竟然讲出下面一句话："我们两家同是一家，是一家，不分彼此。"

当谈及遥远的未来时，有人发现他极富挑战性，有人只觉得

离奇。他在1964年的一次会议上自言自语道："一万年以后北京会变成什么样子呢？"[38] 在一次科学会议上，毛引了一句令人费解的诗句作为结束语（"嫦娥不嫁谁留？"）。

毛在1964年的一次情况汇报会上说："请问，马克思年轻的时候，读过马克思主义著作吗？"[39]

或许有人会同意他接着提出的看法："讲哲学不要超过一小时，讲半小时以内，讲多了就糊涂了。"

"有哪一个大国曾被一个制定政策脱离社会现实基础，沉迷于永恒事物，而且具有猴性精灵的人统治过呢？"

难道毛真的已割断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吗？确实如此。但要了解毛的思想变化过程，我们有必要先探讨一下马克思主义在概念上的内在矛盾。

毛意外地找到了一种方法，它既能解释中国过去的倒退，又能解释震撼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新生力量。历史能倒退也能前进。

在过去的几年中，难道他没能有效地抵制新生资产阶级吗？事实上，早在1962年他就开始对这一惊人的情况有所作为。

多年来，毛对阶级斗争持一种微妙的，用马克思主义标准来衡量是十分温和的观点。他坚持不能混淆对抗性矛盾（敌我矛盾）和非对抗性矛盾（人民内部矛盾）。在延安时，他就指责过28个布尔什维克不应把人民内部矛盾上升为敌我矛盾。[40]

五十年代，他还不愿把持不同政见者列为"阶级敌人"。反对高岗在东北搞"独立王国"时，他也没有把高岗标为阶级敌人。

到了1957年10月前后，毛还一度有过这样的观点：随着社会主义政权的进一步巩固，阶级斗争将逐步消亡。[41]

然而，彭德怀事件发生后，一切都变了。毛修改了他关于阶级斗争的定义。他开始到处滥用"阶级"这个名词，并开始相信，阶级斗争变得越来越尖锐了。

毛这次思想观念的转变，使他在以后的岁月中完全成了另外一个人。*

不久，他就开始根据人的态度来划分阶级界限，“重要的是区分一个人的阶级出身和他本人的表现，重在表现。”㊸

毛常说的95%的干部都是好的，也被说成是一个阶级分析的观点，尽管它只不过是一个算术观点。可笑的是，派别也被说成是一个阶级的一翼，据说资产阶级就在党内。

毛还有一个“理论”依据支撑他正在建造的怪诞的理论大厦，那就是，国内的新敌人正在和国外的新敌人联合起来。

“修正主义”是毛给莫斯科的斯大林的继承人下的定义。“右倾机会主义”是针对彭德怀而言的。毛认为，它们只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他在1962年的一次中央委员会上说：“看来，给中国的右倾机会主义改个名字，叫中国的修正主义，更好。”㊹

把修正主义和阶级敌人联系起来始于1964年。毛在一则批注中写道：“修正主义上台也就是资产阶级上台，这是令人痛心的事实。”㊺

毛的这一新思想象一团古怪而又致命的迷雾，笼罩了北京的政治舞台。毛的同事们被他的阶级斗争激化论吓得目瞪口呆。但如果这仅仅是提法问题，人们尚可听之任之。

1962年秋，毛在避暑胜地北戴河召开的一次会议上指出：“好人犯错误同走资本主义道路是有很大区别的。”㊻这一区分至关重要，但却令人恼怒、捉摸不透。没有人感到有必要弄清它的确切含意。

毛在1963年写的一首词㊼完全是他当时情绪的透现。这首

* “划清阶级界限是为了清除坏分子。”这句话可能是1964年说的，毛这时正处在偏离马克思主义观点的关键时刻。清除坏分子这一政治使命使划清阶级界限成了附属物。㊷

词原是与一位在政府中任职的知识分子的唱和，同时反映了毛内心中对他的同事及对莫斯科的感受和评估。

他感到他的敌人只不过是一群苍蝇。

小小寰球，
有几个苍蝇碰壁。
嗡嗡叫，
几声凄厉，
几声抽泣。
蚂蚁缘槐夸大国，
蚍蜉撼树谈何易。

他要尽快摆脱这种境地，上苍会不会助他一臂之力以完成这一使命呢？

多少事，
从来急；
天地转，
光阴迫。
一万年太久，
只争朝夕。
四海翻腾云水怒，
五洲震荡风雷激。
要扫除一切害人虫，
全无敌。

刘和邓是这首词攻击的主要对象。如果说这首极富挑战性的词没给这两位不懂诗词格律的同事带来震惊，那是不可能的。

一天，毛把他的侄子叫来谈话[48]："看来你好象是属于左派，"毛远新*当时正在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学习，"什么叫先进你知道吗？"毛继续说，并讲出了它的定义，"先进就是要作落后人的工作。"这是六十年代中期毛的自我形象的总结。

毛觉得大多数同事都已落伍，他应责无旁贷地承担起教育他们的工作，还应该在某些方面给予扭转，以保证共产主义目标的实现。

毛简明扼要地指出："我们必须有严格的秩序，必须有一个秦始皇。秦始皇是谁呢？就是刘少奇。我是他的附臣。"[49]毛这话是发自心底吗？如果是真心话，他这个"附臣"比"皇帝"的权力还大；如果不是真心话，那么当时毛已看到刘的影响在逐渐地超过他。

毛又抖擞起精神来，或许他还没有控制整个航船，但他是一个在甲板下面的积极活动者。这年仲夏，他畅游了十三陵水库，显得很是得意。

这位怀疑一切的圣人正在祈求一个使全民族再生的节日。

这位久呆的人物将以半人半神的形象登上政坛亮相。

这位喜欢用永恒的思索来迷惑来访者的领袖，正在考虑用马基雅维里式的手腕，使中国跻身于世界三大强国之列。

这位愠怒的政治家发现刘少奇正在成为秦始皇式的政治强人时，准备马上把他扫入历史的垃圾堆。

---

* 毛泽民的儿子，是毛泽民夫妇四十年代初在新疆的监狱中所生。不久，泽民被反共当局杀害于乌鲁木齐。在北京外国语学院读书的王海蓉是毛远新的姐姐。

乌托邦的愤怒（1965-1969）

安得烈·马尔罗拜会了毛。① 这位法国文化部长是来访问刘少奇的，他要把戴高乐的一封信交给这位中国政府首脑，但那天下午会见时的情形却大出他所料。

马尔罗被领进人民大会堂的一个大厅，他看到墙上并没有张贴绘有高炉和拖拉机的宣传画，而是装饰着传统的中国书画。马尔罗一眼就认出了刘的"长脸"，并走上去握手致意。刘的身边簇拥着一群部长。

毛站在他们的附近，这场景就象一位杂技教练和他的队员们。

马尔罗向刘致意后把戴高乐的信递了过去，可刘没有说什么。是毛首先与他及他的同伴——法国驻华大使最先交谈起来的。"我听说你们去了延安，印象如何？"整个儿下午，刘都没有机会插进一句话。

毛低语道："我将单独和群众站在一起——等着吧。"仿佛刘和其他与会的人都不是毛的同

事，只是一群缄默的证人。

在1965年夏天的这次谈话中，毛时断时续，转弯抹角，态度悲观。同时，他又给人一种莫测的神秘感。

在马尔罗看来，毛象一个威严的皇帝，死板而盛气凌人，就象传说中刚从古墓里走出的巨神。

当谈及法国脱离美国控制及中国离开苏联阵营时，马尔罗无意中用了“联盟”这个词。在此之前，毛一直没有说话，右手始终是在嘴边和烟灰缸之间来回。此时，他突然将双手举向空中又猛然放下，用略带讥讽的语调说：“我——们的同盟，你——们的……我——们的。”

这位来自巴黎的自由主义者并没有得到关于中国现状的乐观描述。毛指出：“我们的工农业问题都没有得到解决，作家总是反对马克思主义。”

法国大使试图给毛的诊断注入一些希望，他接着话茬说，中国的青年对您制订的路线是坚信不疑的。

“您来中国多长时间啦？”毛反问。

这位自持有据的使者用他最近的中国南方之行证实他对中国形势的乐观看法。

毛又说：“你看到的只是一面，你没有注意到另一面。”

这位法国贵族对毛的鼓励就此停住，因为，毛对当时形势的不满不亚于二十年代他曾表示出的恼怒。

毛想起柯西金在苏共二十三大上所讲的话：“共产主义意味着生活水平的提高。”毛毫不掩饰他对这句话的憎恶：“那么游泳是为了穿上游泳裤。”难道世界上的马克思主义者都没有看到权力终究会被剥夺吗？

毛最后对法国客人说：“我们的革命不能只是单纯地巩固已有的胜利果实。”

令人不解的是，那天下午刘始终一言未发。

这就是1965年冬天到来之际毛的思想主调。这个失意人身上的那种趾高气扬精神又在回复。

他离开北京，重访了井冈山。离别三十八年后，毛在山上写了一首词抒发当时的心情。[2] 开始两句道出了他不满的呐喊。

久有凌云志，
重上井冈山。

在《重上井冈山》中也寄托了冒险的向往：

可上九天揽月，
可下五洋捉鳖。

毛仍感受到凡事都取决于英雄的意志。

世上无难事，
只要肯登攀。

毛在一次党内会议上说："现在几盒香烟就能收买一个党支部书记，如果把女儿嫁给一个干部，那就要什么有什么。"[3] 不管毛抱有多大的希望，但他并没有把希望寄托于中国共产党。

"我们党内至少有两派，" 毛挑明了这一点，"社会主义派和资本主义派。"[4]

直接的阻力来自刘少奇，他和他的会讲英语的贵族妻子住在与毛毗邻的漂亮房子里。对中国人民来说，刘当时是一位非常了不起的人物，他在党内的地位也和毛相差无几。

刘于1921年在安源遇见毛之前就已是一个革命者，现在又似

乎成了中国革命的主宰。

刘写的小册子《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仅在1962年至1966年间就售出一千五百万册，超出当时任何一种毛的著作的销售量。六十年代中期的社论都强调干部要学习毛和刘的著作。

毛曾跟其他人，甚至对外国人也讲过刘将成为他的接班人。⑤

毛对刘的不满始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开展这一运动是为了提高农民的政治觉悟。为了与他在1962年提出的激进思想相一致，毛写了《十条》草案，阶级斗争是它的主题。⑥

刘认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只不过是一种乏味的形式，象上次由党英明领导下的反腐败、反官僚主义的运动一样。*

《十条》第三修改稿下发后，一些基层干部开始怀疑这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毛和刘之间踢的政治足球，毛认为第三稿是形左实右。

1965年初，毛又制定新的社教文件，将原来的《十条》扩充为《二十三条》，并十分明显地指责了刘："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毛最后强调，“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有在幕前的，有在幕后的。”⑧

刘不接受《二十三条》，毛决定搞掉刘。⑨

林彪看起来并不象统帅世界上最大军队的将军，反倒象一个童子军。他个头比毛矮，鼻子要比一般中国人的大一号，说话的声音又细又尖，总是用一顶军帽盖住他的秃头，军装穿在他身上就象挂在衣架上似的。他虽然只有57岁，但体弱多病，在公共场合显得貌不惊人。

然而，护送毛步入即将来临的风暴的人，却正是林彪。

林彪已于1959年从被打倒的彭德怀手里接过国防部长职

---

* 毛和刘在总结大跃进的错误上有明显的分歧。刘说，大跃进的失败是七分人祸，三分天灾。毛指出刘正好把百分比说颠倒了，是七分天灾，三分人祸。⑦

务。如果说彭曾是跟在毛脚后跟的猛将，那么林彪则似猫一样的狡诈讨得毛的欢心。

林不象彭那样反对与苏联决裂，林乐于把政治思想工作置于军队其它工作之上，而彭却不同意。林不敢和毛平起平坐，而彭却因为与毛抗争而被罢官。

彭和林之间的不和倒是在其次，重要的是，1959年危机过后，毛对党作出了暗淡的总结。庐山上丢掉的是党的威信，从那以后，党成了一台受人操纵的机器，而不再是一个超出任何人之上的充满战斗力的集体。

毛逐渐地把自己的威信与共产党的威信割裂开来。

林领导下的解放军起到了令人震惊的作用。六十年代早期，当毛被党内的一些官僚视为"亡人"的时候，军队却把毛尊奉为活着的凯撒。林彪成了中国的克伦威尔，他统帅的解放军就是东方的"新模范军"。

林要他的军队成为一所"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军官们也组织起来歌唱毛泽东思想，歌唱四个第一。* 从1962年起，《解放军报》就开始在头版右上方用大号字体刊载毛的语录。

《毛主席语录》首先由解放军出版社出版。1965年后的所有版本都印有林彪写的前言："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

在毛的心里，林彪已取代了刘的位置。在林看来，毛是他走向未来的大路，而刘却是难以超越的路障。

表面上很平静，但一场新的权力之争正在酝酿。

在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人们不习惯讲"毛主义"或"毛主义者"。当中国共产党坚持集体领导时，每个党员在很大程度上都是毛主义者。毛主义就是中国的共产主义道路。

---

* 这是林彪提出的口号，后来成了文化大革命的主题：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活的思想第一。

现在情况不同了。毛的追随者从五十年代的几乎所有人减至六十年代的一部分人。在分裂的党中，他只能属于一个极小的团体。

但是，他确实有一个坚实的团体，是军绿的。于是毛在全国发起了“向解放军学习”的运动。

中国究竟要从解放军那里学习什么？人们感到奇怪。林彪在上海对一伙人说：“江青同志昨天和我谈了话，她在政治上很强，在文艺上也是内行。”[10]

多年来，江青的身体一直不太好，性情也变得很暴躁。她大部分时间都呆在家里照看两个女儿，毛很少和她在一起。“一个很少讲话的人。”[11] 这就是江青和毛在一起时对他的感受。

但是她的本行——文艺——是毛为正在准备的战斗选定的武器。因此，在受到很长时间的排挤之后，江青带着极大的不满，冲进了文艺界。

不久，战士们在她的指挥下唱歌、跳舞，她要给中国文艺界戴上紧箍咒的可怕行动开始了。

毛很支持她。由于不再相信自己的中国共产党，他转而象一位明朝皇帝，搞起了宫廷政治。他开始转向利用侍从和家庭，以更多地得到个人支持。

不久，他的女儿李讷就成了《解放军报》的一名负责人，另一个女儿李敏则在国防科工委掌权（这是一个负责研制核武器的单位）。

毛于1965年秋离开北京到上海，江青随行。两人下榻于原来的法国俱乐部，一呆就是几个月。毛还不时地到他在杭州西湖边上的别墅小住。

这是自毛1949年进京以来，离开首都时间最长的一次。毛离开他感到窒息的北京六个月，中国人有五个月没有听到他的任何消息。

离开北京是他的又一次退却，为了准备回去后进行较量，毛到上海是要招募一些年轻的知识分子做为政治工具。

一天，上海《文汇报》刊载了一篇剧评，上海帮的成员在打开11月10日的报纸后，至少认为这是一篇很有份量的剧评。

这篇文章为一次令人震惊的战斗打响了第一枪，这是马克思主义政府内部自相残杀的开始。

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只有在中国，才能出现这种现实生活中的政治剧和剧场的戏剧同时开演的情况。

这篇剧评的作者是姚文元，44岁，一位随笔作者，有一张圆脸和一双狡黠的眼睛。他的剧评只不过是一些陈词滥调，因为他所批判的是北京市副市长1961年写的《海瑞罢官》。

吴晗用剧本反对毛罢免彭德怀的国防部长职务，毛在四年前就已看出了它的寓意，他现在觉得可以反击了。

只有毛才会对吴晗的剧本大做文章，因为剧本是冲着他来的。当他对来访的阿尔巴尼亚客人讲，文化大革命始于《文汇报》的一篇文章时，毛实际上已承认自己在中国政治斗争中的主宰作用。[12]

然而，毛发动"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确实也有正确的、甚至是高尚的动机。他对马尔罗说，农民的生活那样悲惨，他们吃树皮，但他们是比上海油嘴滑舌的司机更强的战斗者。他担心1949年以后出生的三亿青年人，认为他们可能软弱一些，他们必须在战斗中锤炼自己。

毛重申了他的人的因素胜于一切的信条。"我们把重点是放在人身上，还是放在物身上，或二者平行看待?"[13]他在谈到劳动改造时说。这是中国传统中一直被关注的问题。毛的回答带有浓厚的儒家思想痕迹："如果我们把人的工作做好了，其他一切都好办了。"毛试图在中国革命浮动的沙土上脱离经济基础，重建一种高尚的社会关系。

毛非常相信净化和吐故纳新。他在一次党的会议上叫道："有屎拉出来，有屁放出来，肚子就舒服了。"⑭ 和以前一样，是自然赐给了他满意的思想模式。

"农民不是一年要除几次草吗？草除掉后还可以作肥料。"⑮ 这句话的含意听起来令人毛骨悚然。此时，毛已成竹在胸。

他是在寻求毛泽东的永生，同时也是为了中国革命的长存。

毛把第一枪打向《海瑞罢官》，这不单是为了治愈被伤害了的虚荣心。象任何中国领导人一样，他十分清楚文学对一个政权的巩固、削弱或合法化起着重要作用。

毛自己是半个知识分子，他并不怎么信任知识分子，但又为之倾倒。毛在1964年中期对一些搞经济规划的干部说，在苏联，新的特权阶层首先产生于文学艺术界。他开始相信这一点。

"北京要这么多文艺团体干什么？"他生气地说道，"他们根本无事可做。"他还说，节日期间，总是部队的节目最好，其次是地方，北京的最差。"⑯

他在苏联问题上的困扰，他的沙文主义，他对长生的渴望都一股脑儿地在那群经济规划者面前倒了出来，"你们的这个协会，那个组织，都是从苏联搬过来的，被一群洋人和死人统治着……。"

如果毛对北京的文化部门极为不满，那么他的目的是想钓大鱼。他抨击北京市副市长，也希望能把几滴指责的血溅到市长身上。

彭真是一个阅历丰富并颇有影响的人物。在某些人眼里，他有可能成为毛的接班人。他的有条不紊的城市建设使北京成了一座新型的城市。但在毛看来，北京变得既缺少人情味，又妄自尊大，就象美国南方人眼中的华盛顿特区一样。

近几年来，毛从不看《人民日报》，却偏爱军队的报纸《解放

军报》。

毛讽刺北京科学院在很大程度上成了"不食人间烟火的仙境。"[17]他厌恶地说，"文物工作者"认真研读的那些杂志，他自己无法忍受，而北京市市长却认为，科学院的研究工作是将来工作发展所必须的。

彭真则讥讽江青组织排练的几台平庸的为政治服务的"样板戏"就象"穿开裆裤的孩子一样不成熟。"[18]

两种观点即将发生冲突。

毛用蟹一样的技巧给彭真及北京的一些知名人士施加压力。他指派包括市长在内的一些人来指导他早已标定了的文化大革命。然而，这场运动除了将导致一场战争之外，不会有其他结果。

这位市长竭力地想把姚的文章限制在学术争论范围内，而毛已决意发动一场意义深远的政治变革。文化大革命的第一次浪潮是冲击那些躲进新中国胜利大厦、不再继续革命的官员。对于这，毛当然心中有数。

1966年春天，毛在上海这个制高点上观察这场战争的进度。

毛会见了美国左派老战士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并和她的一些朋友一起庆祝她的八十寿辰。[19]那天毛刚刚为姚文元修改好他给《文汇报》写的文章的第十一稿，在那个清爽的早晨，毛的情绪显得既镇静又自负。

毛和江青并排走进了上海宾馆的接待室。他仔细地观赏墙上的一幅竹雕，完全被它吸引，仿佛只有他一人站在那里，连自己的妻子都忘了。他移到第二幅作品前，然后又走向第三幅。满屋子里的客人都一声不吭地站着，等他开腔，或是走向已经备好的午餐桌前。

毛点燃了一支香烟，并对周围的人说医生让他戒烟。他慢吞吞地告诉大家，他从未想过戒烟。他还请在场的会吸烟的人都同他一起吸，有些人按着他说的办了。

过了一会儿，他发现不吸烟的占多数，就对吸烟者说："不要担心我们是少数，放心大胆地抽好啦。"

斯特朗是一位极力反对越南战争的美国人。然而，毛却一字未提越南战争，他谈到的所有国际问题都指向苏联。

毛询问斯特朗的六位朋友对国际形势的看法，他们的回答都不合毛的口味，因为他认为，六个人的观点如出一辙。

毛后来说，他们似乎是事先排练过，如果有一点不同见解，可能会更有意思些。

使谈话变得僵硬的真正原因是，毛的左派来访者只是反对华盛顿，而毛同时还反对莫斯科。*

毛对国际关系作了重新分析，在理论上他把苏联和美国置于同一水准，都是中国的阶级敌人。这是一个十分混乱的分析，随意混淆了民族因素和阶级因素，又武断地把苏联划归为资本主义。然而，这一看法贯穿着一条新的外交路线。

毛同时声讨两个超级大国的口号受到大多数政治局委员的反对。

北京的每个领导人都清楚，美国对中国存在着威胁。毛并不否认这一点。但他又坚持认为，当中国遇到危险的时候，苏联是不会帮忙的，而刘和许多军队领导人仍相信，面对美国的威胁，北京还有与莫斯科"联合行动"的可能性。

1965年初，在越南问题的压力下，毛会见了从河内访问回国的柯西金。当时毛对苏联满口嘲讽，他在柯西金飞抵北京前就

---

* 1964至1965年间，毛对美国的敌意迅速减弱。一个法国人在1964年9月和毛谈了几个小时，后来回忆说："他对美国根深蒂固的敌意溢于言表。"[20]

已放弃了“联合行动”。

毛戏剧性地向这位苏联人提出了一个无法争辩的问题。如果美国把越南战争升级，进而攻打中国，苏联是否会出兵援助中国？

柯西金非但没有回答，连哼都没有哼一声。*㉑

毛以令人难以置信的坦率向柯西金承认，他的“一些”同事在对待苏联问题上和他的意见不一致。㉓

罗瑞卿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总参谋长，他反对毛把苏联和美国等同起来。他认为毛偏离了马克思主义传统，也背离了起码的军事常识。罗热情地谈论苏联红军，并对社会主义阵营抱有希望。他指出，为了越南的利益，应进行“联合行动”。

毛通过使用一系列严厉措施除掉了罗。罗从六层楼上跳下去。**他是文化大革命中第一个遇害的高级领导人。

打倒罗之后，毛越发地树立林彪。因为1965年林与罗在军事政治路线上有过分歧。

林彪决不会象罗那样因固执而被罢官，罗尊重苏联，相信社会主义同盟，亲欧，在越南问题上态度强硬。而林的路线完全忠实于毛在六十年代中期对国际问题的看法。

毛和林把全球形势看作是中国革命在更大范围的重演。农村（第三世界）终有一天会包围城市（西方及苏联），就象毛的农民革命者包围上海、北京一样。

国际政治已成了游击战争的一部分。

这看起来是穷兵黩武的姿态，其实不是。与刘和罗的“联合行动”路线相比，毛和林的路线有一点鸽派倾向：

---

* 柯西金的不做声可能会使毛想起1941年9月的一件事，当时，苏联官员追问毛，如果日本进攻苏联，中共是否会采取军事行动帮助苏联，毛则顾左右而言他。㉒

** 罗的自杀没有成功。不久，红卫兵开始对这位杰出的军官进行严刑拷打。罗拖着裹着厚厚的绷带的伤残了的左腿，一步步挪向工人体育馆，去接受二万名红卫兵的“审判”。

•人民解放军不得出国境。

•只有当敌人入侵中国领土时，中国才给予反击。

•中国不是反帝力量的前哨，整个第三世界才是（特别是正处于战争中的越南）。

毛、林路线带有民族主义的色彩。在苏联阵营中，中国只能屈居第二。但做为第三世界的代言人，中国就成了某种意义上的第一，同时又甩掉了联盟关系的包袱。

如果作为社会主义阵营的一员，中国人就难免接受欧洲中心论的观点，接受社会主义是土豆烧牛肉的共产主义观点。但是，现在他们可在自己的旗帜指引下向前了：

•革命的关键力量是农民，而不是产业工人的共产党。

•改变世界的方法应是武装斗争，而不是议会道路。

•未来是属于黄色和棕色的，而不是白色的。

•第三世界的大多数国家应该借鉴的是中国革命的经验，而不是苏联的。

与此同时，美国的炸弹正在投向离中国边境不远的南部城市，而毛却显得出奇的镇静。这使美国人都感到奇怪；似乎受到美国鬼怪式轰炸机威胁的不是中国，而是墨西哥。

他清除了政治局内的很多鹰派人物，包括那些赞成在美军打开中国大门之前就出兵越南、会战美国佬的一些高级领导人。

越南战争的结果没有改变毛的战略观点。在六十年代中期他就提出苏联的威胁在上升，而美国的威胁在减退。*美国在印度支

---

* 毛后来向斯密特总理评论了美国在越南的表现，听起来令人震惊。他对这位德国领导人说："如果美国在丢掉五万士兵后就放弃越南的话，那么它就谈不上强大。"[24]

那稻田里的失败为他的理论提供了仍然有效的说明。

1965年秋天去上海时，毛写了一首措辞锋利的词——《鸟儿问答》。[25]一只鹍鹏和一只鹦雀发现它们正置身于战火之中。鹦雀被吓呆了：

"怎么得了，
哎呀我要飞跃。"

而鹍鹏却有着不同的气质。它怀疑地问询在哪里可找到藏身的地方。

鹦雀念念不忘"仙山琼阁"。在毛看来，这种容易上当的小鸟是在骗局中寻找安乐窝，轻信"禁止核试验条约"及克里姆林宫的土豆烧牛肉式的共产主义。

不见前年秋月朗，
订了三家条约。
还有吃的，
土豆烧熟了，
再加牛肉。

鹍鹏最后说道：

不须放屁，
试看天地翻覆。

毫无疑问，这首词是用来反对苏联的，但它也道出了事物格局的变化和更迭。这一长期以来所持的哲学观点——而不是简单

的战略总结——引导着毛制定新的外交路线。

日本共产党的领导人宫本显治于1966年初到中国和毛进行了一次诚恳的会谈。㉖

日本共产党是毛主义者，在谈及莫斯科时，他们也用“修正主义”这一代名词。然而，他们担心美国会扩大在亚洲的战争，所以就游说中国、越南和朝鲜，并讨论和苏联的“联合行动”，毛的一些同事对此也十分热心。

在北京，来访的日本人和一些重要的中国领导人签署了一个公报，用以实现“联合行动”的目标。毛此时远在广州，这是为了避开上海的三月天气。他发出指令说要在来访的日本共产党人离开中国去香港时会见他们，而这对北京的一些人可能是不祥之兆。

毛当时住在一个安静的温泉疗养所，紧挨着广州郊外的一个山地军事基地。当时，就是山上的竹子听到毛对宫本显治说的话也会被震惊。

还没等这位日本人鞠躬完毕，毛就开始了他的长篇激烈演说。他首先指责了公报草案，并对邓小平及其他赶来参加会见的高级领导人发怒道：“你们这些软骨头。”这位来游说的日本人被这场景给吓呆了。

毛希望公报能号召组成一个统一的战线，共同反对“美帝”和“苏修”，日本人不同意。毛于是说，你们在北京制定的公报草案内容空空，毫无价值。公报终归作废。

毛还敦促日本共产党把武装交给日本人民，准备打一场“人民战争”，意在疏远和日本共产党的关系。

这一令人难堪的会见结束了中共和日共之间的亲密关系。

这件事也引发了毛对北京异己分子的新攻击。日本共产党的代表团离开不久，他就罢免了北京市市长彭真。

毛大笔一挥，在自己的政敌名单上添加了一些人的名字，尤

其是他与邓之间的距离开始拉大。

离开北京期间，毛又重读了《西游记》。这本书的主人公是红屁股的孙猴子，它创立了许多伟大的功绩。

孙悟空在玉帝的御花园内偷吃了长生不老的仙桃，为了在生死簿上抹掉他的名字，他敲开了地狱的大门。他一个筋斗就翻出十万八千里，到达天边的擎天柱上。有一次，他还在柱子上撒了一泡尿以示他的自由精神。

敢于和命运挑战的孙猴王有一个应付困境的法术。他从身上拔下一撮毛（中文的“毛”字恰好是毛的姓），将毛咬碎、吐出，然后再说声“变”，每一根毛都变成一个小“孙悟空”，由此就有了很多的支持者。

毛在1966年3月对政治局的一位同事说：“打倒阎王，解放小鬼。”“各地都要有孙悟空大闹天宫。”[27]

毛——以及北京——在年底之前就变出了这些小“孙悟空”们。

毛在早年总是将猴子当做反面形象来用的，例如，将其比作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法西斯分子。但到了五十年代末，他又把它当成了正面人物形象。美猴王孙悟空的大胆、顽皮、傲视一切和伟大的抱负正适合毛的心态。

1966年，毛宣称革命者和美猴王属同一类型，把这一充满想象的思想推向了高潮。

到1966年中期，毛已准备好在公开场合露面了。

毛接见了忠实的阿尔巴尼亚总理，想以此让中国知道他还活着，但并不想暴露行踪。然后，他又想显示一下自己的身体活力，于是来到武汉，在电视摄像机前畅游了长江。

《人民日报》报道，毛用六十五分钟游完了十五公里，没有丝毫疲劳的迹象（或许是受美猴王的精神所鼓舞）。[28]

毛回到北京，接见了现实生活中的“小鬼”，并亲手写了一张大字报，号召全国人民都来造反。

于是，文化大革命真正开始了。

毛在思考中国的未来时说：“我们需要一批立场坚定的青年人来接替我们的工作，他们文化程度不怎么高，意志坚强，有政治经验。”[29]

他自己的经历就是他思想的指南。他说：“我们开始闹革命时也不过是二十多岁的小娃娃。”[30]

文化大革命把这一思想付诸实施。据说年轻人不受旧传统的影响，他们所受的全是新中国的教育，没有被中国以外的世界所影响。他们是地道的新中国的产品，难道他们不拥有“更多的真理吗”！

从这种意义上讲，文化大革命是要实现“百花齐放”没有做到的事情，那就是使道德行为更具体化。

从另一方面看，文化大革命是毛对他以前的各种尝试的告别。毛希望青年们要获得的“政治经验”，将要从反对党的斗争中得到。

这场赌博亦源之于1956年至1957年的震动。当时，毛对已确立的马列主义学说失去了信仰，自那以后，真理和党的威信在他的思想中被分开了。所以，他在1966年就得出了结论，认为真理可以建立在反对党的权威之上。

大跃进时，毛相信党就是一种工具；文化大革命时，他失去了这种信仰，他号召红小鬼去攻击党。

毛强调“造反有理”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他放手发动红卫兵去“砸烂旧世界”。

红卫兵起初攻击的目标是文化领域。他们砸庙宇，抄知识分子、资本家和地主的家，意在寻出一些“资产阶级”或是“修正

主义”的东西来。

太阳镜首先在查禁之列，国际象棋因和苏联人关系密切而被列为第二项。除了马克思主义著作外，其余几乎所有的书都在查禁之列。烧书时燃起的熊熊烈火看上去很是壮观。*

如果说红卫兵象笃信宗教的狂热者，那么是毛亲手播下了恰当的教义。他的思想路线乃是千百年来基督徒们所信奉的箴言：“为爱上帝，从心所欲。”

只要一个人的心正，他的善行就会象顺坡而下的小溪那样自然地流淌。

毛在1966年对马克思主义作了同样的歪曲。他把“造反”置于中心，而新教主义者是将“爱”放在中心。毛在1966年至1967年之间相信，如果年轻人有造反精神，自然就会做出对中国有好处的举动。

这是一种由愚蠢的理论导出的愚蠢的实践。

红卫兵在造反中得到自我满足自有其原因。他们是被忽视的一代，突然有了一种被人发现的意识。他们上了高中，但被撩拨起来的希望不能得到满足，既没有大学可进，也没有城市工作在等待他们。

这一代人从未有机会无拘无束地生活，现在可以好好地发泄一下了。高中的学生，就是把资本主义摆在面前，他们也不一定认得出来，却指责那些和资本主义战斗了几十年的老革命者是资本主义的黑爪牙。

一群红卫兵在半夜冲进彭真的家里，打开了他卧室里的灯，命令这位北京市市长下床接受批判。这些年轻的狂热者们在一个报告中写道：“彭真吓得脸色蜡黄，甚至连衣服都穿不好。”㉜

毛请他的老同志朱德写几篇文章支持文化大革命，后来又要

---

* 埃德加·斯诺的书也在南京大学被焚烧。㉛

求朱因没有支持文化大革命而写一篇自我批评。这两个要求都遭到朱的拒绝。[33]

不久，朱德就被称作是"混进党内的大军阀，大野心家"。[34]毛正在失去并肩战斗几十年的战友。*

就象信徒们对待先知一样，红卫兵已完全属于毛，很多人都是真诚地献身。但是，一个17岁的中学生是很难理解毛对文化大革命的意图的。对他或她来说，批斗那些"坏分子"是一件令人振奋的事，乘特别列车到北京见毛主席并"参加革命"，使他们树立了自信心。

鹦鹉学舌式的模仿行为远远超出了原话的含义。

一个后来偷渡到香港的广东青年回忆说："中央老是敦促我们带上毛主席语录，一有时间就学习。但我们却带着扑克牌，一有时间就玩。"[36]

毛似乎忘记了动机庞杂、多变的学生政治意识和管理一个有七亿人口的国家的政治领袖意识的区别。**

笔和枪是毛毕生所用的工具，加强防卫的部队刚被调到北京，他就回到了首都。到家之后，他又拿起了笔。

他以《炮打司令部》为题写了一张大字报。他写道，据说文

---

* 毛有时也似乎认识到了他已在党内被孤立。他在1967年早些时候对造访的阿尔巴尼亚的客人说："有人说中国酷爱和平，那是吹牛。实际上中国人是好斗的。"后来他觉得应加上一句："我就好斗。"[35]

** 尽管红卫兵们觉得对毛泽东思想掌握的有限，但他们还是被农民对毛泽东思想的无知所惊呆。

一个红卫兵谈起了他在福建山区与一个农妇的对话："我问她天上有什么？她说，毛主席在天上，他每时每刻地看着所有的人。他会知道谁不好好工作并惩处那些懒汉。这一点可能是源自毛的'警惕阶级敌人'的号召。"

那位红卫兵接着说："我问她除中国之外世界上还有没有别的国家，她摇了摇头。我问她是否知道地球是圆的，她摇了摇头。"这位毛的新世界的使者最后说，"到最后，我也只好和她一起摇头。"

在中国的农村建立一个新社会不是容易的事。[37]

化大革命的阻力在中央，所以必须攻破中央，他把大字报拿到中央委员会办公大楼并把它挂在里面的门上。*

毛的这一举动引起很大反响。大字报象雨后春笋般地在全国范围内大量出现。

大字报贴在墙上，钉在树上，悬挂在石狮子上。空白处都贴满之后，就摊在路上。整个北京看上去就象一个巨大的广告牌。

中国成了前所未有的新闻的乐园。

成千上万的人围拢在一起，阅读着写在白纸、黄纸和粉红纸上的消息。对普通人来说只是看热闹而已。毛被一些人成天地赞颂，而其内容都是言过其实的奉承。

最后，大字报的内容越来越粗俗和混乱不堪，尽是些没完没了的无谓争斗，它们已丧失了自身的意义。一些小孩为了挣几分钱，把掉下来的大字报捡起，卖给人家作燃料用。[38]

毛又写了一张大字报。[39]它一半象诗，一半象政治宣言，其中掺杂着浪漫主义和挑战的色彩。

结果是更多的帽子在飞，更多的棍子在打人，而阳光和鲜花却很难见到。

开始，红卫兵写大字报只是批判所有旧的东西。但到1966年底，毛把更重要的任务交给了"红小鬼"们。他要求把半数政治局委员手中的权夺下来。为了鼓励他们的行动，毛在天安门城楼上先后十次检阅了一千一百万红卫兵。

这些年轻人身着黄军装（那些饱经风霜的老战士该怎样看呢?），带着上面写有"红卫兵"三个字的红袖标，每个人的手中都拿着一本《毛主席语录》。《毛主席语录》在空中舞动时，广场上红光闪耀，就象是红色蝴蝶构成的海洋。

---

* 原文不实。毛的《炮打司令部》是用铅笔写在一张日报的空白处，并未张贴。也仅写过这么一段文字，不是作者在稍后说到的"又写了一张大字报。"——校注

毛身穿军装，戴着镶有红五星的军帽，用以加强军事气氛。一套宽松的绿色制服遮住了他那已成“梨状”的体形。

毛从不在接见的集会上讲话（总是林彪代劳），他只是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向下举手致意，江青站在他的身旁（也是身着军装）。然而，只因见到城楼上的毛，成千上万的人因狂喜而流泪，有的用嘴咬着袖口。人们就象潮水似地起伏涌动。

文化大革命带来了各种各样的自我表现形式，毛用一种不可思议的手段在他的垂暮之年复兴了古老中国的仪式。

这位曾撰写过长篇著作的哲学家却写了一张只有二百字的大字报。

这位曾经能一连讲上几小时，劝说他的追随者赞同他的新政策的领导人，现在却只是对他的崇拜者们挥手致意，脸上的笑容也显得那么呆滞。

这位一贯喜欢学生自己思考的老师，现在似乎很乐于听到学生们对他的敬仰和崇拜之词。而他们说这些奉承话，无异于小学生机械地背诵不完全理解的课文。

在1966年末和1967年的疯狂的日子里，艺术家们作画不是签上自己的名字，当然也不能签其他人的名字，而是写上这样一句奉承的话：“毛主席万岁！”

在这些令人作呕的废话之中，毛每天早晨在镜子里是怎样看自己的呢？1949年，他在《党委会的工作方法》的讲话中，不是要求“制止歌功颂德现象”吗？他甚至不也“禁止用党的领导者的名字作地名、街名和企业的名字”吗？[40]

现在，中国到处摆着他的塑像，他的话成了有魔力的咒文。中国的城市似乎都成了天主教堂，而毛就是教堂里“红色的”圣母玛丽亚。

为什么毛变了呢？因为他在晚年时再也不相信共产党集体的威信了，而他的自我形象也正在向一个传统的中国统治者转

变。

毛曾和斯诺谈论过赫鲁晓夫缺少个人崇拜。他认为，在落后的社会中，即使已推行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制度，个人崇拜也是十分必要的。

林彪推动了毛的个人崇拜，他这样做有他自己的目的。而毛没有制止林，他没有制止的意愿和毅力。

一天，毛在中央委员会办公大楼外面对一群人讲："你们应该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41]他需要进一步的混乱，因为在这幢楼内，他正遭到多数人的反对。

毛的对手们无法公开指责他煽动群众的举动。难道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是革命的政权吗？难道群众不是神圣的主人吗？谁的意愿才是政府的意愿？

刘和邓试图限制红卫兵的活动范围，就象彭真想把姚在《文汇报》上发表的剧评限制在学术讨论圈内一样，但他们没敢指责这场运动而带来的混乱。

毛不分历史背景，把他的"压制"学生的同事们与二十年代的反共军阀等同起来。[42] 他用心理上的自夸把疑虑掩盖起来。他对大多数高级同事都说过："你们应该把'怕'字换成'敢'字。"[43]

确实，毛的许多同事都很害怕，但他们又不知道毛要求他们有何种类型的"敢"。

邓不形于色地蔑视着文化大革命。刘则说他对文化大革命不理解，这可能是真心话。陈毅说："我总是对和我相处较好的人讲，如果让我领导文化大革命，那就不会有文化大革命。"[44]

然而，就在中国濒于内战的边缘时，中国的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了。

毛既要核武器，又要政治混乱，集老虎的勇猛和猴子的精明

于一身的他认为二者并不矛盾。*既然能同时取得二者，说明中国当时正在走毛的路线。

文化大革命正在拖垮75岁的毛。

大量的公文、电话和来自各单位各省的客人一齐向他涌来，就连秘书们都感到头晕脑胀。毛常常累得疲惫不堪，经过一晚上的劳累之后，第二天只好闭门谢客。

有些人竟把诡计耍到了毛在中南海的住处。党中央的一位重要领导人曾暗地里把录音机放进毛家里的花盆和会客室的沙发里。

和其他领导人不同，毛在文化大革命中并未受到多大困扰。就连周恩来这样的人物，也要时刻注意，以免自己被清洗掉。

毛并不象周那样频繁地参加大型会议，发表演说，而是呆在家里：在别人的报告上写含意隐晦的批示，用以解决问题。

和其他老同志不一样，毛并不因为失去几十年的战斗友谊而伤感。相反，他总是从根除他认为过时的东西那里获取无限的慰藉，他在死亡那里找到了令他兴奋的暗示。

然而，1967年初，到处都被一种暴力、动荡和仇视的气氛笼罩着，已有成千上万的人在文化大革命中丧生。然而毛曾在二月份对阿尔巴尼亚的客人宣称，他比一年前更乐观。[46]

毛是在给中国进行高水平的治疗呢？还是在通过你死我活的战斗来争夺对中国的控制？很可能是前者，但也不全是。

与建国之初到1959年那段时间相比，毛在六十年代中期的权力几乎丧失殆尽。然而，最初使他让权的是他自己。

---

* 文化大革命带来的混乱，至少也影响了中国一些核科学家的情绪。钱学森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很少与他的美国同事通信。他寄给加州技术学院的一位系主任一张圣诞贺卡，上面是画有一枝梅花的国画。钱在梅花旁边用清秀的英语写道："这是在逆境中盛开的花儿"。[45]

但是，人们对毛的忽视已超出了他所能忍耐的极限。他抱怨说：邓小平做事从不找我商量。[47]他不想让这位党的总书记变得如此独立。

自1962年开始，毛提出了继续发扬中国革命精神的新观点。这些观点是关于继续坚持阶级斗争，如何处理文化和政治体制的关系及怎样对待来自苏联的威胁。他的这些新思想受到过刘、邓和其他领导人的反对。

正象毛对斯诺所说的那样，他已决定让刘“下台”。

当然，他在向比刘和邓更大、更模糊的敌人开战。在他的社会主义存在着长期斗争的观点指引下，他正在把社会主义现实当做日益滋生官僚主义的土壤来处置。

他无力面对他所创立的政权中出现的某些严峻的事实，于是就创造出许多虚无的东西来解释为什么事情变得如此糟。第一个虚幻就是对六十年代中国的阶级斗争的夸大。

毛向几位阿尔巴尼亚的军界客人解释了他对“走资派”的定义：他们在解放前曾投身于阶级斗争，可自1949年后，生活环境变了，就忘记了斗争。毛确实说到点子上了。

“不妨说是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48]毛对“走资派”的分析确实是符合逻辑。

毫无疑问，毛意在嘲讽。但是这句话的确道出了“走资派”这个新杜撰出来的名词的实质。

文化大革命并不只是个人之间的权力之争。学生们就象一群排列在一起的木偶，由一个幕后的指挥者导演，彼此厮杀，而那些指挥者们之间的斗争并非真刀真枪。

我们无法完全了解刘和邓的观点（从此可以看出毛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限性），但不难看出，他们已觉察到自己正处在斗争的焦点上。

两个人都委曲求全地在紫禁城的家里呆了几个月，他们很可

能在此期间和毛进行过长谈。*

毛并没有立即罢免刘和邓，或是把他们关起来，也很少攻击他们。过了几个月之后他才开始对他们施加压力。而刘和邓对此做出的反应又不尽相同。邓曾一度在某种程度上跟随了毛的文化大革命的思想。刘则固执己见不愿放弃自尊，宁可被打倒，也不去拥戴他认为是错误的思想。

毛并不想把中国交给红卫兵。他意在唤起并锻炼中国青年，而不是与他们共掌大权。所以"夺权"仅仅是个幌子。要说这场运动是对一些右倾分子的清洗，是对的；如果说它是在造就一个新的政治体制，那是无稽之谈。

1967年初的一天，毛问周夺权运动进展得如何。周回答说："在一些单位，被一派夺了权后，另一派又去夺，就这样夺来夺去。"[50]周巧妙地不直接点明这种全国性的荒唐的现象。确实，政权正在遭受频繁的易主之苦。

与此同时，毛和周，真正的掌权者，坐在办公室里接收那些经常轮换的掌权者们的报告。这些人好象在进行一场踢来踢去的足球赛。

刘在1967年初就被罢免。但毛并不就此罢休，他要痛打落水狗。

很显然，毛是担心刘还会成为那些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的人的中心。刘还会保持他的稳固地位吗？

《人民日报》办公大楼的广告牌上贴了一张令人震惊的照片。照片上面有三个领导人在参加1966年的国庆活动，毛站在左边，孙中山的遗孀站在右边，中间站着的是刘少奇！[51]

---

* 邓在离开北京到农村接受改造之前，曾和毛进行了一次谈话，他力陈了自己的痛楚和不满。他说，他或许也可以象林彪那样"虚报成绩"，用某种手段来获得毛的赏识。毛笑着回答："历史会验证林彪是对是错，你不必就此不服气。"[49]

人们带着一种负罪的震惊观看这张照片。照片在中国的政治威力是很大的，而这张照片似乎把天地给颠倒了。能展示一张这样的照片是不寻常的。毛应该站在中间啊！

不久，《人民日报》的总编就丢了职。他曾是刘的支持者，企图用照片的力量来阻止国家主席的下滑。

毛和刘在一起工作了近四十五年。他们都是湖南人，彼此可不费力气地听懂乡音。是他在1945年延安的第七次党代会上提出并把毛确立为一个伟大的领袖和思想家。

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刘想把毛从第一的位置上拉下来。

他们俩在对某些问题的看法上有分歧。刘并不象毛那样看重农民对中国革命的贡献。他就象一个天主教徒一样虔诚地信仰党的权威，而不象毛那样时常请群众对党提出批评。* 在经济发展上，他喜欢按部就班，而不是象毛那样喜欢波浪式前进。**

刘缺乏毛的牢固的民族主义思想，他并不象毛那样对中国与苏联的关系恶化感到无所谓。一些毛认为是不可思议的国际主义名词，刘会顺口说出，例如："中国共产党是世界共产党中一个优秀的支部。"

在毛看来，中国的任何东西都不应该被称作是一个"支部"。

刘与毛的最大区别是，他没有丝毫的"猴气"。他与毛看问题的奇特角度大相径庭。他也不认为生活是永恒地变动不定的，而毛却这样看，并为此而着迷。

刘认为历史是一架上升的电梯，而在毛看来，历史就是一个波涛汹涌的大海。

---

* 与其他共产党掌权的国家主要领导人不一样，毛从未当过党的总书记。

** 张国焘对刘的几点看法是很典型的。他记起二十年代的刘是一个"身材修长，清瘦，面色苍白的青年"。还有人发现刘是一个"沉默寡言并略欠青年人朝气的人"。和张一样，刘注重"行动和实践"，而不是"思想和理论"。张记起刘有一次谈到对毛的看法时说："他解决问题的方法在某种程度上缺乏逻辑性，在选择方法时显得固执，不加区别，并欠缺自我修养。"[52]

对刘来说，社会主义是一门科学，必须用理性的步伐去追求；而毛认为社会主义是一种道德，并不附属于某一个最后的胜利。

然而，这些分歧并没有影响他们俩的密切合作，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毛在讲话中时常亲切地称刘为"少奇"，而在称其他同事时，他很少只用名而不用姓。毛只是在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才不能容忍刘的。

这是为什么呢？毛要超越马克思主义，但党的思想似乎象一个教堂，而刘就是教堂里虔诚的教徒。

毛和刘的分裂在非斯大林化期间逐步公开化。来自莫斯科的震荡过后，毛终于做出了反应。他决心找出一条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哪怕它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刘的教条与保守使得他无法领悟"美猴王"的这一变化。

毛只有在失去历史性的信仰之后，他才会清除刘。

毛曾反对过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攻击，他认为斯大林的所做所为"打上了时代的烙印"。受到损害的不仅仅是斯大林本人的名声，而且是整个共产主义运动的威信。

刘的所做所为也都打上了时代的烙印，并且他的名声也很难与他曾积极从事的运动分开。[53]

但毛此时已失去了团体观念。*他再也不象以前那样顾及这座威望的大厦了，而刘正是这大厦的主要支柱。

在政治领域中，某些具体的问题常常会加剧一般的分歧。在六十年代初期，刘不同意毛无节制地援助和支持第三世界的"民族解放斗争。"[55]而两个人的彻底决裂是始于怎样在农村推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如果不在此类问题上发生分歧，他们肯定会在

* 根据流亡莫斯科的王明的回忆，毛经常告诉他的同事，通过延安整风，他结交了"几个亲密的并肩战斗的战友"：刘少奇、陈伯达、胡乔木、高岗、陆定一、彭真和周扬。除高岗在五十年代被打倒之外，其余的人都成了文化大革命的受害者。[54]

其它方面产生分歧。

真正的症结在于毛已从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蜕变成美猴王。

刘在这方面显得十分固执，如果他能象周那样有柳条般的柔情，这场分裂或许能够避免。1966年4月底会见了阿尔巴尼亚的客人，毛当时正大谈他的新的风险性计划，可刘在谈话中一次也没有提起“文化大革命”，甚至连“毛”也没有提到。[56]

刘采取的最激烈的对抗措施是他想利用组织手段来制止毛，刘试图召开一次中央全会纠正毛的文化大革命。但是，1966年不是党的准则能起作用的时节。一个凯撒已对中国的大部分地区施用了催眠术。

毛刚刚贴出自己的大字报，就发现事情发展得有些不正常。他也承认这一点。他可能喜欢这种混乱，他在1966年8月曾说要让这种混乱持续下去。然而，无论是他，还是其他任何人，都不希望因混乱造成伤亡和破坏。[57]

“运动来势很猛，我也没有料到。”[58]毛在10月举行的一次中央委员会上承认，“所以你们有怨言，也是难怪的。”

从1966年底到1967年初，文化大革命只是被动地应付那些出人意料的突变情况。这些事情就好象闪电劈击大树，使毛无法预料。1968年到来时，用军事术语来说，文化大革命已成了解围战。

毛变得越来越反左。1965年至1966年，文化大革命刚刚拉开序幕时，他意在反对那些“遇到新问题的老干部”(“走资派”的代用词)。

从1967年开始，文化大革命就进入了下一个阶段。此时主要是反对那些年轻的政治捣乱分子（极左派的代用词），他们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风向已变。尽管《人民日报》还在鼓动造反，但字里行间却

是告诫学生要遵守法律和秩序。在1968年10月刘被正式免职之前，毛的焦虑所在就由刘的错误转向那些“红小鬼”的过失了，因为他们打倒了刘并要“立刻实行共产主义”。

这一转折点始于上海。上海几个好战的极左分子，“已经夺了权”。他们仿照1871年法国建立的乌托邦巴黎公社，宣布建立“上海公社”。毛没有同意。

1967年2月，他召见了上海的两个文化大革命领导人：[59]张春桥，原是一个记者，他的发迹全是毛一手提拔的；另一个是姚文元，一个长着娃娃脸的御用宣传员，是他写了那篇《海瑞罢官》的剧评。

毛几乎有点迫不及待，张、姚的飞机刚从上海起飞，他就不住地问秘书飞机是否已经到北京了。伟大领袖亲自将这两位煽动暴乱者迎进他的房间。

他向这两人泼了冷水。无政府主义一定要杜绝，他说，一个组织必须得有人负责。

上海的左派们引用了毛在“五四”时期的言论。当年，年轻的毛曾大声疾呼：“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毛叫他们不要再引用那些话了。他自言自语地说，就连他自己也“记不清”当时是否讲了那些话。

当谈到“上海公社”时，毛断然否定。如果全国各城市都建立公社，那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名字是否也要改一下呢？其他国家会承认一个“中华人民公社”吗？

张、姚回到上海，马上给已经白热化了的文化大革命降温。上海公社只维持了十九天。

毛之所以转变态度，是因为他不满于左派们的宗派主义，他们在“打倒”中干得很出色。但谈到建设时，尽管有成千上万的指挥者，却找不到干活的人。

空洞的口号到处泛滥，一个教条主义的分析就会使一般老百

姓变得狂热。红卫兵变得越左，就越不会与他们认为不够左的人握手联合。

红卫兵愈演愈烈的派仗足以使基督教世界内部繁杂的教派纷争黯然失色；相比之下，各基督教派倒象一个完整的统一体。光是三省（湖南、湖北、广西）三市（北京、广州、上海）就有1417个独立的红卫兵组织。

在法国，革命吞噬了孩子；而在中国，孩子们几乎吞噬了革命。

毛开始巡视中国，所见到的一切都使他忧心忡忡。红卫兵不仅仅是内部混战，而且组织起来同工人激战。在军队中也可以听到许多不满的言论。

毛沮丧地对周说："中国象是分成了八百诸侯国。"[60]

毛派了两个高级官员作为他的特使赶到武汉。

和全国其他地区一样，武汉的文化大革命第一阶段批判走资派引起很多人的不满。红卫兵并不象毛所希望或相信的那样受欢迎。首先，一个颇有权威的地方司令员出来反对红卫兵，武汉市一些大工厂的工人也组成了广大的阵线和他们对抗。

毛的两个特使都是极左分子。本来他们南下是为了平息争斗，可是不到两天，他们自己险些被"解决"。

武汉的那位司令员拘留了毛的特使，而这两个人当时的官位都居于中国二十名最高领导人之列。周恩来冒着自己的生命危险，匆匆南下调停。

这一次武汉的那个司令员让步了，周亲自护送他来到北京。

然而，这位武汉的"军阀"还是赢了，毛不得不承认解放军比极左分子更得人心。

武汉事件非但没有遏制反而增加了军队在中国政治中的力量。《人民日报》曾宣称解放军已开赴了"支左"前线。但无论在武汉还是在其他地方，解放军根本没有支左。

1967年中期，极左分子夹住了中国外交关系的喉咙，其结果给毛的震惊不亚于武汉事件。

红卫兵谴责外交部长陈毅，他们占领了他的办公大楼，向全世界各地的中国驻外使馆发电并命令他们在外交工作中采取强硬姿态。这使得中国与柬埔寨、缅甸及其他一些友好国家的关系变得十分紧张。

周自己也做了两天的“囚犯”。“资产阶级的臭老板，善于玩弄反革命伎俩”[61]，这是一个红卫兵组织给总理贴的标签。另一个红卫兵组织要批斗周，据说毛的回答是：“那好，我跟他站在一起挨斗。”[62]

为了在外交政策上做出新姿态，红卫兵冲进了英国代办处。他们焚烧大使馆，辱骂那些惊恐万分的职员，并抓某些人的生殖器，让他们逐个儿在一张巨大的毛主席像前鞠躬。

毛制止了这种胡乱的造反。1967年秋天，他频频谈到各派红卫兵要“大联合”，就象一年前他屡屡号召红卫兵要起来“造反”一样。当听到红卫兵攻击英国人的事件报告后，他抱怨说：“极左。”[63]

陈毅向红卫兵承认：“我过去曾经多次反对过毛主席，今后也不敢保证不再反对他。”[64] 要是在1966年，毛是无法忍受这样的异己言论的。

陈毅讲得十分露骨：“马克思是德国人，于是德国产生了考茨基和伯恩施坦与他分庭抗礼，来修正他的学说，列宁是苏联人，苏联就出了赫鲁晓夫；毛主席是我们国家的人，肯定中国会出现一个人反对他，你们等着瞧吧。”[65]*

毛没有也不能支持对陈毅的攻击。他看完陈的“黑话集”之后说：“此话不黑，口快心直。”

---

* 作者不清楚陈毅的话是影射林彪，而误以为是陈毅公开反对毛。——校注

1967年末，毛命令停止对陈的批斗，从此可以看出毛正处在进退两难的困境。毛说："他体重已减轻了二十七斤，我不能让他那个样子去见外宾。"[66]

和刘少奇相比，陈毅是幸运的。当风暴袭击到陈时，毛已不再热心于风暴了，陈之所以被保驾是因为毛需要从大乱走向大治。

1967年的夏天显得炎热而漫长。仲夏时节，毛离开了北京，把文化大革命中最棘手的一段时期留给周去应付。他先到了上海，然后沿长江两岸巡视，与此同时，他的一条新的文革路线形成了。

"你们不能用斗地主的方法来对待干部。"毛在杭州说，他反对给犯错误的领导人戴高帽子。

"你们不能怀疑一切，也不能打倒一切。"他对武汉的同志讲，但他没有承认他不久以前所犯的正是这个错误。

经过反复思考后，毛再也不象两年前那样确信造反有理了，他需要补救他的过失。他视察江西时说："应该挽救那些能够挽救的干部。"

到1967年末，毛开始热衷于法律和秩序了，那些红小鬼们又被命令回到学校。他们还在"闹革命"，但是实际上，复课限制了他们的行动。

毛在江西对一些人说："如果对左派不进行教育，就会成为极左派。"[67]

"红卫兵能掌权吗？他们今天掌权，明天肯定就被推翻。他们政治上还幼稚，……红卫兵还不成熟。"[68]毛终于从他自己创造的"小鬼"中跳了出来。

文革小组中一些资深的极左分子也无力自救，很多人在1967年底被捕。毛也开始批评他的夫人是"左倾机会主义者"。

为了对极左派杀回马枪，他选择了一个符合逻辑的同盟：请解放军出来帮助恢复秩序。在工厂、学校和机关，解放军取代了“不成熟的”红卫兵。

毛为他起用军队恢复秩序找到了一个永远合理的借口：“军人不过是穿着军装的工人和农民。”[69] 他早期的信条可能会更好地解释他的这一决定：“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不久，一个新的组织形式出现了。但“革命委员会”这个名字没有道出其实质。“革命委员会”由红卫兵、军人和1966年以后改造好了的干部组成，实际是一个不能移动半步的三条腿的怪物。

它并不怎么革命——是一个笨重的管理机构。它也算不上委员会，因为军队这条腿急剧膨胀，使其它两条腿变短，失去功能。

实际上，革命委员会只是恢复文革前政治秩序的不易察觉的一步，唯一的不同是军队的权力扩大了。

1968年初的一天，毛与周、林彪一起参加了一次集会。《人民日报》对此做了报道并刊有一张照片，林彪站在中间，周在他的右边，毛在他的左边。[70] 在许多中国人看来，解放军的负责人似乎成了中国的头号人物。

1968年夏天的一个晚上，已是后半夜了，可毛在中南海的家里还有很多人，在座的有两代人，两个集团，文化大革命领导班子中的两个派别。

那些被毛挽留的几个政治局同事坐在毛的周围，他们是林彪和他的妻子；江青、康生、姚文元和谢富治（公安部长，毛派到武汉的两名特使之一），另外还有陈伯达——一个左派理论家。

北京红卫兵五大领袖也在座。其中有聂元梓，她原是一位北大哲学教师，现领导一个很大的红卫兵阵营。还有蒯大富，他本

是一个带深度近视镜的热情洋溢的理科学生，现已成为清华大学的弄权者。

毛批评了红卫兵领袖大搞武斗的作法。

同时，毛又嘲讽他们没有实力，“给聂元梓充当炮灰的人数有限，蒯大富也一样，”毛进一步解释道，“多时有三百，少时不过一百五，能和林彪的解放军相比吗？……”

他努力将文化大革命扭回到开始时的学术争鸣范围内：“要文斗，不要武斗。”

毛直截了当地应付红卫兵提出的问题，就象一个老练的政治家和一些新手讲话一样。“我是压制红卫兵的黑手。”他对这几位年轻人说，他们都期待通过“夺权”建立一个新的政治制度。

他用权威的口吻宣布：“我以前讲话从不录音，今天我录了，不然的话，你们回去后就会按照自己的意愿篡改我的讲话。”

毛的话语中带着懊恼。他在谈及文化大革命的武斗阶段时说：“被抓的人太多，只因我当时点过头。”谢富治插话说，他作为公安部长对此负有责任。

毛沮丧地说：“不必为我文过饰非。”

陈伯达插话进来并告诫红卫兵说：“要紧跟毛主席的教导。”

毛打断道：“不要再谈教导了。”

毛（还有坐在他身边政治局的一些左翼分子）肯定已痛苦地认识到：红卫兵在1966年自上而下的夺权行动已走入极端。

毛竟还能说一两句含着辛辣的幽默话：“小孩们捡大字报当废纸卖，多少钱一斤？”

公安部长回答道：“七分，孩子们可发财了。”

毛没有给文化大革命带来的混乱无序这一根本问题找到解决的办法。他无法把这两个问题很好地结合起来：一方面，他深信斗争能陶冶人的品格（个体改造问题）；另一方面，他又意识到千百万人相互间斗来斗去只会一片混乱（政治秩序问题）。

他以国家领袖身份下了一道明确的指示："谁如果还继续违犯，打解放军、破坏交通、杀人放火，就要犯罪……就要实行歼灭。"

然而，他并非没有放弃无政府主义的腔调，他脱口而出："让学生们再打十年"，"地球还能照样转动，天也不会塌下来。"

谈话内容由政治转到了如何打发从凌晨到天明这一段剩下的时光。毛以一个关怀备至的师长的口吻说："蒯大富，如果今晚你没地方住，可以到韩爱晶那里去嘛……。"⑦

不久，蒯和聂及其他许多红卫兵领导人，就要到边远地区的农舍中度过寒夜，用养猪代替对革命的追求。

文化大革命是毛主义发展的顶峰吗？绝非如此，它只是温室中的一次字谜游戏。

毛想要建立一个新社会。而在文化大革命中，他的驱动力与其说是对未来的设想，不如说是对令人不安的过去的逃避。

再一次寻求在"一张白纸"上面写上最新的诗篇，似乎有着诱人的魅力。

毛是带着对中国社会主义的缺点所作的理智分析而步入文化大革命的。他宣称资本主义依然存在，应该在思想领域展开一场斗争，所以需要发动文化大革命。否则的话，社会主义经济将会蜕变成资本主义的经济。这一分析很可能是错误的。

许多被打倒的东西又恢复了。没有刘少奇的刘少奇主义又卷土重来。毛只是摧毁了表面上的敌人，而不能摧毁真正的敌人。

毛发动文化大革命是要使他长期以来的社会主义价值观更加坚实。它包括：

-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胜于物质生产。
- 斗争所起的医治社会弊病作用会超出斗争目的本身。

• 生活是一个胜无恒胜、高下易位的永恒战场。

毛在某些方面是成功的。他提醒了中国，要忠实于毛主义的信仰，尽管他没能按自己的意愿改造中国。

文化大革命并未产生一个新的统治格局，只是给统治者新添了几位助手，并一度产生了新的社会气候。然而，它确实给毛苍老的手中增添了无限的权力，供他任意地使用。

峣峣者易折（1969—1971）

毛驱车前往人民大会堂，主持党的“九大”的开幕式。这次会议是为了使文革的“成果”具体化。但在这次空虚而又紧张的党的会议上，毛提出的问题几乎未得到解决。

毛致的开幕词令人振奋鼓舞。① 这次大会将是一次团结的大会，他开始说道，这时，热烈的欢呼声响彻整个大会堂。但在此之后，毛的讲话却转向指责党内各派的明争暗斗。基于此，他罢免了一些旧日同事。

修改过的党章指出，“毛泽东思想”同马列主义一样，是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基础（这与1956年“八大”通过的党章明显不同。那时，正是刘的集团的兴旺时期，没有为任何一位不会把任何一位在世之人的“思想”作为旗帜挥舞，这得归功于林彪。文革把毛的地位推向新的高潮，面带永恒微笑的林在此起了主要作用。

难道这不意味着文革为毛——林时代开辟了一条稳固和谐的道路吗？

“九大”选举出的中央委员会看上去真正成了毛、林的工具。近40%的中央委员来自湖南（毛的家乡）和湖北（林的家乡），虽然这两个省的人口还不到中国总人口的11%。

然而，在毛看来，形势还是很复杂。

外交部长陈毅受过政治迫害。会议前夕，他以其闻名的机智而锐利的口吻对毛说：“我怎么能参加大会呢？人家说我是‘右派’”。毛回答道：“那你就来代表右派么。”②

一句话道出了毛的讽刺与嘲弄。

与1956年那次会议不同，“九大”的召开如同一次密谋，没有发布详细的新闻。这是形势急剧变化的迹象。

还有一个前所未有的现象。这次党代会的召开没有任何外国共产党的观察员出席——这说明一个事实：毛——林为自己的时代罩上了一层神秘的封建主义的面纱，而不是国外众所周知的马克思主义。*

毛在会上的举止如同一尊佛像——实际上，他也就是被当作这样的一尊佛——会议与其说是一场辩论，不如说是由仪式构成（会议自始至终，1512名代表只有11人发了言）。

幕后的气氛更加紧张，以致于花了一个星期的时间来选举新的中央委员会。代表们列队而行，用延安时代的选举方式，通过会堂前排的木质选举箱。选出的人数比原计划的多两倍，这是为了调和各派系之间的竞争。

在一场可怕的暴风雨后，毛稳住了航向。他因此被推崇为马克思主义至高无上的圣哲，尽管刘和邓在“八大”上就曾反对过这种做法。然而这无所谓，万里青天中也偶有几片乌云。

一半以上的代表身着解放军制服。毛曾把军队召来收拾文革的残局，这种介入的后果此刻摆在他的面前。

---

* 周看出了毛所领导的中国共产党的传统主义倾向，并加以反对。他在一次内部会议上抱怨：“‘九大’的党章有浓厚的封建主义色彩”。

难道毛已摈弃了他自己创造的党指挥枪的原则吗？

一些顽固的军队官员们与极左派之间还仍存在不少悬而未决的问题，这是毛的文化大革命给中国带来的不安定因素。

会议提拔了很多“坐直升飞机”*上来的干部。

文革中，这些人因受到毛的保护而得以高升。毛夫人挤入了由二十一人组成的政治局，同时进入政治局的还有，她在上海的同伙姚文元和张春桥。这三人在文革中皆充当了毛的左手。

红卫兵运动的两个煽动者——北京大学哲学系的聂元梓、清华大学化学系**的蒯大富，也千方百计地挤进了大会代表团。

在新的中央委员会成员中间，还有一张新的面孔，和霭可亲、面额宽阔、双目有神。他叫华国锋，来自湖南，是一位稳健的政治家。他是毛1959年回韶山时发现的。

与此同时，大会把林的追随者排在突出的地位。作为一种优美的对称运动，林夫人和毛夫人双双进入了政治局，但愿这不是不祥之兆。

罪恶之神在为未来播种。林彪集团和文革左派在背景和观点上如地之两极，截然不同。林彪在文化大革命中崛起是以许多人纷纷落马为条件的，他与极左派的联系在很大程度上纯属偶然。

毛曾依赖、并且现在仍需要军队，但他更倾向于支持文革左派。目前，他双翼并举，并不偏向任何一方。

对于林夫人和毛夫人晋升到政治局，毛似乎掺入了感情色彩。

毛耽心江青会“被胜利冲昏头脑”，③他曾在信中点破过她。至于叶群，——林的既专横又年轻的第二位夫人，任林办主任，——毛不久就以十分轻蔑的口吻称她为林的“老婆”。④

至少在实际行动中，毛不象以前那样激烈地反封建主义了。

---

* 邓以此来嘲弄那些升得太快以致于无力担当高职的文革左派。

** 为力学系之误。——校注

最大的阴影却是，毛对林有怀疑。毛认识林彪已有四十年了，并和他共事长达三十余年。但是自1966年后，两人的关系布上了阴云，这是因为出现了权力继承问题。这一问题，在任何一种政治制度下都是很微妙的，在马克思主义的专政的政体中，也同样是神妙莫测。

毛在1965年对安德烈·马尔罗说："象戴高乐和我这样的人，都没有接班人。"⑤然而，三年后，"九大"的一条新闻宣布了林是毛的接班人。*

然而墨迹未干，毛的头脑中就又开始有了悔意。每产生一位接班人——都是毛一手扶植起来的——毛就会掀起一场新的运动，暗中阻挠这位受提拔的接班人。

毛林之间的问题比第二号人物的存在有更深一层的含义：它使毛不愉快地想到，他快走到生命的尽头了。

首先，作为政治地位的基石，林的军队在1967年后所起的作用迅速扩大起来。1966年，毛曾满腔热情地掀起了一场政治风暴，但是现在，他却不得不把精力放在重整党的机构上。

其次，毛感到，林彪在六十年代玩弄了一套权力政治的诡计。林所说的"绝对权威"的话惹恼了他。⑥

毛不象林那样，不惜任何代价全力捍卫自己的政治权力的保垒。他也不象林那样，使用削弱军权的方法，以铲除政治上的异己。

第三，赤裸裸的野心对林有一定影响。毛在1966年写给江青的一封信中，对林彪把"毛泽东思想"说成是灵丹妙药表示不满。他写道："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么大的神通。现在经他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⑦1969年，毛已经怀疑，林彪在对他阿谀奉承的背后，隐藏着不可告人的目的。

林彪的这些政治骗术在"九大"上取得了成功。然而，也许

---

* 以前从来没有一位第二号人物——甚至刘少奇也没有——被指定为毛的接班人。

在此之前，毛已下了决心，林不能当他的接班人。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毛和林都抓住文革的一些主要思想不放——政治局的许多人并不认为文革是一个新纪元——尽管他们在如何贯彻这些主要思想上有分歧。

这两人，都站在周和其他领导人，包括几个大军区司令的左边。例如，他们都鄙视工业生产中的物质刺激。在文化政策上，两人都反对为艺术而艺术的观点。

但是，林希望以军队的方式来执行文革政策；毛不仅怀疑林有野心，而且认为，军事方法不能代替政治方法。

他在与地方官员的谈话中说："我赞成雷厉风行，令行禁止的传统军人作风，但在意识形态领域里行不通。"⑧

毛主张把这场触及人们灵魂的革命无限期地搞下去，林却希望在军队的保护下巩固并加强文革的"成果"。

毛在大会上作的总结性讲话有点不着边际。当外国记者批评了会议的过分保密后，他抨击了这些记者，（"在北京的记者都不大安分。"⑨）然后，他环顾一下会场，收回目光，喃喃地说："其实就是这么回事。会议闭幕。"

数月来，毛一直在运筹帷幄。从5月至10月，他没有公开露过面。1969年看起来象是林彪年。毛的一条最新指示"一不怕苦，二不怕死"⑩在建军节发表，但并未使人们乐观。

此刻，他已决定让林彪充分表演一番，也许他不得不这样做。于是波拿巴主义在中国出现了。

红卫兵，或者说是残留的红卫兵，现在与林的左倾军事机器一拍即合。*

不是所有的军队领导人都拥护林，拥护林的左倾主义，拥护林关于军队要政治挂帅的观点。在反对者中，地方军区的领导人

---

* 聂元梓为表示她的忠心，与林的一个关系密切的官员结了婚。

占多数，少部分是中央的。

朱德也是反对者。林在一次争吵中对德高望重的朱德吼道：“你是什么总司令，你没有真正当过一天总司令。”*⑪

毛的困境在于，这些不注重意识形态问题的老式军官们，既不是毛主义者，也不是林主义者，在关键时刻，他们可能会抛弃林。然而，毛的文革又使他们心惊肉跳，一些人已开始怀疑毛是否已昏庸老朽。

毛谴责林彪对他搞荒唐的个人崇拜，使他不象个政治领袖，倒更象个宗教首领。事实也是如此。林给毛贴上“天才”的标签，他充满激情地说：“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

“你说过头了嘛”，毛后来声称他批评过林，“一句就是一句，怎么能顶一万句？”⑫

毛担心，神的一贯正确也就意味着神的可望而不可即。他怀疑林彪是想把他架空至更高的圣德的位置上。

1971年的一天，江青正在颐和园漫步，她忽然发现，在“排云殿”的墙上写着“读毛主席书，听毛主席话。”这本是一句毫无恶意的标语。

此话出自雷锋（一位著名的年轻烈士）之口，但是这六英尺高的字却是林彪的手笔。

江青勃然大怒：他这是想让人们知道，是他林彪提出了这句口号，他这样做不是想利用对毛的崇拜来提高自己的声望吗？⑬

林彪别有用心地利用个人崇拜使毛不得安宁。他不是把“毛泽东，”而是把“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的教义的护身符。1970年，广播中开始讲“毛泽东思想是最红最红的红太阳”。⑭毛的魔力可以比毛更长寿，换句话说，可以由一个新手从中传递。

毛、林紧张关系的升级还在于林彪要求设立国家主席。自刘

---

* 林这里指的是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

少奇在文革中被打倒以后，这一职位一直空缺着。林为显示他的想法如何与毛不同，用一种推理方式说，“不设国家主席，制度就不会产生应有的重要性，人民就不知道谁有权谁无权。”[15]

林说，他希望毛能象建国初期那样，担任国家主席。毛并不想要这个形式上的职务。但是，林一再坚持这一意见，使毛抱怨说，他不愿再次出任国家主席的话已经讲了六次了。

对于林的别有用心，毛以嘲弄的口吻说：“我讲了六次，一次就算是讲了一句吧，就是六万句”，但是实际上，“半句也不顶用，等于零”[16]。毛显然为此已动雷霆之怒。

毛开始感觉到——而且他的感觉可能是对的——林正在哄骗自己把国家主席这一最高职位让给他。但是毛无意这样做。

林一方面称毛是天才，一方面自己又想做国家主席，这样愚蠢的做法，看来令人吃惊。新的党章不是已经规定他是毛的接班人了么？那么，现在首要的难道不是要表现自己的虔诚吗？

然而，坐在第二把交椅上的林却迫不及待了。在毛的身影笼罩下，他离最高领导权如此之近却又望之难及。大概这种处境影响了他的判断力。(对于第二号人物来说，总有不寻常的命运，诸如邱吉尔的阴影中的安东尼·艾登，林肯身边的休伯特·汉弗莱)。

林的另一个问题是，不只是毛，很多中国人也开始怀疑他是否有能力担任党的主席。[17]

1969 年 10 月 1 日是“九大”之后的第一个国庆节，毛和林一起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林讲了话。他那微弱的、略带鼻音的发言没有使人受到鼓舞。甚至在他念稿子时，城楼下 100 万群众仍在高呼：“毛主席！毛主席！”

人群中一定有很多人在怀疑——观礼台上的一些领导人亦在推测——痨病鬼一样的林是否真的具备当主席的素质。

遥远的中国北部黑龙江和乌苏里江畔响起了阵阵枪炮声。

苏联和中国，昔日的一对“兄弟”、和平友好条约的伙伴，又曾自封为黑暗世界中国际无产阶级的两座灯塔，现在却为争夺一块冰冻的荒地而动起干戈。

“九大”前夕，在几个星期的战斗中，近千人被打死，其中绝大部分是中国人。

毛并未感到吃惊，他甚至为自己辩护。* 他多年来一直认为，中国最大的问题是苏联，而不是美国。中国有一句谚语：“不怕南面虎，要防北方熊”。毛从谚语出发制定政策。

当发动文化大革命时，在毛看来，国际问题上最主要的是如何对付美国。所以，在1965年与柯西金会谈时，他才会向苏联人提出这样的问题：如果中美之间爆发了战争，莫斯科是否会给中国以援助。

当“九大”在文革的瓦砾堆上降下帷幕时，毛眼中的国际形势转了个大弯。但他能用美国这张牌来对付苏联吗？

美国的政策正在变化。毛认为，美国在越南已碰钉子，将不可能给中国造成麻烦。

1969年中期，尼克松在关岛确实向世界宣告过，美国在亚洲的军事扩张时代已经结束。

与此同时，苏联的外交政策应验了毛已隐藏十年的不祥之念。莫斯科向布拉格派出了坦克，以结束杜布切克进行的马克思主义内部的民主实验。毛恰如其分地把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称为“新沙皇”。

如果说，“有限主权论”可以让苏联人闯进去“援救”捷克的社会主义，那么，他们就不会想法把中国的亲苏分子拼凑起来，并用苏制的刺刀为他们作后盾吗？

1969年中期，勃列日涅夫召开了一个世界共产党会议，以亚洲

---

* 尽管这场战争可能是林彪出于政治权力的考虑挑起来的。

集体安全条约的形式，提出了一个东南亚条约组织的莫斯科修正案。毛则说“他就象臭名远扬的妓女坚持要为自己立贞节牌坊。”[18]

毛毫不留情地从俄国熊的脸上撕下了马克思主义的假面具。他似乎忘记了，他的这种作法也正在为自己日后置身类似的境地奠定了基础。那就是，他自己的马克思主义也被民族主义所沾染而变得难以辨认。

并非所有的同事都赞成毛外交政策上的这种令人吃惊的转变。

1959 年，彭德怀就曾是第一个对毛的强烈反苏倾向感到不解的人之一。而刘少奇呢，直到 1965—1966 年间还认为有与苏联人“联合行动”的可能，这也是刘少奇注定倒霉的诸因素之一。

这一回该轮到林彪去发现毛对苏联的敌视似乎不合情理了。

苏联之所以使毛感到恼火，究其原因部分在于毛实在不喜欢斯大林去世后发展起来的苏联社会主义；部分在于毛和苏联之间的文化隔阂，在他与赫鲁晓夫吵架时，这种隔阂更为明显。以上两点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19]

如果毛象张国焘那样，在二十年代就访问过苏联，也许他一样会发现，即便是列宁领导的苏联社会主义，也并不完全适合中国人的口味。

到了 1969 年，毛敌视苏联的另一个因素便是：简单的民族主义利益的算计。美国已发展到顶峰，而苏联则正在上升阶段。倒向美国，会对中国有利。

毛对苏联的恼恨还有一点荒谬之处。苏联是一面镜子，毛从中看到了一些丑陋的现实——这与其说是苏联人造成的，不如说是马克思主义的产物。他还看到中国内部的缺陷以及他自己的统治方式。

他逐渐憎恶苏联，因为他不喜欢苏联人提出的“土豆烧牛肉的共产主义”。在很大程度上，这是因为中国太穷，其消费水平还

达不到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标准。

他指责苏联的“修正主义”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篡改，这并不是因为他内心有个明确的选择方向，而是因为作为一种信仰，他对马克思主义的前途也实在是把握不准。

毛处在这样的边缘：他在放弃阶级分析，并倾向认为势力均衡是国际政治的关键。

经毛和林的同意，六十年代后期的路线是号召全世界人民“推翻”美“帝国主义”和苏联“修正主义”。当林在喊得天昏地暗之际，毛却正在变成东方的俾斯麦。

变化的一条线索是毛对“霸权主义”的新提法，[20]这个简陋的字眼不同于“帝国主义”，更不同于“修正主义”。与两者的区别在于，它不是出自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而是源于中国的一句老话，含有“以力服人”之意。

霸权主义，主要是指权力，而不是指某一具体的社会制度。恃强凌弱，仗势欺人者就是霸权主义者。因此，在七十年代，中国含羞厚着脸皮打开了非道德主义外交政策的大门。

毛呕心沥血，倡导了世界性的三角战略，并使之成为七十年代初期世界的主要特征。

1970年，林仍坚决主张对两个超级大国持武装到牙齿的强硬对峙态度。这不是一条明智的策略，但它确实是毛的文革的必然产物——这时期把华盛顿和莫斯科都看成帝国主义。

即使在毛做出这一分析的时候，他对自己的分析可能也没有把握。无论如何，他不打算长期与美、苏保持同等距*。

林根本不同意毛倒向西方。周不象林，这位总理掌握西方的第一手资料，因此易于接受毛的意图。转而亲西方的意向为周提

---

* 毛曾向安德烈·贝当库表示，他担心中国能否既与苏联又与美国保持良好关系——当时，这位法国政治家说法国可以。“周旋于华盛顿和莫斯科之间，”毛说，法国比中国容易些，因为中国没有那样多的活动自由。[21]

供了一个极好的机会，他恢复了与法国人、美国人及其他一些国家的人的老关系。

“九大”过后的一段时间，毛不得不在一些问题上煞费苦心。对林这个作为心腹大患的接班人，如何把他从第二把交椅上拉下来，并扫入积垢甚厚的历史垃圾堆呢？

另一个棘手的问题是，许多军官仍然把美国，而不是把苏联当成中国的主要敌人。

苏联和美国对毛的新俾斯麦主义的反应是一个极重要的变量。莫斯科允许毛在多大程度上反对苏维埃主义呢？他的亲美举动，会得到长期反对中共的华盛顿的报答吗？

越南战争并未使毛轻松地制订出他的新的亲西方外交政策。到1970年，他的兴趣已不再是印度支那战争，而是在这以后会带来何种形式的联盟了。

日本似乎是毛亲西方政策的绊脚石，北京给日本起了个恐怖的名字——“日本军国主义”。华盛顿是日本的保护者，在这种情况下，毛怎能倒向美国一边呢？

但是，毛观察日本已很久。他主要不是根据中国与日本的双边关系，而是根据全球战略形势来看日本的。他对日本的看法遵循着自己的主要矛盾的观点。

只要美国是中国的主要担忧之所在，日本的力量对中国在亚洲的利益来说就是一个真正的挑战。不过，如果美国变得温和一点，那么，中国对日本的畏惧就会被新的一代遗忘。并且，如果苏联成为中国的主要隐患，日本（同美国一起）就会在对付北极熊的统一战线中成为潜在的盟友。

北极熊对变幻中的世界政局当然不会等闲视之。莫斯科至少也同北京一样，对黑龙江——乌苏里江畔的冲突感到震惊。如果毛可以把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称为“新沙皇”，那么那多疑的两个俄国佬肯定也认识到了毛将转向华盛顿寻求保护。

不管怎么说，苏联人肯定也知道，在北京，林和其他人不象毛那样反苏。他们力争阻止，或者至少是使毛最低限度地改变他的外交政策。因此，苏联迫切要求与中国谈判。

胡志明去世时留下一条遗嘱，对两位马克思主义巨人的争斗感到忧虑。这份遗嘱带来了不可抗拒的压力。使得“中央王国”同意接待柯西金。

柯西金是1969年9月抵达北京的，他的飞机降落在北京机场的尽头。只有周在那儿会晤了他，毛再也不见苏联领导人了。

事实是毛无意寻求解决——对边境问题或任何其他问题——他已决定不同他所蔑视的政权进行任何接触，直至拖到困境完全化解为止。

林希望对苏联和美国采取一视同仁的政策，而且他在“九大”上提出了这一观点。正是这一事实，使毛的上述态度强硬一百倍。

1970年中期，周恩来和柯西金在北京机场会晤时，苏方曾提出，举行一次苏中最高级会谈，当时中方原则上同意了这一建议，但是现在中国政府又拒绝了这一建议。这是林彪垮台的征兆。六个月后，苏联向中国提出了一个互不侵犯条约，又一次遭到中国人的拒绝。林的吉星又一次下沉。

林彪本应痛苦地意识到，不是他，而是毛本人改变了自己的路线。四十年代，毛在谈到那些允许美国在自己领土建立军事基地的国家说：“我相信，不要很久，这些国家将会认识到真正压迫它们的是谁，是苏联还是美国。”[22]

毛清楚地看到，莫斯科正在取代华盛顿的位置。1970年，毛尖锐地指出：“杜勒斯的阴魂已进入克里姆林宫。”[23]（一年后，周当面对我讲过这句话）。

1970年初秋，毛、林的紧张关系在庐山召开的中央委员会上逐渐公开化。整整两天半的唇枪舌剑，其紧张程度不亚于十一年前在这同一大厅毛与彭德怀将军斗争的那次。毛、林之争使二百五十五位党的领导人震惊，也给毛带来了不眠之夜。

虽然毛只是抱怨林和“他的大将”搞“突然袭击”，[24]但林可能已经在防御了，他感到毛反对他的冷风正在袭来。

争议的问题与以前大同小异：国家的领导权、“天才”问题、解放军在政治上的作用、美帝国主义是否还是威胁等。

不同之处在于，这次毛是公开而明确地反对林的观点、策略和作为接班人的地位。

对于这次冲突，很难确定谁是谁非，因为无法得到林对事情的看法的材料。他对毛不象彭那样粗鲁，但其用意却比彭更狡猾。

实际情况似乎没有1959年的对抗那么严重，因为在1970年的对抗中，起主导作用的是林的野心和毛的复杂的心理。

庐山之争的结果很清楚。在政治上，林不久就同周发生了激烈的对抗，他与文革左派（如江青）的联盟也开始瓦解。他不久就沦为由失宠的将军们组成的阴谋集团的头目。

“天才”问题、国家主席问题、美国问题，这一切反而冲着林彪而来。

1970年10月1日，晴空万里，毛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国庆游行队伍。彩车、礼炮、气球、体操，场面热闹非凡。毛身边站着两位美国人：埃德加·斯诺和露易斯·斯诺，当时他们正在北京访问。[25]《人民日报》在头版刊登了毛与这位经历丰富的记者及夫人在一起的照片。

“美国友好人士”是对斯诺照片的说明。一条毛语录醒目地排在这一版的右上方：“全世界人民，包括美国人民，都是我们的朋友。”

当毛和斯诺注视着下面那些毛的画像、毛的像章和毛的语录时，这位美国人忍不住问道："感受如何？"毛皱了皱眉。后来他对斯诺说，个人崇拜令人"讨嫌"。它已经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任何企图继续搞个人崇拜的作法都只会为林的目的服务。

在中南海与这位左翼记者共进早餐时，毛对他说，尼克松先生无论是以总统的身份还是以旅游者的身份到中国来，都会受到欢迎。这句话，使1971年春季毛与林在外交政策上的冲突进入决战阶段。

毛和尼克松会晤的最后一个障碍是美国支持越南二月份对老挝的军事入侵。[28]然而，"入侵"失败了，这是毛的亲美政策的侥幸之处。这次"入侵"只能再一次证明西贡政权的软弱无力，因此，它反而成了毛正在形成的对世界看法的佐证。

毛立即着手准备接待亨利·基辛格的访华计划。当杜鲁门总统把中国"丢失"在毛手中时，这位德国出生的奇才还是哈佛大学的学生。

据说，林彪在"九大"曾为他的与两个超级大国保持等距离的外交政策辩护，他怒气冲冲地对毛说："假如说你能邀请尼克松到中国来，我为什么不能请勃列日涅夫来？"

毛策划了他久经沙场生涯中最重大的——尽管不是最周密的——一次战役。这只能是一场重大的流血的战斗。在中国公众眼中，林高高在上，他甚至被任命为中国下一届的最高领导人。

林是在文革的极左浪潮中升了上来，因此很难把这个崭露头角的逆臣重新描绘成"右派分子"。

林掌握着军队，即使在彭身边也没有林那样的一帮资深的军官坚定地站在他一边。1971年中期，林和这帮人正密谋以林家王朝代替毛的政权。自从长征途中与张国焘的那次斗争以后，毛还从未遭到过如此之多的党内军官的反对。

除掉林肯定要付出代价，毛仔细权衡了好几个月。

他不得不小心谨慎。因此，他首先铲除了与林结盟的陈伯达，以切断林与极左派的联系。然后，在1970年12月和1971年4月的会议上，他把火对准林周围的"大将们"。

对自己表面上的接班人，毛假装对他"保护"、甚至是"挽救"。

由于军队内部在关键时刻出现了分裂，也由于周的出色工作，毛取得了胜利。

长期以来，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直是一支自力更生的政治军队，对土地有着深厚的感情。在五十年代，这种情况有了变化，中国共产党掌了权，军队走上了苏联模式的专业化道路。这样，北京与地方的军队领导有了隔阂。

王牌军（特别是人数较少，但力量正逐步壮大的空军和海军）象其它国家一样越来越具现代化了，而地方军队大多数仍由长征过来的泥土气较浓的老军人领导，他们仍保留着传统的东西，对时髦的现代理论不很关心。

文革意外地加剧了这种分化。

毛曾鼓励林使社会组织军事化，使军队组织政治化，而林在此过程中撤换了许多地方上的军区司令员。到1971年初，毛觉得有必要纠正这种状况，于是在周的帮助下，成功地补救了这一错误。

周和那些军区司令不象毛和林那样紧紧抓住文革的成果不放。他们联盟（极力反对文革）把毛从林的威胁中拯救出来。军队分裂了，正因为如此，周才有可能代表毛取得反林的成功。

毛果断地把林的解放军总部，确定为他那场相互讨伐的宗教战争般的文革的第三个打击目标（继打击刘和空想主义者之后）。

早先他提出过这样的口号："全国人民学解放军"。现在他却冷冰冰地说："这还不完全。"他又添了一句具有爆炸性的相反口号：

“解放军学全国人民。”[27]

中国人民解放军未免不是“猴王”重新思考后的“辩证法”的实例。

不久，最后一个省份的党委会宣告成立，这意味着将会剪断军队的翅膀。当党委在红卫兵的冲击中瘫痪时，解放军走上了政治舞台。现在，他们又被要求放弃这个舞台，回到军营中去。

每逢毛在国内对林关闭一道门时，就会对国外向美国多开一道门。

1971年4月，他召开了一次中央工作会议，迫使林的亲信们，甚至林的夫人，作了自我批评。同月内，他向华盛顿表示，仲夏时美国官员的北京之路已畅通。其时，老挝危机已平静下来。

正当基辛格要跨过喜马拉雅山之际，中国新闻媒介却突然发表大量文章，回顾党指挥枪的光荣传统。

当全世界都看到基辛格出入毛的国门、人们被震惊得还未清醒过来之时，一件与之对应的事为中国沉闷的建军节增添了色彩。林的盟友、文雅的解放军总参谋长黄永胜，发表了一篇讲话，其中攻击了美国，而只字未责苏联。

与此同时，毛指示重新发表了他在1945年写的文章《论政策》。文章论证了当时他决定与蒋介石谈判的正确性，同时也含蓄地说明他打开中美关系之门的正确性。

然后，毛通过视察南方的军事基地向林甩石头，他与愠怒而无言的总参谋长黄有一场戏剧性的交锋。在一次党的会议中，毛冲着黄永胜说：“我就不相信我们军队会造反，我就不相信你黄永胜能够指挥解放军造反！”[28]

行至上海时，毛把黄的一个亲信找来问道：“你对黄永胜的印象怎么样？”这位军官由于不知道毛与黄的敌对情绪，热情地赞扬了他的上司。

毛冷冰冰地插话：“黄永胜是刘少奇一类的骗子。”

根据来自广州的可靠消息，这位出了一身冷汗的军官马上绝望地承认，他对“黄骗子”的判断是错误的。毛听罢大喜，他凑近这位军官下了“密令”，要他在反林和反黄事业中起作用。*[29]

毛自己承认，庐山冲突之后，他是从各方面向林逼近的。

林彪集团中的一部分人被逼得穷途末路，他们策划了一个要在1971年秋实施的对抗计划。这是一个夭折在上帝手中的谋杀或废黜最高领袖的计划。

林撤退到风景优美的苏州。在柳树与运河间，与其妻及26岁的儿子林立果紧急商谈对策。莽撞的林立果是以直升飞机的速度升任空军作战部副部长的。我们还不知道在早春的这次会议上得出了什么样明确的结论，但事态的发展表明，他们没有达成一致的意见。

林的这位急躁的儿子——立果，同空军中其他一些急进鲁莽的家伙一起，开始密谋一个反毛的军事政变计划。这些人马上就实施起这一赤裸裸的计划来，未经林及其高级助手们的同意，甚至他们可能还不知道这一计划。叶群在这一计划快要败露之时加入进来。她是林的第二位妻子，比林小22岁。

当林听到这一计划时，可能既成事实了。黄永胜及其他一些亲林的领导也许根本不知道这件事。

与此同时，林当然对毛感到恼怒，也许开始恨透他了。他说毛可以“活一百多岁”，[30]这就泄露了他作为接班人的急不可耐的心情。

立果正试图援救他父亲的事业。

他着手的政变代号为“571”。[31]根据中文谐音，意为“武装起义”。政变计划把毛称为“B—52”。使用这种当时还在越南战争

---

* 原文不实。——校注

中猖獗而声名狼藉的字眼，当然是对毛的侮辱。这还影射着毛的亲美立场。

无论如何，只要考虑到毛那至高无上的巨人地位，就只能采取突然袭击的方式了。

在政变计划中对毛的谴责也不是没有依据的（难以相信：北京能虚构一个整体逼真，各个部分则是败笔的画面）。

“今天是他的座上宾，明天就成了他的阶下囚。”

“(B—52）是一个怀疑狂、虐待狂……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封建暴君。”

“B—52宠爱笔杆子，不喜欢枪杆子。”

“B—52的整人哲学是一不做，二不休，他每整一个人都要把这个人置于死地而方休。”甚至（B—52）的亲生儿子也被他逼疯。

“目前，我们力量准备还不足。群众对B—52的个人迷信很深。”

亲林派的谋反者们疯狂计划中的一个就是，让毛死于车祸（1971年，北京的交通足以造成一场合情合理的事故吗?)。不管出于什么原因，林的亲信的那些荒谬的计划极少得逞。

林垮台后，中国政府又揭发出其他许多暗杀毛的企图。

据说，毛的食物中被投过毒药。

1971年秋，毛在上海的官邸遭战斗机“扫射”，当时他正住在那儿。

毛在结束南巡之后，准备返北京与林决一雌雄时，有人曾企图在其专列上安放炸弹（但刺客惊慌失措，被毛的随行人员发现，毛便下火车，换乘汽车回到北京）。

在林灭亡前几个小时，一位军官“出现在中南海”，想孤注一掷，用枪刺杀毛，（不料负罪感使他犹豫了，枪从他手中滑落，

然后他双膝跪地，乞求对他罪恶的宽恕)。

这些惊人的场面都无法证实。也许他们夸大了立果和那帮冒进的家伙们至少还是预期的行动，但林亲自去谋杀毛是不大可能的。

不管怎么说，1971年秋，中国政界的最高层动了武力。按这种或那种说法，林和政治局的其他五位成员在9月的第二个星期却遭受到灭顶之灾。

这时，毛的处境也并不十分安全，以致他感到必须搬出中南海。据江青说，他在那儿"寝食不安"，随从里"混进了敌人。"[32]

毛携夫人以及全体工作人员都迁往"金海饭店"。* 因为饭店不方便，后来他们又搬到人民大会堂的地下防空洞。

在希望摆脱紧张的精神压力的新的冲动下，毛8月中旬离开北京南下作了为期一月的旅行。

毛一回到北京，迹象表明戏剧即要进入高潮。

9月10日后，政治局中四位亲林的军队领导人一个也没再公开露面。从第二天晚上起，所有的中国高级领导人均失踪了好几天——他们在人民大会堂紧急磋商。这期间，中国实行了空禁。

"五一"后，毛只公开露过一次面——与缅甸的吴奈温会晤(地点不在北京)——8月份以后，就再也没有露过面。人们开始议论他的处境。

外国人会意地报道了美国心脏病专家保罗·达德利·怀特博士应中国医学会的邀请于9月18日到达北京。

中共党员们则焦急万分，他们有足够敏感的消息猜测到毛、林的紧张关系。

在香港，上演了一场生动的文字戏剧。中国银行的大楼——

---

* 原文如此。——校注

北京插入香港心脏之手，一直有一条由霓虹灯组成的标语："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这是林的话，它亦与林的目的相衬。

9月初，红色霓虹灯消灭了，出现了一条新标语："毛主席万岁！"[33] 这对林来说不太对劲。明摆的继承人已明显的不再是继承人了。

不久，党内文件就传达了一个消息：曾企图发动军事政变的林彪，驾机逃跑时飞机坠毁，死于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34] 随后，蒙古人扼要地宣布，一架"入侵"并坠毁于温都尔汗的三叉戟飞机是属于中国空军的。

但是，到底林是怎么死的？是否有可能是毛干掉了林？

按北京的说法，林死于飞机失事，蒙古（及其苏联老大哥）一本正经地向世界宣布了这一情况。为投奔苏联，林慌忙中登上了没加满油的飞机，结果，没能飞到目的地。

象所有中国的典型故事一样，随着反面人物的出现，同样会有英雄挺身而出——这就是林的女儿。

9月初，林一家正在北戴河海滨胜地度假。暗杀毛的蠢举遭挫，使他们不得不退下阵来磋商下一步行动。一个逃往莫斯科（林曾在那儿生活过四年）的计划制定出来了。"小豆豆"认为这太过份了。

"小豆豆"（所以这样称呼是因为她父亲总喜欢在打仗时嚼着炒豆）是林第一次婚姻留下的女儿，她29岁，并不特别得继母的宠爱。*

她向周泄露了她父母的这一阴谋计划。

周拿起电话，似乎若无其事地拨通了北戴河的林宅。林这时正在音乐厅听音乐，叶群接了电话。她向周保证，她和丈夫只是

* 这几页文字有不少失实之处，如战斗机"扫射"、"刺客"出现在中南海，毛"寝食不安"及后对林彪死的推测等。另，林豆豆为叶群所生。——校注

在作一次安静的度假，并无飞往何处的打算。

挂上电话后，叶急忙赶到音乐厅向林报警。她哑着嗓子低声说，肯定出事了，周怀疑他们想逃跑。

在几辆汽车的护送下，林一伙冲向北戴河机场。一个阻止林的警卫被立果用枪打中，并推出高速行驶的汽车摔个半死。加油站的几个人顿起疑心，他们把两辆大卡车横放在跑道上，企图阻止林的三叉戟起飞。

林的飞机为了避开加油车，便在机场跑道里绕了一段弯路才得以升空，但仍擦着了一辆加油车，并在这一过程浪费了大量的油。另一架直升飞机，满载林彪集团中高级成员及文件，包括林的日记也遭难。因为驾驶员拒绝服从林的命令被打死。

在远离中国边境二百五十公里处，林乘坐的三叉戟燃油耗尽，一头栽在蒙古首都乌兰巴托以东地区，顿时起火。林本来打算在乌兰巴托加油的。

这件事也许是真实的。但是，这肯定不是事情的全部，因为对有些广为人知的事实无法自圆其说。在经大力宣染的北戴河那幕戏发生之前，人民大会堂开了一次最高级会议，毛已回到北京并主持了这次会议㉟。

这似乎降低了林豆豆这一角色的重要性。

大会堂的这次会议肯定以某种方式转到了反林集团的问题上。最低程度是撤这帮人的职，进则是在心脏北京，或是马上在北戴河消灭林和他的同伙。

“林彪不敢实施他的计划，” 1973年，周对一帮美国编辑们说。那么，是谁的剑给这场戏收尾的呢？

中国共产党后来宣称，“林企图暗杀政治局的一些人”，那么，中共是否也处决了林集团中的一些人，以作为对这种阴谋的惩罚呢？

不管怎么说，毛挖林的墙脚至少有一年之久，这一点很清

楚。暗杀毛的企图使毛有充足的理由逮捕林集团的某些或全部成员，这一点也很清楚。在温都尔汗飞机残骸中发现的九具尸体，有几具弹痕累累（莫斯科声明了这一点，也得到北京的证实），这一点也同样清楚。

在最后的紧要关头，毛的一句鲜为人知的话带有不祥之兆，"由他去吧，他跑不了多远。"*[36] 这句话是9月12日深夜说的。这说明毛在关键时刻会对林开刀。

令人费解的是，莫斯科为什么不抖出一些林弃毛投苏的更丰富、更确凿的证据？有人注意到，北京只是在党内秘密传达，1971年9月危机之后很久才指控林与莫斯科进行了秘密接触。

总之，林作为9月的第二个星期中的首犯未必是真的。不能排除这一点，在9月12日到来的高潮以前，甚至在很久以前，林就死了（6月3日后，他就一直未公开露面）。

莫斯科声称，温都尔汗九具烧焦的尸体中没有一具是"50岁以上"的人。苏联这样做是虚张声势。北京驻乌兰巴托使馆的一批外交官迅速赶到现场把尸体掩埋了。他们说，尸体已烧得无法辨认。[37]

一年多以后，局势较安定些了，柯西金告诉联邦德国总理勃兰特的也是这么回事。[38] 当追问到"50岁以上"这一点时，[39] 苏联方面悄悄回避了。**

如果苏联的确在残骸中找到了可供辨认的尸体和文件，并且认为据此能为难北京，那就很难解释莫斯科为什么要拒绝英国的三叉戟制造商要求检查残骸的请求。

北京事后的解释都以尸体是否可辨认为依据。莫斯科肯定不能向全世界证明林在三叉戟上，而中国的历史编纂者们则毫无顾

---

* 毛的原话是："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校注

** 难道苏联人是想让毛相信，林彪还活着，正在莫斯科侃侃而谈吗？

急也断言林在三叉戟上。这使得中国方面干净利落地掩盖了在林飞往蒙古的夜晚前，发生在中国权力长廊内的暴力场面。

当温都尔汗出现飞机坠毁时，戏也许已在北京收场了，这只不过是它的一个注脚。

立果和他的年轻的帮手们采取了激烈手段，其中一些后来指控在林身上。对于这些手段，毛也许做了防备，或进行了报复，以至反过来吞没了林。

林不象是死于一场事故。

9月中旬前的某个时辰，林可能因被监禁而自杀或暴病身亡。

也可能被谋杀。

“(B—52)对我们不放心”。写于1971年春的《“571工程”纪要》中有这样一段话，“与其束手被擒，不如破釜沉舟”。[40]这就是林毁灭的一条线索。林陷于两难困境之中，一个是毛对他失去信心，一个是他营垒中的那帮急进的家伙们在绝境中做出了鲁莽、草率的反应。

如果毛没有结束林的生命，至少也结束了林的事业。*

1971年的国庆节是在恐怖的气氛中度过的，没有大型游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史以来第一次——毛仍没露面。为迎接游行和观赏节日礼花，9月初就准备好了观礼台。到中旬，它们又被飞快地拆除了。

公园里的庆祝活动格调沉闷。正午时分，周陪同西哈努克亲王出现在颐和园的游艇上。此外还有三位美国黑豹党领袖，一位西哈努克邀请来的法国厨师，很少有政治局成员作陪。

作为主人，周似乎要为葬礼涂上庆宴的色彩。[41]

---

* 1973年，澳大利亚总理惠特拉姆问毛，林是否真的与苏联勾结，毛回答：“我们一直对他有所怀疑。抗日战争时期，他在苏联呆了很多年，而没有回国参战。他向北边飞就说明了这一点。他死后，我们找到的文件使这一点更清楚了。”

毛只是出现在放大的巨幅照片上。北京机场的五十张一套的毛生平的照片在国庆节的一夜间就缩减到三十九张，十一张与林在一起的照片摘掉了。

《人民日报》10月1日未象以往那样发表社论庆祝国庆，也未登毛和林在一起的照片（1970年到1971年间，毛和林在一起的照片最常见）。某些中外人士认为毛去世了——抑或在怀特医生的手中危在旦夕。

10月7日，毛终于出来了。他出现在电视屏幕上，亲切会见埃塞俄比亚的海尔·塞拉西。在前一天晚上欢迎宴会上，这位埃塞俄比亚国王，只收到毛一人转达的致意。读着《人民日报》的致词，消息灵通的人就会知道，这是非同寻常的。海尔·塞拉西在他的宴会讲话中，向毛和林都致了意，许多外交官和中国领导人都知道这事。

在这期间，毛的中国，这个长期以来被几十个国家拒之于国际组织之外的国家，以压倒多数的优势赢得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而且还成了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

驻北京的外国使馆被告知，中国政府发贺电、祝贺在纽约取得的胜利时，"不必"提到林的名字。北朝鲜与其他外国政府一样向北京靠拢，发来了一封标准的贺电，只提到毛和周的名字。[42]

其他政府也照此效行，全世界一致认可了林的垮台。

林彪危机的影响是深重的，为此付出的代价也是巨大的。

文化大革命取得"辉煌"的战果刚过两年，党内三分之一的高级领导人沦为"党的敌人"。

1971年到1972年的分化和随之而来的清洗，使中国人民解放军受到了有史以来从未有过的震动。有些高级军官逃往苏联，二十几位中级军官企图逃往香港，这一事件是对作为军队统帅的毛的沉重打击。

在林的一方，是裙带关系、野心贪欲、及专横地蔑视群众的政治作用。

在毛的一方，也有类似的、忽略群众的问题；是对他“无限忠诚”的继承人未选择好，或过于多疑，或两者兼而有之；他废黜林时未能有效控制北京的军权。

这场危机使毛从紧急的国内事务中分心达一年之久，它还加速了文革的夭折，更加剧了毛头脑中对中国革命前景的日益增长的悲观主义。

人们纷纷责难这次危机中暴露出来的影响极坏的事件：违禁的外汇兑换事件，空军战斗机驾驶舱内的枪战，从“腐朽没落”的香港进口谍报装备，暗杀、毒气和绑架，某些国家领导人对封建传统观点和阴谋的病态迷恋。

毛夫人说，毛位于杭州湖畔的别墅在林彪危机期间被装上了窃听器。有一位中央委员发来一封电报，他这样做是声东击西，使毛转移注意力，而这时一个反毛小组的成员正潜伏在毛的住宅周围。

江青还透露，有位高级领导人因住处时常受到骚扰，毛就为他在中南海另找了一间卧室；并且，毛的女儿——李讷也几乎被林的行动小组绑架。

一股透着阴谋和怀疑的恶臭萦绕在毛的北京。

毛自己怎能容忍如此阴险的毒谋在他的政治局得逞呢？

把林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光荣榜上除名并不那么容易，于是，中央委员会下发了一份调子低沉、蹩脚的秘密文件：

中国共产党中央员员会决定：《中国共产党党章》、《党的“九大”文件汇编》和《人民战争胜利万岁》交由中央处理。有关林彪的其他书籍文件，以及林彪的题词和肖像，由各基层收集起来，交由县、团级党委处理[43]。

在一封给江青的信中，毛极力想把自己的观点与包括林在内的、反对他个人的观点区分开来。他声称："他们是要整个打倒我们的党和我本人，这是我跟黑帮们的区别。"[44]

可惜只有争权夺利红了眼的人才有可能看清这个区别。

林或许也想过，毛企图"整个打倒我们的党和我本人。"总之，如果排除了"我本人"这个核心的话，这个句子一钱不值。这些发生争执的同志本身都是党的领导，他们要"整个打倒"的意义何在？

林彪事件使毛精疲力竭，从这以后到他去世的五年中，他再也没有亲自到中国公众中去过。

尼 克 松（1972）

1972年2月一个寒冷的日子，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的专机降落在北京机场空旷、宽阔的柏油跑道上。它徐徐滑行，随后停下。迎面是毛的巨幅画像，一侧飘扬着美国国旗，另一侧飘扬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

尼克松带着勉强的微笑跨出机舱，周恩来面无表情地候在扶梯脚边。对1954年日内瓦约翰·福斯特·杜勒斯拒绝与周恩来握手的记忆犹新，尼克松主动把自己的手塞到周的手中。

几个小时后，尼克松挨着毛坐在中南海一把宽大舒适的扶手椅上。幸亏这把坐椅，它把尼克松一直钉到夜晚。在这十二小时内尼克松为中美关系所创下的业绩，比任何一位美国总统在这以前的二十四年中——自从马歇尔的竭力调停失败以来——所完成的还要多。

尼克松抵达的当天，《人民日报》没有提及他或他的这次旅行。这份六版的报纸涉及美国之处的只是一篇悼念性质的文章①。一周前，

毛的美国朋友埃德加·斯诺逝世了。*

如果说在意识形态上尼克松和斯诺共同之处不多的话，那么这显然是毛的典型作风使他们俩掺和在一起。通过让报界在"尼克松日"只谈斯诺，毛试图使美国一方挫失锐气，让中国人民知道他对"美国人民"是站在光明一面的看法是永恒真理。同时，他想给人一种处于激烈遭遇战前夕满不在乎的印象，因而在第二天的《人民日报》上才出现赞扬尼克松此行的重大影响的文章。

同对尼克松一样，这种情形对毛来说也是很微妙的。他不可能把总统介绍给他的政治局全体同事，因为林彪事件留下的阴影至今还在。

江青除外，她未能拒绝丈夫的要求，陪同尼克松夫妇去看了一场《红色娘子军》，其他的文革左派人物都没有出场。

在尼克松八天的访问中，除了毛和周，只有两位政治局成员与美国人进行过少量交谈。一位是主管军队的反林稳健派叶剑英，另一位是主管经济的稳健人物李先念。

毛也对将如何转变中国公众的情绪很慎重。因为许多事情还悬而未决；中国和美国还未建立外交关系；普通中国人在反美主义的氛围中生活了二十多年。

一些军官，部分是对林持同情观点的人，对会谈很冷淡，他们念念不忘华盛顿一直坚持把蒋介石的政府作为中国政府。

恰好在两个月以前，一本对毛周的美国路线持不同意见的小册子《中美关系问题》曾在北京的一些书店出售②。不过，只卖

---

* 无疑，尼克松想起，他去中国前不久与病危中的埃德加·斯诺的接触使他感到宽慰。他给斯诺写了一封诚恳的信，信中说："你卓越的成就受到了广泛的赞扬和欣赏。"毛没想到尼克松对左翼作家是如此了解。事实上，毛对斯诺的颂辞也许本来就提醒了尼克松。

了几个小时就被查禁了。中美关系的难处无疑源于军方，与毛现在的看法相比，军方则认为苏联的威胁要小一些，美国的威胁则要大一些。③

毛在印度支那的朋友至今仍对他们曾与美国有过的相互杀戮关系耿耿于怀，对此，毛和尼克松一样心中有数。在尼克松访华前夕，中国最亲密的盟友北朝鲜，宣称美国总统到北京是"一手举着白旗，一手拿着讨饭碗。"④阿尔巴尼亚和北越则对尼克松之行保持缄默，以示抗议。

在准备期间，毛甚至比尼克松还要守口如瓶。不是所有的政治局成员都参与了这一计划，在中国这边，有着不止一个的"威廉·罗杰斯。"* 北越、柬埔寨及其他敏感的盟国，大多于午夜才从周那儿得到消息，而华盛顿对日本、南朝鲜、南越及其他国家的信息通报也仅在几个小时之前。

要做到保密，毛比尼克松要容易得多。在毛的北京，出访只是对外政策实施时的一种仪式（基辛格是多么欣赏中国的这一点！）。

从基辛格1971年夏的首次访华，到他的第二次来访，再到亚历山大·黑格将军和新闻秘书罗纳德·齐格勒的进一步访华，加之若干其他准备活动，直到总统抵达前夕，北京新闻界对尼克松各方面的介绍总共用了 1647 个字。这极少的介绍资料还是以简洁的方式排在第一版的右下角，如同天气预报。而且，所有文章仅限于事实性描述，未作任何分析。⑤

在中国人典型的处事方式中，准备工作特别重要，以致秘密也保不住了。在二月的头二周，北京的居民发现他们喜欢的饭店中奇妙无比的味道不见了，这使他们很沮丧。

---

* 美国国务卿，曾被置于制订对华政策外围。

原来，最优秀的厨师都被派到人民大会堂的餐厅去了！

毛本人未屈尊在宴会上露面。但他执意让美国人在这些繁多的饮食活动中，在垒球场一般大的宴会厅中受到最优厚的款待。宴会有最好的鲨鱼翅、文火煨过的对虾以及海绵状的竹笋。

在离开华盛顿时，美国总统曾把他的中国之行比喻为美国的登月旅行。正象中国不合尼克松的口味一样，美国也不会以超出这个世界的情趣来迎合毛的嗜好。尼克松曾捡起中国这张王牌，作为一根异国情调之棒来攻击五十年代的民主党。早在这之前，华盛顿在中国问题上的举动，也是毛在击败蒋介石的斗争中所面临的变量之一。

毛总觉得缺少点接触什么的。自他最后一次与美国官员们打交道起，已经有四分之一世纪了。他决定温习一下他那生疏的英语。

与这以前所做过的许多次一样，毛的最后一次突击学英语并不很成功，不过他做这一准备却要比尼克松翻开备忘录，邀请过安德烈·马尔罗到白宫共进晚餐要早得多。

1971年夏，毛已经在温习他的英语教科书了。恰好在毛与基辛格第一次见面时，毛的朋友郭沫若告诉我："他（毛）现在喜欢读的两个新短语是law and order（法律和秩序）以及anti-Mao（反毛）。"⑥ 不用说，这两个短语是毛在反对林的过程中注意到的。

毛泽东和尼克松！在1971年以前的世人眼里，这两人一起搞二重奏似乎显得古怪离奇。

·尼克松担任副总统时，美国曾三次以核武器来威胁毛的中国。

·美国曾不止十二次阻挠毛的政府在联合国取得席位。

·在毛进入紫禁城以来的二十二年中，直到前一年夏

天，尼克松委派基辛格访华，这两个国家没有一位政府官员访问过对方的首都。

·在1969年和1970年间，中国报界称尼克松为“战争瘟神”，这一尊称似乎是代替了理查德·米尔豪斯。

此外还有几点：在美国总统访问毛的北京之前，还没有一位美国总统访问过东京或莫斯科；尼克松在中国八天的逗留是美国总统访问外国时间最长的一次；美国总统在一个与美国没有外交关系的国家领土上谈判是第一次。⑦

正是尼克松总统干了所有这一切。据他的办公厅主任H·R·霍尔德曼说：“数年来尼克松一直把共产党中国当作本国的头号敌人。”

然而，他却正在眉飞色舞地与美国最可怕的东方敌人并肩而坐。帕特·尼克松身着一件红礼服，这是她的纽约设计师专为红色中国而精心选择的。

毛象一个矜持、热心，有恩赐感的祖父那样，接待战争瘟神和他的妻子。他们品着中国茶。

举世为之动容落泪，实是情有可原。

每个人都曾怀疑过其他人。然而，一旦尼克松决定去见毛，他就感到有必要以一种豁达的态度来解释他此行的目的。飞机飞往上海时途经关岛，在关岛机场，尼克松看了一下时间，联想到关岛正是美国时代来临的发祥地。“我希望在坐的各位和我一起祈祷，”他喊道，“通过这次中国之行，一个新的时代将会在全世界降临。”⑧

这支从华盛顿飞到北京的特遣队，吃的是空运的西方饭菜，然而用的餐具却是筷子！一到北京，尼克松就象引用《圣经》那样引用毛的诗词。

毛并未以同样的方式换过一套精神甲胄。他没有给尼克松贴

上新的道德标签。我们还不知道他是否说过尼克松的那种大话："改变世界的一周。"

当然，他也不会操起刀叉，抑或引用尼克松的《六次危机》。

不过，中国人并非完全不受最高级会谈的影响。尼克松来访前的一个月，若干建筑物或街道神不知鬼不觉地换了名字。

尼克松夫人访问了首都医院。然而，几星期前它还是反帝医院。紫禁城中毛所在地的北面有一条街，是红卫兵命名的，叫工农兵街，这是一个含糊而不贴切的名字。在尼克松路过这条街之前，它又恢复了原来长期使用的名字，即地安门街。

毛泽东和尼克松的道德取向也不大相同。

的确，权力均衡的政治在尼克松的动机中占的地位并不比毛少（特别是在国内政治方面)。的确，这两人以同样的眼光看。

然而，毛，一个中国的实用主义者，不会给权力均衡的政治披上一件道德的外衣；尼克松则不同，因为他受美国理想主义的熏陶。

毛并不指望与尼克松取得精神上的一致，但他对发表一个"分开写的"公报的建议抱有同感。

美国没有料到双方以这样一种干脆的方式来处理他们的分歧，以致在公报中竟会出现"中国方面"和"美国方面"。不过，周在某天晚上，跑去对基辛格说是毛坚持要这样做的。"这样更诚实些，"他强调说，他深于此道。《上海公报》坦率地暴露了双方的不同意见。⑨

尼克松做了一次长途旅行。他派了一支八十人的先遣队，还带来一支一百六十八人的随行记者团。

毛则呆在家里。在尼克松逗留北京期间，他从未离开紫禁城一步。

他没有去机场迎接"76年精神号"专机，没有出席宴会，也没有商谈过任何政策问题。周为中国方面操办这些事。毛的侄女

王海蓉总在这些场合出现，每次过后都向毛汇报。

在这两人会见之后，毛甚至没与尼克松通过电话，在尼克松逗留中国八天中的第一天就是这样。在以后的几天中，毛也没有与尼克松交换过任何书面材料。

尽管如此，尼克松之行的气候变化还是影响了毛的起居室。这间屋放满了他的明版书。* 隔壁一间是他睡觉、读书和吃掺辣椒的湖南炒菜的地方。

当尼克松走进毛的堆满书的房间时，他似乎激动了，而且认为毛也一定很激动。一位女助手扶毛站起来。"我说话不大利索了，"他对支气管炎的影响抱怨道。⑪ 同时，两人握住了手，按尼克松的说法，毛握着他的手足足一分钟。

握手时，毛对尼克松开玩笑说："我们共同的老朋友，蒋委员长可不高兴了。"⑫ 这是一个生动的开场白，不过，美国人的口气太被动了，对此连反应都做不出。

在场的三个美国人（尼克松、基辛格、温斯顿·洛德）马上就感到毛的意志力。如果未遇见这个人，我会自在些，温斯顿·洛德议论道，"即使不知道他是谁，如果参加一个有他在场的鸡尾酒会，他肯定会凭他的力量把我吸引过去的。"⑬

毛提到基辛格在1971年的鲜为人知的中国之行，提到他的机智。尼克松回答道，"除了几个漂亮的姑娘"，世人都不知道基辛格的巴黎和北京之行。基辛格是罕世奇才。

"这么说，你们常利用你们的姑娘啰？"毛反问尼克松。⑭

关于国际政治问题，他们未作过多的交谈。当尼克松提到一些美国和中国都应有所举动时，毛略带傲慢地说："我这儿不谈这些问题。这些问题应该和总理去谈，我只谈哲学问题。"

毛经常微笑——"一种带着感染力和隐约的嘲弄、警告的微

---

* 基辛格在回忆录中写道："四周墙边的书架上摆满了文稿。⑩不过，它们实际上都是中国古书，这些书都平放在架子上。"

笑……别想欺骗这位擅长抓对方弱点的人和具有双重性格的人”——并时而引出一场苏格拉底式的讨论。他讲的每一话题都包含着格言或含有间接的评论。在第二次提到蒋介石时，他向尼克松指出，“实际上，我们与他的友谊要比你们与他的友谊长得多。”⑮

“不象与周在一起时那样，可以直接发现他横溢的才华，”温斯顿·洛德评论说，“毛的风格是隐喻的、含蓄的，外表上漫不经心，而实际上敏锐、老练。”⑯

如果说毛和尼克松的会谈内容还没有达到使全世界兴奋的程度——他们未作谈判，甚至也没有谈许多政策方面的问题——那么这件事本身就足以产生这一效果了。

美国记者正确地估计到，毛和尼克松第一天下午的会谈确保了尼克松此行的基本成功。

《人民日报》用了两个版面和七幅照片报道了尼克松那天的活动，⑰中国电视台播放了十分钟的实况。这以后，大多数普遍的中国人在看到美国人路过时，都毫不犹豫地注视着他们，并对他们露出微笑。

双方态度的改变，似乎比毛在一个小时的角色中所能表明的还要出人意外。而且，这一现实的改变是不可否认的。而毛只是在他的安乐椅上指挥调遣着。毛生平第一次对美国人取得的至关重大的胜利也是有目共睹的。

对毛来说，这“改变世界的一周”不是一支突如其来的幻想曲，而是其逐步施展的策略的一部分。几年来，他一直认为美国问题的严重性正在逐渐减弱。在1970年，当尼克松真正对中国表现出兴趣时，毛心中更做好了准备。

1971年3月，一支美国职业乒乓球队到日本参加世界锦标赛。中国邀请了几支国家球队在回国途中到北京比赛，有几名美

国队员极想去中国。恰巧，就在他们离开日本的那一天，美国政府全面开禁，允许美国人去中华人民共和国。美国队员对中国队员表达了这一意愿。

随即，周恩来发出一封电报说邀请美国人是不可能的。毛在北京听说了这封电报，表示不赞成。他派人打电话取消了这一决定。* 结果，美国人受到了邀请。[18]

这一举动向尼克松来访迈出了象征性的重要一步。周也直截了当地领悟了毛对美国问题的看法。

数月后，周不加渲染地对美国客人说："毛主席碰巧感兴趣"与华盛顿改善关系。[19]

毛与尼克松握手言和的直接背景是美国的越南问题。尼克松以娴熟的技巧竭力掩盖美国在越南的无能，他想在一种和睦的气氛中与中国缓和关系。

如果说越南问题刺激了尼克松，那么从毛的观点来看，它却成了中美妥协的障碍。尼克松还处在战争带来的极度苦恼之中，他需要毛的帮助以除掉他脖子上的这一不祥之物。毛希望能超出越南考虑问题，但他又不能超出太远，马克思主义世界的强大压力迫使他继续援助他烦人的印度支那盟友。

从某种意义上讲，尼克松走进毛的书房时，毛实现了他的主要目的。

整整四分之一世纪，他对美国的要求仅仅是美国**不要**去做某些事。他在四十年代后期（当时华盛顿在援助蒋）、在1950年（爆发了节外生枝的朝鲜战争），在1953年（艾森豪威尔正强迫中国在朝鲜停战），在1954年和1958年（台湾海峡危机）以及在1966年（一些美国军官想打赢越南战争，从而给中国一点颜色看）一直担

---

* 有关北京的这次分歧，毛对尼克松作了有趣的答复。毛说，中国一向坚持在两国人民互访的基础上解决一些重大的问题。他承认："后来，我认为你的做法是对的。我们就打了乒乓球。"

心美国会对中国突袭。

在毛看来，美国在亚洲的扩张似乎已止步于尼克松和他之间的小地毯前了。他在夸大美国的衰败，这一点我们知道；然而，他又正确地估计到了，尼克松的出面是一种担保，美国和中国多年内不会再发生战争。

即使毛认为一些美国人对中国的幻觉可消失在最高级首脑脚下的尘埃中，也情有可原。

美国侵入远东的理由何在？尼克松带着越战的满脸愁云来到中国。美国东方之行的使命何在？对尼克松来说美国准备与中国共享亚洲的未来。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普罗米修斯主义在亚洲的真正作用何在？尼克松遇到了美元下跌的麻烦，他要来请毛"帮忙"结束越南战争。

尽管如此，积极的合作谈何容易。美中对话几乎还处在小儿嬉戏阶段。同今天的情况相比，当时每一方都远不了解对方的政治形势。

毛和美国人当时仅在一个国际争端上达成了默契。双方都援助巴基斯坦，因东孟加拉湾（原属巴基斯坦）问题与印度对抗的斗争。

毛从更长远的角度看待越南问题，这一点对依然卷入越战的尼克松来说做不到。另一方面，美国也要从他的"和平结构"的长远角度操纵亚洲的未来。为了不让人说自己抛弃了印度支那朋友，毛不得不对此略而少谈。

苏联问题也是一样，由于时间和空间的不同，苏联和双方有着不同的关系。足以震惊的是，一向攻击"赤色分子"的尼克松，比毛更急于想知道苏联对"改变世界的一周"的反应。毛看得更远些。有充分理由相信，在1972年，毛的反苏和亲西方倾向比美国方面还要大。

尼克松直截了当地问毛："在对中国最直接的威胁中，哪一个

更大些？是美国的侵略，还是苏联的侵略？”[20]毛回答强调了苏联的威胁。然而，美国方面果真理解并欢迎这一暗示吗？

毛希望尼克松在他的战略中把中国放在第一位，而尼克松在这方面又没有理由去做。前两次，毛也曾希望华盛顿能更慎重地对待中国共产党。他觉得罗斯福和杜鲁门在二战结束时对中国共产党估计不足，而且，杜鲁门的立场在中国介入朝鲜前夕依旧未变。难道毛现在还没有具备使美国重视中国的资望吗？

然而，毛又谴责了美国对中美合作的犹豫不决，他对美国的看法存在矛盾心理。强大的美国曾在过去折磨过毛的中国。不过，毛也怀疑美国是否会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过分自信和消极被动之间，华盛顿能找到一条折中之路吗？

毛的矛盾心理之根源在于他年轻时对西方的复杂感情。美国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毛很难使自己依附于这样一种势力。美国发达？是的，但它可能满足于自己富裕和舒适。然而，马克思的“规律”也许注定了它的衰败要比它的兴起快得多。

毛内心可能怀疑，如果他象去过苏联一样去过美国，他肯定会象他对莫斯科一样对华盛顿感到失望。

难道毛也象尼克松一样，梦想着一种人类的“新的和平结构”吗？

毛极少谈起任何实在的国家目标，他倒是真的用过“世界革命”这个词，但它远没有那种国际性的、总括性的企图。它是说外国要象中国那样干革命，或者是简单地把中国的仇敌看作是自己的仇敌。

国际关系作为一种过程对毛极具吸引力，他经常兴致勃勃地与来访的政治家们谈论这一问题。

他能迅速地把握一团事物的意义：变化的永恒性、无所不在的斗争、混成的庞大军事力量、空间本身的无效性。

他满足于看到超级大国、“反动派”及其附庸们的计划被“不

可抗拒的力量”推翻。

然而，除了中国的安全，毛似乎对充满冲突和衰败的混乱过程不那么感兴趣。他有点儿象一位坐在山上漠视市井喧嚣的先哲。

这是毛第二次见基辛格，并且还要见他多次。来自中国的消息说，毛对基辛格比对尼克松更感兴趣。他在与尼克松的交谈中也常常要把基辛格扯进来，这在毛与外国政府首脑的谈话中不同寻常。

曾经五次见过毛的温斯顿·洛德说：“毛欣赏尼克松的精明和智慧，但是他喜欢与基辛格在一起交谈。”[21]*

然而，毛对基辛格的评价却不如基辛格对他的评价高。

1970年间。基辛格说过一句俏皮话。他说，在前民主党政府中，迪恩·拉斯克恶意地把毛比作希特勒，而在尼克松的政府中，人们又善意地把毛比作希特勒。[23]一个不贴切的比喻，不过当时基辛格对中国的认识确乎差之甚。

毛显然知道这一讥刺，他对蓬皮杜总统说：“美国说我们比希特勒还坏。”[24]

毛知道，基辛格在1971至1972年间热衷于中国问题，主要是由偶然因素引起的。打开中国的大门，对基辛格来说是一次特殊的机会，他可以借此扩大自己在美国政府中的权力（那时他的权力还有限）。

基辛格兴奋的部分原因，是他在中国发现了一张可以对付莫斯科的牌。这意味着苏联，而不是中国，是基辛格战略的中心。毛到后来才彻底明白这一点。

与尼克松，而不是与基辛格在一起，毛更知道自己在对外政

---

* 1973年毛对蓬皮杜说：“基辛格喜欢作情况简介，但是他的评论总不那么准。”[22]

策中的位置（虽然尼克松精明且狡猾，但在外交手腕上，基辛格则是诡计多端。）

毛认为，尼克松是一位正统的右翼政治家，他拥有广博的世界知识，而且现在正带领美国适应七十年代的现实变化。毛对尼克松说过："有人说你是右派。相比之下，我更愿意（西方人）从右边掌权。"㉕他读过尼克松发表在《外交事务》上的文章，担任总统之前的"新尼克松"，在文章中表现出自己在五十年代是个反华迷。

毛对尼克松比对杜勒斯要更宽容一些，因为他对苏联在世界上的角色变化感到深深的忧虑。要从另一方来对抗苏联，谁还能比尼克松更合适呢？㉖

毛对西方保守势力的热情使左翼人士感到很吃惊。这是一个理解的问题：毛不很了解西方的政治，看不出自由民主党或劳工党的立场是否能站得住脚。

还有一个可预言的问题：毛欣赏资本主义国家的领导人表现出资本家的行为举止，这验证了他的世界观。

并且，毛也需要建立一个与苏联对抗的统一战线：尼克松（还有欧洲的爱德华·希思和弗兰茨·约瑟夫·斯特劳斯）似乎比自由民主党（还有欧洲劳工党领袖，如哈罗德·威尔逊和赫尔穆特·斯密特）在反苏方面更可靠。*

周在上海为尼克松送行——这一次他微笑了——然后他赶到北京与毛商谈这"改变世界的一周"。紫禁城对这次访问所打的分数是优。

毛对于世界的战略分析即把苏联作为世界的中心问题，已作

---

* 反苏是关键的因素。五十年代，在与莫斯科分裂之前，毛没有讲过西方右翼团体的好话。1956 年在与冈瑟·魏森博恩谈话中，毛赞扬过西德的社会民主党。他对这位作家说："它应该得到支持，它（在 1957 年）选举中的获胜是公平的。"㉗

为这次最高级会谈的结果而引起世人的注目。

在台湾问题上，毛的收获相当大。美国退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台湾的争议，并在公报中指出："台湾不容置疑的属于中国，并且希望中国人民自己和平解决台湾问题。"[28]

今后的时日，尼克松将争取中美关系半正常化，最大限度地使中美两国接触，进行文化交流和经济贸易。

毛则在试探加速全面发展的外交关系。尼克松向他许诺，在他有望的第二任总统任期内这种发展会早日到来。

从某种角度看，毛和尼克松都有所获。中美双方结束了对骂状态，都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苏联再也不可能窃喜于北京和华盛顿互相没有接触了。

尼克松中国之行所造成的气氛，使多数国家就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问题上投了赞成票。在尼克松离开北京之后的九个月内，又有二十个国家承认了毛的政府。

华盛顿从五十年代就反对中国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现在这五项原则却出现在公报的公共部分。尼克松之行也导致台北的国际地位开始下降。但是毛没有帮助尼克松搬走他脖子上的不祥之物，否则，他会被河内谴责为背信弃义。

从长远来看，毛对美国的看法是正确的。"英国人圆猾老练"，1958年他在谈到约翰·福斯特·杜勒斯时说，"美国人性子相当急躁。"[29] 他知道，美国不会象欧洲人那样，对长期扮演宗主的角色有足够的耐心。

政治局的任何人都很难说毛错了。

从毛的利益角度看，尼克松的突破珊珊来迟。毛希望美国能及早地作些于中国经济发展有益的事情。他剩下的时间不多了，没有时间来巩固横跨太平洋的新纽带，印度支那的局势对这条纽带的强大巩固老是一个障碍，这使得毛在有生的四年中拿出三年来处置它。

毛还有时间去诱导华盛顿放松对台湾的控制吗？如果这样，毛就能在他去“见马克思”之前看到中国内战的最终结束了。

继尼克松访华之后，毛的对日政策也改变了。

事实上是日本采取主动的。在对“尼克松冲击波”的反应中，日本赶忙拥抱北京，而与台北断交了。

最终结果是毛不再大谈“日本军国主义”，转而对日本采取一种谨慎的肯定态度。

这不单是由尼克松的说服造成的。与美国的缓和理应使毛对美国在太平洋的主要盟友日本抱更乐观的态度。毛正在接受美国对日本的态度。* 不久，他就敦促基辛格对日本礼貌些，他要求这位国务卿花在东京方面的工夫要与花在北京的一样多。基辛格则附和道："我接受这一劝告。㉛

为欢迎尼克松的到来，毛赠写了一首深奥难懂的诗：

老叟坐凳
嫦娥奔月
走马观花

坐在凳子上的老人是帝国主义。嫦娥（一位公元前3000年的神话人物，她飞到月宫去以躲避她那令人作呕的丈夫）是人造卫星的象征。尼克松本人在中国的简短旅行就象是在走马观花。

毛赞扬他的客人。尼克松至少来看了看这个中央帝国，他不象那种典型的帝国主义首脑，仅仅舒服地坐在凳子上。

然而，毛的另一些观点却使那些想和他携手并进的西方首脑们不安。

---

* 毛在多年前谈过的中国——日本——西方友好协约的想法正在到来。1964年他对法国客人说："建立一个伦敦—巴黎—北京—东京的轴心国是一件大好事。"㉚

帝国主义的时代一去不返。不仅是美国和苏联，而且中国现在也能向月球发射卫星了。

不管尼克松是怎样的明智，他也只是走马观花，掠过表面，对现实作了短暂的一瞥。

毛后来在武汉对一帮军界人士说："尼克松没理解我的意思，"[32] 也许这样倒好，这句话虽然对尼克松并非不友好，但还是使这位美国总统感到困惑。如果他理解了毛的意思的话，他肯定会奇怪他和毛是否还能从类似的角度来看这个世界。

破碎的梦（1973—1975）

毛与周恩来的长期合作关系在1972年最为密切。虽然毛没有在公共场合赞许过他——他不习惯夸耀他的副手——但周却在林彪叛逃和尼克松访华期间出色地辅佐了毛。

这位总理与毛的地位从来没有如此接近过，而毛也很少象在1971年到1972年期间这样感到迫切地需要周的帮助。也许，自长征途中遵义会议这个转折点以来，毛从未有过这样的感觉。

为了击退林彪，毛不得不向右转，这使他倒向周。他以向美国开放来对付某些极左势力和军界的反抗。周又一次成为必然盟友。

毛并不愿依赖周，他毕竟不具备周那样的天性。如果说率性诚物、深谋远虑的毛是虎、猴二气的结合，那么，周就是一个将毛所痛恨的中国官场传统带入共产主义时代的人。

周远不象毛那样。毛信仰一个永恒变动的世界，偏爱高于一切价值的斗争，认为一切现

象都充满着矛盾。

在五十年代末，非斯大林化危机之后，周没有象毛那样变得多疑。因为马克思主义对周来说，并不象感情用事、刚愎、别出心裁的毛认为的那样意味深长。

周不象毛那样爱冲动，他从未被排斥出党，而毛则有过三次这样的经历。① 更不说周会象刘少奇、邓小平及其他人那样遭受到清洗的危险。

周把毛看作是二十世纪中国的指路人，“他教导我们认识了一切，”周以自己特有的声调说。②

周不得不对毛谨慎。他看到毛渐渐地对一帮有资历的同事感到不满，他小心翼翼地尽量不提出异议，以免引起晚年的毛的专断或猜疑③。

周在六十年代批评毛时，采取的是一种既隐晦又玄妙的方式。“毛主席是没有错误的，”周在文革期间一次紧张而又冗长乏味的会议上圆滑地说：“他很谦虚。”为了更清楚地表达自己的意思，他又补充说，“我们大家，包括我自己，都犯过错误。”*④

然而，自1971年后期起，周感到他与毛的关系比以前任何时候都安全多了。

“怎么会有绝对的权威呢？”周在深思熟虑后，公开对一个美国来访者说，“毛主席在某些问题上可能是权威，但如果有些问题他不熟悉，他又怎能成为这些问题的权威呢？”他再一次提出了一个轰动性的评论。“这里还存在一个时间问题”，他在一次对话的开场白中讲道，“你今天是一个权威，但这是否意味着你明天还是权

---

* 周在另一次造反派参加的狂热的文革会议上说：“我们跟随毛主席几十年了，大部分时间，我们都保持镇静，因为我们要顾全大局”。

尽管周很小心，他还是不断受到批判。1969年，极左派们说，实际上是二十九个布尔什维克。这就把周与28个布尔什维克联系了起来，而他们是毛在三十年代的主要对手。⑤

威呢？⑥”

不错，周的评论是针对林彪而发的，因为“绝对权威”是林彪的图腾之一；但周也在慎重之中试图摇撼毛那天神般的地位。

周的勇举没有持续多久。七十年代中期的痛苦争吵很快将证明，这位总理不会被允许成为毛真正平等的人物，只能作为第二号人物。1971—1972年偶然取得的两项重要功绩，使周成为毛不可缺少的执政官，但又即刻招致了非难。

林彪已不在位，但到1973年，毛对反林联盟并不十分满意。门户虽已向美国打开，但到1974年，毛听到了批评中美交往的声音。

毛自己曾鼓励林彪要政治挂帅，使军队成为一所“全国人民的大学校”。林按毛的要求建设军队，而这是彭德怀所做不到的。在此背景下，毛发动了他的文化大革命战役。

令人难以理解的是，1972年，毛再一次器重彭德怀式的军队领导人。

许世友是地方上的军队指挥员的典型，他代表着解放军的声音，在反对林彪推动的极左的农村政策时，这位广州军区司令员说：“也有必要为贫富均等而去发动一场革命。”⑦反林联盟自身的性质决定了它不可能存在长久。许世友与这些人都不是毛的天然盟友，时间很快就会清楚地证明这一点。

在1971年至1972年之交的冬天，毛没有丝毫的胜利者的喜悦。他既没点名指责林彪，也没有另寻“接班人”、“最亲密的战友”来代替林彪。如果周的支持者们期待着荣誉降临到周的头上，他们会大失所望。

毛似乎缺乏自信。林彪事件的了结是一个安慰，至少，它没有使更多的毛主义式的决策出台。

文革中的一切观念、信条和斗争，在毛的手中就象许多一触

即破的泡沫一样崩裂了，只剩下他滑腻的双手粘着强权政治的汗水。

明显地出现了向右转局面：农村实行了宽松的政策；文革的受害者东山再起，有的得以提升；学校教学趋于正常，而且意识形态的压力有所减轻；工厂巧立名目，实行物质刺激；对历史及学术问题展开讨论，政治的束缚也有所缓解。

1972年的右倾风肯定使毛想起了1962年因大跃进失败刮起的那股类似的风。

为了与死亡进行顽强的搏斗，为了夺回对军队的控制权，还为了淡忘他脑海里“无限忠于”的林彪，毛需要付出代价。

一个寒冷的冬天，毛意外地出现在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外交部长陈毅死于癌症。

少数人注意到，毛出席了这次追悼会，并与陈毅的遗孀和子女作了详谈。的确，陈毅有过四十年的戎马生涯，但他却成了毛的文化大革命的受害者(他的一个儿子也被迫害致死了*)，而毛只给了他迟到的保护。

毛很少参加同事的葬礼，为什么此刻他会到八宝山来呢?

毛喜欢精力充沛的陈，尽管他并不总是同意他的观点。当阴谋活动在北京似乎已习以为常的时候，失去一个经常可以直言相陈的人，对毛触动很大。

然而，冷漠的大理石殡仪馆挤满了军人，这意味着还有更多的故事。毛欠了军队指挥员们的帐。他的出现，是为了肯定这位外交部长的功绩，也是为了抹平军人们身上的咔叽布制服上出现的皱折。**

毛发现，在军队中清查林彪余党并非易事。有些亲信曾在林

---

* 原文如此。——校注

** 甚至朱德也允许赠送花圈，并到医院向陈毅的遗体告别。这位反对毛的文化大革命的人物多年来一直未公开露面。

的第四野战军任职，极少数顽固分子则是忠于林的嫡系。

七十年代初期，军队中抵制北京的一部分人并不是林的亲信，他们仅仅是对在林彪垮台的余波中任意处治军人表示不满，因为有数十名将军被捕或被免职。

广州附近的中华温泉，竹丛中突然射出一梭子弹，一名年轻女子倒地身亡，这是林豆豆，她当时作为政府的客人正在这里度假。⑧（译按：此为误传）。

子弹来自附近的军营，从她背后穿入。毫无疑问，勾动扳机的肯定是一名普通的士兵，但他背后一定有指挥。指挥者肯定恼怒林豆豆，1971年9月在北戴河表现出的“英雄行为”——广州军区一直是林彪的权力基地。豆豆的尸体上放了一块红布，上有黄颜色字样：“大逆不道。”⑨

在毛的眼里，林豆豆是一位模范公民，但这并没有使她免遭暴力的威胁而过早地死去。

即使毛认为林是一个“两面派”，这也不能阻止许多军官悄悄地为林说句好话（有时甚至出现在刊物上）。

尽管毛已经置弃了他的国防部长——这是他第三次这样做——但并不意味他能在替代者的问题上取得一致意见。这一职位在林死后空了四年之久。

1972年中期，斯里兰卡总理班达拉奈克访问北京，她代表斯里兰卡儿童向中国儿童赠送了一头幼象，然后抵达中南海与毛会晤。此时，毛为了阐述他的看法，提到了两件人们意想不到的事情。

当对世界形势作广泛的交谈时，毛突然对这位友好的斯里兰卡人谈起了发生在他政府内部的迫害和暗杀行为。班达拉奈克夫人迷惑不解，也很尴尬。过了很久，甚至在她离开毛的书房时，她可能还不知道毛究竟要将哪一个“阴谋家”置于死地，并使之名声狼藉。

这个搞阴谋的“两面派”就是林彪。当时，幸存的林的同情者们都被召集到中南海，以候发落。毛准备按他对真理的悉心理解来造就这个世界。

那个“两面派”死了……用毛自己的话说，“他‘企图谋害我’……他反对整党建党，反对向美国开放……”

五个月前，即使尼克松也不知道这位前任国防部长的任何真实情况。而现在，毛却主动向一位女士透露了林的消息，而这位女士只是来寻求经济援助，并不是来探听政治秘密的。

两周后，毛对法国外交部长舒曼讲了类似的关于林彪事件的权威性看法。毛对他的法国客人，总括地说了一句：“只需一杯苦酒，林彪就完了。”[10] 这一评论，似乎并不表明林彪密谋反对被动的毛，至多意味着，1971年的大事年表会记载这件事而已。

“我们必须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这三者之间的利益。”毛在一份关于在农村实行温和政策的文件中写道。[11]这份文件接着以社论形式谈到过去“人为的平均主义已经阻碍了贯彻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这意味着风在向右转了。

不同的时期，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有不同的意义，不同的作用。

然而，尽管各派的官员们所引用的许多语录条文是死的，但毛本人仍然活生生。他决不会退出思想是非之争，而只是暂时停下来。一些领导人可以任意抽出毛泽东思想的某一部分以服务于自己的目的。刘、邓、林、江青都这样干过。只有毛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掌握着其他人的命运。

1973年春，毛正处在对外政策浪潮的顶峰。

继尼克松之行后，他在书房里相继一一接见了承认中华人民

共和国的二十几个国家的领导人。* 他对他们晓之以理，有礼貌地询问他们国家的情况。他给未被承认时的荒芜年代罩上一层面纱，给历史梳理出明朗的脉络，对过去孤立时受的指责等一些琐碎事表示毫不在乎。会谈给人的印象是，中国和某某国家象一对老朋友，两国之间从容地交往就象空气和水一样自然。

毛是借抗日的东风走上权力舞台的，而现在，与田中角荣首相相处倒把首相当成了一个小弟弟。⑫

周把田中从休息室带到毛的扶手椅边。这位主席向他们两位示以欢迎的微笑。“你们吵完了吗?”不等回答，他又宣称，“吵吵架对你们有好处。”

“我们进行了友好的谈话。”田中壮着胆子说。而对一场关于中日战争竟使中国遭受了“灾难”(日方的用语）的争论避而不谈⑬。

毛以哲学家的姿态出现，居高临下。因而会谈远不是什么诚挚的协商。当挥手让这两位总理就坐时，他说道:“不打不成交嘛!”

毛建议这位并不引人注目的日本人喝点茅台酒。田中回答道:“听说茅台是65度，不过我很喜欢喝。”

“不是65度，而是70度。”这位中国领导人纠正道，“谁给了你这么个错误的信息!”

毛的后一句话使话题远离了茅台酒而向其可能发展的方向深入。“顺便说一句，中国古老的东西太多了，让旧的东西捆住你可不好。”

这使毛转而自言自语地谈起了他的父亲，避而不谈日本政治。

他说道:“小时候，父亲对我很严厉，我就造他的反。儒家的

* 他在七十年代初期会见的外国领导人远远超过他一生任何同一时期内接见的人。仅在1973年内，他就款待了非洲国家的许多首脑。

《四书》《五经》上说父慈子孝，我问父亲为什么对我不好。不扯远了，你在日本竞选时，角逐很激烈吧？”

当田中谈到日本竞选的艰苦时，毛不解地摇摇头，喃喃道：“到街上去作竞选演说谈何容易啊！……”这位老战士把他智慧之手置于这位年轻政治家的肩头。“在街上演说可是件苦差事，”他说，半个世纪前他在长沙就经常这样做，“请多多保重”。

“你们的议会制度怎么样？”他问田中，这位首相小声道：“它也有它的问题，是吧？”

毛的思绪好象返回到几个世纪以前，而越过了可怕的中日战争。他把确立日本在亚洲的领先地位、赢得了其学生的羡慕的，日俄战争之后的时期当作一段过去的插曲，似乎中国是先生、日本是学生的历史时代又会重新开始。

“在毛面前，周只是个无足轻重的人物，”田中回到东京时对他的一些政界朋友说，“他的举止就象陪在某个著名国会议员身边的一个笨手笨脚的秘书。”⑭

这番评论很有意思。这甚至使人觉得，田中的这番话倒不象是在描述周，而是在活灵活现地描述他自己在毛的尊驾前的表现。

在联合国，毛的政府还只是个新伙伴，他还远不会象某些人预言的那样，在这个组织中“制造混乱”。在纽约的中国代表完全是按惯例循规蹈矩地对待公文、辞令和外交礼节。

与此同时，中国在特驼湾成了代表第三世界说话的最有影响的声音，其言论针对“富”国和“穷”国在海洋法、债务、贸易结构等问题上发生对立而发。

《人民日报》大肆宣扬中国在安理会（中国是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和其他世界组织中的言论和行动。

然而，毛似乎对联合国感到厌倦。在所有关于对外政策的谈话中，他很少谈到有关联合国的话题。他把这一话题留给了庞大

的北京政府中旧势力的国际主义派，而这一派是外交部中的不稳定因素。

他对于开会讨论诸如和平、防务、国家争端之类纸上谈兵的做法不太相信。他是热衷于权力平衡术的中国头号人物，而不是容易接受协作方案的国际主义者。

至于“富”国和“穷”国之间的紧张关系，毛强烈地感到：第三世界国家的观点具有道德上的正义感，然而他涉及到复杂的经济问题方面的知识是不全面的，或者说是落后于时代的。

毛更感兴趣的似乎是全球性反对超级大国的行动，而不是第三世界国家的敌人在联合国的声音。

这是自然的。毛又为中国进入超级大国的大同盟跃跃欲试，而不满足于“新兴国家”的小伙伴中作头领的地位。

1973年早春，当来自蒙古的风沙裹住了北京城的时候，毛与基辛格第三次坐到谈判桌上。中美两国关系跨出了一大步，终于达成协议：在双方的首都建立联络处(其实是大使馆)。

中美联合成为国际事务中的既定事实。

然而，仍有人对毛与尼克松在北京的握手言和表示怀疑。在昆明召开的一次秘密军事会议上，一位发言人言辞激烈地说：“有的同志说，过去我们把苏联与美国的谈判说成是美苏勾结，但是现在我们也在与美国谈判。”[15] 人们确实可以这样说。

有位发言人(他的发言稿被台湾特务弄到手)极力反驳了对毛亲美政策的抨击。他对解放军一些低级或高级军官说：“尼克松只是一个过渡性人物，”而中国的真正目的则是“要与美国人民接触”。

怎么理解毛脱离曾亲如兄弟的苏联阵营呢？这份发言稿婉转地指出：“当前，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减少只是表面现象。”

与尼克松一样，毛也无法告诉他的人民政策没有改变。只有军队的官员才知道中国的对美政策已经改变了，正象美国人能发

现尼克松对中国的政策改变了一样。

政治局出现了新的紧张，这在一定程度上是毛自己造成的。

善于应变的毛除了对原则性问题运用他的说服力外，在政治局的各派中，他总是喜欢处在中间地位。这样，他就能根据辩证法的漩涡决定向左还是向右。

1973年，毛发现，反林联盟把他向右拖得太远，他感到一种向左转的冲动。他搜寻意识形态的宝库寻找弹药，以便向那些他认为太保守的同事们开火。

在中国政治局的最高层，大自然在新危机的形成过程中扮演了一个罪恶的角色。1972年，医生发现周的癌症已到晚期。[16] 这一情况无疑破坏了毛、周的合作关系，正象疾病损害了周的身体一样。

毛本人很快失去了左右政治局的力量。他自己的健康状况也一直起伏不定，每况愈下。一连几天的紧张工作之后，帕金森氏综合症就会使他一星期卧床不起。除了签署文件和就重大事件作些商议外，其余时间只能躺在床上。

对毛的接近，在北京的权力竞争中变得极为重要。谁能从这位老者那里得到一个赞许的点头或签字呢？

政治局的人都知道，周是毛与这个国家之间的桥梁。现在他们也知道，这一作用至多还能维持两年的时间。

当周在人民大会堂设宴招待西哈努克亲王时，赴宴的客人们都感到震惊：邓小平竟出现了！

和其他中国领导人混在一起，邓有点不自在地移动着小步，六年的流放生活看起来使他没什么变化。他是一个直率、矮壮的权力人物，也是毛在后十几年中最讨厌的三大人物之一。[17]

邓微笑着。他曾是叛徒、恶魔、异端、反革命、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第二号人物，中国共产党强硬的前任总书记。他习惯于坐

在离毛的座位很远的地方，以尽可能不听这位主席的最新指示。

就象一个乞丐那样，他从政治的墓地中又走回 来了。*

毛的侄女王海蓉，(她曾是北大学生，现为外交事务助理）拉着邓的手，把他再次介绍给一群还瞪着眼睛表示怀疑的外国记者。邓优雅地鞠了个躬，并说他很高兴又回来了。他拘谨地解释说，他一直呆在江西的干校，就象一位学生在解释自己的缺课一样。

王女士轻松悦耳地解释道，现在他是副总理。几周后，外界就知道了，毛认为自1966年以来邓受到了“太苛刻”的公开指责和政治剥夺。⑱

大会堂似乎出现了和谐音调，邓的再度出山说明毛正在下沉的权位已经受到震荡。

病中的周要求邓担任领导职位，也许是周扳着毛的胳膊，逼他签字答应这个要求的。毛则由于那场轰轰烈烈的批判林彪及其余党的斗争的必然结果而引出他应当接受邓。

邓一听到林倒台的消息，马上就精明地从干校给中央委员会写了一封信。⑲他表示对林的叛逃万分愤慨，并问能不能参加批林运动。

邓的复出是毛对帮助他击败林彪的那些人的一个报答。毛曾依靠过地方军区的指挥官，这帮顽固的老将多数是邓的伙伴。毛已经发给在文革中受迫害的高级官员返程的通行证，(邓继刘之后）成了这些人中的当然的英雄。

然而，使邓上台的形势并不单单是一个“左”对“右”的问题。毛的不佳的健康状况，使权力散落的根本主张，对真理唐·诘诃德式的追求，都使他精心安排的每个计划滑向不稳定的一边。

毛已力不从心，难于制定一项持久的政治策略。但他可以发

---

* 我在其他地方（《铁树开花》，1975，第201页）也描述过：在杭州的一家电影院，当观众在新闻片中看到六年多来第一次露面的邓小平时，他们异常震惊。

最高指示，握有予夺之权，也可以行使否决权。

他扮演的是最高立法者的角色。在任何形式的意见冲突中，他只要呢喃地吐出一句话或匆匆写出一条格言，就能稳操胜券。但是他不能坚持到底（象在文革中那样），也不能让现实适应他的格言。

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演出的一个最新场面，这也太危险了：新中国——地球上最大的官僚机构，历史上组织化程度最高的社会，以专政为自豪的国庆，竟是一条无头之龙。

林彪曾诡称他的上司为“B—52”，现在毛真正象一架重型轰炸机了，它能经常产生巨大影响，但却对底下的事情影响甚微。

人们也知道这架特殊的“B—52”快要耗尽燃料，航程将到尽头，再也扔不出几个袭人的炸弹，故用不着害怕（除了那些容易被击中的人以外），当然有人倒是希望它仍有袭击的威力（那些希望从残骸中渔利的人）。

1973年8月，毛“主持”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人民日报》报道说，当毛出现在主席台上时，“全场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毛主席“向代表们亲切地招手致意”。这听起来象是一个君王临朝，而不是一个执行主席的到会。毛在会上并未讲话。

会议只开了五天，比上届即1969年那一次的二十四天要少得多。也许因为毛不能连续坚持五天以上的紧张会议。

“九大”已经做得够秘密了，而“十大”则直到会议安然结束才对外宣布，至于会议地址，则从未透露。[20]

在会议文件中，找不到任何智慧之星，只有一篇新的党章，两篇老生常谈的讲话和翻来复去地提的几个口号。如此而已。

枯燥乏味的原因有两个。其一，毛控制权力但不管理；他的趑趄不进似乎抑制了周围人的创造性。其二，在1973年这种时候提出新的方针政策，就象是要在上帝面前提出修改《十诫》一样。

大权在握的周和那些认为他完成了政治使命的人，与毛夫人和她那些靠不住的、急躁的朋党之间，出现了一种无奈的紧张形势。毛夫人及其朋党从年老的毛反传统的基调中，嗅出了爬上中国政治顶层的最后机会的气息。

新党章中说："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换句话说则是：我们最终要实现目标。但是就现在的情况，只有上帝知道该怎么办。

周是"十大"上的星星。他的外交政策的跟随者得到提升。某些反毛主义的官员们也是这样，他们中的大多数与周有联系，并由于反林而受到过奖赏。与"九大"相比，极左派的军官们损失惨重。

然而，这并不是1973年这次大会的全部。

极左派的帆船乘着毛的风赶上前来。来自上海前纺织工人、年轻、英俊、富有战斗力的王洪文，与周均分了大会仅有的两个报告。"反潮流"是王的报告中的全旨。

大会着重讨论了林彪事件。对其处理采取了中国惯用的方式，林被"永远"开除出党。

毛没为自己派定一个第二号人物。林原来的职务——党的副主席，由五个人来分担。毛似乎希望所有的竞争者都失去平衡，这要么是他对自己的权力松动不满，要么是他的将临深渊之感产生出一种遗憾。

毛79岁，周75岁，周以下的四位副主席中的三位平均年龄接近70岁。在他们中间，39岁的王洪文就象一个和五位大伯在一起的小男孩。

令人担忧的是，这些早在二十年代创造了中国共产党的老兵们，现在仍主持着党的会议。而王和他的战友们（包括江青）又不具备作新兵的气质或威望。

实际上，毛并没能和谐地均衡各方面的力量。也许是由于他

年老体衰，也许是由于刚愎自用，他正在深宫发出一些难以释清的指令，使事态陷入混乱。

周看到了意料中的毛的衰老；而江青则受周的患病所鼓舞，她看到皇冠正滑向皇后的手中。

从某种程度上说，毛的地位要比“九大”时低。他一度被直呼为“毛泽东同志”。六十年代后期，根本听不到这样的称呼，毛被誉为“伟大的舵手”、“伟大的领袖”、“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最低也被称为“毛主席”。周一般尽可能地使用列宁的语录，而在六十年代后期更多的是引用毛的语录。

与1969年相比，中央委员会不再象是毛手中的工具了。它更加庞大了，前一届有279名成员，现在则是319名，这表明存在不同派别的竞争。与以前的中央委员会相比，来自毛故乡的成员少了。

1973年11月寒冷的一天，澳大利亚总理与周恩来正在人民大会堂谈论问题。一位外交部官员递给周一张纸条。周马上对惠特拉姆总理说：“我们能不能私下谈句话？”

当这位身材高大的澳大利亚人起身随周向侧厅走去时，他未拉上拉链的夹克衫却挂住了会议桌绿色台布的缨穗，就象剥香蕉皮一样，整块台布掀离了桌面。于是乎便笺、铅笔、茶杯就象受引力作用一般，随着惠特拉姆的方向卷去。

“可能是见毛。”澳大利亚驻华大使在便笺上写下这几个字，然后把便笺推给坐在他旁边的澳大利亚外交部长。他的确猜对了。这种戏剧性事件的唯一可能就是会见毛。

惠特拉姆问他年轻而聪明的大使斯蒂芬·菲茨杰拉尔德：“那张写有问题的纸条呢？”可是谁也找不到。碰巧，毛自己有几个问题。

下午四点半，两辆黑色中国小轿车由长安街一扇红色大门疾

驶进中南海。每位来访者下车时，都有一位中国助手把手放在车门顶部，以免客人出门时磕着头。

接下来的一百分钟里，当毛细啜着一个瓷杯中的茶，用他光滑而无血色的手抚摸他脸上粗糙的肤斑时，他的生活和政治观(这时他已快到80岁了）便暴露无遗。

步履蹒跚的他向澳大利亚人抱怨说，他的腿不方便。他的听觉似乎也不好，房间中的其他人，包括周和三个月前在“十大”上一跃坐上了党内第三把交椅的意得志狂的王洪文，与毛讲话时的速度要比平时慢得多。

然而，毛不用扶搀能自己起坐。他挥动着的双手似乎要表明，他还很年轻、强健，他决不会使客人因为他的老态龙钟而感到局促不安。

会谈的前半段，毛静候着，几乎听不到他的声音。而急于表现自己能力的惠特拉姆总理却讲了许多话。毛则把惠特拉姆的大部分问题推给他的两位下属。周讲得与毛一样少，王也只讲了一、二句话。

惠特拉姆向毛问了几个关于新的中央委员会构成问题：年龄结构怎样？妇女是否占较重要地位？主席对“十大”新当选的领导群体是否满意等。

毛没说什么；他不是对话题感到厌倦，就是太累了。

周和王共同给澳大利亚客人列举了一些事实和数据。毛只是谈到中央委员会的军队代表问题，他说，军队来的人较多，大约占百分之三十。

澳大利亚客人开始怀疑毛是否真的衰老了。或许，在下午会谈前的那一幕背后还有其他实质性的问题。

那天下午周带了一公文包。他极少这样做。在人民大会堂，当谈到南亚和海外华侨问题时，他有时要打开公文包核对一下。他随身把这个公文包带到了主席的住处。

会谈结束时，周没有和惠特拉姆一起离开，显然他有事要与毛商量。[21]

在这位主席强健或神志清醒之时，他能体察民情，并制订措施。但现在这种情况却不多了。周的公文包里的文件是要经过毛过目或签署意见的。

当觉得力能胜任时，毛无论在一天内的什么时间，都可以安排会见外宾或处理其它事务。

在这种情况下，毛已精力不济，不能贯注全部会谈。比如谈到台湾的前途问题时，他在做出漠不关心的表示之后，会把双手稳稳地搭在安乐椅的扶手上，突然说道："现在该让我提几个问题了。"

这好象是给他配吃的药发生了效力。

毛向惠特拉姆询问澳大利亚工党和共产党在思想上的差别。惠特拉姆回答说，他认为社会主义是进化的产物，而共产党人则坚信只有革命才会有社会主义。[22]

"这么说你的观点是达尔文派的了？"毛接着问。然后，他又轻描淡写地谈起地理来。"澳大利亚的达尔文港是以生物学家查理·达尔文的名字命名的吗？"*

毛巧辞善辩，他极力回避对他的许多赞誉之词。当惠特拉姆表示他对现代中国做出了巨大贡献时，毛却说他的作用还没有这么大。

惠特拉姆评论起中国共产党在1949年以前没有得到过苏联的帮助。毛又对他的话做了订正。他慢吞吞地说，莫斯科"有时"帮不了什么忙。

---

* 惠特拉姆回答不了毛的问题，但在回堪培拉后，他给这位主席寄了一份关于达尔文市是如何命名的说明。虽然这座城市直到1911年仍称作帕麦斯顿，但是作为港口，它在1839年就以查·达尔文的名字命名了。此外，在这一点他还做了"自我批评"，因为他当时未能答出这个问题。

惠特拉姆极力反对中国进行核试验，毛似乎对此不以为然。毛说："我们不在乎你提出这个问题。"毛说，就象在父子之间，即使是最愚蠢的问题也可以谈。针对澳大利亚、日本等国对中国核试验的反对，毛宣称"这是必要的例行公事。"毛甚至不屑为中国的核试验政策辩护。

惠特拉姆反对"必要的例行公事"这一说法，但他后来却让步了。他承认，不能把中国的情况简单地与法国相提并论。原子弹是在中国本土爆炸，不象法国在遥远的殖民地进行试验。加之中国实际上受核武装敌人的威胁，而法国则未必如此，并且巴黎还受到美国的保护。尽管惠特拉姆极力迎合毛，但并不对他的胃口。

毛激动起来了。法国正受着苏联的巨大威胁，它需要独立的威慑力量，它也应该有这种力量。

毛答复了对手，同时也表达了自己的信念，然后他又说了句"毛主义"哲学的格言。这句话似乎削弱了他的强权政治的态度，因为他始终认为原子弹是国防的支柱。"不管怎么说，核武器并不起多大作用，"他沉思道，"起主要作用的还是人。"

澳大利亚客人称赞中华人民共和国取得的成就。毛则提出了异议。他认为，目前取得的成绩微不足道，"但是，中国的贫穷是件好事，它使得人民要革命。"

毛似乎是一个不能或不愿把自己思想的各个层面协调的前后一贯模式的人。

毛的同事中很少有人同意毛留恋过去那种把贫困作为优势的好战精神，如副总理邓小平就是这样，但是毛也赞许地提到了邓的名字。

毛在对惠特拉姆解释中国军队与其他国家军队的差异时，即以邓为例。他强调邓是从"一个当过兵的普通人"走上来的。

惠特拉姆对毛说，这位副总理曾告诉他说出席过“八大”和“十大”，但“九大”却没有参加。为什么邓在1969年的这次会议中缺席了呢？

外国来访者很少有人会向毛询问有关政治局的事情，不过毛并不在意这一尖锐问题。对邓未能参加“九大”，他答道：“因为那时林彪的问题还没有解决。”

换句话说，毛在1969年还是与极左派打成一片的，那时他既不希望也不需要邓来出席会议。

1973年，毛对极左派的态度更加复杂了。1970年至1972年间，他摆脱了他们。现在，他极想从他们储藏丰富的武库中取出一些武器，但又犹豫不决。部分原因是他健康状况日趋下降，另一方面是他对下属的看法是如此反常，以致于上午的拥抱到了晚上就会被敌意所取代。

惠特拉姆谈到了王洪文，说他在“十大”后的直线上升已“世界闻名”。他问毛：“你在什么地方发现他的？”

毛本来可以作出轻松的回答，因为惠特拉姆是以玩笑的口吻提问的。但毛却生硬地说：“不知道。”

澳大利亚客人都把眼睛转向毛，因此谁也不知道王当时的表情怎样。

在历数了毛和周在中国革命史上漫长的经历以后，惠特拉姆提醒道，当年你们长征时，王还没有出世呢。王试图说些什么，但却被周与惠特拉姆打断了。

会谈快结束时，王才找到一个机会回到惠特拉姆对他的评论上来。“我正是长征时出生的，那年我一岁。”他极力说道。他又补充说，自那时起他就已经“象毛主席和周总理那样，开始干革命了。”这种声明只能说明他资历太浅。

王似乎不象中国政府中的第三号人物，毛和周也不是那样看待他。

毛在“十大”上对王的提升是点了头的，他在会议刚刚结束就对法国总统蓬皮杜谈起了王，说：“你看他，很有前途。”[22]不过周精明地扶毛现在已有自觉意识了。*

周是毛从他神秘的书房步入世界的桥梁。既要保护毛，又要持毛，这对周来说需要艺术性。

在与毛会谈时，惠特拉姆几次努力试图给这场尴尬的交谈加上一点儿乐观的气氛。他说，就中国的问题来看——毛几次谈过这些问题——“革命的前途”无疑是在年轻的一代身上。

对此，毛说：“我和周都活不到革命结束的那一天了。”他拒绝与惠特拉姆共奏一曲未来的凯歌，拒绝按惠特拉姆提议的那样，从结构上来探讨中国革命的未来，他关心的是人固有一死。

“我已疾病缠身”，他示意说。

周笑着插话：“他只是膝盖有点风湿痛。”这样说或许是出于诙谐，因为周想让客人们这样认为；或许是出于谈话的窘迫；或许是想婉转地顾及毛的自怜。

毛接着说：“我已和上帝打过招呼。”他不隐瞒自己恶劣的健康状况。

周缄口不语。与毛相比，他见上帝的日子（这种话他从未讲过）比毛更近。

在11月这个寒冷的下午，毛面前两位活生生的人使他感到更加孤独、可悲。周会比他死的早，王坐“直升飞机”上来仅数月就引起了他的怀疑。而这两个人又是他权力机构中的第二和第三号人物。毛要拖着步伐迈向未来，而这两人都不会跟他在一起了。

---

* 王对这一点很清楚。1974年1月，他在中央委员会的一个学习小组上作了一篇讲话（从未发表），这篇讲话是典型的自我辩解。以前中共领导人的任何一次讲话都没有象王的这次讲话那样，引用了这么多的毛主席语录。他是在竭力提示听众，他是——或者曾经是——毛的宠儿。[23]

死亡和怀疑的阴云正把毛与他的可能的继承者分开。

周看了一下表，暗示会谈已经差不多该结束了。毛指了指他的侄女王海蓉——一个思想很左的小人物，当时她坐在周的旁边，文静而拘谨。这位主席打趣说："她把我管得很紧，从不让我说话太多。"

极左派和反极左派集团为了职位和政策，借批孔的名义，进行了拉锯式的竞争。毛在这种紧张局势中来回串演了三种角色：

- 经常支持极左派。
- 对某些中间派作两手准备，对其中某些人实行安抚。
- 不时地坐山观虎斗。

《人民日报》引用了毛的一句话："每隔那么七、八年，牛鬼蛇神就要跳出来。"㉔这是在1973年后期发表的。显然，这是为了让人们回到1966年的那场对"牛鬼蛇神"的斗争中去。*

或者是毛的身体太虚弱，或者是他太冷酷，或者是他自己就

---

* 实际上，自1973年后期，极左浪潮主要发生在教育界。导火线是张铁生点燃的。他中学毕业后，在东北的一个农场工作。在辽宁省的大学入学考试中，他交了白卷，并附上一封信，愤怒谴责了现行的考试制度和教科书。㉕

张的信通过广播象经典一样在六个省播出。《人民日报》也发表了他的信，并写了一段奉承的编者按。不久，这家报纸的头版头条上又刊登了一篇激昂的文章。作者12岁，她说她已受够了学校的师道尊严那一套。

这个孩子气愤地说："我们还是毛泽东时代的孩子吗？他们怎么象对待奴隶一样对待我们？"㉖

毛的侄子毛远新正是东北反教育权威文章的幕后策划者。他30岁，当时主管辽宁省的宣传工作。他的支持使辽宁年轻造反派的"反潮流"成为可能，并不受约束地发展。

北京的毛伯伯希望张铁生写信攻击教育制度、考试、教师和教科书的，毛远新是他的工具，而江青则是他身边的得力干将，她把毛的旨意传授于远新。

不相信，以致他不能为大家定义一下制造混乱的牛鬼蛇神。

毛亲自发动了大规模的“批孔”运动。虽然没人能预测这一运动的最终命运，但“批孔”(“批判孔夫子”的缩写) 却成了许多极左派狂热行为的理论根据。

文化大革命的语言又象雨后春笋般地盛行起来，毛的像章再度流行。* 上海——极左派最坚强的堡垒——出现了一本新的杂志《学习与批判》，其目的似乎要搞得比中国共产党的月刊《红旗》更红。

内聚力的下降与政治温度的上升同步进行。如同林彪事件的后两年一样，仅做好本职工作是远远不够了。现在，你必须装腔作势谈意识形态问题，叫得越响，越有戏剧性越好，而且你必须把所有的邪恶与“阶级敌人”孔夫子联系起来。

海南岛的广播中说，减少交通事故的关键取决于“批孔”运动的效果。

意大利电影导演米开朗基罗·安东尼奥尼 1972 年到中国拍片受到欢迎。而现在，他却被称作“反华小丑”。他那单调的、甚至是冗长乏味的影片已经成了“对中国人民的挑衅”。

对罗马“小丑”的攻击又牵扯到“反美”运动上来了，并很快成为“批孔”的第二主题。[27]《人民日报》轻蔑地说，美国人竟认为安东尼奥尼的毒草电影很有吸引力，由此可见，杜勒斯的阴魂仍然未散。

贝多芬被判为“颓废派艺术家”。1973 年间，费城、维也纳和伦敦交响乐团来华演出，并引起很大反响。但在毛的中国绝无安全之物。《人民日报》拉长腔调数落欧洲的文艺作品：“对我们来说，不难察觉出这些荒诞、离奇的旋律背后所反映出的淫秽、腐朽的生活和颓废的情调。”[28]

---

* 1973 年，作者在中国之行看到的极少。

年迈的毛（不是个音乐迷）显然私下对某些俯首贴耳的人叮嘱过，音乐象其他东西一样，只有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才能挖掘出它的秘密。

孔夫子曾说过："过犹不及。"毛不相信这一套。他看不到中庸的好处。

然而，毛的变化观与孔的社会秩序观之间的战争，在1974年表现为一场滑稽剧。

孔子的影响确实阻碍了毛主义者改造中国。尤其在农村，遍布孔夫子的遗风。特别是对女性的态度、地位、变化等的看法，都受儒家思想的深刻影响。

在毛的中国，这样的运动表明，政治局有人会受到冲击。

"批孔"也是毛心血来潮。它象雷电一样在中国震荡，只是因为雷神需要打雷了。不过，这并不能随之带来一场及时雨以获得更好收成。

这场运动很快变得象个空瓶子，每个人都把自己选择的酒倾注其中，酒味如此之杂，以致于相互冲淡，试不出是什么味道。

1974年间，毛接见了二十多位国外的达官显贵，比以往的任何一年都多。然而，毛每天都从自己的报纸上读到排外的文章。这些文章使人想起"义和团"的造反浪潮。

上海的极左月刊《学习与批判》引用的语录，就象《圣经》引用上帝的话一样多。但1974年2月，毛收管了这家刊物(或许有人以他的名义这样干的)，并重新为它题写了刊名。

这些是否是政策失控发生的倾斜？是否表明各个派别已经四分五裂？是否反映了毛的言行自相矛盾呢？

这都有可能，但最后一点的可能性最大。毛说："吃饭于前，又拉屎于后，并不等于白吃。"[28]这句延安时代的重要论断，在1974年秋天，北京新闻界又重新把它放在显要的版面。毛做了公平合理的"警告"，绿灯闪过之后是红灯。

江青把孔子作为她在“文革”中向上爬的敲门砖。周恩来则全力以赴地加入这场运动以迎合现在似乎要疏远他的毛。他把林彪的名字安在孔子的前面。

这样，原先的“批孔”便转为“批林批孔”，这位被迫参战的总理想把一场闹剧改编为一场喜剧。毛不是说过吗？每隔七、八年牛鬼蛇神就会跳出来，现在，孔圣人和国防部长居然作为这种类型的孪生怪物被强行推到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面前。这两个人，一个才死了二年半，另一个却长眠了二千五百年。

周感到整个运动都荒诞无稽。事实也是如此。它对伟大的文明古国是奇耻大辱。这种事之所以能够发生，是因为政治局已处于瘫痪状态。政治局的瘫痪在于毛身在其位而不能谋其政。

对江青来说，由反孔发展而来的批林批孔运动给全国造成巨大混乱，于左派大为有利。对周恩来来说，这却是反对势力的扩张，同时还是一根套在极左派头上的绞索。

毛欣赏江青的观点，但他没能一直配合这位“文革”中圣母玛利亚式的人物。总之，他的健康状况不允许他合着江青的步子并肩前进。

1974年冬天，毛提醒紧张不安的同事们：“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30]他能够从容不迫地给极左派重重一击，同时又不止一次地敲打他的久负盛名的右派对手。

1974年2月，毛说：“现在形而上学泛滥，片面性。”针对高干子弟上大学搞特殊化的问题，他又说：“批林批孔又夹着走后门，有可能冲淡批林批孔。”[31]这位老者实际上是用颤微微的手指点出这么个问题。

然而，他并不能解决这个问题，他最多只能以一个革命者的姿态同意周讽刺性的“解决办法”。这个办法仅仅是让这场运动发展、变化为一团无害无益的抽象物。

毛和极左派在军队问题上存在分歧。阻击由于林彪而受限制

的左派军官的队伍，对坐在文艺事业的华丽沙发上的江青来说是件大好事。这样，她那块卡叽布领也几乎没有什么损失了。

在中国，军队更接近于群众而不是政党，毛作为这个国家的最高领导人，他不能与军队疏远。

事实上，在1973年冬到1974年，毛出人意料地调换了各军区司令员，十一位司令员中的九位都调动了工作。* 这是从未有过的事情。对这些地方上的军人来说，也可算是彻底赶出了家门。他们不得不离职而到一个陌生的城市。这绝好说明了毛是如何行使他的权力的。他的成功之举除带一点抱怨外，并没发生暴力反抗活动。

如果毛在这个变动之前不给邓复以高职，如果不让邓发出可以解除每一头他管辖的军队狮子的指令，那么，人们会怀疑他是否能调整他那些咆哮着的狮子的位置。

然而，毛再也不能做出类似的事了。一年以后，即1974年年底，他又把十一位军区司令召集到他在杭州的别墅。他们中有些人宣称不来参加会议，[32] 直到毛做出政策上的让步，即在下个月即将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正式透露的那样，他们才同意与他们的统帅会面。

中国有句谚语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自文化大革命的中期起，毛一直是军队之"水"上的"舟"，但是，他必须谨慎从事，以免水位上升得过高，使他淹没。

1974年5月，巴基斯坦总理布托步入了毛的书房。礼宾司的负责人把重要人物一一引见到毛的安乐椅旁。布托按照外宾的惯例坐在毛的左边。但在毛的右边（中间隔着翻译）"周的座位上"却坐着邓！周出席了会议，但他坐在离布托较远的位置上。[33]

照片如同新闻一样报道着。人们知道，紫禁城内新排的座次

---

* 原文如此。——校注

无异于一次政府的内阁大变动。

在此四天前，毛会见塞内加尔总统桑戈尔时，周还坐在紧靠毛右边“他的”座位上，比他职位低的领导人象往常一样坐在外国客人的左边。

这种情况，出现了好多次。* 在允许拍照的会议室，毛与外国领导人会谈时，周一直是坐在他的原来的位子上，而从不坐其他地方。但从此后，他再也没坐过“他的”这一座位了。**

1974 年年中，毛去了南方。对毛来说，夏天的几个月离开北京是不同寻常的，他离开首都多数是为了过冬而到气候较暖和的杭州、长沙、广州等地去。更不同寻常的是——人们可以回顾 1965 年来作对照——他在北京之外呆了有八个月之久。

就在毛要去南方之前，周住进了北京一所部队医院。周说：“我老了，不行了。”[33]他仍断断续续做些工作，离开医院公开露过三次面：1974 年的建军节、国庆节及 1975 年 1 月召开的党代会和人代会。每一次都没见毛出席。***

以后，两个人就再也没有一起在公开场合下露过面。

他们不再在一起露面也可以归结为病痛或机遇，但在这表象的背后，内在地隐藏着可怕的严峻事实，即他们的合作已基本结束。

然而，对中国的治理光靠年迈而执着的毛担当建筑师还不够，还须要周这样的建设者。没有建设者，建筑师无疑创造不出更多的东西。

---

* 1974 年春，毛会见了阿尔及利亚总统布迈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坦桑尼亚的尼雷尔和柬埔寨的乔森潘，周每次都坐在毛的右边。[34]

** 1974 年年底，毛与外国首脑三次会晤，塞浦路斯总统马卡里奥斯、马来西亚总统拉扎克，以及英国的希思，周出席了会议，但是坐在不太显著的位置上。

*** 1973年——1976年澳大利亚驻华大使斯蒂芬·菲茨杰拉德，1973年底见到毛以后觉得：“毛在中国的统治力量只有通过别人——那时主要是通过周的执行和宣传才能体现出来。”1974年，毛显示出他仍大权在握，决定让谁去担当“执行者”和“宣传者”。

当毛远在南方的一天下午，北京《光明日报》社的大楼内由于受指责而乱作一团。已出版的报纸被收回来销毁。因为这天的报纸的第二版上刊登了一篇题为《孤愤》的文章。一位高级官员害怕它会有引起中国公众巨大混乱的危险，决定不让它与《光明日报》的读者见面。五条地区性新闻组成的新版面取代了《孤愤》。

《孤愤》是2200年前法家人物韩非的作品。《光明日报》加上一篇编者按与其同时发表，论文影射毛及其政府的意味再明显不过了。韩非的确又孤又愤，他被“奸臣”所包围。他抱怨那些逢迎谄媚者使他与真实的世界隔绝，使他不能接触那些可信赖的官员，而这对一个统治者来说简直是“罪大恶极”。这个持异见的论者还说，一个统治者容许此类危险的事情发生简直是一个“大错误”。《孤愤》勾画出了一个充满谎言、派性和濒临崩溃的王国。

韩非的文章是用古文和白话文两种文体刊登出来的。《光明日报》的头版头条提醒读者不要简单地把韩文看成一个典故，其编者按说，林彪及“他一类人”就象韩非周围的奸臣一样。

是谁决定发表《孤愤》，又是谁命令将其撤销的？这里存在两种主要的可能，而每一种都可以证明毛的政府的混乱。

可能是毛想要发表这篇文章。与韩非一样，毛感到他已为“奸臣”们所困。他要敲响自我的警钟，而不致把自己和韩非的悲惨一生等同起来。

如果毛在临去南方之前批准发表这篇文章，那么不难想象一些(可能是大多数)政治局委员都想禁止其发表，因为如此公开地表示憎恶和悲观的情绪，用美国人的话说，不利于国家的安定。

不过《孤愤》的发表有可能是江青对周恩来的攻击。1974年，用江青的歪话来说，周是林彪“一类”，她把周（及其盟友）看成毛死后挡在她前进路上的主要障碍。

这个主管文艺的女人，有权对报刊的编辑们发号施令。那年夏

天她耀武扬威，乘毛不在北京之机来攻击周。

假如果真如此，令人吃惊的是，周的朋友能够迅速地将《光明日报》的这篇含沙射影的文章迅速撤回来。*

在毛和极左分子之间，还纠缠着很微妙的私人关系。毛与江青的婚姻表面美满，但实际上却早已搁浅。

这位当过演员的女人看到一线作女皇的希望，已搬出了中南海的住所。在不远处她已有自己的一套高级住宅。党的“十大”使她进入政治局，但并不是她希望的那样是九名政治局常委之一。

自1973年始，如果她想对毛谈点什么，在她得到允许进入毛的住宅之前，她必须写信给联络员，并得到毛的同意。“批林批孔”期间，毛至少拒绝过一次与她会面。

毛写信给她说：“不见还好些。过去多次同你谈的，你有好些不执行，多见何益？”㊲

从1974年到1975年，在毛长期远离北京期间，江青没和他在一起。猫一不在，老鼠就好耍威风。

1974年，最后一次毛在首都露面的时间是6月、7月，江青开始充分发挥自己的作用。《人民日报》宣称她是毛泽东思想的“宣传者”，㊳这对她是一个少有的荣誉，这胜于她昔日所得到的。她以新的姿态主持了与菲律宾马科斯夫人及其他外国客人的会见。

在浙江省，出现了“江青和王洪文的指示”。只有毛或者第二号人物才发过“指示”，江青从1964年起的讲话被新闻媒介以“十年特辑”的方式来颂扬。

对那些轻视毛夫人的人来说，一篇关于汉王朝缔造者的奇特

---

* 在八个月的时间里，毛和周也许只见过一次面。即1974年12月27日，周飞往长沙向毛汇报即将召开的党代会和人代会的准备工作。㊱

的文章，实在令他们无法忍受。这篇文章，作为1974年间谈论历史上伟大女性的许多文章之一，异乎寻常地强调汉高祖妻子的品质和作用。她坚毅果断，在丈夫故去之后掌了权，并通过推行她丈夫的路线赢得了赞颂。

毛对已和他分居的妻子在1974年间的政治活动感到厌恶。她四处插手，四处抛头露面。"江青有野心，有没有？我看是有。"

1975年初，在江青飞黄腾达时，毛这样说，政治局的一次会议上，毛终于气愤地否认了江青有诠释他自己意见的权力。"她并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

无疑，毛批评了江青，人们公开也这样认为，虽然在1974年，甚至到1976年，大家还不清楚存在一个"四人帮"。

"我重病在身，八十一岁了"，他在1975年间给她的一封信中曾伤心地说，"也不体谅"。这是个悲哀的恳求。这表明毛实际上已无法处理涉及到他夫人的复杂的感情和政治问题了。但只要毛发出指令，或者去世，这个野心勃勃的女人顷刻间就会垮台。

"我真羡慕周恩来的婚姻。"毛意外地谈到了总理的私生活。[40]

毛离开北京长达八个月的最后几个星期里，他的夫人在北京附近香山饭店召集外交人员作了一次讲话，并宣称她是代表毛。

在急于求成的慌乱之中，她扮演了凌驾于毛之上的角色。从台湾间谍搞到的材料中可以得知，她在讲话中说，中国需要"黑朋友"、"小朋友"和"穷朋友"，因为毛希望中国具有这种形象。不过，当江青说中国没有"白朋友"、"大朋友"和"富朋友"时，她脱离了毛的实际实行的路线。

江青以一种特殊的腔调说基辛格的"基本观点受资产阶级利益的制约。"但她又提到基辛格认为要"保持势力均衡"，以及他"承

---

* 事后有些证据说明了这一点。毛逝世后，北京声称毛在7月份曾给他妻子写过信，信中说："你们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据说12月份他又写信给上海极左派头目，"不要搞宗派，搞宗派要摔跤的。"[39]

认”国际关系中存在“矛盾”的观点。[41]

在江青妄自尊大的混乱讲话中，她表述了毛对外政策的二重性。

在老谋深算的毛眼里，基辛格的资产阶级地位实际上并不是关键的问题。*毛没有同基辛格讨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这一问题，他也不认为这位美国政治家会成为革命的伙伴。

但是，到了七十年代中期，在毛的外交政策中，这种意识形态上的遁辞几乎不再存在了。江青也许能从毛那里得知只言片语，但她很难充分理解毛本人的思想。

毛与基辛格（江青在香山饭店发表长篇讲话的那一年，毛单独会见了他二次），就战略问题交换了意见。因为中苏敌对是主要矛盾，它导致中国的亲美倾向。

毛批评基辛格时，不象江青那样，把他说成是资产阶级的冒险家。毛主要批评这位资产阶级政治家没能勇敢地站起来反对贪婪的、多少也算是资产阶级的北极熊。

在某种程度上，毛与江青一样，担心同西方进行文化交流有可能受到污染。但是，他并不象极左派林彪那样渴望回到对美苏实行“等距离”外交政策中去。

江青一定看到了“杜勒斯的幽灵”正从太平洋彼岸飘来，而毛却坚信这个幽灵正在克里姆林宫里。

同事们简直不能断定毛下一步要干什么。

毛已清除了他自己选定的两个接班人，周曾帮助毛避免了这两次重大手术可能留下的后遗症。而现在，1974年，他正在与周疏远。他开始把王洪文看作是继周之后最有前途的人。

毛对北京十位最高领导人中的其中两位犹豫不决。江青激怒

---

* 基辛格也证明了这一点，至少在谈到毛时是这样，他说：“中国领导人在和我们打交道时，并不受意识形态的限制。”[42]

了他，虽然这位自负者比极左派还要糟，但因为某种感情的牵连，某种礼节上的需要及某些踌躇的猜疑拖住了毛的手脚，她没有被清除。[43]

邓是毛所依赖的。这位副总理在1974年末坐上周的交椅，但毛在与他相处的时候又特别留神。邓无疑仍然“很聋”，如毛在六十年代那样指责过他的那样。现在，当这位主席发言时，他已能随机应变了。他不再敲着手，给人的印象是全神贯注，似乎他觉得会议议程应该进入下一个了。*

毛让邓和王洪文一起外出视察。[44]在这次到各省的巡视中，我们无法知晓这位“小个子”和“坐直升飞机上来的人”是如何相处的。他俩返回北京后，毛召见了他们，让他们汇报所见所闻。

毛向他们提出的问题令人吃惊。“我死后中国将会怎样？”其怪异程度正与他派出这一小组一样（除非已精明到极点，否则是不会作出这种选择的）。**

年轻的王回答说：“全国人民一定会紧跟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团结一致将革命进行到底。”难道毛愿意听他的娃娃说出这种废话吗？几天以后，在中央委员会的小组中听王的讲话的人，也不会指望听到什么别的东西。

“一场内战将会爆发，全国将一片混乱。”邓尖锐地指出，根据香港的共产党的情报来源提供的消息，毛欣赏邓的答案。

毛在脱离许多实际工作后，仍坚持读《人民日报》这份差强

---

* 邓的再度参政是在“批孔”刚开始后的几个月，他能相对灵活地对待这场运动了。他私下对人说：“孔子已经死了，他的思想也不合乎时代，我们应该反对。我们也要死的，几千年后我们的思想也要遭到反对，因为在那个时代它与人们的思想是不一致的。”

** 几年前，当毛对蒙哥马利勋爵说刘少奇将继承他成为中国的领导人时，布莱顿顺势抓住这个问题。“我问（毛），刘之后谁将接替他”。他不知道或是不关心这一点。他说他自己要见马克思去了，在中国，他们自己会安排好的。但是，也许他确实关心这一点[45]

人意的报纸。这份六版面的报纸似是一个大委员会写的。它很少有意于新闻。《人民日报》不是报道，而是告诫。它是（或者至少毛在世时是）每日教义的阐释，其新闻性质是把具体的道德说教牢牢植根于永恒不变的真理中。不管怎么说，年迈的毛还是从1974年的那撩人的报纸中发现一些真相。

凡是反映他过去熟悉的事情就是真理。如果他读到杭州一家丝绸厂里的“两条路线的斗争”，那就是事实。他认为，他是与两条路线斗争联系在一起的，甚至自二十年代他开始攀登权力之峰起就这样。他觉得他清楚路线的分歧所在。他甚至这样劝慰自己，假若“工人阶级路线”战胜了“资产阶级路线”，那么，丝绸的产量就会提高。

毛正生活在往事中，否则，他就丝毫不会认为1974年《人民日报》的可信。愈来愈多的中国人有这样的感觉。

轿车载着2885名代表驶向人民大会堂。沿街的人们猜测，那个例行公事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终于召开了。会议推迟这么久才召开，人们差点把它看作海市蜃楼了。

会议似乎又回到务实中来了：周又出现了，他裁减了一个权力机构；新的国家宪法规定，工人有权罢工，农民有权拥有自留地；极左派在新的政府成员只占极少数，邓得到提升；会议还强调了秩序和经济建设任务。

这难道不是周的一次胜利，批林批孔的左派分子的完结，邓的东山再起吗？

但是，一个空着的座位却使整个大会堂感到压抑；毛没有出席会议。

莫非他病危，甚或是逝世了？没有，当这次会议在北京召开时，马尔他总理和德国右翼分子弗兰兹·约瑟夫·斯特劳斯被人暗中领到南方会见了毛。

由于不知道是否能把握政府中复杂的形势，毛正在他的营帐中愠怒着。

人代会的公报没有对毛的缺席作出解释，丝毫也没谈到他。[46]毛也没有参加人代会召开前的中央委员会。

新的宪法与1970年准备好的草案不同，与1969年党章规定的也不同，甚至与1973年那个平淡无奇的东西也不同，它较少突出毛泽东思想的地位。虽然谈到了毛泽东思想和毛的党的主席的职位，但没有涉及毛本人。

令人惊奇的是，在周的报告中而不是左派张春桥的那种报告中，一再引用了毛的语录。周的报告至少二十六次提到了毛的名字。

在此以前几个星期，毛与王洪文作了一次长时间的谈话。[47]这位"坐直升飞机上来"的干将敦促毛给极左分子多派些工作。他暗示，周的病并不象他装的那样厉害，他正在医院中忙于策划他的未来（是王承江青的意旨）。他对邓的可靠性也表示怀疑。在这种情况下，他想让毛同意张春桥来担任总理。

毛没有认可王的计策。他准备让张春桥担任国防部长，但却遭到了独眼老将刘伯承和其他将军们的极力反对。[48]他可能还想过让他夫人任文化部长。但是，这位老人终于发现，政治从来都存在着讨价还价的问题，因为存在着太多的反对他的呼声。

不久，政治局会议召开，毛主持会议，他说，宗派主义是一件可怕的事。接着他又以轻松的口吻说，每个人都会犯错误，包括他自己在内，包括他与林彪共事这么久。他赞扬邓是一个"务实的人，"[49]同时，他劝告他的同事们要警惕"资产阶级修正主义"复辟的危险性。

毛解释了他为什么离开了这一连串的党务和那召开在即的"人代"会议。他坐等良机，深深地掩饰着自己的疑虑，暂且让人各行其是，形势畅通无阻的发展。

周在他的人代会报告中如此频繁地提及毛，也许既是为了安抚这位主席，又是为了对毛的缺席赐给他额外的自由表示深深地感激。*

在这段时间，毛似乎回到了韶山。炎黄子孙以秉性召唤着他返回"乡村之中"，返回家乡长沙。正如他在二十年代和 1957 年数次返里一样，在受挫之后，他又返回了故土。

同以往几次一样，这一次又值冬，又是带病体和政治上的失意。他重返故里以汲取养分，增添新的活力。

父母忠贞为国酬，
何曾怕断头。
如今天下红遍，
江山靠谁守？

在南国的宁静时日里，毛赋下了如许几行。出人意料，这首词是为周而作的。

业未就，
身躯倦，
鬓已秋；
你我之辈，
忍将夙愿，
付与东流？

---

* 有趣的是，一个鲁莽、冲动而又资历浅的左派人物对毛的缺席提出了非难。张铁生（辽宁学生，因在大学入学考试中写了封控告信而闻名）讲毛"在给四届人代会泼冷水，"这样使人大代表不引人注意。张作为人大代表，也是坐"直升飞机"上去的人之一。[50]

工作艰巨繁重，遗留待做的事情很多。毛担心接任的人难以胜任。他的悲观情绪压倒了一切，诸如“亲周”和“反周”，或“左派”和“稳健派”之间的界线。

事实上，再来探讨毛在这些日子是否还是毛主义者已不再有意义。他今天是，明天则不是了。

人代会的实用主义论调两个月内似乎就已过时。1975年春，冷风开始从左路刮来，它被一条新的毛主席语录煽动着：“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51]

也许人代会的路线从未在政治局中取得过一致。持不同观点的同事们“按各自需要去领会毛的指示”。由于毛的缺席，他们比往常更加容易这样做，并且周的患病又使得偏离这一路线增加了更多可能性。

张春桥警告说：“我们有些同志，组织上入了党，但思想上并没有入党。”[52] 这听起来有点象一场新文化大革命的吹鼓手。这位上海左派人物猛烈抨击讲求实际的邓和周，说他们“在青少年中鼓吹物质刺激的观点”，说物质刺激“象臭豆腐，闻闻很臭，吃起来很香”。

张的极左同伙姚文元也搬出了文化大革命的腔调。工资差别太大，金钱制度是资本主义结构的残余，它最终会灭亡。这位上海评论家指出，新的阶级敌人会利用这些邪念企图复辟资本主义。[53]

毛给这两位上海人以鼓励。除了能在毛的身边照了像外，他们都从毛那里带来新的语录，这一最最令人信服的、神赐钦差般的指示牌。

这场骤然间变得重要而又莫名其妙的“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运动”，所带来的现实后果是：工业出现了波动。在杭州，出现了恶性的分裂和武斗，毛同意派王洪文到这个湖城去做调解。然而，王的出场反而恶化了形势。

恰好这时克立总统访华，他看出了周的权力下降的迹象。忍受疾病折磨的周在医院的病床上说："克立总理，你回去告诉所有的人，特别是你的儿子和孙子，中国永远不会入侵泰国。"

"总理先生"，这位泰国领导人回答说："这些话非常令人欣慰。"说着，他从口袋中掏出一张纸条，探身向前要求周亲手写下这一许诺。"我要把它复印几百万份，挂在我儿子和孙子的脖子上。让泰国的每一个人都知道这事，这将是我一生中最有价值的收获。"

周不愿写，他说："我的手发抖，病得太厉害，写不了。"[54]

出于面子上的原因，克立接受了周的借口。这是克立在采访中告诉我的。不过我认为，周的勉为其难在1975年中是因为政治的缘故。*

到了夏天，飘忽无常的左派掀起的蛮横骚乱开始平静下来，因为毛这金猴要奋起千钧棒，扫一下极左派。

毛赋闲了一段日子，在中国访问的圭亚那、莫桑比克和刚果的政府首脑都没有会见到他。这之后，毛在5月召集并主持了一次政治局会议。[55]会上，他批评极左派搞宗派主义。张、姚和江青都写信向这位愠怒的主席作了检讨。

这场道德剧开幕时，邓就占据主导地位。文革中清洗出去的军官们就象上班高峰时来往的乘客，纷纷官复原职。罗瑞卿是他们中不可忽视的一个人物，他是前任解放军总参谋长，由于对苏联不够敌视，他成为毛的文革中第一位资深的受害者。

毛作为仲裁者对邓的举动给予默许。他似乎扪心自问，在那些要拉自己下马的可恶的大臣们中间，邓难道真的是最坏的一个

---

* 克立本人回忆他与周会见的场面时说："不象是一所医院"。周戴着一枚毛的像章。这在1975年是不同寻常的，即便在1971年文革的影响四处泛滥时，我发现周也仅仅佩戴一枚"为人民服务"的徽章。

吗？*

在新闻报道中，经济取代了意识形态而成为主要议题。邓提出的“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成了引人注目的口号，几乎同春天的“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号召一样，广为流传。

经济上讲究实效的风气在1975年秋达到高潮。这年召开过几次会议。在一次农业会议上，邓发了言，还有华国锋，这位在湖南以抓农业起家的第二把手也发了言。

江青也出现在主席台上，在人代会上她没有当上文化部长，现在她却要向农民推行其文艺主张。

《人民日报》只发表了邓和华的讲话，毛阻止发表他夫人的讲话。当华把江青的稿子交给毛时，毛在上面批写道：“放屁！文不对题。讲话不要发，稿子不要印。”[57]

毛还批评了这位延安时的情人与美国学者罗克珊·维特克的会谈。会谈中江青狂妄自负，极为放肆。[58]当见到她与维特克谈话的副本时，面对那些得意狂妄的嘶叫，毛勃然大怒。

毛对江青的感情在中国政界掀起两次巨大震动。第一次是谴责左派，这给邓带来了机会；第二次也快要到来了。

• •

当毛衰弱，周病重住院时，对来访中南海的外国领导人来说，翻译们似乎成了关注的焦点。

泰国总理克立于1975年7月，与毛会晤后写道：“他的嘴似乎跟不上他要讲的话，有时根本听不见他说什么。”[59]

克立走进毛的书房时，“毛大声地嚷嚷着……他握着我的手吼得更响了，直到女翻译、护士和所有的人都跑过来。”毛的许多话

---

* 1975年中期，克立总理拜见毛时，邓、毛关系显得有些紧张。“邓坐在远处的角落里，非常拘谨，庄重沉默，没说一句话。”在以一种友好的方式责骂了唐闻生之后（“决不可相信一个美国姑娘”），毛以恩赐的态度对邓点点头说：“他是对的，你可以相信他。”邓愉快地笑了笑。[56]

连翻译都听不懂，他们转而求助于护士。有时护士也没办法。“这时，就会找来毛的女佣人和服务员来解释他的话。”[60]

会谈结束时，克立总理赠送给毛一件礼物，毛似乎对此无动于衷。“他象个孩子，摆弄着手中的香烟盒，直到有人把烟盒从他手中夺走。所有的机敏、智慧，突然间都从他眼中消失了。当我们握手时，他盯着我的脑袋，一副无所谓的样子。”毛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消失。[61]

为了那些国外的求见者，这位主席不得不被人从床上扶起来并穿好衣服。他的下巴低垂，使他看上去象位德高望重的老人，在弥留之际期待着什么。

他挪动着那只疼痛的脚，步履艰难，象是踩在高跷上一样。难以察觉地摆动着僵硬的胳膊，象是在活动人工假肢。然而，毛并没有失去让外国人遵从他的能力。

新西兰总理马尔登夫妇见过毛，他说：“当我和丹驱车驶入紫禁城门内并被带去见他时，对塔玛和我来说，那真是一个令人敬畏的时刻。”*[62]

毛向伊梅尔达·马科斯——菲律宾的第一夫人讲的话表明，任何获得高位的人都隐藏着个人悲剧。他对这位马尼拉的铁美人说：“你的职位越高，别人向你甩的石头就越多。”[63]

毛向克立总理作了可怕的评论：“几乎每一个来见我并令我欣赏的人回国后都会面临灾难。”[64]他指的是尼克松、田中角荣、恩克鲁玛、希思、苏加诺、惠特拉姆、西哈努克等人。他接连举出这七个人的名字，他们都友好地访问过中国，而在自己国家倒了霉。

当克立礼貌地祝他长寿时，他沉思了一会儿反问道：“有什么用呢？”

---

* 约瑟夫·艾尔索帕写道，克立总理曾弯腰给毛按摩小腿和踝骨。不过这件事也许是克立的敌人编造的，克立对我矢口否认这件事。尽管如此，这位泰国领导人说：“我跟他讲起话来，就象我是他儿子或孙子一样。”

克立总理总结道："他是一位仍坚信自己拥有至高无上权力的老人。不过，如果有人想在他的房间之外用他的名义发号施令的话，他根本不会知道。"

1973年初，中美两国关系最为密切，双方各在对方首都设立了办事处。自这年以后，毛的对美政策有了很大变化。

中国人对超级大国的立场的改变似乎是在这个时期完成的，这表现在核武器的问题上。苏联1972年宣称它曾经四次把中国从美国的核打击中拯救出来。[65]而到1973年春，美国官员又私下表示，由于美国和北京的关系，他们解除了中国来自苏联的核打击！

中国改变了它的伙伴关系，在现在这些伙伴们的心目中，其变化程度可能比中国自己认为的还要大。

不过，1973年中期的多种压力损害了中美关系。基辛格原订在八月份访问北京，但推迟了这次旅行，因为那个月"十大"召开了（周在这次会上对美国很冷淡）。

"批林批孔"运动牵强附会地把美国当作一个靶子。正如我们听到的那样，军界正在质问对华盛顿的举动偏袒。被美国炸弹摧毁了的越南正对北京的亲美倾向吹毛求疵。中国驻华盛顿特使则乘机于1974年整个春季离职。

毛周合作关系的衰退使得这种局面无法挽回。这使得对美政策的制定工作落入极左分子和军人之手，从而使美方怀疑中国是否能够继续"坚持"其亲美政策。[66]

基辛格发现邓这位毛的新任执政官对美的态度比周还要冷淡。基辛格很纳闷：为什么邓经常援引毛的话，而当问到周时，他甚至不作任何反应。基辛格把邓说成"一个不易对付的小个子。"[67]

1974年年底，基辛格访华时到医院探望了周。[68]他发现周奇怪地采取了回避态度。虽然周的气色很好，然而会谈只进行了三

十分钟就结束了。基辛格感到困惑。

更糟的是，毛没有见基辛格。这是这位美国人几次访问北京时第一次遇到这种事。

毛那时在长江以南。即便如此，在基辛格访华的前后两个月内，还是有六位其他的外国领导人去谒见了他，尽管实际上他们去时还不知道是去见毛。与政治局中的一些亲美派比较起来，这说明毛对基辛格的北京之行态度暧昧。基辛格是从海参崴飞抵北京的，他和福特总统在那儿与勃列日涅夫共过餐。*

毛的一些同事私下里中伤1974年的中美关系。他们没有资格参予毛、周关系，而且被解除中苏紧张关系的观点所诱惑。

毛自己的亲美观点也暴露了问题，其矛盾之处充分体现在1973年末与法国总统蓬皮杜的会谈中。毛直率地对这位自封为主张缓和的使者说，缓和是个骗局，苏联正在蒙骗西方，而美国人的意志力却正在下降。[70]

鉴于福特总统即将访华，基辛格感到心神不安。1975年10月，毛邀请逗留北京的基辛格见上一面，基辛格松了一口气。会谈中，这位国务卿要求毛把他邀请福特访华的诺言写下来。

毛毫不犹豫地提起蘸水笔，龙飞凤舞地写下了基辛格祈求的这一托咐，[71] 也许他对美国人的这种功利主义嗜好感到滑稽，他至死都带着他的偏见。

毛和福特的最高级会谈是一件单调乏味的事情。对福特来说，继尼克松之后访华，就象第二个登月者。不过，这位总统到北京的公务并不多，因为他对罗纳德·里根来自右翼的挑战感到焦虑。而毛，既令人敬畏又显得脆弱，看上去象月球上的人一样不

---

* 有报道说，基辛格在他们下榻的北京一家饭店的房间里，发现一张西伯利亚地图。上有符拉迪沃斯托克，俄语是“统治东方”的意思。但地图上标的是中国过去用的名字：海参崴。[69]

真实。

激烈的意见冲突折磨着中国政界。西贡的陷落解放了越南人民，但没有改善中美关系。

“我们（在越南）失败了”，1975年春，基辛格恼怒地对一位中国官员说，“你们应出来收拾残局。”[72] 毛比他的同事更清楚基辛格指的是什么。

七十年代，他会见了一大串越南领导人。当他拥抱这些狡诈的、极端敌视中国的来访者时，* 他掩盖了对与中国有关的越南前途的日益增长的焦虑。

毛考虑更多的是越南在亚洲的战略地位，他鼓励好斗的越南英雄们同他们身后的美国人斗争，然而作用很小；越南人另有要紧事做，因为毛的反苏预兆调转了他们的方向。

“越南是一座有四个方丈的庙”，不久，毛对江青说：“任何给过它施舍或救助的人都是它的施主。”[73] 不久，他对越南的态度跟美国那些怒发冲冠的掠夺者们一样，因此，他就再也没有款待过一位越南客人了。

福特来访期间，毛显得精力充沛。实际上，那时他的健康时好时坏。

---

* 1972年12月，南方的马克思主义临时政府成员阮氏萍访华。毛对她说：“我们是一家人啊？我们、你们，越南南方和北方，还有老挝、柬埔寨和朝鲜都是一家人。”他还令人不解地补充道：“我们相互支持。”他也许是在提醒阮氏萍夫人，老挝和柬埔寨作为独立国家有其主权，除越南外，还有朝鲜是中国的好朋友吗？

不管怎样，阮氏萍称他为“毛伯伯”时感到自如。

1973年2月，毛邀请河内的谈判者从巴黎回国途中来见见他。异乎寻常，毛和外交部长阮维桢、基辛格的对手黎德寿长谈了一个半小时。

此后不久，毛接见了河内两位最高领导人：党的领袖黎笋和政府首脑范文同。

1973年底，毛又会见了阮氏萍夫人和阮友寿主席。“我们还应该感谢你们越南南方人民，因为你们战斗了多年。”他谈话时极力区分南方与北方。

毛似乎的确有点欣赏越南南方的政权，而不那么欣赏河内。他于1972年12月接见了越南南方的外交部长阮氏萍夫人，而没有接见同一周来访的河内政治局成员春水。

与1972年毛同尼克松的会谈相比，这次同福特的一百一十分钟的谈话内容更详细，时间更长。毛不断地打着手势，说到点子上时朗声大笑。连身躯也抖动着。他似乎感觉到，这是最后一位美国总统坐在他的书房中了。他十分振作，以最后一次证实自己的活力。

据贝蒂·福特说，当毛看见她的女儿苏姗时，他的“眼睛亮了起来”。

但是，在这次最高级的会谈中，双方都感到局促不安。很明显，对中美两国官员来说，对那些看过毛与福特会见的新闻片的中国人来说，毛将不久于人世了。然而，继续执行这项政策的邓小平和福特，都不是那种能够向各自的国民颁布明确命令的强权人物。

这是一对同床异梦的伙伴。

苏联问题，曾在1972年使毛和尼克松走到一起，而在1975年却成了毛和福特之间的障碍。

在美国人看来，对中国的开放本身就是一个结局，中美在亚洲的紧张关系已度过了危机；与中国的缓和同样就是与苏联的缓和。

从毛的观点来说，这一策略的落实有赖实力，而不是和平。他从中国的立场出发，认为中美应并肩反对苏联的全球霸权主义，因为遏制苏联“霸权”的工作不是中国单方面能胜任的。

因此，这次最高级会谈失败了，很是蹊跷。福特出于本国政治的考虑不改变对台湾问题——关系正常化的主要障碍——的立场。毛也不停地批评美苏缓和，而且向他的客人解释说，这样“只有克里姆林宫受益。”悲剧的根源在于，双方这种战略上的争论也看不出达到合作的迹象。

毛以前也曾反对过缓和，那是在五十年代后期，而且只是方式不同，理由却一样。在那些日子里，他的朋友是苏联，而不是

美国。因此，他当时认为，缓和对苏联有害。到 1975 年，这两个超级大国在毛的眼中换了个位置。

不过，从民族主义和长远的观点来看，毛的策略没有变。他不想让苏联和美国互相打起来，也不想让它们联合在一起来对付中国。他只希望它们互相不那么安闲自得，以腾出时间使中国强大起来，并赶上它们中的任何一个——或者是两个。

强 弩 之 末（1976）

在1975年的最后时刻，新的一年的钟声即将敲响之际，毛靠在他外间的安乐椅上。面色蜡黄，神色黯然，生机顿失，脆弱得就象德累斯顿的瓷器，已近乎无知无觉了。

一天黄昏的时候，朱莉·尼克松·艾森豪威尔和她的丈夫戴维来拜访毛①。毛被两位年轻姑娘扶着，挣扎着移动双脚，步履蹒跚。待站稳后，两位女护士退去。在照相机频频作响和电视摄像机的耀眼灯光前，他握住了美国人的手。然后，两位姑娘把他搀回到沙发椅上。

朱莉拿出一封信，交到毛那苍白、瘦削的手中。信是由一位被革职的人写给应该革职但还未被革职的人的。

为了回顾他与尼克松在1972年难能可贵的政治联姻，毛谈起了一些日常小事。“尼克松先生的腿怎么样了？”他问道。似乎想引起一场怀旧的话题。

毛谈到尼克松将开始的第二次访华，“我

正等着你父亲的到来”。他把双手重重地搁在椅子的扶手上，以加强说话的语气。这是他那个晚上讲得最生动的话。*

在1976年来临之际，朱莉和戴维碰巧发现毛处于一种矛盾的状态。

他们发现毛对美国人的一切事都很热情。“毛主席一直很关心你们的旅行。”当艾森豪威尔一家离开上海回华盛顿时，一位中国的高级官员对他们说，“他把你们看成自家人。”

然而，这对夫妇却见到了极左派的许多戏剧性动作，其中有些是毛直接参予的。

“不值得提起，”毛对朱莉和戴维谈起了一首充满斗志的词，这首词当时正准备重新发表，“那是我在1965年写的。”但《重上井冈山》这首词却是极左派的一颗手榴弹。

“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这是富有启示意味的词句。

会谈结束时，毛站了起来。一个年轻姑娘给她梳理了一下头发。接着，摄影记者们拍下了最后握手的场面。

《人民日报》在报道毛会见艾森豪威尔一家的同时，也发表了这首《重上井冈山》。② 同时发表的还有《鸟儿问答》，这也是一首斗志昂扬的词，作于文革前夕，结尾一句是“试看天地翻覆。”

如果说，1975年1月左翼刮来的是一阵微风，那么1976年1月，左翼刮来的就是狂风了。与一年前相比，毛更难驾驭这股势力。但他密切关注着风向，这是一位行将就木的老人在作最后一搏。当人代会的“问答”对犯错误的“鸟儿”发起攻击时，毛闷闷不乐。

---

* 朱莉还谈到当时北京驻华盛顿的特使黄镇，他当时也在场："我很奇怪，他不是躬身聆听毛的每一句话，而是坐在椅子上漫不经心地左顾右盼。"

如果考虑到毛吃力、口齿不清而且又是很普通的谈话，或许并不奇怪。毛似乎只是一件展品，而这位大使以前已经看过这件“展品”了。

清华大学的“工农兵”组织*，给毛的这封信播下了1976年春左派思想泛滥的种子。③

信写于毛的82岁生日。它控诉“资产阶级”在这所著名理工科大学“掀起了一股右倾翻案风。”换句话说，普通常识开始反对文化革命的教育“改革”这种胡思乱想了。

这封信紧随清华务实派中另外两个人的信到了毛的手中。这两人之一是校长刘冰，他在给毛的信中说：“如果不改变教育体制，学生离开学校时恐怕连一本书也不能读。”

邓是刘的后台。当刘说左翼控诉邓在刮“右倾歪风”时，这位强硬的副总理口气坚定地说：“我们要刮它一场台风。”④

这实质是“红”与“专”的对立。毛有能力进行裁决吗？

毛年事越高，就越相信人的主观意志的力量。即使在他憎恨职责在于培养人的主观意志的学校时，他也是这样。他信口开河：“书读得越多，就越蠢。”⑤

他瞧不起教授。他告诉学生上课时可以睡觉，考试时可以聊天。他把作家送到边远农村去种稻子。

然而，毛绝不会置孔夫子的诗书治天下的训导于不顾。尽管他瞧不起教授，但又害怕教授。虽然1956年北京所谓布达佩斯“裴多菲俱乐部”的幽灵萦绕在他心头多年。⑥他还是忍不住去读作家们写的书，虽然过后他又会把它们扔到一边。

追溯他二十年代在湖南的行踪就可以了解这一悲剧的根源。他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说，“开一万个法政学校，能不能在这样短时间内普及政治教育于穷乡僻壤的男女老少，象现在农会所做的政治教育一样呢？我想不能吧。”

文章继续说：

---

* 似指当时清华大学的“工农兵”学员“上管改委员会。”——校注

“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绅！”这几个政治口号，真是不翼而飞，飞到无数乡村的青年壮年老头子小孩子妇女们的面前，一直钻进他们的脑子里去，又从他们的脑子里流到他们的嘴上。⑦

公元一千九百七十六年不是1927年，政治口号并不以同样方式在清华“不翼而飞”。那时绝望的农民试图找出能表达他们苦难生活的恶魔似的词句。年轻的毛并不理解，“教育要革命”对七十年代一般的化学或物理专业的学生来说，是一句毫无意义的空话。

毛对刘冰的信未作任何回复，他非常喜欢那封极左派的“生日”贺信。⑧他读过后不久，这封信就出现在《人民日报》的头版。

“难道你（刘冰）要把工农兵象废物一样抛出校园吗？”⑨极左派论教育的文章得到了毛的首肯，在铺天盖地的文章中，这是一句最有代表性的话。

象往常一样，在文化领域似乎又要发动一场小型的文化大革命，因为在这些地方易于混淆现实。*

“敌人”就象从流水作业线上出现的一样，工作与生活的每一方面都与“两条路线的斗争”紧密联系。在口头的“革命”比整日喊“生产”要重要的多这已成为一种时髦。周——邓集团中的官员们被吓倒了。对外贸易也蒙受损失。⑩

人们口头上到处喊着“文化大革命的辉煌成果”，似乎这样装

---

* 这一年的晚些时候，毛召见了教育家蒋南翔，蒋曾被左翼狂风从高级领导层刮下来。当蒋进屋时，江青守护在毛身边，警告他向毛汇报教育形势“不得超过三分钟”。

蒋过去曾任清华的校长，现在已从政治幻想中醒悟过来，他倔强而不满地说：“我的报告三十秒就足够了。”他毫不掩饰地对毛说：“大学生学中学的课本，他们的文化水平只能与小学生相比。”

年老的毛，这位教育水平下降的幕后制造者叹了口气，喃喃地说：“如果这种形势持续下去，不仅要亡党，而且要亡国。”

腔作势地讲得足够多，就能肃清大多数中国人私下认为的文革是一场灾难的想法。这种调子是被狂妄的积极分子们煽动起来的。因为毛促使他们"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

这仅仅是为孩子们进行的争论吗？或者，这是不是毛要把某人赶出政治局，象他们以前做这种事一样，准备在新闻界造成一种声势？元旦时，毛做了回答。

"党内将有一场斗争。"他对朱莉·艾森豪威尔喃喃地说。[11]

尽管毛体衰力弱，他还是竭尽全力去拯救正在贬值的文革的成就。因此，《重上井冈山》和《鸟儿问答》并不是偶然写下的，而是文革的序曲。

毛准确地估计到，六十年代的"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将断送在邓的手中。

文革仅象是过节，它没有产生新的结构。毛曾想让"为人民服务"的利他主义精神渗透到平民百姓的心底，他把文革说成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要解决人们世界观问题的伟大革命。"[12]

他一直在寻找新的妙法。"过去我们搞了农村的斗争，工厂的斗争，文化界的斗争，但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没有找到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答案就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毛已经想摆脱那些失去了毛主义者品质的同事们。

六十年代，一种新的思维方式确实主宰了很多年轻人，他们对权威和旧事物的畏惧心理大大减退。一种新的政治手段也确实展开了，成千上万的一度消极被动的群众被发动起来，直接参予政治运动。于是，毛在高层的对手被消除，半数的政治局成员在文化大革命的狂风暴雨中纷纷落马。

这些变化没有一个是持久的。[13]到七十年代，青年们的激情变成极端的愤世嫉俗，自下而上的群众动员没能成为中国政治体制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文化大革命的受害者，作为七十年代

的胜利者，又重新回到舞台上来了——邓是他们的代表。

重振文革的雄风已失去意义，节日毕竟只是节日。不过，人们可以理解毛为什么要在他临终之前再作一次努力，他将自己作为导师的角色和作为领袖的角色常常混淆了。

不久，又发生一件事，这使天平向右边倾倒，也给了毛最后一次机会。

上海和平饭店的糕点师傅做了两只特制蛋糕，它们是用来庆贺理查德·尼克松先生六十三岁生日的。[14]

棕白相间着糖霜的香草蛋糕是供朱莉和戴维用的。那天他们是这家饭店的客人。更大的一只蛋糕饰以"尼克松先生生日快乐"字样，它装在丝绸裹着的盒子里，这是为这对夫妇带回到圣克莱尔去的。

当厨师们准备把蛋糕送到艾森豪威尔的房间时，一位信使赶到房门前，他从北京带来一条不祥的消息：周恩来死于癌症，终年78岁。

朱莉和戴维很快地把蛋糕当作早餐吃掉了。即使新闻界的态度从反对周的政策转到赞美周，中国表面的生活似乎仍没有什么变化。但是，在这种特殊时期，周的逝世使中国遭到了一次可怕的厄运。因为它给毛提供了一个机会，他可以再次尝试发动一场小规模的文化大革命了。

周的遗体从他病故的医院里运送到紫禁城的一间大厅。随着裹有黑黄相间着玫瑰状缎带的柩车队伍驶过，近百万人注视着，他们站在寒风中，默默地哭泣，带着复杂的感情。

在中国领导人中，只有毛没有加入众多的哀悼者行列和去北京医院向周的遗体作最后告别。即使90岁的朱德都来向这具覆盖着党旗，被鲜花和长青树环绕的瘦削而僵硬的遗体告别。

毛也未出席追悼会。邓在有五千名中国上层人士参加的会

上，致了语气过分恭维的悼词，而且王洪文主持会议则狼狈不堪，他就象一位撞入教授级会议的学生。[15]

五十年代后，毛极少参加追悼会。自参加1972年陈毅的追悼会以后，他未参加过任何追悼会，他的健康状况也许可以让他在周的追悼会上露一次面，他只要从家里支撑着走几分钟的路就可以了。

然而，他只送了一个花圈，花圈安放在这位任过二十六年中国总理的遗像旁，另一旁是中共中央送的花圈。肖像摆在骨灰盒上。(周曾要求火葬，并希望他的骨灰，"撒在祖国的江河大地上。")

也许毛只是不愿在众目睽睽之下露面，在这位总理生前最后的几个小时，他曾到医院守候在周的病床前，一种孤独或是内疚带来的悲痛使他要成为除医务人员外的最后一人，使他要同这位在他所有高级同事中与他关系最持久，对他最忠诚的人讲几句话*

中国古代学者司马迁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16]周的死就象山东的这座高山一样沉重，因为毛没料到他会死在自己的前面。*

如果在毛之后去世，便可以缓和一下势态。然而，周先于毛去世，毛不仅不能平息，反而会扩大由于周的死而带来的政治上的动乱，失去了周，具有"猴性"的毛陷入了李尔王的境地。因而极左派势力会对邓不讲情面的办事方式发起挑战。

一句话，周的逝世所导致的两极分化在1976年冬达到高潮。并且，正是毛的存在，以及他摇摆不定的嗜好，增加了反对邓的筹码。

向周的遗体告别时，只有江青没有脱帽，这一被电视摄像机摄入的镜头明显引起了震动。沈阳的一位军官愤怒地抓起一把椅子向电视机砸去。[17]在广州的北京路，聚集在邻居家看电视的一

---

* 毛因自身健康状况不佳，未曾到医院探望周。——校注

群人齐声喊道："打死她！"

邓走近遗体时，周的遗孀，淡泊而令人敬畏的邓颖超对他感激地致了意，邓夫人对江青则是冰冷的。她对张春桥的态度似乎介于两个极端之间，不冷不热。

象往常一样，照片是西方新闻报道中最能说明中国人的反映物。毛对艾森豪威尔一家说过的，"党内斗争，"在周的尸骨未寒之际就开始有了预兆。电视镜头为这一事件的外观提供了线索。

由于周的故去，邓小平试图对毛之后的权力阵容进行调整，就失去了一根主要的支柱。

极右派看到了通行的绿灯，他们谋求一种极不同的权力阵容，江青要孤注一掷。张春桥，这个比江青思路更敏捷根基更扎实的家伙，哆哆嗦嗦地藏在她身后。

毛本人对这些置之不理。"毛之后的权力阵容"并不是他真正关注的焦点。他还活着，他认为还有许多事情要做。

纵使毛对周有某种偏爱——他对他疏远了的妻子没有这种感情——他的态度依旧强硬，而且被邓小平激怒了，如果毛参加了北京医院的哀悼活动，周的遗孀也许还会拥护他。

冬至之时，毛又吐出了一句格言："不斗争就不能进步"，"八亿人口，不斗行吗？"[18]甚至当毛和蔼地向朱莉问起她父亲的腿时，这些话也被作为对邓的全盘政策不满的信息被准确地表达出来。

在旧中国，皇帝的圣旨总是放在一只镀金的木制凤凰的口中，发布时，把凤凰从天安门上吊下来，由礼部官用饰有彩云的托盘接住。然后，把圣旨抄在黄纸上，发送到中国的各个角落。毛的最新指示也是这样。*

---

* 毛自己也意识到了这种相似性，"不要把我说的什么东西都当作圣旨。"他在南宁的一次会议上这样说。[19]

如果说，礼部官的托盘就是《人民日报》和北京电台，那谁来扮演金凤凰的角色呢？难道毛愿意嘲弄1975年下半年的实用主义路线吗？如果不是，那是极左派以他的名义行动吗？

那些新的语录不管怎么说是出自毛的手笔，他的话亦未失去感召力。他的政权由一连串格言固定着。

"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20]通过新年元旦献词传达毛的这句话使全国震惊。而"安定团结"恰是邓自1975年中期以来巩固其权力的办事原则(因为周快要离开人世了)。

毛的这些话，象一团阴沉沉的雾，笼罩在那时召开的一次令人精疲力竭的政治局会议上。当时竞争的两派争相引用毛的话，毛的语录中的旮旮旯旯几乎全都被搜寻遍了，那形状真象云南石林千奇百怪，其妙无穷。

邓是接替周的一位候选人，张是另一位。

形势剑拔弩张，毛在场也无法控制他们了。邓向这个十五人的政治局作了一个经济政策的报告，姚文元驳斥它在理论上没有根据。有人（不是毛）是坚决拥护邓作总理，极左派以他们不会服从他的领导而断然否定。[21]针对这种情况，江青推举张春桥为候选人——他是她圈子中所能选出最合适的一位——但是，那些拥护邓的人，包括军界元老叶剑英，则设法推翻张作为总理的提议。

毛本人则把目光转向一位来自他家乡的得意门徒，他从未给毛惹过麻烦。

和蔼可亲的华国锋是一位诚实的人。到目前为止，毛从各方面考虑都是这样认为，毛至少可以相信他。华最大的优点在于，他在后继乏人的情况下对恶劣的环境抱有信心。

华是在1969年才从湖南登上国家政治舞台的。他比久经沙场的邓树敌要少得多。对某些重要的政治问题，他站在邓和极左

派之间，不偏不倚。在急风骤雨之中，冷静是他的风格。

由于毛不喜欢其他的候选人，华曾给毛提供过的服务，最重要的是在毛家乡的突出贡献，便成了这位和颜悦色的山西人的主要资本。

他曾在毛的家乡主持灌溉工作。他恰如其分地向毛献殷勤，负责修建了一条连接这个地区和长沙的铁路；建造了毛的韶山旧居陈列馆；在韶山办起彩电厂。㉒这些，对这座小村庄来说是一个极幸运的变化。

毛似乎意识到他是从另外的人物中而不是从最合适的人中选择了周的接班人。他知道有人（可能是他的感情疏远了的妻子）说：华"蠢"，是"乡巴佬"后，便反驳说：华"无私、不蠢、厚重少文。"*

毛感到了还有必要对华"不蠢"作些宣传。他承认华也有较不如意之处，因此在二月份华被任命为代总理之后，毛曾这样发过指示："要宣传华国锋同志，要让全国人民认识华国锋同志。"㉓

如果说选择华任总理是一种妥协，但这样做并不能使争执终止。

甚至当攻击的目标只是一种幻想时，毛还鬼使神差般的是要斗争下去。在华国锋提升不久，毛就以灾难性的语言写道："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㉔

这就是典型的毛，地地道道的阴阳家。他忧心忡忡不相信平衡状态的存在，他赞美光明，老是提醒大家阻止黑暗的降临。

"他从来就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毛突然对邓发作起来。㉕在癌症夺去周的生命之后，邓已经处于困境之中，这句话更是对他

---

* 这是引用汉朝一位皇帝在为自己的一位大臣辩护时说过的话（汉朝皇帝指刘邦，而大臣则是指周勃）。

在1976年的政治生命盖棺定论。

要说邓"歪曲"了毛的话是很容易的，而且现在很多人正在这样叫嚷。[25] 邓列出了一些毛所坚持的方针：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毛并未将它们置于等同地位。

新闻界宣传（虽然未指名）邓把"阶级斗争"从"纲"的地位降低到只是许多"目"中的一个，这样做，就是否定毛。这位副总理是"死不改悔的走资派"。

毛把邓及其盟友叫做"走资派"。事实上这太过火了。邓的上层支持者——军队元老叶剑英就是一个——对这位副总理遭到的攻击非常反感，他们匆匆退出了政治局的会议室，离开北京到南方去了。他们宣称不再参加这种败事有余的会议，并对毛的专断表示不满。

《人民日报》宣布（在华上任和邓从职位上消失之后）中央委员会出现了"分裂"。[27] 面对这种情形，又怎么期望一位干部或一位公民去遵循"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指示呢？

毛的最后一次整顿并未解决问题，而且他去世后，这些问题都稀里哗啦地落在中国人民头上。在否邓、用华的过程中，他似乎只是在证明他还活着，他在通过随意的断言驱赶死神。

有可能把作为导师的毛和作为独裁者的毛结合起来吗？

一次，毛以一种迷人的语调谈到孙中山为什么弃医从政。"这样他就能控制医生了。"毛说，"政治家掌握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是这种关系的'医生'"。[28] 这种极富儒家意味的偏激之语表达了一种寓意深刻的政治观。

在毛看来，孙通过从政而选择了更高一级职业，这样，他才能在更高层次上为师，其对象不是别的，而是人的灵魂。孙做的，毛也这样做了。

毛经常说人需要作反省。"吾日三省吾身，内省不疚。"[29] 他

在“八大”上这样说，“内省不疚这句话值得我们注意。”

一体性是毛的梦想，教师讲课要直到学生弄懂为止。政治也同样，统治者就是导师。他大书特书的是如何把人们结集到一起，形成一个感觉得到的统一体。

正是这样，一场民主和集中的奇异双人舞在毛的头脑中跳了起来。“没有高度的民主，就不可能有高度的集中。”他讲的这句话曾迷惑过相当一部分人。当然，只有群众把他们的思想奉献出来，统治者才能使大家集中起来成为统一体，这就是政治道德目标。

面对目前的严重问题，毛和他的侄子毛远新进行了一次谈话，[30]他给这位年轻人就可做和不做的事开了一张处方。他说：“在党的政策要改变时，你必须有清醒的头脑”。毛在说出有清醒的头脑之前，稍作了停顿，他在寻找一种更恰当的表达方式。在党改变了思想时，你应该怎样做呢？是要随政策的改变而改变呢？还是要坚持不同的意见才对？然而，不管怎样，有清醒的头脑会更加左右为难。

毛是一位导师，他确实想让他的学生，即中华民族保持清醒的头脑。但毛又是一位独裁者，中华民族只能存在一种思想。

对中国人民来说，没有一个统一的思想是不成体统的，就是这个不祥物把循循善诱的毛与独揽大权的毛统一在一起。

七十年代起，这种“恶的统一”在中国政治体制中导致一种周期性复发的病症。

1949年的毛并不指望中国今后一帆风顺，但他却又误解了即将来临的紧张局势的本质。在取得政权前夕，毛说：“在过了几十年之后来看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就会使人们感觉那好象只是长剧的一个短小的序幕。”[31]二十五年后这句话成了现实。

这出戏象毛预言的那样，不是道德性的，而是制度上的。

毛一再试图通过英雄的行动实现制度的更新，他一直在追求

一种更加道德的社会，但这种追求只是在毛的心目中才有意义，而在中国社会中则无意义。

正是毛的革命成功才造就了一代超过他的新人。历史并不因昨天在奋力维系自己的完美而停滞不前。毛就象一位应该下台去办另一种事却还在台上的演讲者。

有一天，年轻的毛在同他弟弟打架，而他们的双亲才死去不久。一个共产党支部在韶山一带活动起来。毛继承父业一边持家，一边进行党的活动。其弟泽民极力反对，他对毛吼道："共产党又不是毛氏宗祠。"㉜

这句话——言外之意是要过和睦的家庭生活——激怒了毛，他操起一根棍子就想揍泽民。*

毛确实与家长制的中国有密切联系，他常把宗祠与共产党混淆在一起。他对统一性的追求脱离了年轻的中国人所能理解的政治。

意识形态——无论是孔子的还是毛的——已经从"长剧"中退台了，这是"批孔"运动的部分凄楚之处。毛对孔子的影响极为不满，孔子和毛都是学究们的特殊领域。而对百万中国人来说，民族的前途高于一切传流下来的华丽教义。

"我们可爱的同胞"，他在掌权前说道，"将能象人一样生活，他们可以选择他们喜欢的政府。"㉝ 但是，深埋在毛脑海中的是一个道德共同体，而不是一个民主政体。

"人民"对毛来说是一个玄学上的集合名词，而不是存在着利益竞争和意见相左的公民队伍。他在1949年说："人民"掌权了。这倒有点实在——他的政府广泛代表了一般人的意愿，并确实在为这些人谋利益。但是，仅仅靠更换一个人民代表，"人民"永远

---

* 原文有误。实情是，红军初创时期，为一件公事，毛由于当时心情不好，想动手打已是红军干部的弟弟泽覃。尔后毛一直为此深感内疚，并多次以此例说明共产党人要讲民主，而不要讲"家法"。——校注

不能掌握。

"大跃进"期间曾在鼓励知识分子向党"交心"。在北京可以看到这种现象：教授们身上挎着画有"心"的纸板、绸布或绒布游街，他们这是在把自己的"心"奉献给党的司令部。[34]

这是宗教，不是政治。

毛确是把自己当作圣人，这种圣人排除了中间组织直接联系着群众，而中间组织在现代意义上就是政治的领域。这是扎根于旧中国的一种模式。真理和权力集中在一位圣人身上，他驾驭着作为现代化的国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这种结合实际上是一种灾难性的模式，而且，随着中国的发展，它将是越来越多的人不能接受的模式。

毛在延安批评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时说："如果我们今天不反对新八股和新教条主义，则中国人民的思想又将受另一种形式主义的束缚。"[35] 现在，这种事真的发生了。

漆有红黑两色"中国民航"字样的波音707停在洛杉矶机场成了一大奇观，它是来接尼克松的，这是他离开白宫后第一次重要的公开露面。[36]

中国的政府派专机迎接一位私人身份的外国来访者是没有先例的。在一片冰冷的茫茫雾气之中，这架波音707降落在北京机场。新上任的代总理华国锋微笑着站在柏油跑道上。

毛和尼克松彼此间觉得他们象是一对有着伟大前程的老朋友。他们会晤了一百分钟。

尼克松坐在江青身边，听着"解放台湾"的歌曲，在一个令人望而生畏，应有尽有的阶级斗争展览面前，尼克松露齿一笑，这是一部反映阶级斗争的血泪史。

邀请名声不佳的尼克松再次来访是毛的主意，看来这些是这位老人在事实不足的基础上作出的又一错误决定。

对许多人来说——不是对毛——尼克松以这种戏剧性的方式

再次露面，其受欢迎程度好象是在宴会闻到漏气味。恰好在三天之后，新罕布什尔州开始了初选，福特受到里根的挑战。白宫仍难忍受那令人记忆犹新的福特对尼克松的“特赦”。

后来才知道，甚至中国驻华盛顿的外交官也向北京指出，邀请尼克松访华可能会产生误解。[37] 对美国国情的不了解使得这些建议横招拒绝。

毛想见到尼克松。他在1974年后期就曾请伊梅尔达—马科斯转告尼克松这一点。[38] 并且，他还向三位后来的客人重复过这口信。毛认为中国外交部对此即使不喜欢也必须忍受。

毛从不深究其他国家细微末节的内政变化。对82岁的毛来说，印象便是现实，过去的回忆被赋予现在的意义。在他心目中，中国仍是个强大的王国。

他不会反躬自问——不能从问题中发现意义——如果白宫邀请下台的刘少奇到美国去作一次访问，他该有什么想法？

毛并非想使尼克松“恢复名誉”，象某些美国人猜的那样。与这种猜测相比，他正在做的事要简单得多，他的立场是以中国为中心。

毛欣赏尼克松在美中关系上做的突破，基于此，有什么理由不尊重他呢？* 他对福特的僵持政策感到失望——其实，当福特对中国无动于衷，对苏联也无动于衷时，中国又有什么失落的呢？

毛从来不理解在水门事件上的反尼克松的观点。“水门事件的处理太出格了。”他对泰国的克立总理抱怨说。[39] 他又对蓬皮杜说，“我们不能理解对这种事为什么要如此小题大作。”[40] 他确实不能理解：在他看来如此小的一个麻烦竟能把尼克松总统赶下台。

---

* 尼克松受到了与两个月前来访的福特一样的首脑级待遇。他与华谈了六小时。在全世界仅能从零星的信息中了解这个人时，他却成了研究这个人心理的第一位外国人。他还是第一位被允许以私人身份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答谢宴会的宾客。

而且，从中国的利益出发，他也不愿看到因美国内部换马所造成的后果。

"言论过分自由"。这是毛对水门丑闻之原因作的诊断。毛说在1968年他自己也做过这种事。他反问道："你身上正好带着一个录音机，你就想给这场谈话录了音，这又有什么要紧呢？"他若有所思地说："美国人大多喜欢摆弄录音机嘛"。他对克立先生也断言："我看尼克松下台是美国的战争贩子搞的鬼"。

单纯得惊人。他对克立总理说，"请写信告诉尼克松，就说我很想念他。"毛对尼克松下台表现出"中国人深深的民族优越感，既令人同情，又令人困惑不解。"

在邀请尼克松再访这件事上，毛试图鞭策福特比为难他的成份要大些。毛对美国的初选不太了解；而且，尼克松之行最终决定是在圣克利门蒂，而不是北京。

毛正在考虑的是一个更重大的问题：中国究竟应该重申与美国的关系，还是让这种关系衰退，并进而与苏联谋求缓和？

当千百万中国人民看到《人民日报》头版上毛与尼克松握手的照片时，这并非意味着批评福特，而是进一步确认了美国对中国的重要性。

尼克松对美苏缓和表示怀疑，这一点满足了毛。在一次宴会的讲话中，他说，他认为，"仅靠签署一份原则性声明或举行一次外交会议"就能确保和平的想法是"天真的"。[41] 这显然是在批评讨论欧洲安全问题的赫尔辛基会议。如果这不是在讨好福特，那就是在奉承毛。

即使不是事实，在毛的头脑中，美国问题也是与邓的问题紧密联系的*，因为去年发生的两段莫名其妙的插曲现已明朗化

* 邓似乎与尼克松在进出于横跨太平洋的旋转门时闹别扭，尼克松（1972年）"进来"时，邓刚好"出去"；而邓（1973年到1975年）"进来"时，尼克松又"出去"了；现在，尼克松赶来"进去"时，邓又"出去"了。

了。

福特来访的前不久，受欢迎的中国古典小说《水浒传》突然被公开指责为有毒的书，毛认为这个农民造反的故事旨在宣传“投降派”。

他指出，《水浒》中的农民英雄宋江，根本不能称为英雄。这改变了他一直所持的观点。[42]

北京四处开始谣传，邓（也许还有他的某些军界盟友）准备向莫斯科“投降”了，就象宋江对皇帝作“假抵抗，真投降”一样。

邓对这种牵强附会的作法不屑一顾，谈到批评《水浒》时，他轻蔑地作结论说：“有些人听见风就是雨。”[43]

第二段插曲真有点不同寻常。二十一个月前，中国在西北部扣留了一架苏联直升机上的全体成员。他们多次被北京宣布为“间谍”；然而，恰好在福特从北京慢腾腾地回到家时，他们又突然被宣告无罪。中国政府说他们不是间谍，还给他们举办丰盛的宴会，并令人难以置信地把他们送回莫斯科。

由一再宣称这些闯入者为间谍，到宣告他们无罪，北京以这种出尔反尔的做法对待一场间谍指控案，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史无前例的。当毛和福特的高级会谈失败时，中国政府是否会改变对苏联的观点呢？

这似乎是肯定的。在福特的黯淡之行后，毛并不赞成宣布苏联的机组成员无罪。这说明只能是邓，毛当时的主管大臣，授权向莫斯科做了姿态。*

最终，尼克松之行并不象美国报纸讲的那样，损害了美中关系，但是，也不象毛希望的那样，使这种关系升级了许多（中国

---

* 可以肯定，邓对1976年的毛来说是可疑分子。毛从一个令人失望的同事身上发现不恰当地对苏联采取友好态度是一个错误。但这并不令人惊讶。这是毛与党的首脑人物之间发生的一次大的冲突。

公众是这样认为的）。

“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尼克松就北京和华盛顿的关系作展望时引用了毛的词句。[44] 尼克松和毛彼此的印象很深，他们似乎是在攀登个人的高峰，而不是给外部世界带来什么变化。

对尼克松来说，这次访问只是对1972年的那次作了一个怀旧的注脚。* 对毛来说，尼克松之行不仅在于怀旧，而且也是他用力掷向政治局会场上的一颗手榴弹。

《人民日报》第一次发表了毛对邓的公开指责（“那个人从来不讲阶级斗争。”）[45] 这以后仅一个星期，毛就听说了半英里以外的天安门广场发生平静而紧张的示威的消息。

清明节是中国人缅怀去世亲友的节日。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台阶上出现了悼念周恩来的花圈和诗词，许多人都来观看这一壮观场面，这似乎无可指责。

但是，现场的气氛很紧张。有些诗远不止是纪念周，它们猛烈抨击那些自周去世后三个月以来大吵大闹的极左派。对毛的前妻杨开慧的赞美就是给江青的一记耳光。有的还提到一些怪物，如妖魔，用来影射姚文元。** 寓言极微妙，但带有爆炸性。***

---

* 毛每次对苏联的观点、价值评判标准和目的都采取了强硬态度。有趣的是1975年7月，在北京的一次会谈中，克立总理发现不是毛，而是邓极力称赞和支持河内的政策。

** 有一首诗写道：

清江 a 摇桥 b 恶浪翻，[46]
黑天黑地昏惨惨。
项羽 c 英魂自天降，
扫荡阴霾见青天。
a 江指江青。
b 桥指张春桥。
c 指周恩来。（项羽原文为Hsiang-Yu，前一字汉语拼音中无 Hsiang字，至少经过作者加工——校注）

*** 虽然康生也是最近去世的，但不管是清明节还是其他时间，都没有花圈纪念这位极左派的安全部头目。

人们的第二个主题是对中国的现状感到焦虑。“目前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有人站在“闲人莫入”的人民大会堂台阶上向群众高声问道,“中国向何处去,这是最大的问题。”

对毛的批评可以说是暗藏的第三个主题。有篇文章说:“秦皇时代已经一去不返了。”[46]而秦皇是毛心目中的英雄,不同于腐朽的孔子,他是一位常被赞扬的典型人物。在这主要是年轻人的示威中,蕴藏着对毛的家长制的不满。有一首诗以一种挑战,甚至是警告的口吻写道:“中国已不再是过去的中国,人民也不是愚不可及。”[47]

这已经不只是在纪念令人敬爱的周了。这种巧妙作法,以其强劲之力把一部分民意吹入了毛宫廷政治的灰暗大厅中。

纪念碑前这场声势浩大的运动有可能是对数月来极左派中伤邓为“死不改悔的走资派”的最有力回击。[48]

觉察到这一事件之后,毛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它们象一挂燃着的鞭炮,一个接一个地爆炸了。

北京当局把花圈从纪念碑前搬走了,这一举动把一场平静的悼念活动激化为骚乱,骚乱持续了14个小时,至少牵涉了十万人。当时,人们乱成一片,车辆被烧,一百人受伤,个别人死亡。[49]

有个年轻人——清华大学的学生,无疑是极左派的追随者,做了一个简短演讲,他强说周曾经数次犯了“反对毛主席”的罪行,他话没讲完就被一群愤怒的群众抓住捆起来,在纪念碑台阶上被推上推下,直到他成了血污的一团,瘫倒在地上。[50]

政治局慌忙召开会议,投票决定撤销邓的职务,正式选举华为总理,兼任党的第一副主席(一个新职务),从而使华作为中国领导人成了毛的继承人。所有这些,都是毛策划的结果。[51]

邓未能成为政治上的可靠接班人,这是由于邓的强硬作风,不合时宜的、务实主义的厄运所致。

并无证据表明邓是骚乱的幕后策划者，北京市长如果没有得到毛的首肯，他是不会下令将花圈撤去的。[52]这样，骚乱肯定也不会发生。

十分清楚，政治局走了极端。决定做得太迫切。政府不得不向全国尽快作出澄清。

关键一步是毛本人授意开除邓，虽然他已病得不能参加这次极重要的政治局会议，但他通过其侄子毛远新向会议转达了撤销邓的意见。[53]

据说政治局“一致”通过开除邓的决定，[54]这难以令人置信。难道军界元老们——叶剑英、许世友及其他人——会同意吗？难道邓也投票开除自己吗？“一致”意味着任何人都不允许公开表明反对毛的意见。

洪水般的批邓文章贴上了毛的商标。《人民日报》抑扬顿挫地说：“反革命分子赞美邓小平，并企图让他充当纳吉的角色。”毛还是生活在过去之中，他仍做着1956年匈牙利事件的恶梦。

以下几点表明毛赢得的胜利代价极大：

- 极左派没有彻底击垮邓；邓的盟友为他赢得了“保留党籍的权利”，“以观后效”。
- 邓出来了，但极左派并未进去；毛把正在下降的权力授予了模棱两可的华。
- 军队的领导人对事件的发展不快，但他们极少隐瞒在等待时机这一事实；他们等着毛去世，以及极左分子在悲嚎中一起随葬（镇压纪念周的骚乱的不是军队，而是极左派的民兵；对这种骚乱，军队顷刻间就能使它平息）。
- 社会舆论无疑完全接受毛撤消邓的意见，中国的舆论已达到一种虔诚的程度了。不过，在中国已经传闻毛可能再

也不知他自己正在干什么了。*

官方对邓的点名指责“死不改悔”倒是事实。邓没有全力反击毛——他正在寻求的是他以后东山再起的根基——不过，他封不住自己的嘴巴。

他对他的支持者们说：“如果他们说你是走资派，这就是说明你是对的。”可以肯定，这句话在当时不是轻视毛的，就是轻视毛思想的。

“保卫毛主席！”春夏之交，出现了这种醒目的标语。[55]奇怪之极，中国革命的最高领袖都82岁了，竟要在自己的首都“保卫”。

惯常被年迈的毛摆弄的中国人民，开始慎重注意这位伟人去世后的事了。接班问题是一个影响全局的根本性问题，最终决定1976年转折的基础力量是人心民意，而不是“阶级敌人”或懂得某种特殊学问的官员们制定的妙计。

街头的任何一个人都理解这一点，而且还能就此谈点看法。毛支配着可怕的权力，但他无力阻止人们不去注意他的衰老，不把他撇在一旁考虑他身后的事情。

这场骚乱，以及它敲在紫禁城紧闭的大门上所引起的纷乱的回声，使毛精疲力竭。自四月份以后，他是否做过任何重要的国事决定，很值得怀疑。

四月下旬，新西兰总理马尔登来到中南海，他就遇到了这种令人尴尬的场面。[56]毛几乎无力移动他放在安乐椅靠背上的头，费了好大劲他才喘息着吐出几个字。

---

* 人们会记得当年波亨利·福特一世解雇的哈斯德·艾伦·查理所说过的话：“这班人完了。领班是个病夫，不会调派人，乱了套。凡有才能者均被驱出。”（邓可能也会说这般的话）

"我明白"，马尔登震惊地说，"他的日子不长了。"

有时毛伸出他光滑的、衰老的手在便笺上胡乱涂几个字。对任何熟悉毛那龙飞凤舞的笔迹的人来说，这些字都能够认清。然而，现在这些字的意思却往往含糊不清。

与马尔登谈了十分钟后，毛就上床休息了。这期间，他在便笺上给华写了一句话："你办事，我放心。"[57]不过，这是要华办什么事呢？是下周召开养猪会议呢？还是保护马尔登安抵新西兰？抑或是反对战役？或是中国的未来？

同一晚上，毛又写了一句话："按既定方针办。"毫不奇怪，毛经过了一场激烈的思想斗争。他是说按过去一般的常规办，还是按他近期想好的某道谕令办？

五月份，新加坡总理李光耀与毛度过了难捱的几分钟，这是毛最后一次会见外宾了。李光耀说："没有实质性的交流，他的话莫名其妙，要先由他的侄女王海蓉译成普通话，然后再译成英语。有时他的侄女还要记下来，回过头与毛核对。[58]

维也纳的神经科专家沃尔特·博克迈耶尔博士以前曾诊治过毛的帕金森氏综合症。这年夏天，他又秘密地飞到北京。[59]可是，除了至多延长毛几个月生命外，他不可能再做什么了。

政治局的所有成员都感到焦虑，如果这位象征中华人民共和国实际存在的无与伦比的人物不在了，他们不知道中国该如何迎接这头几个星期的降临。

毛行将去世使极左派的某些成员也惊恐万状。

尽管有人批评毛，但没有人能够在他还不想下台之前就急忙赶他下台。

政治局的成员们发现，1975年至1976年他们对任何事都难以达成一致协议，尤其是不知道该如何对待这位神人。因此，毛仍是决定他们每个人前途的杠杆支点，他仍在台上，咕哝着他的话，而资深的同事们象可以不负责任的勤杂人员，守候在他左右。

一位年轻的外交官6月份宣布："毛主席近来身体很健康，一直忙于工作。党中央决定不安排（他）会见外国贵宾。"[60]

过了这么久，中国官方才最终对毛的健康状况作了解释，言外之意很清楚毛生命垂危。数年来，中国人只能见到他同外宾在一起的照片，现在连这种活着的形象都再也见不到了。

根据近几周来毛同新西兰、新加坡、巴基斯坦领导人的费力而又短暂的会见，可知这个决定做的太迟、也很微妙，它肯定不是"我们党的中央委员"决定的全部内容。

极左分子似乎也反对这一做法。对上海的激进分子，对江青以及与毛亲近的其他人来说，毛是他们的主要支柱。

政治局剩下来的务实派倒是欢迎这一做法，不过他们的力量太弱，还无力促成这一决定。

无疑是华影响了这一行动。这位腼腆的总理紧挨着毛，他不必冒让毛发怒的危险就能操纵作出这一决定。他不属极左派，所以他要作最后努力，紧紧依靠毛从而为江青小宗派遮丑。

毛本人是否也参与其中，抑或是他本人制订了这一方案？我们不得而知。

毛已成受属下奉承的对象，他已病入膏肓，又不存在一个可继承他的权力的一位一致拥戴的继承者。不过，毛不再接见外宾并不意味着他已经辞职。

亲信、枪杆子、个人效忠及血缘关系开始比宪法或任何规章都更能起作用。

政治局的各位成员都竞相捕捉毛那里传出的信息或文件，许多权力都转入毛的贴身警卫官汪东兴手中，他手下有一支精锐的8341警卫部队，他还负责中共中央办公厅的工作。

家庭成员也一样，毛的侄子毛远新原是沈阳军区副政委，他从东北来到北京成了他日薄西山的伯父的总参谋长。

新上任后不久的一天，远新就跑来告诉他伯父，上海一些有影响的人物贴了一张耸人听闻的大字报。[61]

大字报说，“邓在给周致的悼词中过于美化了周，那个定论应该改过来。”无论远新告诉毛这张大字报时存有何种动机，据说，毛还是作了明确表态。他说：“攻击周恩来，必定要遭到人民的反对，悼词中的结论不能改。”[62]

几天后，中国人民手上就有了一条新的毛语录，其暧昧之处说明一个严重问题：生命垂危的圣人兼“皇帝”仍在当权，却又无法管理。

这条语录就是：“翻案不得人心。”但是，借孔夫子之言所说的话意义何在？它在告诉中国人民——他们当然不知道毛与其侄子的谈话——毛的意思是：人民不会支持邓翻文化大革命的案。

这并不是说毛还在同情邓，而是说极左派在利用毛对邓的不满，或者是捏造这种不满，以达到他们自己更深的目的。

在政治局激烈的争辩中，毛的名字被投来掷去，即使毛本人出席会议也是这样。在一次会议上，张春桥批评道，中国进口全套的工厂设备背离了自力更生的原则；华壮着胆子说：“所有这些重大的引进项目，都是经过毛主席批准的。”张嚷道：“你总是拿主席来压人民。”[63]

在许多这样的争吵过程中，毛明显地默默坐着（或躺着），时而轻叩着手。到晚上，他写下一句决定性的格言，然后找这边或那边的主要人物来见他，以显示自己倾向于那一边。

作为这位命在旦夕的统治者的妻子，江青以传统的方式享有一段时间的权力。由于毛病入膏肓，他无力去阻止妻子的活动。因此江青监视着电话机，密切注意着来往的信件，把她不喜欢的翻译都换成顺从她的人，并着手为在毛身后掌揽大权作准备。

毛的一生与封建传统整整兜了一个圈子，他在孩提时代就开始反抗中国传统，拒绝过 14 岁时的一次包办婚姻；但最终却以一

位新时代的"皇帝"而结束，驻足于久享盛名的中国传统台阶之上。而他的最后一位夫人则是在摇摇欲坠的皇位背后进行操纵的皇后。*

仲夏时节，政治局全体成员在毛身边开了一次会。也许在回家时，他们中的有些人还一直在发抖。

"帮助江青。"毛要对未来的政策做出指示，他以这句话开头，[84]但是他的话渐渐低得听不清了，后来却围绕着毛接下去讲了什么引起了激烈的争论，有人说是"高举红旗"，有人说是"改正错误"。

江青及其同伙宣称毛讲的是前者，这意味着由她来接替毛出任党的主席。这位女士的反对者们听到的则是后者，他们以此来反驳江青的观点和做法，虽然这种反驳声调是和善的。

毛接着对在他卧室开会的人说："人生七十古来稀，我已经八十多岁了，早就该死了。"这显然是一件不准备讨论的问题。毛有意要暴露生活中的阴暗面，他盯着这些无言的、善解其意的同事们毫不留情地说："你们中不是有人希望我早点见马克思吗？"

终于，华好不容易才开口："没有。"

毛点破了华的搪塞："真的一个都没有吗？我不信！"

死神对1976年的中国没有丝毫怜悯，似乎清明节的政治地震闹得不够，仲夏时节，一场真正惊人的大地震把唐山市连根拔起了，死亡近二十五万人，而这时朱德刚逝世不久。

毛坚持要了解唐山灾情中的每一细节，如果这场悲剧没给他一种预感，那才怪呢？中国农村一直都迷信大自然在政治事件上的预兆。农民们认为，一场剧烈地震意味着一个朝代及所授予的统治权的结束，毛的头脑中传统思想根深蒂固，所以他肯定也

---

* 毛去世两年后，在一阵言论自由的浪潮中，北京贴出了一张大字报。其中说毛"晚期的思想"脱离了现实，实行的是"家长式专制"。

推测同样的关系。

社会上谣言四起，大部分谣言都说毛快要死了。并且，官方新闻媒介也承认对谣言的传播失去控制。

地震前，乌龟变得烦躁不安，熊猫则抱头嘶叫，老虎和牦牛在预感到地震时都趴在地上——动物感到了大自然的摇动。

地震后，谣言沓来，银行被抢，交往中的无礼行为更加频繁，工人也拒绝上班——人们感到了政治的摇动。

自从1949年以来，无论形势多么危急，毛的在场始终是权威的最终源泉与平息动荡的巨大力量。

这个时代正在结束。这种朦胧中断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毛堪称一个朝代最后一位"皇帝"。

在一次关于战争的谈话中，毛说："负担太重时，死亡是一种解脱。"[65] 到8月下旬，毛的负担太重了，便不省人事。

各派挥笔去发挥那些偶象化的乏味词句的时机到了。华国锋该制定继承大业的计划，江青该忙着谋划自己的对策了。*

他真的还能活吗？在明朝亭阁式的高大窗户下，仰卧着的毛似乎不是真的。对政治局的所有派系来说，毛已被毛主义所代替，现实中的82岁的毛被循环生成一打"毛们"。这种方式使循环者们的需要得到满足。

江青及其同伙对毛之后时代的到来缺乏自信，虽然这伙人试图从毛哆嗦的嘴中挤出一句什么临终指示，但毛再也不能对政治表示意见了。

中国以外的消息传说，毛的逝世将带来不稳定，然而，毛的

---

* 有人说——这些话当然得不到证实——她残酷地把毛从这张床搬到那张床，以达到某种不可告人的目的。在毛弥留之际，她勒索了毛三千美元，临终时，她在远离北京的地方打桥牌。当得知毛的死讯时，她诅咒自己的厄运，她匆匆赶回中南海来安排自己的位置，寻找一些对自己有利的，毛签署的文件。[66]

在世一直就是文革以来不稳定的主要因素。而对毛的死期的不知则是最后的一个不稳定。对于这个遭受近二十年磨难的国家来说，毛的逝世将带来返璞归真意义上的稳定。

北京晚秋一个和煦的下午，三点半钟，收音机开始预告半小时后将有重大新闻。有些在北京市中心工作的人猜测这一消息，因为他们看到上午一连串的小轿车进出于中南海。

“毛主席逝世了。”[67]

9月的一个凌晨，毛离开了人世，政府只过了十六个小时就向全国和全世界发布这一消息。按北京的标准，可谓闪电般的速度。

政治局如释重负。

下层人士有的在哭泣，更多的则是目瞪口呆。

在当代，毛领导中国共产党的时间比任何一个主要国家的领导人都要长，几亿中国人想象不出没有毛的中国将是什么样。

举国降半旗，不戴的毛主席像章又一次佩戴在某些人身上，成千上万的人买来《人民日报》以了解详细情况，他们平日从不劳神去读它上面空洞乏味的文章。这次，这份报纸在北京的发行量增加了几倍。

斯大林逝世时，苏联笼罩着一种可怕的瘫痪气氛，现在中国没有这种征兆。首都北京(甚至其他一些地方)显得很平静，也没有自发的群众“事件”，人们照常工作、照常生活。

中国人认为死亡是超脱不了的自然规律。很少有人装模作样让人感到毛之死足以使他们流泪。

“向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发布的讣告充满感情，“中国人民和全世界革命人民衷心爱戴他……。”

是他，这位农民领袖，带领中国共产党，脱离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也是他使中国震撼西方。现在，他被誉为“世界无产阶级

和被压迫人民的伟大导师。”

哀悼活动宣布持续一周。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将没有任何体育活动和娱乐，“毛的遗体停放在人民大会堂，人们无论职位高低，列队经过灵柩，致以最后的敬意”。这至少是新华社第一次报道的消息。然而在稿子被广为播发和翻译之前，还是有一处小小的改动，“最后”被删掉了，变成人们前来致以敬意。[68]

这一改动表明，毛的遗体——更不用说是他的思想遗产——成了面面相觑的政治局委员们手中棘手的问题。

几年前，毛就去过八宝山公墓为他和江青选择了一块墓地。他不止一次地带着江青去看过这块886号墓地。[69]

1976年在某些中国领导人看来，把蓝苹与毛埋在一起的殡葬计划是不能容忍的。多数人认为，最妥善的解决办法是象周生前处理他自己的遗体所指示的一样，将毛火化并把骨灰撒向“中国的江河大地”。

但毛并未要求这样做。更有甚者，使毛成为木乃伊(列宁式)以供后代观瞻的骇人听闻的办法更迎合了政治局中的某些人（包括华的想法）。*

毛可以离开这个世界了，但他的政治继承人，仍要依靠毛的威信，决不允许最后的致意。

匆匆忙忙地从维也纳请来的尸体防腐处理专家，已从最近对胡志明遗体的处理中学到了经验，他们准备按照华的努力，让毛的遗体成为一种有形式的威慑力量来发挥作用。江青不同意，使得对毛的遗体的处理极为糟糕。

三十万人列队经过灵柩“瞻仰”遗容，外交官的时间特地作了安排，具有共同意识形态的国际友人被单独列为一队，在中央

---

* 对这件事，毛也很矛盾。虽然他说过：“我死后，把我的尸体送回湖南湘潭。”[70]但是，将自己的遗体安置在某个陵墓里，似乎是他想做的最后一件事。

委员们送的花圈中，其中有一个花圈挽联这样写道："深切哀悼敬爱的伟大导师毛泽东主席，您的学生和亲密战友江青……"*[71]

一百二十三个外国政府发来了唁电。许多唁电尽是些死死板板的赞美话。五、六十年代诋毁毛的政府越厉害的，1976年对他颂辞也越多；九泉之下，毛肯定对这种矛盾现象感到慰藉。

在纽约，联合国下半旗致哀；在莫斯科，《消息报》只在倒数第二版的底部发了一则报道；在香港，股票市场混乱；在台湾，则举行庆祝活动。

旅居多伦多的张国焘讲了一句伤心的话："我们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在请这位80岁的老者就其昔日对手之死作一番评论时说："象我一样，毛泽东也是凡世之人，死亡只是时间问题。"他已没有丝毫怨恨了。[72]

哀悼毛的最后一天，一百万人到天安门广场开追悼会。下午三点，全中国停工三分钟。整整9亿人(当然，还有少数人例外)默哀着。中国所有的火车、工厂、轮船都为这特殊的三分钟长鸣着。

王洪文主持追悼会，这种不得体统的安排使追悼会不太相称；华致悼词，他们以故作老练的口气赞美了毛的伟大，批判了邓的罪行。

孙中山的遗孀站在华身边，而华正喋喋不休地讲着党内的"走资派还在走"，并且"资产阶级就在党内"。[73]

追悼会结束时，在场的每个人——包括全中国在看电视或听广播的人——向天安门上毛的巨幅画像三鞠躬。随后，一支五百人的乐队高奏起"东方红"，该歌曲的最后一句称毛是"人民的大救星"。

---

* 后面接着是毛的子女和一些亲属的名字。

下午四点，人群散去。自行车又象往常一样潮水般涌过天安门，追悼会后，人们乘坐的小轿车、面包车从大会留下的废纸屑上辗过，渐渐地远去……

毛泽东时代结束了。

结　语

尽管毛有过失，但毛是二十世纪魅力超群的政治家，他使中国有了一个新的开端。

没有毛，中国也同样会产生强有力的共产主义运动。毛决不是这一运动发端的关键性人物。无论他存在与否，骚乱和非正义都会使共产主义极具魅力。

当然，如果毛不在三十年代成其为领袖，那么中国共产党在1949年就不可能掌权。一场没有毛的共产主义运动肯定会逊色不少，它将失去其应有的、区别于其他各国共产主义运动的特色。

是什么使他成功地掌握了党政权力，取得了最伟大的成就呢？那就是他特具的火一般的热情。没有这，就没有人能象毛那样随着中国末代王朝的衰落以来点燃他的时代。他很自信，也坚信他的农民军队最终会胜利。这——不仅仅是对权力的渴望——赋予他坚如磐石的意志，

这种力拔群山的个性特征——上帝理解毛的这种作为——与时代的社会特征紧密联系。毛生长于动乱年代，那时的人们呼唤着一只可以拯救他们的强有力的手。在那个激烈动荡的年代，那些意欲拥护象毛这样的决意反传统者遍地皆是，可谓空前绝后。

那也是一个令人眼花缭乱的年代，全国像是准备了一百场节目的狂欢舞台，待演的节目都在谋求公众的允诺后以便随时登场。共产党人、国民党人、军阀、土匪、教徒、外国探险家及冠以其它名称的人物，全都旋转着拥挤在一起。兴起、败落、昙花一现的联盟，方生方死的新行动计划，在这种势境中，一个意志坚决的人，有着千载难逢的良机与世争雄，变革社会。

与这一狂欢舞台上的其他人一样，毛也以命相注，并且气运亨通。有三、四次，毛以毫发之差避过了灭顶之灾。① 长征结束后，他之所以赢得中国共产党的指挥权，部分原因就在他的主要竞争对手在挣扎着通过西藏时时运不济。

在一些乱糟糟的大事件中，日本进攻中国的时间选择对毛大为有利——这挫败了蒋的计划。在一群身居中国共产党领导者地位的冷酷阴险者中，毛因与莫斯科及第三国际保持一定距离而免遭毁灭。然而，几乎每一位赞同苏联的拙劣建议的中国领导人，都因此在中国共产党内失去了立足之地。毛是在巧妙消除不适应中国的克里姆林宫策略过程中幸存下来的。

毛的秘诀在于他深知暴力的必要性，实际上他也乐于此道。当党内其他领导人还呆在上海时，毛则拿起一杆枪跑到乡下，走在了别人的前面。

在战争中，毛凭借两个优于人的长处而得心应手：灵活机动的策略，和使下属领会其策略的能力。②

毛曾自称为中间偏左派。③这也是他的方法。他确实在乡村对父亲发出过绝妙的最后通牒，确实经常灵活地利用“统一战线”孤立过主要敌手；确实有意放纵过左派的那些好斗的家伙，并在他

们能量耗尽、成为多余之物时就钳制他们。

他对右派的愤恨决定了他时而向左蹦去，但极左不是他精神上的迷恋之处。他喜欢这种骑墙的姿势。当他愿意的时候，用一支讽刺的利箭或一剂现实主义的苦药，他就可以反驳右倾，而且又抑制左倾。

他常说，"两条腿走路"。这种天然的均衡性——有点象古代中国人信奉的阴阳刚柔相济的二重性——在毛的全盛时期，对毛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他博览群书，足智多谋，而且他来自中国的内地。这些因素都同样重要。在革命的热潮中，他能冷静明智地驾驭群众的激情。

毛也曾为一些过火行为兴奋激昂——如许多人在行将灭亡的旧中国面前所表现的那样——然而他又能持超然之态分析自己所获的经验。

最后，不能撇开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的特点来解释毛的品格。刚果能产生一位毛这样的人物吗？新西兰能吗？我们不能仅仅从其个体心理特质来说明毛的成功。旧中国产生了坚定的、反叛的、神奇的毛，正象毛缔造了新中国一样真实而合乎逻辑。

在中国和世界历史上，毛都占有重要地位。毛领导了一场摧毁旧中国的革命，与其他任何主要国家急剧的社会变迁相比，他推动中国进入改革的运动可能更加剧烈。他为世界上这一最古老又最庞大的国家恢复了独立，赢得了地位。

作为主宰人物，在二十世纪全世界最引人注目、人口最多的社会中，毛本身就是一位巨人。在有记载的中国三千年的全部历史中，他可以列入六位最主要的统治者之中。

作为一位统一者，他可与隋朝（公元六世纪）和明朝（公元十四世纪）的开国皇帝并驾齐驱。甚至可以其壮举与他崇拜的英雄、叱咤风云的秦始皇相提并论——秦始皇在耶稣降生前221年

就统一了中国。

作为中国社会的改造者，他要胜过隋朝和明朝的两位开国皇帝——因为他们几乎未改变社会体制——并且，这一点只有反传统的秦始皇才能与他匹敌。或许还有王莽（公元 8—23 年在位）——他在封建主义的衰落时期进行了“社会主义”的尝试。

作为一种学说的创始人，毛超过了包括秦始皇在内的以前任何一位中国执政者。也许，堪与他并列的是建构了中国人生活模式的孔子及其他圣哲。在某些方面，毛又超过他们，因为他生前就声名远扬，而中国大多数圣贤则是死后留芳。

以二十世纪的眼光来看，毛之所以如此伟大，是由于他的影响在现代中国历经接连不断的种种动荡仍经久不衰。他的经历，足以使他成为将马克思、列宁、斯大林合为一体的中国革命的化身。

五十多年前，毛是中国的马克思，因为他分析了被外国列强瓜分了的封建中国的诸种弊端。他成为中国的列宁，是因为他领导了走农村包围城市以夺取政权的造反道路。1949 年后，他又戴上了中国的斯大林这顶帽子，因为他要用泥刀和砖头来建设一个社会主义新中国。

毛不止是一种，而至少是集五种角色于一身的人。他是点燃全国反抗烈火的农民运动组织者、军事统帅、豪放不羁的浪漫主义诗人、赋予马克思主义一种新的东方伦理的哲学家、全球最庞大的行政机构的政府领袖。

他是社会活动家，也是梦想家；是半知识分子，有点象戴高乐和邱吉尔。这类思想、行动一致的人物在动乱年代总是具有影响力。他们发现，历史由于竞争的刺激才显得活生生。毛坚信过去的美景可以再现于未来，这激起了他最初的政治雄心。他的独特兴趣在于历史是如何演进的。他认为，理想和非凡人物坚强意志是历史的关键所在。

这类集活动家和思想家于一身的人物与空想知识分子不同。他具有军人的气质，兵权之剑倚在史书之旁。与最引人注目的逻辑真理相比，他更热爱自己的国家。他讨厌技术，对于机器能改变人类生活方式的说教难以接受。在经济领域他不是内行。

毛、邱吉尔和戴高乐都是这类人，热衷于理想的人无论如何难以博得“真正的”知识分子的赞许。走出书斋拯救他自己国家的一意孤行者会渐渐成为传奇人物，而且很难把他们与那些曾激励过他们去行动的圣贤般的英雄们区别开来。

对于二十世纪中叶大多数的中国人来说，毛的主要成绩在于统一了中国。这个幅员和多样性方面与整个欧洲相类似的国家常常缺乏政治上的统一。在二十年代，中国变得如此衰败和混乱——如孙中山遗憾地说过的：象一盘散沙——以致许多中外人士本能地认为，不可能把中国合为一体了。

毛统治的时代是中国历史上最为统一的时代之一，方言逐渐消失了。学校教育使孩子们很容易辨认打上了“新中国”印记的喜马拉雅山脉和东邻朝鲜的森林。共产党的组织网络使中国29个省的相互依赖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在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一本书能象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毛主席语录》那样被数亿人诵读。人们甚至一边哀叹这本语录成了知识分子的紧箍咒，一边还要把它作为一种统一的力量顶礼膜拜。

毛领导的中国在世界上站起来了，这一点中国人看得相当重，它恢复了中国人的高大形象。“东亚病夫”的迅速崛起足以使亚洲的其他国家对它新产生的能量感到紧张。除了担心中国会被外来的袭击消灭之外，年轻的毛对一切都无所畏惧。

自1949年宣告“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以来，④壮年的毛意之所欲已得到证实。当北京宣布一次核试验时，你只要看着中国年轻人脸上的那种激动之情就可以了；或者，你也可以同老年的中

国人谈谈，虽然他们中个别的喜欢社会主义，他们还是会说北京政府的好话。因为中国人在世界上有了自尊，这使他们感到骄傲。

什么是毛思想呢？他第一次把农民置于马克思主义革命计划的中心；他把帝国主义当作他所处时代的世界政治的关键，这甚至超过了列宁。这些就是他学说中的孪生支柱。

然而，毛也创造了两个概念，它们使基于支柱顶端的理论大厦具有了特色。他极端恼恨僵化，他用自己欣赏的观点取代了欧洲马克思主义确定了的规律，这就是：**一切皆流，永远如此。**

在毛看来，革命不是一个事件，它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生活方式。毛的政治意识中有两个恒定不变的东西：一是他环顾四周时看到的是无数的不满星火；一是他渴求用变化之棒来搅动锅中之水。

我想，毛根本没把社会主义当作一门科学。马克思、恩格斯则不同，他们宣布以前所有社会主义者的思想都是乌托邦式的空想。对如何策划夺取政权，毛象计算尺般的那样精确。然而，他追求的社会却不能以科学法则来划定。

毛从不自满，他总在追求一种更有人情味和极具影响力的社会主义，这是他的优点所在。如果说，德国人发明了作为科学的社会主义，那么可以说，毛尽了最大努力使社会主义融化成一种社会道德。他不仅需要一个新型的国家，而且需要一种作为他的追随者的新型公民。

年老的毛并不十分清楚他想要什么类型的社会，这是他的缺点。他父亲似乎对他的影响极大（赋予他全力以赴的斗志和对敌的专注）；有时，似乎又是他母亲的影响支配了他（赋予他安享一种道德生活的既定目标）。⑤

毛闻名于中国以外的世界。在毛以前中国三千年的历史中，

从某种程度上说，还找不出毛这样的人。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个在农村环境中长大的人，极少费神去关注中国以外的事。两次去苏联是他仅有的一点国外履历。

他43岁时会见过埃德加·斯诺，这是他一生中第一次与外国人建立一种较为持久的关系。他从未熟练掌握任何一门外语。

毛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都把视野和热情局限于中国。其他国家仅在这样的范围内才能引起他的兴趣：或者它们干涉了中国；或者它们具有中国能学习的思想和经验。

毛的伟大在于他的不屈不挠，在于他的精神锐气以不可抵御之势注入世界意识中。在许多国家，“毛主席”这一有助于跨越文化障碍的亲切的尊名，已成为大多数国家家喻户晓的用语。在六十年代，《毛主席语录》译本的数量和种类之多，使《圣经》也黯然失色。即使是孔夫子，他的学说也从未传播到如此之多的国家。成吉思汗以其影响名扬欧洲，然而，他没有学说。毛是“第一位以朴素而直率的语言同世界谈论我们的切身利益的中国人……”。⑤

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的许多第三世界国家中，毛是各种各样的反殖民主义形式中的主要的人格化身，他比苏加诺、尼赫鲁、纳赛尔更具魅力。因为他知道，要在落后的民族实施新政，不仅需要诅咒西方，而且需要在本土有一个整体的依靠自力更生的变革。

在西方，人们对有色人种的东方世界产生的、有巨大影响的政界人物不习惯。一位中国人站在世界历史的界岸上向我们招手——这就是毛的新奇之处。尽管他是大地的儿子，一位土生土长的中国人，但他以作为本世纪世界政治巨人之一而走完自己的人生历程。我认为，就他曾有过的全球影响来看，只有罗斯福、列宁或许还有邱吉尔才能与之相提并论。

毛的民族主义倾向是如此之强，以致于如果社会主义不能拯救和繁荣中国时，这位地地道道的中国圣哲会随时把它束之高阁。在二次大战后的国际政治中，正是这位中国圣人以一种奇特

的方式发射出两颗最具反响的子弹：1960年他与苏联的联盟破裂而终止了国际共产主义联合；十年后，他向美国敞开了大门，把一个两极世界改变成三角关系的世界。

他所施展的技巧令全世界惊讶，全世界由此在一定程度上领略了中国精神的真谛。

毛统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四分之一世纪并不只是乌托邦理论的一段插曲。他的统治改变了中国社会，而且这种社会变迁将持续到未来，持续到因岁月的不饶，这位神话般的人物逝去，人民生活自此持续到中国社会现代化以后。

毛的政府使新中国比旧中国有更多的社会平等，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按劳取酬——身份，或拥有土地和资本不再起作用了。因此，中国的产品分配成为世界上最平等的分配方式之一，彻底贫困和死于身无分文的人极少。并且，进步的基本手段——卫生保健和初级教育——不再是只有少数人才支付得起了。

在毛的领导下，中国向社会现代化——现代化的最有效形式——迈出了一大步。虽然这一过程使年轻人的注意力从毛的世界观中转变过来，但这些现代人是毛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预言的产物。

在他临终之前，毛完全可以宣称中国已经向繁荣迈出几步。出于多种原因，中国的经济发展虽不如日本那样给人们以深刻的印象，但要胜过印度。尽管毛喜欢拔苗助长而有损其正常生长速度，但收获总是主要的。

总之，毛留给中国的是很大程度上的自给自足和世界第六经济大国的地位。

然而，毛的履历极为复杂，尤其在国内，作为一位要人和政治家，他有严重缺点：心存较大偏见，做事总是前后不一贯。

由于他地位显要，毛不总是令人有安定感。在他的同事中，与他私人关系密切的人极少。他是一个伟大的领袖人物，然而他的性格中的许多方面不值得称道。

毛有自己奇怪的合作方式。如果必要，他可以与任何人结成联盟——今天与一名土匪，明天又与一位王子。第二天，这名土匪或王子因情况变化，又象手纸一样被扔掉。

他历经坎坷，因为他经常改变初衷。他常常对自己栽的树结出的果实惧怕畏缩且异常憎恶。他周期性地对官僚机构的作风大发雷霆，在一个九亿人口的国家，这倒有点象是说不准园丁粘一点泥巴一样。

遗憾的是，中国缺乏某些毛的社会主义所允诺的玫瑰色美景。毛指望中国出现一种"繁荣的文化"，然而政治宣传吓倒了作家和教师。毛期待着公民有"个人心情舒畅"，然而他却撇下一群闷闷不乐的平民而去，他们已经体验到不必伸长脖子等待了。

从某种程度上说，1949年以后，毛从未平静下来过。他从未劳神去把过去原有的革命价值观念转变成胜利后年代的行动模式。他作为一个管理者，要比作为一个反传统者，导师和战士逊色得多。

事实已经证明且将继续证明，中国要从衰败的经济中复苏，要经历一个长期的、缓慢的过程。它的发展落后于毛革命的第二位任务——为这个灾难深重的民族雪耻。所以如此，部分是因为，要在一代人的时间里，使占全球人口四分之一的国家由贫穷走向富裕是一项异常艰巨的任务，不过，部分原因还在于毛不象他精通政治那样精通经济。

这个曾自称为既有虎气又有猴气的人真是充满矛盾。他谴责生活中的一切俗套，然而，他又让中华人民共和国循规蹈矩，陷于他设置的泥淖之中。他自己常常沉溺于传统的浪潮之中，而他却要中国的年轻人远离此地，游向那高高的现代荒漠之陆。他承认

意志在历史中的重要作用，然而他又提倡辩证唯物主义，向历史的客观力量让步。

在毛身上总有什么东西使他拒绝踏上易于成功的平坦高原，只是困扰之时，他才会返回古老的价值之路。经济进步是毛对中国的全部希望所在，但他常在对这种进步的特质焦躁不安。他毅然把政府内的团结和信任抛在一边，以发动其骇人听闻的文化大革命。

即使不密切，但与苏联保持事务性关系本来可以使北京近些年的生活有较大改善。但是，毛不能容忍过去的清白被苏联模式的未来所玷污——他因此宣布莫斯科是万恶之源。

可是，毛的矛盾不只是存在于他个人的封闭着的世界。这些矛盾变得如此之大，是因为中国的变化比毛的变化大得多，而中国这种骚乱般的变化又与毛紧密相关。

毛的一生很难用某种模式来进行概括。晚期的毛——欧洲非斯大林化之后——与刚掌权的毛明显不同。

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已自我溶化，而作为一种新的社会现实却伴随着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辉煌胜利而来。毛“修正”了马克思和列宁。他本应认识到，随着中国条件的改变，毛主义也必须要修改。然而，就象加尔文教徒不十分相信有平行的权利一样，毛也不十分相信他自己的一切思想都应由社会现实所决定。他不能容忍自己权威的丧失，而这又是他的意识形态必然会带来的后果。

毛是憎恨旧事物的人，然而最终，他笃信了一种别人发现已经陈旧了的思想。

年轻的毛为马克思主义所鼓舞，他熟练地用它来夺取了胜利，并开创了中国的新时代。老年的毛则为关系的改变感到困惑，因为马克思主义者对他周围的新社会失去了信任。如果他不是现在去世，而是早死二十年，中国也许会更稳定一些。

毛说过："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⑥]然而，政治热情与灵魂的关系是消长起伏的。

1919年，毛为一位新娘的悲剧深深触动，他呼吁"自由恋爱的大潮"。

然而，毛又给中国留下了什么样的恋爱自由呢？曾几何时，1919年长沙那位少女的孙女或许会因为外遇而判好几年徒刑。

这并不是说毛已经失去了解脱中国人束缚的梦想，而是说，在中国共产党掌权数十年后，与六十年前相比，妇女解放已不再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政治观点之间的殊死斗争了。

年轻的毛和他的朋友们都受个人信念的驱使，而他们的个人信念同时也就是社会信念。他们把自己的一生仅仅看成是革命之火的燃料，它将同时改变中国和他们自己的命运。这是个怎样的时代？显然，1919年的政治是如何为人民谋幸福。

1976年毛去世时，环境不同了，个人权利不再与重大政治斗争之间有简单的一致性。

毛毕竟是1893年出生的，他的启蒙教育受之于儒家的私塾，他的大半生是在农村中度过的。这是一种见不到机器的生活。当军队潜行于山地时，通讯联系是中世纪式的。他们那一代的精英们正吃力地试图把那些陷入惊人的落后之中的公民拯救出来。[⑦]

毛是个维新者。然而，这位维新者不会，而且再也不能跻身于现代人之列了。

毛14岁违心地以封建方式结婚时，中国的末代王朝依然存在。半个多世纪以后，几十位国家领导人踏上了通往北京之路，几乎象朝圣者，对这位纹丝不动的、向来不会去瞧他们一眼的"如来佛"顶礼膜拜。还是家长制般的社会！确实，由毛作为共产主义中国之父所演出的这场独脚戏，是在家长制时代的舞台上开始的。

他不是从个人的福利，而是从国家政权的角度来看待经济发

展——这越来越被中国人所专注。

他理解不了核战争那巨大的、超阶级性的毁灭性威力。

他说中国农民"一穷二白"，在一张白纸上可以任意写上美丽的诗篇！毛念念不忘中国农村的落后和苦行僧式人民的受苦受难。但在某种毛似乎理解不了的方式上，连续几代的中国人，无论他们多么聪明、能干，依然是一穷二白。这也是事实。

不管历史篇章中会有怎样的英雄故事，这种时刻终究会到来，"白纸"上涂满的符号和传说对后来者不再有任何意义。历史自然会揭开新的一页，年轻一代也会发现作为挑战之源的新的空白地。

二十世纪初，作为叛逆者的毛，其个人特征是与一代对国家的混乱感到愤怒和悲哀的人的社会特征同步产生的。

然而，毛的自鸣钟所发出的音响与后来的社会闹钟发出的音响并不十分和谐。难道这只能说明随着毛生命的终结这种不和谐就会消失吗？不，它还说明了为什么毛的影响一直持续到现在。

有一次，毛对他的听众提出忠告："不要总认为只有自己行，别人什么都不行，好象世界上没有自己地球就不转了，党就没有了。死了张屠夫，就吃混毛猪？什么人死了也不怕，什么人死了就有很大损失吗？马、恩、列、斯不是都死了吗？还是要继续革命。"⑧不过，没有了毛，毛的革命实际上就继续不下去了。

1978年，一位在上海参观者拿出相机要拍一张复旦大学校门口毛的白色石膏像，然而一群学生干部赶过来阻止道："不要拍了，下星期我们要把它推倒。"⑨

邓小平、中国现政府中的实权人物，曾评说过毛的错误与功绩，他主张三七开，私下以为这种评价还是恰当的。

现在，人们心平气和地承认，毛的过多荣耀是以贬损同样为中国革命做出了重要贡献的同事为条件的。而毛对人们的评价很

武断，他以“之”字形政策滥用中国大众的热情。他在七十年代过于依赖他的亲信，失去了与外界的接触。

然而，我认为，中国必定会巧妙地处理毛的遗产。中国现在还不需要他，并也是这样做的。

毛支配了一个需要超人的时代，现在已没有这种需要了。毛的“群众”可以站起来放松舒展下“它的”肌体了——中国正在这样做。抽象的“它”也将变成具体的“他们”。

明天的现代公民将不需要伟大领袖。他们将把毛誉为中国的伟大统一者。他们会时时回过头来对毛作伦理上的评价，就象在不同时代，人们对孔子作评价一样。在规划未来的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时，人们不必顾虑毛，但可汲取他的思想。

在政治局，斗争将继续，但不是以过去的方式。它不象毛时代的斗争，它的意识形态成份将更少。失去权力不再意味着失去真理。只有毛才集权力（政）和学说（教）于一身，现在的政、教已逐步分离了。政治将有点更带预言性，更少戏剧性；将更加单调，并让那些曾受政治旋流损害的平民百姓减免精神折磨之苦。

“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这句冠冕堂皇的口号随着毛一起安详地躺在他的水晶棺里。旗帜将会愈飘愈高，直到无人认清那褪了色的深红色旗面上写了些什么为止。

然而，这面旗帜将投下长长的影子。毛的继承者们将分成不同的“毛派”，在围绕着中国问题及彼此之间的斗争中，他们都将举起“毛”作为武器。

这面旗帜本身也是一个抽象物，它们将为明日毛的后嗣们所需要。对许多普通的中国人来说，尤其是农民，“毛主席”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象征。此后，任何一位想控制中国这一庞大的王国的人，都将要利用这一象征物。

真正的毛已融于中国的身躯。

八十年代以来，在最高领袖人物内在精神世界的“虎”、“猴”相争之梦似正成为过去。

未来似乎属于谙熟权力和欢歌进步的老虎，而猴子不能真正理解人的本质，对未曾领略的进步亦抱疑虑。*

然而……孙猴王毛还能从他的陵墓放出“小鬼”去摇撼任何新的成功之原的基础吗？正如他象前人一样递次继承了塑造出他的古老中国文化一样，能把这种猴性传递给中国社会中某些接受者身上去吗？

不论怎样，毛是我触及的历史人物中最伟大者之一，不论历史舞台怎样变幻，他永远与中国与世界同在。

---

* 作者未能正确理解毛泽东致江青信中关于“虎”与“猴”、“虎气”与“猴气”的喻义，并在书中对之作了艺术加工，如用猛虎与狡猴来揭示毛泽东的个性。在这里，他又把“虎”与“猴”分解为代表中国社会进步及妨碍这种进步的两种精神人格。这显然是不对的。在1966年7月8日致江青信中，毛泽东的自嘲“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与他所引证的阮籍的（贬讽刘邦）“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在语义上是同构的。毛意在说明当中国没有象马克思、列宁那样的伟大革命家时，他才有机会显露才华，因而他不是什么当今世界最伟大的天才。毛提及的“猴”是比喻投身中国革命的“造反者”，有积极意义。同时，毛所自鉴的自己身上“虎气”为主、“猴气”为次，是说马列主义意识为主，非马列主义的东西为次，并不包含其它意义。到社会主义阶段，毛强调的是虎气，而猴气是要被改造掉的东西。——校注

注 释

序 言

1. 一位缅甸领导人与作者的谈话，仰光，1979年11月15日
2. 泰国前总理克立·巴莫与作者的谈话，曼谷，1979年11月10日
3. 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第79页
4. 我是受罗伯特·埃利格特《中国的红色主人》的启发，注意到毛面部的这种双重特征的
5. 史沫特莱:《中国的战歌》,第123页，张同才(音译):《野坂参三与毛泽东》,台北，第46页
6. 甘尼斯·哈索诺与作者的谈话，雅加达，1979年11月29日
7. 斯诺:《旅行于方生之地》,第165页

少 年 时 代

1. 韶山地名的起源见韩素音:《早晨的洪流》,第15页
2. 罗伯特·佩恩:《毛泽东》,第30页
3. 《当代背景》,第900号，第10页
4. 韩素音:《早晨的洪流》,第16页
5. 斯诺:《西行漫记》，第124页
6. 李锐:《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第6页
   肖三:《毛泽东同志的青少年时代》，第一章，第三节对此有不同的解释，刘大文（音译):在1945年9月8日的《新华日报》上说，毛曾给过一穷人钱。
7. 肖子昇:《我和毛行乞记》,第6—7页
8. 肖三:《毛泽东同志的青少年时代》,第11页

9. 斯诺:《西行漫记》,第128页
10. 同上,第125页
11. 同上,第125页
12.《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1964年8月18日的谈话
13. 包办婚姻见司马珠:《天文台报》,香港,1958年12月20日
14. 斯诺:《西行漫记》,第131页
15. 肖三:《毛泽东同志的青少年时代》,第一章,第六节,说是米商,不是豆商
16.《当代背景》,第900号,第10页
17. 肖三:《毛泽东同志的青少年时代》,第14页
18. 斯诺:《西行漫记》,第130页
19. 同上,第126页,第130页
20. 肖子升:《我和毛行丐记》,第11页
21. 同上,第13页
22. 斯诺:《西行漫记》,第130页
H·卡明斯:《毛泽东:世界观的分析》,曾把毛的生活与另一位中共要人肖克进行比较,说明毛内在的反叛精神是有一定限度的。
23. 张国焘:《中国共产党的兴起》,第一卷,第一章
24. 斯诺:《西行漫记》,第127页
25. "个人性格"与"社会性格"引自弗洛姆《逃避自由》一书的附录
26. 斯诺:《西行漫记》,第126页

为何求知

1. 肖子昇:《我和毛行乞记》,第14—15页
2. 同上,第19—22页
3. 斯诺:《西行漫记》,第132页
4. 同上,第133页
5. 肖三:《毛泽东同志的青少年时代》,第一章,第七节
6. 毛在1959年谈到不喜欢别人批评自己,见《中国的法律和政府》,1968

年，第1卷，第4号

7. 韩素音：《早晨的洪流》，第34页

8. 肖三：《毛泽东同志的青少年时代》，第二章，第九节

9. 斯诺：《西行漫记》，第135页

10. 《当代背景》，第900号，第10页

11. 斯诺：《西行漫记》，第129页

12. 同上，第138页

13. 同上，第139页

14. 陈志让：《毛和中国革命》，第44页

15. 斯诺：《西行漫记》，第140页

16. 同上，第140页

17. 李锐：《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第32—34页

18. 同上，第35页

19. 同上，第40页

20. 斯诺：《西行漫记》，第141页

21. 肖三：《毛泽东同志的青少年时代》，第三章，第十三节

22. 斯诺：《西行漫记》，第142页

23. 同上，第142页

24. 同上，第143页

25. 毛在第一师范的很多生活细节，见周世钊发表在《新观察》（北京），第二卷上的文章

26. 李锐：《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第42页

27. 斯诺：《西行漫记》，第143页

28. 李锐：《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第45页

29. 斯诺：《西行漫记》，第143页

30. 同上，第143页

31. 李锐：《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第23页

32. 斯诺：《西行漫记》，第149页

33. 《工人》，第一卷，第1号。 毛在一封信中（见李锐书第83页）谈到，西方思想和东方思想一样，也有其弊端。

34. 李锐:《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第 28—29 页
35. 肖三:《毛泽东同志的青少年时代》,第三章，第十六节,英文版（孟买,1953 年）第 42 页，还可参阅《当代背景》第900 号，第 17 页
36. 李锐:《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第 30 页
37.《新青年》，1917 年 4 月
38. 肖子昇(《明报月刊》,香港，1968 年 10 月）进一步解释说,“二十八画生”的喻意是“共产主义者”，因为“廿八”合在一起，有点象汉语中的“共”字。
39.《中央日报》，台北，1972 年 11 月 4 日
40. 学友会,由劝学会发展而来，吸收女同学参加，是一个颇有影响的组织。见肖三:《毛泽东同志在五四时期》,载《光辉的五四》,北京，1959 年，第 19 页
41.《新湖南报》,1950 年 7 月 1 日
42.《当代背景》,第 900 号，第 15—21 页
43. 李锐:《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第 61 页
R·特里尔:《八亿人口：真正的中国》，第 124 页
44. 琳达·萨福尔即将出版的:《毛泽东与湖南劳工运动》第 113 页
45. 李锐:《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第 64 页
46. 斯诺:《西行漫记》,第 144 页。李锐（第 74 页）说毛得到“五、六个回音”。还可参见《问题与研究》(台北),1973 年 12 月号，第 72 页
47.“新”、“民”二字联用，似乎取自《大学》上“在新民”及《书经》上“作新民”的意思。
48. 肖三:《毛泽东同志的青少年时代》,第四章，第二十一节
49. 李锐:《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第 52 页
50. 同上，第 82 页
51. 同上，第 24 页
52. 肖三:《毛泽东同志的青少年时代》,第三章,第十五节
53. 李锐:《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第 38 页
54. 斯诺:《西行漫记》，第 149 页
55. 李锐:《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第 320 页

京 沪 天 地

1. 肖三:《毛泽东同志的青少年时代》,第61页
2. 张功(音译):《勤工俭学生活回忆》,第8页
3. 斯诺:《西行漫记》,第151页
4. 同上,第150页
5. 同上,第150页
6. 同上,第151页。关于毛当时在北京的窘境见《问题与研究》(台北),1973年12月号,第74页
7. 李煌(音译):《明报月刊》,香港,1969年6月
8. 斯诺:《西行漫记》第149页
9. 同上,第152页
10. 李锐:《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第27页
11. 《当代背景》,第900号,第23页
12. 周世钊:《工人日报》,1959年4月20日
13. 《毛泽东集》,中文版,(东京,十卷本)第一卷,第57页
14. 同上,第一卷,第61—62页
15. 《工人日报》,1959年4月20日
16. 李锐:《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第109页—110页;另外,黄雨川,在《毛泽东生平资料简编》(第45页)中说,毛当时并非象李锐所说,单独负责《湘江评论》的编辑工作。
17. 赵小姐事件,见《湖南历史资料》,1959年第八辑
    维特克:《中国季刊》第31号;《工人日报》施拉姆编:《毛泽东的政治思想》,第334页;"囚笼槛车"一词引自李锐:《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第121页
18. 张敬尧在湖南的残暴统治,详见周世钊的文章,载《光辉的五四》,第57页
19. 斯诺称之为"试验性婚姻"(《西行漫记》第156页),但是,他在1968年的修订本中删掉了这句话。第一个孩子的出生日期,见文章"毛泽东

的家”，载《明报月刊》，香港，1967年3月

20．《文汇报》，香港，1957年11月20日

21．斯诺：《西行漫记》，第155页

22．同上，第157页

23．《五四时期诗刊介绍》(北京)，1959年，第一卷，第155页

24．《解放军文艺》，第36期

25．施图亚特·施拉姆编：《毛泽东的政治思想》，第18页

26．毛在学校的大门上写了一句口号：“世界是我们的，做事靠大家来”。(《毛主席年轻的时候》，载《工商日报》，柬埔寨，1967年1月13日)

27．毛通过其以前的老师等在长沙从事活动的情况，见萨福尔即将出版的《毛泽东与湖南劳工运动》第55、56、246—248页

28．肖子昇(《明报月刊》，香港，1968年8月和10月号)提到，毛与这位女同学的关系很好

29．李锐：《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第156页

30．《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1964年8月18日谈话

31．《中国季刊》，第68期。引文引自《中国季刊》第771、775、770页。李锐《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第138页

32．肖子昇：《我和毛行乞记》第249页

33．《新青年》，1919年第12期，及以后各期

34．李锐：《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第166页

35．张国焘：《中国共产党的兴起》(回忆录)第一卷，第140、141页

36．李昂(音译)：《红色舞台)，第98页

37．《中国季刊》，第68期，第771页

38．肖子昇：《我和毛行乞记》，第256页

39．同上，第258页

组 织

1．《工人日报》，1959年4月20日

2．《毛泽东集》(中文版)东京，第一卷，第81页

3. 李锐:《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第 173 页
4. 萨福尔:《毛泽东与湖南劳工运动》,第 92 页
5. “毛主席在安源”,载《解放军文艺》,1968 年第 6 期
6. 韩素音:《早晨的洪流》,第 95 页
7. 《当代背景》,第 900 号, 第 25 页
8. 毛与刘少奇关系的变化见彭树奇(音译)的文章,《明报月刊》,香港,1968 年 12 月。毛在安源的活动见石城(音译)的文章,《中国》,香港,1968年 9 月
9. 《解放军文艺》,1968 年 3 月 25 日,《中国大陆杂志概览》621 号
10. 《中国季刊》,第 45 期, 第 103 页
11. 在湖南自治的问题上,毛曾与《大公报》的编辑们联合在一起,见萨福尔:《毛泽东与湖南劳工运动》,第 248 页
12. 《当代背景》,第 900 号, 第 25 页
13. 史沫特莱:《中国的战歌》,第 44 页
14. H·艾萨克的文章,《中国季刊》,第 45 期, 第 104 页
15. 《解放军文艺》,1968 年 3 月 25 日
16. 李锐:《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第 270 页、266 页
17. 斯诺:《西行漫记》,第 159 页
18. 韩素音:《早晨的洪流》,第 107 页
19. 萨福尔, 第 417 页
20. 施图亚特·施拉姆:《毛泽东》,第 73 页
21. 蒋介石的夫人在其所著的《与鲍罗廷的谈话》(1977)中, 证明了鲍罗廷与金顿的关系, 第 4 页
22. O·符拉基洛夫和V·梁赞佐夫:《毛泽东》,莫斯科, 第 47 页
23. V·V·符尼扬科娃, 阿基莫娃:《在革命的中国度过的两年》,第 228 页谈到胡志明及其他常与鲍罗廷来往的人
24. 《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1964 年 10 月 20 日谈话
25. 张国焘:《中国共产党的兴起》(回忆录),第一卷, 第 342 页
26. 《毛泽东集》(10 卷本, 中文版, 东京),第一卷, 第 98 页。毛对农民作演讲时, 为了得到最强烈的效果, 他总是高呼“打倒洋才奴”,而不是

"打倒帝国主义。"李锐（中文版），第248页

27. 张国焘：《中国共产党的兴起》（回忆录），第一卷，第380页
28. 斯诺：《西行漫记》，第159页
29. 毛还拿出不少的钱给孩子办教育，见刘大文（音译）：《新华日报》，1945年9月8日
30. 《中国文学》，1978年9月号。其他资料认为，毛与杨开慧直到1927年，关系都很亲密，（如"毛主席一家为革命事业"载《澳门时报》，澳门，1967年4月28日。BBC，远东部分，5617，B11，1977年9月17日。）
31. 符尼扬科娃·阿基莫娃：《在革命的中国度过的两年》，第163页
32. 《毛泽东集》（中文版），东京，第一卷，第247页
33. 《毛泽东诗词》，北京，1976
34. 《毛泽东集》（中文版），东京，第一卷，第151页
35. 关于周恩来的背景材料，见司马长丰（音译）：《毛泽东与周恩来》，序言及第2—3页
36. 韩素音：《早晨的洪流》，第119页
37. 施图亚特·施拉姆：《毛泽东》，第91页
38. 《分析》一文，见《毛泽东选集》，第一卷；《民族革命……》一文，收录于《毛泽东集》（中文版），东京，第一卷，第175页。另外，施拉姆在其即将出版的《剑桥中国史》，第12卷和第13卷中所作的精辟分析，也给我以启发。
39. 《毛泽东集》（中文版），东京，第一卷，第207页
40. 1973年，作者访问过毛在武汉住过的地方，看到一些资料
41. 《毛泽东诗词》，北京，1976
42.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56页
43. 蒋永清（音译）：《鲍罗廷与武汉政权》（台北），第291页
44. 罗伊发表在《新共和》上的文章，1951年9月3日
45. 韩素音：《早晨的洪流》，第162页
46. 斯诺：《西行漫记》，第165页
47. 罗伊发表在《新共和》上的文章，1951年9月3日
48. 施拉姆：《毛泽东》，第121页

49. 施拉姆发表在《中国季刊》上的文章，第18号，第64页；另见《毛泽东与周恩来》，第10页

奋 斗

1. 韩素音：《早晨的洪流》，第176页
2. 斯诺：《西行漫记》，第163页，着重号为作者所加
3.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80页
4.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151页
5. 《李大钊选集》，第237页
6. 韩素音：《早晨的洪流》，第177页
7. 后来被洪流放到莫斯科的王明宣称，毛谋杀了这两位土匪头子。"三十年代末期"，毛向王明等人吐露："事后，我感到王佐和袁文才死得冤枉，因为当时他们和他们的人马差不多已被改造过来了。"见《蒙古消息报》，乌兰巴托，1974年6月15—29日（王明的这段回忆不可信，特别是考虑到王明当时所受的迫害，这一点更值得怀疑）
8.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81页
9. 施拉姆等编：《毛泽东的政治思想》，第269页
10. 龚楚：《我与红军》，第124页
11. 关于朱毛军队起初的人数，有不同的说法，见《毛泽东生平》，第94页；鲁强：《井冈山的英雄》，第8、11页；以及司马长风《毛泽东与周恩来》
12. A·布克：《毛泽东》，第190页
13. 《毛泽东集》(中文版)，东京，第二卷，第20页
14. 《回忆井冈山区的斗争》(北京)，第11页
15. 韩素音：《早晨的洪流》，第201页
16. 《人民日报》，1976年12月8日；《东方地平线》，香港，1977年第3期；"杨开慧烈士生平"，载《工商日报》，柬埔寨，1967年1月9日
17. 龚楚：《我与红军》，第142—145页
18. 有关贺子珍的背景资料，见司马长丰：《毛泽东评传》，第299页

19．史沫特莱:《伟大的道路》，第 238 页

20．《毛泽东集》(中文版)，东京，第二卷，第 78 页

21．毛对朱德的公开批评，见符拉基米洛夫和梁赞佐夫，第 57 页；另外，还可参考司马长丰:《毛泽东评传》，第 263—264 页。毛朱分歧见司马长丰:《毛泽东与周恩来》，第 11—12 页，以及《井冈山上的英雄》，第22—23 页

22．《毛泽东集》(中文版)，东京，第二卷，第 140 页

23．施拉姆:《毛泽东》，第 149 页

24．肖佐良(音译):《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权力关系》，第 二 卷，第 157页

25．《毛泽东诗词》，北京，1976

26．国民党军队冲进韶山时，毛的亲属把他自学生时代留下来的日记，学习笔记等付之一炬，以免遭受迫害，只有少部分被抢救出来，李锐的书引用了很多这方面的资料。

对毛氏坟墓的捣毁举动，见李大文的文章，载《新华日报》，1945 年 9 月 8 日

27．斯诺:《西行漫记》，第 180 页

28．我不同意 P·C·黄的观点——尽管他的分析很严密——黄认为，毛在反对李立三主义时，曾对28B非常信任。因为，1945年，毛在谈到这一问题时说，他当时在处理与莫斯科的关系时特别谨慎，甚至不敢讲出全部事实真相。

29．韩素音:《早晨的洪流》，第 228—229 页

30．关于毛在富田事件中所起的作用，有些说法相互矛盾，如多利尔发表在《中国季刊》，第37号上的文章，和P·C·黄的《中国共产党和农村社会：1927—1934》(与 L·萨福尔和 K·沃克合著)。有些幸存者宣称，富田事件中，约有二万人死亡（见《毛泽东与周恩来》，第 30—31 页)。可以肯定地说，朱德不同意毛对这次事件的处理方法(《我与红军》，第 266 页)，另外，还可参考《井冈山上的英雄》第 38 页;《毛泽东生平资料简编》，第 117 页

31．江西时期的婚姻自由问题，见胡之思（音译)：“毛泽东与中国的性革命”载《政治科学评论》，1973 年第 23 卷，第 1 号

32. 《毛泽东诗词》，北京，1976

33. 施拉姆编:《毛主席对人民说》(毛言论集)，第 291 页

34. 沃勒，第 55 页；司马长丰:《毛泽东与周恩来》，第 34—35 页

35. 《红旗飘飘》，第11辑

36.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 150 页

37. C.麦克莱因:《苏联政策与中国共产党》，第 266 页

38. 韩素音:《早晨的洪流》，第 259 页

39. 龚楚:《我与红军》，第 399 页

40. 布劳恩:《中国随记：1932—1939》，第 79 页

41. 傅连璋的回忆

42. 司马长风:《毛泽东与周恩来》，第 60—62 页

把握未来

1. 冈瑟·斯坦因:《红色中国的挑战》，第 118 页

2. 斯诺:《西行漫记》，第 196 页

3. 佩恩:《毛泽东》，第 140 页

4. 迪克·威尔逊:《长征》，第 93 页

5. 同上，第 111 页

6. 韩素音:《早晨的洪流》，第 281 页。另外，韩素音回避了周与毛之间的意见冲突，见司马长丰的书

7. 马尔罗:《回忆录》，第 533 页

8. 陈昌奉:《跟随毛主席长征》，第 38 页

9. E·富尔:《狡诈之人与迟钝之人》，第 32 页

10. 《毛泽东诗词》，北京，1976

11. 同上

12. 刘伯承等:《回忆长征》

13. N·威尔士:《红尘》，第 71 页

14. 韩素音:《早晨的洪流》，第 312 页

15. 佩恩:《毛泽东》，第 156 页

16. G・埃利托:《最后一位儒家》,第285页
17. 韩素音:《早晨的洪流》,第285页
18. 同上,第293页
19. 张国焘回忆录，第二卷，第377页
20.《伟大的道路》,第329页
21. 张国焘回忆录，第二卷，第388页
22. 斯诺:《大河彼岸》,第141页
韩素音:《早晨的洪流》,第295页
23. 斯诺:《西行漫记》,第214页
24. 刘伯承等:《星火燎原》，(香港),第233页
25. 毛在与马尔罗会谈时，认为，长征从某些方面来说，是一次退却(马尔罗:《回忆录》,第528页)
26. 把红军的长征比作犹太人走出埃及，见特里尔与道格拉斯合编的:《中国与我们》,第189页
27.《毛泽东诗词》,北京，1976

抗　日

1. 陕西农村的描述主要引自斯诺・史沫特莱的著作和M・塞尔登的《延安道路》
2. 张国焘(《纽约时报杂志》,1953年8月2日）和梁漱溟（G・埃利托在《最后一位儒家》第285页引述),二人谈到毛的饮酒情况
3. 符拉基米洛夫和梁赞佐夫，第44页
4. 陈昌奉:《跟随毛主席长征》,第85页
5.《毛泽东诗词》,北京，1976
6. E・赖斯:《毛的道路》,第114页
7. 斯诺:《西行漫记》,第455页
8. 施图亚特・施拉姆:《毛泽东》,第201页
9. 黄雨川:《毛泽东生平》第177页
10.《毛泽东集》(中文版),东京，第五卷，第60页（施拉姆译)。据符拉基

米洛夫和梁赞佐夫（第83页），中国共产党总部的办公室里，成吉思汗的画像与毛的画像并排挂在墙上

11．斯诺：《红色中国随记》，第6页

12．贝特·海姆，第101页；另可参见，司马长丰，第99—101页

13．斯诺：《红色中国随记》，第3页。中国现任外交部长黄华，也与作者谈过毛在这一时期的行动

14．赖斯：《毛的道路》，第91页。关于斯大林的电报，还可参见《中国共产党史稿》，台北，第三卷，第728页

15．史沫特莱：《中国的反击》，第122—123页

16．《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只收入这里提到的两篇文章。《基础战术》一文没有收入《毛泽东选集》，但是已由北京出版单行本）

17．翟作军：《在毛主席身边》，武汉，第11页

18．施图亚特·施拉姆：《毛泽东》，第213页

19．《毛泽东集》（中文版），东京，第六卷，第79页

20．斯坦因：《红色中国的挑战》，第106页

21．贝特·海姆：《中国的战歌》，第129页

22．威尔士：《中国的共产主义者》，第252页。关于毛的生活作风一由此导致毛与贺子珍的冲突——其他地方有不同的描述，见司马长丰：《毛泽东评传》，第307页。综合各家说法，可知，在江青出现之前，毛与贺子珍的婚姻关系已经破裂

23．赖斯：《毛的道路》，第108页

24．贝特·海姆：《中国的战歌》，第122页

25．维特克：《江青同志》，第155页

26．程修甲（音译），在《问题与研究》上的文章，1973年11月，第65页

27．杨子烈：《张国焘回忆录》，香港，第333页

28．《当代背景》，第900号，第5页；D·弥尔顿和N·弥尔顿的《风将不息》，第155页。关于毛的孩子们的经历，难以找到确凿的证据，因为贺子珍和江青的对手们都影响资料的可信度。毛与贺子珍很可能还有第四，甚至第五个孩子，但是这方面的证据不足

29．根据鲁强（音译）：《井冈山上的英雄》，第63页。上海市当局对贺子珍

在物质上给予了很好的照顾。

30．维特克：《江青同志》，第 160 页

圣　　人

1．H·福尔曼：《来自红色中国的报告》，第 178 页

2．C·班德和W·班德：《与中国共产党在一起的两年》，第 252 页

3．贝特·海姆：《中国的战歌》，第 121 页

4．F·马库斯：《北京文集》，第 287 页

5．斯诺：《旅行于方生之地》，第 162 页

6．同上，第 167 页

7．《纽约时报杂志》刊载的张的文章，1953年 8 月 2 日

8．《与中国共产党在一起的两年》，第 248 页

9．《战斗赞歌》，第 121 页

10．陈志让（编）：《毛论文集》，第 20 页

11．《解放日报》，重庆，1941年12月14日

12．爱泼斯坦：《访问延安》，第 27 页

13．社会变化引自塞尔登的《延安道路》

14．贝特·海姆：《中国的战歌》，第 119 页

15．M·戈德曼：《共产党中国的文学分歧》，第 93 页

16．《毛泽东集》（中文版），东京，第八卷，第 111 页

17．康普顿：《毛的中国：党的整风文献》（1942—1944年），第 23 页

18．同上，第44页

19．同上，第 4 页

20．张国焘回忆录，第二卷，第 563 页

21．D·威尔逊：《毛：人民的帝王》，第 250页

22．康普顿：《毛的中国：党的整风文献》，第 12 页

23．《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 300 页

24．康普顿：《毛的中国：党的整风文献》，第 57 页

25．同上，第 41 页

26. 同上，第 16 页
27. 同上，第 47 页
28. 同上，第 63 页
29. 同上，第 21 页
30. 同上，第 21 页
31. 同上，第 65 页
32. 《毛泽东思想万岁》（1967年），1961年1月8日。毛的马克思主义观点是典型的中国式的，M·N·罗伊在谈到国际社会主义运动时曾用“集权式的世界党”一词（罗伊：《我在中国的经历》，第 20 页）
33. 施拉姆编：《毛泽东的政治思想》，第 172 页
34. 康普顿：《毛的中国：党的整风文献》，第 53 页
35. 同上，第 58页
36. 刘少奇：《论党》
37. 韩素音：《早晨的洪流》，第 422 页

成熟的桃子

1. 佩恩：《毛泽东》，第 238—239 页
2. F·谢伟思：《亚美文集》
3. 赫尔利的访问取材于D·巴雷特的《迪克西使团》；谢伟思的著述；F·埃西奥里克编：《在中国失去机会》；西奥多·怀特：《寻找历史》，第 198 页；以及D·洛贝克是赫尔利的崇拜者，他认为，赫尔利的喊叫是“科曼奇印第安人的战争呐喊，他在斯大林格勒时曾以此鼓舞过苏联士兵”
4. 《伟大的道路》，第 424 页
5. B·塔奇曼发表在《外交事务》上的文章，1972 年 10 月号
6. 《毛泽东选集》，第 1133 页
7. 同上，第 1133 页
8. 巴雷特：《迪克西使团》，第 75 页
9. 陈志让：《毛论文集》，第 30 页
10. 《纽约时报》，1945年 8 月 27 日

11. 卡尔逊·张:《中国的第三势力》，第 140 页
12.《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 60 页
13. 左舜生（音译）:《近三十年见闻札记》,第 90 页
14.《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 313 页
15. 王明:《回忆我与毛泽东在一起的日子》,第 201 页
16. 韩素音:《早晨的洪流》,第 463 页
17.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54页。
18. 叶长林发表在《中国工人》上的回忆文章，1960 年第 12、17、18期。
还可参见陈志让:《毛和中国革命》第 282 页
19.《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1964年3月28日
20. 叶长林的回忆文章
21.《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 29 页
22. 叶长林的回忆文章
23. 韩素音:《早晨的洪流》,第 476 页
24. 同上，第 477 页
25. 同上，第 473 页
26.《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 135 页
27. 同上，第四卷，第 163 页
28. 同上，第四卷，第 296 页
29. 佩恩:《红色中国之行》,第 41 页
韩素音:《早晨的洪流》，第 489 页
30. 肖子升:《我和毛行乞记》,第 251 页
31.《毛泽东选集》,第四卷
32.《毛泽东诗词》,北京，1976年
33.《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 361 页
34. F·阿切尔:《毛泽东》,第 109 页
35.《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 327 页
36. 同上，第四卷，第 402 页
37. V·戴迪加尔:《铁托言论集》,第 331 页
38. S·托平:《旅行于两个中国之间》,第 88 页

39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 433 页
40. 托平:《旅行于两个中国之间》,第 56 页
41. F·梅尔比:《天国的谕令》,第 286 页
42.《毛泽东集》(中文版),东京，第十卷，第 213 页
43. 梅尔比：第 359 页
44. 埃利根特:《中国的红色主人》,第 229—230 页。作者在引用原话时，把“二十年”改成了“三十年”。
45.《北京周报》,1977 年10月14日。关于陈玉英及杨家的详细情况，见 BBC，远东部分，5617，BII，1977 年 9 月 17 日
46. 《东京日报》,1972 年 9 月 27 日
47. “从中国看世界”,《世界》,东京，1963年 9 月号

“我们熟习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

1.《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 422 页
2. C·罗伊:《为了社会》,第 410 页
3.《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 15—17 页
4. 同上，第五卷，第 22 页
5. 同上，第四卷，第 414 页
6. 同上，第五卷，第 18 页
7. 同上，第四卷，第 458 页
8. 同上，第四卷，第 422 页
9. 同上，第四卷，第 418 页
10. 施拉姆编:《毛主席对人民说》,第 191 页
11.《赫鲁晓夫回忆录》，第 512 页
12. 佩伊:《毛泽东》,第 134 页
13. F·哈里森:《通向权力的长征》,第 435 页
14. A·怀亭:《中国跨过鸭绿江》,第 179 页
15.《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 416 页
16.《亚美》,第一辑，1937年 8 月，第 267 页

17.《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 301 页、304 页
18.《赫鲁晓夫回忆录》,第 514 页
19.《毛泽东的政治思想》,第 429 页
20.《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 47 页
21. R·罗:《逃离红色中国》,第 122页
22.《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 411 页
23. 同上，第四卷，第 420 页
24. 同上，第五卷，第95、96、99页
25.《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1966年 10 月 24 日
26.《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 104 页
27.《毛主席对人民说》,第 279 页
28.《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 344 页
29. 同上，第五卷，第 38 页
30. 怀亭的《中国跨过鸭绿江》,对朝鲜战争的爆发作了分析。R·西蒙斯的《勉为盟友》利用朝鲜方面的资料，作了精辟的分析。最新的研究见《澳大利亚中国事务杂志》,第一期，不管怎么说，赫鲁晓夫的评论可能最为中肯:"金日成是主动者，当然，斯大林也并未劝阻他"（《赫鲁晓夫回忆录》,第 401 页）
31.《人民日报》,1977 年 1 月 11 日。缅甸的一位领导人也同作者谈过此事，仰光，1979 年 11 月 15 日
32. 梅尔比，第 366—367 页
33. 有些人不想介入朝鲜战争，关于这方面的资料见《明报月刊》,香港，1967年第 5 期。以及《人民日报》,1950年11月 6 日的社论
34. 符拉基米洛夫和梁赞佐夫，第 54 页
35.《工人日报》,1961年 7 月18日
36.《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 78 页
37. A·里格特:《解放的囚徒》,第 45 页
38. 施拉姆编:《毛主席对人民说》,第 103 页
39.《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第 546 页

改　造

1．W·欣顿：《翻身》，第 207 页

2．同上，第 399 页

3．《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 215 页

4．同上，第五卷，第 121页；关于梁漱溟对毛的影响，见埃利托：《最后一位儒家》，第 290、322 页

5．E·周：《人必须选择》，第 211 页

6．弥尔顿的话引自《法典》，穆勒的话引自《自由论》

7．《中国的法律和政府》，第 9 卷，第 4 期，1976—1977，第 8 页

8．《毛论文集》，第 26 页。陈志让谈过毛很有意思的语言习惯，他常用同一个汉字"他"，来指代"他"和"他们。"

9．M·戈德曼：《共产党中国的文学分歧》，第130，291—292，321页。《文艺报》（1955年）和《胡风文艺思想批判论文汇集》有关于胡风的材料

10．《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 177 页

11．同上，第五卷，第 299 页

12．戈德曼：《共产党中国的文学分歧》，第 131 页

13．陈志让：《毛论文集》，第 28 页《毛泽东选集》对此作了筛选

14．《人民日报》，1962 年 5 月 12 日

15．施拉姆编：《毛主席对人民说》，第 92 页

16．《纽约时报》杂志上刊载的张的文章，1953年 8 月 2 日

17．毛的评论"没有好处"，来自南斯拉夫的外交人员。

18．马库斯：《北京文集》，第 286 页；另可参见V·克莱塞·马尔克斯：《中国之行》，第 188 页

19．《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第 80 页

20．《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 104 页

21．《人民日报》，1977年 9 月 8 日

22．《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 222 页

23．周鲸文:《风雨十年》,第83页

建 设

1．《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149页
2．赖斯:《毛的道路》,第131页。关于毛与高岗的关系见《明报月刊》，香港，1966年3月号
3．韩素音:《塔中之风》,第62页
4．俞一录（音译）发表在《明报月刊》上的文章，香港，1966年2月号
5．《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年），1958年3月
6．G·西格尔发表在《耶路撒冷国际关系杂志》上的文章，1976年秋季号，第103页
7．《赫鲁晓夫回忆录：最后的遗言》,第278页
8．关于高岗与莫斯科的特殊关系，见符拉基米诺夫和梁赞佐夫，第37页。高岗在延安整风时的话使毛对他很恼火，见前书第77页
9．东北地区的工业生产对中国当时在朝鲜的战争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否则，毛早就把高岗调离东北了。关于这一点，以及毛和莫斯科的关系，程修甲（音译）:《黑毛执政》，台北，1963年，第4，12页
10．韩素音:《塔中之风》,第63页
11．上海电台，1968年3月20日
12．向德（音译）发表在《明报月刊》上的文章，香港，1967年5月号
13．《毛泽东思想万岁》（1967年4月），第10页
14．《赫鲁晓夫回忆录》,第517页
15．同上，第517页
16．《远东经济评论》,香港，1978年5月5日
17．《赫鲁晓夫回忆录：最后的遗言》,第279页
18．同上，第284页
19．维特克:《江青同志》,第262页
20．《赫鲁晓夫回忆录》,第519页
21．《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21—22页

22.《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00页

23. 艾森豪威尔：《付出代价的和平》，第445页

24. 维特克：《江青同志》，第263页

25. 韩素音：《塔中之风》，第112页

26. 维特克：《江青同志》，第255页

27.《赫鲁晓夫回忆录：最后的遗言》，第332页

28.《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第454页

29. 与莫诺努图的谈话，雅加达，1979年12月1日；与缅甸一位领导人的谈话，仰光，1979年11月15日

30. 维特克：《江青同志》，第256页

31. 甘尼斯·哈索诺与作者的谈话，雅加达，1979年11月29日

32. 这些社会观察部分引自S·德布福特：《黄土地，绿宝石》(1979)

33. 童林（音译）：《毛主席革命的一家》（由红卫兵出版），第10页。毛写于1954年的一封信严厉地批评了对他的亲戚所作的任何特殊照顾，毛说："因为他们是劳动人民，又是我的亲戚，我是爱他们的。"(《青年一代》上海，1979年第9期；《华侨日报》，纽约，1979年10月5日）

34.《当代背景》，第900号，第6页

35. 特里尔编《中国之差异》，第256页

36.《中国季刊》，第62期，第188页

37. 西哈努克与作者在北京交谈时引用了毛的这句话（1971年6月29日）。达赖喇嘛也提到毛的谈话："然后，他又说，佛教是很好的宗教，玉皇大帝虽然是天子，也很考虑改善人民生活条件的问题。"（达赖喇嘛：《吾土吾民》，第116—117页）

38. 吴努：《周六之子》，第238页。即使对于尼赫鲁，毛也是"象一位年长的叔叔提建议一样"地讲话。（见戈帕尔：《贾瓦哈拉尔·尼赫鲁》，第二卷，第229页）

39. 莫诺努图与作者的谈话，雅加达，1979年12月1日

40. 同上，第264页

41. C·泰勒的《红色中国的报告》描述了外国领导人访问北京的情景。还可参见马库斯，第281页

42. 甘尼斯·哈索诺与作者的谈话，雅加达，1979年11月29日。还可参见

他的《苏加诺时代的一名印尼外交官的回忆录》，第162页
43.《人必须选择》，第221页
44.《北京周报》，1963年9月6日
45.《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第208页
46. 作者与一位缅甸领导人的谈话，仰光，1979年11月25日
47.《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371页

疑云

1.《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184页
2. E·赖斯：《毛的道路》，第127页
3. 同上，第126页
4. R.罗：《逃离红色中国》，第179页
5. K·埃斯克伦德：《红色官员》，第150页
6.《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303页
7. 韩素音：《塔中之风》，第53页
8.《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290页
9.《中国大陆杂志概览》，第653辑，第37页
10. 毛对非斯大林化所作的反应，没有收入《毛泽东选集》之中，见《人民日报》，1956年4月5日
11. 施拉姆编：《毛主席对人民说》，第101页
12.《北京周报》，1963年9月20日
13. R·麦克法考尔：《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一卷，第53页
14.《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第85页
15. R·麦克法考尔：《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一卷，第75页
16.《人民日报》，1975年5月31日
17.《赫鲁晓夫回忆录：最后的遗言》，第309页
18.《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210页
19.《中国新闻分析》，香港，1956年11月9日
20.《人民日报》，1957年8月8日，1957年8月17日

21．《人民日报》，1957年3月24日

22．《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393页

23．E·赖斯：《毛的道路》，第145页

24．同上，第145页

25．《中国大陆报刊概览》（附录）第208辑，第1页

26．《中国青年报》，1957年5月17日

27．《毛泽东诗词》，北京，1976年

28．《彭德怀事件》，香港，第198页

29．韩素音.《塔中之风》，第85页

30．《反革命刘少奇的一生》（1967年）

31．R·麦克法考尔：《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一卷，第121页

32．《邓小平自白书》

33．E·赖斯：《毛的道路》，第146页

34．F·刘易斯：《希望的历史》，第183页

35．同上，第182页

36．《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388页

37．E·富尔：《狡诈之人与迟钝之人》，第31页

38．《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431页

39．《中国季刊》，伦敦，第43期，第137页

40．程修甲（音译）：《黑毛执政》，第42页

41．韩素音：《塔中之风》，第94页

42．毛泽东：《诗词十九首》（1958年）

43．《北京周报》，1977年10月14日

44．维特克：《江青同志》，第266页

45．施拉姆编：《毛泽东的政治思想》，第436页

46．D·扎戈里亚：《中苏冲突：1956—1971》，第4章

47．《人民日报》，1957年11月20日

48．D·巴尼特：《共产党中国与亚洲》，第362页

49．爱德华·弗里德曼教授指出，"东风"一词的提出，只是为了反对固定不变的僵化思想

50.《赫鲁晓夫回忆录：最后的遗言》，第 290 页
51. 同上，第 292 页
52. 同上，第 288 页
53. 同上，第 288 页
54. 同上，第 289 页
55. 麦克法考尔:《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 171 页

体制的修补

1. 与一位缅甸领导人的谈话，仰光，1979 年 11 月 15 日
2.《中国的法律和政府》,1976 年第 9 卷第 3 期，第 67 页
3.《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1958 年 1 月 11 日
4. 同上（1969），1958 年 1 月 13 日
5. 同上（1969），1958 年 4 月 6 日《中国的法律和政府》，1976 年第 9 卷第 3 期，第 51 页
6.《中国的法律和政府》，1976 年第 9 卷第 3 期，第 37 页
7. 同上，第 80 页
8.《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1959年 2 月 2 日
9.《毛的囚徒》,第 181 页，第 67 页
10.《中国的法律和政府》，1968 年第 1 卷第 4 期，第 12 页
11. 同上，第 11 页
12. 施拉姆编:《毛主席对人民说》，第 156 页
13.《毛泽东诗词》，北京，1976
14.《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1958 年 5 月 8 日
15. F·B·斯塔尔:《继续革命》，第 42 页
16.《毛泽东思想万岁》(1967)，第 145 页
17. 施拉姆编:《毛主席对人民说》，第 94 页
18.《中国的法律和政府》,1968 年第 1 卷第 4 期，第 16 页
19. 同上，第 52 页
20.《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1958 年 5 月 8 日

21.《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1958年5月8日

22. 同上(1969)，第125页

23.《中国的法律和政府》，1976年第9卷第3期，第20页

24.《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1958年5月18日

25. 同上(1967)，第158页

26. 同上(1967)，第129页

27. 同上(1969)，1958年11月30日

28. 同上(1969)，1958年5月18日

29. 同上(1969)，1958年11月30日

30. 同上(1969)，1959年2月2日

31. 同上(1967)，第148页

32.《星期天报》，柏林，1956年12月16日

33.《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1958年5月20日，1958年12月19日《中国的法律和政府》，1968年第1卷第4期，第60页

34. 布克:《毛泽东》，第22页

35.《中国的法律和政府》，1976年第9卷第3期，第58页

36. 同上，第75页

37.《毛泽东思想万岁》(1967)，1959年2月21日

38.《中国的法律和政府》，1968年第1卷第4期，第22页

39. 同上，1976—1977年第9卷第4期，第77页

40.《羊城晚报》，广州，1966年4月23日

41.《毛泽东诗词》，北京，1976

42.《人民日报》，1976年12月22日

43.《中国季刊》，第43期，第125—126页

44.《当代背景》，第834号

45.《毛泽东诗词》，北京，1976

46.《当代背景》，第851号，第6页

47. 同上，第25页

48. 同上，第24页

49. 同上，第25页

50．维特克:《江青同志》，第 301 页
51．《中国的法律和政府》，1968 年第 1 卷第 4 期，第 27 页
52．同上，第 41 页
53．同上，第 37 页
54．同上，第 38、42、39、26 页
55．S·卡诺:《毛与中国》，第 123 页
56．《当代背景》，第 851 号，第 14 页
57．韩素音:《塔中之风》，第 164 页
58．《中国的法律和政府》，1968 年第 1 卷第 4 期，第 54页
59．《毛泽东思想万岁》(1967)，第 207 页

苏联与超越

1．《毛泽东思想万岁》(1967)，第 130 页
2．《赫鲁晓夫回忆录》，第 521 页
3．《联合出版研究中心》，第 52029 号，第 29 页
4．F·阿切尔:《毛泽东》，第 147 页
5．《中国的法律和政府》，1968 年第 1 卷第 4 期，第 16—18 页
6．《毛泽东思想万岁》(1967 年)，第 248 页
7．《中国的法律和政府》，1976 年第 9 卷第 3 期，第 88 页
8．同上，第 83 页
9．《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1958 年 12 月 19 日
10．同上（1969)，1958 年 11 月 30 日
11．同上（1967)，第 156 页
12．同上（1969)，第 337—338 页
13．《赫鲁晓夫回忆录：最后的遗言》，第 300 页
14．维特克:《江青同志》，第 263 页
15．《赫鲁晓夫回忆录》，第 522 页
16．同上，第 524 页
17．同上，第 524 页

18. 马库斯：《北京文集》，第 288 页
19. 布克：《毛泽东》，第 166 页
20. 施拉姆编：《毛主席对人民说》，第 199 页
21.《联合出版研究中心》，第 52029 号，第 14 页
22.《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1964 年 5 月 11 日
23. 来自南斯拉夫外交部长们的信息
24.《风将不息》，第 270 页
25.《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苏联政治经济学"
26.《联合出版研究中心》，第 52029 号，第 26 页
27. 同上，第 612669—2 号，第 311 页
28.《毛的囚徒》，第 296 页
29.《星期天时报》，伦敦，1960 年 6 月 18 日
30.《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1964 年 6 月 18 日
31. 同上（1969)，1964 年 2 月 13 日
32. 同上（1969)，1964 年 9 月 4 日
33.《联合出版研究中心》，第 52029 号，第 15 页
34.《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1960 年 3 月 22 日
35. 斯诺：《漫长的革命》，第 205 页
36. 钱的故事见 W·里安和 S·萨默林：《中国阴云》
37. R·尼克松：《尼克松回忆录》，第二卷，第 24 页
38.《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第 256 页
39. 同上（1969)，第 605 页
40. 同上（1969)，第 33 页
41. 同上（1969)，1964 年 2 月 13 日

退　　却

1.《联合出版研究中心》，第 52029 号，第 24 页
2.《中国大陆报刊概览》，第 4014 号，1967 年 9 月 5 日
3.《中国的法律和政府》，1968 年第 1 卷第 4 期，第 44 页

4.《毛泽东思想万岁》(1967)，第62页
5. 同上（1967），1961年1月18日
6.《当代背景》，第834号，第20页
7.《北京周报》，1966年5月27日
8.《联合出版研究中心》，第52029号，第10页
9. 同上，第14页
10. 施拉姆编:《毛主席对人民说》，第167页
11.《中国的法律和政府》，1976年第9卷第3期，第95页
12. 同上，第120页
13.《毛泽东诗词》，北京，1976
14. 同上
15. 同上（陆游的词引自陈志让的译文）
16.《彭德怀事件》，第413页。毛关于佛教的其他言论，见《中国的法律和政府》，1976年第9卷第3期，第67页以及《毛泽东思想万岁》(1967)，1959年9月9日
17. 施拉姆编:《毛主席对人民说》，第193页
18.《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1967年2月12日
19. 达赖喇嘛:《吾土吾民》，第121页
20.《联合出版研究中心》，第52029号
21.《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1964年6月16日
22.《毛泽东诗词》，北京，1976
23.《中国的法律和政府》，1976年第9卷第3期，第117页
24.《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第494页
25. 同上（1969），1964年6月16日
26. 斯诺:《漫长的革命》，第194页
27.《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1964年6月16日
28. 同上（1969），1964年1月24日
29. 甘尼斯·哈索诺同作者谈论过毛在1964年的状况，雅加达，1979年11月29日
30.《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第532页

31.《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1964 年 12 月 20 日
32.《快报》巴黎，1976 年 9 月 13—19 日
33.《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1964 年 6 月 18 日
34. 同上 (1969)，第 19 页
35. 同上 (1969)，1968 年 7 月 28 日
36. 同上 (1969)，第 477 页
37.《北京周报》，1977年 10 月 14 日
38.《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1964 年 8 月 18 日
39. 同上 (1969)，第 477 页
40. 康普顿：《毛的中国：党的整风文献》，第 40 页
41.《中国的法律和政府》，1976 年第 9 卷第 3 期，第 35 页
42.《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第 602 页
43. 同上 (1969)，第 602 页
44.《中国的法律和政府》，1968 年第 1 卷第 4 期，第 90 页
45.《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第 604 页
46.《联合出版研究中心》，第 52029 号，第 1925 页
47.《毛泽东诗词》，北京，1976
48.《联合出版研究中心》，第 52029 号
49.《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1964 年 12 月 20 日。在西方得到的材料，刘的名字被略去了，但是，毛这时指的是刘，可以说这是不存在什么疑问的。

乌托邦的愤怒

1. 马尔罗：《回忆录》。中国方面关于毛与马尔罗会谈的报道与此有些不同(见《中国的法律和政府》，1976 年第 9 卷第 3 期)。一位读过马尔罗的《回忆录》的读者对作者说："唯一的麻烦是，毛泽东的谈话很象马尔罗"。马尔罗对此回答说："难道你希望他象贝当古一样谈话吗？"(贝当古是曾见过毛的另一位法国政治家。见 F·拉库吐尔：《马尔罗》，第 437 页)

2.《毛泽东诗词》，北京，1976
3.《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1964年8月18日
4. 同上 (1969)，1964年12月27日
5.《星期天时报》，伦敦，1960年6月12日，1961年10月15日
6. 一些特别的文件（被台湾搞到）表明，毛对农村出现的不良现象很警觉，见C·S·陈：《辽宁的农村人民公社》，R·鲍姆：《革命的序曲》
7. 鲍姆：《革命的序曲》，第163页
8. sekai，东京，1967年第3期
9.《中国季刊》，第47期，第571页
10.《北京周报》，1967年6月2日
11. 佩伊：《毛泽东》，第216页
12.《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1967年5月1日
13.《联合出版研究中心》，第612690—2号，第347页
14. 施拉姆编：《毛主席对人民说》，第146页
15.《当代背景》，第897页，第28页
16.《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1964年6月6日
17. 同上 (1969)，1964年8月18日
18.《当代背景》，第842号，第12页
19.《风将不息》，第103页
20.《星期六晚邮报》，1962年11月14日
21. K·卡罗尔：《中国：另一种共产主义》，第350页
22. 符拉基米洛夫和梁赞佐夫，第89页
23. 韩素音：《塔中之风》，第259页
24.《纽约时报》，1977年1月19日
25.《毛泽东诗词》北京，1976
26.《中国季刊》，第35期，第59页
27.《联合出版研究中心》，第42349号
28.《北京周报》，1966年7月29日
29.《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1966年3月20日
30. 施拉姆编：《毛主席对人民说》，第120页

31．弗里德曼教授个人的观察

32．E·赖斯：《毛的道路》，第 272 页

33．同上，第 340 页

34．《中国大陆发生了什么》(台北)，1976 年 7 月 15 日

35．《中国的法律和政府》，1976 年第 9 卷第 3 期，第 145 页

36．特里尔编：《中国的差异》，第 169 页

37．K·林：《上苍的报复》，第 317 页

38．《中国之谜》，东京，第 92 页

39．F·凡·吉内根：《林彪的荣与衰》，第 76 页

40．《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 380 页

41．赖斯：《毛的道路》，第 253 页

42．《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第 650 页

43．施拉姆编：《毛主席对人民说》，第 255 页

44．赖斯：《毛的道路》，第 333 页

45．《中国阴云》，第 270 页

46．《中国的法律和政府》，1976 年第 9 卷第 3 期，第 144 页

47．《每日新闻》，东京，1967 年 1 月 15 日

48．《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1967 年 5 月 1 日

49．《问题与研究》，1977 年第 10 期，第 76 页

50．赖斯：《毛的道路》，第 324 页

51．《中国之谜》，第 27 页

52．《刘少奇全集》，罗德岛大学，香港，张作了序言

53．康普顿：《毛的中国：党的整风文献》，第 132 页

54．王明发表在《蒙古消息报》上的文章，1974 年 6 月 15—29 日

55．赖斯：《毛的道路》，第 192 页

59．《北京周报》，1966 年 5 月 6 日

57．《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1966 年 8 月 23 日，第 653 页

58．《当代背景》，第 891 号，第 75 页

59．施拉姆编：《毛主席对人民说》，第 277 页

60．《远东经济评论》，1969 年 10 月 2 日

61.《时代》周刊，1975 年 2 月 3 日
62. W·伯切特发表在《国家评论》上的文章，悉尼，1973 年 9 月 7—13 日
63. 1971 年 7 月 6 日，郭沫若与作者在北京交谈时，引用了毛的“极左派”一词
64.《红卫战报》，1967 年 4 月 13 日
65. 同上，1967 年 4 月 18 日
66.《中国季刊》，第 40 期，第 92 页
67.《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第 682 页
68.《中国大陆报刊概览》，4200 号，第 5 页
69.《人民日报》，1968 年 3 月 30 日
70. 同上，1968 年 1 月 2 日
71.《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1968 年 7 月 28 日

峣峣者易折

1. 施拉姆编：《毛主席对人民说》，第 280—281 页
2. 韩素音：《塔中之风》，第 336 页
3.《中央日报》，1972 年 11 月 4 日
4.《中共研究》，第四卷（3）
5. C·L·苏兹贝格：《最严酷的战争》，第 11 页
6.《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1967 年 12 月 17 日
7.《中央日报》，1972 年 11 月 4 日
8.《中共研究》，1972 年 9 月号，第 93 页
9. 施拉姆编：《毛主席对人民说》，第 289 页
10.《人民日报》，1969 年 8 月 1 日
11. 韩素音：《塔中之风》，第 339 页
12. 施拉姆编：《毛主席对人民说》，第 294 页
13. 维特克：《江青同志》，第 371 页
14. 安徽电台，1970 年 7 月 16 日；湖北电台，1970 年 7 月 17 日

15．韩素音：《塔中之风》，第343页
16．施拉姆编：《毛主席对人民说》，第294页
17．对于林彪领导能力的怀疑，见《红卫兵》，第95页韩素音发表在《纽约时报》上的文章，1972年8月21日
18．韩素音：《塔中之风》，第359页
19．张国焘回忆录，第一卷，第4章
20．尼克松政府中的一位官员告诉作者，是尼克松给毛的一封信，使毛在七十年代频繁地使用“霸权主义”一词
21．《法语世界》，1976年9月10日
22．《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00页
23．韩素音：《塔中之风》，第357页
24．施拉姆编：《毛主席对人民说》，第292页
25．斯诺：《漫长的革命》，第5页
26．当时，作者曾写道，老挝问题是中美关系缓和的最后障碍（见《八亿人口：真正的中国》，第145—146页）基辛格的回忆录证实了这一点：1971年4月21日，周恩来给尼克松的信件中有“鉴于当前形势”一词，这里是指老挝危机。（见基辛格：《白宫岁月》，第174页）
27．施拉姆编：《毛主席对人民说》，第297页
28．同上，第296页
29．《明报》，香港，1972年3月7日
30．维特克：《江青同志》，第360页
31．《中央日报》，1972年4月13日
32．维特克：《江青同志》，第372页
33．多米斯：《文化大革命后的中国》，第121页
34．关于林彪危机的叙述，除引用的文件外，还参阅了M·考的《林彪事件》；伯切特发表在《国家评论》上的文章，悉尼，1973年9月13日；C·墨菲发表在《国家评论》上的文章，纽约，1973年6月18日；以及《林彪事件原始文件汇编》，台北
35．《纽约时报》，1972年10月12日
36．墨菲发表在《国家评论》上的文章，纽约，1973年6月8日

37. 多米斯:《文化大革命后的中国》，第 130 页

38. 墨菲文

39. 莱利弗尔德发表在《纽约时报杂志》上的文章，1974 年 1 月 27 日

40. 《中央日报》，1972 年 4 月 13 日

41. 《纽约时报》，1971 年 10 月 1 日

42. 维特克:《江青同志》，第 15 章

43. M·考:《林彪事件》，第 76 页

44. 《中央日报》，1972 年 11 月 4 日

尼　克　松

1. 《人民日报》，1972 年 2 月 21 日

2. 《新潮周刊》，东京，1971 年 12 月号

3. 毛曾对尼克松承认，中国方面对他们到访存在一些阻力（见基辛格:《白宫岁月》，第 692 页

4. 《纽约时报》，1971 年 2 月 23 日

5. 路透社的詹姆斯·普林格尔报道了中国新闻界对尼克松访华报道的总字数

6. 郭沫若与作者在北京的谈话，1971 年 7 月 6 日

7. H·R·哈尔德曼:《权力的尽头》，第 90 页

8. 《纽约时报》，1971 年 2 月 21 日

9. 一位美国官员与作者谈过周对联合公报的看法

10. 基辛格:《白宫岁月》，第 1058 页

11. 尼克松:《尼克松回忆录》，第 2 卷、第 52 页

12. 基辛格:《白宫岁月》，第 1060 页

13. 洛德与作者的谈话，纽约，1979 年 9 月 27 日

14. 尼克松:《尼克松回忆录》，第二卷，第 28—29 页

15. 基辛格:《白宫岁月》，第 1060、1058、1062 页

16. 洛德与作者的谈话，1979 年 9 月 27 日

17. 《人民日报》，1972 年 2 月 22 日

18．1975年10月，《南华早报》援引《纽约时报》新闻服务处威廉·希尔的报道，谈到这件事（毛的一位朋友C·P·李说，是毛否决了周的建议）
19．《纽约时报》，1972年2月6日
20．Bungei Shunju，东京，1978年8月，基辛格：《白宫岁月》，第1062页
21．洛德与作者谈话，1979年9月27日
22．《新闻观察家》，1976年9月13日
23．基辛格谈"希特勒"的俏皮话是在哈佛大学对部分教员讲的
24．《新闻观察家》，1976年9月13日
25．尼克松：《尼克松回忆录》，第二卷，第29—30页
26．尼克松政府的一位官员告诉作者说，毛谈过尼克松的文章
27．《星期天报》，柏林，1956年12月16日
28．关于尼克松的许诺，卡特政府的一位高级官员告诉过作者，他读过尼克松北京会谈的副本。当时参加会谈的另一位官员也告诉过作者这件事
29．《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1958年11月30日
30．马库斯：《北京文集》，第289页
31．基辛格：《白宫岁月》，第1089页
32．《问题与研究》，1975年第2期

破碎的梦

1．张国焘发表在《纽约时报杂志》上的文章，谈到毛三次被逐出党的经过，1953年8月2日
2．H·索尔兹伯里发表在《纽约时报》上的文章，1976年1月11日
3．关于周恩来自1969年起对毛的肯定，见司马长丰的《毛泽东与周恩来》，第9页，他把这种伙伴关系称为"第六阶段"
4．这两处引自一份红卫兵小报，"一月风暴"，1968年5月，见斯梅东的《我所知道的周恩来》，香港《展望杂志》出版的小册子（没有出版时期）

5. W·歇顿发表在《波士顿环球报》上的文章，1976年1月11日
6. 多米斯《文化大革命后的中国》，第114页
7. 韩素音：《塔中之风》，第342页
8. 《香港时报》，1974年2月20日
9. 《华盛顿邮报》，1974年4月11日
10. 维特克：《江青同志》，第365页
11. 《参考资料》，台北，1972年8月16日，第2页
12. 《东京论坛》，1972年9月27日
13. 黄华与作者的谈话，纽约，1972年11月10日
14. 《中国大陆发生了什么》，1974年6月15日
15. 《问题与研究》，1974年第6期
16. 直到周恩来去逝之后，《人民日报》（1976年1月8日）才披露，他早在1972年就诊断为患了癌症
17. "邓小平的政海浮沉"，载《七十年代》，香港，1977年第3期
18. 《中国信息服务》，74—091号
19. 《七十年代》，香港，1977年第3期
20. 《北京周报》，1973年9月7日
21. 毛与惠特拉姆的会谈来自作者访问：惠特拉姆（堪培拉，1978年12月和其他时间）；菲茨杰拉德（堪培拉，1979年1月和其他时间）以及中国官员
22. 《新闻观察家》，1976年9月13日
23. 《问题与研究》，1975年第2期
24. 《人民日报》，1973年11月30日。毛在1966年说过，文化大革命"每隔七、八年"就要来一次（《问题与研究》，1973年第1期）
25. 《人民日报》，1973年8月10日
26. 同上，1973年12月28日
27. 同上，1974年1月30日
28. 同上，1974年2月14日
29. 同上，1974年10月7日，《毛泽东集》（中文版），东京，第六卷，第135页

30. 韩素音:《塔中之风》,第381页。关于批孔,见《明报》,香港,1976年10月25日

31.《人民日报》,1974年2月14日

32.《每日电讯报》,伦敦,1974年12月18日

33.《人民日报》,1974年5月12日

34.《人民日报》,1974年5月8日(桑戈尔);1974年2月26日(布迈丁);1974年2月23日(卡翁达);1974年3月26日(尼雷尔);1974年4月3日(乔森潘);1974年5月19日(马卡里奥斯)

35.《纽约时报》,1974年5月14日

36. 爱德华·弗里德曼教授引导我注意到周恩来的长沙之行,他是在中国从一次展览的文字说明中发现这一点的。

37. "四人帮的上台和下台",载《七十年代》,1976年第12期。另可见《明报》,香港,1976年10月28日

38.《人民日报》,1974年7月16日

39.《七十年代》,1976年第12期

40《七十年代》,1976年第12期,《明报》,香港,1976年10月28日,1976年10月29日

41.《问题与研究》,1975年第7期

42. 基辛格:《白宫岁月》,第1063页

43.《中国大陆发生了什么》,1976年4月30日

44.《星期日时报》,伦敦,1961年10月15日

45.《七十年代》,1977年第3期

46.《北京周报》,1975年1月24日

47.《七十年代》,1976年第12期,《明报》,香港,1976年10月26日

48.《中国信息服务》76—384号

49.《纽约时报》,1975年5月5日

50.《问题与研究》,1979年第1期

51.《人民日报》,1975年2月9日

52.《红旗》杂志,1975年第4期

53. 同上,1975年第3期

54. 克立与作者的谈话，曼谷，1979年11月10日
55. “1976年在广州看病”，载《七十年代》，1977年第2期
56. 克立与作者的谈话，曼谷，1979年11月10日
57. 对江青讲话的讨论，见特里尔：《中国之未来》，第55页；《明报》，香港，1976年10月27日
58. 《明报》，香港，1976年10月27日
59. 《中国季刊》第64期，第811页
60. 克立与作者的谈话，曼谷，1979年11月10日
61. R·马尔登：《马尔登》，第128页
62. F·阿尔索普发表在《读者文摘》上的文章，1975年12月；克立与作者的谈话，曼谷，1979年11月10日
63 菲律宾的一位政府官员向作者透露，毛曾对马科斯夫人说过这种话
64. 《中国季刊》，第64期，第811页；克立与作者的谈话，曼谷，1979年11月10日
65. 《远东经济评论》，1972年1月8日
66. 雷斯顿发表在《纽约时报》上的文章，1975年1月26日
67. 巴特菲尔德发表在《纽约时报杂志》的文章，1976年8月1日
68. 雷斯顿发表在《纽约时报》上的文章，1974年12月6日
69. 同上，1974年11月30日
70. 《新闻观察家》，1976年9月13日
71. 《新闻周刊》，1975年12月8日
72. F·阿尔索普发表在《读者文摘》上的文章，1975年12期
73. 《问题与研究》，1975年第7期

强弩之末

1. 朱莉·N·艾森豪威尔：《特殊的人》，第153页
2. 《人民日报》，1976年1月1日
3. 《中国大陆发生了什么》，1976年1月31日
4. 凡·吉奈根：第309页

5.《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1965年1月8日

6.《人民日报》，1967年5月28日

7.《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47页

8.《人民日报》1975年12月30日

9. 同上，1975年12月4日

10.《中国信息服务》77—381号

11. 朱莉·N·艾森豪威尔：《特殊的人》，第161页

12.《人民日报》1967年11月6日

13. 中国新闻社1969年4月27日

14.《特殊的人》第184—185页

15. 有关周恩来去世情况的叙述，来自作者当时在北京与外交官们的交谈

16.《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227页

17.《七十年代》，香港，1972年第12期

18.《人民日报》，1976年5月15日

19.《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1968年1月11日

20.《人民日报》，1976年1月1日

21. C.霍林沃斯发表在《每日电讯报》上的文章，伦敦，1976年2月19日

22.《问题与研究》，1976年第3期

23.《七十年代》，1977年第2期

24.《人民日报》，1976年3月10日

25. 同上，1976年3月10日

26. 同上，1976年2月17日

27. 同上，1976年2月17日

28.《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1958年5月20日

29. 联合出版研究中心，第52029号，第4页

30. 同上，第6、48页

31.《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374页

32.《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1964年6月16日

33.《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52页

34. 韩素音:《塔中之风》,第108页

35. 康普顿:《毛的中国:党的整风文献》,第36页

36.《人民日报》,1976年2月24—27日;《纽约时报》,1976年2月23—27日

37."可能会引起误解",来自中国外交官与作者的谈话

38. 萨菲尔发表在《纽约时报》上的文章,1976年2月9日

39.《中国季刊》,第64期,第811页;克立与作者的谈话,曼谷,1979年11月10日

40.《新闻观察家》,1976年9月13日

41. 毛在过去对宋江经常是持肯定态度的。见《矛盾论》(1937);《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1939)以及1959年在庐山回答彭德怀将军的挑战时的话

42.《人民日报》,1976年4月8日

43.《人民日报》,1976年4月8日

44.《伦敦时报》,1976年2月26日

45.《人民日报》,1976年3月28日

46. 这首词由L·O·李译成英文

47.《基督教科学箴言报》,1976年4月6日

48.《人民日报》,1976年4月8日

49. 同上,1976年4月8日

50.《伦敦时报》,1976年4月6日

51. 1979年,华谈到,他的两次提升(1976年2月和1976年4月)都是由毛亲自决定,政治局通过的(见《北京周报》,1979年10月19日)

52.《人民日报》,1976年4月8日

53.《七十年代》,1977年第2期

54.《人民日报》,1976年4月8日

55. 同上,1976年4月10日

56. 马尔登:《马尔登》,第128页

57.《人民日报》,1976年12月17日

58. 李光耀总理给作者的信,1979年11月28日

59.《中国季刊》,第67期,第676页

60．《中国大陆发生了什么》，1976年6月30日

61．《七十年代》，1977年第3期；《明报》，香港，1976年10月29—30日

62．《人民日报》，1976年3月10日

63．《七十年代》，1977年第2期

64．凡·吉耐根：第318页。关于这次床前会议的其他资料，见《BBC世界广播概要》，远东部分，第5335号，1976年10月12日；《明报》，1976年10月26—30日；《纽约时报》，1976年10月7日。关于毛所说的"帮助江青"这句话的意思，很可能毛指的这两种意思都有。

65．《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1964年6月16日

66．《七十年代》，1976年第12期；《法语世界》，1976年11月19日。

67．关于毛去世情况的叙述，来自作者当时在北京与外交官们的谈话。

68．《北京周报》，1976年9月13日

69．《中国新闻》，台北，1975年11月5日

70．BBC，远东部分，第5335号，1976年10月12日

71．《中国季刊》，第68期，第880页

72．《伦敦时报》，1976年9月11日

73．《人民日报》，1976年9月19日

结　语

1．参见斯诺：《西行漫记》；陈昌奉：《跟随毛主席长征》

2．对于毛的军事才能的分析，我采纳的是巴黎的雅各斯·吉尔梅兹教授的观点

3．特里尔：《八亿人口：真正的中国》，第68页

4．毛的话见"论人民民主专政"，载《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15页

5．D·威尔逊编：《毛泽东在历史的天平上》，第3页

6．斯诺：《大河彼岸》，第158页

7．《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第34页

8．同上（1969），1964年6月16日

9．到复旦大学的这位访问者是作者的学生，告诉作者这件事。

修订再版后记

初版中译本《毛泽东传》自1989年问世以来，受到了广大读者的关注和青睐。不少报刊载文，称赞它是一部好书。它溶学术性与通俗性于一体，将精辟独到的分析与生动、翔实的资料紧密结合，把主人公毛泽东写得血肉丰满，栩栩如生。

有赞扬也有批评。有的读者对本书的译文质量提出了意见，认为译文有一些舛错和误译之处。面对读者的批评，我们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和总结。为了对读者负责，为了给读者提供一个高质量的《毛泽东传》的中文译本，不负读者对本书的厚爱，我们决定修订此书。

几个译者通力合作，在原译文的基础上，又认真地对照原著，将全书重译了一遍，并将原书中的引语全部与中文的有关资料进行了核对，补上了注释部分。在此基础上，我们又请从事毛泽东研究的专业工作者对书稿进行了校订和润色。

通过译者、校者的共同努力，可以说，这部修订后的中译本《毛泽东传》基本上符合原著的内容与风格要求，达到了信、达、雅的基本标准。在此，我们向译者、校者，向一切关心爱护这部书的读者、朋友，致以衷心的感谢！

虽然修订后的《毛泽东传》比初版书的译文质量有了长足的进步，但我们仍然热诚地欢迎读者批评指正，以便进一步提高质量。

参加本书翻译工作的同志的分工为：丛守民（2，3）；刘路新（1，4，5，7，8，9，10，11，15，16）；高淮生（12）；许宁（13，14）；高庆国（6，17，18）；吴振洲（19，20，22，23）。译稿和修订稿的组织、通稿、加工润色主要由刘路新负责，高庆国协助刘路新作了大量工作。

河北人民出版社

1990年4月